

张发奎口述自传

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回忆录

张发奎 口述

夏莲瑛 访谈及记录

胡志伟 翻译及校注



张发奎其人

- ◎ 张发奎是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曾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北伐战争中担任被誉为“铁军”的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军长。
- ◎ 蒋介石称张发奎是模范军人，劝张不要搞政治，集中精力于军事任务，前途无量。
- ◎ 张发奎曾经是汪精卫的信徒，称“只要追随汪精卫，就不会迷失方向”。
- ◎ 在张发奎的部属中可以列出一批中共名将：叶挺、贺龙、叶剑英、林彪、张云逸、周士第……

张发奎语录

- ◎ 如果中山先生活着，国民党的训政一定早已结束，必须以德服人，而非以力服人。
- ◎ 自民国肇建以来，蒋先生是运用政治权谋的第一名。他希望别人对他诚实，但他自己却不诚实。
- ◎ 蒋先生养成了直接发布命令的习惯，其插手干扰引起了指挥系统的紊乱。
- ◎ 汪精卫作为行政院长，不敢对蒋先生进言。每逢出现议题，他总是看蒋先生的脸色，他本身没有主意。他一阔脸就变，变得官气十足，忘了从前的理想。
- ◎ 胡汉民确实是有许多优秀品格，他学问渊博，责任心强，人格完整，私生活也很简朴，但他不是一个伟人。
- ◎ 假若我是蒋先生，我会枪毙张学良，或者干脆放了他。
- ◎ 宋子文把中华民国当做私产。白崇禧足智多谋，但非常阴险。阎锡山圆滑狡黠。孙立人恃才傲物。杜聿明心高气傲。熊式辉爱摆官架子……
- ◎ 当共产党人下基层工作时，国民党人却忙着向上攀爬。

ISBN 978-7-5154-0121-8



定价：56.00元

张发奎口述自传

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回忆录

张发奎 口述
夏莲瑛 访谈及记录
胡志伟 翻译及校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发奎口述自传 /张发奎口述；夏莲瑛访谈及记录；
胡志伟翻译及校注.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 4
ISBN 978-7-5154-0121-8

I. ①张… II. ①张… ②夏… ③胡… III. ①张发奎
(1896~1980)—生平事迹 IV. ①K82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1509 号

出版人 周五一
责任编辑 姜楷杰
责任校对 王小芸
装帧设计 古手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辑部 (010)66572154 66572264 66572132
市场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60 毫米 1/16
印 张 27.5 印张 2 插页 插图 122 幅 484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6.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出版说明

张发奎（1896—1980），广东始兴人，国民党军二级上将。出身贫寒，16岁从军，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的警卫营长。北伐战争期间，率第四军第十二师在汀泗桥、贺胜桥连创吴佩孚部队，第四军被誉为“铁军”，张发奎也被称为“铁军英雄”。抗日战争中，他从淞沪到百色，从华东到西南，指挥过近50万国民党各个派系军队同日军作战。抗战胜利时，为广州战区接受日本投降的中国最高长官。1946年任广州行辕主任。1949年3月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同年6月底辞职，到香港定居。

张发奎84岁离世，亲历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许多重大事件。他所结交或过招、对抗过的现代名人既有国共两党政军要员，也有名流绅商、各系军阀、情报特工，甚至帮会豪强、汉奸土匪，还有美英、苏俄在华顾问、官员，越南、朝鲜等国人士，等等。因此，他的自传堪称20世纪中国历史的缩影，也是一部具体而微的北伐、抗日、国共战争史，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

《张发奎口述自传》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员夏莲瑛女士远渡重洋在香港两年、访问张发奎400多次录音记录的基础上，辅之以在港台两地访问国民党有关军政人员梁华盛、杨清文、黄旭初、邓龙光等多人获得的旁证资料，又与黄旭初、李宗仁、蔡廷锴等人的大量回忆录和其他历史文献核对考证，整理而成的。最初的英文抄本共1089页。在采访中，夏莲瑛以张发奎的私人记录——日记、电报、信函、公文为线索，按年代顺序询问他在每个历史事件中的亲身感受与目击真相，发现细节有误便会建议他澄清，既能挑剔含糊的答案，又能循循善诱，使他自然而然吐露出平时难以启口的事实。张发奎在访谈中说话坦率，牵扯到个人恩怨政坛是非的词句甚多。故他声明，第二十章的内容，在他有生之年，不得公开。其他章节涉及人物评价时也吩咐记录者用双括弧圈起，暂不公开。

2002年，胡志伟先生从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获得《张发奎口述自传》部分英文抄本，决定将这部“传记文学的奇葩、口述历史之极品”翻译成中文，使之“不再沉睡在异域图书馆的尘埃之中”。2005年，胡志伟先生赴美买下《张发奎口述自传》的中文版权。

在翻译过程中，胡志伟先生在文字转换和史实核对、考证方面极下功夫。中文本沿用英文抄本原来的安排，用第一人称问答形式展现全部内容，不更动一字一句。为保持传记作品在语气、声调、情绪等方面的生动性和鲜活性，对张发奎口述中带出的情绪化语调、粤语方言、谚语等方面都予以准确译出，使得这本传

记更加神完气足、引人入胜。

这本书的译注工作从2002年开始到2007年完成，历时六个春秋，九易其稿。在大量译注中，译者对史迹采取客观态度。对于传主所述与知情人回忆录有出入的史实和判断，均在注释中给出相关说法、史料，供读者判断。对于传主口述明显有误及整理者听错的地方，译者花大量工夫考证，提供注释，给出准确的史实。对于英文抄本的大量编辑错误，更是不厌其烦地予以订正。同时，译者从自己搜集的上千张照片中精选了100多张插入文中，图文并茂，强化了阅读中的形象感、现场感。

本书简体中文版依据繁体字本（《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略有删节。对于个别删节处理，以“……”（省略号）标示。对于传主规定在自己身后才可发表的内容，除第二十章外，在正文中间以“【】”作标记。

特此说明。

编者

【目录】

- 001 第一章 早年岁月
(1896年至1920年5月)
- 014 第二章 粤军
(1920年5月至10月)
- 026 第三章 在广东的军伍生涯
(1920年11月至1925年6月)
- 044 第四章 军队整编：第十二师
(1925年6月至1926年6月)
- 059 第五章 北伐中的“铁军”
(1926年6月至1927年4月)
- 083 第六章 第二次北伐与南昌暴动
(1927年4月至8月)
- 100 第七章 广州政变与广州暴动；隐退
(1927年8月至1929年初)
- 118 第八章 从镇压到合作：同桂系的关系
(1929年初至1931年5月)
- 138 第九章 政治与旅行
(1931年5月至1936年初)
- 156 第十章 闽赣浙皖边区与苏浙边区
(1936年初至1937年7月)
- 169 第十一章 淞沪会战与武汉会战
(1937年7月至1938年)
- 200 第十二章 第四战区（上）
(1938年冬至1939年9月)

222	第十三章 第四战区（下） (1939年10月至1944年春)
246	第十四章 四战区与越南 (1940年至1944年)
266	第十五章 桂柳会战 (1944年春至12月)
287	第十六章 准备反攻 (1944年12月至1945年8月)
303	第十七章 接收广东 (1945年8月中旬至1945年底)
326	第十八章 广州行营 (1946年至1947年)
342	第十九章 内战失利 (1947年11月至1950年)
368	第二十章 创建第三势力的努力以及类 似的牵连 (1950年至1962年)
407	第二十一章 在香港的日子 (1949年6月以后)
424	译注参考书目
429	译注后记

第一章 早年岁月

(1896年至1920年5月)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1896年9月2日），我生于粤北毗邻江西省的始兴县清化乡矮岭村（今隘子镇彩岭村）。我父亲叫我翼斌。

我们家族在彩岭村住了多久？我不清楚了。从哪里迁来？我也不能确定，但知道我们是客家人，我的祖先来自河南中州。清化乡的张氏宗族声称自己系唐朝宰相、始兴伯张九龄的后裔。张九龄是彩岭村附近石头塘的客族人。他的两个弟弟也当过官，其一任职于粤西南高州（今茂名市），另一在四川为官。时至今日，当我们见到四川和粤西南的张姓人氏，都认他们为我们的族人。

彩岭是一个非常贫瘠的村庄，那里居住着的100户张氏宗亲。在广东省，大多数村庄是按宗亲聚居的。外姓人是不允许迁入的。在清化乡的其他村庄，居住着刘姓、潘姓等。邻近的华屋村居住着华姓族人。所有的村庄之间相距约十里。所有这些村庄既小又古怪，人们都在梯田上耕作，每年仅收成一次，可耕地很少。

村民主要种植稻谷，也有玉米、番薯、芋头。每个家庭平均收成不超过150担（每担折合120斤）。很少有一户人家收成超过200担粮食。如果稻米不够吃，人们就用芋头熬粥，或以番薯、芋头充饥。人们也种植杉树，它可以制作棺材以及房屋的梁柱。所以邻近地区栽满了杉树。

大多数村民是贫穷的农民，中农很少，没有富农，更不必谈什么地主。多数农户是自耕农，少数系佃农。清化乡是很大的，涵盖了始兴县四分之一的面积，住有八千多村民，然而土地多为山岭，一眼望去山多人少，人们在此长途跋涉都不见人烟。始兴县其他乡的人口比较稠密，尤其是毗邻县城的乡镇，那个小镇住有两三千居民。镇上的人讲始兴方言，同我们清化乡的方言略有不同，但我们听得懂。

始兴县住的都是客家人，全县人口约十万人。我们客家人保留着许多古老的风俗，其中有些已经延续了几千年之久。我们比一般的中国人更为稳健。譬如，我们习惯于维持天足，妇女从不缠足，因为她们经常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读书人的妻子不让丈夫下田劳作，她独自揽下所有的重活，认为书生动手是羞耻的事。书生待在家里，养育孩子。我们可以说，客家妇女比男子更为强健，因为妇女下田劳动，而有些男子不下田。

我们客家人重男轻女。例如，客家人对初生女婴漠然置之。倘若一连生下三个女婴，第三个女婴就会被溺死。是不是只有穷人家才这么做？也未必。富人生了女儿又生女儿时，父母会埋怨姐姐拖来一个妹妹，为何不拖个弟弟来。溺毙第三个女婴后，他们期望下一胎是男婴，因为女婴会畏难却步。这当然是封建迷信。有时富豪家也会溺死女婴，所以溺婴的动机并非经济困难。客家人不管家中人口多少，从来不会溺毙男婴。

客家人也盛行童养媳。通常女孩子三岁就订亲了，她被送到男孩家住，一对童男童女在家里大厅上拜天地。当女孩长大到可以梳发髻时，亲友们便会应邀赴宴，也不必举行什么宗教仪式。穷人家固然这么做，有钱人家也往往借此将女儿打发出去。

客家人另一种坏习俗乃是“过三胎”——在贫寒的农户尚未诞下男婴时就把女孩送进门，等对方诞下男孩与之成婚。倘若亲家头一胎生女，婚事就告吹了。于是人们就等候第二胎，如果第二胎仍然是女孩，人们就再度等待。以三胎为限，设若第三胎仍是女婴，这户穷人就让孩子再嫁另一户，借此赚一笔钱；但若第三胎是男婴，不管男女双方年龄相差多大，是一定要成婚的。有时，男比女小十几岁，甚至小二十多岁。在这种个案，女孩从男孩诞生起就充任他的保姆。这一习惯并非限于穷人家，富户也借此将女儿打发出去。为什么穷人家没有生下孩子就先让孩子进门？答案很简单，男方担心家道中落后，男婴长大了会娶不上老婆。

客家人到处都有。他们起步于河南，定居到四川、江西、福建、广西和广东，以后者为多，他们构成了东江、北江流域人口的主体以及粤西南与西江流域人口的一部分，在广东省3500万人口中至少占了一半，如今^①香港350万市民中至少有100万人是客家人。客家人的风俗到处都是一样的，香港的客家餐馆虽然不是我的同乡开办的，但其风味同我家乡并无二致。你走到哪里，客家菜的口味都是雷同的。

方言也是如此。梅县客家话被视为标准的客家话，在中国大陆上不同地区的客家话只有些微区别，其发音是基本上相似的。有些地区，发音有点儿刺耳，另一些地区则比较柔和。江西的客家话与广东的客家话类似，只是尾音不同。陈济棠是粤西南客家人，我是北江流域客家人，然而我们俩说的是同一种方言；香港新界地区的客家话同我说的客家话是一样的，所以我同香港的太平绅士林道杨交谈使用客家话，他是新界粉岭的客家人。全球客家人的表达方式都是一样的。

我的祖先都是农民，祖父是贫农，他的四个儿子都务农。我父亲张居之排行第二。他二十出头就放弃农耕，投奔一位叔父到始兴县城，在县衙门充任一名刑房小吏。

我祖父那一代未曾上过学，父亲这一代多少都受过点教育。我父亲上过村

^① 指20世纪60年代中期，张发奎口述时的时间。——编者注

塾。由于祖父勤奋操劳，家境渐有改善。我父亲念书没花很多钱，他还没有达到参加昂贵的科举考试那一步。在那个年代，入学是很艰难的。在我们村里，男孩子半天上学，半天放牛砍柴。秋收之后，牲畜不需要放牧。在16岁以前，男孩没有能力在田野看住牛，所以不能被视为成人。

女孩同男孩一样要做家务杂事，但因她们不能上学，便要下地种菜插秧。我父亲的原配妻子是刘姓家族的，也住在清化乡。她没有生育就去世了。我母亲是填房，她生在始兴县城一个贫苦的家庭，姓萧。她第一胎生下女孩，我是老二，两年后我弟弟贵斌降生了。母亲带我们姐弟回乡祭扫祖墓，在村子里有三个叔叔和许多堂兄弟。接着，父亲的微薄薪金难以养活全家，母亲便带我们姐弟回乡。乡下有田有房，自祖父去世后，他的土地分开了，我父亲进城后，分到的土地耕不过来，一部分就租佃给别人去耕。我们每年收成几十担粮食，也种植蔬菜，可还是不够吃。父亲偶然回来看望我们。他很严厉，当我淘气或者赌钱被他抓到，他就打我。所以我在家中怯声怯气。

父亲喜欢帮助弱势群体，我常常见到他帮人撰写诉状。那时没有执业律师。因为长期浸淫于刑庭，他对司法机构绝无好感，故教诲我们永远不要从事涉法行业。

父亲意志十分坚强。他沉迷于鸦片烟十多年，我常见他斜倚在烟榻旁。一天早上，他起身后把烟榻、烟管和其他烟具搬到院子里付之一炬。我想，对于抽鸦片成瘾的人来说，这样做是很难熬的。而后，当他烟瘾发作时，就给我几个铜板去买米酒，就这样，他戒除了烟瘾。这就是为什么我不相信人们无法戒除恶习。我父亲就是这样戒绝鸦片烟瘾的。他为什么要戒烟？首先是考虑到财力，虽然那时鸦片价格低廉；其次，抽鸦片损害他的健康。

母亲十分和善，待我很慈祥，但每当父亲打我时她都不敢吭声。她是一个不识字的农妇，只会抚养子女。

母亲是佛教徒，她崇拜神佛，在特定日子就要戒荤茹素。父亲终生不信仰任何宗教，我也不信佛。在童年时代，我把学校旁边庙宇中的泥菩萨视为玩具。

9岁时我进了老式的私塾——粤人通称为“卜卜斋”，坐落在始兴县城。此后，全家又搬回县城。私塾只有一个老师，他用戒尺打我手心，有时用铅笔碾压我的五指，这是很疼的。但我从来不怕，我是很顽皮的，老实说，施行体罚对我有点惊吓，但事后马上就忘了。

私塾的课程以《三字经》为始，课文由三个字的句子组成，头一句是“人之初”。然后，我们诵读《论语》、《孟子》、《大学》以及《中庸》。

私塾挂着一幅孔子像。一开始就学习孔子的语录，可是我对孔夫子没有特别的印象，无论是他本人抑或他的学说。

学校里有十多个学生，年龄都差不多，也都很顽皮。

贵斌同我一起上学，但为时不长，不久他就过继给一位比较富裕的族人，回到乡村居住。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我进入始兴县高等小学堂，父亲给我取名“发葵”。“葵”是一种向阳花的名称。劝学所的一位客家长者给我取了字号“向华”，意即向着太阳。

始兴高等小学堂是在清废除科举制度——那就是所谓自强运动——后刚刚开办的。这是本县第一所洋学堂，由县政府斥资交劝学机构管理，配置了现代化的校舍与新式的设备。许多人申请入学，因为学校免费供给食宿。我也出于同样动机，这使家里不必付出分文。

一年级有大约20个学生，待遇很好，穿起了有高领和五个纽扣的制服以及皮靴，可是仍旧留着发辫。课程有地理、历史、算术、国语。我喜欢玩，我很懒，我厌恶学习，也厌恶旧式课程。当然我喜欢新式学堂，因为在那儿可以穿上制服，伙食也比家里丰盛。我们做游戏，也参加军训，踢足球，但没有网球。我不喜欢运动，因为我太小也太矮。在全班中，我是年龄最小也最矮的一个。我的同班同学有些已20岁了，有些已结过婚。在那个年代，人们习惯于早婚，十五六岁就成亲了。有个姓谭的男孩，才十二三岁，却娶了个30多岁的妻子。他出世之前，妻子就嫁入谭门。他的父亲是个裁缝。

任何老师想影响或感化我是不容易的，因为我很懒，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玩耍。我取笑、揶揄老师，不肯受教。我瞧不起他们。他们通常都同在卜卜斋一样处罚我，我会被罚站。

13岁时，我成为要求改善伙食的学生运动之领袖，我们砸烂了厨房中的所有盆碗。校方开除了我们七八个闹事学生。父亲打了我一顿，县太爷命令我们向校长认错求饶。我们忏悔了，保证永不再犯，校长宽恕了我们。

翌年暑假快到时，我和两个同学一起去游泳。我们把辫子上的线绳解下来，考虑到湿水之后可以快干。当同学李志嵩站在河岸上时，我们在浅水中练习狗爬式，谁也不知如何游泳。我们都比他年幼，尤其是我；同伴们都是十五六岁，李志嵩已十七八岁，成了家。他出自一个富裕家庭，我们呼唤他下水，他看上去很有自信，一跃入水。我们深受感动，以为他是游泳高手。他浮出水面又下沉，一位渡轮船夫大叫：“有人溺水了！”我们害怕了，抓起衣服一哄而散。

我们闯了祸，不敢出声，都用床单蒙住脑袋睡去。不久，李志嵩的衣服和另一位同学的扇子被发现了。人们跑来说：“有学生溺毙了。”扇子的主人说，可能是李志嵩遭遇不测，是他借去了那把扇子。同学们被召紧急集合，校方宣称，承认同李志嵩一起去游泳者不会受罚。谁也不敢承认，但是我们的辫梢都是湿淋淋的。我是同学中最年幼且最矮小的一个，站在排尾。老师认出我而且触摸我的头发，我不得不承认，还招出两位同学。于是，我们三人被开除了。我们没有被怀疑犯法，问题是我们不应该逃跑。事实上我们没理由跑，但是我们太不成熟了。

我回到家里，又挨了一顿打。这次校方不再宽恕我。父亲认为我是个没出息的孩子，常常捅乱子。

翌年我15岁，父亲托几个学生陪送我去广州。他给我10两银子——相当于

14 块大洋，就打发我上路。那时广东省通用的货币是两角钱的铜元，俗称“双毫”。一块大洋可以购买 30 多斤米。当然母亲是不情愿让我离家远行的，毕竟我是长子。

我对此不感到奇怪，父亲不喜欢我，因为我常常惹下麻烦。我被学校开除过两次。此外，他还有其他儿女要抚养。

我拿了几件衣服打成包袱。我们坐一艘小帆船去连江。因为只有白天开船，所以旅程耗费了七八天。夜间，帆船停泊在河边的村庄。由于水流湍急，夜间航行是很危险的。我们还害怕遇到土匪，所以就在连江搭火车去广州。

我给学生们煮饭，还做些杂活，以赚取车资。当学生们入校后，雇佣关系就结束了。我滞留在一家小旅馆，一日两餐加住宿耗费二十角五分。当钱花完时，我必须找工作做。我无脸回家乡。正好省政府为振兴实业训练技工所设的增步习艺所招收徒工，我去报名，并且很幸运被录取了。

这所技校坐落在广州郊区的增步。陈策与刘沛泉也在那时入学。陈策与我学习织布与染色。首先我们要学会清洗与漂白棉纱，刘沛泉学习陶器制作。我们还只是小孩子，彼此很了解，但我不认为我们会建立真正的友谊。若干年后，人们说，我们三人代表了陆海空军——陈策在海军（历任海军第一舰队总司令，军委会海军军令处处长），刘沛泉在云南空军。

我们每天工作至少十小时。我们很早起床，下午五点才歇工。午饭后可以小憩，每月休假两天，初一与十五。除了这两天，我们不能离开习艺所，好在院墙内地域宽广，可以在里边散步。过大年放假三天，但大多数人留所。我是没有足够的盘缠回家，要知道我是被家里撵出来的。母亲不愿意让我离开，那有什么用？她不识字也更不会写，那时的村妇都是文盲，她一分钱也没有。

我很少外出，没有钱也没朋友，如果勤奋努力，每月能挣一元两毛大洋，视织布数量多寡而定。那时我非常刻苦耐劳，常常名列前三名，月薪至少有一元两毛。

我们的待遇很好，有时上课，调皮捣蛋者受罚，那时我不再淘气了，我担忧如果再被开除，我将走投无路——我不能回家，因为家境贫寒，而且始兴太遥远了。我必须自立自强、循规蹈矩。

1911 年，听到广东新军反政的消息后，陈策把辫子剪掉了——他是第一个剪辫子的，我也跟着剪了。我太高兴了。为什么？因为我听说汉人已推翻满清，我不用再每天早晨梳辫子了，也不会再长头虱了。

我听说孙中山推翻了满清。有人说他是“孙大炮”（吹牛的）。我也听说汪精卫谋刺摄政王（1910 年）的事，但我所知不多，也无意谈论国家大事，我考虑的，是三年学徒结业后要找一份薪酬不错的职业。

广州反政后，增步习艺所关闭了，我便和一起南下的学生们回到始兴县。父亲训斥我，责问我为什么还要回来。那时没有辫子外出是很危险的，我们不知推翻满清会不会产生变卦。头发长出来需要一段时期，而我那时几乎是秃头。

增步习艺所 1912 年重开，我重回广州。校方指责我返校太迟，我声辩从报

纸得悉习艺所复开为时较迟，校方不由分说，即宣布开除我学籍。

我在旅店中滞留，花光了家里给我的十两银子，到哪里去赚回这些钱呢？此时我看到粤军模范团的招兵启事，我妹夫华文治与其兄长华岳高同我一齐去应征。我必须向连长与一个秦姓旗手恳求收容我，因为我发育偏迟，虽然年近十七且健康良好，但实在长得太矮小了。

为什么我找不到工作呢？因为哪怕找一份文职工作都要寻铺保，可是我在广州举目无亲，没有其他赚钱谋生充饥的门路，于是我当了兵。

有人说，反清革命成功后，身为军人是很荣耀的。我不同意中国谚语——“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既然如此，为什么回到广州我不马上参军？是因为我想不到军队会收录我，我实在太小了。当时我没有选择余地。入伍后，我对民间藐视军人的传统观念逐渐有所理解。

模范团是否意味着与众不同？不，这个团的所谓“模范”只是名字而已。它直属于粤军总司令部，同另外三个师下辖的战斗团地位相同，粮饷相同，制服相同。模范团下辖两个营。

在模范团，我是年纪最小的。我扛一支来福枪，别人干什么我也干什么。我从不感觉苦，因为父亲不喜欢、不关心我，所以我不想家。

月初，营长发给连长每人十元一毛五。这笔钱包括主食——米、副食——食油、盐、木柴、蔬果，每人每日两毛，月计六元。减除这笔开支，每月尾我能净收月饷四元一毛五。由于主、副食开支每日仅一毛五分，我每周可领取三毛五分钱外快。那个年代物价便宜，一毛五分钱一天已经吃得很好了，每餐都有肉吃。

连长很喜欢我，虽然年纪小，我很活跃，排长也喜欢我。几个月后我被擢升为副班长，挂下士衔。设在黄埔的广东陆军小学招生考试时，连长鼓励我去试一试。他考虑我本来上过学，去军校可以继续我的学业。然而他也告诉我，我资历不够，所以每晚给我补习中文与算术，尤其是前者。他给我做投考黄埔的担保人，如果我成功入学，模范团就可以保留我的名额，每月十元一毛五饷银照付。他认为，一旦保举投考军校成功，对连队是莫大的荣誉。我本人不乐意这一安排。为什么？我生怕穿军服去应试会被人小看。故我正式请假穿便服去应试。

3000个应征者竞争120个名额，明文规定每个县可录取1人，大县倘若有人录取，名额可增至2名。始兴县有30多人报名，可是南雄县报名人数很少。始兴县的同乡便希望我以南雄县籍报考，使他们减少阻力。可是我拒绝了。

我顺利考取了。有个有趣的故事：考试分为三场，头一场是体能测试，另两场是笔试。真是巧得很，连长教我的题目正是第三场的考题——《吴起为将与士卒同甘苦论》。我只要凭记忆写一遍就行了，一切犹如神助。

我是始兴县唯一被录取的。事实上，作为一个士兵，我是资历最浅的，别人都是高小毕业生。如果没有连长的辅导，我是进不了设在黄埔的广东陆军小学的。设若我考不上，就得回到模范团去当二等兵——团部是不会为我保留副班长职位的。

对于上军校，我的感受很简单：上学总比继续当兵强，毕业后，我在军中更有前途。那时我已知道怎样去盘算，相信自己会告别士兵的生涯，但不知道何时能晋升军官。

南雄县一个也没被录取，模范团还有两人被录取——方颐与谭在汉，他们都是团部保举的；薛岳和高汉宗是第十团保举的——我看见他俩穿了军服入考场，此时的薛岳名叫薛仰岳。

因为我请不成假去广东陆军小学注册，我请华岳高代我去办理。注册官把我的姓名第三个字写成“奎”，意谓男子汉大步走，葵与奎同音。于是我的名字成了张发奎，并沿用至今。

入学时需要提供铺保，这事引起一场争执。我的队长——相当于连长的教官问我铺保是谁。我答道：如果学校不接纳，我就回部队去。此时副官长熊略听到嘈声，询问发生什么事。我解释道：我是遥远的外地来的客家人，在广州无亲无故，到哪儿去找铺保呀？熊略对我说，我应该在广州寻一家商铺，请店主盖个刻有店名的图章，再来找他。于是我照办了。就这样，我进入了广东陆军小学堂，时维1912年。军校设在黄埔，由广东省政府管理。我们免缴学费、宿费、膳费、制服费，一切都免费。另外，每个月发给两块钱零用金。海军学校也设在黄埔。我再次见到陈策。

翁式亮是黄埔广东陆军小学校长。大多数教师是粤籍人士，军校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是粤籍人士。不过那儿有一个朝鲜学生。

学生按照年龄编班，我被编在16岁班级，有120名学生，其中包括李汉魂、薛岳、黄琪翔、韩汉英、陈芝馨、李振球、邓龙光、缪培南、吴逸之、吴奇伟、王超以及邓挥——邓铿的弟弟。黄琪翔的姓名同现在相比，音同而字不同。

15岁班级包括余汉谋、黄镇球、叶肇、张达、徐景唐和华振中。华是我家邻近的华屋村亲戚。

大多数学员都高小毕业，仅少数学员，像我和薛岳是行伍出身。薛岳与我是好朋友，我俩是北江地区的同乡。他是个好学、上进心强的孩子，立场坚定，斗志昂扬，我十分崇敬他。我们选修国文、地理、历史、物理、化学、算术等。我们也学习外语。我们班级学德语，15岁班级学日语。学校尚无成套的规章，每年由广东省政府决定新招收的一班学习何种外语，至于军事科目只有操练与来福枪射击。在那里，我初次接触了中国古代军事经典——《孙子兵法》。我认为孙子兵法是经验之谈，我将它视为军队的圣经。我崇拜吴起，他同士兵甘苦与共。我相信只有吴起这种品格才能带领士兵同生死共患难。换言之，统帅必须以身作则。入学试时我凭借吴起的故事才过了关，我崇拜他，当然也崇拜岳飞与戚继光。

我是个很懒惰的学生，在全班名次总是倒数第三名。我们犯下轻微错误就要记过，三个小过积累一个大过，三个大过会开除或禁闭。有时我们会在课堂里罚站逾一小时或者全副武装伫立三小时。犯下较严重过失的人会被关入“反省室”

一两天。

1913年，我母亲病故。我回乡奔丧，姐姐告诉我母亲因难产而死。我父亲太不可理喻，他把妹妹送给一个江西人，从此音讯全无。此时家中还有八个孩子，在贵斌下面有两个妹妹，接着两个弟弟嘉斌与勇斌，下面又是两个妹妹。父亲送走的是九妹。

我父母把七妹送到华家去当童养媳，当时我12岁，她才3岁。我背着她放进花轿送入华家，一块红布遮着她的头。她按规矩拜天地，新郎叫华文治。华家是富户。父母亲把八妹也送出去当童养媳。

母亲去世后，父亲辞去了始兴县衙门刑房小吏的职务回到村里。那时他已不再适合耕田，故把田地租给姐姐的夫家耕种，自己经营鱼塘。姐姐嫁给一位姓曾的客家农民，住在十里外的邻村，那儿仅住着六七户农家。

在广东陆军小学的岁月里，我对日本人的憎恨与日俱增，因为日本人欺侮我们，加上从历史课上知悉朝鲜、台湾的沦丧^①，使我更加仇恨日本人。

我也逐渐滋长了革命思想。广东军政府陆军司司长邓铿想征募优秀青年投入革命事业，便派人向我们宣传革命。苏璋已接替翁式亮任陆军小学校长，他是国民党员。我们班级分成三部分，各40人，李章达负责教导我这一部分，我们称呼他“学长”——相当于排长。他是国民党员，他介绍六七位同学——包括薛岳和我——加入了国民党。不久，龙济光成了都督。接着，徐雨三接替了苏璋。孙中山的著作我们不敢读，龙济光是很严酷的，但我们从报纸上得悉革命的进展，开始信仰三民主义。起初我对三民主义不甚了了，甚至感觉革命是不必要的。国民党改组成中华革命党后受到袁世凯爪牙龙济光的残酷迫害，我们耳闻目睹龙济光的暴政，这才悟出革命是必要的。

快毕业时，朱执信指派四五位同学参加二次革命。那时国民党员有十多人，我们都想加入，便只好抽签。被成功抽中的是薛岳、谭在汉和罗宇澄，薛岳再也没有回到学校。

我去了广州，希望也加入反袁之役，但未获准。除了回校我别无出路，因为我家境贫寒又离得很远。但回校后，我发觉我已被开除，我号啕大哭，恳求校方宽容，终于得遂所愿。

不久，我们听说薛岳、林直勉、梁树熊和谭惠泉等人在广州湾（今湛江）被法租界当局拘捕。法国巡捕询问姓名时，薛岳漏报仰字，此后就成了薛岳。他和同志十余人被投入监狱。梁华盛的父亲梁海山也是国民党员，一起从事“讨龙”斗争，他侥幸逃脱骠骑追捕，遂给人狱诸君送饭。

1914年陆小毕业后，我们全班迁入武昌第二军官预备学校，黄埔的广东陆军小学就此停办。陆军小学第四、第五、第六期学生同时并入武昌军官预校，我

^① 朝鲜半岛上的国家在中国的汉朝至清朝时期曾是中国的附属国，甲午战后日本逼迫清政府放弃对朝的宗主权。而台湾自古为中国领土，台湾的沦丧区别于朝鲜。——编者注

认识黄埔陆军小学第五期的同学，但不认识第四期学生，其中有邓演达与李扬敬。他们在第四期毕业后经短期培训课程也调来武昌，邓演达和我成了好朋友。

我们这一班继续念德文，比起在黄埔，军事课程增多了。我开始崇拜拿破仑，不是他的箴言“战争的第一、第二、第三项需要都是金钱”，而是钦佩他的格言“胜利取决于最后五分钟坚持”。

一如既往，我仍旧懒散。例如有一次与司徒非等同学比赛谁画得最快，我抓起几支铅笔用一张纸包起，第一个走出赛场。

武昌官校有一千多学生，这是我首次有机会接触外省人，但他们都同我差不多。由于人数太多，学生中具有革命倾向者占多少我不能确定，我们不得不从事秘密工作。我和几位同学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其主要成员是来自广东陆小参加过中华革命党者，非粤籍的成员包括浙人樊崧甫^①。

在中华革命党的影响下，1916年初，驻扎在武昌的炮兵旅计划举义，我校几百名学生打算响应义举。我们向校方申领军火弹药。可是学校根本没有贮存军火，我们碰了壁，起义也失败了。

这时国文教师告诉我，我上了黑名单。所以我爬墙逃到汉口英国租界，和我一起逃跑的有司徒非、林杰兴和樊崧甫，他们都在黑名单上。我乘上一艘英国轮船去了上海。

我们愿望加入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的运动，樊崧甫要我们参加浙江省的反袁军。但是，我们三个广东人都想回到广东参加朱执信领导、总部设在四邑（指台山、开平、新会和恩平，在广州西南二三百公里处）的反龙（即龙济光）之役，那时邓铿正负责东江之役。

就这样，樊崧甫独自去了浙江，我们三人经上海去香港。我们在早先抵达香港的反袁同学中了解朱执信的情况，此时薛岳、林直勉、谭惠泉、梁树熊等人已从安南（今越南）河内的法国监狱获释，到澳门找到了朱执信，其他同学加入了陈炯明或徐谦的队伍。林杰兴和我决定去澳门看望薛岳等人，由他们介绍，我俩加入了朱执信的机关。

在澳门，我见到了朱执信、邓铿、廖仲恺以及古应芬。邓铿和廖仲恺是东江地区的客家人，朱执信和古应芬是我们通称的“番禺捕属”，他们是跟着大官到广州做胥吏的外省人后裔。这些外省人在衙门中任书吏，统称“老夫子”，俗称“师爷”。由于他们中间许多人祖籍浙江绍兴，所以不论他们究竟是否来自绍兴，统称“绍兴师爷”。当携带他们来广州的官员调走时，他们却留下来，有时他们继续为新上任的官员任事，有时离开衙门以撰写讼状为生，聚居在广州附近的番禺。那时广州并非广东省省会，广州的一部分是南海县，另一部分是番禺县，这两个县都隶属于广州府。他们的后代与粤籍人氏广泛通婚，通常都受过良好教

^① 樊崧甫（1894—1979），浙江缙云人，保定六期。历任国民党军七十九师师长、四十六军军长。抗战时任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上将军衔。

育，能找到好差事。他们常常收取厚酬充当枪手替富家子弟参加科举考试。他们被视为百分之百的广东人。胡汉民与汪精卫也都是所谓“番禺捕属”。

朱执信组织了民军，其中包括从台山招募的土匪——俗称“大天二”，以及粤军、学生等。民军有数百人，大多是粤籍人氏。土匪占了多数。梁盛与其他粤军首领是有革命思想的，他们的喽啰很顺从首领。梁盛去澳门见朱执信，朱要他攻打江门与新会。鉴于反袁革命没有独立的军队，朱执信饥不择食，当然朱执信担心梁盛部下不守军纪，所以他派我和司徒非去监管梁盛。

我俩是徒手前往的，因为澳门法律不准藏有枪械。估计梁盛们不会给我俩配发武器，我俩抱着赴死的决心出发，每人带着一盒香烟，其中有一些含剧毒，备作被俘后熬刑不过自杀之用。虽然囚犯会被搜走身上财物，但通常可以保存香烟。

梁盛服从我俩的指导，因为我们是朱执信派遣的。我们帮助梁盛指挥他的部下攻打江门，像民军军官一样，我俩穿着黑色的生丝新裤。战斗持续了几小时。这是我的第一次战斗经历。当时我只是个大孩子，我当然害怕，听到枪声就发抖。战斗全面铺开，龙济光增援部队到达后，我们很快被击败和溃散了。梁盛为了表示效忠朱执信，乃派遣一个土匪护送我与司徒非去澳门向朱执信报告。

司徒非和我在路上被地方民团截住了，他们问我俩是新军还是旧军。旧军是指龙济光的济军。我俩说隶属新军，刚被龙济光部打散。他们绑起了我俩，看上去要枪毙。司徒非是开平人，想说服他们让我俩去香山，但是枉然。在此关键时刻，有一个在当地具影响力的老人来到现场。他说，不管我们是什么军，都应该放掉，如果有必要，别人也会解决我俩。他的意见占了上风，我俩保住了性命。于是在那个土匪陪送下到了澳门。

司徒非与薛岳同朱执信留在南湾花园。李扬敬、徐景唐、张达、李章达与我住在何隆兴街52号一楼。

然后，朱执信派遣王超、司徒非、薛岳、徐景唐、李扬敬和我去邓铿的石龙总部。我们被安排了卑微的职位，黄埔陆军小学第四期学员周演明当副官长，邓信任他。由于不堪忍耐他的傲慢态度，王超、薛岳与我回到了澳门。临走前，王超写了封信解释我们辞职的原因，由我呈交邓铿。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了。我和同学们看到报纸上登载通知，要我们回到武昌陆军中学。朱执信认为我们应该回校。所有同学都决定回校，唯独我不想回去。朱执信给回校的同学都发放了路费，他自己也离开了澳门。

薛岳、我以及其他十位同志滞留澳门，以朱执信临走前留下的500元钱维持生活，暂住的三间房每月必须交纳20元钱房租。我们当然要吃饭，当500元钱用完时，我们打算以赌博维生。几个月后，薛岳和我决定去香港。我们收受了几百元钱的孙中山公债券，那时是属于非法的。薛岳揣着债券，一到香港就被捕了。我去寻找驻港机关。到那儿时，我见到薛岳与几个警察。他宣称自己是机关雇用的厨子，我也编了个谎话。最后邓彦华用钱把警察打发走了，薛岳被开释。

薛岳与我烧毁了公债券，各自回家。

不久华振中来信说，我可以去保定，然而我先要考虑自己有没有足够的盘缠。父亲卖了田又借上债，凑集一百多元，但还是不够去保定的路费。

父亲与我从始兴县城搭乘一艘小船，有个姓关的亲戚是军人，正好同船。父亲作了介绍后，关氏询问我作过什么事，为何不去保定。我说没钱，他教训我道，我只是个大孩子，尚未完成学业就要干革命，实在太傻。我认为他讲得对，但那时我内心忐忑不安，并不认为要先念够了书才有资格参加革命，然而我还是放弃了去保定军校的计划。

到了广州，我写信给住在乐昌乡下的薛岳，我叫他来广州，于是我们合住一间旅舍。我的钱花光了，必须去找工作。我们去找梁树熊介绍。他是个革命者，同薛岳一起坐过牢；此时正担任烟酒专卖局总务主任。他介绍薛岳去专卖局石龙办事处，介绍我去肇庆办事处。我即去了肇庆，那个经理很客气，问我住在哪里，要我等一下，让他查看有没有空缺。我想这是打官腔敷衍我，便直说：“不要打官腔，老实告诉我，你究竟有没有事情给我做？”那时我口袋里只剩下几元钱，仅够回广州的路费。设若我在肇庆苦候，势必花光这笔钱，陷入窘境。他嫌我太粗鲁，我们吵了起来，于是我走了。

我乘船回广州，这次我独自一人，身无分文，不能再住旅馆了。我找朋友、同学消磨时间，他们的确不计较同我交往，但他们的父母耿耿于怀。晚上我睡在大街上。毕竟我不忍心打扰朋友们。

有一天，我长途跋涉去看望我妹妹的公爷华先生。他是个木材商人。我的要求并不高，只告贷五元钱，想借此再支持一个月花销。不料他不仅拒绝借钱给我，甚至不留我吃顿饭，还训斥了我一顿。

我决定去找以前的一位老师，他正在魏邦平（时任广州市警察厅厅长）手下做事，我想他也许会给我找一份工作。看见他走入一座建筑物时我紧紧尾随，哨兵却说他不在。我指哨兵说谎，他说我不懂人事。很明显，这位老师不想见我。

似乎我已无路可走，但我不想写信求家里帮助，即使开口，父亲也不会给我分文。我向天字码头走去，想蹈海自杀。当我见到自己在海水中的影像时，我突然想到，既然我16岁就能入伍当兵，为什么20多岁不能重新入伍呢？部队一直在招兵。既然我已经接受了中学教育，那并不意味着我不能重新当兵。想通了这一点，我不再去跳海了，决定参军从头来过。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自杀企图。此后我的人生历程一帆风顺。事实上，我从来没有再产生沮丧或压抑感。每当我打了败仗——那是兵家常事，我都不会垂头丧气。只要我斗志昂扬，一切都会转危为安的。我是个乐天派，否则那天晚上我已经跳海了。

正好在这一关键时刻，我撞见了司徒非。他告诉我，朱执信正在找我。上次我遇见他时，他问我在哪儿，可惜我没回答他。司徒非一直追随朱执信，曾告诉

朱，他遇见过我，然而他二人都不知道怎样同我联络。于是，我去见朱，他把我留下了，时维1917年，我21岁。

朱执信在广州河（今珠江）南给一群革命青年租赁了一所住房，那里是他的支持者李福林所控制的地域。李福林当过土匪，辛亥革命前他就入草为寇了，他常常将一束报纸裹着一支手电筒，用以恐吓路人，使人误以为他持有手枪，所以老百姓称他为“李灯筒”（粤语手电筒）。以后他用“灯筒”的谐音字“登同”为字号，这是孙中山给他改的。

朱执信给我们讲述革命历史，他的道德感染力更为重要。当我们穿着华服时，他不说什么，不知何故我们就不敢再穿得那么阔绰了。朱执信夫妇俩都生活俭朴，居陋室，自己做家务。总之，朱执信是个有道德的人。

邓铿也常常向我们讲话。在那个时期，邓铿和朱执信对我的人生观起了最大的影响作用，他俩帮助我提高了革命觉悟，可以说我的前途是在他俩引导下塑造的。

李福林要求广西都督陆荣廷委任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为广州士敏土厂厂长。于是，革命党人就有饭吃了。薛岳、司徒非、刘纪文和我都在该厂找到了工作。我被安排负责煤炭供应，我们四人都得到60元月薪。

胡毅生是个善良的革命家，他对下属态度和气。他的职务是名义上的，所以他很少到厂里来，只是把士敏土厂当作革命党人维持生计的工具。由于厂里没有足够职位提供，我们中的单身汉必须拿出一半薪金去救济分配不到工作的同志们。我要求父亲把弟弟们交给我，三弟嘉斌来了广州，报读了南梧中学附小。此后我一直负担他的教育，每月仅耗费八至十元。父亲不肯让幼弟勇斌来广州，一直把他留在身边。

我希望父亲再娶，并答应负担一切开支。他拒绝了我这建议，他说倘若再生下孩子，新娘会虐待我的弟妹。

1917年7月，中山先生来广州，9月10日他正式就任大元帅职，在广州士敏土厂设立了（中华民国护法）军政府。司徒非、陈策和我都成了中山先生的便衣卫队成员。我们跟着他到处走，但很少有机会与他交谈。

我见过中山先生那时的随身保镖双枪将莫里斯·科恩，他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外国人。

1918年1月3日，因新任粤督莫荣新擅杀大元帅府卫队数十人，孙大元帅命莫查办无果，乃命效忠于孙的两舰炮轰督军府以示薄惩。莫荣新是陆荣廷的亲信，我记得胡毅生命令我运煤给那两艘炮舰。炮战失利，两艘舰逃走了。

同情中山先生的广东省长朱庆澜将警卫军20个营拨付护法政府，这20个营重新编组后称为“粤军”，中山先生委任陈炯明为司令，邓铿为参谋长。粤军集中在汕头，邓铿号召在水泥厂工作的革命青年参加粤军，我告诉他我不能去，因为我要照顾嘉斌的学业。薛岳去了，后来粤军奉命援闽。孙大元帅以武人作梗，与护法宗旨相违，乃辞职，于5月20日离穗赴沪。

在这段时期我去基督教教堂做礼拜，对基督教产生很大兴趣。前已说过，我不相信佛教。水泥厂的一位主管邓彦华娶了一位上过教会学校的女孩，入了基督教，我就跟他们上教堂。

1920年，胡汉民的兄长胡清瑞内定继胡毅生任士敏土厂厂长。我对胡毅生说我打算离厂。这里有个逗笑的故事：厂里有个湖北籍的李姓副厂长善于命相。有一天他给我算命，说我如果从军，可以升到营长阶级；设若我从事文职，我将做到巡按使（专员）。我听了很不以为然，我才不信那套鬼话，于是我加入了粤军，旨在揭破那湖北佬的谎言。

我参加粤军的另一个原因是：传说中山先生已下令援闽粤军返粤^①，我示望加入回粤的队伍。因此我要求胡毅生准我辞职。那时，我除了嘉斌，并无其他负担，此外，我已攒了些钱。胡毅生劝我继续为他的堂弟做事，也保证胡清瑞会像他自己一样善待我。我把命相佬的预言告诉了他，我去意甚坚，要求他给在闽的邓铿写一封介绍信。胡毅生在函中说，我离开士敏土厂的唯一原因是希望成为军人。我揣着这封信去闽南漳州投奔邓铿。倘非为了揭穿那个算命的同事的鬼话，我一定仍留在士敏土厂。这个故事也显示了，我为什么不相信、永远不相信命相佬的预言。

^① 1920年冬，直皖战事爆发，因盘踞两粤之桂军与直系勾结，派兵入闽，表面上进攻驻闽之皖系督军李厚基，而实欲假途消灭驻闽之粤军，打击革命力量。孙中山乃下令陈炯明率师返旆。

第二章 粤军

(1920年5月至10月)

1920年5月，我被指派担任士官，隶属于驻漳州的粤军总司令部。这个职位原本不在粤军组织编制内，每月薪饷原定月薪25元，但我从未领到那么多钱。有两种士官：一种月薪25元，另一种35元，薛岳与邓演达属于后者，叶挺已经成为粤军工兵营的连长。邓铿安置我任最低级的职务，因为1918年我不肯投奔他。他问我薪饷最低能不能接受，我说什么也能忍受。

士官每月发饷两次：月中和月底。我们不穿制服——哪有钱买制服？我们没有什么事可做。当士官有点照顾性质，做一些零活，像送送信。士官另一种称呼叫“查勤”，听上去令人不舒服。

士官必须自己寻找住处、自己料理膳食。我住在驻漳州的粤军独立营某连连部，因为我认识广东陆军小学第四期毕业生李浚，和与我同在第五期毕业的王超，前者是独立营营长，后者任连长。我睡在王超连部的一张帆布床上，与连部军官一起用膳。当然我要付膳费。

独立营是邓铿的基本部队，它原本是驻扎在汕头时由邓铿组建的独立排，直属粤军总司令部，后来逐步扩充成独立连、独立营。

粤军控制了包括厦门在内的闽西南地区以及粤东的一小部分，其财源在就地征税，县政府负责收取固定税款，他们的固定岁入是土地税。县长通常预先征收一年或几年的税款，即所谓“寅吃卯粮”。这种税制在中国是常见的，特别是四川，田赋预征几十年之多，因为那个省的政局不稳定。地方税是岁入的另一来源，所有的地方税务机关都奉命把税款交给粤军总司令部。作为绝招，粤军会向当地商会“借”一笔特别费，这就是所谓老虎借猪——有借没还。军队是否按月获发固定经费没有定规，一切要视地方财政状况而定。当地方政府不能提供足够经费时，军方就拖欠饷银。

粤军总司令部在漳州设立了一家造币厂，交周演明管理。这家厂子铸造双毫，但含银量比粤制双毫少，所以老百姓宁收一枚粤制双毫也不愿收取两枚漳州双毫。周演明曾与我一起去漳州旅行，此后别人再也不敢小看我。

粤军直至连一级都有军旗，旗上图案相同，只是级别愈低旗帜愈小。

粤军总司令部下辖八个部门：秘书、参谋、副官、供应、军械、军法、医疗以及军务。中山先生把十二个警卫营交付陈炯明，此后扩充成粤军，陈炯明麾下

有几个上校衔的统领，职位相当于团长，手下至少有两个营，有些是三个营，数量多少是由于各该单位的不同历史背景造成的。在那个年代，中国的军队好像是私人的军队，统领的副手帮统挂中校军衔。

再者，陈炯明的部队包含整支“绿林好汉”单位，也有部分“绿林好汉”的单位。杨坤如统领原来就是广东东江地区的土匪，他转投粤军是因为他要为正义而战，部下有些本来是土匪，有些是地方民团成员，有些正规军单位，例如许崇智、方声涛和张贞指挥的单位，是直属陈炯明的。

军官分为三种类别：官或战斗兵种的军官——指挥官、参谋官；佐或技术兵种军官——副官、医疗、后勤人员；士官——秘书，办事员等，均系文职。文职的定义是指既非军校毕业生又非从行伍提拔起来者。粤军军官的出身背景我所知甚少。大多数低级军官与许多中级军官来自贫农与中农家庭，高级军官什么成分都有——农民、地主、官员、学生，还有少数来自商人家庭。

几乎所有高级军官都是军校毕业生，他们有些是前清的广东讲武堂毕业的，有些是保定军校毕业的，少数高级军官是行伍出身，例如梁鸿楷与洪兆麟。许多中级或校级军官是保定军校、广东讲武堂、军官讲习所和速成学校毕业生，也有云南讲武堂的，他们是外省学生中最优秀的，少数从行伍提升。多数低级或连级军官从士兵中拔擢，有些上过广东讲武堂或者军官讲习所，少数上过速成学校。保定军校毕业生至少当连长。广东学生从保定军校毕业后，会在北方担任短期的教官，然后当排长。北方比南方太平，阎锡山治下的山西犹然。北方的军队比南方稳定。这些广东学生南归后，就当上连长或参谋官。

广东讲武堂、军官讲习所及速成学校是广东省政府经管的。速成军校的学生多数是中学毕业生；讲武堂与讲习所的学员多数是从士兵提拔的低级军官，仅少数是中学毕业生。这些军校的训练课程只需要一年半，自然不能同保定军校毕业生相比，后者从陆军小学课程开始，要读八年才能毕业。

事实上，大多数高级军官喜欢用行伍出身的军官——包括广东讲武堂和其他省办讲武堂毕业生——当排长，因为他们比正规军校毕业生容易指挥，他们通常思想单纯，作战勇敢。再者，行伍出身的军官是非观念分明，而军校毕业生更会盘算个人得失。此外，倘若军校毕业生获委为排长，他在实质上是孤独的，因为他周围是一群粗鲁的行伍出身军人。在北方，情况截然不同，排长们都是军校毕业生。

士兵文化程度很低，少数人是文盲，多数人仅识几个字，多数人是贫苦农民；少数人是无业游民。他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当兵找出路，二是懒惰一无所长而又贪吃者。前者到处都有，后者毫无前途。

士兵都希望升军官，梦想过高级军官的奢华生活。在中国，实现此一梦想者寥寥可数——我马上可以举出冯玉祥、蔡廷锴和梁鸿楷，然而士兵们绝大多数只能梦想。在那个年代，士兵们期望至少升任班长，只要识几个字和生气勃勃，三年就能升班长。一个班有九个士兵，两个头目：班长挂中衔，副班长是下士，真

正的列兵只剩七个。

非委任的军官和士兵的擢升通常由本连的连长提拔，军官们看待非委任军官同看待士兵一样，非委任军官也把自己当成士兵，因此产生了“士兵”（士与兵）这一名词。当一位比较高级的军官讲话时，通常把听众分成两类，他会说“长官们，弟兄们”，后者就是指“士兵”。

在低级军官与士兵之间没有明显的等级差别。由于大多数士官是士兵晋升的，他们自然会亲近手下的弟兄。排长把自己看作这个家庭的首领，把班长当作弟弟，把士兵当成儿子。那就是为什么中国士兵被称为“子弟兵”。

排长成天守住他的士兵，要执行忙碌的计划——操练两次和讲授两堂。第一场操练在上午七点半，早餐是九点；紧接着十点上第一节课。午休后，两点上第二节课，三点钟上第二场操练。每堂操练和讲课都是一小时。操练内容是实弹射击、格斗训练等，演习与模拟战也会举行。排长会讲述基本军事课本，例如军事行动规则的书，解释它的内容，有时会教士兵阅读。四点钟吃饭，饭后排长带领，参加连部组织的行军，大家一边走一边唱军歌。到达目的地后，士兵可以随意散步或爬山，其他人可以尽情欣赏风景。然后做捉迷藏一类的游戏。足球赛很流行，因为他们随身能携带的只有一只球，他们绕着踢，却没有球门；有时打排球和篮球。天黑时，士兵们集合回营。九点钟，人人都要休息。每星期六，下午操练与课程被检查代替。排长视察每个班的清洁卫生，看看毯子是否干净、便鞋是否沾满泥污；还要检查步枪是否保养良好，特别是看刺刀是否生锈。

连长也很亲近士兵，排长们做的事连长大多数要做，然而并非所有的低级军官都按指示做，有些人是懒汉。有些刚学习识字的低级军官，学业进度是有限的，然而作为排长，担任连队值日官主持早晚两次点名时，他们必须会念士兵们的姓名，有些排长识字很少，只能凭记忆去背诵士兵们的姓名。

当团长打算在驻地征募新兵时，他直接通知县长或者几位县长。换言之，他只要同他辖区的最高行政长官接触，宣告他需要征募新兵。当他想在自己的辖区以外征兵时，他必须取得粤军总司令部的批准，由总部颁令各该地区协助。常有军官对长官说，他有本事在故乡征集一批新兵，于是长官便派他回乡执行任务。军官会得到一笔钱，付给每个新兵作为安家费。

另一种常见的征兵方法是：某一位无职军人对长官说他能故乡征募一批新兵，长官便派他回乡。如果他成功地带回一批新兵，他便会委任为副官，作为酬劳。

这位军官回到他故乡县份时，会拜访县长，贴出布告，表明某部要来征兵，这张布告会详细说明新兵的年龄与健康规限。县长有时直接协助，给每个新兵发放安家费，也会补偿给他新兵的交通费用。新兵的年龄规定必须是18至25岁，但在实施时，来者不拒，未成年人与25岁以上的壮丁都接受，甚至瞎一只眼的都收，只要能走路就行，他们可以当炊事兵。

征募的兵的服役期是不明确的，有时士兵能获准回家奔丧或探视患病的亲

人，但必须提出重大的理由。在请假离营期间，饷银便被部队克扣了。

官兵的薪饷等级是由编制表规定的。尉官要扣下 10% 薪饷，校官和将官要扣 20%。士兵不扣。以下就是粤军官兵扣饷前后的薪级表：

等 级	饷 银	实 得
新 兵	10.50	10.50
列 兵	12.00	12.00
下 士	14.00	14.00
中 士	16.00	16.00
技术军士	20.00	20.00
上 士	24.00	24.00
少 尉	40.00	36.00
中 尉	60.00	54.00
上 尉	90.00	81.00
少 校	160.00	128.00
中 校	220.00	176.00
上 校	300.00	240.00
少 将	400.00	320.00
中 将	600.00	480.00
上 将	800.00	640.00

每月初，粤军总司令部后勤部门会按每位士兵两毫一日或六元一月的标准，向驻地长官发放饷银，这笔钱包括主食——米钱，以及副食——食油，食盐、木柴和菜金。如果粤军总部经费支绌，团部就只能得到十天的饷银，团部一次拨付营部几天的伙食费，营部拨付连部几天伙食钱，这一切没有定规。到了月底，新兵照例会获发十元五毛饷银扣除六元伙食费的余额——四元五毛钱。事实上，他很少机会领得上这一笔钱。因为粤军财政拮据，总部常常拖欠饷银。由于伙食费开支每人每天仅耗一毛五，合每月四元五毛，所以每月能剩下一元五毛。于是，每逢星期日，连长会给每个新兵派发四毛钱，一个新兵每周有四毛钱零花当然很开心，那总比做乞丐强。这一制度对新兵与中士、下士一视同仁。技术军士与上士同连部的军官一起用膳，连部获发的技术军士、上士以及军官的伙食费是每天四毛，即每月十二元，通常连部为士官支付每月伙食费六元，如果每月实际开支大于六元，连部会予以补发。所以一名技术军士月底会获发六元钱的伙食尾子，

但他很少会领到饷银与伙食费的差额——八元大洋。技术军士在连部协助文书上士从事文书工作，也有在营部后勤部门担任办事员工作，所以他们是文官。上士在连部负责财务、膳食，后勤等事务，职位相当于准尉。

军官们很少领到那份打了折扣的饷银与伙食费的差额，换言之，一名少尉月饷40元，扣除一成后实发36元，再扣除伙食费12元后，应发的24元往往成了镜花水月。然而，在这种征募制度下，中国的军事单位从未足额过，军官们能借此占些便宜。战斗部队维持规定兵员是特别困难的，但是有些战斗单位是领取全额薪饷的，能否如愿端赖独立单位与后勤部门的关系。

很少粤军单位能领到全额薪饷，多数单位领到的金额少于足额编制，但他们都虚报人头，连长向营长多报，营长向团长多报，逐级都是如此，人人都眼开眼闭，这就是“吃空额”。由于大家都这样做，所以无人会举报。

我在连部见到，连部不会迅速向上级申报逃亡人数，迟些申报的话，连长就可以吞没开小差士兵的那份粮饷。但粤军有保存人事与战斗记录。

部队一日两餐，上午九时与下午四时。每个班任命一名伙夫，每天清晨，连部的上士出去采购，伴随着三个戴着红色“购粮班长”袖标的值日班长以及三个值日伙夫，这是为了防止上士舞弊。上士与三个值日班长有权挑选食物品种，唯一的限制是买干辣椒必须得到所有士兵的同意。那三个值日伙夫跟着挑运大宗的补给品，其中主要是蔬菜与猪肉，偶尔也买牛肉，它售价比猪肉便宜，因为吃牛肉的人不多。事实上，农村见不到牛肉，只有市镇上才有。军队喜欢猪肉，因其富有营养。我们常常买肥肉，它是最廉价的猪肉，也最富有营养，吃了容易强壮，而士兵都是骨瘦如柴。模范团的伙食比粤军好得多，因为那几年物价上涨了许多。

当部队奉命驻守某地时，士兵会自己饲养猪与鸡，栽种蔬菜，以改善伙食。一头猪需要几个月才能喂养到百多斤重，然后被屠宰。军人最爱吃鸡，但除了农历新年与节日，是吃不到鸡的，甚至军官也很少吃到鸡。

粤军士兵加入部队后，每人获发两套军服。每套都有上衣，裤子与军帽。有时还领到一件汗衫。冬天他们会领到棉衣与夹裤。每年领一套新军服，棉军服则两年发一套。

我们都戴“铜鼓盔”，它是竹子做的，形状像鼓，用来遮阳防雨挡子弹。这种铜鼓盔是广东部队的显著特征。每个月每个兵获发两毛钱买草鞋——名为草鞋，但只有中间是草编的，其余部分是麻织的，因为脚背受压力较小。只要有空，士兵们买了稻草与大麻，自己编织草鞋。有时他们编织纯麻的凉鞋，那就比较耐穿。军服穿烂了都不会扔掉，因为破布可以同麻掺合起来编织草鞋。这样，两毛钱就能编两双草鞋，买两双草鞋要花四毛钱。通常不打仗时，士兵们都光着脚板。

有些军官甚至打仗时也不穿军服，这是为了方便。夏天他们穿着生丝做的黑衫裤（俗称香云纱），冬天则穿淡绿色绒线衫。穿什么他们可以自主。营级以上

军官可以随心所欲穿衣，但大多数营连长是穿军服的，他们要上操场，另一原因是他们缺钱买便服。营连长也同士兵一样穿草鞋。

高级军官则穿胶鞋或布鞋。然而，行军时他们大多数人穿草鞋，因为胶鞋容易滑跤，布鞋湿了水很重。很少有军官穿皮鞋，因为不适合爬山，而且不方便，湿了很闷气。

士兵按规定发给一条毯子，可以对角斜披在身上；一件雨衣——其实是一件涂了桐油的布披风；一只饭盒；一只口粮袋；一只水壶；一把两用镐锹；一支枪；一条容纳150发子弹的子弹带，有时子弹带是皮做的，但多数是布制的。子弹带用带子横过身上，十字形绕住腰部。这一切是按规定配备的，但有时要两个战士合用一条毯子，有时一个士兵得不到一只饭盒，只能用杯子吃饭。部队常在拂晓发动进攻，士兵在半夜就要开饭，用饭盒或茶杯装饭揣在怀里上战场。

至于取得弹药的方法，在一场战斗之后，我们叫老百姓去捡拾子弹壳，然后再花钱从老百姓手中买回来，有时我们自己也捡子弹壳，把弹壳清洗干净后送回武器修配厂重新充填火药。当然，这种弹药的品质是下等的。

武器由军需库承担修理。我们的枪支大多是陈旧的，有些没刺刀，步枪的口径各不相同——我们有汉阳、沈阳、上海、巩县以及石井兵工厂造的七九步枪；也有德制步枪，其中有些是19世纪末叶制造的，另一些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造的。一般认为德制武器品质最佳。

所有的高级军官、部分营连长持有手枪，多半是毛瑟枪。有些排长只能持竹棍，因为手枪不够分配，他们挥舞竹棍指挥士兵，有时用竹棍敲击士兵的背脊逼他们冲锋。当一名士兵在战斗中倒下来时，一位低级军官就会接收他的步枪。

粤军有一些上海制造局出产的口径75毫米山炮以及一些瑞典造卜福斯式高射炮。我们也有一些空气冷却式机枪，多半是国产的，可以连发24发子弹；还有一些水冷式机枪，能连发250颗子弹，多是德国造的。

粤军的住房由连部安排，连长与他的参谋人员住在连部，排长与他的士兵住在可以征用的营房。如果借不到，经与县长或其他地方官协商后就入住学校、祠堂、庙宇等。

已婚的军官能与家眷同房，但有时她们需要住在营部或者团部。通常只有较高级的军官已婚，多数中校以上军官已婚，有些少校已婚，但连级军官已婚者很少。家属们在军中不能享有任何待遇。军人阵亡后，按规定，阵亡军官遗属可以领到一些抚恤金，但绝大多数遗属领不到，因为粤军太穷了。

上校以上的军官不少纳妾，上校以下的军官很少能负担妾。军人比平民更倾向于纳妾，因为他们常常远离家园。列兵与士官已婚的很少，那时候的妇女不准丈夫参军。军中没有营妓。日本军队设有营妓，但中国军队没有。因为此举容易生嫉。例如，一位连长喜欢排长的女友，后者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前者可能会在营长面前说后者的坏话，最后可能会酿成血案。还有中国人认为部队携带妓女是不吉利的，所以随军医院的护士尽皆男性。中国军人是驯服服从的，下级一定

服从上级。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人强调精神生活重于物质生活，这是中国人与外国人不同的一点。

粤军有基本的医疗设施，漳州有一家军医院，每个团部配备了一名受过西方医疗训练的医生，以及一名药剂师、三名男护士。多数医生是在中国修读医学的，有些是北京中国军医学院毕业生。

军中最常见的疾病是感冒、胃疼、着凉和烂脚，医生多数使用西药，像阿司匹林等，因为他们受的是西药训练，如果他们使用中药，人们会嘲笑他们，说他们是外行。士兵们不喜欢西药，时常向连长索要虎标万金油、消食丸等中成药去抑止胃疼。

多数的军人都想当指挥官。参谋人员至多升到参谋长。要升到指挥官的职位是凭借活人的汗、死人的血，此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参谋军官往往是被忽视的一群。

可是，排长是暴露在重大险情面前的，因为他们接近前线。有些军官怕死、想避免接触危险场面，便钻营充当参谋或副官，以后他们会调任副团长，到了那一层次，就远离战场了。

一个低级或中级军官要由他的统领推荐才能由粤军总部拔擢，升职才能晋衔。这类推荐通常都能被接受。升职的标准是战时建功，和平时期忠诚勤奋，譬如训练士兵成绩出色。资历也很重要。例如，连长出缺时，连里的排长们谁领中尉军衔，通常就能补缺。一个连队三个排长，一般仅有一个中尉，另二个少尉。等级制度与年龄无关，有些人少尉一当好多年，中、高级军官也有这种情形。

我怎样才能走上快速升官的捷径？立功——和平时期忠诚勤奋，善待士兵、爱兵如子、严格约束士兵，其中勤勉是重要的；在战时，必须勇敢。这样，我的上级才会注意我并推荐我升级，我从不依赖亲友帮我冒尖。但确实有些军官会拍马屁——刻意讨好上司，例如，赠送上司所喜欢的古董或者给上司拉皮条以求加分。

从年轻时开始，士兵们就被教诲：服从命令是神圣的职责，营长几乎绝对服从上司的命令——开战或者停火，本人从不分析问题，也不考虑打仗是为了国家、人民抑或上司。

人人都想升级，但如果他感觉在某一单位没有前途，他可以辞职另谋高就，有时候会寻求文职。由于大多数中国军人是职业军人，一无所长，故不易在其他行业找到工作。他们并无奢望去当县长，因为知道县官难做。由于粤军仅仅控制一小块地域，县官的职缺仅几个，况且军中的文官往往能依靠高级军官的推荐得到这类肥缺，所以军人只能在军队中得到拔擢。军人作战或尽忠职守可以升官晋级但不会获颁奖章或勋章。

军官犯错处罚最严厉的是送军法审判，但这很少见；开除军籍是常见的。犯过失不甚严重的军官会被革职留任——一种典型的中国式安置。在中国军队中很少见到降级的案例。在那个年代我所服务过的单位内，我记不起任何这类军官受

降级处分的个案。然而“降级”这个名词还是有人使用的。军官们犯了小过错会受到记过处分，三个小过并成一个大过，三次大过会导致开除或受审。

如果作战阵亡人数太多，官长会不会受处罚要视环境而定——设若损失由他指挥错误引起，他会被撤职。擅自撤退会受什么处罚也要视具体情况，撤职或送军法处，或者不予处分。总的来说，粤军的纪律是松弛的。死刑仅适用于军官携械逃跑、临阵脱逃或战时逃亡，或率众逃亡等。

老兵的数目不很多，士兵是不能辞职的。当他们感到体力衰退时，他们会请长假，通常是35至40岁，他们的长官会让他们离开。长官若是个好官，还会给点钱。那些留在部队不走的人通常是无家可归，他们可以转任伙夫。一般来讲，倘若当几年兵也升不到班长，他不会留下来。对于非委任的军士，如果军士做了一段时期升不到军官，他们通常会请长假。请假离开前没有任何钱可领。

士兵与军士怎样受奖？升级。他们较易受哪种处罚？一些轻微的过失如损坏公物、打架斗殴、言语粗鲁，会被排长训斥或者记过。排长会将犯过失者关禁闭；严重的过错会解送上级机关交付军法审判。那时没有鞭刑，有时犯过失者会被戒尺打手心二三十下，或者他会被罚跪一段时间，如30分钟。死刑仅施行于携枪逃亡或临阵脱逃。前者会立案调查，一般会枪决；后者不经调查立即处决。通常开小差者会被他本单位的低级军官辨认出来。

携枪逃跑是重罪，因为一支步枪值许多钱。在多数案例中，逃兵是被可观的金钱所诱惑而开小差的，有道是“武器是军人的第二生命”，一支枪对广东人来说就意味着生命，持枪的广东人可以所欲为，外省人可不是如此。在广东，掉队的士兵会遭遇抢劫，有时会被杀，诱因是枪支。当一名士兵掉队时，他的排长或连长会接过他的枪支，让他过一会追上来。在湖南或江西，如果士兵掉队了不要紧，没人敢夺他手里的枪。在河南，一支枪卖不到十元钱；在广东，一支枪轻易可卖到二百大洋。

广东人为什么这样喜欢枪支？首先，广东的村庄之间往往都有夙仇，大多数的村庄都居住着同一族人。村庄之间爆发械斗（粤人好斗）时，强者一定战胜弱者，所以武器对于进攻与防守同样重要。其次，广东常遭受匪患，老百姓需要枪支抵御土匪，有些村庄组织了自卫团。然而民团良莠不齐，枪支常常流入土匪手中。

四邑人氏比广东其他地区的人更珍惜枪支。因为华侨回到四邑买屋或造屋，他们有更多的钱购买枪支，用以组织民团抵抗土匪。

广东人在粤军中占多数，但也有外省人，例如福建人和湖南人，统领洪兆麟就是河南人。最好的广东士兵来自钦州、廉州、高州和粤西南的雷州半岛，那些地区的人民喜欢当兵，刻苦耐劳，官长们都喜欢招募他们到自己的单位；东江与北江流域地区出身的士兵在素质与数量上屈居第二。西江流域山岭罕见，是富裕地区，所以出产不了好兵。

没人会去广州府、南海县、番禺县、顺德、东莞、香山等地征募新兵。那里

的百姓谋生容易，缺乏耐力。广州府出过几个军官，多数担任参谋工作；有些人离开军队去了保定军校，他们怕吃苦。四邑出产的军人不多，多数四邑男人去了国外。

客家族人在粤军中占了一大部分，我随口可以说出下列在漳州的粤军客族军人姓名：熊略、杨坤如、张民达、邓铿、邓演达、叶挺、谢英伯、薛岳、翁式亮、黄强和叶举。

客家人陶冶出优秀的军人，他们在山区谋生的艰辛岁月铸就了筚路蓝缕、克勤克俭的品格。东江地区的客家妇女连抬轿这样的重活都干，可见客家人的冒险精神。日本人所赞誉的“广东精神”实际指的是“客家精神”。

粤军中大多数官兵是客家人，中国近代史显示了客家军人的卓越成就。我可以举出下列例子：粤西南——防城陈济棠、廉州陈铭枢；东江流域——大埔吴奇伟和罗卓英，梅县叶剑英、黄镇球、黄琪翔、黄慕松、熊略和张民达，惠州叶举、叶挺、邓演达、邓铿、杨坤如、黄强和翁式亮，高明谢英伯，五华缪培南；北江地区——乐昌薛岳，曲江许志锐和欧震。据说中山先生也是客家人，他有不少客家拥护者，如廖仲恺就是东江流域博罗县人氏。但我从不以身为客家人而自豪，也并不与客家人特别亲近，当然，我们聚在一起时常常讲客家话，但我从不喜欢黄琪翔，他是客家人，我器重朱晖日，他却不是客家人。我感觉自己是广东人。

一般来说，广东军人能够身居要职。例如，在抗日战争期间，十个战区司令长官中有三个是广东人：薛岳、余汉谋与我。非客家族的粤籍军人我记得有：粤西南——高州的邓龙光、李汉魂，廉州香翰屏；北江地区——陈可钰；东江地区——海丰陈炯明，潮州翁照垣；西江地区——罗定蔡廷锴，高要余汉谋，新兴梁鸿楷；四邑地区——台山朱晖日；广州府——番禺许崇智，东莞蒋光鼐、徐景唐、李扬敬、李章达。

军队没有宗族或地区性组织，军中结社是禁止的。然而，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地方性的社团。例如，我驻扎广州时，可以加入张氏宗亲会或始兴南雄同乡会，军方不会干涉。官兵们极少加入这类地方社团，士兵更从来不会加入。

中国国民党（从中华革命党改组而成）在粤军中发展党员，有些高、中级军官加入了，低级军官极少加入，士兵则完全无人加入。

1920年7月，援闽粤军起程回师广东，它分为两个师，邓铿兼任第一师师长，洪兆麟任第二师师长，我随邓铿行军。直到开抵汕头附近的澄海以前，我们未遭遇莫荣新部的抵抗。

粤军征集民夫的方法是军方每天要求县长或村里的长者募集一批民夫，亦即军方接触地方上的首领来达成目标。每晚队伍抵达目的地后，就换上另一批民夫，原先那批民夫就回家。倘如找不到继任的民夫，那就仍旧留用原来那批人，有时我们会在旧人中留下几个。有时我们雇用妇女做挑夫，然而天黑就让她们回家。酬金是明订的，每十里路付两毫。粤军也强征民夫，譬如，先前雇的挑夫逃

跑了，我们就要强征挑夫。我们强征民夫——这是常发生的事——时，队伍到达过夜的地点后，就要把民夫看守住。有时要用绳子把他们拴在一起，强制他们服役，但仍按规定付酬。

通常部队一小时行军10里路，每天平均行军60里，走三天休息一天。急行军时每天走100里。我们完全依靠人力来运输，因为粤南地形多山而我们只有少量骡马。每个民夫挑60斤货——包括弹药和炊具。南方的军队习惯于携带炊具行军，我们称之为“野战厨房”。寻找住房时由一名高级副官率领、从各营中抽调官兵组成的先遣组会提前两小时到达宿营地，他们向地方当局要求派房。先遣组负责人负责分配房舍，人们不能奢望有床睡，多数时候士兵用稻草铺在地上权充床铺，一切要看那些陌生的村民是否害怕军队。即使那个村庄愿意合作，但村民除了老幼都已逃走。他们匿藏在邻村，直至军队开拔才返村。百姓多害怕拉夫，粤军有些单位军纪欠佳，搜掠村民的蔬菜，抓小鸡吃；军纪良好的单位则按照市价偿付粮价。

我们的通讯设备很简单，通讯单位设在师部与总部。我们利用当地的电报局，用密码联络。总部与师部有电话，团部就少见。我们把电话连在电报线上。在没有电报线的地方，粤军在休整地点设置中继站，转播总部、师部、团部之间的电讯。站与站之间最大距离是20里，当信差到达一个站，站长签收文件后，派一名部下送文件到下一站，信差要走得很快。团部与其下级单位之间不必设立中继站，因其间距离较短。

情报组织方面，师部负责战略与战术情报。当我们准备次日发动攻击时，团长会派出一个营作为前锋；营长则派遣一个连作为尖兵连；连长指定一个排作为尖兵排；排长通常命令一位班长带领几个聪敏机伶的士兵向右前方搜索行进，另两位班长率众向左前方与中间搜索前进，他本人则同排里剩余的士兵留下来。通常尖兵连比营内其他连提早出发三小时，这就是战术情报机构。至于战略情报则由师部雇用当地居民，派遣他们到敌方驻地作侦察而取得，有时师部派遣官兵去侦察。例如，一位军官是我们将展开战斗地区的原居民，情报机构会派他回家。他会假装已经退伍，系回籍定居，一切都视当地局势而定。

弹药怎样储存与分派？挑夫将弹药运到团部，在战时，必要时他们要运送弹药到前线，他们也帮助运送伤患。寻找民夫把伤患从团部送往后方是团长的责任。士兵们自己把伤患从前沿阵地抬出来，通常用担架、椅子或门板。医疗设备方面，开始向南方行军时，总部分发虎标万金油与其他中成药给士兵们。没有战地医院，没有救护站。伤患在团部会得到绷带、红药水等。可以想象，仅能提供初级的医疗设施，其功用是止血。

当我们进攻汕头时，第二师师长洪兆麟从各连抽调士兵组成了敢死队，由几名军官率领。洪师长给每位敢死队成员发放了一种券证，允诺持证者缴获敌方一支步枪就可领赏50大洋。虽然我在第一师师部追随邓铿，但仍没有步枪，我向洪兆麟要了一张券证，加入了敢死队。见到我们冲上去时，许多敌军残部就投降

了，我挥舞着棍棒解除了一个敌兵的武器。占领汕头后，我上缴了步枪，遂领到了50元赏金。这是洪兆麟想出的一个临时主意，然而颁发奖金给攻城掠地成功的单位，是常有的事。

邓铿见我作战勇敢，便升我为师部副官，挂中尉衔。这样我便赶上了薛岳他们的官阶。不久我被任命为（二十一营营长）杨坤如部上尉参谋。杨是土匪出身。任命这一职务是为了建立师部与杨坤如之间的联络。他曾要求邓铿给他些“军校生”，声称邓铿有恁多军校生。事实上邓铿有许多保定军校毕业生。但我缺乏安全感，不想去跟随杨坤如那类人。

1920年9月在海丰与陆丰附近，当我们准备攻打惠州时，邓铿想组织督战队这种特别单位，任命我为上尉指挥官。督战队由80人组成，是从第一、第二师各单位中抽调的，编成九个班——九个人一个班——三个排，每一排自己选举排长，于是我有三个排长做助手，督战队队长相当于连长的职务。

督战队的职能是阻止违令者擅自后退，我们举起军旗站在第一线后面，倘若士兵后退，我们有权开枪。士兵们没有后撤，因为我们打了胜仗。督战队的另一功能是军队占领一地后维持风纪，所以督战队的成员必须是十分勇敢。督战队是否设立，要视部队长考虑他的部下是否需要监督与鼓励而定。在进攻惠州时，邓铿感到杨坤如部和洪兆麟部战绩欠佳，他相信凭借我在杨部服务的经验，颇适合去指挥这一特殊单位。此外洪兆麟对我印象不错，他见过我要求加入敢死队，知道我是勇敢的。

我有官印，与连长同级别，那“钤记”是一个方形的木章，几分钟就刻成了。我拿上这个官印，首次当了指挥官。我认为当指挥官最重要的品格是勇敢，“死生由命，富贵在天”。在战斗中我有时会担惊：当我听到炮火声时心跳就加快了。但这种恐惧感慢慢就消失，变得十分镇定，习惯于炮火声浪了。

在惠州之役后，部队的进展是安稳的，占领石龙后挺进广州。但当我们败退时，情况很糟糕，我们的伤员处境凄惨，敌军既不会善待他们也不会杀害他们。只要有可能，伤员同我们一起撤退，蹒跚而行。

体格健全的俘虏会被敌军收编，那时双方兵员都不充足。当我们打了胜仗时，不会像他们那样苛待被俘官兵，但是也不会优先照顾敌军被俘人员，因为我们连自己的伤员都照顾不过来。通常我们忙于追击敌军，敌方的伤兵按例由地方上的商会照顾，熬稀饭给他们喝。有些人回家了，去留自决。我们会安葬阵亡的官兵，把敌军尸体留在战场上。

至于健壮的敌俘，在解除武装后，会命令几乎所有的人充当挑夫。连长会根据需要，留下一批俘虏充当“永久挑夫”，剩下的便解送到营部去，那些需要永久挑夫的单位便会优先受惠。我们不付酬劳给这类挑夫，只是提供膳宿。他们若是拒绝，好的单位会让他们离开，坏的单位就违背他们的意愿强迫留下来，因为他们是战利品的一部分。过了一段时期，便把他们安置到战斗单位。被俘的敌军士官有时也充当挑夫。我们不会接纳被俘的敌方军官，一方面，我们不担心军官

职缺无人填补，另一方面他们不愿加入我军，这里有一个效忠的悬念。当解除了武装之后我们不再把他们当作敌人，会拍他们肩头，同他们握手，也不在乎他们干什么，毕竟他们多数是广东人，回家并不困难。我们会审讯他们，但不会刑讯逼供。从士兵提升的军官，思想比较简单，他们不会噤声，有碗说碗，有碟说碟。但他们只知晓自己单位里的事情。军校毕业生就不同了，从他们口中套问情报很不容易，有些人不吭声。我们必须以不同的方式亲近他们——必须更有礼貌。至于士兵，我们很少审问他们——毕竟他们所知甚少。

1920年9月21日，在石龙附近，我的良师益友朱执信死在虎门要塞。当时他正想游说莫荣新的部队投向我们，虎门要塞司令丘渭南部下对是否反正意见分歧，他前往调解，事后据称一名哨兵误击了他一枪。但是，跟随朱执信去虎门要塞的几位同志说，那天有人要找他，他说“我就是朱执信”，接着子弹打中了他。我猜想这是丘渭南下的命令。

根据在漳州时达成的协议，（警察厅长）魏邦平与（广惠镇守使）李福林答应同粤军合作。1920年10月26日，我们占领了广州，莫荣新麾下的桂军撤回广西。那时桂军林虎的部队驻扎在粤西南，他的下属陈铭枢营长和陈济棠连长倒向我们，俗称“输诚”。前者是保定军校毕业生，后者是邓演达在黄埔广东陆军小学和陆军速成学校的同班同学，毕业后入桂军任实习官。蔡廷锴则在陈铭枢麾下当排长。

投向另一支部队，在当时很体面。当他们投诚时，是由于服膺对方浴血战斗所奉行的宗旨，此举同“投降”完全不同。投降是很丢脸的，在战场上打不过对方时才会发生投降的事。

第三章 在广东的军伍生涯

(1920年11月至1925年6月)

1920年11月，中山先生离沪返粤，复大元帅职，任命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省长。粤军成立了第一师，粤军参谋长邓铿兼任第一师师长，陈可钰任师参谋长。梁鸿楷被委任为第一师第一旅旅长，下辖两个团，第一团团长谢毅，第二团团长徐汉臣。梁鸿楷是第一师属下唯一的旅长。陈修爵掌第三团，陈铭枢第四团。许多独立营的班长被委任为第一师的连排长，独立营直属于第一师，由齐公恪任营长，王超任副营长。其他隶属第一师的单位还有吴植夫的工兵营，杨勇的通讯连，梁公福的警卫排以及薛岳的机枪连。该连仅拥有两挺水冷式机枪，然按规定最少应配备六挺水冷式机关枪。

第一师有部分军官不是广东人，例如徐汉城便是湖南人，好多保定军校毕业的参谋军官不是粤人。除了徐汉城那个团，多数士兵是广东人。

粤军第二师是洪兆麟统领的，麾下大多数军官是湖南人，士兵则湘籍、粤籍都有。第三师由魏邦平统领，士兵全系粤人，李汉魂、邓龙光、韩汉英在第三师。

粤军第二军军长是许崇智（邓铿的义弟）。许济（许崇智的堂弟）、吴忠信和张明达任旅长，顾祝同、刘峙、卫立煌任参谋长，第二军的官兵部下是粤籍人氏。

粤军的组织系统是九个士兵一个班，三个班一个排，三个排一个连，四个连一个营，三个营一个团，两个团一个旅，两个旅一个师。编制如此，但没有真正实施。例如许崇智的第二军始终没有师的编制，员额不足。

第二师师长洪兆麟希望我去当他的少校参谋，我婉拒了。1920年11月20日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签署委任状，任命我为第二师师部少校副官，我负责总务兼管后勤。有时候邓铿从西关陈塘打电话给我，他正在那儿同歌女饮宴，吩咐我带钱去那儿给他付账。我常见到许崇智陪着他。

有一次我兼任军法官，去调查第一师官兵的违纪行径。审讯由一名军法处的文职法官主持，我在旁聆听，当他作出判决，我就签署，然后递交师长。我们没有审过什么大案。我还兼管过军需部门。

有个12岁的孩子对我说，他没东西吃，我收容他到师部做些端茶水等杂活。我有权配备一个传令兵供我差遣，这孩子跟了我好多年。那时邓铿充分信任我，

他对我影响至深。

我在一年内就从士官升到少校，擢升比别人都快。事实上，第三团团长陈修爵希望我去做他手下的中校副团长。我拒绝了，因为我不是保定军校毕业生。当副团长要负责制订军训计划，我认为我不够资格，故介绍校友罗子良就任此职，他是保定军校毕业生。我认为参谋与教育是保定毕业生更适合担任的，毕竟他们接受了好多年的训练。在军阀统治年代，保定毕业生是非常吃香的。他们没有组织保定校友会，但他们是四校校友联会的核心人物，会员包括陆军小学、军官预备学校，陆军中学以及保定军校毕业生。四校校友联合会有组织活动，我们缴付会费，举办招待会款待会员。我是会员，但并不活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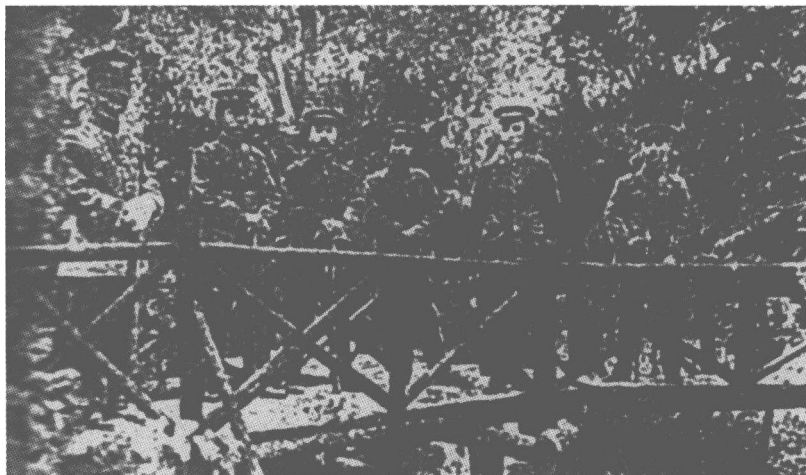
凯旋回穗后，粤军正规单位的军官就必须穿制服了；军官与文官混杂的单位则不必穿军服。粤军成立了一个军官训练班，轮训上士与排连长。优秀的排连长通过考试可以去广东讲武堂深造。粤军也轮训班长与副班长。

那个时期广州有一间军医院，总部与第一师师部都成立了军医部门。第三师有些团长聘用中医，但他们未被列入粤军正规编制。中医协助受过西方医学训练的西医，他们使用药油、绑带，还从伤兵体内取出子弹。

广东省为粤军军人提供了许多职位，这就是“水涨船高”。军中的文职人员几乎涉足所有的职务。推荐他们的至少是师长。师长们享有足够的声望，能向省长陈炯明推荐文官。

第一师驻扎在广州，陈炯明经常送钱给粤军，在这方面他十分出色。军官与士兵都过得他的赏赐，亦即新兵现在除了每周四毛钱零用钱之外，还能领到四元五毛钱的伙食剩余金。然而，军官的薪饷仍然要打折扣。陈炯明的钱源自广东省政府财政局。由于他兼任广东省省长与南方政府陆军部部长，自然不缺钱。陈炯明印行纸币，规定一元钱纸币兑换五个双毫，但双毫仍为市面上的主要货币。

鸦片与赌博是明令禁止的，但在“山高皇帝远”的地区，烟赌盛行无忌。有



1921年，第一师军官在广州培苑公园餐厅。左起：齐公恪、张发奎、梁鸿楷、王超、叶挺、罗子良。

些军事单位包庇烟赌收取黑钱，对方倘若不肯就范，赌场烟馆会无休无止地受到骚扰。譬如，那些军人会派遣兵士穿着便衣到拒绝付黑钱的赌场捣乱，于是赌场烟馆不得不“出血”。在某些地方，烟赌交易在固定（每月初三、初六、初九、十三、十六、十九、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九日）集市的公开摊位上进行。通常军事单位不需要主动索取黑钱，烟馆赌场会自动奉献。好一些的单位不会为算计几张赌台、几条烟榻而讨价还价。但他们知道，收这种黑钱只能在远离省会的地区，故不必害怕陈炯明的禁烟禁赌政策。

走私漏税是军人搞钱的另一种常用方法。例如，驻扎在河（珠江）南、控制着珠江三角洲（包括南海、番禺、顺德、香山、东莞）水上交通线的广惠镇守使李福林，组织了一支“护商队”，表面上声称为了防御土匪，实际上付钱给李福林后，他就会派手下士兵登上民船，这艘船便可挂出书写着“福军”的旗帜，就可以拒绝海关搜检，也就逃避了进口关税。李福林就是这样财源广进。

其他军事单位使出同样的伎俩。商人们害怕土匪，也害怕军队。第一军（军长陈炯明）的第一师也这样搞钱吗？他们不敢。毕竟陈炯明的总部与宪兵单位设在广州。此外，邓铿也治军十分严格，第一师每天军训就耗费六小时。这使我想起我的革命战友陆志云告诉我有关广东盐务稽核分所汕头缉私队的一个故事。缉私队执行盐务稽核分所征税的任务，他们巡视各个盐场，查缉漏税案件。陆志云说，汕头那个缉私队的负责人每月可得到3000大洋的外快。陆志云建议我请求邓铿出面向陈炯明推荐，让我出任此一肥缺。我当时月饷仅128元，除了那盐务缉私队我到哪里去赚那么多钱哟——一年之内赚三四万大洋；我只要三四年就能挣下足够享受一辈子的巨款，此外，我也不必再上战场了。我告诉邓铿。他问我：“你今年几岁了？”我答：“26岁。”他问：“你几时死？”我猜不透他的意思，咕咕哝哝道：“不知道，我相信近期不会死去。”他马上厉声指责我：“我从未想到你是这么糟糕的年轻人，你只想去赚钱，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呢？现在我明白了，我看错你了！”我哭着说：“我知错了。今后我再也不考虑这类坏主意了。我决心听您的教诲，做一个好青年。”在邓铿的熏陶下，我再也不迷失于“求官搞钱”的诱惑了。这就是邓铿感染我的众多事例之一。

我们称呼陈炯明为“陈老瘾”，他嗜烟十分酷肖他的嗜“俭”。我们都很尊敬他。他的私生活极为严谨，据我所知没有任何恶行，不贪污，憎恶烟赌，也很有学问。

由于第一师没有陆军大学毕业的军官，邓铿要求李济深到第一师来。广西籍的李济深同一些第一师军官是广东陆军中学、速成学堂、讲武堂的同学，当时他在北洋政府陆军部供职，他应邀南下后接替陈可钰任第一师参谋长。待人和蔼友善的陈可钰调任副官长。

邓铿打算在陈铭枢的第四团扩充一个营，以便落实一团三营的编制。他想安排我出长第三营，陈铭枢拒绝了，因为我不够资格——不是保定军校毕业生。他

要缪培南的堂弟缪培堃去当第三营营长，因为他是保定军校毕业生。当陈可钰告诉我这一内幕时，我勃然大怒。我对陈可钰说，正因为有人说我不够资格，我偏要带兵，我偏要当营长。陈可钰没法改变我的决心，我辞职不干了，从师部搬到了一家旅馆。

1921年夏，我被任命为中校帮统（相当于副团长）兼邓铿的同学莫飞熊统领的警卫游击团第一营营长。“游击”这个词并不意味着游击战。一些混合部队往往被冠以“游击”二字，因为粤军不想赋予他们正规部队的名称。

我去北江地区的连县就职，叶挺与我同行。那时他是工兵营营长，他去那儿是为了招募新兵。莫飞熊劝告我不要出任营长职，因为那个营的士兵大多数是当过土匪或民团的。他要我以副团长身份留在他的广州办公室帮他做事，因为我能接近邓铿。我拒绝了，坚持要下部队带兵。

和叶挺一起回到广州后，我向邓铿解释我对充任副团长不感兴趣。因而，我又无事可做了。邓铿叫我回到第一师师部去，但我不想回去。陈可钰想推荐我去当宪兵营营长，然而邓铿说，我的个性不适任该职。最后，我被任命为第二十七警卫游击营少校营长，这个职位出缺是由于营长李子皋去世。

第二十七警卫游击营中，有些是当过土匪的，他们曾帮助我们福建一路打到广州，该营组成了李安邦统领的游击团的一部分。第二十七营驻扎在南雄，虽号称一个营，但仅有200名士兵，纪律松弛，抽鸦片。邓铿知道该营品流复杂，所以告诉我如果尽了力气仍无成效，就回广州来。

我到南雄后，该营不让我就职。我告诉副营长，倘他不移交营长印信，我不会就职，我会报告总部，这意味着中止薪饷与供应。由于他的部下都不是本地人，他们势必重新落草为匪。就这样，我拿到了印信。营长的图章比连长大得多，是方形的，称为“印”。

除了营旗，营长旗挂在营部门口，后者与营旗的大小、设计相同，差异只是蓝底写着“张”字。这是粤军杂牌部队中的陋习。

我这个营在农村地区收取烟赌税项，这是我首次拿到这类黑钱。我命令值日排长把他的连队中每个职级官兵的准确数字写个报告给我，附带他的连长的印信。那连长不能瞒骗我，因为翌日的值日排长会告诉我真相。我把现有人数如实呈报团部，但坚持要按足额颁发薪饷给这个营。

我拒绝把任何余款或任何黑钱分给营部军官，而是分给我的部下。例如，我每月分发每个连长30块大洋。我身边的僚属分到钱太少，因而不高兴。但他们怕我，那时我活像个军阀。

我给士兵每月两元钱，给下士四元，以此类推。我想，同一般军官相比，我厚道得多，他们从来不发钱给士兵。

我曾任命一个亲戚华仪九负责后勤，但他行为不端、花钱不当，于是我决心再也不让亲戚掌管后勤工作。在那个营待了几个月，举步维艰，积重难返。当我把这一忧虑报告邓铿时，他问我能不能解散这个杂牌营，用此经费组建大元师府



陈可钰

警卫团的第三营。

警卫团团长是陈可钰，副团长是李章达中校，邓定远和蒋光鼐是少校副团长。警卫团直属于中山先生，1921年5月5日他正式就任非常大总统，该团下设三个营，薛岳的第一营是由第一师的机枪连扩建的；叶挺的第二营是由第一师的工兵营组建的。

我报告邓铿，我会遵令行事，但首先他要把第二十七警卫游击营召回到广州来。由于他们都是广府人，闻此当然十分高兴。一天早上，我将他们集合到广州的一座庙宇，通知他们：粤军总部已派了一支强劲的宪兵部队包围我们并解除武装，如果我们负隅顽抗，将会被消灭；但如果同意缴械，将获发三个月的饷银。士兵们不反对领三个月薪饷回家，但有些军官不肯就范。在一部分士兵协助下，我解除了这个营的武装，封存了枪支弹药，呈缴第一师师部。次日，总部发下三个月薪饷，但发饷之前士兵们重新落草为匪了。那时我正在第一师师部，我叫了一辆人力车，叫特务连给我配备了一个排，那些士兵们见到那阵势便吓得逃跑了。那笔钱原封不动，我凭此重新招募警卫团第三营士兵。

我被任命为大元帅府警卫团第三营少校营长，委任状由陆军部颁发，是部长陈炯明于1921年11月4日签署的。李步瀛任副营长，是我推荐他的。四个连长是阮宝洪、苏德燊、王仲瑜和陈瑜。这就是我出任营长的经过。设若不是陈铭枢激怒了我，恐怕我永远不会当上指挥官。作为师部副官，紧跟邓铿使我得益不少。我是个年轻人，不必养家，仅需要扶养一个弟弟，每月有一百多元收入，可以过得很舒服。另一方面，由于我在师部的工作甚有成效，邓铿不想派我下去带兵，故我一直在等待时机。正因为陈铭枢的无理刁难，我才坚持要下去当指挥官。在某种意义上说，我必须感谢陈铭枢。同理，倘无一位同事测算我的前途命运，我会追随胡毅生或胡汉民，永远也不会开始我的战斗生涯。

我同陈铭枢的关系并没有改善，他对我并不友善，我也不善待他，一则由于他歧视我，二则由于他个人生活的不检点。军官必须以身作则，陈铭枢却做不到这一点。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是赢得部下的忠诚，因为我想成为比陈铭枢更出色的指挥官。我尽最大努力向士兵灌输服从命令、遵守纪律以及亲民爱民观念。鉴于陈铭枢小看我，我决心向他显示：虽然我年轻，但我凭直觉，可以干得出色。

我们是中山先生的警卫，我营有两挺水冷式机枪。我们能正常发饷也能穿上像样的制服了。士兵们领到了石井兵工厂新生产的优良枪支，都装有刺刀。他们佩上了装有两个盒子的皮质弹药带，也穿上了布鞋，终于摆脱了草鞋。

我很忙碌，每天至少要有一次操练，旁听讲课，有时自己上台讲。我认为营长最重要的品格是什么呢？营长是指挥战斗的，他需要智慧与勇气。在往昔，当两个将领率部交战时，勇敢意味着力量。诚然，随着科学的发展，一名营长不再

需要那种力量。智慧是指什么？智慧意味着设计谋略的才能，例如，怎样发动一次围攻。营长还需要小心谨慎，这都是《孙子兵法》教导我们的。

大约1922年，我营与警卫团奉命开往桂林。此前夏季，中山先生与陈炯明指挥了“援桂”之战，击败了桂军，将广西置于广东统治之下。中山先生带着第一、第二警卫营，在桂林设立了大本营，积极准备经湖南北伐。

在我一生中做过许多奇特的事。在梧州等候船只去桂林时，我营两个士兵迷路过了河。他俩回营后诉说，刺刀都被桂军第七军军长陈天太的士兵抢走了——我的士兵请假外出时常常把刺刀绑在腰部以示威风。我不知道他俩有否违纪，但相信他俩没有撒谎，因为丢失武器是犯死罪的。倘若这两个士兵犯了过错，他们会逃亡的。我问陈天太，他矢口否认。我召集了连长会议，一致同意进攻陈天太部的一个连部。我派了两个连，拂晓时包围了陈天太部，打垮了对方，找到了那两把带编号的刺刀。

作为一个年轻人，我是轻率莽撞的。当时我认为我有充足的理由去攻打抢了我们武器又拒绝归还的人。当然，现在我不会这么想了。

陈炯明发觉了这一事件，下令陈可钰逮捕我送回广州。陈可钰命令我赶快去桂林。陈炯明逼陈可钰执行。我看见陈可钰神情沮丧，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就问邓定远出了什么事。邓告诉我，这是我的错，陈炯明已来电命令立即逮捕我。

陈可钰一直待我很好。我告诉他，我会为自己所做的事负责，要求他把我押回广州。他叫我不要担忧，我应该服从他的命令去桂林，到了那儿我可以期待，看会发生什么事。

陈可钰向中山先生报告了这件事，那时陈炯明已指令蒋光鼐接替我的职务。中山先生说，我要出发去清剿土匪，事实上可以派遣一、二营去剿匪的。十多天后我剿灭了土匪，中山先生打电报给陈炯明说，我已经立下战功，故对我的处分改为“革职留任”，不久我官复原职。

我营与第一、第二营轮流拱卫孙大总统与孙夫人，他们去哪儿我们戒备到哪儿。有时，他俩饭后出外散步，在这种场合，他会停下来问我一些有关士兵的问题。这是我初次有机会同他交谈。

对孙大总统的印象，我只能讲，他是一个伟人，我深深为他的演讲所震撼，也被他的谦虚与热情所感动。他绝不会看不起像我这样的营长。对我们来说，能见到大总统是绝大的荣誉。那个年代军队中存在着浓重的等级观念。团长、旅长、师长都是眼睛朝上望，团以下军官通常没有机会接触最高领袖。

我对孙夫人也印象很好，但与她谈话的机会很少。

在桂林，我见到了蒋介石。当我在警卫办公室睡觉时，我见到蒋坐了轿子来见总统。士兵们说“参谋长来了”，随即向他行礼。蒋先生没有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看上去他很严肃，常常穿着那著名的黑色斗篷。当时他担任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的参谋长。他俩一起在日本念书，从同盟会时代就是同志。蒋给许当参谋长似乎是很自然的事，看来他俩很要好。

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的主要分歧是基本政策的歧异。陈炯明鼓吹联省自治，孙中山则坚持北伐。^①虽然我颇为佩服陈炯明的私德，但作为国民党员，他应该反对孙中山北伐。陈炯明反对北伐造成了恶果，每当我们断了饷银，就用一部人力操作的印刷机生产纸币，五张钞票一页。多数钞票值两毛钱，有些是一毛或五分钱。这些纸币是临时印制，在当地流通。

对于孙大总统同奉系军阀张作霖联合对付吴佩孚，我并无特别见解。北伐军进入湖南后，1922年3月21日，邓铿在广州大沙头车站被暗杀了。无疑，此案是陈炯明亲信的助手叶举策划的。邓铿遇刺身死，使孙大总统失去了右臂，他下令北伐军回师广东，并免除陈炯明的内务总长、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等职。

接着，北伐重新开始。孙大总统在粤北韶关设立了北伐大本营，梁鸿楷接任第一师师长，奉命与第二军许崇智、朱培德部一起进军江西。孙大总统在陈可钰率领的警卫第一、第二营拱卫下回穗处置陈炯明，每个营留下一个机枪连在韶关。

警卫团韶关团部由我的校友、始兴同乡华振中副团长率领一个排留守。我的三营，与一营连长吴逸志率领的机枪连以及二营连长梁世骥率领的机枪连留在韶关。我们都隶属于总统府文官长胡汉民。在桂林我常见到他，但很少有会结识他；自从我的营被指定拱卫胡汉民，我就有更多机会去接触他，我崇拜他。

1922年6月15日至16日，陈炯明的亲信（粤桂边防督办）叶举与第二师师长洪兆麟在广州发动政变，叛军包围了（观音山）总统府，警卫第一、第二营被解除武装，陈可钰等人被拘禁。

胡汉民去江西探望许崇智与李济深，吩咐我营与留在韶关的其他单位同行。当我们抵达始兴时，翁式亮派遣丘兆琛秘密走访华振中。翁式亮是我上陆军小学时的校长，此时他率领一支杂牌部队，成为陈炯明的重要追随者。丘兆琛与翁式亮都是惠州人，丘同我和华振中都是陆军小学同学。

华振中召集了连以上军官会议，他说他希望我们不要同陈炯明作战，也希望我们服从多数人的决定。华振中是中校副团长职级，比我地位高。但我不同意，我说每个人都有自决权。在这个问题上，我麾下四个连长——阮宝洪、苏德燊、王仲瑜、陈瑜都宣称支持我。但是吴逸之和梁世骥表示想回广州去。他俩不愿意同陈炯明打仗。这一建议得到少校副团长陆材的大声支持。除了王仲瑜是行伍出身，所有这些人都是我的同学。

翌日，华振中南行投向翁式亮，两个机枪连都跟华走了。阮宝洪虽然宣称支持我，但也跟华走了。可是他麾下两个排长拒绝同行，陈瑜也跟华走，部下一个排长不肯走。在另一方面，华振中手下的排带着团旗投向我一边，这对士气是很重要的。每个团里必有一名少尉或中尉担任旗手，带两个士兵。旗手的责任是保

^① 据《广东省志》记载，北伐军费绝大部分由粤省负担，仅1926年就耗用毫洋8326万元，占当年省财政支出的66.38%。

障团旗的安全。其他单位一师或粤军本身都配备旗手一职。

就这样，我率领三个连加一个排，华振中则带走了三个连。我带了部众北行追赶胡汉民。刚到南雄，我们碰上胡汉民、许崇智和李烈钧，他们正开赴韶关作战，陈炯明亲信梁鸿楷率第一师尾随在后。当我向他们报告始兴发生什么事情后，胡汉民告诉我，他在江口听说我投降了陈炯明叛军而华振中与部分士兵则忠贞不移，但他曾表示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他要求许崇智查证这事。我感到惊奇，问胡汉民何以见得。他说，华振中看上去不像是个正直的人，而我看上去很老实。毕竟他确信我不会投降。



胡汉民

在粤北翁源，我们同陈炯明部展开激战，第一师加入敌阵，将我军击败。倘若第一师不在紧要关头增援敌军，胜利应属于我方。后来我从邓演达处得悉内情：当第一师到达赣粤边界时，召集了一次会议，陈铭枢与陈修爵赞同支持陈炯明，梁鸿楷必须屈从，因为其他团队的士兵盲从二陈，所以第一师决定离开许崇智、投向陈炯明，陈遂下令第一师向我们开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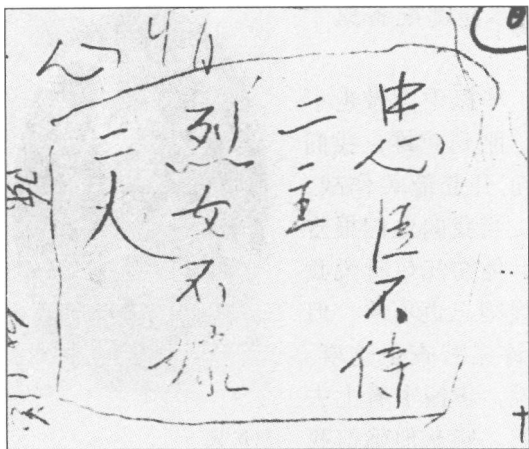
胡汉民、许崇智、赖世璜、李烈钧带领部队向闽南转进途中，同陈炯明部接战，赖世璜部下的卓仁机带了一营人马投向陈炯明部。

我的部队同许崇智部的联系被切断后，我除了上山别无出路。我带了部下一百多人开到我故乡始兴县的仙人岭。我们在那儿待了约半年，度过了连草鞋也没得穿的日子——在山区想买也买不到。当食物吃完时，我们袭击一个小村，该村住着不到十户人家。我的士兵会在拂晓前包围村庄，开枪威胁村民，然后命令他们出来投降，这是搜掠小村的典型方法。有时我们会杀死三十来斤重的小猪掳走，我们搜掠玉米、大米、芋头、土豆等，但我们没抢钱，因为那儿根本没有钱财可掠。有人说我得了“张大王”的诨号是由于我名字的第二字奎，系大字同王字缀成的，然而“山大王”这个词通常是指土匪。我承认，那时我确实当了土匪。众所周知，有不少土匪变成了军人，如李福林，但是很少见到军人变成土匪的例子。

毕竟我们奉行道德原则，所谓“盗亦有道”。我们当土匪与众不同，我们绝不纵容通奸或强奸。我们只是搜掠，因为没有食物。在我的部属中，我仍旧维系着军纪。

有一天，翁式亮派了我的一个熟人（丘兆琛）送来许多饼干和其他礼物，此人举了一支白旗。见到那么多补给品，有些士兵甚至有些军官害怕我会投降。那人带来翁式亮一封信，声称“师生之情，爱护之心，始终如一”。我收下了他的礼物，但答复他“忠臣不侍二主，烈女不嫁二夫”。我提醒翁式亮，他自己曾经这样教诲我，设若我投降，我真不配做他的学生。

此时，第一师回到广州长驻，梁鸿楷实在不想同陈炯明合作。他如果真想附



张发奎亲笔所书：忠臣不侍二主，烈女不嫁二夫。

逆，绝不会留用在赣州会议上反对投靠陈炯明的李济深与邓演达（梁鸿楷部真心投奔陈逆的只有陈修爵团）。梁鸿楷派遣缪培南的侄儿缪五常来同我商量把我的部队并入第一师。缪氏还带来了邓演达和李济深的信，称他们明确反对陈炯明，要求我重回第一师。我告诉缪氏，我可以遵命，但前提是梁鸿楷必须反对陈炯明。他说，梁氏会同意的。

就这样，1922年9月，我带领部众回到了广州。我这个单位并入了

辎重营，梁鸿楷任命我接替何迺英出长该营。原任副营长的黄琪翔则留任，此时他改成现在的名字。

辎重营下辖四个连，我委任原来在薛岳的警卫第二营服务的缪培南为连长。营里所有的排长都是行伍出身，其中有些人上过广东讲武堂。

我拒绝留在广州，因担心华振中等人会坑害我。我要求梁鸿楷把这个营调出广州，于是运输营去了南海县关山。辎重营很快改组成第一师第二团第三营，我被提升为中校营长。第二团由卓仁机统领，他虽只带一个营回第一师，还是被任为团长。我的营驻扎在西江地区的德庆。

孙大总统派邹鲁到香港联络桂军将领刘震寰、滇军将领杨希闵以及第一师的密使。刘震寰的叔叔刘古香是革命党——中山先生的支持者。根据约定，当滇、桂军向广东挺进时，第一师将掉转枪口对付陈炯明，与客军并肩作战。李济深通知我这一安排，陈济棠、邓演达、李济深与我在这一共同目标上联合起来。梁鸿楷知道实情，但不出头露面。当我们准备发难反陈时，我担心黄琪翔不可靠，乃请求梁鸿楷打发他走。我担心黄氏不可靠，一直认为他是个机会主义者。他确实是个有才华、有学问、有教养的人，是保定军校毕业生，是一名勇将，但他的私生活却一塌糊涂，耽迷于享乐。我想他可能知道我要他离开，但这不影响我和他的友情。他加入了沈鸿英之子沈荣光的部队，我委任朱晖日接任三营副营长。

工兵营营长邓演达、缪培南、戴戟和其他第四团军官劝说团长陈铭枢暂时离开。他们与陈团长都是保定军校毕业生。他们对陈说，因为他曾鼓吹支持陈炯明，所以他必须离开。由于是保定校友，他们容易同陈铭枢对话，否则他会向陈炯明告密。陈铭枢是佛教徒，他去了杭州一所庙宇。我常常思忖，他是个伪善者。于是陈济棠成了第四团代理团长。

第一师奉命去西江地区抵御滇桂军。1922年12月初，我营被派往封川。叶举是西江地区所有粤军的总司令，但我从未去拜会他。我见到前敌总指挥熊略。

我在广东陆军小学念书时，他是副官长。

在代理团长戴戟指挥下的第一师第四团是首先起兵讨伐陈炯明的，陈济棠并不在前线。熊略要新任第二旅旅长陈修爵逮捕陈济棠。陈济棠哭着对陈修爵说，如果让他回到前线，他能让戴戟等人转舵。当然他只是装腔作势，陈修爵还是让他回到团部。

熊略在封川召集团营长开会。他说，第四团已经转向。他说，他本人不需要拥护陈炯明，但我们必须明白：广东人在广西人统治下受够了苦，现在首要任务是打败来犯的滇桂军。我假装保证我将同滇桂军决死一战，这是为了麻痹他。

会后我对团长卓仁机说一切已安排就绪，我必须明确地响应第四团的行动，如果他不同意，我就会离开他，让其他人当三营营长。鉴于其他营长附议，卓仁机不得不同意了。

因此，第二团也发难反陈了，邓演达的工兵营接着也起而回应，下面是第一团。只有沙世祥的第三团没有反应，该团被广西将领沈鸿英的下属李易标缴了械，沈鸿英站到了我们一边。陈修爵带了第三团残部逃到东江地区投奔陈炯明。

我们同滇桂军并肩作战，一路打回广州。我感觉滇桂军是不可靠的。我所接触过的各级军官都是傲慢和专横的。

在三水县河口镇发生了一件事。首先到达的我营，解除了陆兰清部的武装。这支滇军要求移交这批武器，我拒绝了。滇军解除了我营一个排的武装。我的同事劝告我要忍耐，指出滇军实力比我们强。但我态度十分强硬，最后滇军把我们的装备归还了。

1923年1月16日，滇桂军与粤军第一师攻占了广州。滇桂军对百姓很残暴。甚至他们的士兵也摆出征服者的姿态，把广州当作被征服的领土，好像是第一师向他们投降。他们歧视我们。要知道，只有第一师同他们合作，洪兆麟带着第二师以及效忠陈炯明的不少杂牌部队逃到了东江地区。

第一师的高级军官都认为我们不应驻扎在广州，因为桂军与滇军正直扑广州，我们害怕他们吃掉粤军。1月17日，第一师开始向江门、新会、四邑集结。第一师改组，师长梁鸿楷被任命为广东第一剿匪军军长，李济深继任第一师师长。原应陈可钰继任师长——我们都拥护他——但他病了。这就是李济深取而代之的原因。我敢说，李济深在第一师安插一个人人都办不到。

卓仁机被任命为第一旅旅长，下辖两个团，第一团团长是梁鸿楷堂弟梁鸿林，第二团团长由卓仁机兼任。陈济棠被任为第二旅旅长，下辖邓演达统率的由原工兵营扩编的第三团和戴戟统率的第四团。

除了第一师之外，梁鸿楷手下就没有其他部队了，他专心统领第一师，我们都尊敬、服从他。

第一师驻扎在四邑，我的营驻扎在台山县的公益，隶属于卓仁机。

1923年2月21日，中山先生返回广州，重新担任大元帅职，古应芬在江门组建了大本营办事处。1916年我在澳门见过古应芬，当时他只是个平民，对我



梁鸿楷

们革命青年甚难施加影响力。现在，我对他有了深入了解，他外号叫“烂大鼓”，“鼓”字与他姓氏“古”同音，陈济棠成了他的教子。

从福建回师广东后，第二军驻扎在东江地区，也是因为害怕被滇桂客军吃掉。

此时，我二弟贵斌来投靠我。原来我不希望他从军，他的养母去世了，我希望他回家陪伴父亲。此外，他已结婚，不适宜从军。他不听我劝告。我让他做士官，他留在营部没有固定职务，我仍然希望他回乡。不久，父亲逝世，我同贵斌、嘉斌一起回乡参加父亲的葬礼。

很久以前父亲在清化乡为我配了亲，但我不同意，我反对盲婚哑嫁。他临终遗言，要我完婚。遵照他的遗训，1923年3月7日，在他下葬前我娶了这位姑娘；否则，我按规矩要三年后才能娶亲。当时我已28岁。

我的妻子刘景容也是客家人，她出自清化乡富户刘家，是我父亲原配的亲戚。她出生时父亲已故，所以无法入读正规学校，只能在村塾就读。很奇怪，很少有人认为我们的婚姻是盲婚，因为她很洋派。

婚礼后几天我就离家。我负起了扶养四弟勇斌的责任，他在村里陪伴我的新婚妻子。贵斌回到了营部。

这一年余下的日子，我打了一仗又一仗。首先，我参加了清剿沈鸿英的战事。1923年4月中，他背叛了中山先生。我营在北江地区清远作战。然后，我营在西江地区肇庆作战。邓演达率部沿着肇庆城墙挖掘地道，5月18日拂晓，当炸药爆破城墙时，我率领第三营占领了肇庆，生俘敌旅长黄振邦。由于他拒绝投降，梁鸿楷下令枪决了他。

营级是不具备情报搜集功能的，除非奉命充任前锋警戒，在此情形下就必须派出先遣小组。

营长要紧贴前线。有一次，一颗子弹穿过我的铜鼓盔，打掉了我的一束头发，只差一公分就要了我的命。

我会向上级呈报准确的伤亡数字。通常高级军官会夸大伤亡数字以显示其部众士气旺盛。在夸大敌军伤亡之余，把我军的损耗——主要是逃兵——归类于受伤减员。

由于我营战绩辉煌、缴获大量武器，我被拔擢为新成立的第一师独立团上校团长。该团隶属于卓仁机的第一旅，下辖两个营。我的升职是由于作战勇敢，但光是勇敢还不够。我并非神枪手，因为我眼力并不太好。但我很勤勉，且关爱士兵。最重要的是与部下同甘共苦。我治军严格，赏罚分明，待兵如子。倘非如此，他们不会跟随我效命。

不久，我团奉命到北江地区同沈鸿英叛军作战。6月初，在渡过连江时我团

负责拱卫李济深的师部，并且顺利攻占英德。然后，我团同第一师其他单位一起，奉命到西江地区同沈鸿英部作战。梧州指挥官黄绍竑投向我方，我团与第二团于6月18日进占梧州。

1923年8月，我团移驻江门。那时沈荣光吃了败仗，黄琪翔失了业，我让黄回来充任副团长。不久，占领粤西南与海南的陈炯明爪牙邓本殷，和逃到东江地区的洪兆麟，伙同陈炯明威胁广州护法政府的安全。孙大元帅派我部进击惠州。第一旅奉命前进增援东江地区。我团自江门出发，由于无钱买粮，我晋见孙大元帅。他给他儿子、广州市长孙科下了个条子，要他给我发放三千大洋军饷。于是，我团向东江地区挺进。

很快我病倒了，由于不注重饮食，我得了胃病。在那些日子里，我不碰白兰地，只喝廉价的广东酒。我请病假回广州，把团长权柄交黄琪翔暂代。在广州的医院里，我遇见陈诚，他是炮兵连连长，在战斗中负伤住院，是邓演达把他调到第一师来的。钱大钧也在第一师，钱与陈诚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他俩是第一师内众多非粤籍军官中的表表者。

1923年8月30日，独立团归第一旅卓仁机指挥，驰援在东江作战的东路讨贼军许崇智李福林部。10月2日，第一旅克河源，17日敌发动三路反攻，19日我军左翼失利，敌人据河源。我的二弟贵斌在河源战斗中阵亡，尸体没找回。他是个很勇敢的士兵，此后我不让其他弟弟再从军了。

11月中旬陈炯明部威胁广州。我回到团里时，危险已经解除。

1923年12月4日，我团奉命驻扎台山、四邑，乃再次在公益设置团部。1924年3月，我派遣一个营到西江地区救平桂军第七军陈天太的叛乱。5月，我团奉命驻守西江地区的德庆。我又扩编了一个营。

当时无论谁当广东省省长都要听从杨希闵和刘震寰，在他俩控制的地区任命自己的亲信担任县长。杨希闵的滇军驻扎在广州市及郊区，滇军实力比桂军强得多，此所以广州落入滇军手中。

在任何一个军事学家眼中，广州与珠三角都是广东省的头号竞争目标。首先，它是广东省最富庶的地区；其次，谁控制了广州谁就能合法享有外贸的特权。四邑稳占第二位，它是富饶的，海外华侨汇钱给四邑的亲戚，导致四邑地区商业繁荣。再者，澳门与香港近在咫尺。

刘震寰、杨希闵对孙大元帅的服从是表面性的，口惠而实不至。他俩对孙大元帅很傲慢，更不用说对我们了。滇桂军公开贩卖鸦片，欺凌百姓。滇桂二军的军纪都很差。滇军可以从肩上扛的鸦片枪识别，可以说所有的军官与大多数士兵都抽鸦片。云烟很便宜。在桂军，吸食鸦片也很普遍。



刘震寰

在滇桂军驻扎地区以外的广州以外地区，驻军首长就是土皇帝。他们无权任命县长，但他们有权向省长推荐县长人选。省长终究会接受推荐，不会安插自己的亲信去做县长，因为当地驻军会阻止他们就职。孙大元帅从不为县长人选而费心，他只关心革命前途。

我的上司、旅长卓仁机进驻台山县之后，就把县长刘裁甫赶走了。刘是李济深的朋友，他在北大求学时就结识了李济深。卓仁机直率要求第一师师部向省政府推荐他自己出任台山县县长。我可以断言，那时的军人是没有政治觉悟的。

省政府的主要收入除了常见的财源——土地税、各种地方税、商会的捐赠之外，鸦片烟税和博彩税也是广东省的重要税收来源。广东人爱赌也爱抽大烟。

省政府允许鸦片合法买卖但又设立禁烟局。中国人喜欢唱高调，机构名称往往同它的实际功能相反。商人们向禁烟局申请鸦片专卖权。譬如，一位商人意欲获取江门的鸦片专卖权，禁烟局就会对他开出10万银元一个月的价钱。商人会同禁烟局讨价还价，最后约定每月初交9.9万元；另外预交一个月专利费作为押金。禁烟局将这笔钱转缴给省财政厅筹饷处。

专卖商去江门招募当地商人设立鸦片馆。每一位当地商人都允诺每月偿付他一笔固定款项。专卖商会拜见江门的驻军首长，答应按照鸦片床数或鸦片馆数每月进贡一笔钱。

博彩税的征收与烟税类似。唯一的区别是，商人缴付的赌博专利税称作“保卫捐”，是直接缴给省财政厅筹饷处的。

然而，省财政厅筹饷处无法掌控广州市的烟赌专利捐税。因为捐税直接由专利商缴付给杨希闵。杨干脆对该处说，他已经找了专卖商，捐税已直接交给他充当滇军军饷。

省政府同样无力在广州征税，因为滇军插手税收。有时它把力所不及的事交给省政府，有时它一文钱也不缴只送去一纸收据。刘震寰的桂军也照此办理。

孙大元帅为筹集资金伤透了脑筋，他常常期望廖仲恺帮助他筹款。廖设计了各种各样的税收计划，例如以拍卖土地修建电车网来筹款等，海外华侨响应这一计划，但最后还是实现不了。孙大元帅对他的追随者如何筹款并不太担心，他从来不关心细节问题。

除了滇桂军驻地，其他地区由谁控制岁入呢？一切端赖当地驻军首长是否效忠于孙大元帅。广东省的军事单位多到难以计数，连我都搞不清楚。有些单位衣衫褴褛，另一些穿得好些。我到访广州时见到滇军戴着红色帽箍，除了粤军之外，不同的部队佩戴不同颜色的帽箍。我们粤军不佩戴任何帽箍，可是军帽上饰着五星徽章。粤军内部制度不健全。有些自称总司令的草莽英雄对孙大元帅说他们拥有一支部队，孙就深信无疑。我们对此感到不可思议，难怪人们称他为“孙大炮”了。

省政府可以在第一师驻地征税，筹饷处江门分处同样也征收本地的烟赌专利税。筹饷处江门分处给第一师发饷。各个部队长以保护烟赌业来收受黑钱。起先，第一师驻地仅限于四邑，占领梧州后，西江地区便落入第一师控制，李济深

被委兼任梧州督办。第一师控制了西江的交通，并仿照李福林的商业保卫团，组建了西江商旅保卫团。团勇奉命向西江上航行的船舶征收保护费。

双毫仍是当时主要货币。我们有时会发行军票，但在农村地区使用军票不容易。村民们拒绝接受军票。在城市里形势则较好，因为商人们能用军票缴付税款和其他支出。

第一师的军官中国民党员并不多。我敢肯定，每个营不多于两三个。1923年1月26日，孙大元帅决定与苏俄合作并与其外交代表越飞签署孙越宣言。我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压迫我们太甚，使我们透不过气来。我们很乐意接受苏俄的援助，尤其是因为它援助孙大元帅实现国民革命。1923年10月，鲍罗廷来到广州。他不是第一个前来援助我们的俄国人。在他之前，苏俄顾问巴甫洛夫将军来过，可我不清楚他做了些什么。

我和相同级别的同事讨论过联俄政策，邓演达十分支持。1922年夏，孙大元帅决定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我赞成在国民革命中联合苏俄，但我认为允许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是错误的决策。共产党员跨着两个党，虽然他们应该遵守国民党党章、执行国民党的政策，但他们受制于共产党的党纪。如果共产党命令他们去破坏国民党的政策，他们倘若拒绝遵命，就是违反了共产党的党纪。你可以说我是像清教徒似的拥有洁癖，然而我认为一个人只能拥有一种信仰，既然加入了国民党，就不能再信仰共产主义。让人们同时成为两个党的党员，这种做法是谬误的。孙中山应该要求已经加入国民党者退出共产党，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在当时环境是很困难的。

在表面上，大家都赞成容共政策，可我内心抱怀疑态度。不过我不敢说出来或公开表达我的疑虑，因为我的地位并不高。第一师其他军官中，李济深与邓演达支持容共政策，陈济棠和其他军官都反对。我感觉，梁鸿楷不赞同容共，这也许是他以后未被逮捕的原因。然而，在第一师军官中，没人敢公开反对容共，许崇智的一些部属持反对态度，但也不敢吭声。在这一时期，我不认识个别的共产党员，因为共产党是一个秘密组织，我们无法知晓谁是中共党员。

国民党改组时，实施扶助工农政策。我认为这一政策是正确的，因为当时中国4.5亿人口中八成半以上是农民；虽然当时中国工人数量不多，但他们对未来中国的工业化来说是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此一扶助工农政策对实现三民主义至关重要。

自加入国民党后，我相信国民党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能够救中国。我认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我信仰社会主义。我认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显著区别在于：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各尽所能”的理论上的，共产主义则是建立在“各取所需”理论上的。例如，一名工头是依据工程师的计划监督工人操作的，倘若工作失误，工程师会受到责备。培养一个工程师需要好多年，他是劳心者，而工头则是劳力者。工程师会收取较高报酬，而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却是“各取所需”或曰“按需分配”，这是荒谬的。

我感觉共产党人比国民党人更熟谙工农运动，我并非嫉妒他们。在采纳“联

俄、容共、扶助工农”这三大政策时，孙中山相信共产党并未隐藏邪恶的意图。我本人的观点很简单，虽然我认为一人跨两党是谬误的、这使共产党员首先效忠于共产党，但是我并没有想到他们敢于颠覆国民党。

国民党人并不关心工农运动，当共产党人下基层工作时，国民党人忙于向上攀爬。我同情共产党，相信他们所做的工作会刺激与鼓舞国民党。对中共党员，我印象甚好，因为我看不到他们有任何伤害我们国民党的证据。

我在驻地经常同工农运动接触，我曾在农民协会与工会成立典礼上发表演讲，通常只说几句鼓励的话。由于廖仲恺兼任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部长，积极从事工运，我与他有所接触。以前我见过他，但很少与他接触。如今发生了一些有关工人的事件，有时他的工人们与我的团部发生争执，工人方面未必常有理，我部下官兵亦然。

驻扎在公益时，我抓了一对违法的工人夫妻。作为工人的坚定支持者，廖仲恺发了一份电报给我，要我无条件释放他俩。我拒绝了，理由是我有责任逮捕违法犯罪者。廖仲恺再次来电说，无论他俩有罪与否，我都必须立即释放他俩。我认识到，他的宗旨是工人不应该被捕。我誓不低头，乃将案件转交军警联合调查局处理。廖仲恺骂我“镇压工人”。

我回忆起另一宗事件——新宁铁路工人罢工。我下令复工，在盛怒之下我对工人们说，倘若事态日益恶化，我会把他们全部杀死，然后将部队撤到山区去。人们知道我言出必行，我是讲道理的，但我会拿出铁腕，即人们所说“讲理的野蛮人”。翌日，罢工的工人们复工了。

我不管到哪里，都组建一个以我为首的军警联合调查局作为地方最高执法机构。该局指定一名文职法官在一名书记官协助下审理案件。军警联合调查局视案情需要将案件移交地方法院。但我从没有向上级请示核准设立这类军警联合调查局。

有一次我只带一名卫士便服出行，当我下火车时亲手抓捕了一名从妇女身上扒窃布匹的小偷。他走在我前面，我把他揪到军警联合调查局。该局的法官认此系轻微罪行，想把此案移交地方当局——法官们常常引援法律。我坚持要毙了这个小偷以维系法治。在环绕全城游街三圈后，他被处决了。

当地百姓对我评价很高。我严禁部下骚扰百姓，他们对我的保护烟赌举措毫不在乎，老百姓所盼的是和平生活。终于有人经营烟赌业了。此后，烟赌业蔓延到整个广东省。这当然是错误的。

我的新兵全系粤籍，士兵们来自粤西南，构成了最大的群体。早先我已订下惯例，到外省去征募新兵。我派人到湘粤边境去招募湘勇，他们是唯命是从、不屈不挠的好兵，非但作战勇敢，而且刻苦耐劳。这一传统始自清代曾国藩左宗棠训练的湘军。

当我在广东招募新兵时，必须请示上级。在广东以外我则必须要求上级，例如师长出具一纸公文给有关的县政府，表明某团派人到贵县募兵。我通常派遣湘籍军官去他家乡招兵，他会带着这封公文呈缴给故乡的县长。营长可以自行招兵，但这很少见，因为县官瞧不起他们。招兵通常是团长的事。有时候新兵的眷

属会来找麻烦。当新兵入伍后，他们的妻子会来争夺丈夫，哭天喊地。这时我只好让她们丈夫回去。有时候，某位新兵告诉我们，他将在一个特定地点秘密入伍，而不是同我们一起行军出城，因为他的母亲与妻子不让他参军。

事实上，当官的若想吃空额，就尽量少募兵。但我常常期望我的部队保持满员，问题在于我常常要面对逃兵问题。有许多职业性逃兵，他们入伍第一天就逃去别处加入另一支部队，为的是每一次都可领到几块钱军饷。

第一师师部将军费派发到所属单位。我敢说我是个“坏蛋”，每当商人们告诉我们，他们想设立一些番摊（赌桌）或烟榻，允诺每月缴付一笔贡金，我就答应了。用这一方法，我赚了一大笔钱。

我禁止营长们收受黑钱，理由很简单：一个营长可能驻扎在烟馆赌场林立的繁华市镇，另一位营长则可能驻扎在贫瘠的地区，我要集中一切资源，麾下营长们才会听命于我。你必须适应这一现实：我们并非经常有机会赚到黑钱的，如打仗时就顾不上，还有驻扎在乡村地区，一点钱也挣不上。

毕竟我能从“吃空子”上获利。我很倔强也引以自豪的是，我坚持麾下的营都是满员的，并且拒绝把缺员的余额奉献给旅长，因为卓仁机与陈铭枢都很自私。前者抽大烟，我常常要在他的鸦片烟榻旁边同他谈公事。

我把“吃空子”积聚的钱以及烟赌黑钱分配给属下官兵，余款存放在后勤部门。只要有需要，我能提取大笔钱，也不会影响军饷的收支平衡。这就符合一句成语“有福同享”。这就是我麾下官兵从不反对我的原因，他们对我很忠心。

当时我家庭负担不重。四弟勇斌16岁时，他同我商量，希望同村里的一个姑娘解除婚约。我答应帮助他，付了一笔钱给未婚妻的父亲，使他得以解脱盲婚的束缚。

我还计划帮助四妹，她从小送给人家当童养媳。她九岁时，我付钱让她离开了夫家。她原来是因为家庭贫困而离家，我想，经过一段时间的学校生活后她会同那小丈夫离婚。我送她上学，她和我妻子一起过了两三年后，她还是想重回夫家，相处时间长了不免产生了感情。

当团长时我接到作战命令，会先咨询参谋处长决定战术，然后决定哪个单位进占特定地点，哪里设立团部等等。我的参谋处长配备了两名少校衔的参谋担任助手，其一负责拟订作战计划，其二负责情报搜集。

经历一场战役后，我的部队多数时间是无机会整编的。我没有指挥或组织类似1920年的那种“督战队”。当我官阶低时，我没资格组织督战队；升到团长时，我也仅能指挥一千多个官兵。我感到我可以依赖营长们，士兵们毋须特别的监管。

我是行伍出身的，打过许多场仗，但都是些糊涂仗，士兵们头脑笨拙，我自己又粗心大意。有时打胜仗，有时吃败仗。当团长时，我不注重练兵；战事沉寂时，我沉湎于声色与美酒。简言之，我是专横的，急性子的，染上了各种嗜好。我性情暴躁，活像个军阀。很幸运我的职位不高，否则我会做出许多危害。

人们称军人是“神仙、老虎、狗”，意谓军人有钱时像神仙一般快活，手持武器时像老虎一样凶狠，有时候无缘无故殴打百姓；当他们鏖战几日没东西吃没

地方睡，尤其打了败仗时，活像一群狗——指的是中国种狗，因为中国军人比外国军人贱得多，中国军人永远吃不到好牛肉！

有一阵我到公益的基督教堂去做礼拜。虽然我没有受过洗礼，我还是常上教堂。那牧师是个年轻人。我甚至送妻子去培道中学，送四弟勇斌去培进中学，这两家都是广州的教会学校。

每当星期日祈祷时，我都会因受到鼓舞而睁开眼。我注意到牧师的眼睛也是睁开的。从他的目光方向追踪，我发现他凝神注视教徒中的一位年轻姑娘，教徒们也都在互露笑容。我想：这是什么牧师呀？这是什么宗教呀？一个牧师可以这样举止乖张吗？于是我再也不上那家教堂去了。

1924年5月，黄埔军校建立后，李济深被委兼任该校训练部主任。一批第一师军官，如邓演达、陈诚、钱大钧、严重和王俊奉调去黄埔担任教官和其他职务。

1924年，许崇智被孙大元帅任命为“建国粤军”总司令。名义上，许崇智指挥第一师与第三师，后者由郑润琦任师长，还有一些他自己的部队。事实上，许崇智不过问我们的事。第一师仍把梁鸿楷当做上级长官，他是个好人，我们听他的。许崇智自己的部队包括张明达统领的第二师，他的堂弟许济统领的第四师，以及几个旅。

有关1924年9月18日开始的第二次北伐，我对此印象不多。同月，我移驻西江地区的肇庆。10月，我团被改组为粤军第一师第一旅第一团，陈铭枢调回第一师，任第一旅旅长；陈铭枢的好友、参谋人才蒋光鼐出任第二团团团长，他的干部是从第四团抽调的。

商团未同我团作过战，因为我团不是驻扎在广州。我以为他们协助我们维持地方秩序。商团是广州商会组建的。1924年10月中旬，救平商团之战。起初，孙大元帅只是想向商团借一批武器，也许是想测试对方。可是商团拒绝了。府方充公了商团从国外订购的一批武器。我认为，政府没做错，在我方立场，商团首领陈廉伯本系买办阶级，又勾结陈炯明谋反，像这样的帝国主义走狗，理应被消灭。首先，商团拥有这么多武器是不正常的，何况那都是些重武器，这暴露了他们的邪恶目的。商人干政是不智的。

1925年1月15日，护法政府下令东征，讨伐陈炯明。因为这时陈再度反攻广州。许崇智被任为东征军总司令。杨希闵的滇军在东征军中占多数。

第一旅奉令增援东江地区。在东征战役中，我参与3月19日至20日的兴宁战役可能最重要。双方都出动了主力部队。第一旅由蒋先生指挥，他在普济桥设立旅部指挥作战。何应钦的第一教导团和王柏龄的第二教导团也由蒋指挥。黄埔军校毕业生在教导团中充任低级干部。

一件奇怪的事发生了：陈铭枢命令我派一个营去支援第一、第二教导团包围兴宁城。我派第三营营长黄琪翔，我自己则率两个营进攻20里外的神光山。经过几番激烈的夜战，我军在神光山伤亡惨重。拂晓时，我从山顶望出去，但见山脚下聚集了大批俘虏。我询问士兵们，哪一支部队俘获了这么多敌军？他们喊道：“第三营。”我几乎不能相信，因为黄琪翔在兴宁作战。原来黄琪翔找不到教导团，就决

定加入我们的神光山之战。黄营击溃了敌人一个旅，很凑巧，敌军旅长名叫王其祥，与黄琪翔音同字不同。黄琪翔俘虏了大量敌军，缴获了大约1000支步枪。

陈铭枢命令我去增援蒋光鼐。战事毗邻第一旅旅部，陈铭枢顶不住林虎部的优势火力。蒋先生被围于惠州五里亭顶，正陷于灭顶之灾。我再次率领黄琪翔营，全体官兵光着身子突破敌阵杀到林虎司令部，大获全胜。

教导团攻下兴宁后，敌军后撤至潮州与汕头。蒋先生来兴宁，奖给我团15只猪，给蒋光鼐团只有10头猪。至此，在蒋先生的印象中，张发奎是个勇士，以前他大概对我没什么特别的印象。我对这几天的战绩感到自豪：只要我决心去打，不管敌人多么强大，我都一定能取胜！

东征胜利是哪一支部队战功最显赫？当然是第一师与教导团。后者纪律严明，乃是革命军的核心——天之骄子。他们得到最佳的薪饷、装备与制服。一切最佳待遇都来自苏俄援助。其他部队则是混合装备，不如他们装备精良。俄国顾问对其他部队不甚看重，倘若有机会就要淘汰其他部队。我们当时已知道：他们不信任我们。我们依靠自己发展壮大，利用缴获的装备，那是五花八门种类繁多的。

教导团服装时髦，训练精良，供应充裕，这一切激励我要在战斗中超越他们。说起来很奇怪，他们成了我的兴奋剂。我要求部下以行动证实自己胜于教导团，后者老是趾高气扬。我的部下没有辜负我的期望，那就是我们打胜仗的原因。没有他们的努力，我们不会取得那么辉煌的战果。

我知道俄国顾问是配置在教导团中的，但我未同他们接触过。在教导团以外的军事单位，并无俄国顾问。

在战争中，人民协助我们抬运伤员、供应茶水、侦察敌情、充当向导等等。为什么？因为我军纪律严明。我常常让挑夫操劳一天后离去，老百姓开始了解我们。就这样，在征集挑夫方面我比以前轻松了。

为了得到百姓帮助，在东征途中，我走访村中的长者，他们都是客家人。在各种工作项目中，我付酬都比以前多，他们便召集村民帮助我们。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当时我正在前线作战，闻讯我很悲痛。

有关驱逐刘震寰、杨希闵部出广州之役，我还记得许崇智叫我去汕头见他，当时我驻在梅县松口。此事我记得很清楚：载我去汕头的轮船因为河水暴涨而不能停泊在松口。粤军第二师师长、华侨张民达在梅县城上船，后来轮船在潮安撞桥，张民达不幸落水身亡。俟洪水退潮后，我于翌日抵达汕头。许崇智要我准备同刘震寰、杨希闵作战。

1925年5月中旬，我团向广州进军。蒋先生指挥东江地区召集的部队同滇桂军作战。粤军各部沿着广九铁路行军。6月12日，我团在龙眼洞附近的瘦狗岭与滇军接仗。李福林军在河（珠江）南，谭延闿的湘军、朱培德的滇军和驻扎在北江地区的其他部队一齐向广州进军。6月13日，滇军与桂军都在广州被缴械了。

广州市民对滇桂军恨之入骨，他们向溃军扔石头，杀死了不少。我们收容了一些粤籍、湘籍与桂军士兵。

第四章 军队整编：第十二师

(1925年6月至1926年6月)

驱逐滇桂军成功，大大提高了粤军的士气，也使蒋先生的声望急升。

第一师第一旅总部设在花地。第一师控制了广州——三水铁路，蒋光鼐的第二团驻扎在河口地区，我的团驻在佛山地区。

我的部队从不驻扎在广州，我不想留在广州。因为广州是个繁华的大都会，我担心部下官兵会腐化堕落；其次，如果我团驻扎在广州，我们就收不到黑钱了，广州的烟赌税现已直接由省政府征收。所以驻扎在广州以外地区更加有利可图。于是，我远离广州，整天和部下在一起。

我的旅长陈铭枢希望他的旅部与第一、第二团共享这笔黑钱，亦即割断传统的三条生财渠道——烟、赌、航道。我拒绝了。他的旅部收不了几个黑钱，束手无策，因为这类事情是上不了台面的，所以他对我十分恼怒。

佛山市民对我印象良好，他们常常怀念我驻扎在那座城市的岁月。我严格约束部下，曾因偷窃案枪决一名士兵。我将犯兵移交军警联合调查局，他绕城游街后被处决。他偷了几只香蕉，被当场抓获，这明显是犯罪。当然我可以把他移送地方法院，但我要抓个典型杀一儆百。自这一宗案件处理后，没人再敢偷窃。他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不想劳动。他故意当着警察的面偷窃，想借此入狱食皇粮。他已经七次轻判入狱，没人愿意给他钱，因为他太年轻了。

我在佛山做了另一件事。在我的辖区，坏人或下流社会的人是受限制的。我一到佛山就召集十来个坏人，警告他们规矩点。我说我会给他们职衔并且付酬，希望他们协助军警联合调查局。怎么协助？我要他们想办法去扫除佛山城内的坏人，举报勒索等罪案。如果出了问题，唯他们是问。我相信“以毒攻毒”，结果绩效良好。

1925年6月23日沙基惨案发生，我对帝国主义的残暴行径极为愤慨！我为同胞被杀之事激怒，但我没有向政府建言采取何种对策。我认为我们应该打击英国在华势力。军人会应召拿起武器，他们绝不会考虑“匹夫之怒”造成的后果。

广州市政府号召香港工人罢工回到广州，但没考虑到我们能不能供养他们，也不考虑到港英政府将如何对付我们。我们只希望看到，中国工人离开后，那些英国恶魔凡事都要自己动手操劳了。当时不仅仅劳工离开香港，普通居民也大批

地离开，那些日子的激情很难以言状。事情发生后，我们就要着手解决回穗工人的吃饭问题。

我感到发动罢工反抗英帝国主义者是正确的，它是我们的头号敌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是次要的。我们也反对买办阶级，反对买办实际上就是反对英帝。罢工对帝国主义是沉重打击，当时的我爱国热忱高涨。

我并不认为国民党领导省港大罢工是受了共产国际反英政策的影响，我认为国民党中央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

那时我认识的共产党员有苏兆征和彭湃，因为他们是广东人。我也见过周恩来，但对他不太了解。

1925年7月1日成立了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当时我是拥护的。到那时为止，我们只有军政府，我们是遵循三民主义的方向前进的。

1925年7月6日，国民政府成立了军事委员会，仍由汪精卫领导，我对此事并不清楚。军人被教诲要服从命令，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服从文官指挥。无论文官与否对我都不具影响力，我愿意接受具有政治智慧又能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的领导。蒋先生就是那样的军人，所以我愿意接受他的领导。我抉择的标准并非限定于文人与否。

我在广州见过汪精卫，但对他不了解。我的职位不够高，故不能常与他接触。我崇拜他，因为他的革命经历和谋刺清廷摄政王之壮举使我留下深刻印象。我认为有机会见到他是光荣的。我也崇拜胡汉民与廖仲恺。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遇刺身亡。廖仲恺是容共政策的热烈鼓吹者。前面我已讲过，他偏袒工人们，甚至犯了法的都偏袒，所以许多国民党员对他不满意。据说是胡毅生（胡汉民的堂弟）策划了这宗暗杀。事实上，我认为他未必是凶手，被检控可能仅因为他反对容共政策，林直勉也因同样原因于8月25日被捕。我听说孙中山的支持者朱卓文策划了该案。

1925年8月25日，梁鸿楷被拘留。是不是他与港英串谋颠覆国民政府？^①那是冤枉的，我绝不相信他会阴谋反对国民政府。他是忠诚的，没做错什么事。如果有阴谋，我一定会知晓。第一师只有四个团，作为团长，在第一师是属于位高者。我从未听见梁鸿楷说过意



廖仲恺

^① 据毛思诚编纂《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一书说：8月25日晨，擒获林直勉、张国桢、梁士锋等，在粤军总部扣留梁鸿楷、招桂章等，发现港英谋覆政府，以梁鸿楷为总司令、魏邦平为省长之阴谋。9月17日，汪兆铭、李济深等来校谈，许（崇智）军1.5万人饷90余万，各军则多告饥乏。9月19日，盖当时公（蒋）欲出师长江以图本党之发展，而许不赞其行故也。9月20日，政治委员会卸许军政部长、粤军总司令、财政监督职，派陈铭枢护送许下轮赴沪。褫广东财政厅厅长李鸿基、军需局长关道职，逮送办，因李、关侵蚀国帑接济反革命军也。

味着阴谋反抗国民政府的话。我简直不相信他能瞒着我们卷入任何阴谋活动——我们是他的下属，也是知心朋友。所有第一师的军官都感到对他的指控是不公平的。

那时，毕竟我的政治觉悟提高了，否则我一定会造反营救梁鸿楷。我甚至没有考虑要采取行动对抗政府。

我同样不相信（建国粤军总司令部高等顾问）魏邦平也卷入了这场港英策动的阴谋。再者，他也没有力量。

8月25日，直属于许崇智的高级军官（讨贼军第四军军长）张国桢被捕。【当他与蒋介石在许崇智手下共事时，他曾严厉批评过蒋。】后来他被处决了。^①张国桢是我在广东陆军小学的老师。

粤军旅长杨锦龙也被捕了，他的部下被缴了械。粤军另一位旅长梁士锋也被解除武装。梁是很专制的。

部队一支接一支被缴械。我们粤军官兵感到迟早全都要被缴械。怎么会这样呢？以蒋介石的观点，粤军参与了所有的不法活动，专横暴戾。他认为除非把粤军除灭，一支新的革命军才能建立。粤军其他部队的表现是否好一些？不，其他单位比第一师更差劲。

粤军要被解除武装，是由于它的力量强大——它比其他部队控制地盘多，而许崇智的粤军司令部又设在广州，许的嫡系部队则驻扎在东江流域。第一师第一旅驻在广州——三水铁路沿线，粤军的其他单位驻扎在广州府其他地区、四邑以及东西江地区。



谭延闿

谭延闿的湘军和朱培德的滇军驻扎在北江地区。李福林的福军，军纪比其他部队差得多，但由于分散于各地，解决他们殊非易事。许多福军官兵驻在商船上。驻在河（珠江）南的福军不多，他的下属李芳是他亲弟，另一下属李雍是堂弟。李福林志在控制河南牟取利益，所以不曾卷入政治斗争。

【蒋先生对粤军处置不当，所以军心对他不服；他的权力愈大，他在粤军心目中的地位愈低。在那些日子里，人们不能谈论革命的事。】

没人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我已感受到这种不安

^① 张发奎此言不确。当时蒋介石连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都选不上，委实无权杀张；若无处理廖案特别委员会负责人汪精卫、许崇智的同意，张国桢身为讨贼军第四军军长是不可能被捕的。张一直同陈炯明叛军及其骨干熊略、叶举私下有勾结，1923年2月孙中山回穗组织大元帅府后，陈炯明从东江不时向广州反扑，张国桢临阵退却，孙中山曾下手令“着就地枪决”，因吴铁城宽纵而未执行；中山先生逝世后，张国桢确曾出席在广州河（珠江）南大塘李福林家乡举行的颠覆国民政府（1924年7月成立于广州，推汪精卫主席）的会议。8月20日廖仲恺被狙击而死，李福林怕东窗事发，于是出而自首，向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告密，所以张国桢本在必死之列。何况审判张国桢法庭由罗翼群、欧阳格、周恩来等三人定讞，周恩来是审判长。故张国桢之死与蒋介石无关。

全感，我常预感自己将会是下一位被缴械者。一天我接到命令率团赴广州，我收到报告，说我团会被解除武装。报告来自第一师师部一位我所信任的友人，他提醒我将大难临头，但我仍然沉着、坚定。同佛山的商界友人商定，找了几艘大型帆船，安插部下官兵转业航运。在午夜安排部众上船，向西江地区的高明起航。

我选择了高明是因为很容易到达，该地又多山。一旦情势紧急，我们可以占山为王。我的部下都是忠诚可靠的，而且我的校友罗子良是高明本地人，早在陈修爵投靠陈炯明后就加入我部。

我的部下纪律严明，都是优良的战士。我本人并未参与反革命活动，但我尚年轻，对上级有所不满。回忆当年，我相信陈铭枢在蒋先生面前说我的坏话。

我并没有因为率部去高明而受惩罚，倘若高层派部队来解除我的武装，我就没有机会参与以后一幕又一幕的活剧了。

不久，第一师师部命令我同卓仁机部驻江门的团长、梁鸿楷的堂弟梁鸿林合作，去解除驻台山的第一旅卓仁机部武装。因此，我团向江门行进。抵江门时，卓仁机旅部与卓部另一个由张弛^①统领驻在台山附近的团队已经被解除了武装，我猜测是梁鸿林先下了手，卓仁机逃走了。受伤的张弛穿便衣逃到我处，我和他曾在卓仁机麾下同事过，我保护他并用船把他送去香港。我团留驻新会。

梁鸿林团很快就被第一师另一支部队解除了武装。在所有这些行动中，第一师师长李济深都与蒋先生密切合作。【蒋先生善于分化瓦解，他攫取了李济深的指挥权，用第一师的部队解除其他部队的武装。】

我平静地渡过了这一场危机，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成功地执行了那么多任务。蒋先生对我颇为信任。

1925年8月30日我升任新成立的第四军独立旅旅长时，党军扩建成为第一军，由蒋介石统率；湘军扩编成第二军，由谭延闿统率；滇军扩编成第三军，由朱培德统率；粤军第一师扩编成第四军，由李济深统率；李福林的福军扩编成第五军。这些就是国民革命军的最初部队。

国民革命军实行三三制：三个连成一营，三营成一团，三团成一师，三师成军，废除了旅一级的编制。我的旅是第四军唯一的独立旅。这是怎么发生的？陈铭枢被委任为第四军第十师师长，陈济棠任第十一师师长。由于我是陈铭枢麾下第一团团长，且在东征之役功勋卓著，蒋先生待我很好，谭延闿也赞许我的战功，理应升任他的副手。可是陈铭枢对蒋先生说，正因我很能干，应该给我机会到第十一师以外去寻求发展。换言之，他不要我这个团了。我猜想，是蒋先生出了成立独立旅这个主意。当陈可钰和李济深对我谈起此事，我说：“好吧！”我乐意去指挥独立旅。

我的团队是满员足额的，因为东征期间我们俘获了大量敌军且把他们收编入

^① 张弛（1891—1967），江西九江人，南京陆军第四中学毕业。辛亥革命后任九江军政府参谋、大通军政分府参谋长。历任粤军营、团、副师长。1933年任江西省第十一区兼十三区行政督察专员。抗战爆发后，历任第一五五师师长、第三十五集团军参谋长、第六十四军军长等。1949年去台湾。

伍。接着，我征募新兵，增设了一个团，第一、第二团分别由朱晖日与黄琪翔执掌。我旅奉命驻守新会。

1925年9月20日，许崇智被迫离开广州。蒋先生说，他只是要求许暂时离开一阵，俟他把军队重新组建完竣后，许崇智就可以回来。



许崇智

许崇智串谋与陈炯明一起反叛是不可能的。许崇智没有做错任何事。是的，他想过得快活，但没人敢说他不忠于国民党。他是孙中山先生最忠实的信徒。我对他很了解，他善待朋友和下属。他出身于名门世家，^① 举止高贵，但他的部队确实军纪松弛。他做事鲁莽草率，不如他的参谋长蒋先生治军严格。许崇智的部属，例如他的堂弟许济行事专制暴戾。

蒋先生是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但联苏容共扶助工农的政策受到国民党内部分人士的反对。【蒋先生宣称，是否拥护军队领导人乃是衡量是否革命者的标准。真正的标准是：是否可靠，亦即是否服从蒋先生。】许崇智是否反对国民党的政策？我所知道的是：

他亲近谢持、邹鲁、萧佛成、居正和其他反对三大政策的国民党要员。

9月20日，郑润琦统领的粤军第三师被缴械了，第三师的军官邓龙光和李汉魂来到了第四军总部。莫雄统领的粤军第三旅也被缴了械，莫雄是许崇智的直属部下。不久，粤军第四师许济也被解除武装。

计划中要解除武装的部队是否包含许崇智直辖的国民革命军部队？许崇智同意蒋介石逐个解除武装的决定，但他没料到有朝一日蒋先生会逼他离开。许崇智手下的部队并入了蒋先生统率的第一军，^② 譬如第二师的团长薛岳与他的部下全都移转第一军，顾祝同与卫立煌也移转第一军。

我认为，为了重建军队，蒋先生解除军纪不良——如许济的第四师——的武装，是正确的，解除卓仁机武装也是对的，但他不应该解除梁鸿林团的武装。梁团是粤军的基干部队，起初是由梁鸿楷指挥的。梁鸿林是个出色的军人，维系军纪也甚严明。简言之，蒋先生在缴械事宜上本应谨慎从事。我敢说，他甚至想缴我的械。

我感觉到，苏俄顾问对解除一支支部队的武装出谋献策，我们脑子太简单。粤军不管错到什么地步，我们也不能任由俄国佬摆布。我感到蒋先生听信俄国顾问的话。对路加契夫与其他俄顾问进入总参谋部关键岗位有何看法？我只知道广州有红须绿眼的外国人，但我不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他们在干什么。我并不担

^① 许崇智的祖父许应颢、父亲许炳衡都是前清朝议大夫、福建补用通判；其叔祖许应葵历任甘肃巡抚、闽浙总督、礼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另一叔祖许应荣曾任浙江巡抚；其堂兄许崇灏、崇清分任南京临时政府卫戍司令、中山大学校长；堂弟许济任粤军师长。

^② 《革命文献》1955年版第11册1762页载，蒋介石在1926年1月1日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军事报告中说：第一军由党军和忠贞的粤军组成。

任见多识广的职位，我无法接触到高层的进展。

对9月23日胡汉民离开广州，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我猜想他因为堂弟胡毅生被传说卷入廖仲恺被刺案而不得不离开。他们弟兄俩与廖案无关——从留学日本时开始，胡汉民同廖仲恺是多年的老同志了。胡氏兄弟都由于反对容共政策而受到斥责。

1925年9月杪，国民政府发动对付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任命蒋先生为东征军总指挥，以第一军与第四军为主力。10月4日我旅出发加入第二次东征，我旅从属的第四军是李济深指挥的。在第二次东征战役中，我参与的最重要战役要算1925年10月22日至23日的热汤战斗。我旅经历了激烈的战斗，当时我旅仅1700余人，敌军是我们的20倍。我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击破敌阵数处，敌终于不支溃败。然而我旅阵亡营长罗子良一员，伤一员，连排长伤亡十余员。士兵伤亡数百人。作为旅长，我忙于战事，没有机会去赚黑钱。

第一军军纪严明战绩可观。在第二次东征中，我确信蒋先生具有不羁之才。我们的空军对东征有何贡献？^①我根本没见过任何飞机。

1925年10月26日，我旅与李济深纵队其他部队奉命开赴粤西南增援征剿邓本殷之役。鉴于热汤之战损失惨重，我旅奉命先开赴肇庆休整。

在赴肇庆途中，我在广州停留了几天。在广州，我见到了国民政府的苏俄顾问团团长季山嘉，他给我颇为良好的印象。

在肇庆我旅被扩编成第四军第十二师。1925年11月21日，我被任命为第十二师少将副师长，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兼任第十二师师长。这是出于我的建议。他那时病了，我告诉他，我会管好一切。作为十二师师长，他不必到师部视事，仅仅挂名而已。

我要陈可钰当师长，这是基于我俩牢不可破的友谊。他是个很好的人。1920年粤军从福建回师广州时，他待我十分好，后来我在他统率的总统府警卫团任职。1922年当我的部队重新并入第一师时我要求他重回第一师。邓演达、李济深和其他人都对他持同样的良好评价。

我推荐许志锐为师参谋长。通常遴选师参谋长由军部推荐。参谋长有权指挥战斗，但要以部队长的名义发布命令。师级参谋长挂少将衔。

我征募新兵以补充损失，且扩充部队。第十二师下辖三个团：叶挺的第三十四团，朱晖日的三十五团和黄琪翔的三十六团。

叶挺当上第三十四团团长的，里面包含着一段姻缘的秘密。叶挺与我是好朋友，我俩是校友兼同事。当我俩都当营长时，他在广州认识了一个美丽的姑娘。在他姐姐出阁前，父母不让妹妹嫁给叶挺。姐姐是个麻脸。叶挺追求她经年，一直不成功。在失望中，他剃光了头发。

我升任师长时，叶挺在第四军军部担任参谋。他要求我帮助他当上团长以成

^① 据季山嘉在广东军事发展报告中说，革命军的空军能够完成50%的任务。



叶挺

全他的婚事。他说，即使婚后立即免职也可以。那时他女友的姐姐已经出嫁了，但其父又开出新的条款：叶挺必须当上团长。所以我推荐他当三十四团团长。

许多广东人会向未来的女婿开具条件。我介绍黄镇球给卓仁机妻子和朱晖日妻子的妹妹。她的父亲也说，黄镇球必须当上团长，他才同意女儿嫁给黄。就这样，直至黄镇球升任第四军补充团团长才得以完婚。

我知道叶挺的政治观点，早在他从莫斯科回来之时，我就问他，是不是共产党派遣他去苏联的。他说，他在上海认识陈独秀后就加入了中共，于是去了莫斯科。我听了后说：“好呀！”

第三十四团由新军组成。叶挺推荐海南人周士第担任他的参谋长。我知道周士第是共产党员。三十四团任命军官多数是由叶挺推荐的。^①我批准他的推荐，我信任他。然而我也安插一些军官到叶团。

除了周士第，我是否知晓三十四团的中共党员？我知道还有，但我不清楚是谁。共产党了解国民党，但我们不了解他们。

在任命军官方面，我能够委任连一级军官，委任校级军官则须由第四军军部批准。可是，事实上都会自动批准，因为第四军军部没办法去逐案调查。师长撤换一名军官，得同时指定接替者，然后向第四军军部呈报，同时请示上峰批准任免令。

我的师部辖下有参谋处、经理处和副官处，其中参谋处是最重要的，它包含三个部门：人事、情报和作战。经理处负责部队的军饷与供应；副官处负责选择师部驻地与部队驻地、管理战俘以及负责师部的经费与供应。可以说，副官处负责任何参谋处与经理处都不管的事务。由于时间匮乏，这三个处常常配备不全。至于师直单位，我只设立特务营，负责警卫工作。

国民革命军佩戴国民党党徽——白日背靠青天——以及红色帽缨，粤军部队自军级到连级，佩戴的军徽相同，但大小不一。

将国民革命军的组织系统同粤军比较，三三制在指挥作战时更具实用性与灵活性。譬如，一名师长能将麾下三个团中的一个团留作后备队；然按旧制，一名旅长将麾下两个团中一个留作后备队、将另一团充当进攻部队，那么要区分他的旅长权限与进攻团团长的权限殊不容易，所以旅级编制的取消便顺理成章了。

按新制，一个班的编制从9人增至14人。按照组织编制表，一个连必须包含126个士兵，3个排长，1个连长，1个文书，1个传令兵，1个司号兵以及9个伙夫，共计143人。

以下单位是设立在团一级：机枪连、特务排、担架排、通讯班。一个团必须

^① 周士第著《我回忆叶挺同志》（原载1949年香港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烈士传》第180页）说：虽然正式批准权在师、军一级，但中共能决定团级干部的任命、调动与罢免。

配备大约 1600 人的战斗部队；一个师则配备 4800 人的战斗部队，加上师部参谋人员，一个师至少有 6000 人。师直单位包括一个炮兵连、一个运输连、一个特务连、一个工兵连、一个通讯排和一个担架排。所有这些单位的组建耗时甚多。

国民革命军的一个连比粤军一个连名额多；营级则不相上下，因为粤军一营下辖四个连。国民革命军一个团比粤军一个团名额多，因为下辖单位更多。

虽然粤军第一师下辖四个团而国民革命军的一个师仅三个团，但是后者阵容较大。首先，国民革命军一个团的编制比粤军一个团大得多；其次，国民革命军的师直单位比粤军多。可是，实际上国民革命军没有一个单位是足额的。

国民革命军的薪饷同粤军比较，每月二日，营部收到每月士兵伙食费每人六元，剩下的伙食尾子发还每个士兵。此外，新兵每月月底可以收到四元五毛钱的饷银余额，后来改为翌月二日。其他阶级均按章实授。所以士兵们境况大为好转。由于他们能领到薪饷余额，所以我不再给他们发放特别费。

国民革命军也采用粤军的惯例，对军官薪饷打折扣发放，例如一名少尉原定 40 元月饷，实发 36 元，以此类推，尉官九折，将校八折。

国民政府成立后，双毫逐渐淡出，代之以纸币。

对军事单位薪饷的拖欠现象仍然存在，有时政府拨款少于规定的数额。例如，一个师原定军饷 10 万元，政府实发 9 万元，欠师部 1 万元。

我也重视新兵训练，但没有培训参谋人员，因为所有的参谋部是军校毕业生。十二师又没有后勤供应，我们只能从战利品中得到补给。

第四军派遣杨德昭为十二师政治部主任。政治部有十多个政工人员。宣传科与其他部门建立起来了，每个团队都有政治指导员负责政治工作，政治部的组织逐渐扩展了。政治部的职能是在军队中实施政治训练，以革命思想武装军人的头脑；组训民众；从事革命宣传，派人协助建立工会、农会，帮助草拟组织规章等。政治部没有情报，如果政治部从民间收到情报，政治部主任会向我报告。

我赞成设立政治部，我相信政治训练是重要的，我希望这方面超越黄埔军校。我友善对待政工人员，欢迎他们进驻。

第四军总部命令我师在挺进粤西南前先到江门集中。我们向雷州半岛开拔。国民革命军也雇用挑夫，但像以前一样，服役一天我就让他们回家，也有些挑夫愿意留下来帮忙。国民革命军仍然强征挑夫，但规模大大缩小。我则从来没有这样做。

1925 年 12 月末，我们抵达雷州半岛。这地区多半是平静的，邓本殷逃到海南岛去了。我在湛江（广州湾）附近的遂溪设立了师部，派部队消灭了邓本殷残部和雷城、徐闻以及雷州半岛各地的土匪。

1926 年 1 月初，奉派来我师的苏联顾问保罗^①报到了。我同他交谈过，他讲英语，随身带着翻译。

^① 在京师警察总监 1928 年印行的《苏俄阴谋文件汇编》一书中，没有查明此人的真名。

我常常去湛江，在那儿我见到陈学谈——当地类似杜月笙的江湖老大，人人叫他“大老爷”。那些日子发生了不少奇怪的事。陈济棠的十一师与我的十二师奉命进攻海南，但我们没有足够的渡海船舶，只能先渡一个师，第四军军部命令陈济棠先渡。由于我师刚刚成立，理应陈济棠先行，但他不肯。我们在第四军军部开会，军长李济深要我先渡。我提出条件：谁先登陆海口就颁三千大洋奖金，李济深同意了。现在回想起来，接受任务时要先开出奖金条款，这当然很不合理。

情报工作方面，当我师接到进击海南的指令后，师部参谋处就在广州湾设立了情报机构，它派遣商人或农民去海南侦察敌情。有时是由我师情报人员训练他们。有时我们派遣参谋人员去收集情报，但次数很少，因为军人很容易被识破——军帽的帽檐会在军人的额头留下深刻的印痕，容易因此泄密，导致穿帮。我军抓到了可疑人员，都是用这一办法来识别是否奸细的。另一原因是我们只能派遣战斗地点的本地人，而参谋人员中难以寻找这类人士。

我们从不同来源获取情报。例如，海南岛西部儋县人王鸿饶同意归附我们，他向我们报告了守军驻地情况。情报费用是由一个特别基金支付的，师部参谋处处长向我报销所需经费，我便从经理处调款，然后向上级呈报核销。

拟订作战计划时，第四军军部决定进击海南岛的战略原则：十二师先发起攻击，军部指挥十一师跟进。按照这些原则，我决定如何完成任务。

我的参谋长指导参谋处拟订作战草案，描绘出不同的行动步骤以及可能遭遇的问题。计划草拟完竣，我就召集会议。参谋长和作战处处长，参与计划的参谋人员以及各团长，甚至驻地不远的团级参谋主任都要出席，保罗当然要到。我先要求他们对作战草案提出意见，我会听取不同意见，但最后决定权在于我。有些师长从来不召开作战会议，而只是咨询他们的参谋长。

参谋处长在拟订作战计划时不需要咨询经理处的意见。在作战会议上，我会向经理处以及其他部门军官征求意见。作出决定后，我就命令经理处作出准备，经理处长向第四军军部领取必要的军火与其他军需物资。他几乎是有求必应，否则我会出面力争。

我们必须先把部队集中到硃洲岛，然后渡海。我军向南边航行登陆是不可能的，因为那儿地形多山。保罗与一些军官建议我们开往抱虎角，那儿没有敌军守卫，我则主张驶向离海口一百多里的小港新埠，虽然那儿有敌军一个机枪连驻守。换言之，我主张敌前登陆。我提出我的理由：首先，抱虎角离海口比新埠远；其次，抱虎角周围波涛汹涌，我担忧官兵们会晕船。所以我坚持向新埠开航。

为什么不在海口登陆？很简单，首先，由于潮汐不利，在海口登陆很难。即使乘着海潮的高峰，也要耗三小时才能靠岸停泊。其次，北方的军阀政府已派遣“海圻”号军舰到海口防守。第三，海口筑有秀英要塞。

1926年1月中旬进击海南岛之役，听上去像个神话，与现代战争无关。我们

征集了大小不同的帆船组成舰队，小船只能载几十人，大船也仅载百多人。我们在黄昏时起航，我在保罗与参谋们陪伴下，搭乘一艘小型机动船“南丰”号。我师的主力——两个战斗团与特务排——从硃洲岛乘坐两百多艘帆船。其余部队从半岛南部的外罗起航。

我的一名营长率领几艘帆船，载了大约一营兵力，首先登陆新埠镇。他们首先攻击敌军，后继部队陆续抵达。翌日黄昏我登上海南岛，当晚攻克新埠。第二天黎明我师向海口挺进，上午就占领了海口，把敌军缴了械。我们亲睹海圻军舰载着邓本殷逃走，我们束手无策，因为正碰上退潮。

我花了三天时间集合部队，因为我们无法控制风向。如果没有风，帆船就开不动。我部下有一个营被风刮到了海口，但不能登陆，因为碰上了低潮，直到我们占领了海口，该营才登陆。有一支部队在抱虎角登陆。

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渡海作战，也是一场没有海军舰艇参加的渡海夺岛战斗，有的只是一条小型机帆船。

虽然两个师奉命渡海，实际上是我这个师独力打下海南岛的——陈济棠缺乏信心与勇气。李济深依约赏给我师三千大洋，我把钱分给三个团，加菜庆祝胜利。

陈慎荣部投向我们，并入了国民革命军。他从雷州半岛西部渡海攻击海口西面的临高。王鸿饶同意攻击儋县的敌军。这两项行动是为了抑阻敌军向海口集中。

我们从邓本殷手中缴获了一门上海生产的山炮，我很高兴。我组建了师直炮兵连，由陈荣机统领。我推荐薛岳的堂弟薛仰忠为炮兵营营长，他毕业于广东速成军官学校，曾经在我师部当过参谋，有多年炮兵军官的经验。不能任命他更高的职务。他也参与指挥炮兵连。

我在离海口十分钟路程的琼山设立了师部。李济深、陈可钰偕同第四军军部成员以及第四军的俄顾问涅吉丁（其真名叫郭列也夫）莅临海南。第四军在海口设立了指挥部。

对于保罗在军事战略上有何贡献，我没有任何印象，因为他的军衔不高，而且他不明了中国的军情。我想不起来他曾持有与我们相反的意见。在会议上他确也表示自己的见解，但大多数情况下，他接受我们的看法，事实上他是个脑筋迟钝者。不过我喜欢他，因为他总听我的话。这就是为什么当有人说我们听命于俄顾问时我就觉得好笑。他长得高大，看上去是个诚实的人，我们相处得还不错。涅吉丁就完全不同了，蓄着小胡髭，手持烟斗，个性活泼，爱发表自己的观点，更喜欢长篇演说。

苏俄顾问与我们食宿与共。如果我们在庙宇过夜，他们也一样。我认为他们是一个优秀的群体，帮了我们很多忙。他们向其上级所呈的报告对我们作了善意的评价，这就是我们对加伦（加伦是华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将军的化名）和其他俄国人留下良好印象的原因。

我们从不询问或调查他们的背景。作为我们的顾问，他们从来不谈论军事以外的任何事情。这方面他们做得好，他们从不批评中国人的人格或政治，保罗甚至从不向我评论其他中国军人，也从不干涉我们行政事务或个人问题。我觉得我们也不应该问他们苏军的事，他们毕竟是来担任军事顾问的，他们的内政与我们无关。同理在军事范围之外，我们的事情也同他们无关。

那些俄国人的生活习惯与服从命令理应受到我们钦佩，他们尊重我们的职权——事实上，我们的职位高于他们。他们受过优良训练，既然我要同他们共事，我改变了以前对他们的消极态度。

我对俄顾问的观点也影响了我的下属，但不知其他高级军官想法如何，因为我从不与他们谈论这一话题。我偶尔问他们与俄顾问相处如何，他们常说俄顾问干得很出色。

苏俄对国民革命军的影响是重大的。我们军队的组织与训练仿效苏军，甚至军服也受了苏俄的影响。先前我们的制服用的是中式服装的直领，现在仿照列宁装改为法式的翻领，甚至中山先生自己的服装也改为翻领。

我认为苏俄对国民革命军的影响主要是政治部——那是很出色的。我们学会了怎样去武装士兵、怎样教育他们去战斗，也同样武装他们的思想。从前，如果你问我的士兵为谁而战，他会回答“为张发奎”，现在他就说：“为了人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整个国民革命军中每个士兵都有此觉悟，有些人仍然抱着老脑筋，认为自己征战有功就可以为所欲为。

政治部留给我极好的印象。在部队到达之前，他们就与当地人民取得了联系。其成效是：我们无论去哪儿都能得到人民的帮助——提供情报、茶水、抬运伤员等等。从前我们一到某地便发觉老百姓都逃光了，因而困难重重。我们付钱给老百姓，过往军阀部队缺乏纪律，压迫百姓，但我军爱护、保护百姓。

廖乾五接替杨德昭担任驻海南第十二军政治部主任。我知道廖乾五是共产党员，不年轻了。同叶挺一样。他做政治工作绩效极好。

政治部容纳了许多共产党员。我从没有检查他们的活动。我常常听他们向官兵们演说军队对工农大众的职责以及纪律的重要性等等。第四军从不欺压百姓。

在海南岛的第十二师国民党党部的职能，是加强军队对党的了解，执行党的政策。中央党部向我们下达政策。我兼任十二师党部主委。我的参谋长、三位团长及其政治部主任担任师党部执委。

那时师部的三个处已经满员了，参谋处下设人事、情报、作战、训练四个科。此外成立了医务处，以及我亲自掌管的机要处。不少师直属单位由我直接指挥。

李汉魂加入我师后，我组织了军官训练团，叫他负责训练低级军官。我还为军士与上等兵成立了军事训练班。除了参谋会议，我每周召集参谋长、师直单位主官以及师部各处长开会。

我的妻子到海南来探亲，这是她第一次过军旅生活。我恢复了每天清晨骑马的

习惯。按制度，营长可以配备一匹马与一个马夫，那是一个二等兵。马匹通常来自蒙古、四川或贵州。师长可以支配两匹马。事实上，当军队行进时即使马匹足够我也很少骑马，何况常常马匹匮乏。为了同部队保持步伐一致，我必须骑得很慢，然而我总是以策骑奔驰为乐。行军时由于我常常步行，所以军官们也跟着我步行。

当师长时，我有随从副官，他通常是少尉或中尉军衔；还有一名卫士，军衔为下士或中士。我喜欢用军校毕业生当副官，让他帮我存取文件，他同我一起进餐。大多数军官都会把卫士提升为随从副官。

在海南岛我的性格特点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详情如下：一天我去戏院，黄琪翔的主任参谋文国康携了一名妓女走过来。他问我：“这个女人漂亮吗？”这使人十分尴尬，难以回答，我想他太无耻了，我们毕竟曾是同学。我十分生气，想处罚他，但按捺住了，叫黄琪翔去警告文国康。我说：“我们都是同学，告诉他今后不许在公众场所这么做，下次再这样我要处罚他！”

不出两个星期，当我在一家旅馆等候友人时，再见到文国康携着另一个妓女。他对我说：“这是另一个女人，你看她怎么样？”这次我再按捺不住了，马上要他辞职。

我奇怪他怎么堕落至这样地步，悟出这是我自己的过错。我意识到，我曾当过“坏蛋”，所以在我缔造一支纪律严明的好军队前我自己必须洗心革面。要知道，我们都没有携眷从军，致使军队生活充满了醇酒妇人，夜夜笙歌。我感觉我的下属沦入放荡的生活，倘若事态发展下去，我们不会有前途。

我以身作则，摒弃了所有的坏嗜好——赌博、叫歌女陪酒等，完全改变了以前的生活方式，希望以此感化下属。我希望他们看到他们的长官并未携眷随营也规规矩矩做人，从而痛改前非。我颁令全师官兵自律，要他们停止闲荡，不再沉溺于酒色歌舞。因为我先已律己，所以有资格纠正部众的恶习。

第十二师官兵必须遵循四大禁令——禁止逃亡、禁赌、禁嫖、禁（鸦片）烟。禁令对所有官兵一律实施，违者受罚无一例外。

我们对新兵说，不获请假批准不得擅离军营。如果请假未获准擅自离营被抓回来，他们将被处死。死刑对所有擅离营房的官兵一律适用。

有时招募新兵者没有仔细解释四大禁令的内容，因为招募新兵越多，他得益更多。因此，十二师的连长会询问新兵们能不能遵守四大禁令。设若新兵回答说“不”，便会被移送营部。

死刑也适用于赌博。为什么刑罚这样严峻？因为赌输者往往铤而走险携枪逃亡，而逃兵带走的枪支在广东卖价十分昂贵。

要抓住违反禁赌令者是困难的。由于刑罚严厉，士兵们不在营房聚赌，而是星期日到山区或郊野主赌，还派人放哨。每当军官走近时，他们就疏散或者假装在聊天。当吴奇伟与我同行时，他常常叫嚷：“你们在干啥？”来向赌徒示警，他的外名叫“婆婆”。

最流行的赌博方式是扔骰子和番摊。前者不容易侦查，后者可以用现金交

易，故不需要什么设施。

梅毒是严重的威胁，且对军队的战斗力极为有害。梅毒在我师仅仅感染到一些军官，士兵们一般付不起嫖金。同妓女过夜的罚则是星期一在纪念周上当着全师官兵的面，用木板打二百下，其目的是唤醒犯规者的羞耻感。

抽鸦片上了瘾就需要治疗，出院前，戒烟者必须签署一份保证书：永远不再抽大烟。为了加强戒烟者的决心，他必须寻找两位保人，如抽大烟者的连长，一旦他重新抽大烟，保人们就要罚钱。倘若重新抽大烟被抓住，此人要被关禁闭。

此后再也未发生故态复萌的案例。这不是由于治疗效果所致，而是由于四大禁令。它维护了军纪，也保障了战斗力。我们的口号是“遵纪人人平等，杀敌绝对自由”。我善待官兵，与他们同甘共苦。这就是为什么上帝独厚于我，以及我从未受伤的原因。

我说过我再也不去教堂，我不再相信传教士的话，但我仍然信仰上帝。我相信，纪律要依靠互信，但互信只能建立在官长的账目公开与赏罚分明。因此，我以“吃空额”积聚的钱，为官兵们设立了一项储金。这是相当可观的一笔钱。由于我坚持，第四军拨付我每连143人、每营450人的军饷，而一个营维持400人就很不错了，所以每营至少可以结余50人的军饷。一个师的实际员额通常比组织编制表规定的数目少1000人。若以每个士兵十元五角计，每月至少可以节省一万元！

我决定设立一个储蓄基金是因为我觉得，我背上“吃空子”的名是不公平的。于是我召集参谋长、处长、团长、参谋主任、每团一名营长，以及每营一名连长来开会，我提议成立一个经济委员会来负责管理用“吃空子”积聚起来的储蓄基金，旨在公开账目。

我部下军官支持这个计划，因为他们常常要自己掏腰包。以前我常常将“吃空子”省下的钱分给他们，那么他们会不会因为失去财源而反对这一计划呢？不，因为此时他们获发一笔“特别办公津贴”。我得800元，团长500元，营长300元，连长100元。扣除这笔特别津贴后，余款便由储金委员会掌控。

按照章程，这个委员会由副师长、三位团长以及经理处处长组成。他们把钱存在银行里，取款时至少要有两名委员签署，还必须列明用途预先呈请我批准。亦即，没有我的许可，任何人拿不出钱。

储金委员会隶属于我任主席的师部经济委员会。按照章程，该委员会由师参谋长、师经理处处长，三位团长以及师政治部主任组成。该委员会的决议由多数票作出，每次都要经过激烈辩论才能作出决定，一旦作出决议，一定十足付款。

有了这个储备基金，我就可以不再欠部下一分钱了。当军部应拨军饷有所拖欠时，我就直接从储备基金中取用同额款项。我根据值日排长最新呈报的各级官兵数字，向下属单位派发伙食费，结余则点名发放。

我从没有从烟赌业收取黑钱，因为我已经下决心从善。我也不允许我的部属收黑钱。

我设立了人事委员会，自己出任主席，其他成员是参谋长、三位团长以及政治部主任。该委员会实施了一项公平的赏罚、升迁、罢免制度。对尉级与校级军官的任免提议经该会讨论后，将决议呈交给我。倘若我觉得不适合，我会将提案退回该会。但我基本上接受他们的决议。

人事委员会擢升军官的标准是作战勇敢、训练（下属）精良、恪守军纪、爱兵如子。提升低级军官的标准同高级军官没有任何差别。经济委员会与人事委员会是我的部下勇敢善战的另一重要原因。

我环游全岛，对海南岛这个富饶大岛的潜能留下印象。

对1926年3月20日发生的广州中山舰事件，我感到困惑：那时我们正同共产党合作，却为李之龙是中共党员而喋喋不休。只有蒋先生知晓事件的真相，我们中间无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①

1926年5月9日，汪精卫受该事件牵连而离开了广州。我强烈感觉这对他不公平。此后我对他的著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的演讲感动了我，我认为他是仅次于孙总理的演说家，他的品格令人仰慕。

这一时期我对蒋先生非常崇拜，我感到他具备非凡的军事天才。正如我先前所述，我赞成他对杂牌部队缴械的举措。他决心重组军队以便统一广东、达成他的最终目标——北伐。孙中山生前重用一切拥护他而又支持北伐的人。蒋先生却不同，我感到蒋先生在训练黄埔学生的工作上做得很出色。无疑，他在统一广东上作出了伟大贡献。

倘若广东不统一，广西绝不会加入国民政府，李宗仁不会带领他的部队加入国民革命军并整编为第七军，也不会派军队去增援湖南的唐生智，如此唐生智便不会起兵反抗北洋政府的省长赵恒惕。

唐生智派遣他和陈铭枢的保定军校同学刘文岛到广州来，陈铭枢在收编唐生智部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上起了重大作用。我们欢迎此举，犹如欢迎李宗仁部归附。那时吴佩孚部队驻扎在湘鄂边界附近的醴陵、浏阳、平江一带，唐生智部则控制了湖南地区。假如唐生智不加入我们阵营，我们离开广东就要同唐部作战。他与我们合作，至少使北伐军在湖南少打了几仗。

唐生智与陈铭枢的个人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第四军麾下第十、第十二师被选作先头部队离穗开赴湖南。自此，我在战斗中扬名显声，许多人对我另眼相看。我猜想唐生智以为第十、第十二师会援助他，前者在广州地区，后者尚驻扎

^① 张发奎去世22年后，大陆史学专家杨天石教授以大量史料，包括中共元老包惠僧、陈公博、张国焘等人回忆录、季方报告、黄珍吾报告、欧阳钟报告、陈孚木回忆录等，证明蒋介石没有给海军局或李之龙下过调舰命令，矫蒋之令的是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幕后主持人是西山会议派、广州市政委员长伍朝枢、孙文主义学会这三方面，而欧阳钟的后台则是其叔、孙文主义学会骨干、海军官校副校长欧阳格；是欧阳格与王伯龄定计，一面唆使侄儿矫令，一面向蒋介石谎报李之龙谋叛，结果便演出了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事后，蒋查出事涉欧阳格，即下令逮捕。1937年欧被蒋下令处死。事发时，蒋介石日记表明，他以为系汪精卫摆布与陷害——欲让李之龙出动中山舰绑架他。事件真相大白后，蒋汪之隙已成。且绵延13年，其间蒋汪时分时合，最后导致汪氏投敌叛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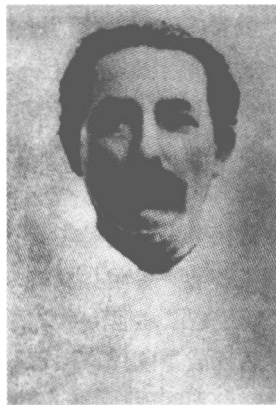
于海南岛。

当收到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命令十二师参加北伐的电报时，我十分高兴。他命令我先派叶挺的三十四团。于是三十四团被改编为独立团，向湖南开拔。另外组建了三十四团，由许志锐统率。这样，十二师就有了四个团，在国民革命军采用的三三制中颇不寻常。

陈可钰辞去了兼任十二师师长的职务，我晋升中将师长，朱晖日任副师长。朱副师长挂少将衔，他的职权是能出席所有的会议，被授权于我不在时代理师长职。然而，大多数时间他没有什么事做，不需要批公文，所以空闲时间比参谋长多。通常在师长职务出缺时，副师长会真除师长。

吴奇伟接替许志锐任参谋长，缪培南继朱晖日任第三十五团团。我下令三十五与三十六团搭船经广州去湖南，三十四团留在海南。

1926年6月5日，蒋先生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那时他是唯一的总司令。蒋先生让第四军军长李济深担任他的参谋长。李率第十一师留守广州，负责广州市的治安。



鲍罗廷

我比大部队先回到广州，停留了大约十天。我告诉蒋先生，我敢保证梁鸿楷对国民政府的忠诚，他是个老国民党员。我没有要求蒋先生让梁鸿楷复职，仅仅要求蒋释放梁鸿楷。蒋先生说：“他是你的上司，是我的下属。你是否认为你爱你的上司而我不爱我的下属？别担心！”蒋先生希望我在出发北伐前解除疑虑。最终多半由于李济深的努力，梁鸿楷获释了。

蒋先生听说我在海南缴了邓本殷部的武器，便彬彬有礼地要求我送十来支毛瑟牌手枪给他的卫队。如果政治已经上了正轨，他作为上级，大可以通过第四军军部命令我上缴这批手枪，然而当时他吃不准我会不会同意，只好以礼相求。我答应了，当我的师部抵达广州

时，我如数点交。

在广州我见了许多人，那时我已升任师长，身份变得非常重要。早先来广州时我见过李宗仁夫妇，这次则见到了苏俄总顾问鲍罗廷，我们在翻译帮助下交谈。我也聆听过他的一次演讲，由吴绍澍担任翻译。

我对鲍罗廷印象非常好，我认为他有良好的政治觉悟，我甚至可说有点崇拜他。但他看上去很严厉，也很神秘。同时我遇见加伦，同鲍罗廷相比，加伦更和蔼可亲，我钦佩他的军事知识与洞察力。此外，他谦恭有礼，我对他的钦佩超过其他俄顾问。

第五章 北伐中的“铁军”

(1926年6月至1927年4月)

1926年6月底，第十二师师部与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团乘火车开往韶关。保罗随行，另一位俄顾问康契兹跟随第十师。再从韶关向湖南攸县前进，六月初叶挺独立团就攻占了该县。第四军奉命在攸县集中。1926年7月3日我们抵达时，第十师师长陈铭枢奉命在副军长陈可钰到达前临时指挥第十、第十二两师作战。

那时唐生智是前敌总指挥，第四军被指派在湘江右岸作战，李宗仁的第七军与唐生智的第八军负责湘江左岸的战事。第十、第十二师联合进攻萍乡——株洲铁路线上的醴陵。第三十五团与第十师的二十九团是我指挥下的右翼，叶挺独立团在左翼。我命令二十九团营长张世德警卫江西萍乡。他带了几个卫士策马走在全营前面。我训斥他一顿，因为营长应该领导全营，而不只是一小部分。

1926年7月10日，第四军攻占了醴陵。我没见任何萍乡——株洲铁路的工人们怎样帮助过我们，在以后到达武汉前也没见到过工会的红旗。然而，在醴陵工人们可能同人民群众一起帮过我们。政工人员在组织当地民众方面干得很出色。民众为我们当挑夫、当侦探、抬伤员、烧水煮粥，也帮助我们破坏铁路。有时他们收取酬劳，但有时也会自愿提供服务。



唐生智

攻占醴陵功劳最大的是第三十五团。事实上战斗并不太激烈，时间也未拖延。我们拂晓发动攻击，午后就占领了醴陵，伤亡很有限。醴陵的居民放鞭炮欢迎我们。接着向北追击敌军，拿下浏阳没有战事可言。

不久，陈可钰偕同邓演达的兄长邓演存到了醴陵。邓演存是保定军校与陆大毕业生，时任第四军参谋长。第四军俄顾问涅吉丁和军部大多数人员也同时抵达，其余的军部人员则负责第四军广州留守处。留守处将军饷送到第四军军部，军部再依次发给我们。留守处也照顾送往后方的伤兵。第十二师也在广州设立留守处将部分军费付给下属单位，师留守处直接从军留守处领款。阵亡军官眷属获发的抚恤金似比以前多。但供应并未增加。

1926年7月11日唐生智部攻占长沙后不久，我见到了他，但他没有给我留下

什么印象。8月11日蒋总司令到达长沙后，召集了一次会议。当蒋总司令主张集中兵力进攻武汉时，唐生智是否主张同时进攻武汉与江西，我记不起了。总之，会议决定先攻武汉。我认为这是正确的，武汉是重要的城市。第四、第七军分配在右路纵队，第八军是左路纵队。左右两路都配属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指挥。

在长沙，蒋总司令给我三千大洋。我自然说不必要了。他坚持说：“收下，收下！”他写了张条子：“付向华弟特别费。”我将此手令交给师军需处领回了这笔钱。蒋总司令确实待我很好。在当年，三千大洋是极大的一笔钱哟！

第十二军的装备质素比以前好，因为我们从邓本殷手中缴获了一批武器。我们现在只用0.65和0.79公分口径的步枪。我师有两挺俄制的新型重机枪，每挺都由两个轮子架起来。我们也有国产的水冷与气冷机关枪。但我们仍然只有一门山炮。我把炮兵营改组为机枪炮兵营。

我们仍然利用子弹壳与炮弹壳，但我们现在交它们到石井兵工厂加以熔铸，重新制造枪炮子弹。

军官们现在佩上手枪了，在我师，我们得益于从邓本殷部缴获的毛瑟牌手枪，然而第十师有些军官尚未能佩上手枪。

我们的士兵装备有：一支步枪，一条容纳150颗子弹的子弹带，两颗手榴弹，一条毯子，一件雨衣，一个军用水壶和一只饭盒。按规定还配备铁锹和洋镐，但未常用，一个班只带着一两套。全部加起来，一个士兵要背40至45斤装备。

士兵获发了较好的军服，冬季获发棉衣、棉裤，还有短裤与汗衫。在执勤时，所有的军官都要穿上军服，由他们自己掏钱买。作战时无论官与兵，每人都要戴一条红白蓝领巾以资识别。军官常常穿士兵制服以防敌军辨认。所有官兵都佩戴布制徽章，印着他们的姓名与职务，军官的徽章加上不同颜色的边框——将官是红色，校官是黄色，尉官是蓝色。

无线电通讯设备仅参谋总部与第四军军部有，我师仍然没有。我们的电话比以前多，每个团部与一些营部装上了电话。其实通常在团部与营部之间不必使用电话，因为驻地通常离得很近。长距离的通讯，我们仍然依赖逐站传递信件，有时使用马匹。那时我们的马匹比以前多了，传令兵可以用军马代步。

情报工作方面也有革新，表现在组建侦察队。师部规定每个团要组建一个侦察队，战略情报则由师部作战处情报科掌握。

现在只有军级才有权招募新兵，当我计划招兵时，就向李济深呈报：我欲在某县招募多少新兵，他便行文有关的省政府，省政府乃指示该县县长协助我招兵。这样，县长们就不会像以前那样辛苦了。以前，几名团长能轮番到同一个县去征兵。这是征兵制度上的改善。雇佣挑夫的程序也照此改变，挑夫改称“运输兵”。他们与战斗兵待遇相同，组成了军队中最重要的部分。仅有的差异是：由于运输兵不用打仗，所以征募运输兵的年龄上限远远高出战斗兵，通常是25至35岁。我们的运输兵来自许多省份。

有时，某人对我的下属说，他能为我们征募一个运输连，条件是要任命他为

连长。我们通常会接受这一条件，因为他与那批新兵来自同一个地方，新兵们都听他的，换一个人当连长就得不到那批新兵的信任。那时充任运输连连长是不必须具备特定资历的。

运输连同正规连的编制相同，是师部直辖的。他们过夜的地方远离大部队，次日又要回去执拾他们的货物——大多是军火、医疗用品和现金。每个运输兵最多挑60斤。有需要时，我们雇用临时的挑夫。

俄国人在后勤方面援助我们到什么程度我不清楚。我所知道的是：以前当团长的必须操心所有的事，包批军需、伤兵等等；现在的团长就不再担忧了。军需总署在北伐军总司令部设立起来了，由俞飞鹏主管。军部与师部也设立了兵站，负责向后方运送伤兵，向前线运输军火、军服、粮食等等。口粮是每人每日配给22两米，如果有结余，可以出售给老百姓，将收入去购置副食品。当军部兵站不能发放食米或数量不够时，便发放现金。各部队在当地年长村民或地方当局帮助下使用现金买米。这样做很容易，因为湖南省盛产稻米。

有时候副食品如豆类、咸鱼等是直接送到部队的，军人的伙食改善了。士兵的伙食费仍然是六元钱，那就是官兵们都喜欢打仗的原因——他们能缴获大米以及其他食品，分文不付；他们的升迁也更容易。

军部的军医处办起了野战医院。师部与团部设立了救护所，由受过西方医疗训练的医生主持，佩上尉或少校衔，还配置了药剂师与男护士。救护所能提供简单的治疗，主要是止血。每个连配置了四个担架兵与两副担架，用以将伤员从前线运送到救护所。师属担架排会把重伤员抬到野战医院。有必要时，伤员会被送到后方的军医院。对于敌人的伤兵我们也救治，但会优先救治自己的伤兵。每次战斗结束后，师部副官处与军医处会从每个连抽调一个士兵组成一个殡葬队，把敌人的阵亡官兵与自己的阵亡官兵合葬在一个普通的墓穴。

师部副官处负责处理战俘工作。俘虏们由特务排看管。通常先指派他们抬担架或当运输兵，然后分派到不同的连队。有时直接分配到战斗部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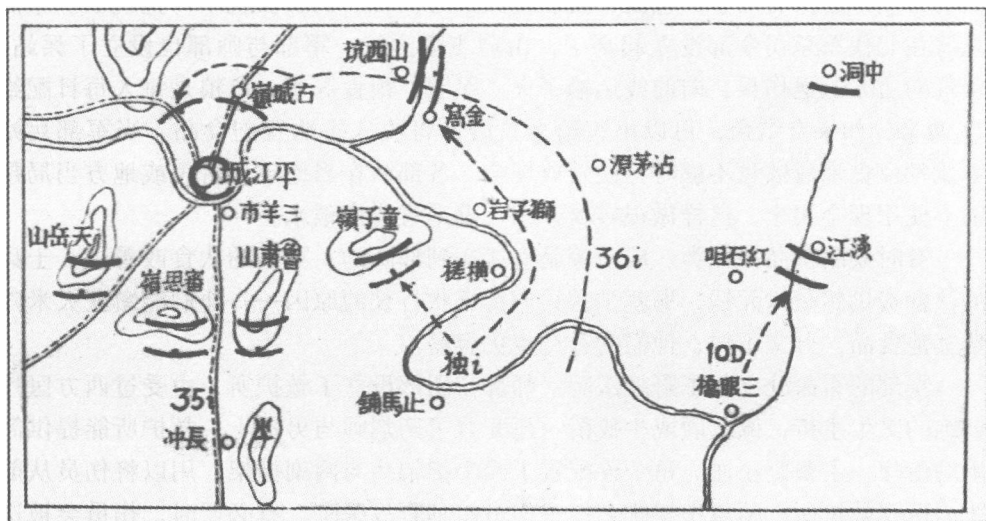
我赞成“革命军人连坐法”。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下令所有部队作战时实施这一法规，是为了确保官兵们不敢擅自退却。

醴陵之役后的最大硬仗，是1926年8月19日的平江战斗。第十师与第十二师再度参战。第十师攻击右翼，十二师从正面主攻平江。在进攻中，我斥骂了第十师的团长蔡廷锴，因为他私自率领一个连袭击敌军的炮兵阵地。他忘了自己的团长身份，匹夫之勇是枉然的。当然，我对蔡廷锴是很了解的，我常常叫他“高佬蔡”。

平江之战比醴陵之战猛烈得多。我们再度于拂晓展开进攻，但直至黄昏并未攻占县城。平通防御司令陆沅指挥十余万人沿山地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遍设地雷与铁丝网，光是山炮就拥有十几门，据险顽抗。我奉命担任中路指挥官。8月19日拂晓开始攻击，平江的农民自动组织队伍担任向导，他们熟悉敌方主力阵地、地雷铁丝网及沿途地雷，故我部深受其益。我亲自指挥进攻童子岭，未及两小时便占领平江城东北古城岭。在此战居首功者是三十六团团团长黄琪翔，该团经

肉搏冲锋，首先攻入平江。入城后激烈巷战，十二时已全部解决。敌军悍将、平江通城防守司令陆运拒绝投降，举枪自尽。我们从被俘敌军军官口中知悉，陆运自信能消灭我军。当他的部属告诉他，他们已决定投降，他说：“好，走吧！”即拔枪自戕，以报吴（佩孚）大帅知遇之恩。他求仁得仁，我钦佩他，军人当有此杀身成仁的气概。我买了一副好棺材将他厚葬。

此战俘敌军官79人、兵1500余，缴获大炮11门、机枪5挺、步枪1000余支，马12匹、军用品无算。我军伤亡173人。



平江附近战斗经过要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提供）

当第四军官兵英勇作战时，人民对平江大捷再次作出了贡献。独立团的特遣队是先期进入湖南的叶挺团长组织的，其成员有当地民众，他们协助我们侦察敌情。特遣队并不直接参加战斗，虽然中共党史专家胡华说农民自卫军参加了湖南的北伐战事，但我从未见过农民持枪，他们只是手执木棍。湖南农民与广东农民不同，他们没有武器。

我们轻易拿下了通城与崇阳，然后向汀泗桥挺进，吴佩孚在此部署的兵力数倍于北伐军。汀泗桥系鄂南重镇，前临巨湖，东枕高山，西、南、北三面环水，粤汉铁路自西南至东北纵贯其间。由于湖水很深，我军实在不可能夺取桥头，其北端堤坝上由敌军布满了装上倒钩的铁丝网。我想不起敌军是否在桥头部署了重兵，我想不必要部署重兵，敌军可以据险而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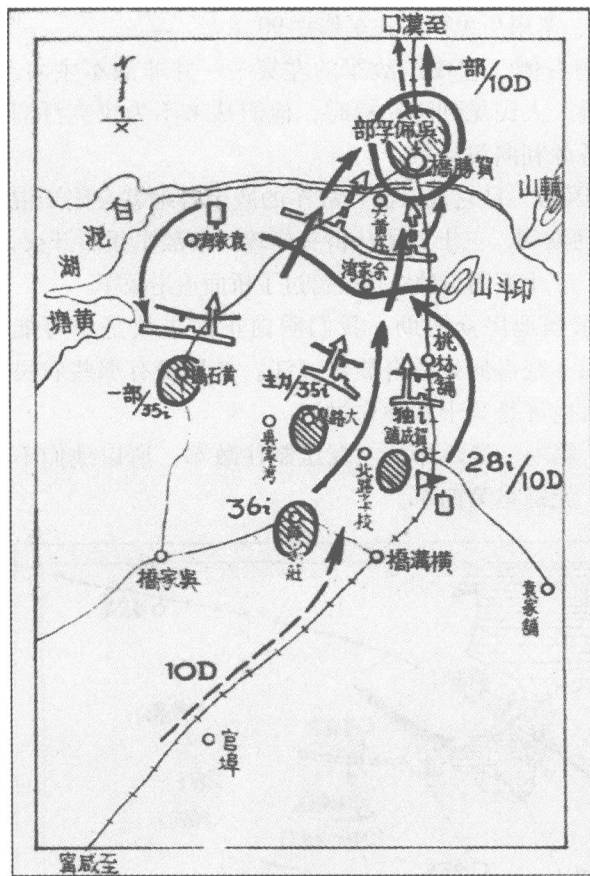
敌军的主力包括吴佩孚的“铁卫队”驻守在镇东的高地，那里有精心制作的防御工事。缪培南的三十五团部署在桥头，黄琪翔的三十六团部署在桥右，第十师在三十六团右侧，叶挺的独立团充当预备队，它和我留在十二师师部，位居第三十五团与三十六团之间。

政治部带来的农民告诉黄琪翔，徒步跋涉那条流入黄塘湖的汨罗江是可行

汀泗桥之役黄琪翔应居首功，他的三十六团伤亡惨重——至少折损三分之一，亦即几百人。在战斗中，一名营长、几名连排长阵亡。当然负伤者多于战死者。其他团队伤亡少得多，尤其是叶挺的独立团。我的师部损失了一名上尉参谋。

虽然我们的士兵勇气可嘉，但若没有当地农民相助，我们是过不了河的。汀泗桥之役树立了民众援助国民革命军的一个样板。我们到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倘若战事发生在其他省份，民众无疑会同样援助我们。

汀泗桥对任何由南向北攻击的军队来说都是难以攻陷的。在1921年湘鄂军阀内讧时，（赵恒惕率领的）湘军终以天堑不能飞渡，损兵折将退回湖南。毫无疑问，汀泗桥战斗是北伐战争中决定性的一仗（吴佩孚守汀泗桥的精锐部队中，3个团长战死，39个连长死剩5个，士兵死伤过半）。设若我们拿不下汀泗桥，吴佩孚就会避免失败的命运。这场战役理应名垂青史。



贺胜桥附近国民革命军攻击经过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提供）

由于第十二师在汀泗桥大获全胜，第十师应该轮到去攻打贺胜桥。但在一次会议上，陈可钰再次指派十二师担此重任。

可是，攻打贺胜桥容易多了，它的地形与汀泗桥大不相同。那儿也有一座铁路桥，但我们不必先拿下它。白泥湖水浅，我们不费事就过了河。此役毙敌1000余，俘敌军官159名、兵2386人，缴获大炮20门、机枪30挺，步枪2000余支。敌人在车站遗下粮食尤多，殆如山积。我军伤亡497人。

贺胜桥胜利的首功应记给三十五团团团长缪培南。事实上，此时吴佩孚军队已丧失战斗意志，它不能及时撤退，因为第十师已经切断了它的退路。8月30日，三十五团解除了敌军的武装。

第七军部署在我们左边，同第四军军部保持联系，第四军第十师部署在我师的右翼，我们当然也保持联络。但是，毫无疑问，是十二师攻占了贺胜桥。

在我的心目中，贺胜桥战役从未占据重要地位。该战役被说得如此重要，主要是因为吴佩孚亲自指挥了这场战事。他想死守贺胜桥，遂用执法队砍杀后退官兵的脑袋来阻止退却。我看到一名旅长被砍下的头颅悬挂在树上，附有他职衔的标志。但这一切都是枉然，汀泗桥与贺胜桥战事注定了吴佩孚的失败命运。

由于第十师在贺胜桥之战伤亡不重，它一路追击敌军到武昌，十二师则尾随在后。第四军、第七军和刘峙统领效忠蒋先生的黄埔子弟——第一军第二师一起包围了武昌。

吴佩孚的“赵子龙”——刘玉春指挥1.6万多北洋军防守武昌，依（鲁肃）山据险（汨罗江）修筑工事。他拥有大权，湖北督军陈嘉谟却无实力。敌军从城墙的角落向我军开火。此时十二师缴获了大量精良装备，包括0.79公分口径的步枪，十几门汉阳造与沈阳造的重机关枪。可是，我们的山炮仅具有有限火力，士兵处于不利境况，因为他们见不到敌军。

我们将手中陈旧的武器换上缴获的敌军武器，再将剩余装备上缴第四军军部，它们后来可能被运回后方留守处。

蒋总司令于1926年9月4日抵达南湖，召集会议决定作战计划。李宗仁被任命为所有攻城部队的总指挥，陈可钰任副总指挥。总司令部渴望尽快攻下武昌，以便能抽调部分部队到江西同孙传芳部作战。蒋总司令建议组织敢死队攀登城墙。会上人人都赞成这个计划，士气极为高昂。我认为攻城之策可行，据报此时敌军士气低落。

北伐军总司令部命令第七军、第四军和第一军第二师挑选一批士兵攻城，每个师都负责组建一个攻城营。我下令三个团长各挑选一个连，由各团长指定一名军官率领。敢死队是长官挑选的，但若非自愿，不会编入。他们必须是勇士，我指定了最勇敢善战、最足智多谋的军官欧震指挥这个攻城营，并着手准备竹梯。

虽然我们的士兵趁着夜色攀梯，但仍被敌军发觉了。城墙高峻坚固，敌军只要把云梯推倒就行，所以我们的士兵折损于敌军炮火者并不多，但从梯上坠落伤亡者却不少。我们没有重炮，因此攻城营伤亡几达三分之一。在两次攻城失利后，我们放弃了这一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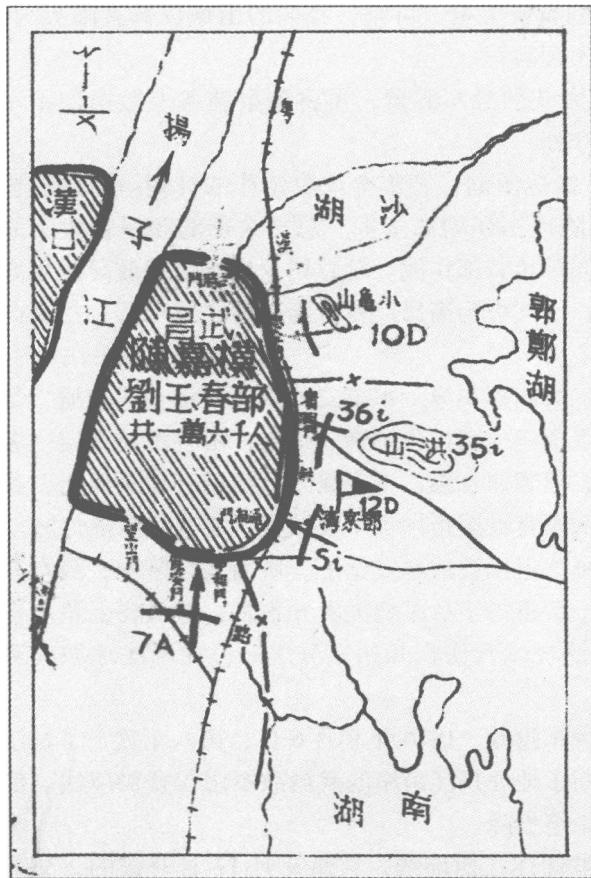
此时，汉阳守将刘佐龙向北伐军投诚。1926年9月6日，第八军攻下了长江北岸的汉阳，翌日攻下汉口，切断了地处长江南岸的武昌敌军之粮食供应线。他们只好紧闭城门死拼，刘玉春也拒绝投降。

当江西战况危急时，第七军被调往江西前线。它是9月11日开拔的，交第八军接防。陈可钰接替李宗仁担任武昌攻城总指挥。9月16日，第一军第二师也调往江西战场，由第四军接防。由于蒋总司令身处江西，兼任总司令部汉口行营主任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便成了蒋在湖北的代表，直接指挥第四、第八军，有职有权。

李汉魂的1926年9月23日日记说，河南的红枪会有数百名会众到武昌助战，但我从未见过任何红枪。

要想推开武昌城门是不可能的，因为敌军在城门背后布下重兵，又垒起沙袋顶住城门。所以我们决定挖开城墙地基，埋设炸药。叶挺本是学工程的，他指挥了整个爆破进程。叶挺负责东湘门附近的作战，铁路从这里穿过。根据叶挺的建议，我们改装了两辆吴佩孚弃置的载货车厢，四周围上钢板，两侧钻了枪眼，每辆铁甲车装载数十名叶团官兵，然后夜间用一节火车头推动这两节车厢向东湘门再迂回。一批士兵跳下铁甲车挖掘炸药坑，其余人留在铁甲车厢上用机枪等火力掩护。这一行动并没成功，敌军清楚明白我们在哪儿挖掘，摧毁了我们的计划。

黄埔军校工兵营也参与爆破，叶挺负责的是挖掘工作。我看到还有矿工参与掘进。10月1日上午，敌军3000人冲出通湘门，欲阻止我军挖掘地道，并欲夺取城外仓库存粮。经一日鏖战，敌军大部被歼。



初期攻武昌城配备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提供）

铁罗尼1926年10月30日呈交给鲍罗廷的《武汉形势报告》，唐生智希望十二师离开武昌围城前线，以便独吞攻克武汉的功劳，我并不以为然。

当我部抵达武昌东郊金牛镇时，10月7日陈可钰告诉我，武昌敌军弹尽粮

周士第的回忆录把十二师的胜利归功于叶挺。我的部属中在围攻武昌之役居首功者无疑是叶挺，他确是一员勇敢的斗士，他的部下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但叶挺在北伐的其他战役都起了主要作用吗？我回想并非如此。

攻打武昌时，有一架俄顾问驾驶的德制容克式水上飞机在武昌上空作了飞行侦察。根据台北出版的《革命文献》，两架国民革命军飞机对敌军总部与其他军事目标投掷炸弹。不过用钢丝绑住的炸弹只有25磅（约合11.34千克）重，我不信这能造成重大伤亡。事实上，我甚至从未听到任何证据显示我们用飞机轰炸了敌军。我们攻下武昌后发现，敌军总部与其他机关都保存完好。

1926年10月初陈可钰告诉我，江西战事严峻，命令十二师开往江西前线。据俄顾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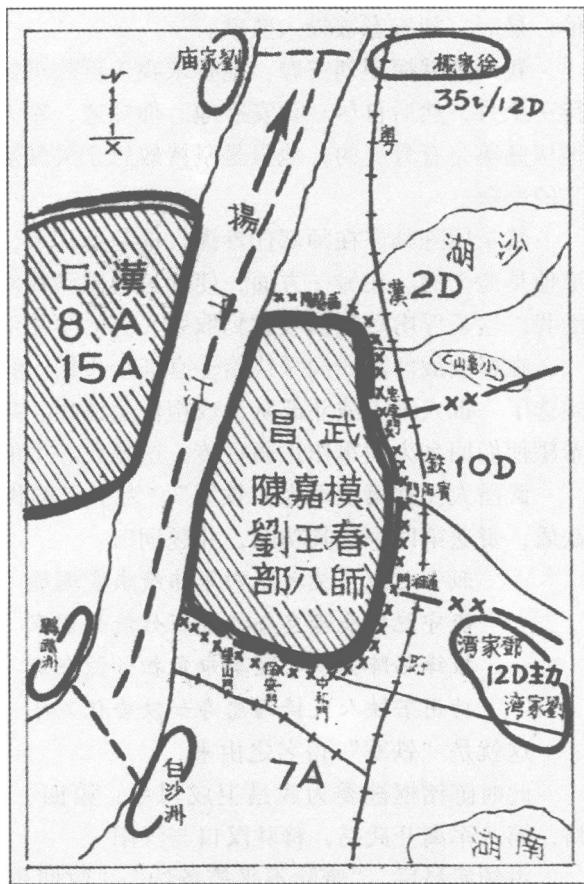
绝，势穷力蹙，正准备投降，令我立即返回。已投降唐生智的敌第二师师长刘佐龙派代表入城规劝敌军投降。最后，武昌守城副总司令吴俊卿派遣保定同学、团长贺锐廷求见邓演达与唐生智，传达吴俊卿同意于10月9日、10日午夜打开城门，他的部下从右边行军离开武昌，步枪一律放下；我军则从左边行军入城。

据1926年10月10日的唐生智日记称，10月10日凌晨四时，只有保安门被打开，唐生智部赶在第四军之前入了城，我记不起哪支部队首先进入武昌。我只记得第十师的部队在十二师之前进入。当我师入城时，我变得不耐烦。我看到地上堆满了沙包，敌我两军熙来攘往。我和邓演达、陈可钰爬上了竹梯。

当我在十多个卫士拱卫下巡行武昌街道时，一个守夜老人叫住我说：“这是（督军）陈嘉谟的住所。”他告诉我陈嘉谟逃走了，请我们进去。我和张弛一起进去，他当时任师部副官处处长。然后，我出去寻找陈可钰，留下张弛与几名卫兵看守这所官邸。后来，蔡廷锴团的一名连长在当地民众引导下，带了一排士兵来到陈公馆。看到我们先到达，他说了一声“倒霉”就走了。

我们在陈嘉谟官邸设立了十二师师部。一天，当我正在观看一幅兰花画时，守夜老人告诉我有一间秘密的地下室，我吩咐张弛下去察看一下。老人从地上抽起一块木板，引路走下密室，那儿隐藏着大量名画、古董、银器以及象牙制品。我将象牙制品与银器捐赠出去救济长期受难的武昌人民，并通知连长以上军官每人前来挑选一件名画或古董，作为纪念品。如今我仍保留着其中一些翡翠与画作^①。陈嘉谟想渡江逃走时，被第八军士兵俘获。

第十二师的俘虏与战利品数量都极为可观。第八军在武昌驻军不多，武昌城



封锁武昌态势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提供）

^① 这批名画由张发奎运至香港，其中最珍贵的《三希堂法帖》于1986年卖给香港中山图书馆。

内军人多数是第四军的。武昌之役，敌军官被俘 700 余、士兵 9495 人，缴获大炮 18 门、机枪 116 挺、步枪 7000 余支，军用品无算。

刘玉春与他的参谋长陈师许逃到文华大学，被十二师三十五团主任参谋邓龙光捕获。起初，逃避战乱到该校的外国人拒绝邓龙光进入。后来刘玉春被押送到第四军军部。他一进门，陈可钰就叫他坐下。陈可钰说，由于刘坚守武昌四十日，城内百姓遭受了难以言状的苦难，他希望刘玉春表态：若将其移送给百姓公审，他认为是否公平。刘玉春说，他认为不公平——百姓一定会处死他。但他又说，倘若形势相反，他会同样将陈可钰交付百姓公审。他要求陈可钰一枪打死他。最后，刘玉春被投入监狱。

我到监狱探望刘玉春，他要求我告诉陈可钰，最好枪毙他。否则，他顶多等待三个月，然后自尽。我安慰他。你知道，军人之间是存在怜悯之情的。我感觉他毕竟还是有骨气的，他只是坚持效忠于吴佩孚而已。我送给他一些有关三民主义的书籍。

我录用陈师许在师部任参谋。他是浙江人，武昌军官预校的前期校友，我知道他是能干的。在另一方面，使刘玉春感到我对他抱有善意，乃属意陈师许鼎力助我。这是俘虏军官被吸收到取胜一方的罕见例子。

在释放战俘前我们派钱给士官与士兵们。我们集中了武昌之役的俘虏，从中挑选了一批人编入战斗部队，或担任运输兵、担架兵，剩下的便斥资遣散。我们希望他们回乡为我军作正面宣传。这是我经历的第一次给俘虏发钱。

武昌人民称第四军为“铁军”。为了表彰我军的功绩，当地粤侨绅商特铸一铁盾，赠送第四军旌其功勋，并题词曰：

烈士之血主义之花四军伟绩威震遐迩
能守纪律能毋怠夸能爱百姓能救国家
摧锋陷阵如铁之坚革命负担如铁在肩
功用若铁人民倚焉愿寿如铁垂亿万年

这就是“铁军”得名之由来。

此时陈铭枢被委为武昌卫戍司令，第四、第八军分道扬镳：第四军留驻武昌，第八军离开武昌，移驻汉口与汉阳。

占领武昌后，“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等口号涌现了。我师政治部在街上贴出了上述内容的标语，废除不平等条约与收回租界的愿望广泛传播开了。当时民众的爱国热情甚难以文字语言来描绘。

在武昌上学时，我常常到汉口英租界去，在江边的公园门口我见到一块告示：“华人与狗不准入内”。这给我留下一个很坏的印象，我发誓：有朝一日我掌权后，一定要收回租界。

现在武昌收复了，我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告诉陈友仁、邓演达和铁罗尼，我们应该利用民气，不顾一切阻碍，收回租界，不必再透过外交手续。我相信，英国与其他列强不会再奉行炮舰政策了。对方原则上同意，但反对鲁莽的行

动。列强以为我会遵循外交程序。我认为，他们把我看得太简单了。

1926年10月17日，第四军再次奉命开往江西，我遵令指挥四个团：第十师副师长蒋光鼐麾下的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团以及十二师的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团。陈铭枢留守第四军武昌总部。

第十、第十二师各留下一个团在武昌。从蒋先生10月17日致李济深的电报知，蒋先生没有命令第四军全部出援。我们必须留下一部分兵力拱卫武昌，我们不想放弃武昌。陈可钰、陈铭枢与我三人作出这一决定，身为武昌卫戍司令的陈铭枢需要军队。邓演达当然同意。作为北伐军总司令的武汉行营主任，他也需要军队。加伦与蒋总司令接受了我们的建议。

我决定把叶挺团留下，因为叶团在围攻武昌期间付出很大牺牲，需要时间去整补。根据不成文的规矩，牺牲惨重的部队会得到足够时间去休整。我们离开武昌时，陈铭枢对我说：“这是我们的本钱，请好好保护它。”我说：“你不必担忧。”他指的是我带到江西去的四个团。

按计划要在11月2日发动江西攻势。我们的任务是切断南昌至九江的铁路，我隶属李宗仁指挥。我命令黄琪翔攻击德安，我自己率两个团进攻马回岭，另一个团充当预备队。贺耀祖指挥的独立第二师也归我节制，奉命在左翼攻击马回岭与九江之间的敌军。贺耀祖原先是湘军赵恒惕部下的师长，同年率部加入国民革命军。

我们向湖南新兵解释什么是步枪与子弹后，就让他们上阵地作战。他们穿上军服拿起步枪十分高兴。当然，他们被掺和在老兵之中，让后者施教。那些日子士气之高昂实在难以描述。

1926年11月3日，黄琪翔攻占德安后，我叫他把德安移交给李宗仁的第七军，然后同我一起进攻马回岭。11月4日，在遭受重创后，我们攻下了马回岭。

当敌军向德安发动猛烈反攻时，第七军陷于艰危境地。我立刻派出劲旅解救第七军。贺耀祖的独二师没打多少仗，当我们攻下马回岭、迫使敌军向九江退却，并从那里渡江到北岸时，贺耀祖攻下了九江。

我们的两架飞机与容克式水上飞机在九江之役根本踪影全无。

那时，据李汉魂日记，我对“某部”表达了不满，“某部”指谁？正是李宗仁。当我们帮他击退了反攻德安的敌军后，他竟命令我们渡过长江追击敌军。那时我们已遭受重创，所以感到很不高兴，感到李宗仁分派这一任务对我们很不公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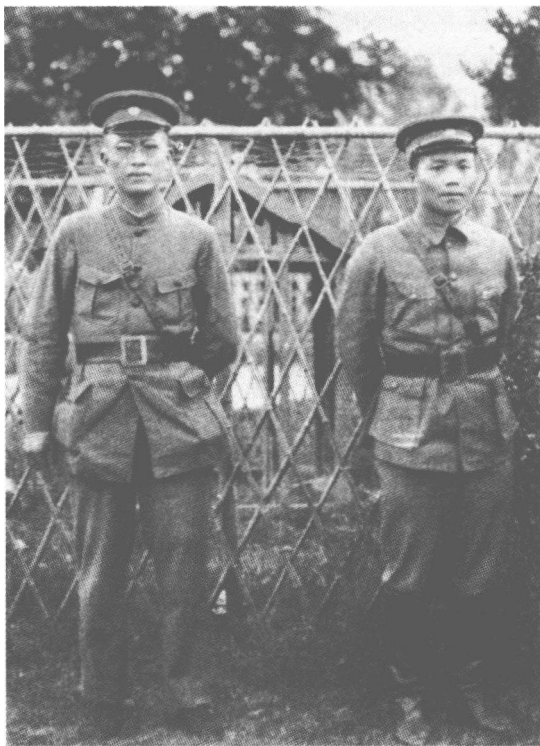
据李汉魂回忆录说，由于第七师打算占据九江，故我对李宗仁很不满意。其实我们没有任何抢占地盘的打算，仅仅是想帮李宗仁打败孙传芳后顺利返回武昌。如果我们去追击敌军，天晓得我们还要持续不断打多久的仗呀？我们的抱负是在武汉。

在盛怒之下，我下令第四军的四个团集中在九江由蒋光鼐指挥，只身回到武汉，既不顾及军令也不考虑后果。

我并非出于一己的私念而采此鲁莽行动，这是我手下四个团一致的愤懑情

绪。我只是附从他们的观点。特别是四个团长：黄琪翔、缪培南、蔡廷锴和蒋光鼐。当我离开马回岭时，我其实是服从他们的意见。

我回到武汉后，将这一切告诉陈铭枢，他说我做得对，毕竟他也有两个团陷在江西。于是，邓演达命令第四军回师武汉，贺耀组部留在九江直接划归李宗仁统辖。



桂系两巨头：李宗仁（右）与白崇禧

见我勃然大怒，李宗仁才醒悟到，他命令我们追击敌军是谬误的。我怎么知道？他给了我一封电报提及此事。

蒋总司令很关心第四军，希望第四军留在武汉。俄顾问也同情我，并赞同我的行动，这是邓演达告诉我的。俄国人要我赶快回到武汉，更令我吃惊的是，得悉我将被任命为第四军代军长。

我同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的苏俄顾问铁罗尼关系非常友好。作为邓演达的挚友，他常常访问第四军军部，我也常回访他。

俄顾问对第四军十分支持，因为第四军纪律严明、坚强有力、勇敢善战。此外，我们善待中共党员。俄国人从未见到这么好的部队。尤其是加伦，对我印象颇好。我常去看望他，他待第四军不薄。

攻占武昌以后，第四军的地位提到高于其他军，同第一军平起平坐。国民政府当局对四军特别好，因为俄顾问对我们印象良好，也因为蒋总司令对李济深态度友善。人们都认为，第四军确实是一支能征惯战的部队。

我是第四军四个师长中最有胆量的，我年轻时那些日子，确实是敢作敢为。

第四军在武昌并没有接受苏俄军援，除了前面已说过的两挺重机枪，我们再也没有从苏俄手中得到任何援助。也没有得到汉阳兵工厂制造的武器。

唐生智表面上对第四军友善，但他野心勃勃，不希望第四军驻在武昌，但由于俄顾问器重我们，他无法摆脱第四军。俄顾问也知道他的野心。事实上，唐生智的实力也并未强大到足以摆脱第四军的地步。

唐生智与陈铭枢的关系原本很好。陈铭枢是第八军政治部主任刘文岛的挚友。唐与陈在政治上都很活跃，也都很有野心。但他俩的关系在这个时期开始恶化。

我没有卷入政治。除了打仗、打仗、打仗，我别的什么也不听。你可以说张发奎是个“坏蛋”，但这正是我的立身之道。我的想法很简单。我的朋友们难道没有告诉我政坛上发生了什么事？什么朋友！我从不住在城里，我常和我的部队在一起。我所见到的人都是军人，他们只关心打胜仗。

自我早年加入国民党后，我一直相信唯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邓铿与朱执信笃信三民主义，我相信，作为一个军人，我的职责就是为国家效力以及实行三民主义。我拒绝追随任何不信仰三民主义的人。那很简单。有人会说，由于军人从小就陶冶了服从命令的习惯，那么如果我追随了坏人，我就会走上歧途。事实上，我追随过邓铿、朱执信、梁鸿楷、胡汉民以及汪精卫，他们都在国民党历史上留下长久与显赫的记录。当然，如果他们不是国民党员，我就绝不会追随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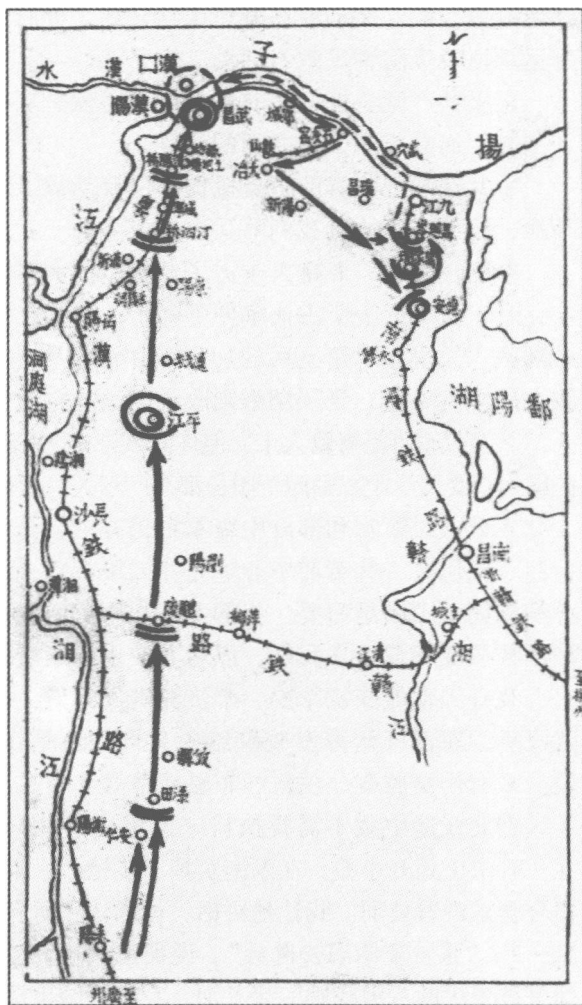
在北伐中，第四军参加了四场主要战役：汀泗桥、贺胜桥、武昌及马回岭。这四个战役中，我认为贺胜桥之战最不重要。

北伐中哪一场战事付出最惨重的损失？第十二师在汀泗桥折损了大部分（当时每师不足5000人）官兵。我估计第十二师伤亡2000多官兵，第四军则损失四五千。阵亡人数不超过上述数字的四分之一。多数伤员经治疗后又重回前线，阵亡与致残者至多10%，残废军人会被送到残废军人之家奉养。失踪的人数很少。

我沿袭旧习惯，像虚报敌军伤亡数字一样虚报自己的伤亡数字。

从军人的观点，我崇拜蒋先生北伐时期直至攻克武昌所制订的战略方针。在这一阶段，他的军事领导是非常杰出的。我不需要讨论政治问题，例如他在中山舰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这件事的真相我并不清楚。至于他在江西的战略如何我则不清楚。

副总参谋长白崇禧被人们称为“小诸葛”，但我相信蒋



第一次北伐各役作战经过略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提供）

总司令本人对制订战略负最大责任。加伦直接向蒋总司令提供意见，加伦是能干的，我可以说他作出了贡献。

攻克武昌后，我认为强行攻城是一个错误，因为城防坚固而我军的攻城装备不够，我们纯粹依靠勇气，以致造成了颇大而不必要的牺牲。我们应该在围城后耐心等守军粮食耗尽。到那时，无论民众抑或敌军都会投向我们。这一错误战略是谁提议的我不知道。当然，我们没有预估到刘玉春对吴佩孚的忠诚，竟会使他坚守武昌达四十日之久。

对投诚后编入国民革命军的部队，我认为吸纳刘佐龙、叶开鑫、贺耀祖、贺龙和其他投诚部队是正确的。否则，这些人将成为北伐的障碍。

妇女在北伐中起了一个新的作用。因为从来未有妇女在军中服务。女孩子在军政学校被训练成政工干部。女性政工人员从事宣传工作与劳军工作等。北伐军到达哪里，妇女运动便在哪里蓬勃开展，进而协助军队。在湖南，妇女参加了识字运动以及废除缠足陋习活动。

至于共产党，他们对北伐的最大贡献是从事群众工作，他们全力把军民结合在一起，而且充当二者之间的桥梁。

中共在湘鄂两省的分支机构有没有动员工农加入国民革命军？我们自己招募新兵，但共产党协助我们募兵也是可能的。

在北伐初期，粤籍人士占了北伐军的大多数。但当我们从其他省份招募更多新兵时，粤籍人士所占比率便下降了，我们在湖南征兵尤多，并将俘虏兵安插到各部队。大量非粤籍士兵的加入，并没有影响第四军的战斗力。仅有的差别是，我在广东讲粤语，到了湖南则改说国语。自此，我常常讲国语。

大多数军官是粤籍人士，但你应该记得，我们有一个人事委员会，非粤籍军官也能够因功受奖。十二师四个团长都是广东人，后来也都升任师长，这也都是事实。

多数低级军官和部分中级军官仍有机会升级，但是比在粤军时期升级幅度小一些。我们有一些黄埔毕业生充任低级军官，但数量有限，因为黄埔毕业生优先分配到第一军满足需要。我部下那几个黄埔生是政工人员。我欢迎他们，我要黄埔军校分配毕业生来我师，以后人数也逐渐增加。

我师经常能获发军饷，李济深确保我们在前线的两个师有稳定的军饷。攻占武汉后，军部开始派发胶鞋给士兵们，可是在战斗中和行军中，他们仍然穿草鞋。军官们穿胶鞋、皮鞋、布鞋或草鞋。

在北伐途中我不需要执行“连坐法”，因为我经常打胜仗。但我也处决过逃兵。有个士兵开小差，在湖南卖掉了步枪。后来他被奉派外出征兵的军官抓获。我集合全军观看处刑。我让他讲话，他承认了所有罪过。这件事登上了报纸的头条消息——“张发奎挥泪斩逃兵”。说那逃兵被斩首，那是不确实的，那会抵触法律。他是被枪决的。但我确实流了泪，我必须约束军纪。不过我们通常没有逃亡问题。

我从江西回来不久，蒋总司令派我与邓演达到广州催促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迁往武汉。原先蒋未派我去，是邓演达提议让我同去。我说：“好，我要先报告

我的军长。”一名苏俄飞行员驾驶容克式水上飞机载我俩去广州。我知道邓演达此行是奉蒋的指示，邓说蒋想迁都武汉，但他没吩咐我讲什么。到了广州，邓演达提议将党部与政府迁往武汉，我没有吭声。

除了军长李济深，我还会见了谭延闿，那只是礼节性的拜会。我们谈论了军事，却始终未谈及政治。那时我对政治根本一窍不通。

在广州住了三日，我与邓演达又飞回武汉。由于大雾，我们在韶关降落。过一阵，我们重新起飞，但是大雾又出现，我们差点撞毁在乐昌的山岭。我们的飞机突然栽入河水中，救生圈破裂了，很幸运，河水很浅。等飞机修好后，次日继续北飞。

回到武汉后，我被任命为第四军中将军长，得到一个长方形的公章。我兼任十二师师长。论资历，陈铭枢应该擢升副军长，然而我比他升得快。

我是接替陈可钰的副军长职，他调任第四军党代表。我想是李济深或者陈可钰的主意让他担任这个职务，因为他认为这个职务负担较轻，他不必再随部队行军了。有人说他的任命是名义上的，犹如以前他当十二师师长时从未到过师部，重要的是给他安置一个职位。当局擢升我是考虑到我的战功，但又要找个职位给陈可钰。实际上，他任党代表职不久就因病离开部队回到广州。他积极参加北伐却以就任党代表告终。

为什么早先第四军不实施党代表制？廖仲恺是第一位由国民党任命的派驻黄埔军校党代表，第一军是国民革命军中第一支实施党代表制度的部队。李济深是不情愿接受这个制度的。第四军被一连串的胜利宠坏了，没人将这一制度强加于我们。

我记得有一次师级以上军官讨论过，都不赞成党代表制。我们认为，部队的命令，甚至作战命令必须与一位党代表连署是荒谬的。我相信文官干预部队的作战命令是错误的。文官缺乏军事知识和战术认识，廖仲恺是一个例子。其次，我认为已经建立了政治部，就不必设立党代表一职了。

1926年12月10日，宋庆龄偕鲍罗廷及其他领导人从广州来到武汉时，我见到了她。12月13日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组织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推徐谦任主席，我觉得在政府未迁来武汉前组织这个联席会议，这是正确的。

我对武汉的工人运动印象甚好。武汉是中国拥有大型工厂与大量工人的少数几个城市之一。我常常见到湖北工人联合会主席向忠发。我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我也常常见到苏兆征。

共产党员中我接触最多的是恽代英，



孙中山与宋庆龄

他是个出色的演说家，我常常邀他到我部队来演讲。

我也同高语罕与郭沫若有许多接触。我知道郭沫若也是中共党员。在北伐期间，军中90%的政工人员是共产党员。当时许多人宣称郭沫若不是中共党员，我不相信。这种“宣称”不过是烟幕。为什么我确信他是共产党？他的思想、言论，行动都左倾偏激。邓演达把他介绍给我，同时还介绍了恽代英和高语罕。

除了叶挺与周士第，在我部属中有哪些是中共党员，我记不起那些职位低的人了。叶挺的手下，当时还是一个连长的林彪，我也记不得。

共产党人对我评价颇高。叶挺告诉我，有一天共产党开会时提及我的名字，决议说我的无产阶级意识太浓重，暂时不必争取我加入中共。

朱德曾经协助我征聘干部，经过如下：我告诉郭沫若，我需要干部。他与邓演达把朱德介绍给我。郭沫若与朱德是四川同乡。朱德看上去很粗鲁，不像是军校毕业生。他建议我派他去四川征聘优秀干部，我同意了。

朱德去了四川。据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说，朱德是奉了邓演达的正式委派，去四川策反杨森与邓锡侯的，此事我不知道。至少，他为我邀聘了许多干部，其中包括了罗永扬^①。

我委任朱德为待命军官团团团长，要他训练他聘来的干部。一个多月后他离开武汉去南昌投奔他的云南讲武堂校友朱培德。朱培德当然比朱德年长。这就是后来人们说“朱培德培朱德”的由来。



朱德

我把朱德聘来的干部任命为低级军官，分配到不同的部队，这就是我部下有四川干部的缘故。他们中间有共产党员吗？很难说。

我没有怀疑共产党员会阴谋反对国民党。其他人也许已经产生怀疑。对武汉的领导人停止发放经费给南昌的蒋介石，我当然感到那是正确的，否则我不会留在武汉。

1927年1月3日，汉口工人与英国水兵发生冲突，死伤民众数人，激起全市公愤，次日民众进入汉口英租界。我听说，工会领袖召集民众，带领他们进入英租界，当时我在武昌，是去看望陈可钰与邓演达。我们一致认为应该收回英租界。

民众怒不可遏，群情激昂，难以言状。唐生智与我的部队都同情民众。由于唐生智负责汉口治安，他派士兵进入英租界维持秩

^① 罗永扬（1912—1988），四川威远人，毕业于成都国立大学政治特科，并入四川陆军军官队习军事，积功升至七战区长官公署上校参谋、二十三集团军军法处处长、新编十一军第三师少将师长等，是张发奎旧部。抗战胜利后加入人民社党，当选国大代表。在张君勱支持下创办香港宇宙出版社，刊行《再生》、《自由钟》杂志，历十年之久。1962年秋，左舜生领取台湾2000美金赴美讲学，罗永扬主张开除左出《联合评论》，张发奎未允，罗则扬言“我们也可以自己去卖”，遂开始与台湾驻港特工挂钩，此举促成《联合评论》提前结束。1969年当选民社党中常委，1984年任“国民大会”主席团主席，1988年病故台北。

序。事实上，民众很有秩序，那几日军民双方确实合作无间。

我告诉（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陈友仁，在我求学时见到过汉口公园前的辱华标识。我提议，我们悬挂我们自己的牌子：“英国佬与犬不得入内”。陈友仁说“好，好主意”，但他只是讲笑话而已。他虽然冷静、谨慎，有时却相当幽默。他告诉我：“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人生观是错的，我们必须超出那些小心眼。他认为收回英租界是另一码事。但他想用外交手续去收回英租界。

鲍罗廷十分同情我们，但他也认为应按照外交程序行事。

国民革命军决定向长江下游进军，我相信此举好过渡江北上直接对抗北京政府。我们的计划毕竟是先打掉东南部孙传芳再对付北方的张作霖。

邓演达充满了革命精神。他知道我要去南昌述职，便要我劝说蒋总司令移驻武汉。我俩商量了怎样向蒋进言，我们知道蒋是反对把总司令部迁往武汉的。这是邓演达第一次同我谈论政治。

当我对蒋谈及此事时，他不置可否。倘非邓演达嘱托我向他提此事，我不会向蒋多说话，因为我知道自己的思想很简单。

离开南昌前，蒋请我共进早餐。这是个好机会，因为这是我与蒋单独进餐的罕有时光。他说：“向华，你是个模范军人，我希望你不要卷入政治去，希望你别学陈铭枢，他喜欢干预政治，却不顾及他自己的军事职责。你与他不同，你真心关心自己的部属，所以他们为你效命。我希望你将来远离政治，把精力集中于军事任务，注重军事训练。倘你这样做，你的前程无量。”我衷心赞同蒋这一套模范军人的观念，军人不应该搞政治。我问蒋：“我回武汉之后要做什么？”他说：“一旦发生什么事情，要向谭延闿请示。”

那天，蒋总司令给了我5000块大洋。

我没有见到谭延闿，但我见到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副主席张静江。

回武汉途中我与汪董琴同行，他是中共党员、邓演达的追随者，在总政治部担任高职。回到武汉后，我往广州打电报向李济深请示。他答道：蒋要我遇事向谭延闿请教是对的。

我还记得1927年1月中旬蒋总司令到武昌之事。他到武汉看了看，回到南昌就下令向孙传芳开战。我想，他见到群众中的共产党力量，大吃一惊。事实上他不必担忧，至少我和唐生智的部队并未被赤化。

同月，第十二师扩编为第四军，我被任命为第四军上将军长。第四军下辖第十二师与第二十五师。第十师扩编为十一军，由陈铭枢任军长，下辖第十师与二十四师。第四军留在广州的十一师与十三师组成第八路军，由李济深任军长，他还兼任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十三师是由补充团扩编而成的，由徐景唐统领，因为



邓演达

李济深感到广东防务兵力不足。组建第十三师是不寻常之举，因为国民革命军已采用三三制。

不久，李济深通知十一师师长陈济棠到苏联作一次考察旅行。李的本意是想改组第十一师，师长走远些便少一些阻力。

保罗被任命为第四军顾问，我想那时是涅吉丁被委派为第十一军的顾问的。俄顾问没有派到第四军属下的各师，因为人数不足，不够分配。

廖乾五被派到第四军任政治部主任，第十一师政治部主任徐名鸿任十一军政治部主任。黄琪翔任第四军副军长。这是在人事委员会作出决定后，我认为，考虑到汀泗桥的武功，应该给他升级。这就是虽然缪培南、朱晖日比黄琪翔资深，但黄升得比缪、朱快的原因。

1922年，在缪、朱未来之前，黄琪翔没有做过我的副手。我不能这样盘算，因为，我当营长时，他早已当上副营长了。此外，不久我就让他走了。

邓演达的兄长邓演存^①留任第四军参谋长。第四军下辖第十二、第二十五师，黄琪翔兼任第十二师师长，该师下辖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团以及许志锐刚调到武汉的三十四团。朱晖日出任第二十五师师长，下辖第七十三、第七十四、第七十五团，前者由叶挺的独立团改编，另两个团由新的部队组建。

我接管了第四军军部，鉴于军部参谋缺员，许多参谋留在广州，我就把第十二师师部的一批参谋调到军部。除了参谋处、副官处和经理处，我增设了军法处和军务处。



张发奎

邓演达向第四军拨付军饷，他的身份是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第四军的军饷政府欠付一小笔钱，那是因为他们拨付的军饷比满员金额少一些。不过这也给够了。事实上，李济深也留下了些钱。当然，我向行营呈报的军饷是以全军足额为基数的。而第十二、第二十五师向我军部申领经费是按实有人数计算的，大约每师5000人。如果是常规军饷，军部经理处按师部呈报数额向师部经理处发放；如果是特别用项，就需要我亲批，这些包括了军、师、团长的交际津贴及其他开支。

我在军部设立了经济与人事委员会，第四军经济委员会掌控储蓄基金，他们审核与通过各个师经济委员会的决议。当然，我是主席，其他成员有副军长、军参谋长，经理处长、政治部主任以及各师师长。师长们兼任各师经济委员会的主席。

军部人事委员会的级成同经济委员会相同，只是没有军部经理处处长，添上

^① 邓演存（1888—1966），广东归善（今惠阳）人，保定一期炮科、陆大六期。曾任广东大元帅府广东兵工厂管理委员会委员。北伐期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汉阳兵工厂厂长等职。1947年2月授少将衔，同年退役。新中国成立后，任广东省政协委员。著有《民国兵工纪略》、《琶江兵工厂建立始末》等。

军部参谋处处长与军务处处长。师长们任各师的人事委员会主席。师部人事委员会的决议同样呈交军部人事委员会审议与执行。

这期间我最亲密的朋友是邓演达与陈公博，后者是我在北伐时结识的。星期天我如果无事可做，便到陈公博处聊天。去过许多次。我还见过宋庆龄、孙科、何香凝和苏兆征。还有陈友仁、宋子文、徐谦、顾孟余、谭平山以及其他，都是在武汉初次见面的。

陈公博和徐谦对我谈起召唤汪精卫回国的迫切需要。邓演达也对我说，正准备召唤汪精卫回国，他询问我的看法。我说：“好啊！”

我没听说过蒋先生与日本人之间或蒋与张作霖之间秘密谈判。共产党人不会跟我谈这一类的事，我也没有其他渠道得知这类秘密。我认为蒋先生既独裁又自私，但我没有怀疑过他会同帝国主义勾结。他只是想清除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我们反对此举。其实我们的反蒋运动是很单纯的。

邓演达代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任命第四军参谋长邓演存兼任兵工厂厂长。薛岳被任命为第四军代参谋长，邓演存接着就离开了第四军，专心致志于兵工厂业务。

唐生智与我分享了汉阳兵工厂的产品。我们停止了装运武器给蒋介石。汉阳兵工厂被共产党控制了吗？很难说，也许兵工厂的工人中确有不少共产党员。邓演存的政治倾向是稳健型的，完全不同于邓演达。我绝对相信他不是左倾分子。

冯玉祥是同情武汉方面的。阎锡山的立场则不清楚。当然，我们都想拉拢他。

由于蒋先生是在日本上的军校，所以他不是四校联谊会的成员。可是，该联谊会并无反蒋力量，因为刘峙、何应钦、顾祝同、蒋鼎文、钱大钧与蒋的许多追随者都是该会会员，再者四校联谊会也并不具备政治功能。

许多保定校友，例如唐生智与白崇禧是四校联谊会会员。刘湘与刘文辉叔侄是该会有影响力的会员。李宗仁并不是会员，我虽是会员，但并不积极参与。

北伐无疑是四校联谊会最辉煌的年代。在这段时期，保定校友掌控了南北双方的军事权力，他们至少是校官，升迁迅速。不少人上过广东陆军小学或武昌军官预科，是我前后期校友，多数是前期。

同保定军校毕业生相反，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的地位日渐下降。

在那时，黄埔毕业生犹如雏鸡，同保定毕业生简直不能比；保定军校要训练八年才能毕业，而黄埔军校受训不到一年。后者在基本军事根柢与阅历方面都远远不如前者。黄埔生学了比较新型的武器如机枪等的知识，从科学技术观点来看，他们学了很多现代化的事物。事实上，很难评价黄埔的科学化训练，因为受训时间太短。此外，我军的装备比吴佩孚军队差次得多。我们赢取胜利靠的是团结一致与精神训练。

国民革命军各军多数是反蒋的。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六军军长程潜都对蒋不满。谭延闿同我们一起在武汉，朱培德对武汉国民政府的忠诚没有问题。程潜同情我们，程听第六军党代表林祖涵（伯渠）的话，林是中共党员。他们都有联系。至于第四军与第八军，我们公开反蒋。然而，第一军

是忠蒋的。我们不清楚第七军的态度，李福林的第五军则无足轻重。

我知道唐生智非常反蒋，这是从他在会议上的讲话得出的结论。是不是唐生智在军人中煽动反蒋情绪起了主要作用？也许。但你要知道一句广东谚语：“牛唔饮水，唔揪得牛头低。”

俄顾问没有同我论及蒋先生，他们从不与我谈及武汉与南昌之间的斗争，也不论及唐生智、陈铭枢或冯玉祥。他们真是精明。加伦与铁罗尼、邓演达常常来访，但谈话内容仅限于军事。鲍罗廷呢？我很少见到他。

1927年3月6日，陈铭枢离开武汉。他离开前两三天打电话要我去他在汉口的家聊天。当时有其他访客在场，包括第十一军副军长兼第十一军第十师师长蒋光鼐、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戴戟以及第二十四师副师长蔡廷锴。陈铭枢告诉我，蒋先生反对迁到武汉是错误的，因此造成了分裂，第四军和第十一军不追随蒋是正确的。但由于蒋已往待他太好，他必须辞职，并离开武汉。他表示担心第十一军，希望我维护它，像对待自己的第四军一样对待十一军。他向我保证：蒋光鼐、戴戟与蔡廷锴都会服从我的命令。

以上是陈铭枢讲话的要点，我完全信任他，我是正直与坦率的。我想劝他留下，但他不听。他悄悄地离开，乘船去了上海。我们之中有些人为他送行。

《蔡廷锴自传》说陈铭枢是由于第十一军受到压力才离开武汉。陈明确地告诉我，他想辞职。当然，我不知道是否有人逼他辞职。按理说，如果他不想离开，没人能强迫他辞职。他有实力，他的十一军下辖第十、第二十四、第二十六等三个师。二十六师师长是杨其昌，他带了部下投奔我方。我的第四军下辖两个师。我们这两个军联合起来，没人敢强迫他离开。我想可能是邓演达与他谈话建议他离开的，就如1922年我们准备与陈炯明决裂前他突然离开粤军。陈铭枢属于右翼，邓演达属于左翼。我猜测，邓演达内心是期望陈铭枢离开的，邓演达在政治方面是足智多谋的。^①

唐生智希望陈铭枢离开吗？即使唐生智想逼陈走，也力不能及。唐想不想？那是有可能的。唐与陈在政治方面都有野心，而两个有政治野心的人是永远不能相处融洽的。幸好我没有政治野心。这就是我能够同唐生智合作的原因。

对于陈铭枢的离去，我没有施加任何压力，他确实不希望我做他的下属，但我不认为他会走得更远。可是，后来他声称是我逼他离开的，那么说不对。我有任何下属要他离开吗？也没有，我与我的下属想法是一样的。我对部下约束很严格，我的下属从未反对过我。

蒋介石在《致国民革命军官兵的信》中说，陈铭枢的离开是共产党阴谋所致。但陈铭枢没有对我提到过共产党，共产党怎能逼他离开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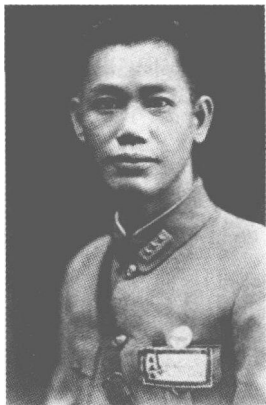
刘文岛也离开了武汉，他同我们意见分歧。

^① 从3月15日的李汉魂日记可知，当日邓演达召集第四、第十一军上校以上军官，在报告党务后表示“我们的决心与态度”；接着又召集这两个军中校以上军官，特别呼吁解决内部问题，还征求与会者的意见。那时，张发奎已被指定指挥第十一军。

我被任命兼十一军军长，因为朱晖日与我的其他下属部缺乏指挥一个军的足够能力。

蒋光鼐以疾病为由离开了。我想凭借在第四军的老关系劝说他留下，他说，他必须离开，他要追随陈铭枢。坦白讲，蒋光鼐是一个优秀的参谋人才，但他不适合做部部长。但我仍然希望蔡廷锴留下来，想让他任第十师师长。他拒绝了，缴了辞呈。我拒绝将此辞呈上缴军委会。虽然蔡廷锴是行伍出身，^①但他很勇敢，也善待士兵。

蔡廷锴说他有病，住进了汉口日租界一家日本医院。我去医院探望他。我带着手枪，我的副官与两个卫士也携枪。日本哨兵因我们身怀武器，不让我们进去，我坚持要进去，日本兵也无可奈何。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根本不在乎别人说闲话。此后，中国军人就能自由出入日本租界了。



蔡廷锴

我力劝蔡廷锴留下来。如果出于自私的动机，我会让他离开。他的下属也不会因此反对我，因为我一向正直坦率，从来不自私。蔡廷锴告诉我，陈铭枢与蒋先生串通，已经派人去运动第十师一名中校团参谋主任。此人是保定毕业生，非粤籍人士，他已受命策反第四军反抗武汉国民政府。我问蔡有无证据，蔡说：“难道我这个师长对此人不比你了解得多？”他说，如果我枪毙那个军官，他就留下来。那个军官后来被处决了。蔡廷锴出庭作证，因为他拿出其下属谋反的证据，我想刀下留人也办不到。

据蔡廷锴在其回忆录中说，此人姓魏，被政工人员指控勾结陈铭枢，未经审讯就处决了。蔡所讲的可能是同一个人，我记得第十师的军官被枪决仅有一例。

在行刑后，蔡廷锴升任第十师师长。他要求调我的北江地区同乡、第四军部属许志锐任副师长，我同意了。

我觉得我已遵照陈铭枢的嘱托，没有调走十一军任何一人，也真的把十一军当作我自己的第四军。但是，接着戴戟也离开了，我只好提拔叶挺任二十四师师长，在围攻武昌之役后，他已立功扬名。

对于戴戟的离去，我没有抱憾，他和蒋光鼐一样，是个优秀的参谋人才，但不适合当部部长。

周士第继叶挺任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团长的。我对周士第印象不错，他作战很勇敢。

我钦佩共产党员的热忱与战斗精神。在这里我想提一下蒋先云，当时他在武汉从事劳工运动。我知道他是中共党员，任命他为十一军二十六师七十七团团长的。他说：“我是共产党员，你知道吗？”我回答：“是，我知道。”他问：“既然

^① 此处原稿记录恐怕有误，查蔡廷锴是保定军校第三期步科毕业。

知道，你会怀疑我吗？”我说：“不会，只要我用你，我就不会怀疑你！”

介绍蒋先云给我的是邓演达。蒋先云工作勤奋，在劳工运动中功绩卓著。我想，这样的人一定会赢得士兵们的竭诚拥戴。据张国焘回忆，蒋先云刚离开蒋的总司令部秘书一职，我不清楚这是否属实。

我从不怀疑共产党员是勇敢善战的。我重用叶挺，从未置疑——毕竟我随时可以撤他们的职。此外，虽然蒋先云是中共党员，他的下属可不是。如果他一意孤行，我相信他的下属不会无条件跟他。军队中等级制度森严，所以我从来不担忧反叛的可能性。既然我相信共产党员首先要效忠于共产党，为什么又不担心他们反叛呢？因为我从未感觉到他们会阴谋反对国民革命军，也从不担忧。我觉得没什么可以担惊受怕的。

第二十六师师长杨其昌也离开了，副师长吴仲禧^①被委任为代师长，他原来是第十师的。二十四师七十一团团长了也走了，我任命欧震补缺。

我保留了十一军军部，但因为它刚成立不久，参谋人员很少。十一军没有党代表，至于政治部是否有许多共产党员，我也不清楚。我在十一军设立了经济、人事委员会。不过军部没钱，因为陈铭枢离开时没留下一分钱，我仅仅掌握印信而已。

陈铭枢走后，唐生智紧紧抓住我，我与他接触密切，相处不错。

1927年3月11日，在武汉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我当选军事委员会委员。有报告说，3月21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薛岳进占上海，他要求中共党员拒绝蒋总司令退出上海的命令，并要求他们同第一师一起反蒋。我从未听到过有这么一份报告。【如果你去询问薛岳本人，即使他确实作过他也绝不会承认自己在关键时刻提出过这样的要求。我不相信任何人会完全承认自己的过失。我所能讲的是，薛岳左倾，他对蒋先生心怀不满，事实上蒋也待他不

^① 吴仲禧（1895—1983），福州人，辛亥革命时参加福建北伐学生军，保定三期。抗战爆发前夕秘密加入中共，长期潜伏于国民党军中从事谍报工作，官至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军法执行监。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广东省人民法院代院长、省司法厅厅长和党组书记、省政协副主席、民革广东省副主委。他在四战区策反参谋长吴石，从中获许多军事情报。胜利后，吴仲禧在国民党国防部中将监察官任上，被军统蔡劲军控告贪污，吴石以国防部史料局局长身份营救他出险。此后吴仲禧在上海中共地下党林亨元（业律师）家介绍吴石认识另一中共党员、民主促进会负责人王绍鏊等，吴石则介绍吴仲禧结识他的学生、桂系将领廖磊之侄、白崇禧华中“剿匪”总部情报科科长胡宗宪。胡每周寄送《敌我双方兵力位置要图》给吴仲禧，既有国民党军部署的准确位置，又有“剿总”估计共方兵力部署的判断，均由吴仲禧及时交给沪、港的中共地下党组织。1948年夏，吴仲禧以国防部中将部员职衔去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前，由吴石撰写介绍信给刘峙的参谋长李树正，遂在李树正陪同下，获取了东起海州、西至商丘的徐蚌战场国共双方部队驻地、番号、兵种等情报，迅即返回上海交回中共华东局情报部部长潘汉年。1949年3月，汤恩伯江防总部里一名中共地下党员鲁彘找吴仲禧送交汤签署的给沿江守备十个军军长的作战命令，吴仲禧专程乘飞机到香港将此绝密情报交给刘人寿，用秘密电台呈报中共中央军委。4月，吴石向吴仲禧报告，已游说国民党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投共，林已答应。6月下旬，吴石由福建绥靖公所副主任调任国防部次长，赴台途经香港，在佐敦饭店与吴仲禧及中共华南分局人员会见，交付国民党军留存西北各地的部队番号、驻扎地点、部队长姓名、现有人数与配备、整编计划等文件以及国民党军在长江以南川滇湘粤闽各省的部队建制、兵力等文件共几十页给华南分局饶彰风、张铁生。由于中共台湾省工委组织被破，吴石等被捕，1950年6月10日被判死刑。

好。薛岳自己也对他的上司国民革命军东路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不惬意于心。】薛岳后来离开了上海的第一军，但当时我对情况不甚了解。

毫无疑问薛岳是有才干的，但他经常轻率莽撞。他对共产党评价很高——这也不是他一个人作如是观，在北伐期间中共党员确实是不辞劳苦。据潘公展说，武汉国民政府的领导人企图劝诱薛岳背叛蒋总司令，这事我则不清楚。

有人说，南京事件是林祖涵（伯渠）与其他共产党员煽动的。北伐军进城时，有穿军服之匪徒向各国领事署、机关、学校、住宅袭击与抢劫，造成英领事与外侨伤亡，英美兵舰即开炮轰击，死伤军民颇多。经第二军军长鲁涤平、第六军军长程潜入城枪毙抢劫犯数人，且护送外人赴外舰，其事始息。我所知道的是，林祖涵系第六军（国民党）党代表，也是中共党员。从军委会军需办公室1927年4月的报告知，武汉的军委会在“特别费”名下拨付给林祖涵预算之外的9672元。这是为什么我不知道。也许这里面有秘密联系，这笔钱是用来资助他的（越轨）行动。

3月底，武汉的领导人们讨论进攻上海、南京。当时，我已变得非常重要，我统率第四、第十一两个军，能出席国民政府军委会的会议。一伙武汉领导人鼓吹“安内”运动，旨在于重新北伐之前遏止蒋介石。唐生智特别热心鼓吹对北方实施攻伐。此人有野心，意欲取代蒋介石的地位。有一部分文官支持他的主张。

大多数人认为，如果我们与南京为敌，我们仍然要面对张作霖的威胁。这一群人主张部署少量部队防备蒋先生，派遣我们的主力部队去同北方的张作霖打仗。换言之，他们主张“防东攻北”，那就是第二次北伐。我特别热情支持这一路线。

一方面，朱培德军在江西，我们不需要派部队警戒东面；另一方面，蒋的第一军是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的。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自相残杀，应该在清算自己的兄弟前消灭敌人。邓演达、谭延闿等人赞同我的观点。

当时我们不能确定冯玉祥的态度，河南的军队正由吴佩孚的下属及靳云鹏的弟弟靳云鹗掌控。

李汉魂日记说，十二师的两个团4月7日奉命向安徽安庆进军，4月10日却奉命停步。这是为什么呢？这两个团奉命进军安庆是为了防御可能来自蒋介石的攻势，但正如我已讲的，在武汉的领导人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分歧，这就是改变命令的原因。

1927年4月5日，汪精卫与中共领袖陈独秀在上海发表联合声明，保证国共为了国民革命继续合作。可以说，当时汪精卫是要同中共合作的，我追随他。1927年4月10日他抵达武汉时，我高兴得不得了，我的脑子里只有汪精卫。

加伦与鲍罗廷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他们赞成迁都武汉。也许这是俄方支持武汉政府的政策，这使得蒋先生认为是共产党的阴谋。但是，我们没看出这点，否则，宁汉分裂不会发生。许多人站在武汉一边——谭延闿、宋子文、宋庆龄等。大多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与国民政府官员部在武汉。

1927年4月12日，蒋先生在上海发动了清党，四日后广州跟着做，李济深在广州执行清党到如此地步——他甚至枪杀阅读汪精卫演讲文集的人。我所听闻之最残忍的清党事件发生在广州南沙头——李福林下令在共产党员背后绑上石头，然后把他们推入珠江。在广西，黄绍竑也以铁腕执行清党。^①

至此，我与李济深没有更多的联络。在他认可蒋先生要我请示谭延闿的指示后，我已断绝同他的联系。第四军视他为敌人，因为他支持南京当局，但我们并未谴责他。

依照蒋先生的指示，我向谭延闿求教我应该如何取舍。他告诉我：“蒋先生做错了，我们应该反对他。”他告诉我，我在跟随武汉领导人一事上不能犯错。我在武汉是确实有权力的。如果站到蒋先生一边，带着我的部队离开武汉，武汉局势将大受影响。因为光是唐生智的部队，是不足以同蒋先生抗衡的。

^① “清党”的始作俑者是李宗仁、白崇禧。捕杀中共党员的南京、上海、广东、广西四省市中，三个是新桂系的“食邑”。在“清党”的决策上，新桂系也起了推动作用，大开杀戒也比上海早三日。“清党”会议是在上海龙华镇的北伐军前敌总指挥部举行的，出席者有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陈果夫等监委和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李济深等人。当时蒋介石顾虑重重，举棋不定，认为对付共产党没有把握。白崇禧挺身而出厉声说：“你们怕共产党，我不怕；你们不干，我白某人一个人也要干。我马上就要从我的防区内杀起！”就这样通过了“清党”决议。广西捕杀人数也远远多于上海。

第六章 第二次北伐与南昌暴动

(1927年4月至8月)

1927年4月中，武汉的领导人最终决定继续进行第二次北伐。武汉在东进抑或北伐这个问题上意见分歧，唐生智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他与我是武汉两个最重要的军事领袖。虽然他的地位——驻武汉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高于我，但我的兵力不比他弱。可以说，军人对于发动第二次北伐是意见一致的。影响武汉领导人作出第二次北伐决定的一项重要因素是北洋政府的河南保卫军总司令靳云鹗归顺我方，这意味着我军能够在无阻挡的情形下进入豫南，向驻马店集中；另一重要因素是国民联军总司令冯玉祥同意与我们的进军配合，派遣他的部队东出陕西潼关。

叶挺、恽代英以及我的其他共产党员友人是支持第二次北伐的，他们赞成同张作霖作战，而不是蒋介石。这表示他们并不志在夺取政治控制权以及鼓吹反蒋。俄顾问方面，加伦、铁罗尼与涅吉丁没有鼓吹反蒋。鲍罗廷的态度我不了解。

军委会仔细考虑了，当我们向北进军时，南京方面会不会攻击我军。结论是否定的，因为我们知道，南京方面也承受着内部压力与来自孙传芳的外部压力，我不了解南京方面怎样决定他们的战略。总之，他们最后采取了与我们类似的战略：防御武汉攻击孙传芳。

军委会决定了以下计划：冯玉祥的部队从潼关沿着陇海线前进，切断张作霖的后方，以便同唐生智与我在郑州的部队连成一片。在休整一段时间后，我们就向北京进军。同时，朱培德的第三军团警戒南京方面可能发起的进攻。

我把一个师留在武汉，我不能放弃武汉这个基地。我决定把叶挺的第二十四师留下。这是一个新组建的师，它容纳了大量的新兵，需要整编与训练。唐生智也留了些部队在武汉。

当时，我担任第一纵队司令官，任务是向京汉铁路右翼挺进，以便夺占开封。我隶属于第一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唐生智，他的总指挥部同第二纵队司令官刘兴一起行动，刘还兼任第三十六军军长。第二纵队沿着京汉铁路前进，直指郑州。第三纵队司令官是魏益三，所部乃是新编的河南倒戈部队。所以真正同敌人作战的只是第一、第二纵队。

第四、第十一军于1927年4月18日在武昌南湖机场举行第二次北伐誓师典

礼。两天后，许多群众到京汉路车站为我送行，宋庆龄女士给我一篮鲜花。

1927年5月1日，我统率的两个军完成了在驻马店的集结。我一到驻马店就拜访了靳云鹗。由于我穿着士兵服饰，鄂部的哨兵没认出我。当他们知晓访客的身份时，他们惊诧我的身材如此瘦小。相比之下，北方的军人真是高大魁梧，尤其是山东籍的官兵。

我在驻马店收编了陕军一个骑兵团，团长是崔华。这个团仅有三个连一百来匹马，其中多数是蒙古骏马。我把这个骑兵团编入一纵指挥部直属部队，因为，马匹大有助于侦察工作。

我们的武器弹药更加标准化，步枪部换了0.79公分口径，大多是汉阳兵工厂制造的。我们也拥有该厂制造的迫击炮与0.75公分口径机关枪。

通讯工作方面，军级指挥官配备了外国制造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同上级联络，同下属单位则使用电话联络。当然，我们使用密码。

5月14日，我接获总攻令。四十一军的段国璋旅靠了过来，但又突然叛变，在汝南袭击我部。由于我们从未对段部抱有警惕心，我们有部分单位被缴了械，我们承受了伤亡，所幸为数轻微。我派兵包围了段国璋旅，让其他部队挺进上蔡。

我记得在上蔡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部队进不了民房。由于整天下雨，我的参谋长与我去敲一家的门，屋主不让进，我们用客家话咒骂屋主“河南人毫无人性”。此时，屋主出来欢迎我们，他说“我们是一家人”，原来他们也是客家人。

在上蔡，我们没有很多仗可打。5月16日，我指派两个团包围了县城的富双英部守军，其余部队挺进东洪桥和西洪桥。

东洪桥与西洪桥发生了激战，该两桥相距约两里路。在指挥这场战役时，我忙坏了，我根据战场情况把后备队在两座桥之间调来调去。结果后备队没有打成一仗，因为每当他们赶到一地时，战事就平静下去了，他们就要返回另一座桥增援。反而在来回奔跑行军中，累死了两个士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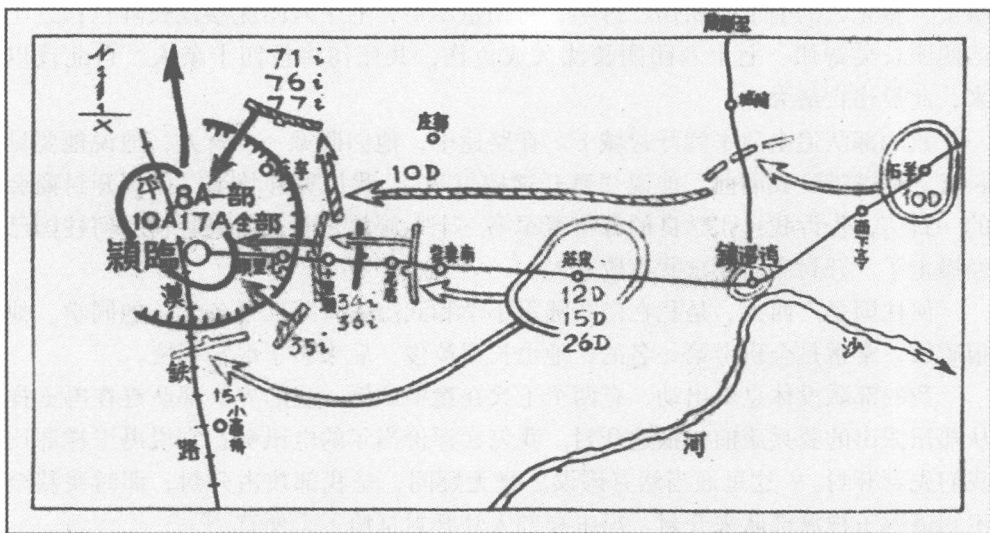
5月17日，我们占领东洪桥与西洪桥后，富双英旅长率领上蔡守军投诚。我下令黄琪翔率领二十六、十二师和独立第十五师从西洪桥向逍遥镇前进。独立第十五师下辖三个团，是由投诚的湖南部队改编的。师长贺龙原来是湘西的土匪头子，但是看上去他很斯文，说起话来条理分明，一点也不像土匪，这方面他同朱德刚好相反。

5月24日，我们攻占逍遥镇。《三国演义》第67回《张辽威震逍遥津》就是描述1786年前魏将张辽在逍遥津旁桥上重创吴兵，甘宁、吕蒙拼死保护孙权，挥鞭策马跃过逍遥津出险的故事。我们在同一地点俘奉军团长王步锡以下五百余人，再次威震河南逍遥津。接着，我们向临颖进发。在临颖附近，我军击中两架敌机，但那只是侦察机。1927年5月27日拂晓，我们进攻临颖。除了蔡廷锴的第十师担任后卫，我把所有的部队都投入了这场战斗。敌军在各方面都占了优势——他们有空军、坦克、大炮等。我听说我们的机关枪炮兵连跟着一些步兵单

位后撤了。这是从北伐出发以来我军首次退却，我赶到前线，士兵们一见到我就回到自己的岗位。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讲战事的胜负同战场指挥官素质高低有很大关系。

此役我们伤亡惨重，我见到蒋先云躺在担架上经过我的指挥部。他睁着眼，说不出话，但是还挥动手臂表示要回到前线去。他确实作战勇敢，善待士兵，可惜他最终在临颖不治。

我们不能同优势的敌军硬拼。5月28日，邓演达、铁罗尼、保罗、涅吉丁都建议我下令立即退却，他们都说，否则会发生混乱。我不同意，我说，第一，白天撤退是危险的，同样会溃散。由于我们没有足够的火车车厢把部队转移到后方，我们很可能被消灭。第二，我们必须等待蔡廷锴师到来，我已命令他急行军来临颖增援。我计划把第十师投入战场继续战斗以稳定我们的战线，坚持到黄昏才可以开始撤退，夜间撤退比白天撤退安全得多。简言之，我也感到我们无法继续这场无限期的战斗。



临颖附近攻击前进要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提供）

此时，蔡廷锴赶到了指挥部，李汉魂从前线报告张学良已经撤走了。那时大约下午四点钟。毫不夸张，我在最后五分钟的坚定不移，扭转了战局。胜利是属于能坚持到最后五分钟的人的。如果张学良坚持到黄昏，我们就不得不撤退了。这使我想起一则广东故事——有人问另一人：“你走不走？”那个倔强的汉子答道：“不，我不走！”前者道：“你不走，那我走！”他吓不倒硬汉。

保定军校第八期毕业的李恒华带着他驻守临颖的炮兵团投降了我们。他们的武器大多是山炮，也有些野战炮。于是，我解散了机枪炮兵营，淘汰了陈旧的山炮。这一战，我们发了一笔“洋财”，大大改善了火力。

我们俘获了奉军四辆坦克，这是我首次俘获坦克。拍照存证后，我们将这四

辆坦克上缴给军委会，因为我们根本不懂得使用这些新式武器。

刘兴的部队也参加了临颖之战，可以说，刘兴的二纵在临颖——他们在火车站作战，但那不是主战场，刘兴的部队伤亡轻微。

临颖之战是我部在第二次北伐中所经历的一次最残酷的战役。奉军出动了第十军王树棠全军，第十七、第八军及飞机坦克共十余万官兵，我军仅黄琪翔指挥不足额的第十二、第二十六师；敌方兵力十倍于我，且有良好的工事与优秀的兵器。我与黄琪翔亲临前线指挥，敌方集中火力，弹如雨下，我军始终坚守阵地。自27日拂晓至28日下午，血战两日，冲击敌阵几次攻克临颖。此役缴获步枪千余支、迫击炮十余门，机枪五挺、坦克车四辆，军品无算。此役击溃了张学良部的主力，使我们得以进军开封。

在我参与的所有战斗中，临颖战斗——并非许多人想象的汀泗桥战斗——给了我最大的满足感。如果说汀泗桥之役是消灭吴佩孚部的关键，那么临颖之役乃是消灭张学良部的关键。此役也是我在内战中参与的最残忍战役。正面战场伤亡惨重，蒋先云的七十七团伤亡过半，蒋伤重不治，七十六团沈参谋长阵亡；三十四团团团长吴奇伟、七十六团团团长沈久成负伤，共死伤将校四十余人。自北伐以来，此役伤亡最大。

我的部队追击敌军到开封城下。在路途中，他们遇见一个盲人，他说他要见长官。他被带到我面前，他说“劈开这枝竹竿”。我们劈开竹竿，见到开封商会的一封信，告诉我：张学良的部将奉军第三十七旅旅长兼开封警备司令何柱国已经撤走了。开封商会要求我直取开封。

何柱国是广西人，是我在广东陆军小学和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的同学。他很聪敏，常常是全班考第一名的；他也长得英俊，后来去了保定军校。

我的部队没休息就出动，有两个士兵在途中病倒。我的先头部队赶在冯玉祥从郑州派出的骑兵旅前头抵达开封。我怎么评价当年的电讯呢？它说冯玉祥部比我们先到开封。^① 这里面当然有谬误。毫无疑问，是我部攻占开封，那时我甚至不知道冯玉祥派部队来开封。冯玉祥部入驻开封是捡了个便宜。^②

有谣言说开封俘获数以万计的敌军官兵的消息，那全是胡扯！敌军都已撤走了。此外，我不相信张学良在开封驻有数以万计的部队。这一定是有人为我吹嘘战绩。当然，张学良留下了一些老弱残兵在开封城。

我的部下不会让冯玉祥部骑兵进城。根据不成文的规矩，先占领城池的部队有权拒绝其他部队入城，原因很简单：避免添乱。当我和我的骑兵团抵达开封后，我亲眼见到冯部骑兵抵达城外。

^① 据《革命文献》第17卷记载，1927年6月1日张发奎电军委会称所部前锋于6月1日下午6点占领开封；然而冯玉祥部将孙良诚6月2日电军委会，宣称该部于5月31日攻占开封。

^② 据蔡廷锴回忆录，他的十一军第十师前锋部队于1927年6月1日率先抵达开封。另据李汉魂6月2日的日记，第十一军已经占领开封并消灭黄河以南的敌军；冯玉祥已刊日记中的编按直指冯军于6月1日占领开封，武汉部队也已抵达。

北方的民众欢迎我军，他们欢迎我军甚于冯军，这是因为我军配备了野战厨房自行煮食，而北方的部队都要求老百姓提供伙食。

在开封，我抓到一个嫖妓的军官，他是第一个违反奸淫禁令的。他哀求我处死他，而不要当众按军法处以二百军棍。我拒绝了他的要求，因为此人并非恐惧皮肉之苦而是害怕羞辱。难道二百军棍打上去不疼吗？执刑用的木板是临时制作的代用品，那触犯军纪的军官可以穿着衣裤受刑。另外，执刑的军官通常是同级或上一级军官，本是受刑军官的朋友，下手不会很重，仅仅打屁股而已，事实上也不会打够二百下。

至此，在我部的“外江佬”数量已超过粤籍官兵，有许多下层干部都是外省籍。许多黄埔四期、五期生，尤其是黄埔武昌分校训练的五期毕业生来我部担任低级军官。

我部由设在武汉的第四、第十一军联合后方办事处直接从军委会取得军费，它也负责照顾伤残士兵。补给工作由总军需署掌管。

政府有时会拖欠军费。对当时通货的贬值，我无甚印象。我敢说自国民革命军建军后，我从未感觉经费成问题。此外，我部已积累了相当大一笔公积金。

我们自信有能力直捣北京。我们面对的只有奉军，而这时奉军已陷入混乱。我们感到他们将会退回东北。吴佩孚的军队已被消灭。孙传芳部正与南京方面的国民革命军作战。



阎锡山

怎样评论阎锡山违反承诺——未派晋军出击奉军一事？当张学良进兵河南时，如果阎锡山出兵石家庄，他可以切断奉军的后方补给线，那么临颍之战就不会发生，我们肯定已经顺利到达北京。然而，我对阎锡山的态度并不惊奇，他这个人本来就很滑头。

河南投诚部队的装备不差，但军纪很差，靳云鹗还抽大烟。

在第二次北伐中，我们没有犯下战略错误，但以我个人经验来说，我常常过分信任倒戈投降的部队，段国璋旅的复叛就是我们轻信北军叛部所遭致恶果的典范例子。当然，向我们投诚的北军，多数还是忠于革命的。

第二次北伐的伤亡颇重，临颍之战最为惨重，伤亡率超过三分之一。其他战役的伤亡率就小得多。整个第一纵队减员五千多官兵，包括负伤与阵亡。贺龙的独立十五师折损较少，因为我指派给他的任务比较轻松。

张学良的奉军同吴佩孚、孙传芳部队比较，吴佩孚军队战斗力最强劲，奉军



冯玉祥

其次，孙传芳部最差。装备上以奉军最精良，吴部与孙部差不多。

在第二次北伐中，农民协会对北伐军帮助很大，农民群众为我们担任侦察、向导、运输、通讯等工作。也有过几次，有人拒绝同北伐军合作，河南的红枪会对我们不友好。可是，加入农民协会的红枪会群众向我们提供援助，这必须归功于我们的政工人员。我军每占领一地，有时在占领前，共产党就派人去整顿红枪会。那些未经整顿的红枪会，对我们有所阻挠。有时骚扰我们的后方，掠夺我们的武器。他们装备很差。总之，红枪会的成员，协助我军的多于妨碍我军的。

台湾的历史学家蒋永敬在《鲍罗廷与武汉政权》一书中提及，在河南曾发生过农民与受共产党影响的国民党党部之间的纷争。我记忆中无此印象，但是这类争斗是可能发生的。

人们常常抨击湖南农运无法无天，但由于当时我对共产党印象甚佳，所以我对此类报告一概不予理会。当时我认为工运与农运都是新生事物，对在运动发展的痛苦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过激的行为，我们应该持宽容态度。此外，我对农民协会有极好的印象，因为他们帮助北伐军。

5月中，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联同第二十军杨森部、第十五军刘佐龙部从背后袭取武汉，武汉政府依靠叶挺部将十四师等逐出武昌。夏斗寅部驻扎在宜昌，叶挺对夏斗寅部与杨森部采取行动是正确的。

1927年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哗变。当时我在河南作战，对此事未太留意。许克祥是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下属。我认为，湖南农民协会虽然犯了左倾幼稚罪，许克祥的滥捕滥杀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倘若我处于他的位子，不会像他那么大动干戈。我不相信有关共产党阴谋的报告，故仍然信任共产党员，同他们合作。

1927年6月7日，我和一些参谋与一个骑兵连离开开封去郑州。一到就看到张学良致国民革命军的函件，他希望我们不要毁坏郑州附近跨越黄河的铁路大桥。这座桥正由一位比利时籍工程师管理。从军事的观点，张学良应该炸毁这座桥以阻止我军追击撤退的奉军，但是，他顾及整个国家利益。他信中还说，希望把他留下的大量麦子分给贫民。我感到此人头脑清醒，置国家利益于他个人利益之上。奉军的军纪不坏，张学良是足智多谋的。他原先以为河南守得住，所以构建了防御工事，临颖尤其坚固。尽管外传他是“太子爷”，他还是能干的将才。

几天后，我在郑州会议上遇见冯玉祥。他对我说：“你真了不起！你们南方人两条腿比我的马队还跑得快！”他不知道，我的部队是日夜兼程，一刻不停赶到开封的；他想不到我们跑得这么快。我们向开封急行军的速度确实引起了北方官兵的钦敬。

冯玉祥对武汉政府的态度给我的印象是：他是左倾亲共的，他不和我们站在一起，但也没有同我们断绝关系，似乎在骑墙观望。

在郑州会议上，我们决定把唐生智和我的部队撤回武汉，把河南的军政管辖权移交给冯玉祥。这是汪精卫提议的。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回师武汉的理由，原来计划在郑州与冯玉祥部会师后，稍事休息，然后进军北京。

我们决定回师武汉，是因为湖南农民协会的不正当举动。汪精卫报告说，农民协会发动骚乱，走向极端，导致后方不稳。他是郑州会议上最活跃者，唐生智也讲了许多，他也报告了农民协会制造的动乱。我们同意，鉴于前述暴行，我们不能再继续从事第二次北伐了。有关前述暴行问题，要留待我们回到武汉再议。郑州会议并没有提议军事长官解除各支部队中共产党员的武装。

郑州会议收到朱培德发来的电报，说蒋先生准备夺占江西，但我们回师的主要原因，乃是湖南农民协会的暴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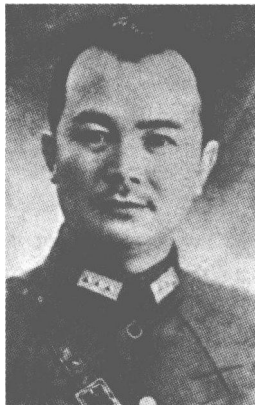
唐生智、冯玉祥和我都赞成回师武汉的动议，当时争议很小，我完全同意这项决定。我的部队已经承受重大伤亡，需要时间去整顿和补充。另外，我们南方部队不习惯北方的环境。我感到回武汉可以安心无忧，因为我相信冯玉祥部足以抗衡张学良的奉军。我为什么不考虑冯有野心呢？是的，他确有野心，但我们留下了河南的部队，冯玉祥部在河南并不寂寞。

1927年6月12日郑州会议结束，唐生智下令我部回师武汉。他对我暗示，回去后我们要东进，意即进攻南京。唐生智部将沿长江北岸，我部则沿南岸行军。

冯玉祥在其回忆录《我的生活》中说，汪精卫和其他武汉领导人突然离开郑州，是因为他们得悉冯玉祥已经同蒋先生结盟，意欲扣留他们。其实我们离开郑州后才知道冯玉祥与蒋先生结盟，那时我们才感到冯玉祥是不可靠的。至于担心被扣留则是过虑，因为唐生智部那时还驻扎于郑州。

回到武汉后不久，汪精卫召集“非共武装同志”开会，向他们出示共产国际的决议^①，要求他们在军队中提高警惕。我记得在一次汪精卫召集的非正式会议上，对唐生智、我和一些高级将领说，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下达行动指令前，要密切注意共产党。

当我听到冯玉祥于6月19日至20日的徐州会议上同蒋先生结盟的消息时，我并不惊诧。冯玉祥、阎锡山以及大多数北方武人都很狡黠也很圆滑，不像我们南方人直截了当。



黄琪翔

武汉分共后，我被任命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挂上将衔。第二方面军统辖第四、第十一、第二十军。第二十军是由贺龙的独立第十五师加上四分之一团整编而成。

当总指挥与总司令两个官衔并存时，总司令高于总指挥，委我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时，隶属于唐生智的第四集团军。唐生智野心勃勃，但他和我一样，都是汪精卫的支持者。

6月，黄琪翔被擢升为第四军军长，下辖十二、二十五和二十一师，缪培南被任命为第十二师师长，李汉魂为

^① 据《革命文献》第16册记载，1927年11月5日，汪精卫在广东中山大学发表题为《武汉分共》的演说，透露苏俄顾问6月1日交给他两份共产国际的决议，在其他省份，苏俄要武装2万名共产党员和5万名工人农民。

第二十五师师长，二十一师是由投诚的富双英旅扩编而成。

朱晖日升任第十一军军长，下辖第十、第二十四和第二十六师。蔡廷锴和叶挺分别留任第十、第二十四师师长，蔡廷锴的副手许志锐升任第二十六师师长。为什么让他接替吴仲禧？因为吴仲禧是福建人，福建出产不了勇士，但他是个出色的参谋人员。

应蔡廷锴的要求，我派第四军的陈芝馨接替许志锐任第十师副师长，蔡与陈是西江地区的同乡，除了陈芝馨，我没有将其他第四军干部安插到蔡廷锴的第十师。



李汉魂

除了许志锐，还有其他第四军的干部调到二十六师担任要职，副师长、参谋长、经理处长、副官长以及三个团长都是第四军调去的。

叶挺的第二十四师中，三个团长都是第四军调去的。第十一军参谋长吴涵也是第四军调去的。

为什么第十一军有这么多第四军出身的军官？因为自从陈铭枢离开后，第十一军的军官们相继辞职，由此造成的职位空缺我必须填补。

谢膺白被任命为第二方面军参谋长，我推荐郭沫若为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兼党代表。政治部有许多共产党员，尤其是第四军，这是由于廖乾五的缘故。我推荐高语罕任第二方面军秘书长，他在中国共产党任要职^①。秘书长与参谋长同级。

我把共产党员安插到不同的岗位，因为他们都很能干。既然汪精卫已经吩咐我提防共产党，为什么我还要把郭沫若与高语罕礼聘到第二方面军呢？是我同意任用他俩的。这也是邓演达提出的建议，汪精卫并没有反对。如果汪精卫反对，他会告诉我。设若汪告诉我不可任用郭沫若和高语罕，我会服从他，因为我不管是非，一直崇拜他。我很强调情感的重要性。我相信只要追随汪精卫，就不会迷失方向，但他没有给我明确的指示。我也亲近邓演达，二者的区别是，我觉得汪精卫能做我的领袖，邓演达则是我的知心朋友。

邓演达既建议设立党代表职务又建议任命郭沫若为党代表。当郭沫若出任第二方面军党代表时，他并没有利用他的特权，这个党代表只是名义上的职务，他没有真正执行党代表的职能。我从未向他下达有关政治部业务以外的命令，因为他是个文职人员，他也明白自己对军务一无所知。我是独断独行的，他从未要求参阅我的任何命令，表现得十足是一个学者——有点不落俗套，有点浪漫。他工作并不勤奋，不像廖仲恺；他作风懒散，却很健谈。作为四川人，他是口才便

^① 高语罕（1888—1948），1925年任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委员，1926年1月出席国民党二大任中共代表党团书记并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委会常委，1927年3月出任中共兴办的汉口《民国日报》主笔。

给。事实上贵州人和云南人都辩不过四川人。

1927年6月杪，记不起是否我同意将工人纠察队合并到我的部队。我个人对共产党员仍然是友好的。^①

铁罗尼是唯一不拘谨于军事的俄国人，有时他同我谈及宽泛的话题。有次我问他有俄国的共产主义，他说：“俄国革命发生在多年前，在今日的苏俄已经不存在真正的共产主义，至少还要五十年才能实现共产主义，我不能活到那一天了。”那时他四十多岁。他继续说：“在中国根本谈不上实现共产主义，所以你不必担心。”他又说，三大政策是正确的，俄国人来中国是为了帮助实现国民革命。此时我愈来愈参与政治，也就开始确立自己的政治立场。由于同汪精卫接触频繁，我开始感觉胡汉民心胸狭窄。汪精卫叫我“向华”，因为我比他年轻。

我同孙科的关系密切，我尊敬他，我称他“孙先生”，因他学问渊博。他的私生活异乎寻常，但他读起书来废寝忘食。此外，我崇拜民主，他作风很民主。虽然他看上去面容严肃，但他完全没有官僚架子。他是个出色的演说家。我认为他很能干，但他不够坚定，那是文官的通病。设若蒋先生不是军人，他也会这样。

虽然自己是个粗鲁的军人，但我还是愿同文人接近。在武汉，我交结了许多文官——郭沫若、徐谦等。我对这两人印象都不错，我钦佩郭沫若的学问……我认为徐谦很能干，他是有名的法学家。

此时刘玉春已获释，这是怎么回事？陈师许有一天告诉我刘玉春吐血，我就去看望他。他几乎疯了，说我们若不释放他就干脆杀了他。对此我很有感慨，我向唐生智报告此事，认为刘玉春的行径值得同情。唐生智向国民政府提出这个问题，于是刘玉春重获自由。

我派了一辆马车把刘玉春接到我的总部。一路上，老百姓向他掷石头，高喊：“杀了他！”他一见我就下跪，感谢我救他一命。我说，我们是为了一种理念，为了实现三民主义而战。过了一会儿，我派人护送他登上开往上海的客轮，我给他盘缠以及一小笔钱。他经上海回到了老家天津。

我对武汉国民政府进军南京的计划能成功深信不疑，对唐生智部与我部攻占南京极有信心【为了赶走蒋先生】。在我们这方面，拥有第二、第三、第六军，我们只需要对付第一军，至多再加一个第七军——我们仍然不知晓它的政治态度。

我计划进击南京准备派遣第四军第二十一师富双英部沿着长江南岸进军，我的主力将从南昌出发沿着以下两条路线东进：一条经由上饶、江山和杭州直捣宁沪，另一条由皖南直抵南京。



郭沫若

^① 中共党员朱其华（曾在第四军政治部任职）在其《1927年底回忆》一书中说：“武汉之所以还没有像南京那样杀戮共产党，就是因为张发奎还有一点问题……张发奎在作战时不愧是一员勇将，但他也只是一个军事人才而不是政治家。”

我从河南回师花了些时间。每一支部队向下游的九江进军前都只在武汉停留几天。叶挺的二十四师首先开拔，我下令部队沿着南浔线（南昌至九江铁路线）集结。朱培德部向东，仅在南昌留下一小支部队，当时朱德任朱培德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长。叶剑英在九江任第四军参谋长，他是梅县同乡、第四军军长黄琪翔推荐给我的。我以前见过叶剑英，但对他并不了解，也不知道他是否共产党员。

1927年7月15日，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召集全体会议讨论共产党问题，旨在压制违反国民党党纲的所有言行。不久，汪精卫召集了一个高级军政领导人的非正式联席会议。他告诉我们，中央已决定实施“分共”，但有异于南京方面的“清共”。这意味着要用和平方式撵走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不逮捕也不杀害他们。他告诉在场的高级将领们回到各自单位作好准备。我们要求共产党员自动离开，给点钱让他们走。如果他们不想离开，可以留在武汉，但不许在政治、军事机关任职。

对“分共”政策，我认为，在革命成功之前，革命力量不应该分裂。当然，一旦汪精卫决定分共，我会支持他，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比我更高瞻远瞩。正如我常说的，服从命令是军人的神圣职责。这可能导致险境，年轻的军官很容易被引入歧途。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认真考虑分共政策是否正确。既然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认为“分共”是正确的，我当然听他的。我绝对支持他“分共”，正如先前宁汉分裂时我绝对支持他的立场。我对军事的兴趣始终多于对政治的兴趣。虽然我在政治上并无许多高见，基于我所任的职位，我也不可以多说多话。

汪精卫在那次会议上有谈起俄顾问。事实上，我想不起他在会上谈过任何有关俄顾问的事，我并不认为俄顾问对我们搞阴谋。

邓演达与铁罗尼来看我，这两人是形影不离的。邓演达说，汪精卫的政治生涯已经告终，叫我不再听他的话。邓演达说，唐生智的政治生命也已死亡，我必须把我的第四、第十一、第二十军带到后方——广东，重建革命基地，一切从头开始。现在回想起来，我相信他的主要目标是鼓励我同共产党合作，以便建立一支既反蒋又反汪的部队，可是他本人并非共产党员。

我反驳说，汪精卫的政治生命并未终结，他只是得了病，只要他一息尚存，我们就应该请医生拯救他。这说明了那时候我仍然是左倾的。我说，我们仍然可以同汪精卫谈谈。我的观点是我们必须支持他。铁罗尼赞同邓演达的观点。

邓演达和我曾是同学，又一起在邓铿的第一师共事过。我俩的长期联系从未中断过。共产党知道我俩有着牢不可破的友谊。我猜想，中共期望邓演达能以私人感情影响我。我俩分歧的关键是汪精卫。

邓演达发觉他不能劝服我，就马上去了郑州。冯玉祥答应邓，鲍罗廷与其他俄顾问返回苏俄路过他的司令部时会保护他们。许多共产党人安全通过冯玉祥的辖区。他是个奇怪的人，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讨好共产党。

邓演达是唯一宣告汪精卫政治生命已经终结的人。郭沫若，特别是高语罕都

不敢越轨，他们知道我是汪精卫的坚定支持者，害怕我会扣押他们。他们说，湖南农民运动走向极端施暴是由于中共基层干部的左倾幼稚病，而中共中央委员会对这类歪风不以为然。他们想我相信，所有的乱象都会被制止。

谭平山、徐谦和何香凝都要求我维护三大政策，许多人都在为此努力。

是年8月6日，林昌炽上书武汉国民党中央，举报共产党把持军校、破坏国民革命。当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解散时，恽代英等人要我将军校学生调入第二方面军教导团，我接收了这批军校生，凡留在武汉的都安插到教导团，共有一千多人。组建教导团使之隶属于第二方面军都是奉武汉国民政府的命令。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校长杨树松被任命为教导团团长。他原籍东北，毕业于保定军校，是邓演达的追随者。

我不相信士兵中有共产党员，因为那时候绝大多数共产党员是知识分子。我知道低级军官中也有共产党员，但不知道有多少。在二十五师周士第的第七十三团，多数军官加入了中共，叶挺把这个团移交给周。在其他团队，共产党员不多。无论如何，我不能把共产党员当作敌人，我不反对共产党员个人。分共政策只是来自高层的命令。

除了周士第，我还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团长是共产党员，我只知道叶挺师长是共产党员。然而我们之间相处得很好，我以为我能够感化他们，至不济，我想他会离开部队。



周士第

张云逸是李汉魂部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参谋长，但我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以前他当过杨锦龙独立旅的参谋长。在杨部被解除武装后，他被收编，负责我部的参谋处。

第四军第二十师七十七团团长黄新不是共产党员，他是江西人，是我在武昌陆军预备学堂的同学，后来去了保定。我安插他到七十七团接替阵亡的蒋先云团长。蒋先云没有把黄新带到这个团。当然，这个团有不少中共党员。

有人说第十师第三十团团长和该团其他军官都是共产党员，这点我从未听说过。范德星^①团长是陈铭枢的粤东南同乡，也是他的部下，是行伍出身。他是个粗人，所以没资格加入共产党。



何香凝

^① 团长姓名有些紊乱，张发奎说团长又名范聚奎，蔡廷锴与张国焘回忆录都说是中共党员范孟声，张发奎的《第四军纪实》称是范德星。

我觉得我能够牢牢控制我的部队，我已经独力把第四军发展壮大。把第四军交付黄琪翔后，无异于我亲自领军。虽然第十一军原本隶属于陈铭枢，但是由第四军的朱晖日统率，许多第四军出身的官兵调入第十一军。



贺龙

然而，我对贺龙没有把握，因为他有自己的部队。但是我对他很好，他也感受到这点。我待他真诚、坦率，我认为他不是共产党员。

1927年8月5日，汪精卫在武汉国民党中央会议上报告说：“从武汉决定制裁共产党以后，武汉的共产党徒全到四军、十一军、二十军去了。张总指挥因为中央扩大会议决定并命令保证共产党员的生命安全，也无法拒之门外。及至他们到四军、十一军、二十军工作，张总指挥又以为他们是帮助国民革命，所以优容他们。”那么，是不是那时有许多共产党员加入第二方面军？是否因为我相信他们会有助于国民革命所以欢迎他们加入？共产党员都害怕四一二事变在武汉重演，他们害怕唐生智会杀害他们。那时唐生智枪毙了一名旅长。我说了很多次，我不会杀共产党员。那时高级共产党员都去了第二方面军司令部驻地——九江。

共产党员并没有渗入我的部队的下属单位。如果共产党员是军人，他们自然会加入教导团。我估计数量不多，因为教导团团长杨树松不是共产党员。

中共机要刊物《中央通讯》第十三期登载了南昌暴动失败后，张国焘于1927年11月8日给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一封信，其中谈道：“当武汉唐生智、汪精卫政府日趋反动时，彼时我党与张发奎关系尚好，事实上我们曾将农民的枪支送给他，并答应给他种种的帮助。”绝无此事！他们没有给我一支枪。必须记住这一事实：唐生智与我组成了在武汉驻扎的两支主力部队。至于汉阳兵工厂生产的军火，唐生智和我所获相同，我分配到的确实不少于他。此外，武汉政府寄希望于我们第二方面军，因为他们认为唐生智靠不住，而大家都知道我是支持汪精卫的。如果说，我发枪给共产党员，那是因为部队中有共产党员。

无可置疑，共产党员用不同的方法帮助了我，因为他们工作勤奋。共产党的政工人员无疑是认真负责、表现良好的。在他们的宣传中，仅仅夸奖我的部队。据我所知，他们从来不宣传共产主义。张国焘信中还谈到，1927年7月26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上加伦将军报告，他已会见张发奎，张同意将二十军集中准备进攻，十一军集合于南昌，第四军沿着南浔铁路集合，此三个军不能再向东行进。加伦建议：倘若张发奎同意返回广东且不强迫叶挺以及其他军官退出共产党，中共将同张部一起回返广东。加伦所说的26日汉口会面细节是否属实呢？我也许见过加伦，至于他说关于返粤的事情我记不起了。邓演达是唯一建议我带部队回广东的人。

据张国焘《我的回忆》所述，我想回到广东去，其实不确，也没有任何下属鼓吹返粤。27日李济深等人警告我，反对我南返，也许他们获悉了邓演达的企图，也许他们误以为我想南返。^①

原广西省主席黄旭初1962年4月1日在香港《春秋》杂志撰文说，李济深派了他的参谋长王应榆带信来看我。信中说，如果我对广东有任何意见，可以同他讨论，但我绝不可率部返粤。我见了王应榆，他是我在广东陆军小学的同学，可是我想不起他讲过有关回粤的事。



我是怎样得知贺龙擅自率部回南昌的消息？那是出 张国焘

乎我意料的事。7月29日我同汪精卫一起到达九江。^②

是否因为我不敢独自去九江，就请求中央派人向我部下训话，提醒他们内部纷争会导致分裂？笑话，说我不敢独自去九江，是荒谬的！然而，也很可能是我要汪精卫去向我的部属解释他的政策。我已经通知在庐山召开第二方面军师级以上军官会议，讨论让共产党员和平离开我部的程序。

1927年10月15日，张太雷在中共南方局省委联席会议上报告说：“张国焘不主张在南昌动作，是因为他对张发奎有许多幻想。就是临走的前夜也与张发奎作了很长的谈话，而且还说有希望。”实际上我到九江后，张国焘并没有同我长谈，我那时并不认识张国焘。^③

那次庐山会议，叶挺、贺龙、蔡廷锴没有出席，因此会没开成。不过，我并不认为共产党会发动叛乱，所以没有先下手逮捕他们，若要逮捕他们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

我打电报给叶挺与贺龙告知8月1日我会抵达南昌是可能的，因为他们没去九江（按：庐山离九江仅十多公里）。

那时我的部队中，叶挺的二十四师与蔡廷锴的第十师在南昌地区，十一军向南昌地区集结尚未完成，朱晖日第十一军的指挥部设在马回岭，二十六师驻在马回岭地区；第十军与第四军的第十二、第二十五师在九江与德安之间；富双英的二十一师在长江北岸，正对着九江。集结军队是一件复杂的事，我们必须为士兵寻找营房。

我想，共产党害怕我们会镇压他们。他们误以为，我和朱培德的部队将会在

① 1927年7月27日，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黄绍竑、陈可钰等人联名致电张发奎，曰：“近闻兄处军队且被伪命移动，有所窥视，岂两湖赤祸犹为未足，而尊欲施诸两粤耶？”

② 8月5日，汪精卫在武汉国民党中央报告时说：“当时是因为知道了四军、十一军、二十军内部起了纠纷，同时张发奎总指挥请求中央派人训话，庶使纠纷平息，并且说内部的纠纷不解决，中央无人去，他是不敢到九江去的。”

③ 据1966年9月25日张国焘在香港亲口对夏莲瑛女士说，他仅见过张发奎一次，是在武汉的一个大型集会上，但未交谈。



朱晖日

南昌包围他们。这就是7月31日午夜至8月1日凌晨他们在南昌发动暴乱的原因。^①

我是在庐山听到这一消息的。我在十一军听说蔡廷锴与叶挺贺龙合作，感到非常失望。

叶挺无疑是南昌暴动的领导人，他在共产党内拥有很高的地位，并且指挥正规部队。然而，如果没有贺龙与蔡廷锴，他不会具备足够的力量发难；如果他单独采取行动，他一定会失败。我认为，叶挺不能掌控他的二十四师。如果在后方，他的部下会迫使他离开。南昌暴动被称为“贺叶暴动”绝非偶然。贺龙是在会昌战役后，到瑞金一所小学内由周恩来监督加入中共的。

叶挺扣押了二十四师七十一团团长江震与七十团团长江古勋铭，一路往广东撤退途中，这两位团长都处于拘禁状态。叶挺原可以杀死欧古二人，但出于同情心，他没有下手。

我心中极为忧虑，乃开始制订收平暴动的计划，一旦暴乱发生，那就绝无和解的希望。此后我一直牢记，要掌控兵权。共产党必然会战斗到底，我必须粉碎他们。

我立刻赶到德安，去巡视前线，周士第的第七十三团驻扎在那里，我信任该部的忠诚。我必须视察部队，保持信心。我什么也不怕，毕竟是我把周士第安插到七十三团团长的位置上的。

我建议保罗、涅吉丁和另一位俄顾问同我一起去德安观察形势，他们同意了。他们对南昌暴动也感到非常惊奇。当然，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故作惊诧。

我和这三位俄顾问、几位同事军官以及翻译员们坐上了一部守车，由机车驱动开往德安。当我们停在马回岭时，朱晖日与李汉魂在车站迎候。在我准备下车、他俩想上车之际，我听到两声奇怪的枪响。显然，至少有一个共产党已经劫持了机车，强迫司机开车。我身边只有十名卫兵，于是我跳车了，部分卫士也跟着跳车。^②我把马回岭交给朱晖日，返回九江。俄顾问和其他官兵来不及跳车，乃去了德安。

^① 据南昌起义时任贺龙部警卫连连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江西省副省长的黄霖回忆，汪、张29日发表特急电严令贺、叶限期将部队撤回九江。29日前夕，张国焘曾与张发奎长谈。30日张国焘赶到南昌出席中央军委前委紧急会议，提出：“起义必须得到张发奎的同意，才能成功，否则不能起义。”周恩来拍板说：“前委大部分同志都主张起义，要不然就只有束手待毙，难道你要大家都跟你去投降张发奎吗？”周恩来以总前委书记身份强行通过发动南昌起义的决议。

^② 据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说：“中共将有暴动，似为张发奎所察觉。7月31日张发奎从九江乘南车赶往南昌，但他到达马回岭站附近即被阻隔。据在当地指挥暴动的负责人聂荣臻向我描述当时的情况说，张发奎到马回岭时，因为交通已断，即下车向正在移动的部队警告：‘你们向何处开动？奉了何人命令？’并宣称‘我是张总指挥，我命令你们停止前进！’这时聂荣臻深恐军心动摇，便指挥同志架起机关枪，向张发奎来的方向作示威式的扫射。张见情形不对，便被逼不再指挥他的部队了。因而聂等也就指挥军队破坏铁路……”

那天我步行踏着南浔铁路一条一条枕木返回九江。回到九江后，我召集了师长和师政治部主任以上军官开会，向他们解释中央的分共命令以及我已制定的对付共产党暴乱的方案。我要求他们回到各自的部队，命令所有的共产党员到九江来。

我解散了第二方面军政治部。郭沫若和我谈了一次话。我对他说：共产党人对我们不好，但我们从来未曾亏待过他们，现在他们必须从我部撤离。虽然我知道事态已经无可挽回，但还是安排他乘坐一辆守车前往南昌。

共产党员都被集中到九江，我说：愿意去南昌的，可以同郭沫若一起走；不愿去南昌的将被送往上海或任何他们愿意去的地方，他们会获发路费。我们分共并不意味着暴力，是指共产党员要退出政府与军队。我坦率要求他们，当我准备攻击南昌时，走到一边去。唐生智乱杀共产党人，我不能这样干，我甚至没有抓过共产党。为什么？因为叛乱是在南昌的那些人制造的，其他人不能为此承受罪责，纵然设若他们接受高层指令后同样也会掀起暴乱。此外，我从来不相信屠杀能解决问题。

有二十多个政工人员站了出来，这证明他们是共产党。我给他们发了路费，廖乾五就是其中之一。广东惠阳人、留德法学博士廖尚果 1927 年 9 月在广州接替他任第四军政治部主任。政工人员中没有一个人逃跑的。

只有少量军人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问题是我们无法保证所有的中共秘密党员都已退出部队，他们的额头上毕竟没有刺字，我们防不胜防。譬如，叶剑英没有离开黄琪翔的第四军，我仍然不知道他是共产党。

一些中下级军官跑了，例如十二师有个营长独自逃跑了。共产党可能指示他带着队伍一起走，但他觉得控制不了众人。我不知道他是否去了南昌。

我为郭沫若送行，同他一起乘坐机车离开的有 20 个人——廖乾五、徐名鸿、第十一军政治部主任、政治部的处长们等等。徐名鸿是陈铭枢的追随者，他从未承认过自己是共产党员。

局外人目睹这一局面，猜测我会逮捕共产党人。但正如我常说，我从不逮捕共产党员个人。

我猜忖，朱德、叶挺、贺龙那一伙人在暴动翌日召开的革命委员会常委会上建议利用我的名义^①，他们仍然称我为总指挥。他们都很了解我，特别是叶挺。回想起来，我相信，因为我信任共产党，加伦等俄顾问以及中共党员都在我身上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共产党希望利用我的名义去团结民众，消除他们的疑虑，减轻他们的痛苦。民众很清楚，我张发奎不是共产党。那时他们最害怕“共产共

^① 据张国焘回忆：“暴动的临时政府‘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由 25 人组成，其中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并未到场。他们的名字被列进去，这是利用国民党招牌所必需的。至于张发奎那时正与南昌暴动处于对立的地位，中共仍将他的名字列入，一面表示拉拢，一面借此维系第四军军心。参加南昌暴动的国民党左派人物，只是一些中下级干部。因此，这个革命委员会，用的是国民党的招牌，事实上完全由中共所操纵。”

妻”这样的口号。

共产党以为，如果我同意入伙，我的第二方面军会回到他们所称的革命策源地——广东。我的部队可以对付来自南京或武汉的攻击。他们想不到南京与武汉会联合起来“剿共”，因为他们估不到蒋先生会下野。

张国焘一再鼓吹，要为张发奎“黄袍加身”，那么我有否分别收到叶挺和贺龙的电报，欢迎我去南昌呢？我不记得在南昌暴动后从共产党那儿收到过任何讯息。

涅吉丁等俄顾问与他们的翻译在我的司令部出现了。他们告诉我，火车到德安后，他们被押送到周士第的司令部，周部士兵剥掉了他们的衣裤，宣布他们不受欢迎；我的卫兵有些被缴械逮捕，有些从桥上跳下河去逃走。

俄顾问与他们的翻译穿着衬衣衬裤，在渐渐变冷的天气下，显得很可怜。

我建议他们去南昌，他们拒绝了。我问他们想去哪，他们说要想回苏俄。我送他们每人500元以及一些衣裤，用船把他们送到上海，再由上海回莫斯科。

我派遣部队追击贺龙、叶挺“叛军”。8月7日，我部抵达南昌时，“叛军”已经撤离南昌，到达江西抚州。他们的目标是广东东江地区。朱培德的部队也回到了南昌。我们决定集中兵力，于是召集了一次军事会议。

蔡廷锴在江西进贤（按：南昌东南24公里）摆脱“叛军”之后打电话给我。我一直以为他是忠于武汉革命政府的，但是不料他竟用……广东粗话咒骂我，使我极为震惊。他说，他忠于陈铭枢，支持蒋先生，我们反蒋是错误的，他要像反对共产党一样反对我们。

蔡廷锴是个粗鲁汉子，但也有人说他文雅，这样子集二者于一身还真有趣！他诅咒我会下地狱，这实在有失一名高级军官的风度。他因为十一军的事辱骂我，又辱骂武汉革命政府，时在我们获悉蒋先生下野之前。回想起来，我相信倘若蒋先生已经辞职，蔡廷锴也不会同共产党站在一边。

蔡廷锴因蒋先生而恨我。即使没有南昌暴动，他也会离开我。他正在等待合适的机会。只要他投入蒋介石营垒，他可以从南昌到他选择的任何地方去——广东、福建、浙江，整个世界都是对他敞开的。

现在我才明白，陈铭枢离开武汉之前已经同蒋先生商量过如何保存实力并对蔡廷锴、戴戟、蒋光鼐作了安排。陈铭枢一度搁置他的计划，那是由于他的力量尚不足以抗衡武汉革命政府——唐生智与我是全力支持汪精卫的。陈铭枢的第十一军比我的第四军弱。为什么他不指挥三个师来对付我的两个师呢？因为二十六师师长杨其昌已经倒向我们这一边，他不会听从陈铭枢。此外，人们可以见到，长期以来，打胜仗全靠我的第十二师。我们强攻汀泗桥与贺胜桥，早先两次东征与攻占海南岛，都是靠第十二师打的胜仗。

我明白了为何蔡廷锴要求我调许志锐给他，为什么他要告发团执行官。这一切都为了向我表忠心，显示他不会同陈铭枢一起搞阴谋。这是传统的中国计谋——杀死自己的亲信借此向上级表示自己的忠诚。此时我感到那位团执行官被

诬告了。事实上，蔡廷锴已经投靠陈铭枢与蒋先生，所以陈铭枢没有必要去设谋坑人。蔡廷锴只是搁置了他的计划，而当机会来临时，他会突然转向反对武汉政府。他率领的军队当然是亲蒋的。

蔡廷锴让陈铭枢离开，陈回到南昌便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①。

蔡廷锴摆脱共产党时只带走了他的第十师，后来这个师成为第十九路军的核心。如果没有他，整个第十师就会落入蒋先生的追随者陈铭枢之手。

蔡廷锴摆脱共产党之后，仅以离开我第二方面军的人数计算，我估计共产党大约剩下 5000 人的战斗部队。^②

① 据 1946 年香港出版的《蔡廷锴自传》说，他给范孟声与三十团其他共产党军官一些钱，让他们离开，但范从此失踪，乃属事实。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叶挺的二十四师和周士第的七十三团是暴动主力。驻南昌附近第十师师长蔡廷锴原来持观望态度，经中共极力拉拢才入伙，任新编的第十一军副军长。张发奎部由九江向南昌逼近时，叛军被迫离开南昌，8月5日往抚州、瑞金向广东潮汕进发。行经进贤时，蔡拉队向东跑了。他集合干部训话，将三十团团团长范孟声（又名范聚奎）及其他中共党员三十余人一律扣留枪决，其余几十位同志下落不明。”张发奎则说范德星是抗战胜利的 1945 年因汉奸罪被处决的。

② 据张国焘回忆，失去蔡师之后，暴动部队人数约 2.5 万，枪支 1.3 万支。

第七章 广州政变与广州暴动；隐退

(1927年8月至1929年初)

虽然李济深在“清党”时期同南京政府站在一起，但这并没有影响我们的私交。我已经讲过，第四军没有谴责他。他派了陈可钰到南昌要求我们回师广东，陈已退休，仍仆仆风尘北上充当说客。

陈可钰同我谈了三天。李济深希望我部南归，协助他镇压共产党“叛军”，此时“叛军”正向汕头推进。可是，一旦我部在汕头方向追击叶挺，他会转攻广州。所以我部宜开往韶关搭乘赴穗的列车，然后向汕头地区的“叛军”进攻。换言之，李济深希望我进攻抵达汕头的“叛军”，他知道我部能对付叶挺。

作为粤人，我当然很乐意遵命南归，我们也愿意协助李济深“剿共”。甚至他若不请我南归，我也会继续“追剿叛军”，南昌暴动是我的直属部下闯下的大祸，为此我深感不安，所幸那时蔡廷锴已经离开叶贺。我感觉，如果我“追剿”叶贺，那些被胁持的部队很可能会阵前反正。然而，如果李济深不让我回广东，我们就只能独自行动了，广东毕竟是在他控制之下的。

甚至，如果叶挺不向广东进军，譬如去了福建，李济深仍会要求我南归，因为他担心叶挺最终仍会攻打广东，我们南归可以增强他的兵力。此外，李济深与我本是同根生，他认为邀我南归是上策。总之，南昌暴动使得我们回粤，否则我们回不了。

陈可钰建议，在部队出发前，我和他先赴上海。我同意了，因为剩下问题只是部队到韶关这一短途行军。但是另一个问题出现了，蒋先生在南京掌权，我怎样在他眼皮底下绕道上海南下广州。我问陈：“我怎样安全通过浦口与上海？”他说：“蒋先生正准备辞职。”这出乎我意料。

1927年8月13日，蒋先生宣告下野。此举促成了宁汉合作，桂系控制了南京。蒋先生怀疑何应钦与桂系军人勾结，逼他下台。但是，何应钦最终没能控制第一军，控制了第一军的是蒋先生。是桂系而非何应钦逼迫蒋先生辞职。但是何应钦看到形势不利于蒋先生，就没有反对桂系逼宫，这就是下野的真相。

我对陈可钰说，我们应该支持汪精卫。他说，这没有问题，李济深不会成为汪精卫的对立面。所以我接受了李济深的邀请。我们的南返决定呈请了汪精卫并得到批准。

在回武汉的途中我解散了骑兵连。它本是由骑兵团缩编的，因为马匹在华南多山的地形中没多大用处。我把它们分配给高级军官。

我把富双英的第二十一师（隶属第四军）划归给唐生智部。因为富双英是东北汉子，我觉得他的部下不适应在华南服役，他们怕爬山。在九江，他们已显露出这一弱点，有些人见到庐山竟大哭起来。他们简直不习惯在山地背负装备行军。此外，二十一师的兵员不足。

我同唐生智分家。他对我说，他希望我把这个师拨给他。富双英是北方人，不想跟我到华南去。不过，我把有用的李恒华炮兵团留下了。

现在我指挥三个师：十二、二十五、二十六师，总共约2.2万官兵，其中包括运输兵。政府拖欠我们120万元军饷。但这不要紧，我在储金中拨款支付军饷。

我把部队交给黄琪翔与朱晖日，同陈可钰一起去上海。到了上海，我俩搭乘最快起航的一艘轮船去香港，然后转赴广州。

到了五羊城，我问薛岳，上海发生了什么事。【他告诉我，他不反对逮捕共产党，但是反对枪杀他们，因而被逐出了第一军。】于是他来广州看望李济深。作为粤籍人氏以及前粤军第一师师长，他回穗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李济深收容薛岳也同样是很自然的事，就如李要我回穗一样。薛岳被任命为李济深第八路军暂编第一师师长。暂编第二师师长是黄慕松^①，他的堂弟黄镇球曾任第四军后备团团长，那时任暂二师副师长。

暂一师、暂二师、陈济棠的第十一师以及徐景唐的第十三师，组成了第八路军。李济深、薛岳、陈济棠、徐景唐和黄镇球都在粤军第一师服务过。

第八路军的部队驻扎在哪里？暂二师有一个团驻在海南，该师其余部队驻在西江地区；第十一、第十三师驻扎在东江地区防御叶贺“叛军”来袭；仅薛岳的暂一师充当警卫部队，第八路军的部队驻扎在广州。

我要薛岳去游说李济深支持汪精卫。我俩断定，虽然李济深是广西人，但长期在广东，是第四军元老，我们能从感情上接近他、劝说他。我们要求李济深支持汪精卫，邀请他来广州领导我们的革命事业。我对李说，如果他支持汪精卫，我们就支持他。他答应了。在那次谈话中，还有陈可钰在场。

李济深既不真诚又不坦率。他虽然答应，但我察觉到他并不心口如一，因为他正在同桂系接触。桂系和老一辈的西山会议派结盟，然而汪精卫同那些老家伙斗争已久。李济深是桂系的后台。考虑到李济深的地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军事厅长、国民政府委员、军委会委员、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广东省政府主席，他是桂系的精神领袖，李宗仁则是桂系的实际领袖。如果李济深真能支持汪精卫，桂系便难不倒我们，广西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也会支持汪精卫。

我觉察到李济深欠缺高尚的信仰。他说要支持汪精卫，只不过是一种谋略。首先，他要我回师广东，只是因为他麾下的部队不是贺龙叶挺的对手。一旦贺叶挥戈

^① 黄慕松在广东黄埔陆军小学做过张发奎的教官。后来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回国后在中俄界务公署任职。北伐开始后，李济深要他回粤，他入粤军总司令部任编审委员长，兼黄埔军校高级班副主任。



陈济棠

直捣广州，桂系部队不能增援他，事实上桂系主力都离开故乡参加北伐去了。

薛岳与我去游说陈济棠和徐景唐。他俩不表态，但我们感觉他俩屈从于李济深，他们历来都顺从李济深。我不敢跟黄慕松提起这个话题，我对他的堂弟黄镇球谈过，我们之间无话不谈，他赞成我的建议。

除了第十一、第十三师，黄绍竑率领桂军偕同几支南京部队奉命开赴东江地区“剿共”。在南京的部队中有个北路总指挥兼新编第一师师长钱大钧，他早先在粤军当过第一师少校参谋。

“叛军”开往汕头，一路上打着我的旗号。在9月24日至30日叛军占据汕头期间，贺叶并没有接触过我。

那时我的部队已抵达韶关，时维9月杪。8月20日部队从南昌启身时，我已命令他们停留韶关待命。他们到达后，我接到报告说教导团内有共产党员，我下令将这些人缴械，教导团没人抵抗。

10月3日，叛军在潮汕地区汤坑被陈济棠部击溃，^①按理，我部不需要再进军东江地区，也就不必下令向广州进军。但是我坚持南下，因为唯有掌控广州才能取得政权，把汪主席请回来。我对李济深说，我部必须到广州整编与训练，他不得不同意了。为什么？因为我部比他的第八路军强得多。我指挥三个师，薛岳也站在我一边，这意味着我有四个师，而李济深只能控制三个师。此外，第四军因其战斗力而受到民众赞美——我们是铁军，我比他更为声名显赫。

我在广州设立了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10月18日李济深以撤销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换取我撤销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这样，两个总指挥部都撤销了。

考虑到原二方面军参谋长谢膺白无事可做，我们安排他接替李济深的亲信，担任广东省政府农工专员。我把十一军的剩余部队合并到第四军，归黄琪翔统率；十一军军长朱晖日调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我让缪培南的第十二师驻扎广州，李汉魂的二十五师驻在东江地区惠州石龙一带，许志锐的二十六师驻在韶关。李恒华的炮兵团驻在广州市郊。虽然在南归途中有些士兵开小差，但我仍对该团印象良好，士兵们刻苦耐劳。不过，他们仍然不习惯穿草鞋，也不习惯爬山。我们南方士兵——湖南、广东、广西士兵在山区健步如飞，比北方兵敏捷活泼。诚然，北方士兵个子大，但这使他们比较迟钝。在南归途中，其他部队有些人开小差，但不多。

我命令教导团进驻黄埔，在那儿施行了政治审查，结果澄清了以前的疑虑。我把结果告知教导团团长江树松，他很满意。我相信该团已经摆脱了共产党的影响，便把武器发还给他们。我思忖，该团原有的共产党员在南昌暴动发生后便从

^① 汤坑镇属于广东丰顺县，据黄霖回忆，贺、叶两军在此伤亡3000多人；据叶挺报告，剩下2000人、1000支枪。

九江离开我部了。

叶挺释放了扣留的欧震与古勋铭，我知道他们没有附逆，便让他们归队。

那时我们的公积金积累了几十万元。到了广东，有李济深提供军饷，我们便不必挪用公积金了。邹敏初代替冯祝万任财政厅厅长。我们不放心冯，他是李济深的亲信，可能会把广东省政府的库银私下输送给广西。广东是富裕的，它是革命策源地，广西却很贫瘠。

省府里都是粤籍人氏，广东人存有一种封建观念。此外，李济深有许多粤籍同学，所以，是广东人而非广西人滋养了他。李济深在第八路军没有任用广西干部，他的部队是清一色的粤籍官兵，他无法在第八路军安插广西人氏。

当李济深表现得不诚实时，我们光明磊落。事实上存在着矛盾现象：李济深是广西人，却从未在广西任职；他看上去像个广东人，但作为广西人，他想帮助他的桑梓。我们很难改变他的封建观念。

虽然李济深为了自身利益需要依赖第四军，但他并未善待第四军。每逢后勤补给等事务，他就会偏向广西的部队。天气转冷了，李济深先把棉军服发给广西部队，然后再发给自己的广东部队。我不想谈他对我部的态度，他的广西意识远远超过他的第四军意识。

我渐渐确信，李济深正涉入协助桂系夺权的阴谋。薛岳与黄镇球同意我的见解——那些广西军人正在策划一项阴谋。

1927年9月15日，在南京设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推定宁、汉、沪（西山会议派）三方委员。但汪精卫不愿加入这个特委会，他认此为非法机构，要我们反对它。他想在广州成立一个与南京的特别委员会对抗的政府。他希望团结他的支持者重回广州。作为汪的支持者，我们通电指责中央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职权，在国民党党章上毫无法理根据，要求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中央监察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这就是第一次护党运动。

汪精卫要李济深公开谴责中央特委会并支持他本人。如果李济深同意这样做，汪就可以回广州了。1927年10月2日，李济深与我致电汪精卫，表示我们不承认中央特委，并邀他回穗。事实是电报仅仅说我们邀请汪来广州，并未提及特委会。薛岳与我呼吁李济深加入我们的行列，联名通电反对中央特委。我们希望电文既反对特委会又支持汪精卫。薛岳为此当场流泪，可是李济深拒绝签署这份电报，他说我们必须等汪精卫返穗后再讨论特委会问题，他只同意邀汪回穗。

10月6日我发出另一封电报谴责特委会。汪用密码给我发电报说，我们必须通电谴责特委会。

由于李济深拒绝通电谴责特委会，汪精卫派遣陈公博到广州传达他的想法：他要领导国民党员到广州设立一个政府，以对抗南京方面。我记得最重要的是从头至尾我们反对南京方面。这就是广州事变的背景。

许多分属国民党左派的党员跟随陈公博回到广州，其中有顾孟余、甘乃光；伴随陈公博的是汪精卫的主要助手。当时有一流行语“顾陈甘”。何香凝也来

了。陈公博则一再派人去汪精卫处“迎驾”。

【此时李汉魂之二十五师赴东江解除李济深部第十八师师长兼惠州警备司令胡谦所部武装，我们认为此人是反革命，很不可靠。他是倾向南京方面的。他是江西人，在蒋先生那儿做过北伐讨贼军第三军军长、中央军需总监、黄埔军校教育长、东征军总指挥部参谋长等。逮捕他是以贪污罪名^①，李济深要把他押回广州接受军法审判。我们不能拒绝这一指令。然而我明白，把他一送回广州，李济深就会开释他，他必定会报复我们。故我批准李汉魂在押解途中枪毙了他，对李济深则申报胡谦在途中企图逃跑才被击毙。】

我们计划如何同唐生智配合呢？唐生智与我都支持汪精卫，可是汪信任第四军甚于信任唐。唐与汪各怀鬼胎，都想利用对方。我们计划当第四军夺取广州政权时，由唐生智攻占南京，至少要攻占武汉。

10月20日，南京方面下令西征讨伐唐生智，由李宗仁率江右军溯江西上，白崇禧任前敌总指挥。21日，唐生智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宣布与南京国民政府脱离关系。黄绍竑在是年底上海举行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第四次会议预备会上对中央监委所作报告称，10月18日成立的广州政治分会临时军事委员会于23日决定与南京取一致态度，派部队讨伐唐生智。这是李济深的态度，他是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我也无可奈何。不管怎么说，他派李福林部北进，没有调派我的部队。

10月29日汪精卫到广州后，在日本的蒋先生派宋子文（同年12月宋美龄与蒋在上海结婚）到广州，虚情假意地为李济深丧母表示哀悼。事实上，李母已经死了一段时期，在我9月21日回穗之前就去世了。宋子文的真实使命是同我们接触，希望我们欢迎蒋先生抵穗，他建议蒋汪结盟。北伐前我在广州、北伐途中、武汉都与宋有来往。蒋派他来是因为宋与陈公博等左倾人士熟络。

【蒋先生在东京曾经蒙受很大的屈辱。在旅日华侨欢迎会上，他被陈道行与翁照垣痛骂了一顿。陈道行原来在粤军许崇智部第二师任团长，翁照垣是陈炯明旧部。蒋先生不想待在日本，可他已失去南京政权，这就是他想来广州的原因。】

李济深同我们商量这件事。【我们中间无人希望蒋先生来。】我们对宋子文说，蒋先生暂时别来了。【薛岳与我是反蒋的。】于是宋子文走了。

我不知道汪精卫有没有决定同蒋联盟，他什么也没对我们讲，也不肯详细告诉我们他的政治计划。设若他告诉我们他想同蒋先生合作，我们会接受宋子文建议的。

南京方面打电报邀请汪精卫李济深北上，我对汪精卫说，我们无法说服李济深，就不得不推翻他了。我建议召集会议，邀请黄绍竑李济深出席，在会议期间逮捕他俩，解除他们卫兵的武装。这样，我们就可以迫使桂系听从我们。换言之，我鼓吹以激烈行动在南方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汪精卫不接受我的建议。他拟订了以下计划：他和李济深经香港去南京；我

^① 据李汉魂部下二十五师七十四团参谋长李明在《李汉魂枪杀胡谦始末》一文透露：从胡谦家里搜获白银与烟土各十余万两，价值不下数百万两。这都是胡谦从惠州民间搜刮来的，李汉魂因而发了一大笔横财。

以出洋为名辞职，财政局送我五万大洋；汪与李离开广州后，立即逮捕黄绍竑。大家都同意这一计划，我不得不接受了。

第五军军长李福林态度没问题，他和我都是朱执信的老部下。另外，他没有很强的实力，他和以前一样，只想控制河（珠江）南。

根据我们的计划，我提议将军权交还李济深，自己出洋，条件是李济深同意支持汪精卫。这是一个烟幕弹，大家各怀鬼胎。李济深中计了，他下令财政局给我五万大洋充当出洋经费。我说，我要去香港安排旅程。这样，李济深就不必提防我了。如果我留在广州，虽然我已交卸一切政军职务，但在他赴南京期间，人们都会以为我代理他的职务。他临走前，招黄绍竑到广州代理政治分会及临时军委会两主席职务。

我去香港是在11月13日，李济深、汪精卫去香港是15日，同一日黄绍竑自邕抵穗。

16日晚，我离港返穗，是17日拂晓抵达广州的，那时政变已发生，我部黄琪翔军，会同李福林军及薛岳师在午夜解除了李济深驻穗部队的武装，第一次护党运动宣告成功。可惜黄绍竑闻风（按：原财政厅厅长冯祝万通风报信）先遁，捕黄挟以缴西、北江桂军枪械之计未遂。

我出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临时军委会主席。我们有时开会，这个临时军委会事实上只是个名义。

陈公博在广州主持政务，他接收了李济深的广州政治分会主席职权，兼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甘乃光接掌广州市市长。

汪精卫在这一政变中幕后决定一切。他期望我们在广州稳住局面后，同其他政治集团保持联系。如果政变失败，他可以假装什么也不知道。政变发生时，他正和李济深一起乘坐开往上海的轮船。政变消息传到船上，他假装大吃一惊，他对李济深说，事先没发生任何迹象，用一句粤语来说，就是“食死猫”。人们将会断言广州事变是我张发奎策动的阴谋，以此载入史册。我很坦白地说我们军人实在是政客的牺牲品。

事变以后，我们建立了独立团，由李济深的部下莫雄任团长，薛岳的新二师被扩编为第四军教导第一师，就这样薛岳投入了第四军。

黄慕松对我说，他同情我们，相信我们做得正确。然而，鉴于他同李济深的私人关系，他不能公开支持我们。他强调这一事实——是李济深要他来广州的，于是他辞去预二师师长，把职务移交给任副师长的堂弟黄镇球。这个预二师和韩汉英的省防军第二团合并，改编为第四军第二教导师。就这样，我掌握了五个师。

我们仍然要对付驻扎在东江地区的陈济棠第十一师和徐景唐第十三师。我们希望说服陈徐二人加入我们这一边。我感到他俩迟早会倒向我们，因为他们的军饷出自省城。可是，我们仍然要派军队去东江地区防备他们。由于黄绍竑逃亡成功，他的部队驻扎在西江地区，我们又得派部队警戒，还得抵御来自粤西南的进攻。如此这般，我把大部分兵力调离广州，只剩下教导团、两个特务营、炮兵

团、兵工营以及其他军部直属单位。

当时叶剑英是第四军参谋长，教导团团长仍然是杨树松。可能我确实想调叶剑英去主掌教导团，因为杨树松已多次请求我批准他辞职。我曾在韶关缴了教导团的械，他感觉我不信任他。我劝他别走。同时，我也同一些高层同事咨商，如果杨坚持不干，我们怎样善后。我们决定把叶剑英作为教导团团长的后备人选。



叶剑英

第一特务营成立已久，该营负责拱卫第四军军部与广州的军械库，营长跟随我多年了。第二特务营刚刚成立，营长是梁秉枢，他从当排长时就跟着我。我把军官们安插到这个营，计划再设立一个营，让三个特务营并成一个警卫团，预定梁秉枢任警卫团团长。

事变后，我的妻子来到广州，我俩人住坐落在东山的黄琪翔公馆，暂时居底层。那段时期我俩收养了琼芳——我的妹妹与华文治刚诞生的女婴。

广东省财政厅给我五万大洋作为出国旅费，但没成行。我想把这笔钱给了陈可钰。原因很难解释，那是出于个人友情。他很穷，我又不需要这笔钱。但我发现只剩下三万元钱了。原来是广东省财政厅厅长邹敏初瞒着我教我妻子花两万元钱在香港跑马地乐活道买了一处住宅，邹买了邻宅，另一位邻居乃是陈炯明。我将剩下的三万元给了陈可钰。

这一段时期，共产党有没有接触过我？黄琪翔左倾，他同情共产党，支持邓演达继续同共产党合作的政策。他跟共产党接触过，还常常告诉我：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已抵达广州，他们对我印象良好，想见我。那是些什么人？我问他，但他不肯告诉我，也不告诉我这些人住在哪里。我不能有效地追踪这个话题，只有一个办法才能逼他讲出来，那就是逮捕他。

我训斥黄琪翔，我说共产党不可以再骚扰我。就我而论，我们的政策是分共，如此而已！^① 他想向我解释他的观点，但这只是枉费心机。即使他左倾，他也明白第四军不听他的，所以他从来不反对我。我能举出几件事证明，在广州他

我训斥黄琪翔，我说共产党不可以再骚扰我。就我而论，我们的政策是分共，如此而已！^① 他想向我解释他的观点，但这只是枉费心机。即使他左倾，他也明白第四军不听他的，所以他从来不反对我。我能举出几件事证明，在广州他

^① 据谢膺白回忆：广州暴动平息后，张发奎在东山寓所酒后对二方面军参谋长谢膺白说：“7月份我们不肯执行武汉政府分共政策，准备集中九江、南昌，东征（南京），仍维持国共合作局面；9月回广州仍不执行分共，遭宁沪两方面斥责。我们一向认为共党的敌人是蒋介石、李济深，绝不是我们反对分共的第二方面军，但此番共产党发动广州暴动却把我们第二方面军也视为敌人，一律加以摧毁。我至今想不通，这岂不是黑白不分吗？”言下不胜叹息。

从未做过违抗我命令的事：有一天，他说共产党派人来拜访我，问我肯不肯会晤此人。我问：“是谁？”他答：“恽代英^①。”我确实认识他，他是很重要的共产党员。黄琪翔说，南昌暴动被击溃后，恽和许多同志逃到香港，他这次是秘密来穗。我回答说可以见他，问他在哪里，黄喊“上来”。这表示恽代英住在黄琪翔住宅的一楼，毫无疑问，没有黄琪翔的同意，恽住不进来。

恽代英同我谈了不少，仍然要我同他们合作，换言之，他在重复执行邓演达的方针。我对他说：“我在广东主政，你们共产党别再骚扰我！在我这方面，我不会加害你们。赶快离开广东！别骚扰我，我也不会害你们！”我没有扣押他。我与共产党之间不存在个人仇恨。他知道我从未杀过、抓过共产党，除非他们参与暴乱。我对他说：“让我独自留在广东吧，你们把广东视为革命基地，我们也要在广东实现理想。”他接受我的观点，答应不再打扰我。除此外没有其他共产党人在广州同我接触。

据龚楚在《我与红军》一书中说，“叛军”溃散后，朱德率部加入了驻扎韶关的范石生部，他用了假名“王楷”。朱与范是云南讲武堂的同学，范石生庇护了朱德，也收编了朱德的千余败卒。他任命朱德为第十六军的团长。范石生名义上隶属于李济深部。

1927年12月9日、10日，汪精卫打来四封电报，要求对共产党员廖尚果等采取行动、查抄广州苏俄领事馆、驱逐苏俄领事、撤黄琪翔职等等，我总是听从汪精卫的，我为黄琪翔撤职作了准备。他知道这事，但不能不服从我。朱晖日唾骂他，谴责他为匪作伥，说我们首先应该毙了他，他俩好像两弟兄吵架，我叫他们冷静下来。



恽代英

我想打发（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尚果走，以为他不是共产党员，可是倾向邓演达，一般认为他的政治立场同黄琪翔相似。

下一步是准备查抄苏俄领事馆。朱晖日查抄了人力车夫工会与印刷工会等，搜出了一批枪械，抓捕了一批人。于是他们提前两天暴动。

12月11日拂晓，谢膺白打电话到黄琪翔公馆，他报告我，已经听到炮声，据他下属电告，共产党发动了一场暴乱。他叫我赶快逃，电话突然中断了，我猜想电话局一定被占领了。

我没有预估到这场暴动的发生。机器工人工会早先给我们提供了共产党活动的情报，我们也通过搜查，取得情报。从这些资讯，我知道共产党正在煽动闹事，但我不了解他们的行动计划。我认为，在他们暴动之前，我们能救平骚乱。后来我们逮捕了一大批人，才知道他们订下了暴动日期。

^① 恽代英（1895—1931），湖北武昌人，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教官。1927年当选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参与领导南昌起义与广州起义。1930年被捕，翌年牺牲。

听了谢膺白的电话，我上楼叫醒了黄琪翔，我叫妻子快到我妹妹家去。整个暴动期间她都匿藏在那儿。黄琪翔与我一起去看望陈公博，他也住在东山。我们把他从床上拖起来。然后我们三人去大沙头看望广州市商会会长邹殿邦。邹有一艘汽船。我们同他一起乘船到河（珠江）南找第五军军长李福林。



李福林

到了河南，我命令江防司令冯肇铭控制住珠江，亦即保卫河南，不让暴动者过河。听到炮声后，冯与他的部下已经出动炮艇巡弋珠江。那时战火尚未波及。

我要求李福林拨给我一个营去夺回广州，我要黄琪翔指挥这个营。为什么我认为一个营就足够了？首先，因为共产党依靠的印刷工人及其他行业工人都没受过军事训练，他们只是一群无组织的乌合之众。我认为第一特务营不可能被共产党利用，因为该营营长是我的老部下；第二营也不会出格，^① 该营员额不足，枪支很少；我只担心教导团。但我估计，该团至多仅有一部分人会被共产党利用。其次，我计划返回市区亲自督导平乱。

除了一个营，我没有向李福林提出更多要求，然而他拒绝了我的请求，他说他的部队的职责是保卫河（珠江）南，故我们只好寻找自己的部队去夺回广州。

河南是李福林的势力范围。在整个北伐期间，他一直留在后方保护他的领地，无论如何他都不愿放弃这棵摇钱树。另一条理由是他不信任黄琪翔。他是个粗人，毫无顾忌地用脏话唾骂黄琪翔，指黄是共产党。我说黄琪翔不是共产党，他说他不相信。

黄琪翔确实不是共产党员，但骂他左倾却不过分，他受邓演达影响太深了。他要为广州暴动担负很大的责任，倘若他不是左倾，恽代英就不能潜伏在黄公馆策划暴乱。另外，他早应向我报告共产党的动静，但是我问他时，他回答说 he 什么也不知道。就如我已经说过，除了邓演达一人，他没有向我透露其他潜入广州想策反我的共产党员姓名，毫无疑问，他知道得颇多，却对我守口如瓶。我也被人们怀疑左倾，我没法自辩。汪精卫领导着国民党左派，我只是支持汪精卫而已。

在河（珠江）南，我们可以看到广州市区沉浸于战火，一面红旗在第四军政治部上空升起了。我们听到号炮声，确认这是第四军军部与其他机关发出的。

我要求李福林的亲戚、煤炭与船务商人谭礼庭到沙面去发电报给我驻在东、北、西江地区以及粤西南的部属，命令他们返回广州镇暴。鉴于共产党佩戴红带，我下令我部官兵佩戴白带。我们不能进入沙面，因为外国人不让我们进去。谭礼庭却能进去，因为他和英国人关系不错。

^① 据《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称：“警卫团团团长梁秉枢和一些主要领导骨干都是共产党和倾向革命的人。该团第三营的士兵大部分是原省港罢工纠察队的工人。”

陈公博和我借用谭礼庭的船驶向西江地区肇庆。那晚驶近肇庆时，我们偶然遇到许志锐及某部属。他们接到我的电报，已经起程向广州进军。

次日凌晨，我们抵达江门（按：离广州约50公里）。在江门以北、西江与蓬江交汇处的北街镇，我发现薛岳教导第一师副师长邓龙光，他闻讯从粤西南赶来。他的部队已准备好上船回穗，可是他们没有钱。我向江门商会要了3000元。第四军从来不向老百姓索要，这是我个人的借款。

我回到河（珠江）南，等待邓龙光部开来。此时，莫雄率领独立团以及薛岳部下一个团和从北江地区赶了回来。12月13日早晨起，我的部队陆续抵达广州，各支部队从各个方向进攻广州，暴动部队便支持不住了。当天黄昏，枪战停止了。暴动者向龙眼洞逃跑，在那儿遭到莫雄部堵击。暴动自11日晨至13日止，为时只有三天便被完全扑灭了。

在镇暴过程中，李福林的部队偕同我部一起渡江到了西关。设若他肯拨给我一个营，我们一定能在暴动当天就夺回广州。

当时英美日的炮舰没有炮轰广州，列强是不会帮助我们镇压暴乱的。就如我已说过的，我甚至连沙面都进不去。美、日、法的海军陆战队士兵有乘炮舰登陆沙面，但他们仅仅是保卫沙面的洋人住宅区，可是共产党没有攻打沙面。

回到广州，我才知道这三天内发生的一切事：

叶挺进入广州出任工农红军总司令，其主要成员由部分教导团人员和人力车夫工会、印刷工会会员组成。共产党人把杨树松与五百多教导团官兵视为死硬派，把他们缴械捆绑囚禁。^① 缴下的武器分发给工人。这证明了，教导团只有一部分人参加暴乱。^② 杨树松被五花大绑后，叶剑英控制了教导团，自任团长。

据第四军参谋处长薛炼说，暴乱开始时，叶剑英率众企图冲进设在中央银行隔壁的肇庆会馆之第四军总部，他坐了我的装甲汽车，他的副官宣布第四军军长黄琪翔来了，叫哨兵别开枪。薛炼不许叶剑英进入，并下令开枪。虽然军部仅一个连留守，但仍坚持抵抗。好了，这就是我们怎样得知叶剑英是共产党员的。

缪培南在第十一师后方留守处，他只有一个排的士兵，还竭力阻挡共产党进入。各师的留守处，兵力都只有一个排或一个班，共产党暴动分子屡次攻击，却都未攻占，第四军军部亦未被占。^③

当暴动者进攻广州市公安局时，朱晖日仍在工作。他在士兵戒护下，攀墙突

① 据1928年1月4日的《鲁干庭关于参加广州暴动工作的报告》称，暴动部队“先将张发奎派来的参谋长、代理教导团团长朱芳勉从梦中绑起刺毙，并将各连反动分子约四五十人拘禁”。

② 第四军教导员有1300余学员，其中200多人是中共党员。

③ 据共产党所散发的传单称：“工农兵联合的革命实力，经过一次英勇的斗争，夺取了广州的政权，大部分留守广州的兵士都在红军指挥之下，造成了这次的暴动。十二月十一日晨四时，五千工人赤卫队占据了公安局，缴了公安局保安队的械，释放了一切革命的政治犯，随即由一队队的兵士、一营营的赤卫军用手枪、炸弹、长枪等占据了一切反动政府的机关，许多革命军队占据了广州市内一切军事要隘，现在他们已经占领了第四军军部、广州卫戍司令部、公安局、省政府、财政厅、军事厅、国民党省党部、电话局、电报局、电灯局、邮政局、中央银行、粤汉、广三、广九三车站，其他次要机关尚在肃清中。”



廖培南

围。他的汽车司机——一个潜伏共产党夺了公安局的大印。暴动者缴了公安局保安队的械，杀了一批高级警官。^①军械库守军只有一个班，由一名姓陈的连长统领。仓库失守前，他点燃了炸药，全体官兵与仓库同归于尽。特务营营长梁秉枢暴露了共产党员身份，当暴动开始时，特务营有两个连分驻各处守卫，梁身边只有一连人，他自忖无力唆使另两个连叛变，便叫身边那一连官兵向暴动者缴械投降，武器则转发给工人赤卫队。暴动被救平后，梁秉枢逃走了。后来，共产党开除了他，他加入了蓝衣社。

第一特务营忠贞不移。该营并没有受到攻击。炮兵团与工兵营也未受攻击。^②他们没有参加镇暴，因为没人指挥他们下一步行动，他们与其他部队也失去了联系。

廖尚果在第四军政治部升起红旗，所以畏罪同“叛军”一起逃走了。然而，有人告诉我，在政治部升起红旗的不是廖，而是他的下属。

暴动失败后，叶挺和叶剑英并未指挥“叛军”冒险继续作战。当他们的同志被我军围攻时，他们两人躲藏了起来，后来化装易服，偷偷逃到香港去了。^③

一部分暴动者躲藏了起来，我们搜查住宅，抓捕“红带友”。他们为什么不摘除红带？有些人摘掉了，但他们不察觉自己头颈里留下了红色染料的污迹。我们发现杨树松等被俘者戴着脚锁，我们自然不会伤害他们，但我们理应处决教导团中所有的“红带友”。我听说其中有些人大叫：“国民党万岁！张发奎万岁！”其中有些人仅仅因为佩悬红带就被检控为共产党。事实上，在暴乱中追随共产党者，根本不需要以一根红带来标明自己的真实身份。

在燕塘龙眼洞一带，我们捡拾了六具俄国人的尸体，每人都佩悬着红带。你要明白，隐藏在东山俄领馆的一批俄国人策划了这次暴乱。当我军到达时，这六

① 据谢膺白回忆：警察总队队长李作明被击毙。公安局职员与警察总队官兵被打死很多。十二师留守一个排顽抗。太平沙陆军仓库久攻不下，暴动者乃用火攻，从大南门南胜里延烧至海味街、泰康路、永汉南路、南堤大马路、二马路、太平沙通津、回龙里以及其两旁的内街，逼近肇庆会馆。

② 据鲁干庭报告说：“待天明时，（暴动部队）将公安局攻克，沙河、燕塘一带的炮兵，亦于十一日上午完全缴械。唯四军军部及十二师师部与仰忠街军械处始终未能攻下，乃于十二日下午放火焚烧。是役夺步枪五十余支，机关枪十余挺，大炮迫击炮各数十尊，俘虏约两千人。”20世纪60年代出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崔庸健，广州暴动时任黄埔军校特务营二连连长。特务营200多人有朝鲜人100多人，他们大部分死于攻打沙河之役。

③ 对于这一役，叶剑英于1958年7月30日《人民日报》撰文说：“起义开始后不久，起义指挥部讨论了当前的局势，当时曾提出应该迅速停止枪声，建立市内的革命秩序。对一切尚未攻下的残余据点，应包围监视，在政治上瓦解他们，争取他们。应该以教导团为基础，迅速扩建军队，把工人赤卫队和教导团合编成立三个师，将战线推往郊外，发动农民，组织农民队伍，以便迎击前来增援的敌人。大家认为这些措施是正确的，可惜时间不容许我们这样做。敌人在帝国主义军舰帮助下进展很快，我们还来不及在市区内建立革命秩序，来不及以教导团为中心扩编武装力量，更来不及把战线推到郊外，敌人从三面围上来了。从江门赶来的薛岳部，从韶关赶来的许志锐部以及从石龙赶来的李汉魂部，很快又占据了市内主要据点，在敌强我弱情况下，经三昼夜奋战的起义部队，不得不撤出了广州。”

个俄国人来不及逃回领事馆，就跟随“叛军”逃跑，最终被我部下抓获处决。

处决外国人是违反国际公法的，我们向中枢报告，那些俄国人在是指挥暴乱时被击毙的。我们不能据实申报他们是被俘后再枪决的。当时我们都很年轻，我们痛恨俄国佬。坦白讲，设若我缺乏修养，我也会亲手杀死那些俄国人，我当时愤怒极了。

暴乱初起时，薛岳正在市区，他在家里躲了三天，当他的部队回穗时，他出来指挥。【在平暴时，他特别残酷无情，他对共产党显露出刻骨的仇恨，毫不怜悯，杀人绝不犹豫。以前他总是保护共产党员，如今却发生180度的转变……】薛岳的部下进入东山苏俄领事馆时，领事馆职员正在焚烧重要文件。见到这些文件时，他极为震怒。士兵们救了火，缴获了大量文件，薛岳把文件移交给我，我呈交给中枢。12月14日国民政府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

【薛岳逮捕了俄领馆若干涉嫌组织与策动叛乱的人员，还将他们押上街头游街示众，随后下令枪决了苏俄驻穗副领事哈西斯等三名主谋。此举自然是罔顾国际公法，他想枪毙所有抓获的俄国人。如果没有我阻拦，他一定会枪决苏俄领事夫妇及其两个孩子。他要押他们游街再予处决。但是，这一切必须向我请示。】薛岳把俄领事夫妇与两个孩子押到第四军军部，我对俄领事略加安抚，表示我会保护领事馆。【我反对枪决领事全家，因为这么做后果极为严重。押他们游街后枪决同在龙眼洞平暴中枪决是不同的。】扣留这一家四口数日后，我释放他们，让他们去了香港。

我已记不得暴动主犯、广州苏维埃政府代理主席兼海陆军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张太雷毙命的详情了，^①事实上我从不认识他。

李福林杀了想逃往香港的一家人，他们都佩悬红带。当时有些人担心共产党加害，所以佩悬红带，他们也希望凭借红带就能顺利获准搭船赴港。我有没有误杀共产党员？这是难免的，也是迫不得已的错误。

有多少人死于暴动与平暴？我估计有五六千人，^②老百姓和军警受伤的都不多。

12月17日，汪精卫宣布辞职。他不想为暴动承担任何责任，害怕火烧到他自己身上来。他的辞职电文又提议召开中执委第四次全体会议、废止中央特别委员会，还公然谴责我们，然后去了法国。这就是政客们的权术。

李济深知道陈可钰同我关系很好，就派他来同我讲数，他答应既往不咎，也不会同我开战。交换条件是我辞职，把广东交还给他。李济深规定，第四军必须到惠州集中沿东江开往江西，陈可钰保证我的人身安全。他像南昌暴动后那样，充当了中间人的角色。他相信李济深说话算话，李是他的挚友。

当时陈铭枢第十一军的蒋光鼐师和蔡廷锴师从福建南下广东，由李济深任总指挥的东路钱大钧师和陈济棠师由粤东直指广州，从香港辗转广西的黄绍竑率领桂军自西向东挺进，徐景唐第十三师则从南路逼近广州，迅速形成东、西、南三

① 张太雷是暴动的第二日在巷战中被枪杀的。

② 据《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称，在12月13日后的五六天，有5700人被杀。

面合击的军事态势。我召集会议，大家都认为事态严重，我们别无选择，所以诚意接受了李济深的条件。对方答应讲和，但第四军必须离穗参加第三次北伐。

汪精卫同意这一安排，因为他觉得没有选择余地。他告诉我们，最好离开广东参加第三次北伐。他和蒋先生接触后，叫我去找蒋先生商讨第四军的前途。那时蒋先生想利用汪精卫。

12月22日，我辞去广州政治分会临时军委会主席职，黄琪翔也引咎辞职。当时陈公博任政治分会主席，我们是自己辞职的，我们对广州市民遭遇的这一场浩劫深感歉疚。我错在粗枝大叶，把军队都派出去警戒，造成广州防务十分空虚，再加上麻痹大意，为暴动提供了良好机会。考虑到广州是我们的发源地，我本应留下一些战斗部队的。倘若我留下一个师，共产党绝对无胆量在广州造反。

缪培南接替黄琪翔任第四军军长，薛岳任副军长。我叫黄镇球命驻守海南岛的团长叶肇率部回师广州，他不服从，因他支持李济深，我们也无计可施。

我和陈公博留在广州，直至我们目睹最后一批第四军部队离开大沙头车站。然后我俩去了香港。12月26日缪培南等将领在率部离穗候命参加北伐的通电中说，离穗北上的决定是我与陈公博离穗赴港后，于12月22日由第四军的将领们作出的。他是故意要造成这一种印象：我已经离穗，第四军已经同我脱钩。这是陈公博出的主意。

26日，第四军新任正副军长缪培南、薛岳通电欢迎陈铭枢回粤主政，这又为了什么？是蒋先生希望陈铭枢率领蔡廷锴带出去的部队回返广东，陈铭枢当然是蒋先生的支持者。



黄镇球

在广州暴动后，广东省政府与南京政府都对第四军停发军饷，我们完全依靠存在香港、上海的公积金维持军饷。根据当时美国驻广州领事休斯敦的一份报告，我与我的支持者从广州中央银行运走了几百万银元^①，我还想汇50万墨西哥银元给在上海新婚燕尔的蒋先生。真相是陈公博向广东省财政厅厅长邹敏初要了20万银元，把这笔钱携离了广州。当时他兼任广东省政府主席，自然有权这么做。但他没占为己有，而是想用以资助我们支持汪精卫的活动。考虑到此举不合惯例，故他要我下令第四军签署一张收据，这笔钱佯称用作军饷。我当然同意了。但事实上第四军什么也没得到。省政府亏欠第四军太多了——我说不出精确的数字，按规定每师每月军饷是几万元。1928年1月4日李济深返回广州，他向中枢报告了此案，第四军声称这笔钱已花掉了，事实不是很清楚了吗？

接着，汪精卫的侄儿汪道源以及褚民谊被检控贪污公款，他两人是冤枉的。

^① 据邵仲池著《收购白银前后回忆录》一文（原载《南天岁月》，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3—314页）透露：1927年尾张发奎引咎辞职时，将中央银行广州库存的800万银元席卷而去，在香港与南洋开厂买地。

广州市长甘乃光是唯一的账目不清者——他离开广州时，从市财政局取走了16万银元。李济深对他下了通缉令，他去了美国。为此，汪精卫改变了他对甘乃光的态度。甘乃光是个投机分子，当廖仲恺在世时，甘十分左倾，对廖的女儿十分巴结。我们断定，甘对廖仲恺的兴趣多于他的女儿。果然，廖仲恺死后，甘对廖梦醒就失去了兴趣。

李济深毁弃了他的诺言。第四军在东江地区受到李部、陈铭枢部以及桂军的攻击，他们想消灭我军。我们失去了二十六师师长许志锐，1928年1月14日他在激烈的战斗中阵亡，黄镇球负伤，第四军遭遇惨败。



许志锐

陈可钰感到对不起我们，他收了我三万大洋，最后上了李济深的当。所以第四军不再按李指定的路线沿东江行进，而改沿北江、搭乘火车去韶关，然后向江西边界行进。这样就容易得多了，李济深在北江地区兵力不多。

第四军没有估计到要同李济深打仗，我们轻信了他的谎言，然而我们还是有所准备的。部队行军时哪怕在最普通的环境下也会派出警戒，这是我们念军校时就懂的。

轻信李济深是一个失着。如果我不听陈可钰的话、不辞去职务，我们的处境将是完全不同。我本该同我的部下在一起。倘若我不落入李济深的圈套，而是同第四军在一起，事情不会变得这么糟糕。缪培南的名望远不及我，长官在场与否，差异太大了。如果我留下来，我们会紧守阵地避免败绩。事实上薛岳比缪培南威望高，但我不能把军队交给薛岳，因为他刚加入第四军不久。

简言之，从这场悲剧^①中我吸取了两个教训：一是永远不要过分相信别人，二是同自己的部队在一起至为重要。更重要的是，倘若李济深支持汪精卫，或者汪精卫接受我的建议一举扣押李济深与黄绍竑，结果将会完全不同。

李济深回广州后，他和陈铭枢陈济棠以广州市民的名义在泰康路勒石立碑，上书“在汪精卫与共产党员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等领导下发生了广州暴动”，以此羞辱我们。

在同一时期，李宗仁指挥西征军打败了唐生智部。唐不能控制他的下属，官兵普遍厌战，故李品仙、叶琪和廖磊投向南京方面。所部被并入北伐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部，唐生智只好逃离武汉。

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主席李宗仁获授权治理湖北湖南两省，广州分会则治

^① 缪、薛所部在五华岐岭与陈济棠、陈铭枢部遭遇，结果两陈败北，缪、薛为之趾高气扬，高喊“活捉陈和尚，生剐陈瘟猪”——因陈铭枢曾入佛，陈济棠绰号“瘟猪”。缪薛率骄兵欲由老隆渡东江入龙川、河源一带，欲回击追敌凯旋广州，再图发展。不料徐景唐、黄旭初的追兵已至，于五华潭下恶战三日，缪、薛因伤亡过半和师长许志锐阵亡，被迫撤退。接着又在龙川贝岭再遭徐、黄所部重创，只好率余部二万多人经和平走赣南。

理广东广西两省。就这样，桂系控制了四个省。1928年1月杪，第四军越过粤赣边境后，忠于李济深的部队停止了追击。第四军在赣南安远集结，此时中央政治会议决议特任蒋先生为国民革命军北伐全军总司令，亦即蒋复出掌权。他通知我去上海，秘密会见了，我，答应保护第四军。他说，在下令第四军参加第三次北伐之前，他会让第四军有个休整的机会，我将此承诺传达给我的下属。

蒋先生是信守承诺帮助第四军的。他私下透过宋子文拨付军饷给我。在这段时期我常常见到宋，对他更为了解。他亲近陈公博和我，蒋先生要利用我们，在另一方面，第四军也要利用蒋先生争取生存，第四军的将领们也明白这是双方互相利用。我们知道蒋先生想培植第四军用以对付桂系。

第四军经龙川、五华两场恶战后，亟须休息整顿，但是【蒋先生又收回了他的许诺，】立即奉令参加第三次北伐，时维1928年3月杪。这是因为蒋受到桂系头子李宗仁和李济深的压力。这是蒋先生告诉我的，桂系希望消灭第四军。



许德珩

第四军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由国华银行董事杨德昭负责，同各方面联络。此时，我的三弟嘉斌被苏俄政府囚禁了。广州暴动时，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念书，校方开除了他。在回国途中，他在海参崴被捕，又被押回莫斯科，关押了一年左右。

我住在上海法租界，同我的北江地区同乡陈公博保持密切联系。奉汪精卫的指示，他用那广州带来的20万大洋开办了《革命评论》杂志，后来又创办了大陆大学。许德珩^①同其他汪系改组派的成员都在该校教书谋生。

汪精卫的支持者搞了个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参加者要缴纳会费、遵守纪律等等，外人称之为“改组派”。他们不喜欢被称为一个派系，却喜欢人们称他们为“左翼”，因为听上去更进步。我没有加入改组派。

顾孟余生性胆小，乃拒绝加入这个小组织。这就是人们称他“取消派”的原因。虽然他没加入改组派，但汪精卫还是信任他。

我同旅居法国的汪精卫保持联系，我们通信，也透过陈公博联系。

我感到有点压抑——李济深恨我，不择手段打击我。那时桂系位高权重。我对蒋先生说，我想去欧洲，他劝我留下来，说不必怕李济深。他说他会通过上海帮会

蒋先生说，我想去欧洲，他劝我留下来，说不必怕李济深。他说他会通过上海帮会

^① 许德珩（1890—1990），江西德化（今九江）人。1927年7月中旬由恽代英派遣，打入北伐军总政治部任秘书长兼代主任，9月初离任。1928年8月应陈公博聘，入大陆大学讲授社会主义史和唯物辩证法，同时任教的有李达、邓初民、马哲民等。翌年5月9日，该校被查封。据许回忆，是陈公博收了宋子文十万元，自己叫军警查封的。新中国成立后，许德珩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头子杜月笙与张啸林保护我。

杜月笙请我去吃饭，我们成了好朋友。他一直待我很好，我不参加考试就领到了驾驶执照，是他帮我从法租界警察局直接领出来的。当然，他不知道我是色盲——分不清红色与绿色。这就是我开车时，旁边经常配备一名司机的原因。我在上海闯过几次车祸，有一次我撞翻了人行道上一个水果摊，我马上赔了钱；另一次我在南京路上撞伤了一名行人。我匆忙下车去警察局，给了一个印度警官一些钱，幸亏我开的是一辆小型奥斯汀车。



陈公博

杜月笙这个人十分豪爽、友善、直率。他常常伸出援手，扶弱锄强，热心公益，惜老怜贫。我对他十分崇敬。他是青帮的重要领袖，青帮的宗旨是不坏的。不过，俗话说“十个手指不一样长”，那就是说，任何组织都有好人也有坏人。青帮的其他掌门人就不如杜月笙的才干，我对张啸林的印象就差多了。

这段时期我遇见戴笠，他请我吃饭，我们相处很好。戴笠是黄埔四期生（按：应系六期），我们军人常会在上海晤面。

李济深还是不放过我，他一再向蒋先生唠叨，说不允许我逗留在上海。蒋先生说，既然我想去国外，何不去日本一游，他不希望我走得太远。曩昔出国只能搭乘轮船，去欧洲的航程要二十多天，所以我去了一趟日本。那时去日本不需要护照或签证，拿到船票就可以启身。蒋先生同我约定，如果出了大事，他就要召唤我回来。

我用了个假名“邹醒春”独自去了日本，装扮成南洋侨商的样子。取那化名的意思是什么？醒是苏醒的意思，春就是春天——一年中最好的季节，这个名字表示我已觉醒，并决心不满足于当一名军人，邹姓则与本来的张字发音相近。此外，邹敏初是我的好友，我在广州政坛失意后，曾去香港他哥哥家小住过。

在此以前，我曾协助黄琪翔去日本，他住在梅县同乡、华侨富商潘植我^①家

① 潘植我（1885—1953），广东梅县南口堡寺前村人。1907年毕业于梅城嘉属官立中学后，随宗亲潘祥初赴日本大阪吉田工厂习艺，旋入东京机织学校学习。1913年在神户开设得人和公司，经营纺织品及日用百货出口东南亚等地业务，生意扩展到雅加达、棉兰、上海、香港等地，在南洋拥有七十多家经销公司，一度与三井、三菱财团齐名，号称旅日华商第一家、广东梅县首富。创立神户中华总商会，当选会长，兼任广东商业会所议长。他竭诚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辛亥革命前把自己三年积蓄全部捐赠革命经费。民国肇建后，受聘为广东省都督府顾问，捐资兴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1921年应聘为内政部顾问、北京总商会顾问以及广东丰顺县县长，自掏腰包补贴地方财政，还当选国会议员，代表华侨出席北洋政府国会。曾先后荣获黎元洪、徐世昌两位总统颁授二等嘉禾勋章与奖匾两块。1926年捐资兴建神户华侨同文学校、香港东华医院等，因而荣获教育部颁授嘉祥勋章。1931年捐资兴建梅县279米长的梅江大桥。1928年，张发奎以假名赴日旅游，下榻于潘府，潘植我因未向日本警方申请真名而受处罚。当时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许世英均为其座上宾，屈映光、李汉魂、李福林、丘哲等南北要人来日均热忱接待。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潘植我坚拒日本政府强迫华侨通电反对国府、支持汪伪政权等无理要求，1940年逃亡印尼巴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险遭日寇杀害。1945年日本投降，幸张发奎通知盟军将潘植我从海岛集中营救出，即回香港疗养。1953年病故香港，张发奎等挚友亲临殡仪馆致祭。

中，潘在神户开设一家大型货栈，我也入住潘公馆。

我大多数时间在神户，其他时间由潘植我与黄琪翔陪同周游日本各地。我们同一位爱说笑的台湾朋友访问了艺伎馆，他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一天下午，我们进馆时，什么人都不在，一位老妇问我们是朝鲜人还是台湾人，因为艺伎们拒绝接待日本国的奴隶。这是日本人自大狂情结的一种表露。我说，我们是中国人，那位台湾朋友告诉我们，别让对方知道他是台湾人。

我在日本住了大约半年。在这段时期，第四军参加了山东的泰安、德州和济南战役。1928年夏，北伐军攻占北京天津之后，第四军驻守德州。南京方面那时没有向第四军派遣政工人员。第四军离开广州前，是用自己的干部安插到政治部去的，第三次北伐期间他们都不离不弃。第四军在山东时，中枢想派曾养甫^①来主掌第四军政治部，但不晓得什么原因他没有到任。

《第四军纪实》中说，1928年6月中旬第四军军官吁请中央政府与蒋先生解散政治部，这里我想有两个原因，其一是财政上的，第四军得不到足够的军饷；其二，在第三次北伐中，第四军担负了最艰难的战斗任务，全军的前途十分渺茫。

9月，第四军被缩编为第四师，下辖三个旅与三个教导团。缪培南留任第四师师长，薛岳辞去副师长职，由朱晖日继任。这一下，第四师满员了。离粤时，它有五个师，从五个师部一下子遽减到一个师部。第四军精减下来的文职人员领了些遣散金。中央负责安置被遣散的军官，其中一部分保送设在南京的高级军事教育班。

缩减军队是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的决议，据编遣委员会经理部主任宋子文在编遣会议上报告：全国军队200万人，年耗军费3亿元，而国库全年收入仅4亿元，除偿还外债1亿多元，全部移作军费也不够，更谈不上从事经济建设和文教事业，所以裁军乃是唯一出路。此时我回到上海，大家都感到头疼，人人都来找我求助，我觐见蒋先生，但是他也爱莫能助。我一次次去看望第四师的高级军官，他们告诉我，第三次北伐结束时，蒋先生曾向他们训话，暗示第四军要捍卫中枢抵御桂系。我们同桂系之间已经种下了刻骨的仇恨。我对他们说，我们犹如关在笼里的老虎、甚至是狮子，蒋先生说：“别走出来。”

不久我又去了日本，因为李济深施压，他一直同蒋先生啰唆要我走开。他担心若我留在上海，又会搞出点事来。

第三次北伐胜利后，北京改名北平，由白崇禧坐镇。桂系的势力无所不在——从广西中越边境的镇南关直至山海关。这一次我妻子同我一起去日本，我邀请冯次淇与谢膺白同行，他俩都失业了。冯是许崇智的旧部，谢膺白本是留日学生，娶了个日本妻子。我邀他同行是因为他能讲日语。

我仍使用化名邹醒春。第一次访日时，我隐姓埋名，但这次我一登陆长崎，真实身份就暴露了。日本移民局问：“你是张发奎吗？”我否认。对方拿我没办

^① 曾养甫（1898—1969），广东平远人。早年留美，回国后参加北伐，后任行政院建设委员会副委员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等。1935年任铁道部政务次长，后任广州特别市市长。抗战时期任滇缅公路督办、交通部部长等。抗战胜利后当选立法委员。1949年到香港，1969年在港病逝。

法，因为当时中国人去日本不必持有护照。我猜想是谢膺白的日籍妻子向移民局透露的，尽管我已经嘱咐过她要保守秘密。

谢膺白和冯次淇使用他们的真姓名。日本小吏询问冯：“你在冯玉祥治下过得怎样？”日本人把他看成北方人，实际他是“南人北相”。

这使我想起一件很好笑的事情。潘植我有一位很要好的日本朋友，是日本外务省调查部门的主管。我第一次访日常见到他。第二次他到神户港接船，翌日他带来几份报纸和一本《中日名人录》，问道：“张发奎的相片看上去非常像你。”我答：“是的，这并不奇怪。”他继续说：“不仅他看上去像你，他的年龄也和你相同。”我当年34虚岁。我说：“真奇怪！”他继续说：“你最好不要再假装了。上次你来这儿骗了我半年，我想不到你就是张发奎！”他告诉我，由于没有辨认出我，他已经受了处分。我不知他是不是开玩笑。他手持的当地报纸以头条刊出“共产党集团的张发奎到神户度假”的消息，还登出我的照片。

我们同潘植我在一起。日本人一次又一次地来纠缠我，使我非常困扰。日本记者常常来访问，我的一举一动经常登上报纸，又被他们误当作共产党员。我在不胜其烦之余，真想回国去，可是办不到，蒋先生要我走开一阵，我必须等他点头才能回去。

1929年1月19日，第四师的团以上军官上书国民政府蒋主席以及编遣会议成员，要求解散第四师，这又是为了什么？【虽然蒋先生的第一军对北伐并未作出大的贡献，】但大大扩充了他的嫡系部队第一军，缩编了其他军。第四师官兵强烈感觉这样做不公平，所以决定向中枢要求裁撤。中央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还进一步把第四师减到三个旅、一个教导团以及一个师直属营。缪培南一怒之下辞职去了香港，朱晖日代理第四师师长一职。

【蒋先生在编遣过程中假公济私善自为谋，这就是为什么他一次又一次遭到反对，直至抗战爆发。】

最后我向蒋先生请示，表明我想回国，他批准了我的请求。我不知道他同意我回国的原因，但我知道，有些事情已经在进行了。

第八章 从镇压到合作：同桂系的关系

（1929年初至1931年5月）

我回到上海，在蒋先生的岳母家见到了他。蒋先生告诉我，他正准备压制桂系，我不必避开。我常常会晤宋子文，从他身上学了不少东西。在那时，我俩无所不谈。当然，蒋先生事无大小都同他商量。

当李济深去南京路过上海时，宋子文信心十足对我说：李将在南京被扣押。宋并不担心我会给李通风报信。然而，我还是请粤籍同乡邹敏初警告李济深勿去南京，可是邹没有说是我透露的内情。李济深住在上海一位广东富商家中。

我为什么要警告李济深？我担心，一旦他被扣押，桂系会迅速瓦解。虽然我憎恨桂系，但我不希望桂系立刻溃灭。倘若李济深能离开南京回穗，他能组织强硬的反蒋势力。只要他反蒋，第四师就能继续生存；只要桂系公开反蒋，蒋就不会裁撤第四师，因为他要利用第四师——桂系的夙敌。

虽然我对政治的认识不够深刻，但我也明白最大的危险乃是缺乏动乱——第四师需要在动乱中求生的机会。有动乱，我们才能幸存。只要李济深离开南京，就会闹出乱子，蒋先生必会利用第四师，于是他们能继续生存，东山再起。否则，蒋先生会裁撤第四师，我们很难熬出头。蒋先生一定没有忘记，我们并未对他坚贞不渝；他暂时庇护我们，只是因为他打算借刀杀人——利用第四师对付桂系。

李济深不听邹敏初的忠告，他同吴稚晖一起去了南京，是吴稚晖专程去上海“迎驾”的。李济深还以为自己能应付蒋先生。

回上海后，我也常常会晤唐生智。他告诉我，当局派他去南方策反他昔日的下属李品仙等人，那时他们都在桂系麾下。

陈公博与我一起拜访了俞作柏，自从黄绍竑、李宗仁、白崇禧在一场清洗中篡夺了俞的广西省主席职位后，他一直隐居于香港。他的政治立场左倾，其弟俞作豫（曾参加广州暴动，1929年到桂军俞作柏部做兵运，次年领导龙州暴动，任红八军军长，同年6月在广州被捕遇害）是中共党员。虽然我与俞作柏相识年久，但我见了他几乎认不出，他戴了一副假牙，面貌完全改观了。他告诉我们，他要去武汉游说他的堂兄弟李明瑞（时任第七军第一师师长，1930年加入中共，任红七军军长。1932年10月在“肃反”时被中共枪决于江西于都）、杨腾辉（后官至第七军军长、广西省财政委员会主任，1939年至香港，旋病故）以及其

他李宗仁部胡宗铎（第二十二师师长）、陶钧（第十七师师长）、夏威（第十五师师长）手下的军官。第二天，俞伯柏去了武汉。

从陈公博口中，我知悉蒋先生是透过宋子文起用俞作柏为他效力，而宋子文接触俞作柏是由陈公博引荐的。俞作柏本是汪精卫的支持者，失权下台后他一直同陈公博等人保持联系。

1929年3月21日，李济深在南京被扣押。设若1927年他同我们站在一起忠实地支持汪精卫，他一定会避免这一下场。

我到南京去见蒋先生，他要求我回到部队里，让我去九江见他。他给了我五万大洋，是他批了条子，宋子文在上海付款。我对宋子文说，既然压制了桂系，我要求汪精卫回国。他答应我，他会向蒋先生要求，一俟桂系平定后，便邀请汪精卫回国；否则，他同我一起辞职。

对当时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制裁改组派的措施——开除陈公博、警告汪精卫等人。我大不以为然，但无力挽狂澜于既倒。

在那些日子里，蒋先生同我是一鼻孔出气。汪精卫、陈公博知道“鸟尽弓藏”的道理，但仍希望我协助蒋先生平定桂系。很明显，我们的头号敌人是桂系军阀，我们打算走一步看一步，事实上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

我同薛岳一起去九江，他是我召回第四师的。朱培德与我偕同蒋先生登上了一艘炮舰，蒋先生说：“你回来了，很好！你可以协助朱培德。”当时朱担任湘赣剿匪（桂系）军前敌总指挥。朱与我登舰后闲逛了几步，蒋先生叫他过去讲了几句话。我也走过去了，蒋向朱出示一封电报，诚然，他不好意思不让我过目。电报是陈铭枢刚发来的，他支持蒋先生清剿桂系，电文说：“我们听说您起用张发奎。第十一军闻此深感不安，请勿起用他。”电文暗示，倘若蒋先生起用我，第十一军将不会听命于蒋。

蒋先生告诉我：“你不必担心！”我说，我不想使蒋先生因我而失去十一军对他的支持。因为我的参战会给蒋先生制造困难，也会让我自己不安，所以我不参加对桂系的作战了，我回上海去。虽然我是愿意参加征剿桂系之役以报当年被桂系、被李济深赶出广东这一箭之仇的。蒋先生再次要我别担心。他说，既然他把我召回来，我就得留下来。他还说，他有同陈铭枢相处之道。朱培德也说，没什么可以忧虑的，他要我担任他的副职。

蒋先生说，不必了，他会写信给第四师代理师长朱晖日，称他已命令“向华兄”归队，朱晖日统率的第四师仍归我指挥。这是很奇怪的，乱了章法——第四师仍由朱晖日统率，但是我的位置比他高。简单地透过一封信就授权我指挥一个军事单位，这样做不妥当。

薛岳与我离开九江去追赶第四师，它已开拔去同桂系作战。我希望桂军向湘西撤退得慢一些，让我能够一路追击它到广西。听宋子文说，战事结束后俞作柏将重掌广西省政，我愿意同他合作，重建我们的部队。我想乘此机会重回南方，因为我已感到第四师甚难在北方发展，我内心明了蒋先生不信任我们。

我预料不到的是，桂系内部的倾轧使它迅速分裂，以致战事终止了。俞作柏潜往武汉很快奏捷，李明瑞与杨腾辉脱离桂军投向中央，未发一枪一弹武汉就易手了，胡宗铎与陶钧向沙市退却。

关于蒋先生的德籍军事顾问麦克思保，我记不起什么事了。

薛岳与我，于1929年4月8日在湖北东山附近赶上了第四师。我被任命为讨逆军第一路右翼军司令官，指挥三个师：第四、第十和第十一师。薛岳却无任命。

我去汉口时，第四军追击敌军到了郝穴。我陪伴毛邦初驾机到沙市轰炸桂军。我想朝下望一眼，机上携带了几个小型的25磅重炸弹。我们看不到敌军，但看到许多船只。当他让投弹时，我向那些船只瞄准投弹。我猜测，杀死了许许多多鱼儿！

4月26日，胡宗铎、陶钧、夏威通电下野出国，并要求中央派员接管他们的部队，他们“宁赠友人，勿与族人”。于是，俞作柏掌控了那三个师。

那三个桂军师长的部分下属接受了此一决定，例如尹承纲率部投向南京，在半路上被中央下令解除武装；其他人，像夏威的下属李朝芳，拒绝投向南京，遂向沙市退去。

朱晖日被任命为第四师师长，他想辞职，蒋先生委任我做第四师师长。所以我不想接受此一任命，我希望朱晖日留任。我想再度离开部队。

5月中旬，我去了郝穴，蒋先生令我去肃清桂军的残部。我率部向西行军，朱绍良朝南，我们将扫荡钦州的桂军残余。但我没立刻去钦州。正因为我是被迫去扫荡桂军，所以我不想同桂军接战。我明白蒋先生棋盘上的下一步棋就是消灭我部。我猜村“灵魂交付炼狱之后，便不需要和尚超度了”。

我花了一番工夫来重组我的部队，同时秘密派人去见我的挚友李朝芳。他是我部下几位团长的保定同窗，肥胖而蓄有胡髭，是三位蓄须的年轻广西将领之一，另两位是夏威与黄绍竑。我希望李朝芳向广西前进，那么我就可尾追到广西。要不然，他的部队将被俞作柏接管。我让李朝芳通知桂军其他指挥官都照此南退。

李朝芳没有把我的口信转达其他军官。不仅没有向广西开拔，5月27日，他带领他那个旅，像赴丧礼那样倒背着步枪，到我驻郝穴郊外的前进指挥部接受改编。我问他为何不按我的话南撤，他说他碍难照办，他的部队没钱开拔，且官兵们丧失信心。我没扣留他，在解除这个旅的武装后，把军械全部上缴南京。

在解除几支较小规模的部队后，第四师开入了沙市，在那儿，我挑选了李朝芳部下的精锐，编入第四师，每个班增加两名士兵作为后备。这样每个班便从14人扩充为16人。这两名充员兵并不发给武器，但他们同其他士兵一起训练。这是我首次指挥一支满员的部队，我发放遣散费给老弱士兵，让他们回乡，其中一些满族人（八旗兵）也愿意离开。

我几乎没有留用李朝芳部下的军官，因为我已经拥有足够的军官了。

蒋先生猜疑我怀有过分的野心，但我其实没有。我向他报告说，充员兵是必须配备的，因为在当时的征兵制度下，新兵常常会开小差。我解除了大量李朝芳部官兵的武装，其中许多是年轻力壮的广西人。考虑到征募新兵不容易，留用优秀的桂军士兵便顺理成章了，他们确实是经过训练的军人，足以充实第四师。

回南京向蒋先生报告时，我解释道：充员兵是由第四师的储备金供养的，每个士兵每月只耗费十元五角饷银。蒋先生说：“好，好！”我再次对蒋先生说，我不想主掌第四师，我坦率表明，我绝对忠于旅居法国的汪精卫。我说：“如果汪精卫要我同您开战，我怎么办？设若我拒绝同您打仗，我就不成为他的忠实信徒了；设若我同您打仗，我就委屈了您。”蒋先生说：“你认为汪精卫同你关系良好吗？好，我同汪先生的关系更加好！”我说，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值得庆贺。于是，蒋先生吩咐我接长第四师。我要求蒋邀请汪精卫回国，他说：“好主意！”然而他只说不做。

我见了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邵力子。我说：“我不理解为何吴稚晖明知我不是共产党却一口咬定我是共产党员？他为什么硬要扣我一顶红帽子？”邵力子说：“他必须这样做，不然他还能写什么文章？”吴稚晖支持李济深，李的女儿拜吴为老师，由李月付五百大洋束修。吴稚晖常常说自己不在乎，我常常认为他太伪善了！

戴季陶是蒋先生另一位我所不能容忍的智囊，我认为戴十分伪善。我从未要求吴与戴给我写任何东西。你要知道，当一个人升到一定位置时，文人雅士便会自动敬献自己的书法，有时军政人物会要求学者们为自己书写一些条幅。

我被任命为正规陆军师长，享有上将待遇与薪俸，虽然通常师长职位只挂中将军衔。李汉魂被任命为副师长。

正式就任后，我十分谨慎。我感觉到，由于我同汪精卫过从甚密，蒋先生永远也不会信任我。他知道第四师是个精诚团结的整体，绝不会被分割收买，要消灭第四师唯有解除其武装一途。

第四师移防宜昌，薛岳一直补不到实缺，吴稚晖便离开了。

我召集了第四师各级代表会议，每个营都推派一名连长、一名排长、一名班长及一个列兵；每个团都推派一名营长，所有的团长、团参谋长、团副官长、团政训处主任，师部高、中级军官以及师政训部主任都要出席。会议开了三四天，我们讨论了有关整个部队的事务——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们试图检讨



过去，以便为将来奠定坚实的基础。我觉得召开这一会议十分必要，因为我接报知悉高层出现违纪、腐化现象，老百姓对军纪涣散啧有烦言。故我们试图在会议上调查民众的投诉，以事实为根据作出报告。

已经有许多民众要求我总结第四师风雨同舟、勇冠三军的原因，其实最重要的因素是实行了民主。会议中发生的一件小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中央命令所有的士官与士兵都要像日本兵一样剃光头，或者至少要剃个“陆军头”——中间剪短，四周剃光。在会议上，有一位班长想知道，为什么军官可以留长头发。他特地指着，因为我通常留着长发。军医处处长为我辩护说，张将军是高级指挥官，他需要头发保护脑袋。我的部下回嘴道：“难道我们的脑袋不需要保护？”这个问题引起了热烈的辩论。结果，多数意见认为：无论军官与士兵，如果不想剃光头，至少可以剃一个“陆军头”。于是，第二天，我的长发改成了“陆军头”。我提出这件事，显示在我的部队，民主已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第四军的座右铭是“公诚廉毅”。我恢复了在我离营期间停止实施的“四大禁令”，还恢复了经济委员会与人事委员会的运作。虽然这两个委员会还存在，但久已停止发挥它们的功能。

我禁止部下军官纳妾，违者开除军籍。当然，这一禁令并不追溯已往所纳妾侍。我这一决定是因为部下一位勇士团长张德能被卷入一宗麻烦事而断然作出的。自第一次东征起，他就在第四军朱晖日部下任职。他的湘籍妾侍无理取闹诛求无已，给他造成无尽的痛苦。他想离婚，可她提出极不合理的要求，甚至得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妇女部的支持，该部将申诉书转到师部。我在南京同那个女人商量，建议她接受金钱解决方案。可她拒绝，还继续纠缠不休。于是我下了最后通牒：倘若她坚拒我所提出的和解条件，我将支持张德能，不准她走近第四师。她终于接受了我的条件：张给她几千元大洋换取儿子的抚养权。张德能对我感激涕零，发誓从此再不纳妾。这一宗案件使我坚信，纳妾对部队只会起负面影响，在我指挥第四师期间，没人再敢纳妾了。

为了配合禁止纳妾，我订定制度帮助军官们配亲。我下令：按照军官的级别，从师部储金中拨款作为结婚津贴。严格地说，这是我们第四师的“土政策”。

军委会按月拨款给第四师。我向中央呈报全师的实有人数，但收到的是足额满员的饷银。我恐怕蒋先生怀疑，所以呈报的是实际人数。当然，他知道我所有账目都是公开的，就像我已讲过的，我们的公积金供养了每班两名后备兵。军委会常常拖欠军饷，但我从未拖欠下属的饷银，因为我以师部公积金垫支。同以前一样，我发得很快。在我离营期间，官兵们不是常常能准时领到饷银的。

为了杜绝“吃空额”这一陋规，中央订定了每年巡视点校制度，以核定各军事单位的真实人数。由高级军官组成的巡视委员会成立了，它可以深入到每一个排。巡视委员会成员巡遍全国各地。当巡视委员到达前，中央会通知部队长。部队长把巡视委员安顿到旅馆后，就通知他属下的各团，巡视委员若干日内要光

临，务须作好准备。有时准备工作不必去做，因为有人会宣称，部下几个营已经奉命去剿匪或者“剿共”，那就没办法去核查。陆军的单位散布在宽广的地域，战事常常发生，部队也就调动频繁。于是乎，轮到检点的部队长便会将属下部队在指定日期调到指定地点接受检点。翌日，这些部队就会出现在另一个地点接受另一场检点。

部队长经常送礼，甚至送钱给巡视委员，款待他们，故他们会佯称已经检点完毕。有时他们仅仅作了一次散步，既省精力又省却麻烦。诚然，有些巡视委员是认真负责的。

第四师从未纵容此类舞弊，也从不向巡视委员行贿。我会招待他们，但绝不过分。我会让他们知道第四师的真实人数。

我担任第四师国民党党部的主委，但是党部具体由师政训处管理，关巩是第四师首任政训处主任。1928年前的政治部与1928年以后的政训处，在地位与功能上有何主要区别？在北伐期间，政工人员工作勤奋，亦即，中共的政工人员与国民党的政训人员不同，政训人员主要关注的是考核部队是否可靠。【关巩的首要任务则是判断我们是否效忠蒋先生，】我们自然不让他进入经济委员会和人事委员会。

政训处仍然保存了政治部的组织形式，它下设宣传、组织、总务等科。它主要由黄埔毕业生充任。【我同他们没感情，我们把他们视为奉派来监视我们的。事实确实如此。】

第四师是否隶属于湖北各部队编遣特派员刘峙？编遣特派员刘峙拥有广泛的政治、军事权力，他甚至有权在有关绥靖事务上发布命令给湖北省政府主席。在第五绥靖区，他指挥第四师执行绥靖任务，我派遣了一个团到恩施清剿土匪。

1929年6月杪，我把职位移交李汉魂代理，未获蒋先生批准就离营上了庐山，那时蒋也在庐山。我是借口养病，以避免蒋先生的疑心。蒋先生离开庐山后，9月6日我才回营。

回到宜昌，第四师参谋处长邓定远收到前第四军参谋处长薛炼一封来信，那时他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校长钱大钧手下任职。邓和薛是江西同乡兼同学。薛炼透露说，中央拟将我与钱大钧对调，但是钱大钧拒绝接任我的职位。【很明显，中枢亟欲把我调离部队，从而控制第四师。】蒋先生信任钱大钧，也许钱大钧自知掌控不了第四师，所以不敢上任，也许他不在乎师长这一职位。

此时，我们收到黄琪翔以第四师南京留守处（李宗岳任处长）密码发来的电报，电文说“扬子江风云突变，请即离开”。很明显，黄琪翔听到了一些谣诼。^①

9月8日、9日、10日我接连收到蒋先生来电，命令第四师开往陇海线讨伐

^① 据谢膺白说，谣诼的源头是李汉魂。他擅杀胡谦，导致胡谦夫人向国民政府控告要李汉魂偿命。李心中不安，便散布谣言说李济深对第四军含恨入骨，坚请蒋借北伐为名，将第四军置于最危险的一翼，利用张宗昌、孙传芳的炮火来消灭第四军。倘若谢膺白所说确实无讹，则张发奎的第二次护党运动系受人误导。

冯玉祥。命令说，第四师至迟9月18日要离开宜昌，把驻防任务移交给新一师师长曹万顺。冯玉祥的部队正驻扎在潼关、郑州和开封。按理，我们应被安排去汉口搭乘京汉路北上，那是最迅速也最直接的路径。但是，蒋先生命令我们开往浦口搭乘津浦列车北上。这引起我的疑虑。自广州暴动以后，我学乖了，不会轻信别人。

而且，蒋先生指定我们三路进军。终于由于渡船的载量，我们能以一路、四路、五路或更多路行进，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被限制于三路呢？最终，蒋先生要我向他报告：我搭乘哪一条船，很明显，蒋先生想缴我的械。我感觉他要清除我，我的部下也察觉到这点，任何一位有军事头脑的人都看出蒋先生一心想收拾我，尽管我们没有冒犯过他。我很忧虑，但我觉得不必害怕。我想去南京见蒋先生，但我部下的旅、团长期期以为不可。李汉魂、黄镇球、韩汉英强烈反对，他们担心我此行会遭遇大难。



杨杰

几年后，（时任洛阳行营主任）杨杰告诉我，当时他对蒋先生说，其他人可能会接受这项命令，张发奎会抗命。

我在宜昌召集了团长以上的军官聚会三日，政训处组织了演剧以及其他娱乐。我跟同袍们讨论了 we 面临的形势，一致认为不能束手待毙。倘若违抗蒋先生的命令，我们势必同中央军开战。有些军官主张开仗，但多数人认为此举无疑以卵击石。

我考虑到两种可能性。其一是加入陕西的冯玉祥部。【我们能要求汪精卫透过黄少谷把我们的计划告诉冯玉祥，黄是改组派成员，时任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同中将秘书长。】第二个可能是入川。这一计划的好处是：中央军不容易入川攻击我们。在另一方面，民间俗谚道：“天下未乱川先乱，天下大定川未定。”我记得吴佩孚被北伐军击败后，他的部众就是在四川被地方武装吞并的。其他人也遭遇过同样的命运。汪精卫的支持者刘文辉在川西，遗憾的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我们自省实力有限，无法在四川重生，倒可能被人家吞掉。

我们不敢接纳南进的主意——粤桂太遥远了。故我提议加入冯玉祥的西北军，我跟他是旧识。1929年初，我第二次旅日返回上海时见过他。他刚去过南京，邀我午餐。坦白讲，我们两人都不得意，这就成了好朋友。

冯玉祥这个人不可信任，无关宏旨。只要我确定他不会伤害我，可靠与否我不在乎。私人关系与政治关系是两码事。可是，我部下所有的高级军官都反对我所提出的加入西北军的建议。

在绝望关头——无路可走之际，陈公侠奉俞作柏之命到访，俞作柏已经回到广西重任省主席。陈公侠是广西人氏，在第四军当过团长。他告诉我，俞作柏已

决定反蒋，但尚未发难，因为他的部队不够强大，他希望我们去广西同他并肩作战，这样我们可以夺回广东。我们绝处逢生，大喜过望，就很快接受了这一建议，准备向广西进军。1929年9月17日，我与团长以上军官通电倡导第二次护党运动。我不相信蒋先生会接受我的三点要求——取消违法乱纪之三全大会；根本铲除一切恶化腐化势力；敦请革命元勋（汪精卫）回国主持大计。“恶化腐化势力”系指吴稚晖、李石曾、戴季陶之流。坦白讲，如果蒋先生不着手“解决”第四师，我们是不会提出那些要求、不会起兵反蒋的。我们倡导第一次护党运动是为了反对“中央特别委员会”，为了支持汪精卫。虽然第二次护党运动肇因于蒋先生要“解决”我们，但仍使用“支持汪精卫”的招牌。然而汪精卫没有叫我们采取行动，我们发难只是为了求生存。当然，倘若汪精卫叫我采取行动，我一定服从他的命令。

我发电报给宋子文，提醒他，我俩曾约定：倘若平定桂系后汪精卫仍不能回国，我俩一起挂印辞职。我希望宋子文规劝蒋先生接受我们的建议，但他没有答复。

我又开始蓄须，并发誓：回不了广州，永不剃须！

11月5日，我写信给唐生智。我同他一直合作愉快，我倡议第二次护党运动后，希望他也能起兵反蒋。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曾是唐生智的下属，我希望唐生智告诫何键及其已往的下属诸如何键的女婿（时任第八军十一师第六旅旅长）李觉以及（时任第四集团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师师长）陶广等，不要同我们开战。换言之，我希望唐生智劝说他们协助我们反蒋。

我扣押了师部政训处副主任侯志明以及他的十多名部下。我们允诺在广州之役——无论胜败后，便释放他们。政训处主任关巩在南京。我们任命自己的政工人员，把老弱病残打发回家。

1929年9月17日至18日，我们渡江，在南岸的枝江县集合。我指挥的部队有三个旅加上一个教导团，战斗部队约有2万人，加上运输兵，总数约为2.8万人，每个连至少配备8个挑夫。

那时，中央积欠第四师几十万元的军饷，所幸我们的公积金已经超逾200万元，其中多数是银元。我们把储金从银行提取出来。如果没有这一大笔钱，我就不能“护党”了。

骡队驮着我们的财富——包括这批银元——南下，经理处派了一个连护送。老百姓以为驮的是军火弹药。倘若我的部队不忠心，这笔巨款就会轻易失踪。每一个士兵都知道箱子里装着银元，但我的部下是忠实可靠的。凭借这笔巨款，在那风雨如晦的日子里，这支部队坚如磐石。士兵们深信我是公道直行，所以心甘情愿追随我，即使前程崎岖也毫不在乎，士气一直保持高昂。

9月19日，枝江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我们击中了一艘“江靖”轮，上面搭载的正是来接替我师防务的曹万顺新编第一师之第一团。曹万顺搭乘另一艘轮船溯江而上。一年前，陈诚当过他的副手——第十一师副师长。此时陈诚已升任

第十八军军长兼第十一师师长。第一艘船上的官兵不知道我们已经通电反蒋，当我们命令他们停止前进时，他们拒绝了，还以为我们是土匪。我们开火后，他们就扯起了白旗。于是我们缴了三艘轮船 3800 人的械，取得了一批精良武器。搬不动的枪支，我们拔掉枪栓，一路行军一路抛弃，这是为了确保敌军不能使用这批枪支来追击我们。我们没法搬走那么多的武器。

我们没有将这三个团的俘虏编入第四师，因为他们来自敌营，不可信任；此外，我们哪有军官来监管他们呢？但是，我们从俘虏中挑选身强力壮者充任“永久挑夫”，需要多少就用多少。即使这样，我们还是抛弃了许多东西，我甚至扔掉了我的帆布床，只带走金钱与军火。

我们组建了情报机构，由团部负责侦察，师部不再组织侦察队。只要条件许可，我们一路铺设电报线，要接许多线头。部队停下来休息时，我们的先遣与殿后单位就会切断电报线，将它连接到我军的电讯设备上，这样，我们各个单位之间就可以通电话了。每逢我接到敌军逼近的报告，就立即转发所有的单位。敌人却不能窃听我们的通话，因为我们的通讯单位把沿路的电线杆都砍倒了，敌军不能再使用它。

9月22日，蒋先生宣布撤我的职，委派黄镇球继任，这是由于黄镇球的堂兄，（参谋本部测量总局局长）黄慕松在南京为蒋先生服务。我向第十一旅旅长黄镇球出示了蒋先生的电令，问他究竟是接受蒋的委任令抑或继续反蒋，他表示自己是坚定不移地反蒋的。

9月23日，我们抵达石门后，驻军独立第九旅旅长李抱冰的使者唐国庆携带欢迎函前来拜访我。他声称是李抱冰旅部的副官，带了酒肉来慰劳我部。然而我们还是保持警惕心，准备随时会来临的袭击。我命令在泮水上搭建一座浮桥，由黄镇球旅负责掩护全军渡河。

第四师刚渡过泮水，黄镇球的一个团想过河时，李抱冰旅就开始攻击我们。我们以一个团击退了对方的一个旅，还俘虏了唐国庆，他供认是奉命前来探取我军的虚实，他本身是李抱冰旅的营长。我们砍下他的脑袋，钉上一块木板，让它漂流到下游的泮州。杀头是违法的，本应处以枪决，可是固定一个头颅要比固定一具尸体容易。我们被激怒了，我们希望李抱冰亲睹搞阴谋诡计的下场。毕竟他不应该欺骗我们。既然蒋先生命令他进攻我们，他为什么不直接向我们发动进攻，而要先要出奸计呢？

几天后，我们一整个排出任务没回营。当连长向我汇报时，我惊诧莫名，我不相信一整个排会背叛我，猜忖是那个湘籍的排长欺骗了他的士兵。我相信部分士兵会回来的。

三天后，整排士兵捆绑了排长回来了。我询问士兵们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告诉我，排长叫他们别跟我回广州——士兵中有些是湖南人，甚至是石门本地人。一天晚上，此人病倒了，他吩咐一个班长给他端洗脸水，班长一拳把他击倒，捆起了他。我同意了他的请求，向集合的师部各单位官兵讲几句话，按规矩我不能

准许如此做。此人忏悔道，他曾经当过土匪，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一回到他曾经落草的湖南石门地区，就不由自主重操旧业。他呼吁在场的官兵不要步他的后尘。翌晨，这个排长在师部被当众处决了。此举表明，一切处罚都是公开的。

至于我们的征程，虽然在枝江没有大战，但进入湖南省境后几乎无日无战。遵照蒋先生的命令，湖南的驻军每天都攻打我们，我军常常腹背受敌。所幸我们拥有精良的电讯设施。两万多官兵的行军，排成一字长蛇阵，电话使我们配合良好。

唐生智想劝说他的旧部属支援我们，但他们都拒绝唐的建议，要不然，他们可以联合起来同我们一起反蒋。然而，他们对待蒋先生只是三心二意。有次我窃听到陶广（何键部第三十五军第三师师长）与李抱冰的通话。陶对李说，奉中央命令追击我们之时，不必太卖力气，他建议在追击时同我们保持一日的行程，让我们自己走开。事实就是这样，因为何键与他的部属都曾经是唐生智的部下，他们都是湖南人，其中多数是保定军校毕业生，他们只是敷衍蒋先生而已。

我们一路上打些小仗，湘军一直追不上我们，敌我之间顶多相隔二三十里，有时只差十里路。我们行经荒芜的湖南村庄——蒋先生命令何键坚壁清野，在我们路过的地区疏散人口，搬走盐、米等食物。我们尽可能采购两至三日的粮食与盐。老百姓对我们很友善，因为我们买什么都付现款。缺盐是最大难题，湖南各地都缺盐。我们可以断油，也可以吃白饭，可以掘食红薯或芋头，可食无盐是不行的——三天不吃盐，两条腿都站不稳。

有一些人开了小差。从整体上看，我的部下毕竟是对我忠诚的。这使我想起在湘西发生的一件事：有一天行经一座村庄时，我们路过警卫连中几位卫士的家。他们的亲属见到他们很高兴，并劝他们别再走了，他们转身对亲属们说：“我们必须护送张将军安全抵达广东，完成此事才能回家。”

行经宝庆时，蒋先生委任邓龙光接替我的职位。这是由蒋先生身边的总司令部参议杨永泰出的主意，杨与邓龙光是高州（今茂名）同乡。邓龙光也发誓反蒋矢志不移，我让他在全军殿后。

最后，蒋先生悬赏十万大洋购我的人头。他有没有开出生俘我的赏格呢？我猜村活捉总比尸首更值钱。

除了蒋先生之外，为什么我们要挑选吴稚晖、李石曾以及青红帮来抨击呢？蒋先生把吴稚晖、李石曾奉为智囊。我前面讲过，我永远不能容忍吴稚晖，也不喜欢李石曾，这两个人都是伪君子；至于青红帮，国民党一直利用他们打冲锋。

10月10日我致电蒋先生，阐明第四军的行动纯粹是悬念国民党的前途。这封电报由副师长李汉魂起草，以第四师反蒋将士的名义发出。他们发表这一通电是为了澄清他们的立场以及他们对我的忠诚。前此，南京已经先后任命黄镇球与邓龙光取代我，李汉魂也是邓龙光与杨永泰的高州同乡。

最重要的一仗在湘桂边界附近开打。一天晚上进晚餐时，李觉指挥的一个团袭击我的师部。并不是他故意攻打师部，而是我们行军排成一字长蛇，李觉根本不知道我在哪儿。当时我身边只有一个警卫连。我下令向敌军冲去，结果敌军伤

亡逾三分之二，我们一个连堵击了一个团敌军的攻势。同时，电话将师部发生战斗的消息传到行进中的其他单位。后卫部队赶了上来，前锋部队退了回来，分进合击之下，击退了敌军。战斗持续了两小时。

倘若我的警卫连守不住阵地，我们能否成功抵达广西就很难讲了。如果吃了败仗，我们会失去公积金，我不被枪决也要坐牢。无疑，这是南进途中生死攸关的一次战斗。

那天晚上我们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其他的战斗都损失轻微，整个南行途中伤亡总计仅一千左右。大多数减员是由逃兵引起的。

在南行途中，我一直同俞作柏保持联系，使用密码电报联络。我们计划向桂林挺进，休息一段时间就打回广东去。可惜当我们抵达广西边境时，俞作柏再度丧失政权。

俞作柏回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后，率领李明瑞、杨腾辉回邕。俞起用了许多中共党员，如龚楚和张云逸。（广西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广西各路编遣特派员）吕焕炎，甚至（第七军军长）杨腾辉都犯了恐共症。于是，俞作柏被迫离开广西。李明瑞、张云逸、俞作豫等部退入桂西，建立了红色根据地。这时我才知悉李明瑞系中共党员。

几年后，我在上海询问俞作柏，为什么他要重用中共党员。他说：“原因很简单，打个比方，我好比在山间行路，天黑了，我精疲力竭，走不动了，又害怕虎狼袭击。突然间出现一座空轿子，轿夫问我去哪儿。虽然我知道他们不甚可靠，我也不能拒绝他们的服务，因为我不能在山中度过长夜。我只能盼望自己脱离险境。”他又讲了另一个例子：他把自己同北平的乞丐比较，后者冬天吞食硫磺充饥兼取暖，由于饥寒难熬，知道自己活不过来年春天。俞作柏被赶走，吕焕炎与杨腾辉邀请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返回广西。此三人尚未回到故乡，吕焕炎就控制了局面。

1929年10月31日，我们抵达广西龙胜，我见到了吕、杨的代表们，以前我都认识。他俩叫我莫去桂林，因为（黄埔系的六十三师师长）李扬敬的粤军驻扎在那里。余汉谋的第五十九师驻扎在宾阳，李扬敬和余汉谋都是（第四军军长兼广东西区绥靖委员）陈济棠的部属。中央已派遣陈济棠部到广西堵截我们南下。我接受了他俩的劝告，改变了计划，转向临川进发，在那儿稍事休息。同时，我们与李宗仁黄绍竑的代表接了头。

11月7日，到临川不久，李扬敬和余汉谋部都向梧州撤退，所以我们向平乐开拔，再挺进贺县。我被任命为护党救国军第三路总司令。我从贺县南下，到石桥会晤黄绍竑。他是从梧州北上的，粤军刚刚撤离那儿。11月24日，黄绍竑与我订定了我军与桂军进攻广东的战略以及进军的路线。

据黄绍竑在《五十回忆》一书中说及，他建议我部先休息一段时期，我则要求立刻攻略广东，声称倘若桂军不同意，我将孤军前进。其实我没说我要孤军前进。黄绍竑建议我们休息一阵，我则希望夺回广东愈快愈好，广州是我们的目

标。第一个理由是我军士气高昂，虽然从湖北一路打到广西，但他们并不疲倦；第二，我担忧我们一停下来，南京会派部队南下增援李、余部；第三，我考虑到财政方面，设若我们滞留在广西，我们势必要向广西当局筹募军饷。

我同黄绍竑开完会，即返回贺县，率部向广东挺进。我们的行军路线是：怀集—广宁—清远，我们是左路军，桂军是右路军，他们行军路线是德庆—肇庆—四会。

当我的部队在怀集与广宁之间的竹林中行进时，首次见到（军政部航空署署长兼广州航空学校校长）张惠长的机队，他们执行轰炸与侦察的任务。我命令士兵们坐下，用树枝伪装他们的军帽。炸弹只有25磅重——我知道它有多重，因为一颗炸弹掉在我右前方，不知何故它没有爆炸，我真幸运，我高呼“中华民国万岁！”虽然炸弹小，但也使我头疼。诚然，我们没有



黄绍竑

空军。鉴于这一次教训，我们等太阳落山才行军。广东的飞机每天都来轰炸。另一件难忘的经历发生在我们渡过北江向花县进军之时。黄昏时飞机来袭，那时我正在水稻田里。炸弹爆炸后，我发现自己被埋在泥浆中。

直到逼近花县，我们都没有遭遇敌军抵抗。12月8日，中央军加入了战斗，中央派了三个师到广东，分别由（第六路军总指挥）朱绍良、（第八师师长）毛秉文和（第一军军长）陈继承率领，他们都是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何应钦直接指挥。朱绍良与毛秉文的部队号称“朱毛军”。我军击败中央军和部分粤军后，便进驻离广州才二十多里的人和墟。

一天，我率部追击毛秉文，广东空军出现了。我到一间收容毛秉文部伤兵的屋子躲避，因为不忍听闻他们的痛苦呻吟，我带了一名参谋与一名卫兵去了另一座房屋。在那瞬间，炸弹落到第一间房屋，我又一次死里逃生！

在进攻广州之役，我三日三夜不眠不休——通常我是嗜睡的，甚至在马背上也能睡着。这三天我不进食，只是不停地喝水和抽烟，那时我称了一下体重，仅仅九十多磅（约合八十多斤——编者注）。

我们离龙眼洞不远了，当我们俘获冯应乾时，我们已能看到白云山了。他是我的同窗，（中央讨逆军第八路军前敌总指挥）蒋光鼐手下高级军官，当时担任信使。从他身上搜出的一封密函，我们得悉，（第六十师师长）蔡廷锴正准备率部偷袭我们。我断定：即使我们能攻入广州，最终也会被消灭。故我下令撤退。

最终我们没有同蔡廷锴部在九传湖发生激战，我们没有立即后撤。一回想起那场激战，我脑海中总是浮现蔡廷锴要偷袭我的消息。^①

^① 据《第四军纪实》一书说：左翼迫至人和墟不直下广州系处置失当，且两军联络不实，友军不十分拼命攻击前进，加上敌军空军参战，以致功败垂成。

12月12日，我的部将都同意我撤退^①的决定，我的副手李汉魂与所有的旅长都支持我的做法。然而，后来有人抨击我这一决定：既然陈济棠和何应钦已登上炮舰逃走，他们坚称，若我攻入广州，局势将发展到我们难以预料的畅顺。^②但是当时我不知道陈济棠已准备弃守。诚然，倘若我知道此事，我不会下令撤退的。

桂军沿着粤汉铁路行进，有几支部队并未打过硬仗。抵达新街后，桂军没有任何显著的进展。1930年1月初，我们撤到平乐，召集会议检讨广东战役的成效。李宗仁白崇禧都承认：旅长黄权和蒙志没有打出水平。由于黄、蒙二人亲近吕焕炎，李、白怀疑他俩心存异志，就同黄绍竑与我讨论这个问题。最后，李宗仁命令我解除黄、蒙两部的武装。我邀请二人到我的师部，向他们出示李宗仁的手令，然后扣押。他俩被押解到桂林监禁。我缴了这两个旅的械，然后把两个旅的官兵移交给李、白。

我们撤离广州地区，以保存实力。虽然行军缓慢，敌军却不想赶上来交战，只是以同样慢的步伐尾随我们。

在广东，我部遭受重大损失，只剩下1.4万多官兵，其中仅八九千人是战斗兵。我将他们整编为两个师，分别由李汉魂与邓龙光指挥，韩汉英被任命为第四军参谋长。我们再次挂出第四军招牌以振作士气。

我们释放了侯志明与其他在发起第二次护党运动时扣押的政训人员。我们到了广西后，并没有在军中恢复国民党的党部。本来我们都是国民党员，但坦白讲，这个党已“名存实亡”。

我们接受桂系的指挥。李宗仁说，是汪精卫吩咐我这样做的，其实这是我们自己的决定。因为我们弹尽粮绝，不得不要求李宗仁提供军饷，这一段时期过得特别艰难，自从驻防海南岛以来，我第一次欠发饷银。桂系只发给我部士兵与士官每天两角钱，军官每天四角，另外供应大米。广西的货币很不值钱，每日两角饷银中，有一角五分要耗费在燃料与食物上。我部下士兵在广西没有见过猪肉。已往我们的伙食要丰盛得多。

当桂系资金短绌时，就发给我们鸦片代饷。如果市价每两鸦片20元，桂系就以一两鸦片顶替20元下发，而我们卖给老百姓只能收回十七八元。可是李宗仁的护党救国军总司令部与我们军部都不能直接出售鸦片，所以我们只能接受更低的价钱，也只能自我安慰：聊胜于无。

作为“客军”，我们不能涉足包赌包烟等黑钱。能不能从公积金支取些许？

^① 占领人和墟后，因回援两龙墟，剧战四昼夜之久。中央军飞机大炮集中炸射，第四军死伤惨重。第一营的连排长伤亡殆尽，独立营营长黄克白阵亡，三十五团团团长李汉炯受伤。在万分紧急中，第十旅的团长黄世途失踪，十一旅的团长孟敏也失踪，前线无人指挥，各班独立苦战。12日下午全线伤亡惨重，第八路军迄无消息，张发奎不得已才下令撤退。

^② 随军向导说：广州的要人均准备下船退却，若乘胜增兵进入广州，则两广之敌后路断绝，不攻自破，张桂军不至于后来受飞机及大量敌人增援两龙墟苦战之害。

不，既然我们接受桂系指挥，它就要负担我们的财务。我们的武器弹药主要来自缴获敌军的装备。此外，我们的部队常常缩编，故需求不大。每一场战役之后，我们都派人到战场上搜集子弹壳与炮弹壳，送回军械库去重新灌注炸药。广西是没有兵工厂的。

我们部队里拥有西医，但是药品严重短缺，只好使用中药。李汉魂引荐了一个相当出色的中医——林英标，早先他在桂军第三师服务，我聘他为我部服务。

这一时期，第四军中的湖南人已经多于广东人，也有广西兵，因为我们合并了一大批李宗仁部属；我还有一批北方兵，他们从张学良部投降过来，一直追随我。

这段时期，我下令处决了一个违反禁赌令的士兵，他玩番摊时被抓获。我必须维持军纪。

同第四军的精诚团结相比，桂系内部的人际关系实在太复杂了。桂系依靠吕焕炎，因为它自己的部队大多都打光了：仅李明瑞、杨腾辉跟随俞作柏回到广西。此时李明瑞已逃到桂西，只剩下杨腾辉。杨腾辉害怕李、白、黄，因为在武汉他曾转而反对李、白、黄，留下了案底。

我很难确定桂系内部哪一部分效忠李宗仁，哪一部分效忠黄绍竑。白崇禧是追随李宗仁的，李、白之间没有隔阂。只有广西人自己才知道他们各人的实力，外边的标语写的是“李黄白”顺序。

当我完成部队的整编时，吕焕炎勾结陈济棠发动了一场叛变。黄绍竑与我率部南下，在贵县和桂平一带进击吕部，吕焕炎逃离广西。自此，我部开往桂西南，那儿没有敌军，我们可以利用广州湾（今湛江）重新打开鸦片出口贸易。我们还要自己寻找食米。

1930年2月6日，我到达廉州，不久薛岳重回第四军。这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无疑“雪中送炭”。

此时，粤军撤至梧州，蒋光鼐同我们驻香港的代表李章达取得联系，蒋和李是同学兼同乡（二人皆是东莞人）。蒋光鼐表达了同我们合作的愿望，建议我们派遣密使到梧州去。他答应不同我们开火，我们可以平安开赴梧州；他想同我们合作消灭陈济棠部，进占广州。我们相信他是诚实的，也愿意同他合作，他原来是我的部下。于是我们派司徒非^①与副官处长王超去梧州。他俩一到梧州就被扣押了，这是我们头一次中了蒋光鼐的奸计。

1930年2月中，黄绍竑与我率部在北流同蒋光鼐蔡廷锴接仗。^②当我命令士兵冲向敌阵时，他们都带上了全副装备，他们说：如果打胜仗，上级不会在乎，会补充装备；如果战死，那就一切都无所谓了。

^① 司徒非（1893—1937），广东开平县人，保定军校毕业，曾任江门市长、广州市公安局长。1932年淞沪抗战时任十九路军独立团团长。1933年11月参加闽变。1937年7月受一五六军军长谭邃邀请，任一〇六师中将参谋长。曾参加淞沪会战。11月10日在南京南门突围时中弹殉国。

^② 战场在北流东30里的三和墟，由于张桂联军要佯攻，故损失极重。前线连排长伤亡殆尽，激战两昼夜，至2月16日全线动摇溃退。黄绍竑承认自己指挥失当。

这一仗，我们被彻底打败了。当士兵们向后溃退时，邓龙光阻止他们，多数人不敢再退；但有个士兵不听从，邓龙光就地将他击毙了。

经此一役，蒋光鼐的六十一师与蔡廷锴的六十师自称“钢军”。蔡写信给我说：“人们称你是勇士，如今我发现你只不过是‘豆腐军’。你不敢勇敢地面对我！”他又说此后我们不应再使用“铁军”称号。这封信是他亲笔写的。“铁军”称号毕竟是人民颁给我们的，并非我们自吹自擂！

北流之战我们伤亡一千多人，我们把死者留在战场上，打了败仗就没有办法了；我们也把不能及时转移的伤兵留下来。我们安慰他们不要担忧，敌军不会杀死他们的。根据惯例，他们应该把伤兵送进医院。他们通常不必为我们的伤兵费神，伤兵们慢慢就会归队，有些是由人民协助回营的。我们的战斗部队下降到五六千人，此时我将第四军缩编为三个团，分别由吴奇伟、薛岳、韩汉英指挥。

北流之战后，第四军的将领们有没有打电报给黄绍竑安慰他，说打败仗是由于第四军执行任务不力？也许有这样的人，但北流之战是黄绍竑指挥的，难辞甚咎。经此一役，他的态度转为消极。我们想安慰他，但遭到大败，我们自然不能说这一仗自己打得好。

我们退到桂西南。不久，我们在敌军压力下退至南宁。可是，他们并未全程追击，而是停在郁林（今玉林）地区，随即又退至梧州。此时唐生智反蒋失败，通电下野去了香港。他给了我们十万港币，这笔钱是交给香港的著名药房“陈李济”之老板李朗如，他负责第四军香港办事处。这办事处是1927年我们初次失利以后在香港非正式设立的。钱存在香港，因那时没汇钱去广西的渠道。

我们同北方武人阎锡山、冯玉祥的关系属于什么性质，我不太清楚，因为专注于军务。国民党左翼的要员陈公博、顾孟余等都住在香港，与阎、冯保持联系。由于这些左翼要人无法进入广西，故我们派遣密使去香港同他们联络。在那些岁月，桂系首脑离开广西殊难成行。

北流一役失利后，桂军与第四军都捉襟见肘了。前途渺茫促使我们将注意力转向湖南。1930年5月，李、白与我决定进军攻打长沙进逼武汉，以便那儿与在华北已开始反蒋的阎、冯连成一片。为了进军湖南，我们得招募新兵。

5月杪，李、白与我出发赴湘，黄绍竑随他自己的部队开拔，我们只派了一支小部队留守广西。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加入了我们的阵营，那时他在湖南省主席何键手下任第四军的副旅长。

第四军攻占醴陵后，会合桂系第七军攻下长沙。6月初，我军从长沙进军平江。到了平江我收到黄绍竑急电，称他受到蒋光鼐蔡廷锴围攻，希望我军回师增援。那时衡阳已经失守。面临几种抉择，其一是蹶回去攻击蒋、蔡，然后再指向武汉；另一选择是不顾桂军继续进军武汉；第三种选择是进军江西。江西省主席鲁涤平已经秘密派人联络我们，答应在江西同我们交战。据说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谭延闿派人通知鲁勿与我们开战，鲁是谭的旧下属。

薛岳竭力主张进军江西，然后直指浙江，他不愿客居广西与回援黄绍竑，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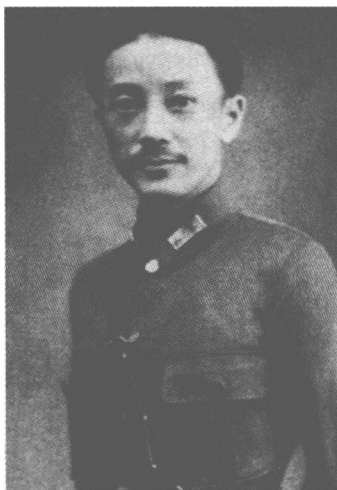
们都认为黄难敌蒋、蔡。但多数将领不同意薛岳的主张，^①因此举无疑断了后路，白崇禧坚持要维持广西基地，他与薛岳本来有隙。他建议我们回师进击蒋、蔡。我个人认为假道江西似乎希望不大，而回援黄绍竑则有机会击败蒋、蔡，如是我们能按原定计划进军武汉。另一方面，一旦败绩，我们也可以退回广西基地。此时多数人赞成回援，李、白尤甚，于是决定回援。

7月初，我们进击衡阳西南的洪桥，受挫^②后撤至广西桂林。此役双方都损失惨重，我们折损了二十三团团长李汉炯，敌军阵亡了旅长张世德。后来我才知，我部下一批士兵早先被俘囚禁，在此役得到解救，重回第四军。

据李宗仁回忆录说，洪桥之战后薛岳宣布同我各奔前程，允许部下持枪自选出路，此时第四军只剩一千多人，于是我要求解散第四军解甲归田。这完全不是事实！我永远不会离开自己的部队，薛岳并不悲观呀！那时第四军减员到只剩下原来的两至三成，我们考虑分掉剩下的公积金给所有的官兵然后各奔前程。^③事实是，我感到局势危殆，第二次护党运动失败了。然而，我仍决定不可以解散第四军。不过，因为第四军大幅减员，按比例讲，官多于兵。于是，愿离开的官兵，我们斥资遣散。那时，自幼结交的高州同乡李汉魂与邓龙光，由于悲观而离开了第四军，另一原因是他俩与薛岳意见分歧——邓龙光打过薛岳的追随者、团长梁国材耳光。我允许李、邓离开，宁可让薛岳留下，因薛岳意志坚定。李汉魂去了香港，我叫他编撰《第四军纪实》一书，当第四师驻扎山东时他已开笔撰写。

那时仅有几个高级军官想离开，他们都自由地走了。薛岳、吴奇伟等人同我一样择善固执。我和薛岳原打算进入李宗仁的护党救国军总司令部，但此计划未成功。

第四军和第七军重新整编，薛岳被任命为第四军第十师师长。据李宗仁回忆录说，他调拨了桂军两个师的装备、士兵以及少尉以下军官，共计六千多人给第四军，但我只收下武器与士兵而将军官退回给李宗仁的总司令部，却安插自己亲信的军官进去。实情是白崇禧想把第四军与桂军混编，他计划交换几个团，下一步是交换营级编制。亦即桂军调来一个团，四军调去一个团；接下来，桂军调到第四军那个团中的几个营要同第四军其他团的几个营对调。如此这般，后者团长



蒋光鼐

① 正因为多数将领不赞成薛岳取浙江之计划而回师进击蒋、蔡，不料此一着之差导致士气颓丧，一路逃亡甚多，战斗力大减，遂又遭一次失败。

② 据《第四军纪实》记载，洪桥之役剧战两昼夜，当时士气不振，疲劳已甚，械弹不如敌军，地形亦差，以致败绩。

③ 据《第四军纪实》说，各将领多心灰意冷，故将所余薪饷分发各同志自寻生路。

就失去原来几个营的控制权；最后，交换下达连一级，白崇禧称此为“油炸黄豆”。表面上，他十分赞美第四军，他说他希望把第四军与桂军混合起来直至合二为一；他称赞第四军，说通过这样的交流，我军的严明纪律会影响桂军。

我明白这是一个阴谋，李宗仁的总司令部是由桂系控制的，我们的军官调到桂军后，他们会被调职。然而，我无法抗拒这一计划。

1930年7月中，这一计划实施了。我的部属吴奇伟被委任为桂系第七军二十一师师长；我的另一下属张德能被任为该师第六十一团团长；桂军的苏祖馨被调到第四军第十师任三十团团长；经理处长陈劲节调任李宗仁总司令部兵站总监。团长张德能与苏祖馨率领自己的部下对调，按中国人习惯，士兵不容易适应新的长官，所以调兵不调官是不可能的。

接着，我们用哪两个团换来桂军的两个团（分别由王景宋与阚维雍指挥，拨归吴奇伟的第十二师，入第四军序列），我记不起了。据黄旭初在香港《春秋》杂志撰文说，桂军调给第四军的部队多于我们调去的部队。那毕竟是桂系要兼并我军的一个阴谋，他们以为我们离不了广西，盘算所有的部队最终都会成为桂军的一部分。还有一点，由于第四军纪律严明，它所到之处都受到人民爱戴，现在第四军是客军，广西民众与局外人——非我们自己——用了“张桂军”这一名号。白崇禧等人自然不希望看到我的姓氏排在整支军队名字之前，而且广西的军政首脑一直不喜欢他们的军队被人称为“桂军”。桂军的军纪还不错，没有异常现象。

我发现部下有人抽鸦片，遂设立一个机构主管戒烟。早先我收容了五十多个可怜的弃儿组织了第四军的童子军，对他们施行教育，到十七八岁时，其中许多人通过考试进入军校，以后他们跟随第四军实施“清共”。见到童子军的教育大纲甚为优异，有些军官让他们的子弟加入进去。

据程思远在《李蒋关系与中国》一书中说，第四军要求公开调查黄绍竑未按计划攻占衡阳之失误，事实是李、白与我知道湖南战事受挫后黄绍竑心情悲观，都想法子安慰他。我们的口号仍然带有黷武色彩：“有枪就有土，有土斯有财”。李、白决定战斗到底，第四军也决心反蒋。

据雷啸岑回忆，1930年7月31日，汪精卫电告李宗仁，曰张发奎打电报告诉他：共军已攻占长沙。汪希望李派军队北上同彭德怀、贺龙合作，又说他已命令张发奎同中共合作。这是无稽之谈，汪精卫的反共立场是相当坚定的，他时刻警惕共产党异动。在广州暴动前夕，他曾打电报给我，要我采取措施镇压共产党。

1930年秋天，北方与南方在军事、政治方面的反蒋联盟土崩瓦解。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缺乏真诚的合作，各派系都想利用别人，他们的联合是建基于私利而非公义，所以“同床异梦”。

此时，龙云派出卢汉——他号称“讨逆军第十路军前敌总指挥”——来攻打我们。卢汉包围了南宁。李宗仁下令黄旭初死守南宁三个月，以等候援军。当时士气高涨，我告诉黄旭初：倘若他能坚守南宁三个月，我就能粉碎围城的滇军。出发前，我设宴招待全体官兵以壮行色。白崇禧任前敌总指挥，我是第一纵

队指挥官。10月中，我们实现了诺言，南宁解围成功。当白崇禧策马追击敌军时，他说：“向华，来吧！”我率领部众追击卢汉直至百色，使滇军遭受重创。

我对白崇禧甚为不满，因为仗虽打赢，但我的部队损失也很惨重。右江流域多山，人烟稀少，气候恶劣。空气如此稀薄，以至妇女都要抽烟——在广西的山区，也是如此。稻子种得很少，玉米是主食。因为不习惯山地空气，许多士兵生了病。我鼓励士兵抽烟，分发生烟丝与当地的土造纸，让他们自己制造卷烟。这是个省钱的办法。

桂军没有参加追击，可是广西人习惯于那种气候。我很幼稚，我想解了南宁之围后，白崇禧应该让我们透一口气，休整一下，他多少应该对我们讲点礼貌吧。

1930年冬，黄绍竑离开了广西。^①他认为命途多舛，没和李、白商量就发电报倡议和平。他没有使用密码，也不害怕李、白报复，因为他与李、白的交情已维持好多年了。此外，当我们试图安慰他时，我们没有清晰地表示我们的态度。可是，我们从来想不到他会采取单独行动。

电报局局长梁达昌没有拍发黄绍竑这封电报，他把电文内容报告了李、白。他俩打算扣押黄，征询我的意见。我说，我们不宜扣押黄绍竑，否则我要解除一部分桂军的武装，可能激成内战，黄绍竑的追随者还不少呢！但另一方面，倘若我们让他留在广西，他会继续鼓吹和平，对我们的部队造成不良影响。我建议让他以广西代表的身份离开广西，委任他在外面促进南北和平；等他离开了，我们可以不认账。他俩接纳了我的意见。

我们询问黄绍竑那封电报的事，他承认了。我们告诉他，这么大的事情应该先同我们商量，我们终究不会反对这一倡议。实际上，李、白与我已秘密决定让他离开广西，不承认他在外的言论，改编他的部队。

就这样，黄绍竑经印支半岛去了香港。抵港前我们通电澄清我们的立场。后来蒋先生任命他为内政部部长，蒋先生想显示：任何人只要向他投靠，一定会得到高官厚禄。但是蒋先生也知道，他无法影响第四军，李、白也保持坚定立场。

黄绍竑离邕对桂军与第四军没产生什么影响，我们撤了几个亲近黄的军官之职务，把另一些黄绍竑亲信调到不重要的职位上去。杨腾辉被解除军职，转任省议员，置于监视之下。他哭着向我下跪，要求我帮助他。我叫他不要害怕，我和李、白都不会捕杀他。其他亲黄的军官失去行动自由，被监管。于是我们整顿了那几支原来忠于黄绍竑的部队。

桂系的旗号变成了“李白黄”，此时的黄是指黄旭初。权力仍掌在李宗仁手中，白崇禧仍忠于李，黄旭初则对李、白唯命是从，他没有个人野心。

^① 黄绍竑在其自传《五十年回忆》中说：“我觉得这几年的内战是太无谓了！于国家有什么益处？于人民有什么益处？于自己又有什么益处？于是我决心退出这内战的漩涡”，“潜回广西召集旧部实由于对方（指陈铭枢、陈济棠）欲借外人势力压迫一个失意的人，使他不能安居而加以侮辱……认为是一个奇耻大辱，不得不铤而走险，以谋相当的报复”。他居港期间，港英当局以“从事政治活动碍及治安”为由，具函限他三日内离境，故他憎恨在广州当权的“二陈”借外人势力压迫自己的同胞。

我觉得李宗仁的军事才干很普通，但他是个“伟人”。他为人诚实友善，作风民主。一天我们打网球，他叫卫士取一双胶鞋，我见他对他下人都是低声悄语，可见他待人公平。很少见到有大人物像李宗仁那样完全摆脱官僚习气与军阀心态，哪怕一个小兵都对他口碑良好。他不像冯玉祥那样既傲慢又做作。

白崇禧有军事天才，军事学识与军事才能俱优，还具备高度的政治觉悟，足智多谋，难怪人们称他“小诸葛”。但他不像李宗仁那般具有恢宏的气度。白崇禧非常“阴”（险），不坦率，遮遮掩掩的。事实上，除了李宗仁，桂系的领袖们都是这一类型。

我很了解郭德洁——李宗仁的如夫人。那时我们都称呼她“郭夫人”。为什么冠以她娘家的姓氏呢？是因为李宗仁要求人们别称呼她“李夫人”的。当她问我们为何不称呼她“李夫人”时，我们说：问你的丈夫去吧！他一直不让我们称呼她“李夫人”，所以直至抗战爆发，郭一直不能享受“李夫人”的荣衔。同理，吴奇伟的妻子被称为“龙先生”，因为她在军中担任政工，龙是她的娘家姓氏。这些称呼对于一个不是原配夫人的女子，算是很不寻常的。

我们在广西最后一年过得很艰辛。粤军占领了广西省的经贸中心梧州以及梧州至郁林的桂东南地区。这是广西最富饶的地区，盛产稻米，也是桂籍华侨的故乡。我们只好仰仗鸦片贸易来挹注军费。

我们的困境并没有影响军心，士兵完全了解形势，他们对我很好，士气仍旧旺盛，否则我们就不能坚持下去了。桂军待遇同我们一样。即使处于艰危境地，表面上李、白待我们还不错；但在另一方面，人们可以说是我们帮了他们的忙。他们不必担忧我们会叛变，倘若我们变节，肯定走不远。1930年12月中旬，我把公积金剩余下的十万元分派给老兵^①偿付军方欠款等。我解散了第四军经济委员会，把公债金分派给官兵们，由于财务拮据，部队再次减员。第四军军部被裁撤了，第十师也裁撤了，薛岳被任命为柳州军校校长。第十师的官兵被调配到吴奇伟的第十二师。十二师下辖三个团，分属沈久成、欧震和阚维雍，其他军官只能降级任用。军队整编纯粹是内部事务，对外我们仍自称“第四军”。出于习惯，士兵仍叫我“军长”。在吸取了广州暴动的教训之后，不管遇到什么挫折，我再也不离开部队。^②

那年冬天，我有时走访中越边境的龙州。一位法军营长知道我来，遂邀请我到凉山去做客。我越过边境，一路打猎。我见他的行径，感到震惊与痛苦——当他要跨上马背时，把脚踩在一个越南人的膝盖上来作踏脚石。我们行经一个小镇时，他随意鞭打街上的行人为我们开路。他见到一个小摊伸到街上太远，就一脚踢翻，把货物撒得满地，摊主敢怒而不敢言。

法国殖民主义是一种痛苦的现象，法国人是最坏的殖民主义者，他们把印度

① 《第四军纪实》说：“十二月十五日张发奎军长与吴奇伟师长带回公积金十万元清发老兵欠饷。”

② 12月17日张发奎对全军训话：“誓与各袍泽共患难到底，断不离开团体。”

支那人民当做奴隶。当地人民对于这种虐待只有忍气吞声。我的东道主只不过是一个营长而已，有什么权利这样作践百姓？我相信印支人民一定会起来反抗法国人。我在当时就下决心，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帮助印支人民。

我知道印支成立了革命党，但不知道名称是什么和有哪些人加入。我知道有些越南革命者被法国人杀害在谅山。我听说爆发了起义，法国称此为“动乱”，但我不知道是指哪一次起义。

当我倡导第二次护党运动时，我妻子在上海。廖仲恺夫人何香凝要求我太太与甘乃光太太陪伴她到外国旅游，我让她去。妻子访问了法国，我的三弟嘉斌正同薛岳的弟弟一起在那儿学习飞行。后来她去了英国学习英语。

1931年，我的妻子与嘉斌一起回国。我不能让他到广西来与我会合，因为他娶了个法国太太。他到广州加入了黄光锐的广东空军第一大队。黄光锐在广州很有权势，他是陈济棠一个儿子的教父。

陈济棠的长兄陈维周不知道我对嘉斌很恼火，他对嘉斌很好。他每月发给嘉斌两百元津贴。我很了解陈维周，当我和陈济棠都在当营长时，他在陈济棠营里当秘书，后来他当上了广东省厘金局局长。

我们不能在广西发动攻势。在另一方面，粤军并未向我们施压。陈济棠想封锁我们，他的口号是把我们的“禁烟”在广西。在逆境中，我同李、白在一起，咬紧牙关。

这种困境一直持续到1931年2月28日——立法院院长胡汉民被蒋先生下令软禁在南京汤山。古应芬——胡汉民的支持者南下广州。古是陈济棠的教父，陈对古绝对服从，甚至陈维周也听从古应芬。接着，粤籍的党政领袖以及一些非粤籍的政客南下。这个五羊城变成了反蒋的中心。

陈济棠派林翼中来看我们——广东现在来乞求我合作了。桂系领袖李宗仁可以仅仅派遣白崇禧去广州同广东的领袖商谈政军合作，但白崇禧坚持要我陪他去，他说他不能代表我的部队。另一方面，广东的领袖们也希望我去。

陈济棠和他的下属余汉谋、叶肇等都是我的老友和第一师的旧同事。此外，缪培南此时担任陈济棠的参谋长。当陈济棠邀缪去广州时，缪问我们，他可以去吗？我们告诉他先走一步。当然，白崇禧与这些人的渊源之深远不如我，所以他觉得有些话他不能说，而我则可以说。因此，我和白崇禧一起去了广州。李宗仁给我五万元钱，但我拒绝接受这笔钱。同时，广东的部队撤离了广西。接着，杨腾辉被允许离开广西，黄权与蒙志被释放了。既然两广要开展合作，就不必再担心他们这些人会制造麻烦。

第九章 政治与旅行

(1931年5月至1936年初)

1931年5月20日，白崇禧与我到了广州。由于回穗目标已达，我剃去了胡须。我想去泰康路观看那块谴责广州暴动的石碑，可惜它已消失了。我问出了什么事，余汉谋告诉我：他耗费很大精力提醒广东的领导人，如果他们想邀请我们回穗，就必须先移走那块石碑。陈济棠问怎么移，余说，很容易，他可以派工兵在半夜把那石碑打碎，把那些碎片抛入天字码头旁的珠江。

广东省主席陈铭枢被质问对软禁胡汉民一事的态度后，就离开了广州。他是蒋介石的支持者，自忖不宜留在广东。

汪精卫、孙科等领导人莅临广州。1931年5月27日，成立了党政权力机构。聚集在广州的异议人士包括西山会议派成员、胡汉民与汪精卫的人马、孙科“太子系”以及两广的领导人。汪精卫在广州时，表面上每个人都拥戴他为领袖，因为胡汉民仍被软禁着；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人们各怀鬼胎。只有陈公博与我们来自广西的人们才是真正支持汪。

汪精卫从来与胡汉民不和，胡是国民党右翼的领袖，汪则是国民党左翼领袖。两派人士非但在国内互相攻击，在海外也攻讦不停。由于陈济棠支持胡汉民，胡系人士在广州便显得重要，他们与西山会议派合流，然而人们尚记得：几年前胡汉民从莫斯科回到上海时拒绝会晤西山会议派人士。

我没有随白崇禧回到广西，部分原因是我感觉桂系阴谋吃掉我的第四军，另一原因是第四军只剩下一个师了，我离开它已无关大局。我健康欠佳，去了一次上海。朱培德介绍我去一位德国医生处就诊，他说我患上了肠胃病，倘若戒除烟酒，他愿意为我免费治疗，只收药金。那时我每天抽烟一百多根，再加几根雪茄与烟斗丝。我一根接一根地抽，把十个指头都熏黄了，制服上有许多烫破的小洞。我自参加革命时就开始抽烟，买不起纸烟，便用纸卷碎烟叶。在战场上，纸烟是最重要的。我可以整天不吃不喝，但不能不抽烟。

最后，我接受了医生的条件，选择了双十节开始戒烟戒酒。我故意选择这个日子，为了容易记忆。每当我决定做什么事时，我总是拣选国定假日起头。我就此戒了烟酒，我确信：“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此时我要求李宗仁资助两位第四军军官。早先第四军依靠唐生智捐赠的十万港币来招待赴港的访客，譬如黄镇球在花县负伤后到香港住了一段时间疗治。但

是，第四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李朗如告诉我，他耗费了五万多元购置了香港湾仔的两幢三层楼房，因为房租收入多于银行利息。如是，余款便不多了。

黄镇球想去德国医治，我要求李宗仁给两万元赞助。李宗仁说，他无力拨款给黄镇球，因为他自己必须照顾许多部属，可是他能给我付钱。我收下这笔钱如数转交黄镇球。

后来我又收到李宗仁支付的另一笔两万元，转交给吴逸志，他也负伤了，也想去德国治疗。在那个年代，德国是最时髦的，人人都想去那儿。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东三省，促成了南京与广州两大政治集团的统一。10月14日，当局应粤方要求解除胡汉民的软禁，他离开南京去了上海。10月21日，我陪伴汪精卫等人抵沪。作为汪精卫的支持者，他去哪儿我也去哪儿。在那些日子，我每天都见他，他住在香港巨绅何东的西摩路（今陕西北路）住宅，我住在法租界，邻居是黄琪翔与蔡廷锴。

胡汉民、汪精卫与“太子派”领袖孙科都在上海。他们的追随者希望彼此达成党政团结。汪精卫的追随者抛出“汪胡孙”的提法，另两派则颠倒姓氏的顺序。我奇怪为什么中山先生的三个亲密信徒这么难于合作。我有一份那时在上海发表的电文，可惜遗失了。

【孙科和】汪精卫感到蒋先生掌控了军队，【他们】需要蒋的军事后盾。【他们】希望蒋先生将他自己的权力限于军事，【他们】是现实势利的。在另一方面，胡汉民希望蒋先生永远没有机会东山再起，坚持要他辞职。汪精卫不同意。所以，11月杪胡汉民去了香港，然后去了广州。

【胡汉民的女儿胡木兰最近在（香港）《中国民主论坛》发表《回忆我的父亲》，驳斥外界称她父亲不是“伟人”。我不能苟同。胡汉民确实是有许多优秀的品格，他学问渊博，责任心强，人格完整，私生活也很简朴，但他不是一个伟人。无疑，蒋先生软禁他，对他不公道，但他没有中山先生的器度。1922年，中



孙科

山先生曾对吴稚晖说，只要陈炯明认错，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孙先生指的是那个策动叛乱、围攻观音山总统府的军阀陈炯明。】

此时汪精卫【和孙科这方面】和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关系如何？陈铭枢在政治上很有野心，在胡汉民被软禁后，他同蒋先生的关系恶化了。陈铭枢宣称，他是被赶出广东的，一如以前他宣称我强迫他离开武汉。我猜忖，蒋先生以为，没他命令，陈铭枢就不会离开广东。陈铭枢紧紧抓住汪精卫【与孙科】。在另一方面，汪精卫与孙科也紧紧抓住陈铭枢，因为他们想利用他的十九路军（由蒋光鼐与蔡廷锴两个师组成，那时由蒋先生直接指挥，已经移驻京沪地区）。

唐生智已经两次起兵支持汪精卫，都以失败告终，他手中已无兵力。他与妾侍住在香港凤飞台，此时更加亲近汪精卫，因为他需要汪的政治支持。至于第四

军，它仍旧留在广西。所以人们说汪精卫没有“资本”，这对孙科来讲更确切。

除了唐生智、刘文辉与我之外，汪精卫还有其他军人支持，朱培德、王懋功（曾任第一师师长兼广州卫戍司令）和方振武三人中：朱培德表面上支持蒋先生，但对汪精卫不错，他同我是好朋友，因为我俩都支持汪精卫；方振武是冯玉祥的旧部，那时住在香港，自从冯玉祥兵败后，方不敢住在上海，他怕被捕。

我猜测朱培德、王懋功、方振武、刘文辉与唐生智在金钱上暗中帮助过汪精卫，除此他怎能筹集活动经费呢？再者，他要花很多钱去供养在法国居住的家庭。我没有给过他钱。

在任何事件上，陈铭枢都是得意扬扬，神气十足。自然，政客与军人都在互相利用。这段时期我同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接触频繁，我们都想利用别人。陈铭枢对我说，蒋先生软禁胡汉民，这一着错了。

10月29日，我要求李宗仁收回调动第四军去右江地区的成命，广西人能够习惯右江地区的气候，但我们第四军官兵简直不能忍受。在如此恶劣环境下，开小差的将日益增加。我们真正忧虑的，还是被桂系吞并。第四军的将领们打电报给我，要求解决问题。我拍电报给李宗仁说，如果他一意孤行，倒不如把第四军解散了。桂系害怕变生肘腋，就没有坚持调动。

第四军呼吁支援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的抗日义举。有鉴于白崇禧一心想吃掉第四军，它如果留在广西，用不了几年就会完蛋了。吴奇伟与第四军其他军官都看清这一危险，他们要求我想办法解套。我同汪精卫讨论了这事，他建议第四军通电要求北上支援黑龙江省的马占山，那时全国人民都热情支持他的抗日义举。汪相信，抗日是何等重要的大事，桂系不敢阻挡我们军。他亲自起草了一系列电文，表达第四军渴望北上支援马占山，日期署在1931年11月17日及以后。

所有这些自然都是烟幕弹，援马只是离开广西的借口。我们想清楚了，一离开广西，第四军是不会去黑龙江的。

当我去广州同胡汉民、李宗仁、白崇禧商讨“援黑行动”时，胡汉民及其追随者说，在他们方面是没有问题的，但我必须同李、白商谈。李、白说，支援黑龙江抗日是好事，他们会提供方便。事实上，大家都认为第四军远道去黑龙江是不可能的事，知道这只是我的借口。

桂系阻挠第四军离开广西。李、白拖着不发布让我们离邕的命令。李宗仁总司令部的兵站总监陈劲节（原第四军军官）一怒之下去了香港。他知道桂系想消灭第四军，他写信给李、白说：除非第四军被允许离邕并安全抵达目的地，他绝不会移交从国外采购军火的合约，此重要文件在他手中。

李宗仁、白崇禧勃然大怒。我对他俩说，我要去香港找陈劲节让他交出军火合约。一到香港，陈劲节打电话给我，我问他身在何处，他说在山顶，但拒绝说出具体地点。他说李宗仁不停止干扰第四军离邕，他就不来见我，也不会将军火合约移交给桂系。

李宗仁打电报给汪精卫，控告我教唆陈劲节卷带重要文件出走。不久后我回到

上海，汪精卫向我出示了他这份电报。我否认这一指控，说李宗仁此举不公道：我根本不知道陈的出走。但由于陈劲节的威吓，李宗仁最终允许第四军离邕。

我到上海后，与宋子文频密接触，透过他与蒋先生联系。我们讨论了“援黑运动”，第四军离开广西后急需军饷等事。

这时我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这是怎么回事？通过协商，宁穗双方同意各自召开四全大会。双方选出的中执委与中监委全部有效。汪精卫起草了一张他属意的当选者名单，穗方不同意这张名单，故汪精卫的追随者说，他们会自己想法解决。于是，他们租用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召集了自己的大会。

我从不钻营谋官，做个普通党员就满足了，虽然我是汪精卫的追随者。在1931年11月23日召开的广州会议上，我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委。我是广州选出的唯一的汪系人士。在广东帮内，我同胡汉民、古应芬、邓泽如、萧佛成都关系良好。

我出席汪精卫在上海召集的会议，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最后达成的共识是，汪精卫上海会议选出的委员同样有效，汪让我作一抉择，我说我宁愿做中监委。我觉得在大世界游乐场选出的委员似乎不大庄重。此外，汪精卫也希望我接受穗方的选举结果，这样他的上海会议就可以增加一个席位——在汪系选出的一位候补中执委可以递补我的位置。当然，穗方也希望我接受沪方的选举结果，双方都希望多拿一席。

在作出抉择时，我觉得中执委较重要，但我对此不感兴趣，我相信一名党员的唯一目标是实现三民主义，所以我毫不迟疑选择了中监委。

1931年12月15日，由于胡汉民坚持，蒋先生辞去了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兼各职。11月29日离任前，他下令处决邓演达。倘若蒋先生没有被迫辞职，我相信邓演达不会被处死的。因为蒋很清楚知道，他的继任人会释放邓演达，因而先下手为强。我知道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提醒他这一点。

处决邓演达那天晚上，我在太阳公司顶楼的歌舞餐厅跳舞。何应钦从南京来电，告知邓演达的死讯，要我通知他的哥哥邓演存，他正好和我在一起。得此噩耗后，邓演存马上乘夜车去南京参加葬礼，料理后事。

香港左派出版的小说《金陵春梦》断言陈诚向当局出卖了邓演达，导致邓于1931年8月17日被捕。许多人都这么说，我却不相信。^① 陈诚与邓演达是十

① 根据邓演达战友谢树英、罗任一等人回忆以及邓演达、陈敬斋的审讯档案，现已确定邓演达是他的同志、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上海市干部会地下机关人员陈敬斋出卖而被捕的。1930年5月，邓从欧洲秘密回沪，陈于8月3日向南昌行营写告密信，8月中旬蒋介石由江西抵沪坐镇指挥，由陈敬斋带领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与静安捕房中西探员包围邓演达借用的愚园路20号，一举逮捕邓等十数人。蒋本欲收编邓，只要邓取消临时行动委员会，便任命其为“剿匪”副总司令，但邓因听闻蒋要下野而拒绝。此时何应钦、何键、何成瀾等联名致电蒋，称“此人不杀，不足以安天下慰党国”。1931年11月29日夜，由蒋的侍卫长王世和监刑，枪决于南京沙子岗。邓死后，孙科、李济深、居正等94人在上海《申报》连续登载治丧启事，张发奎也列名。1949年11月，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已改名农工民主党，由该党呈请周恩来、罗瑞卿等批准，责成江西省公安厅逮捕陈敬斋。11月8日，陈敬斋在江西景德自营的利兴富瓷铺被捕，押解到北京。1951年4月25日，北京市军管会军事法庭判处其死刑，罪名系“变节投敌，勾结蒋匪杀害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领袖邓演达”。故传说陈诚出卖邓演达，纯属谣诬。

分亲密的朋友。事实上是邓演达引荐陈诚到第一师——蒋的最精锐部队——的。甚至在邓演达出任第三党领袖后，陈诚仍同他保持联系。陈诚不是卖友求荣的人。我相信，即使是陈诚向当局检举邓演达，也只是想制止他的政治活动，并非想杀他。人们说，邓被捕后，陈向蒋先生求情不要杀邓。我相信这是真的，蒋先生没有立即杀邓也是事实。

邓演达死后，陈诚起用了几个第三党党员，例如严重（曾任第一师第三团团团长）和丘学训。陈诚佯装不知道他们是第三党成员的身份。

自南昌暴动前夕与邓演达谈话后，我再没有见过他，也不敢同他接触。我认为第三党有许多才华横溢的人，倘若邓演达不死，第三党是有前途的。

我帮助黄琪翔去日本后，他加入了第三党。此时，他已不在第四军，第四军也不欢迎他。（海军部长）杨树庄等加入过第三党。除黄琪翔外，我没有同第三党的其他成员接触过。继任的第三党领袖章伯钧同邓演达差得好远，黄琪翔也差得远。做一个党魁，最重要的是私生活正派，在这方面邓演达极为出类拔萃，他既博学又勤奋。

1931年12月28日，孙科被任命为行政院长，^①孙同汪精卫、胡汉民都比较亲近，同汪、胡两人之间由来已久的勾心斗角蔚成对比。孙科出任阁揆，减少了胡汉民集团反对政府的机会。孙科集团视我为汪派人士。派系的划分既清楚又严格。

汪精卫很失望，他的手足无一进入政府，无奈转而同蒋先生合作。

我继续透过宋子文同蒋先生联络——蒋先生已经通知我：有事要同他商量可以先找宋子文。宋很确定地告诉我：第四军离开广西就应由中央拨付军饷。当然，蒋先生不能公开帮助我们。

接着，孙科要蒋先生回南京，他应付不了局面，政府需要军人的支持。汪精卫与孙科在上海达成协议，1932年1月28日，中央政治会议紧急会议在南京召开，决议推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当晚，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那天午夜蒋光鼐叫人打电话给我，说对日抗战开始了，他要我去他的十九路军总部晤谈。

黄琪翔与我同去，我们同蒋光鼐、蔡廷锴、戴戟（时任淞沪警备司令）、翁照垣等人倾谈，蒋光鼐要我提供意见。我说：“小事化大，大事更大。”我指出，他在上海拥有一支庞大的部队，然日本驻沪不足三千人。我劝他先发制人——立即进攻日军在虹口的总司令部，凿沉吴淞口黄浦江上的船舶以堵塞日本军舰的入口。我告诉他，虽然蒋先生反对此刻就与日本开战，但只要他能扩大战况，政府一定会认可他的行动。蒋光鼐没有接受我的建议，他说他“只能应战，不能求战”。再无话可说了，只得离开了他的司令部。

蒋光鼐想当“马占山第二”，但他缺乏勇气主动进攻日寇。海外华侨支持

^① 邓演达的反蒋经费，主要由孙科提供，三次共付15万元，还允诺起兵之时助饷100万元。这笔钱未拨之前，邓即遭逮捕。

他，透过国华银行汇寄巨额金钱；上海市民热情支持十九路军。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举行了一个讨论会，他们支持十九路军，孙科等许多中委都赞成攻击日寇。李宗仁说，他要回广西去命令部众北上增援十九路军，他说：“向华，带领第四军！”坦白说，许多人都盘算扩大上海战事。

从何键致吴奇伟电报^①知，陈铭枢反对第四军支援十九路军。汪精卫要第四军开到上海，可陈铭枢拒绝让我们北上，他害怕我们扩大战事，更不希望第四军进驻京沪地区。

虽然蒋先生没有正式复职，但他仍然负责军事。1932年3月1日，十九路军奉命撤离上海。

5月5日同日本签订《上海停战协定》是一个错着。坦白讲，直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我们决定全面抗战时，条件仍未成熟。日本之所以侵略中国，因为他们自知有足够能力打败我们。如果我们在1932年奋起抵抗，就不会发生卢沟桥事变。如果1932年还不够条件抗日，那怎能指望胜利呀？为什么我们不应该胜利！？民族精神是重要的。此外，我们可以呼吁国际同情。譬如，1937年事变后，苏俄立即赶来支援我们抗日。



吴奇伟

1932年3月蒋先生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我对汪蒋合作有何看法？当然，汪精卫、胡汉民、孙科同蒋先生合作乃是最理想的安排；由于办不到，次佳安排就是汪、孙与蒋合作。孙科当立法院院长。外边挂的标语是“汪蒋孙”。

打了那么多年的仗，我一直盼望汪蒋合作，而不是汪取代蒋，我期望蒋先生尊重汪精卫的党政地位。我很高兴看到他俩合作。另外，这就意味着第四军不会再吃苦了。我感觉日子好过了，我也尽到责任了。

3月10日，第四军终于离开广西全州向湖南进发。桂军调过来的团长阚维雍也跟我们走。

第四军离开广西对我和桂系领袖的私人关系当然有影响。它依靠我们壮大声势，但“合久必分”是必然会发生的事。个人感情是重要的，可是，考虑得失也很重要。当我们算计双方利益一致时，我同桂系就合作愉快；当我们各自算计产生矛盾时，双方关系就要破裂。然而，在后来的岁月里，合作又光临了。

我们向蒋先生报告，第四军六个团，实际上只有四个团，分别由沈久成、欧震、阚维雍和梁展云统领。后者是地方保安团团长，在1929年底花县战斗时加入我部的。第四军实有人数，包括挑夫，大约七八千人。

我在上海晋见蒋先生。他信守诺言，给第四军发了军饷。蒋先生问我，第四

^① 1932年2月杪，吴奇伟接何键电云：“张部开往何处尚未筹商，真如（陈铭枢，当时代理行政院长）之意最好勿令其来沪”，使第四军进退两难，即放弃援黑请求、开赴淞沪归蒋光鼐指挥，以完成抗日志愿也不获准，遂只有留驻全州等候中央命令指定路线方能前进。

军可否去江西“剿共”。我告诉他，第四军属于国家，它不是我的私人军队。

1932年5月，第四军开抵江西，加入了第四次“剿匪”战役。自南昌暴动以来，我已经感觉到，同共产党和平共存是不可能的，但我认为内战是毫无意义的。除了广州暴动时期，我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此时称他们为“匪”。我始终认为，用武力去解决共产党问题是失策。蒋先生的口号是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去解决共党问题。我同意全力贯彻这一政策，但蒋先生并未确实执行。他依靠军事力量，忽视政治手段。如是，则不可能解决共产党问题。

【我不钦佩蒋先生的“剿匪”战役。自1929年召开军事编遣会议以来，他的自私性格暴露无遗。在“剿匪”诸役中，他养成了直接发布命令的习惯，其插手干扰引起了指挥系统的紊乱。钱大钧的兄长是在江西被蒋先生下令枪决的。我知道，原因是机场场上损失了一批货物。^①虽然钱大钧是蒋先生亲信，他也没法救回其兄长一命。】

我认为共产党问题的解决方法，在军事上应取守势，政治上应该在竞争中扑灭共产党。这就是说：政府必须见到共产党的长处，比共产党做得更好，在共产党失败时仍然施行仁政，以争取人民支持。在我的观念中，共产党的长处是，军人与政工人员在亲近民众方面成效卓著。

此时，我要杨德昭找陈济棠的兄长陈维周斡旋。杨德昭曾负责第四军的上海办事处，后来他跟着缪培南给陈济棠做事。我们乐意让他进入陈营，他可以在陈济棠手下帮助我们。此时他任陈济棠的南京留守处负责人。我要杨德昭找陈维周转告陈济棠，第四军是粤军，谁也不能预知未来会发生什么事，陈济棠为了前途起见，应该帮助第四军。

透过杨德昭，陈济棠给第四军每月2万元广东币，相当约1.6万大洋，款项由陈维周主管的广东盐务局调拨。第四军签署一张收据后，将整笔款项交付给陈公博用作汪精卫的活动经费。由于第四军已由中央定期发放军饷，它已不需要这笔钱，仅仅第四军的高层知晓这笔钱的去向，陈济棠陈维周都不知底细。

陈济棠愿意帮补第四军，因为他想同我们保持良好关系，以免第四军将来再反对他。毕竟对他来讲，一个月付两万元算不了什么，事实上他也不必掏自己的腰包。

蒋先生叫我回到第四军去，我拒绝了。虽然我仍是第四军军长，我让代军长吴奇伟支领这份薪水。我不用为生活发愁，蒋先生一次又一次给我特别津贴，我太太用于投资甚为成功。

那年夏天我去了庐山，在那儿觐见蒋先生。他再次要我回第四军，我再次拒绝，但提出反建议——让薛岳继任第四军军长，他已经离开柳州军校。蒋先生说：“你最好继续做下去。”【这就显示出蒋先生对薛岳印象不好。】

后来，我在游泳池见到何应钦，他试图劝说我回第四军。我说，我绝不会回

^① 1933年，南昌机场发生纵火案，烧毁飞机十多架。事缘军委会航空总署署长徐培根贪污公款300万经商失利亏本，遂烧毁仓库企图毁灭证据。

去，我不想重过军旅生涯，我想退休，建议蒋先生让我出国考察军事。蒋先生同意了我的请求，说我必须在国外住两年，但建议吴奇伟继续代理第四军军长。我说：“不，我必须辞职。”我不想做一个有名无实的军长。我告诉蒋先生，第四军是属于国家的，如果我去国外仍遥领军长一职，我的举止就变成一个军阀了。我坚持要他接受我的辞呈，说俟我从国外回来后，他应该另给我委任新职。最后达成共识，吴奇伟真除第四军军长，我被委为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院长是唐生智。

我为什么要离开军队？因为蒋先生不理解我许多观点，我想他永远不会信任我，他知道我亲近汪精卫，唯一办法是我离开。此外，打了这么多的仗，我实在累了。

有报道说，由于我要出国，汪精卫拒绝见我。我对汪精卫说，第四军缩编导致一批军官被裁撤，希望他帮助他们求职。那时顾孟余任铁道部部长。汪建议顾恢复全国铁路警察总署，任命朱晖日任署长，马少屏被委任为沪宁路警务处处长，其他失业的第四军军官各自被安插到各地的铁路警务部门。我还要去见汪精卫商谈其他失业军官的出路。我想，他嫌我太烦，事实上我打扰了他。不过，我以为，既然第四军是为他作出了牺牲，他就有责任照顾它的失业军官。

一天，我到汪精卫公馆，他正在书房，房门微开，从镜子的反射可以看到他的表情。当有人通报我来访时，我看到他的表情很恼火，我知道了他对我不高兴，也知道了原来他一直在利用我。我见了他，却未提及来意。可是，这件意外并非我离国的主因。此前我早已下定决心离开，汪精卫同意我的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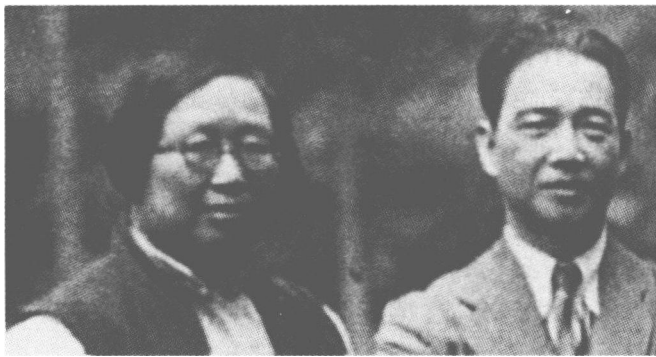
对于那些为他牺牲与战斗的军人的态度，显露了汪精卫的软弱无能。我常常对他说，第四军是为我打仗的，他应该照顾第四军。【可是，作为行政院长，他不敢对蒋先生进言。每逢出现议题，他总是要看蒋先生的脸色，他本身没有主意。他一阔脸就变，变得官气十足，忘了他从前的理想。是否因为他在军内职位不够高呢？不是，胡汉民对蒋先生态度坚定得多，讲话也更直率。当然，这一性格导致他被软禁^①。】

① 据杜月笙的秘书胡叙五透露当年胡汉民被扣汤山的一些秘辛，是幕外人莫名其妙的：原来那时当局和德国拟定密约，条约中的两大条款：第一，用德国教官训练中国徒手兵200万。第二，德国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条约所限，不能制军火，乃供给机器及技术人员在中国制造枪炮，制成后两国分配应用。此项盟约，照例要中国政府五院院长签署，始能生效。遂先征立法院长胡汉民意见，哪知胡不同意，当局恐事泄，立刻将胡软禁汤山。为免此事功败垂成，总望胡回心转意，拟派一个与胡接近的人，和胡商量，后来点将点到了刘纪文。哪知刘见到胡以后，胡便将中德密约和盘托出，详告与刘，并且叫刘将此中秘密，转告党国要人，从速在西南另组政府；并派刘纪文、陈友仁赴日本见首相犬养毅，要其出兵东北。以为如此一来，坐镇北京的张学良，势必回师东北，援救家乡；而冯、阎之二三集团军，无张监视，即可直捣南京。同时两广一、四集团军，即由衡阳进攻武汉，实行推倒南京政府。当局知道此项阴谋，乃先为预备，所以西南出兵到了衡阳，看见冯（玉祥）阎（锡山）毫无动静，亦即回师。西南政府见计划不行，再请日首相犬养毅撤兵回日，以平民愤；哪知被日本少壮派反对，要实行田中奏折计划。犬养要维持撤兵信用，双方坚持不下，遂被少壮派刺杀。后来胡由中央委派以赴欧洲考察名义出国，1935年返国，中央迭电胡邀约回宁。当胡到香港的时候，陈济棠即亲自赴港，迎胡到粤，不惜卑辞厚礼，请胡主持西南军政大计，一切当俯首听命。胡不能推却，哪知到粤以后，陈一切均阳奉阴违，中央虽迭电邀胡赴（南）京，胡已身不由主。陈济棠更以胡游说日本出兵之秘密相要挟，说如胡赴（南京）京即公布此一秘密。胡进退失据，抑郁愤惋，终致脑溢血以死。

【有人说，汪精卫与蒋先生的合作好像演木偶戏，他们真的是在做戏。我知道，蒋先生仅仅是利用汪精卫，汪也心知肚明。他当上了行政院长，他的几位追随者也已经当了部长。可是他有职无权，立法院院长胡汉民也是如此。但我认为，胡汉民比汪精卫坚强。】

陈公博出任实业部长后，也变得官气十足。此外，他的私生活不检点，对此我很不满意。就这些人攫取了高官厚禄。

顾孟余是一个革命理论家，十足是个书生。作为铁道部长，他毕竟没摆官僚架子，但他只是挂个名而已，是副部长曾仲鸣实际管事。那是因为他对汪夫人陈璧君言听计从。换言之，曾属于“公馆派”。



汪精卫与陈璧君

陈璧君控制一切。汪精卫是取消了同另一个女郎的婚约才娶她的。她对汪精卫的革命精神起了负面影响。1900年，这种革命精神曾经激励他图谋刺杀清廷摄政王。陈璧君以玩弄政治为乐，汪的追随者都对敬而远之，他们都怕她。

陈璧君还插手陈公博的公务。陈公博有一次讲了个他留美（1923—1925）时的故事。陈璧君要他为革命活动筹款，陈公博问：“我怎么行？我又不是四邑（美国华侨中最大族群的故乡，包括台山、开平、新会、恩平四个县）。”她说，既然是这样，你给我撰写演说词，你自己的演词自己写，陈公博照办了。陈璧君就是这样的女人。

我对她很了解，她个性很强，有时她絮絮叨叨说个不停，汪精卫不得不说：“可以让我先讲吗？”她讲话很粗鲁，又禁止汪精卫饮酒——他酒量很大。汪精卫如此惧内，使我们难以置信。我们称她为“男人婆”，她是个胖女人，但经常穿得像个男人，看上去雄赳赳的。她注重舒适，穿棉衣棉鞋，把头发剪得又短又直。

蒋先生叫宋子文给我五万元出国考察费。动身出国前，我确信我的部属都得到了安置，光是铁路警察署就安顿了第四军许多军官。

既然我出国的名义是考察军事，我计划访问德国——蒋先生建议我去拜访他的首席军事顾问、德籍中将乔治·威塞尔。蒋先生说，这位德国顾问能介绍我见到一些德国要人。威塞尔给我出具介绍信去见埃里契·鲁登道夫将军。

1932年11月2日，我和妻子离开中国。我没有固定的计划，我可以在国外居留到用完这笔考察费。由于这笔钱为数不小，我能出国很长一段时期。虽然我是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政府让我使用公务护照，但我拒绝了。我以普通旅游者身份，再次使用化名邹醒春。有些人仍然用此化名称呼我，因为我在国外写信使用这个化名。

客轮停在地中海，我把致鲁登道夫的介绍信扔到海里，我厌倦了军事生涯。另外，我不想泄露自己的身份。

我和妻子先去德国，因为吴逸志与黄镇球都在柏林，还有个原因是我国驻柏林公使刘文岛是我的好朋友。

刘文岛提供了公使馆的设施，让我饱览柏林景色。一天他告诉我，德国人知道我来了，要问我下榻何处，鲁登道夫已经收到信函告知我将拜访他。我猜忖是蒋先生的首席军事顾问直接写信给他的。刘文岛问我该怎样答复德国人。我说别承认我在他那儿。我不想会见鲁登道夫。

我妻子去了英国，接着黄镇球与我到捷克斯洛伐克访问了汪精卫，他正在那儿养病，天气寒冷。我想不起来我们同汪精卫谈了些什么重要的事，汪精卫仍旧是行政院长，仍然同蒋先生合作。后来，中枢派了一位少将率团考察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会讲德文的吴逸志同我加入了这个团，参观了兵工厂及其他感兴趣的地方。

在德国，我有两件难忘的经历。我出席了 20 堂讲授外国历史的讲座，吴逸志担任译员。我们第一次去那位讲师家里时，他泡了咖啡，说想问一个问题。他说，4.5 亿中国人民拥有几千年的文明历史，而日本只有六七千万人口与短得多的历史，然而它却能欺侮我们。日军只出动 128 个骑兵就占领了热河，东北军官兵望风披靡。1933 年 3 月 3 日，承德失陷，汤玉麟不战而退往滦平，张作相退守古北口。他想知道，为什么日本能这样摆布我们。我告诉他，并非中国人民无能，而是中国的地方军阀畏战，他们贪生怕死。

另一件难忘的经历发生在埃森。访问克虏伯军火工厂后，吴逸志与我站在一家店铺的橱窗前观看从不同国家进口的酒类，因为我是个酒鬼！一位老人走出店铺，问我们是不是中国人。这使我十分惊奇，因为人们总是问我们是不是日本人。我通常得解释我们是中国人。

这个老人说，只要我们国土一日还被日寇占领，他就一日不卖酒给我们；等我们回国赶走日本侵略者，我们可以再来他的店铺，任凭我们喜欢哪种酒，他会赠送给我们。你看，他看不起我们中国人，因为我们不抵抗。这件事使我没齿难忘。

希特勒上台执政后，我离开德国。如果不是他掌权，我会留在德国的。但我绝对不能接受他，纳粹党人的反犹太主义简直太荒唐了！

举个例子，我们常常光顾犹太餐厅，因为它便宜。德国人是非常俭朴的民族，他们午餐只点一道菜伴食面包。但我们喜欢喝汤，常常叫几份汤。在犹太餐馆，我们被告知：不必点汤，因饮水是免费供应的，他们想帮我们省钱。好，在希特勒掌权后，戴着纳粹党徽“卍”字臂章的青年们站在犹太餐厅与商店门口阻挡我们进去，说这里是不良场所，令我们到别家店铺去。

我见到有人被捕，纳粹党人十分残忍。在我离开这个国家前，我想把银行中的一笔钱转拨给我的四弟勇斌，他正在汉堡学医。银行节外生枝，行员问我，勇斌是什么人。我说他是我弟弟。他们问我，为什么我弟弟的姓氏与我不同——事

缘我用了化名姓“邹”。在德国，人们甚至没有把钱划拨给别人的自由！

勇斌陪我去英国同妻子会合。我国的驻英公使郭泰祺是汪精卫的拥趸，也是我的好友，他为我们提供了各种方便。一天，张学良与郭泰祺到医院来探望我，当时我住院治疗胃病。屏退郭公使让我俩单独相处后，张学良问我，1927年我为何不撤出临颖。我答，这很简单：我想等到日落再撤。张说，当时他必须撤退，因为冯玉祥正向郑州挺进，在那儿奉军兵力不足，以致冯军威胁到他的补给线。他还告诉我，他刚接收额外的炮兵——正载在临颖车站的货车上。他说：“如果我不决定撤退，你的部队将遭到致命打击！”我们的谈话着眼于未来的友谊，我俩都善饮。

我很少同陈公博联系，同汪精卫联络更少，我想避免惹麻烦。另外，坦白讲，我对他们都很不满意。我也没有同第四军的旧下属联系，我告诉吴奇伟别写信给我，以免惹起蒋先生的怀疑。甚至间接联络也没有，我不希望作出危害我的旧部的任何事。

我甚至没有写信给居港的薛岳，【自从蒋先生拒绝起用他后。】到1933年，陈诚对蒋进言后，蒋才开始重新起用薛岳，陈诚与薛岳交情不浅。薛岳加入了“剿匪”战役，吴奇伟率领的第四军划归薛指挥，【但蒋先生对薛态度仍不友善。】

当第四军的高级将领陆续“离开舞台”时，陈诚迅速在军中崛起。由于陈诚的第一师背景，他确实与第四军有渊源。他知道第四军英勇善战，便希望我们出来帮助他。可以说，薛岳与陈诚是在互相帮助。

同样的原因使陈济棠任用缪培南当（第八路总指挥部）参谋长，不再计较我们曾经与他激战。李汉魂与邓龙光此时也在陈济棠麾下。当年离邕去穗前曾与我商量，说是缪培南邀他俩的——很明显，缪培南的表现得到陈济棠的赞赏。我鼓励他俩赴穗履新。

从伦敦出发，我们游遍了整个欧洲。在汪精卫回国前，我妻子陪伴我到巴黎探望他。黄镇球则陪伴我第二次游历巴黎，在那儿我们见到陈铭枢。在短暂充任交通部长后，他偕女友玛嘉丽离开中国。在交长任内，因牵涉招商局变产契约及签订电讯合约受贿一案，辞职出洋。陈铭枢没有提及十九路军计划发动闽变的事，但我回伦敦后，陈铭枢写信要我同缪培南弟弟缪培基去巴黎看望他。故我同



邓龙光

妻子、缪培基再度赴巴黎。这次陈铭枢说，他要回国了，如果发生任何事情，他会打电报给我，并且邀请我们回国帮助他。他没有再深入谈下去。

在巴黎，我偶然遇见陈友仁^①，与他的妻子——张静江之女（张荔英）。我

^① 陈友仁（1879—1944），生于牙买加。早年就读于英国，曾在伦敦及西印度群岛做律师。1912年回国，任北京政府交通部法律顾问。1924年任孙中山英文秘书。1926、1931年两次出任外交部长。1933年任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委员，闽变失败后流亡海外。

们约时聚会，谈及国家大事。陈铭枢与陈友仁反对国民党，也反对国民政府。我对政府不满，因为它腐败无能，也因为它奉行对日不抵抗政策以及依靠军事手段解决共产党问题。但我不反对国民党。

1933年10月底，我和妻子去了法国港市尼斯，因为我忍受不了伦敦的雾。在尼斯，我收到李济深和陈铭枢发来电报，要我回国帮助他们。11月21日，福建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打电报给在柏林的黄镇球，他妻子早已在我帮助下到了柏林，他夫妇俩来尼斯同我商量，我说】我不能回去，因为听说叛军取消了我们的国旗——换言之，他们想推翻中华民国——也因为他们想颠覆国民党。他们太幼稚了！【可我并不反对他们的反蒋立场。我告诉黄镇球，他也不该回去。】叛军不仅反蒋，他们还同共产党合作。十九路军政治部主任徐名鸿和闽变不少成员都是共产党员，虽然后来徐声称他是社会主义者。【但黄镇球说，他已经答应回去帮助蔡廷锴，接着他回国了。】

陈济棠接受了中央的命令，进攻十九路军，但是1934年1月，在陈济棠部开抵福建前，闽变失败了。范汉杰、毛维寿、沈光汉、区寿年和张炎——张世德的弟弟，十九路军所有的高级军官都投靠了蒋先生，蔡廷锴等人不得不逃亡。徐名鸿逃到他的故乡广东大埔，被陈济棠部捕获枪决。

【黄镇球到达新加坡时，福建人民政府彻底崩溃。】黄镇球逗留香港期间，陈诚【完全不知道黄回来的原因，】要他去南京。陈诚常常施惠于第四军成员。他问黄镇球在德国学了什么，黄答：“防空。”【他确实没有真学到防空，仅仅参观了防空设施。】事实上，我们一起参观了一些设施。不管如何，他就这么当上防空学校教务长，校长是蒋先生。

陈济棠打电报给吴逸志要他回国。我同意了，因为这意味着吴逸志不再需要第四军供养了。回广州后，他结识了中山大学一位女生。当陈济棠派他回德国买军火时，他带了这个女孩，在赴捷克斯洛伐克的飞机上与她结了婚。她的妹妹嫁给了中国驻布拉格公使。

回到伦敦，我见到胡秋原与王礼锡夫妇、陆晶清、陈孚木^①以及其他参加“福建人民政府”的人。我常常认为胡秋原是一个书呆子。陈孚木同一位英国姑娘建立了亲密关系。当我为此责骂他时，他说他只是为了学习英语。

我想去看看苏联的社会，乃要求郭泰祺帮我办理签证。郭说我必须使用真名；否则，如果在苏联发生什么意外，我就得不到外交保护。于是，我们决定用我的真名申请签证。苏联驻英大使向莫斯科请示。当批示下达时，我被告知我是“不受欢迎的人”，苏联政府不能保证我的人身安全。我听说，当俄国人纪念广州暴动周年时，我被视为敌人，他们展示我的相片，称我为他们的战友的“头号刽子手”。

^① 陈孚木（1892—？），广东东莞人，云南讲武堂毕业。1926年3月任广州国民政府监察委员。1927年任武汉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1931年12月当选国民党第四届候补中执委。1932年1月至11月任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政务次长。抗战中投靠日伪。1940年增选为汪伪国民党中央委员。1942年12月任汪伪新国民促进会上海分会委员。

那年冬天，我与妻子去西班牙与葡萄牙。当我们走进里斯本一家百货公司时，几个营业员走过来问我们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我们答是中国人。他们问我们有否去过澳门，我们答去过。于是，他们走开了，完全瞧不起我们。他们以为我们来自澳门——把我们当成他们的奴隶。由于这一不愉快的经历，我们停留两天就离开葡萄牙返回伦敦。

我记得在伦敦有过两次不开心的经历。一到伦敦，我和妻子入住第一流的旅馆——蒋先生给了我一大笔旅费。但我们登记时表露自己是中国人时，被告知房间都已客满。后来我们想省点钱租一个套房。一天，我们走过一幢悬挂“出租”牌子的房屋。我们看过了房间，觉得挺满意付了五英镑定金给房东太太。第二天我们去到那儿时，她丈夫拒绝了我们，说妻子不晓得他已经把房间租出去了。

我注意到，种族歧视几乎都存在于教育程度低的族群。教育程度较高人们是不错的。说到底，可能每个地方都有种族歧视。可是，在法国我真的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1934年8月5日，蔡廷锴在翻译秘书麦英俊陪伴下到了伦敦。政府电令驻外使领官员不得接待蔡。当他打电话给郭泰祺时，郭装病不肯见他。蔡廷锴十分气愤，过来找我。由于我无官一身轻，故可以见他。我解释道，他应该谅解外交官们得听令南京的苦衷。我看望了他几次，当时他的两个儿子正在英国留学。

我同纽约的国民党左派联系。在纽约有两个国民党党部，其一是由支持胡汉民的右派领导，其二是由支持汪精卫的左派领导。左派派遣曾任第四军后勤军官的华侨谭光中到伦敦来看望我，当时他在左派机关报民气日报任职，该报发行人是朱贯日。谭光中问我几时访问美国。他回到纽约，便做好了欢迎我的准备工作。

8月中，我和妻子离开伦敦。当我们到达纽约港时，有人问：张发奎将军在船上吗？——一位华侨发来电报欢迎我。我否认自己是张发奎，因为我不希望华侨兴师动众欢迎。然后，海关官员坐了汽艇登轮，他们问张发奎将军在船上吗？我第二次否认。他们解释道，倘我就是张发奎将军，我的行李将受到免检通关的礼遇。这样，我才承认自己是张发奎将军。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叶国良与其他许多人会见了。民气日报敦请中华公所组织了盛大欢迎，中华公所确实是超党派的，它安排纽约所的华侨组织代表出席这一盛会。与会者中有客家社团仁和会馆的代表、另一个客家社团惠州工商会、刘关张赵四姓组织的龙冈亲谊公所、安良工商会、黑社会从事烟赌业的协胜公会以及政党——致公堂等等。中国立宪党是唯一未派代表出席的组织。国民党右派党部的代表也会见了。我。

华侨为我在纽约一家大旅馆预订了房间，要支付我的花销，但我坚持一切费用由我自己负担。应中国驻纽约总领事叶国良的要求，旅馆升起了中华民国国旗。

翌日，我拜访了所有派代表出席欢迎会的社团，包括致公堂。该堂在纽约比

外地强大，因其党魁司徒美堂是纽约安良工商会的会长。在致公堂总部，我见到标语“打倒孙文！”致公堂因中山先生“忘恩负义”而对他极为恼火。我也见到墙上挂着陈炯明、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的相片。

致公堂攻击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当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致公堂前任党魁黄三德回国想谋个官职。孙大总统率直告诉他，华侨不可以在中国做官。此人回到美国痛骂中山先生，说他忘记了致公堂昔日给予他的经济援助。自此致公堂成了反国民党的一股势力。

我计划在海外停留一个时期。美国有许多华侨，他们对我的热情欢迎出于我预料之外。四邑乡亲组成了旅美华侨的最大群体。我深得民心是因为我当团营长驻扎四邑时军纪严明，在民众中留下良好印象。然而，这确实不能成为我在粤人中普遍享有盛名的唯一的原因，因为有好多广东县份我都没有驻扎过。我想，我在北伐时的出色表现是人们待我热情友善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例如汀泗桥战役被华侨们视为奇迹。至于客家人，他们是一个紧密结合的群体，他们感到我为他们赢得了荣誉。

在纽约的几场演说中，我讲到了忠党爱国，我没有讲任何反对政府的话。

1934年8月28日，蔡廷锴也来到纽约。中国总领事叶国良陷于窘境，因为华侨们希望他会见蔡。为了避免尴尬，他匆匆离开了纽约。

福建人民政府的旗帜在蔡廷锴下榻的旅馆升起。我去该旅馆看了一下，摄下照片。华侨什么东西都送给蔡，把他当成了1932年淞沪抗战的英雄。致公堂也欢迎蔡。稍后，有些华侨告诉我，蔡廷锴在纽约正式加入了致公堂，他必须下跪，接受烦琐的仪式。致公堂要蔡抨击我，因为我支持国民党，但蔡没有照办。

倘若蔡廷锴没有来到纽约，鉴于国民党左右两派的斗争，右派一定会在纽约抨击我。由于蔡竭力攻击国民党，右派牢牢抓住了我。

在旅游波士顿等地后，我们来到芝加哥。在华侨以我名义举办的餐会上，我会晤了美国医生奥兰多·斯各特博士，他在市政府任职。他对我烟酒不入感到诧异，问我为什么。我答称肠胃有病，他提议为我体检。我经历了为时一周的全身检查，然后他邀我去他家。他告诉我，不可以再抽烟，但适度饮点酒对我有益。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很简单，孙总理常常讲抵抗力，我的病很平常，但没有抵抗力，简直愈益恶化。我说饮酒使我痛苦。他说胃疼也要饮。他拿出一只大酒杯，说这是他的传家宝，倒了些白兰地交给我，说：“当你战胜日本时，我会将这酒杯送给你。”我饮完了白兰地，说：“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一定会得到这个杯子。”他给我配了些药。自此，我又开始饮酒。你要知道，一周后，我的胃再也不疼了。后来，我恢复了饮烈酒。

我在斯各特家中见到国父相片，他告诉我，他信仰三民主义。后来，他告诉我，他已经在芝加哥加入了国民党。我同他通信，持续多年。

在一个华侨社团，我会见致公堂前党魁黄三德，此时他已被开除出致公堂。有人指着他说：“那就是黄三德。”他已成了老翁，看上去凄惨可怜，几乎像个

乞丐，住在会所中。

蔡廷锴应邀去芝加哥。芝市最有力的华侨组织安良工商会坚持要中国驻芝市领事到车站迎接。否则他们要大闹一场。当政府不能支持他的使领人员时，总领事会得依赖华侨的支持。他并非粤籍人士，要我去同安良工商会商量。我约见他们说：总领事是政府委派的，不是华侨委派的。如果他去迎接蔡廷锴，他一定会被撤职；如果华侨擅自委任一位总领事，不会得到美国政府的承认。我说：“如果你是总领事，你会怎样做？你们不是说过，他对你们好、对你们有帮助吗？”安良诸君接受了我的观点。在另一方面，我建议蔡廷锴抵芝时，他像叶国良一样避开。

1934年10月7日，在蔡廷锴抵达芝加哥前几天，我们去了墨西哥与古巴，然后去好莱坞。11月4日蔡廷锴到达旧金山时，我们在好莱坞。蔡对欢迎群众说：“我不理解华侨为什么要欢迎一个烧毁广州的人，他曾是我的上司。我们应该欢迎他还是打倒他？”群众应声高呼：“打倒张发奎！”这一场景由中国立宪党机关报世界日报作了报道。

旧金山的龙冈亲谊公所派了四个代表到好莱坞邀请我去旧金山，我拒绝了。我说：“华侨内部的斗争与我无关。”他们哀求我去，我改变主意跟他们去了旧金山。

到埠后，我收到一封匿名信，曰：“你烧毁了广州，至今拒绝认罪，有何脸面来此地？你必须立即离开！否则，当心你的脑袋！”当国民党左派机关报国民日报与国民党右派机关报少年中国晨报的记者到访时，我说，我将在旧金山逗留半年。

我觉得蔡廷锴的头脑太简单，遂约了他在一家中国餐馆会面。我说：“我们俩人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个人物，我们终究要回国为国家效力的。事情与华侨无关。你为什么蠢到要被他们利用？你为什么耍诬骂我？华侨要你骂我只是贪图一时得意。可是，我们的私人关系并未受到伤害。”他答应不再骂我。

我同蔡廷锴仍然保持友好，虽然我们政治立场不同，但我们是好朋友。他和我一起度过艰辛的岁月，政治影响不了我们的友情。我常称呼他“高佬蔡”，他则叫我“向公”。

在旧金山，我同国民党左派联系频密。我认识黄迎春，他是旧金山国民党左派党部领袖，也是当地秉公堂的魁首。秉公堂是黑社会组织，也是旧金山最有力的华侨组织。

中国立宪党总部在旧金山。该党党魁陈敦薄与世界日报的财务负责人邀请蔡廷锴赴宴，国府驻旧金山孔总领事也出席了，他不知道蔡廷锴会到场。在宴会上，他发表演说，称蔡廷锴为“抗日英雄”。次日，世界日报报道了这段讲话。我对孔总领事说：“你将被政府处罚！”后来果然被撤职，我告诉他，他本应离开这个餐会。

在南方，我注意到很强烈的种族歧视，我也回想起在旧金山发生的一件事。一天，我和妻子偕同孔总领事与许多华侨去观看足球比赛。一位华侨的女儿坐在离我们几排远，突然间有一个醉汉用卷起来的报纸拍打她的面孔，说“炒杂碎，

炒杂碎”。我认为此人假装喝醉，非常愤怒。我妻子叫那女孩唾他，可是女孩不敢照做，故我叫坐在身边的华侨过去打那个色狼。孔总领事怕事，期期以为不可，但我们可不管。看到我们向他冲去，那男人赶忙逃走了。

我收到蒋先生的电报，要我回国。他汇给我一万美金，相当于三万大洋。他没有讲明要我回去的原因，我本来不想回去，但再想之下决定，还是回去的好。原先我早已想到旧金山学习驾驶飞机，那儿气候是理想的。可是我被拒绝参加飞行课程，因我是色盲。我开始对美国意兴阑珊。另一个我决定回国的原因，是蔡廷锴给我找的麻烦。

我买了一辆别克汽车，载了妻子和几个朋友去了温哥华。在那儿我听说1935年2月11日蔡廷锴在檀香山攻击我的语气比较温和。在温哥华国民党设于唐人街中餐厅的欢迎宴上，两名警察突然进入，对中国总领事说话，后者脸色马上变白了，告诉我约有一千名华侨包围了餐厅。我们的聚会有十桌人，我望见窗外至少有五六百人，他们想冲进殴打我，认为我要为火烧广州负责，还骂我是共产党。我见到他们举着标语：“打倒张发奎！”我猜想幕后黑手是致公堂，它在温哥华很有力，华侨盲目跟从该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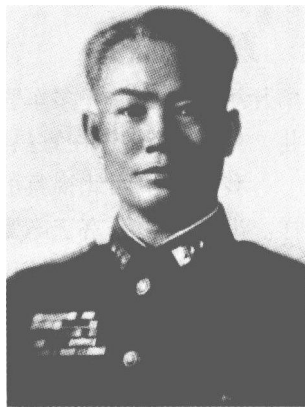
温哥华警方派来一辆汽车，在电话中建议我从后门走一条小巷离开餐厅。我拒绝了，因为我离开餐厅后还要应约到200码（约合183米）以外的国民党党部去发表演说。我告诉警察，我认为这些华侨是暴民而非我的同胞。警察劝告我再等15分钟。然后，警车到达了，警察为我开辟了一条通道。我准备打架，我对赴宴的年轻人说，有胆的跟我来。我叫他们在裤袋里装上汽水瓶，许多人跟着我出去。当我们出现在门口时，暴民问谁是张发奎。我说我便是张发奎。倘若他们想动手，立刻可以冲上对付我。可是，警察没有让暴力冲突发生。

跟着我在国民党党部演讲时，有人向党部玻璃窗掷石头，警察同外边的暴民发生冲突，不得不用水龙驱散他们。我用扩音器对他们讲，我们都是中国人，倘若他们有意见，可以进来同我讲，为什么我们要在外国的土地上打仗呢？最后，两部警用摩托车护卫我离开了国民党党部。

我的相片登上了温哥华的报纸，它报道说，人们直呼我为“铁军将领”，果然名不虚传。此后，当我外出时，都要由警方摩托车护送；在旅馆则由一名便衣警察保护。有鉴于我惹出这些麻烦，我放弃了访问加拿大其他城市的计划，与妻子搭乘班期最近的客轮回国。

3月12日到上海后，蒋先生派黄镇球来见我。几日后我去南京见汪精卫，那时蒋先生在四川。

5、6月某日，我去汉口会晤陈诚。蒋先生派了“美龄”号专机到汉口来接我去成都，途中在重庆过了一夜。



陈诚

在重庆机场我和一些等待会见旅长的中央军士兵谈话，至今仍留有生动的回忆。我询问一名班长：“你们的旅长有几个老婆？”他不知道我的身份，答道：“四个。”我问：“你的旅长拥有西式的洋房吗？”他答：“是的。”我问他有没有娶亲，他答没有。最后我问：“你怎么能跟随一个行为宛如典型军阀的长官？”他答：“你错了，等我当上旅长时，我也会有这些东西。”这活生生描绘了军人中愚笨的军阀心态。

当我到达成都时，我见到蒋先生的豫鄂皖三省“剿匪”司令部秘书长杨永泰，他与我约时间觐见蒋先生。蒋回溯往事，说：“我领导无方导致了民国十八年的不愉快事件。”我说，原因不在于他错或我错，而在于他与汪精卫不能坦诚合作。蒋先生要我回部队去，我则希望从事建设性工作。我自忖能胜任一个省政府的建设委员，我还说，我愿意到西北视察，然后听从蒋先生分配工作。蒋先生说：“好，好，让我迟些同陈诚商谈你的工作。”他叫我等待薛岳，说他已传召薛从前线回来述职。蒋此时对薛岳的态度很好，因为薛在“剿匪”战役中表现出色，使他很满意。

在等候薛岳期间，我游历了峨眉山。那儿风景极美，比我见过的世界各地任何风景都美丽，那是一种自然的美。



薛岳

见到薛岳后，他问我同蒋先生会见的情形，我告诉他讲了些什么。他说，我不应该这样坦率，不应该指责过去蒋汪之间缺乏合作。我说：“那我怎样回答他呢？”薛认为我应该更有礼貌。

薛岳告诉我，共产党已无路可逃。许多年后，张国焘告诉我，渡过金沙江后，共军已精疲力竭，在川西一次会议上，他力主进军西康，赶走刘文辉，反对一路打到陕西去。可是与会的大多数人赞成北上，认为抵达陕北就安全无虞了。此时他们收到高岗从陕北打来电报称：一旦他们抵达陕北，他将负责红军的全部供应。

我从成都回到上海，见到一些第四军军官。既然第四军此刻隶属薛岳，就不需要我去插手它的事务了。【我离开第四军后，许多军官纳妾，例如吴奇伟与欧震。李汉魂娶了个海关职员的女儿，是他1929年在宜昌结识的。】

我开始了西北视察的旅程。我先去山东泰安，在泰山脚下一个村庄见到冯玉祥。冯玉祥是个富于幽默感的人，他说：“向华，我有许多隐藏的‘冰’。”我以为他指的是兵，颇为惊讶，想地球上哪里能隐藏他的兵呢？随后在用餐时他要副官“把冰拿出来”，原来他指的是冰激凌，而不是兵。他对我表示，这么好吃的东西只有我光临才会端出来。

在济南，我见到冯玉祥的旧属韩复榘，他已当上山东省政府主席。然后我访问了青岛、天津、北平、万全（今张家口）和包头。我在绥远见到（绥远省政

府主席兼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然后去山西,见到阎锡山,他的口音很难听懂。

阎锡山能在山西掌权那么多年,的确是有两下政治权术的。但他的观念仍太封建,明显的事实是:山西境内铁路轨距同邻近省份尺寸不同,旨在阻止外人进入山西。我还见到河北省政府委员张荫梧。我见到山西省所有的重要将领。

山西被称为“模范省”,但我不知道“模范”在哪里。在河南,我对它的良好道路与乡村建设留下印象。我走遍了山西全省,这里的道路就不敢恭维了。“模范”两字仅指人民穿简朴的衣服。广西的人也是这样,难道也可称“模范省”吗?我所到之处都受到盛情款待,但我没看到任何特别出色的东西。

我从太原飞兰州,再去陕西,在那儿见到了杨虎城和陕西省主席邵力子。从陕西,我飞回上海。

我当时仍然是汪精卫的拥趸。他对我不够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要反对他。我仍然支持他。也许你不能接受旧道德。让我打一个比方。一个女人结婚了,生了一连串孩子,她丈夫成了鸦片鬼,又不管家用。就这,她怎么办?她不能离婚,所以她只好接受现实。这同我情况一样。当然,我同汪精卫的关系并不同夫妻关系完全一样。

1935年11月1日,南京发生了谋刺汪精卫一案。当时我并不在场,因为去下关车站迎接冯玉祥了。谁是刺汪案的主谋?此事我不清楚。^①

此时我加入了道社。我认同道社的宗旨,它强调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道社是这组织的秘密名称,对于外人,它号称“民生经济原理研究会”。

王正廷是我的介绍人,在他家里加入的。除我与王正廷,还有王伯群、李晋、李绶、钱永铭、杜月笙和杨德昭。王伯群是这一组织的主要倡议人。入社的手续如何?两位介绍人,填具表格保证遵守道社纪律。

道社组织了一家民生公司,我投入股本1000元。

【蒋先生知道道社吗?我问其他人,他们说蒋先生知道。道社希望蒋先生默许。我们认为吸收孔祥熙入社是个好主意。我们希望获取蒋先生的信任,就好比政学系那样搞定蒋先生。】孔祥熙后来加入了,杨虎城也加入了。

【黄郛是政学系领袖之一。李根源是后台老板。杨永泰进入了蒋先生的总司令部,但他在政学系的地位却不如李根源和黄郛。许多政学系成员都当上了省主席,例如吴铁城、吴鼎昌和黄绍竑,后者离开广西就加入了政学系。】

我加入道社同支持汪精卫有何关联?我信任汪精卫是个人行为,但我从来没有加入过任何改组派的团体。汪精卫不知道道社的事,我不能让他知道,也没有汪精卫的其他支持者加入道社。

^① 根据军统要员池步洲回忆,刺客当场被逮,此人名孙凤鸣,是十九路军一名排长。组织与指挥这一行动的是黑社会头子王亚樵,他以晨光通讯社为掩护,组织暗杀团,原来目标为蒋,不料汪精卫竟替蒋挨了三枪。事实上,刺汪案幕后主使人是李济深、陈铭枢,晨光通讯社的金主乃是李济深与陈铭枢。

第十章 闽赣浙皖边区与苏浙边区

(1936年初至1937年7月)

1936年初，蒋先生宣布委派我接替卫立煌任闽赣浙皖边区“清剿”总指挥，卫调任湘鄂边区新设立的职位。我拒绝此职，卫立煌催我去办移交，我留在上海不肯上任。

“剿匪”第一路军总指挥陈诚劝我受命，最终，私人关系使我接受了这一职位。他把黄维的十一师和霍揆彰的十四师调到闽赣浙皖边区，这两个师先前隶属于陈诚率领的第十八军。

罗卓英被任命为闽赣浙皖边区“清剿”副总指挥，中央知道他能同我合作。第三次北伐时他在第四军服务，是他的大埔同乡吴奇伟引荐他来到第四军。

此时蒋先生发布委任令已两个月，卫立煌已经离开边区。我推荐第四军旧属朱晖日任“清剿”总指挥部参谋长。在那个年代，通常中央选定参谋长人选后会咨询总司令的同意，以确保合作无间。我常常自己任用参谋长，这也表示中央对我特别尊重。

“清剿总指挥”是那个时期使用的专有名词。按规定，总指挥是在执行最高军事当局的命令。我遵从黄琪翔的忠告，留下了小胡髭，他说留髭会使我显得更加威严。当然，他本人长得英俊，留了髭看上去很伟岸。

我在浙江省江山设立了司令部。这个浙赣边境的小县城是戴笠的家乡。我的责任是指挥“剿匪”行动与指导练兵。

闽赣浙皖边区的边界从浙江金华向东南延伸到青田与浙江海岸的瑞安，沿着浙江与闽北海岸继续向南，转向内陆朝福建建瓯，然后向北到江西婺源，从那里到产茶叶的安徽祁门，再向东南到安徽绩溪，转东南到浙江建德，最后回到金华。这个围起的部分便是中共残部活动地区。边区包30个县。在浙赣两省的边区，人口稠密；到了闽皖两省，由于多山，便人口稀少，省界沿线也人口稀少。省界是沿着自然障壁划分的，它划得妙极了。

在边区内部，党政军机关的关系如何？我的职责是在“剿匪”事务上指导党政运作。这四个省政府任命县长与专员，后者受权管辖几个县，在边区内直接接受我的指挥“剿匪”，边区的政治、经济机构都要配合军事需求。譬如，当我们决定出动到某县“清剿”共军残部时，我直接向县长下达命令。他就分别下令属下的保甲长动用地方保安团队执行“剿匪”任务，各该保甲长都兼任地方

武装的头领。共军俘虏会被转解给县政府。

保甲制度起了很大作用，这是一个组织民众的良好制度，6至15户组成一个甲，6至15个甲组成一个保，以此类推，就像军事组织一样。蒋先生听从杨永泰的建议才实施这一制度。事实上当年曾国藩也用过这一制度。我对曾国藩并无任何特别的印象，他是投笔从戎的。我并不特别崇拜他，从整体上讲，我不崇敬清朝的人。

保甲制度也有其负面影响。许多民众恨它，不因为这制度本身，而是因为人民厕身其中。迄今为止，村长成为压迫全体村民的唯一“恶人”。这一制度把保甲长添加到压迫下层民众的行列中去了。保长压迫甲长，甲长压迫百姓。每当设立一个新的机构，中国人的贪腐陋习便乘势蔓延，新的机构打开了更多贪污机会的大门，就像民谚所说：“多只香炉多只鬼。”

我并未实际管理过这四个省的省政府。倘若省党部与省政府不服从我，我只能报告中央。我偶尔见到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因为我的“清剿”指挥部设在浙江。我很少见到安徽省主席刘镇华、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和福建省主席陈仪，他们也不需要拜访或求教于我。必须强调，仅仅在边区“剿匪”事务上我才拥有权力，我只访问过一些吸引我个人注意的县份。

我的指挥部直接指导国民党党部的反共宣传，但并不插手党组织或选举，这一管辖权属于省党部。我没有接触过省党部，仅因为“剿匪”行动而接触过县党部。事实上我从未负责过针对共军的“清剿”行动。在边区毕竟有一些共军的残部，他们分散在各地。罗卓英是实际负责“清剿”行动的。每逢周末，我回上海陪伴妻子，星期六去，星期日下午准时回指挥部，以便准时出席星期一的纪念周。这样就有一夜可以跳舞，我已经欧化了。

那两个“剿匪”师的官兵多是外江佬，尤其是湖南、江西籍多于粤籍。在高级军官中，有粤籍也有非粤籍。奇怪的是，十八军有些高级军官是浙江人。

这两个师的军纪良好，对我顺从，因为其军官是陈诚栽培的。我过去指挥过的部队在军事与政治常识上确有进步。还有其他部队隶属于我——两个原来属于方振武（港英政府前布政司陈方安生的祖父，因在察哈尔与福建两地反抗中央，失败后下野）的旅，被收编为中央军，由卫立煌留下来，官兵多数是北方人。其中独立第四十六旅旅长鲍刚^①很有幽默感，他告诉我在旅、团长高级训练班结业后他与蒋先生的一次会见。蒋先生习惯于传召各种训练班的毕业军官作个别谈话。当蒋问他有何感受时，鲍刚答：“现在我不再担心没饭吃了，现在我是您的门生了。”蒋高兴地说：“好！好！”

我不知道那两个旅是否善战，我从不过问那两个旅或两个师的内部事务，他

^① 鲍刚原系方振武部属，1925年投靠冯玉祥，北伐时编入国民联军援陕军，1928年任四十一军军长，翌年任四十五师师长，1930年任三十八师副师长，1931年任独四十六旅旅长，官愈做愈小，他认为这是没有后台的缘故，所以有这番感慨。1937年12月，他又升任第十三军副军长，参加台儿庄会战。1942年3月在豫南游击总指挥任上被暗杀身亡，年仅38岁。

们直属于中央。他们甚至不告诉我正确的官兵人数，我也不需要去打听。那我怎样实施管理？如果部队表现不佳，我会报告蒋先生。我应该常常向部属演讲，但却很少去做。我想显示消极态度，表明我没有过分的野心。中央没有派遣政工干部到我的指挥部来。在边区我的指挥部，没有党部，至于部队里的党组织，我不清楚。但军官们很少把工作重点放在军队党组织上。

中央只提供我的“剿匪”指挥部及其直属单位的经费，指挥部编制很简单，只有参谋处、副官处、经理处和掌握电讯的机要处，以及大约一百个士兵；直属于指挥部的只有一个特务连、一个通讯排和一个军乐团。我常常请示中央拨给我军乐团，我喜欢在特别场合听它演奏。

那两个师、两个旅直接从中央领取经费^①，赵志尧负责“清剿”指挥部与两个师的后方留守处业务，掌握军饷、供应等。赵志尧把经费汇给经理处，指挥部成员的薪饷由经理处移交副官处。有时钱没有花完，指挥部不能吞掉这笔钱，因为剩多少都还给了经理处。指挥部直属部队从经理处领取饷银。

我的饷银是每月640元，此外还有每月1000元的特别津贴，那确实是一大笔钱。

中统局也许派过调查员来我的边区，但我不清楚它的活动。

在“剿匪”时期，在我的边区有多少人因共产党言行而被捕？以我所知，为数不多。

我知道有军统局的特务在边区活动，但我不知道是些谁。军统局直属于军委会，是由蒋先生直接掌控的。有些特务是军官，特别是担任情报工作的军官。事实上，大多数情报军官是特务。其他特务是做政工的。可是，我们不能去问他们。军统局的成员在部队中考察部队（对中央）的忠诚度。【我们叫他们“蓝衣”，但不当面称呼。我们感觉到他们不喜欢这个称呼。】



戴笠

我同军统局长戴笠关系很好，在这一时期我对他更加了解了。军统局在杭州与空军官校所在地笕桥之间办了一所秘密警察训练学校。表面上它是一所高级警官学校，学员中有部分是军人，毕业后，他们秘密渗入军中，其他人则深入社会各个层面。学员中有女性，我是从上海百乐门舞厅的舞女黄白英口中知晓这所训练学校的。我认识她已久，由于我认识他父亲，她称我“张伯伯”。一天我问她为什么很久未见她。她告诉我，她在这所学校受训。1937年7月我在庐山见到戴笠时，我问他：“你认识黄白英吗？”他说：“认识，你想见她吗？”我说：“是的。”我只是开玩笑，可他回答：“她马上就到。”翌

^① 军政部军需署成立于宁汉分裂后，设三司一处——会计、储蓄、营造司、总务处。送石友三100万元使其倒冯（玉祥）投己，送李明瑞40万使其倒桂投己，都是蒋透过军需署付的款。

日，她果然搭飞机到来。我猜忖戴笠调她来庐山从事某项工作。

【军统局的口号是“鬼挡杀鬼，佛挡灭佛”，这就符合“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宗旨。陈诚有一次坦言：戴笠是神志清醒的，但射杀其他特工一定不冤枉。

蒋先生赋予戴笠很大的权力，但他永远不会把所有权力交给一个人。蒋先生早就刻意栽培胡宗南，树立他的地位。当戴笠掌控了军统后，胡宗南荣享了一大部分黄埔军人的支持。于是产生了“十三太保”——全是黄埔一期毕业生，他们都是蒋先生最宠爱的门生。这13人包括康泽、酆悌、贺衷寒、邓文仪、桂永清、刘健群、潘佑强、郑介民、葛武繁、梁干乔、萧赞育、滕杰、曾扩清，再加上三李——李延年、李仙洲、李默庵。

起初陈诚与黄埔系并无联系，在1935年出任蒋先生的武昌行营整编办公室主任前，他未曾受到过重用。整编是一件难事，会因而得罪人。从此以后，一部分黄埔学生支持陈诚，他的十八军大多数中下级军官是黄埔毕业生，十八军人才辈出。】

【陈诚的保定军校背景能适应当时的局面吗？当时黄埔毕业生在军中刚刚起步，保定毕业生要位高权重得多，陈诚起用了许多保定生，例如罗卓英加入了十八军。蒋先生滋润了陈诚。陈诚也具有政、党联系。我已经说过，他起用邓演达的部下，例如严重。作为浙江同乡，陈诚最终还能依靠同蒋先生的省籍渊源。】毫无疑问，在这段时期陈诚的权位稳步上升。他敢于向蒋先生坦率进言，他是我所亲见的两位敢于向蒋先生直言者之一，另一位是宋子文。

【另一批黄埔毕业生则拥戴何应钦。何曾经领导黄埔师生北伐与两次东征。此外，他是一个和蔼、诚实的人。可是与其他人相比，何应钦的地位没有提升。有人认为蒋先生对他态度冷峻是因为1927年8月有人逼蒋辞职时何没有站出来挽留。】

我同复兴社（有时称蓝衣社）成员的关系如何？在边区，部分政工与参谋，尤其是情报官是复兴社成员。复兴社的起源要追溯到1920年代中期黄埔军校内组建的孙文主义学会。可是，并非所有的孙文主义学会成员都加入了复兴社。复兴社成员在军中监视共产党的渗透活动，也考察军队对蒋先生的忠诚程度。他们骄傲自大，犹如“天之骄子”。他们通常称呼蒋先生为“校长”。有一次我呵斥他们道：“蒋总司令是你们的校长，但他也是我的上司。如果你们拥护你们的校长，是否认为我不拥护我的上司？”

我没有同德国军事顾问接触，也没听到德国顾问在中央的活动。作为一名驻扎在外地的军人，我不知道南京的事情，相信与我同样职务的外地军人也会这样回答。

在这段时期，国军接受德式军训，废止了日式军训，因为从德国回来的学生宣称德国制式较优良。例如向右转，日式是简单地举起左脚；还是德式咔嗒碰鞋为好，德国兵穿的是皮靴，穿胶鞋或草鞋的中国兵怎能“咔嗒”呢？我们只能

见到流血。另外，我们没有那样强壮的体格。

我同意大利顾问几乎没有接触，因为他们在空军服务。但访问洛阳空军学校和其他单位时见过。当我见到我们的军校学生迎接意大利顾问使用法西斯式的敬礼时，我感到很难过。我不喜欢墨索里尼那套玩意儿。中央命令全体官兵在集会中每听到“领袖”、“委员长”、“总理”时要突然立正。在“蓝衣社”神气十足时期，意大利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在边区担任“清剿”总指挥时，我没有在比较平静的地区行使权力，那是因为那儿没有共军和土匪。在共军与土匪被赶走，复兴重建工作应该交给政治家去做，但是有些军人自私自利野心勃勃，他们兼任省主席，那就是军人怎样会变得有钱有势。虽然我是粗鲁的军人，但我知道在如此环境下潜藏的危机。我反对任命军人任省主席。因为我自己是军人，我甚至强烈地不同意这么做，试问哪一个省是由军人治理好的？政治智慧绝非轻易得到的。

有个别政绩良好的军人省主席吗？我想不到任何一位。许多人说福建省主席陈仪，然而我不同意这一说法——许多善事是我在福建做的。我感觉军人十之八九是独裁者。倘若我当了省主席，也许我也会变成独裁者。但是我从来不想被任命为省主席。我始终认为军人从政是错误的。统率一万多人的一个军已经够困难的了。一个最小的县也居住至少 8000 人，而大的县份往往超过 100 万人。如果管理一个军够伤脑筋了，一名军人怎能去管理一个县？命令发布下去，绝不能保证它得到执行。很难指望老百姓会执行某人的命令，因为他们绝不是像士兵那样组织严密。至今还有许多军人认为他们能够管好一个省政府。【刚想起黄旭初，他当广西省主席许多年。他能保住权力是因为他没有个人野心。但他的政绩如何呢？广西省自称为“模范省”，但它能向我们端出什么来证明这一荣誉呢？】阎锡山在山西又做出什么政绩呢？

【当 1936 年蒋先生任命薛岳为贵州省主席时，薛岳与龙云结拜成金兰兄弟。我不喜欢这类东西，我认为属于封建性质，在军阀时代，这结拜弟兄具有政治谋略的特性。当军人想利用别人，他们便以交换红帖子来变成义兄弟，帖上写着“同生共死”云云。倘若我也想这么做，我会拥有许许多多结拜兄弟。】

文官任省主席比军人好一些，但事实上文官也未必政绩良好，并非所有的文人省主席都做得令人满意。尽管如此，文人省主席的昏庸无能绝不意味着军人应该干政。直到现在，国民党仍然依靠军人。【毕竟蒋先生本人是军人。】

现在我对国民党的看法是：自北伐成功后，国民党就变质了。于是这样的标语出现了：“党员可杀”。老百姓马上就不满意国民党。

【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权力特别大。1935 年 11 月国民党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选举时陈立夫比蒋先生多得一两票。蒋先生十分生气，吩咐他的下属重新投票。他们的权力来自何处？当然是蒋先生。陈诚也是依靠蒋先生。然而欲进入权力的人，也必须是两下。陈氏兄弟领导的 CC 系是国民党内的一个蜂房，它比国民党本身的组织紧密得多。】陈氏兄弟中陈果夫更有权势，他守口如

瓶，拟订了一个庞大计划。他从不暴露自己，待人和蔼友善。我很少见到他发怒，可是偶尔听到陈立夫大声训斥别人。

我认为国民党倡导的新生活运动只是一句口号，何尝实施过？国民党高层个个都贪图享受。蒋先生提倡新生活运动是因为他看到国民党与整个社会恶质化。但是所有的运动成功与否端赖党政领袖是否以身作则，领导人本身的品格是决定性因素。【全国统一后，蒋宋孔陈四大家庭愈来愈有权，改革必须从他们身上开始。】



陈立夫

【国家统一后就应该准备建立宪政。如果中山先生活着，国民党的训政一定早已结束，必须以德服人，而非以力服人。坦白讲，在他的个人权力得到巩固前，他并不愿意实现宪政。】

作为特别国防委员会委员（1936年1月8日由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政治委员会任命），我除了去南京出席几次会议外，什么也没做。

1936年6月初，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同广东的陈济棠发起了抗日运动，其实是以抗日运动为幌子从事分裂国家反对中央的活动。我觉得他们错了，他们蓄谋反抗中央为时已久。

在我出任闽赣浙皖“清剿”总指挥不久，陈济棠以色盲为借口强迫我的三弟嘉斌离开广东空军。他顾虑嘉斌不可靠。嘉斌仍旧不敢来看我，因我仍对他恼火。他去拜访黄镇球，由黄引荐给蒋先生。蒋先生要他去找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经过测验证实嘉斌并非色盲，后被委任为中国空军轰炸机中队的教练。

当南京与两广又生龃龉时，我会见了陈济棠的五兄陈维周，他去南京觐见蒋先生回穗途中路过上海。陈维周笃信命相。每当广东有人接受重要任命时，他都安排一位江湖术士翁半玄去看望此人。如果翁的观点是正面的，这项任命就正式发布；否则，这项任命就会被搁置。这次陈维周赴京，与蒋先生促膝面谈，仔细观察了蒋的面相，发现蒋先生“满脸晦气”。早先他偕同翁半玄去蒋先生故乡奉化专门看了溪口蒋母墓的风水，断定不出两年蒋先生必将权势不保。

翁半玄告诉陈维周“大运已至，机不可失”，陈便断定蒋先生的日子屈指可数了。陈济棠常常过于轻信他五兄，于是贸然推出反抗中央的计划。我相信，若非翁半玄进言，不管桂系怎样怂恿，陈济棠是不会举起反蒋大纛的。

1936年6月初，我会见李汉魂的下属陈公侠，时任粤东“清剿”专员。他告诉我，李汉魂派他去南京见杨永泰。杨永泰与李汉魂、邓龙光是茂名地区同乡，【李汉魂与邓龙光遵循“杨永泰路线”——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路线。】陈公侠问我有什么话转告李汉魂，我要他引用一句古话给李，大意是如果有人谋反，他的前程是不确定的；否则他有可能平步青云。我希望李汉魂起来反对陈济棠，但我确实不敢为此多说话。

当陈济棠、李宗仁发动两广“六一事变”后，蒋先生决定分兵几路征剿。他指定我为前敌总指挥。于是我率领两个师与其他单位，自江西进击粤北，罗卓英担任我的副手。我对蒋先生说我不想参加内战，建议罗卓英取代我的职务。他不勉强我，说我可以挂前敌总指挥的名义，让罗卓英执行。他要我去福建协助蒋鼎文，他正准备进攻广东的东江地区。我的职位蒋先生没有发布正式任命，他只是简单告诉我去协助蒋鼎文，但是事实上蒋鼎文必须听我的，因为我的职位比他高。

因此，我带了一批同事到福建厦门，蒋鼎文组织了一次盛大欢迎仪式，大量的宣传品称我去厦门是指挥讨逆战事的，旨在恐吓陈济棠，让他知道。我这个老对头现在奉中央之命率军讨伐他了。事实上，我并未肩负任何职责。我住在厦门对面的外国租界——鼓浪屿。

我到厦门后几天，7月6日李汉魂离穗去了香港，他发表了致陈济棠的著名通电，人们称之为“挂印封金”，他把官印、公款等一切东西还给了陈济棠。^①这表明，李汉魂不支持陈济棠，但他并不采取行动反陈。中央为此极为高兴，因为不费分文就使李汉魂离开了陈济棠阵营。何应钦打电话告诉我这一消息，要我打电报鼓励李汉魂，赞许他做了一件好事。我拒绝了，因我觉得李汉魂做了一件错事。我对何应钦说，李汉魂应该立场鲜明——反陈或拥陈，却不应该选择第三条路而出走。

中央【采用“银弹”政策】成功地策反了广东空军第一大队队长黄光锐，于是飞行员驾机投向中央，人们打趣说：翁半玄的“机不可失”，系指飞机而非机会。

粤东绥靖主任余汉谋不想掉转头去反对陈济棠，因为陈维周待他很好。陈济棠对东江地区钨砂走私运往香港一案持眼开眼闭态度，省政府失去的一大笔税收流入了余汉谋个人及其下属的腰包。但最终还是在他的下属陈勉吾（陈伟）与李彦和的压力下转而反对陈济棠，那两位下属纯粹由爱国意识驱动。李彦和^②跪在余汉谋面前哀求他，陈李二人都是余汉谋与我在广东陆军小学的同学。

在余汉谋倒戈后，陈济棠挟公款2600万元偕陈维周、第四路军副总指挥李扬敬等人乘英国军舰“海虎”号逃到香港。蒋先生犒赏余汉谋几百万元。

【事实上，如果李汉魂听从我的劝告掉转头反对陈济棠，广东省不可能落入余汉谋之手。当时李汉魂与邓龙光各指挥一个师驻粤。】

蒋先生要我离开厦门。在我返回闽赣浙皖边区之前，滞留于上海，我在那儿会见了余汉谋。他刚去南京觐见蒋先生，正要返回广州。我当然称赞了他的义举，他是我的同学兼同事。我们常常一同外出消闲。

^① 据1967年6月3日邓龙光在台北接受夏莲瑛采访时透露，当时李汉魂正访问广州。原来约定要等邓龙光回到潮州，李汉魂才发表通电，但李汉魂等不及了，于是邓龙光匆匆离开广州，因为陈济棠已派人监视他。

^② 李彦和（1896—1989），本名李煦寰，广东惠阳人。广东黄埔陆军小学第五期、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天津北洋陆军军医学校及法国里昂大学毕业。时任粤东绥靖公署政治部主任。

有一次我去南京时，何应钦告诉我，蒋先生后悔已往待我甚不公平，但遗憾的是，二级上将的名额已经用完了。我从欧洲回来后，正逢国军军官授衔。条例规定，挂四颗星的一级上将有8位，挂三颗星的二级上将有22位，五星特级上将仅1位。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陈济棠、李济深、张学良当上了一级上将，蒋是唯一的五星特级上将。

边区“清剿”总指挥本应授二级上将军衔。鉴于我的资历（当过孙中山卫队营长），二级上将也已经偏低了。我完全有资格当战区司令长官，但我从不求官。

我告诉何应钦，我不在乎。我被授予中将，加二级上将衔^①，何允诺一旦出现空缺，我会立刻真除上将衔。

为奖掖在北伐时期的功勋，11月我被颁授宝鼎勋章，在这以前，由于我的反蒋态度，从未得过此一荣衔。宝鼎勋章会带来许多其他奖励。这样有些不妥，授勋必须及时——在建立勋业时或者建立勋业后不久。还有，我从未因为（在广州暴动中）消灭共产党而受到任何奖励。

1936年9月，军委会任命我为闽赣浙皖边区主席。这一官衔的改变并不会影响我的权力或者我与边区党政军部门的关系。

接到中央命令后，我搬到浙江衢州，这是一个特区行政长官的职位。衢州比江山大得多，在这里指挥“剿匪”较前更为方便，但我本人态度仍倾向于“剿匪”（共军）是负面的行动。

蒋先生注意到我的消极被动态度，问我为何从不参加“清剿”工作，我说我没有兴趣。我相信，依赖武力去对付共产党是不适当的。他问我是否对修筑国防工事有兴趣，我说是。因此，苏浙边区便特地为我设立了。1936年11月我被任命为苏浙边区绥靖主任，负责修筑苏嘉国防工事。到那时为止，修筑任务一直是由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负责的。我在浙江嘉兴设立了总部。苏浙边区的边界从江苏平望到海岸的金山卫，继续沿着杭州湾到澉浦，向北到太湖，然后沿湖边到苏浙边界的杨店。这个边区比闽赣浙皖边区小得多，但人口十分稠密。

我们已经耗费几年时间从事苏嘉国防工事的建筑。这座国防要塞是由德国顾问设计的，当要塞工事动工时，我还在国外。我接手时，工程已到了最终阶段。苏嘉国防工事从苏浙边境的西塘到浙江嘉善；从浙江平湖到浙江海岸的乍浦。苏字指江苏边境，嘉字指的是嘉善。

中央军校校长张治中负责修筑吴福国防工事，它从长江南岸的福山延续到昆山苏州地区，是在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指挥下施工的。黄镇球的八十七师与孙元良的八十八师都隶属于张治中。

苏嘉、吴福两个国防工事极为坚固，大多数工事是有伪装的，我们修建了钢筋混凝土地堡充作营连长的指挥部，它好似建筑在方形的坟墓中；机关枪与山炮的

^① 这一任命是1936年9月12日分别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与行政院长蒋介石分别签署的，任命状保存于哥伦比亚大学张发奎卷宗。

地堡则筑成圆形或长方形的坟墓，尤其是圆形的。我们也修建了更小的步枪掩体与壕沟，用水泥加固，安装了电话，犹如置身马其诺防线。壕沟起了交通线的作用，可惜没有连线，因为江南地区河川溪流众多，需要使用小汽艇。有些壕沟是被覆盖住的，另一些没有覆盖的是设计了供少数人用的。

另外，我在杭州湾设防，修筑钢骨水泥地堡。除了山炮，我们拥有野战炮，用以密集射击敌军战舰。我也在太湖沿线修筑了堡垒阵地。

阮肇昌的五十七师与李松山的五十五师以及蔡忠笏指挥的第一炮兵旅隶属于我。这两个师原来是（孙传芳部将）陈调元的，1927年3月陈调元（率孙部第五方面军）投向国民革命军，这两个师便被改编为中央军。其中有些低级军官是黄埔生。我同他们没有私人联系。我下令阮肇昌部驻扎在沪杭铁路沿线，李松山部沿杭州湾驻防。

这时期的一个师在人员数目上同国民革命军时代的一个师比较，比以前人数多。平均一个师有七八千个战斗兵——这仍然没有足额。

第一炮兵旅驻扎在嘉兴训练，它直属中央。蔡忠笏，浙江人氏，是我在武昌陆军军官预科的同学，他喜欢饮酒。

我练兵的目的是为了防御日本侵略。我部下士兵要学会游泳与划船。我坐了汽艇巡回视察。我对新职极感兴趣，因为我感觉中日之间必有一战，我日以继夜督工与练兵。我从没有向部众训话。

我同边区党部与政府的关系如何？我负责国防工事的修建，在涉及这类事务方面，可以向江浙两省的省主席发布命令。在蒋先生决定提名我任此职后，文官朱家骅继黄绍竑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我向朱家骅发布命令多于向陈果夫发布命令，因为置于我管辖的江苏地区实在太小了。

在许多方面我需要那两位省主席的协助。虽然国防工事是由工兵修建，我们仍需要地方上协助运输铁料、钢材、黏土以及其他建筑材料。省政府向专员、县长下达命令，专员县长再向保甲长下达命令协助我们。保甲长有权征用船只与人力。我们还必须秘密施工。民众误以为我们在从事“剿匪”工作，然而这一地区并无共产党活动。

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来到我的嘉兴总部，我陪伴他在杭州湾视察了我们的国防工事与防御阵地。

我拜访了住在苏州的政学系领袖李根源。我崇拜他，这是一位纯洁、博学、有趣的老将军、老绅士。

谁是1936年11月杨永泰暗杀案的主凶，我不知道。胡汉民的追随者刘芦隐被控为该案幕后主使人，但是我不相信。^①

^① 杨永泰横死30年后，曾任湖北省国民党党部常委的刘鸿皋著文披露：“刺杨案是CC系的阴谋，因为蒋介石对杨永泰的信任已超过对陈果夫的信任。如果这种情况再延续下去，则CC在中央和地方政权的权位将被政学系夺去，因而他们下此毒手。”CC系骨干、曾任中宣部代理部长的方治也私下证实刺杨案的主谋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

宋庆龄回上海不久，黄琪翔陪我到她的西摩路（今陕西北路）寓所拜访她。在那段时期，黄琪翔一直帮助她。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蒋先生被劫持的西安事变。事变翌日，叶挺在上海看望我。自南昌暴动以来我没有见过他。他说，他住在法租界，但不肯告诉我具体地址。许多共产党员住在这个城市的外国租界。

见面头一件事就是我问他，1927年12月11日至13日广州暴动期间他为什么不抓捕我？他答：“我的良知不允许我这么去做，如果我扣押你，我将是对你太不公平了，因为你绝不会屈服的，你会慷慨赴死。故我必须让你走开。”倘若他想扣押我和黄琪翔，这是轻而易举的。在黄琪翔家没有哨兵，我也只有一个侍从。我们有随身武器，总共就这些。当然，还有几个公安局特警守卫我的住所。

这表明叶挺很注重感情。正如我已说过，他和我是挚友。要不是我提拔他当团长，他就不可能娶到那个妻子。他告诉我，在广州暴动后，共产党斥责他待我太温情。不久，他带了妻儿去苏联与德国，住了很久。

叶挺对蒋先生的命运表示关怀，想去营救他。我估算中共一定涉及劫挟蒋先生的阴谋。叶说，劫持蒋先生是错误的，但他相信事件会和平解决的——他确认没有必要诉诸暴力。倘若中央衮衮诸公想出兵征讨张杨，他愿意从中尽力斡旋。我相信他一定是奉中共的指示来找我转圜，否则他不会表露出对营救蒋先生出险信心十足。我叫他在上海等候。

我坐夜车去南京。一到，我就找（军政部长）何应钦，向他报告叶挺找我谈话的内容。我问他是否想见叶挺。何说：“好，让他来南京。”我打电话给叶，叫他立即进京。他搭乘当晚的火车。秘密警察一定接到通知，暂勿骚扰他。

当我带叶挺去见何应钦时，叶表示他有信心能找出营救蒋先生的法子。何应钦向共产党强硬地表态，说中共休想以劫持蒋先生来左右政局、逼迫政府屈服。他要求中共立即无条件释放蒋先生。否则，讨逆行动将立即开始。

听到何应钦的话、见到他的坚定态度，叶挺不同我告别就悄悄离开南京。我已经安排他和我住在同一旅馆。第二天早上见不到他，我以为秘密警察逮捕了他。我向戴笠查询，他叫我等一会儿。后来戴告诉我叶挺没有被捕。我以为戴笠骗我，便开始瞎忙一气想营救叶挺。两天后，接到叶挺来信，告诉我他已安全抵达上海，并为不辞而别向我致歉。我向戴笠报告了这一消息。

在蒋先生被扣押期间，大多数时间我都待在南京。我出席了何应钦召开的一个会议，议题是讨逆，营救蒋先生的军事行动正在准备。这次会议只有军人出席。对讨逆行动上我和何应钦的立场完全一致。当时我们不明白内幕秘辛，认为蒋先生已沦为人质。我们知道蒋先生的毅力与性格，相信他一定不会屈服。我们相信讨逆行动会加快蒋先生恢复自由。

有人认为讨逆行动会危害蒋先生的安全，也有人说，何应钦力主讨逆是由于个人野心所驱使，从此蒋先生再也不信任他了。【但正如我已说过，我同意以下观点：自1927年以来，蒋先生一直没有善待何应钦。事实很清楚，蒋先生对何

应钦失望，代之以刻意栽培陈诚。】可是，我确信，何应钦力主讨逆，绝非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也不是要伤害蒋先生。他坚信，中央采取强硬的行动，才能迫使张、杨早日释放蒋先生，绝大多数军人同意何应钦的态度。我们结论是西北“剿匪”代总司令张学良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同中共“沆瀣一气”。他们是互相利用，因为他们本身的力量太微弱。张、杨扣押蒋先生的目的是胁迫中央政府被他们牵着鼻子走。1927年，同样的念头促使我建议逮捕李济深。



西安事变前夕的张学良（左）与杨虎城

戴季陶是文官中最强烈鼓吹进军北上讨逆的人，许多中央委员，例如张继，都赞成北上讨逆。可以说，强烈反共的人们都赞成这一讨逆行动。

事实上我所接触过的人，大多数倾向于派军队北上征伐张、杨叛逆。他们相信，不必担心蒋先生的安全，张、杨不敢加害于蒋。

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了。1936年12月26日，蒋先生在全国军民欢呼声中返抵南京。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对蒋先生作了一次礼貌性的拜会，表示我一直留在南京等待他安全归来。他单独见我，进了他的书房，但见他穿了一件棉袍子，没戴假牙，使他看上去有些苍老。他用几个靠垫撑住他那在事变中跌伤的腰部。他告诉我，必须回到自己岗位上去，什么问题都不存在了。

张学良承认他自己有错，不需要我们去批评他了。当时他也许受了共产党的影响，误以为它是爱国的。我视张学良为一个非凡的人。他敢陪伴蒋先生回南京——他根本不需要这样做，这对任何人都是不平常的勇举。毕竟，任何人也不能保证他不会杀。早先去欧洲时，他一下子就戒绝了鸦片烟与吗啡针，那可不容易，要倚靠自己的决心。他为人坦率、幽默、善辩、活泼、聪敏，是个奇妙的朋友。在南京我常常去看望他，南京的午餐会太多了，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我们都嗜酒。我钦佩他。

【蒋先生对张学良的处置引起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诚然，蒋先生对张学良是宽宏大量的。倘没有蒋先生要求宽大处置，张学良一定会判处死刑，这是罪有应得。张学良劫持党国领袖罪无可赦——但蒋先生刀下留人；可是蒋先生的亲戚、卫士蒋孝先等四百多人被杀了。假如我是蒋先生，我会枪毙张学良，或者干脆放了他。当然，设若杀了张学良，蒋先生会被人指责不够义气，正如我所说：张学良本来不应该陪伴蒋先生回返南京。】

西安事变发生后几个月内，国共渐渐重新修好，我乐观其成。每个新时期总需要新政策。在20年代中期，我不同意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但我赞成让他们参与国民革命。现在我赞成国共合作抗日，否则，共产党会阻碍我们抗日。我们没有其他选择。

【我认为蒋先生具有政治才干，他的优点是意志坚定，忍辱负重超于常人。有许多蒋先生的长处是我学也学不会的。众所周知，他的学问普普通通，但很难去评论他有没有政治才干，因为我自己都不是一个政治家。即使如此，我也不承认他是一个政治家——他熟谙机巧权术，他知道怎样去欺骗、威胁、分化他的政治对手，善于运用“银弹攻势”。我知道在许多例子中，他运用这一战术诱导敌人向他投靠。例如，唐生智、俞作柏被蒋先生策反，转头对抗桂系，又如冯玉祥、唐生智的部属被他贿买倒戈，还有余汉谋转软反对陈济棠等等。纵横捭阖是蒋先生取胜的重要原因。

1929年编遣会议后，除了原先的第一军之外，所有的部队都抱怨蒋先生，甚至他疼爱的十九路军都反对他。但他利用敌人的自私自利，安全渡过了每一次危机。每当某甲起兵反蒋时，蒋先生都会以金钱物质诱导某乙非但不附逆反而支持中央。蒋先生运用这一权谋打垮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因为人人都离不了自私这一人性弱点。】

中国人的自私表现在凡事要考虑：谁是我的人马，谁谁可靠吗？谁谁不可信赖。我敢说，在我整个军旅生涯中，从入伍到退役，一直没有办法去消除中国军人的自私习性。

【自私是人性的一部分，但我们中国人比外国人更加自私。袁世凯固然也依赖权术与金钱，但他的政治权谋不如蒋先生这样成功。我相信，自民国肇建以来，蒋先生是运用政治权谋的第一名。他希望别人对他诚实，但他自己不诚实。】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三股力量拧不成一股，反而自相残杀。然而我们从未见到蒋先生亲训的第一军有人反对过蒋先生。

回溯往事，到抗战前夕为止，我犯过两个大错误。1927年夏季，我犯了一个大错误——过分信任共产党，误以为“分共”政策能够兵不血刃地贯彻执行。当时我们既已确立分共政策，就不该同时把军队往东调动以至南昌有隙可乘。我们必须先处置共产党，然后再对付南京。其次，我们应该有力地控制住共产党，它绝非如九江事件中那样不堪一击。至少蔡廷锴师不会通敌叛变，贺龙部也不会易帜。

在1927年8月1日中共掀起南昌暴动后，我犯了另一个大错——过分信任陈可钰。我不应该同意去广东，而是应该马上去南京，那时蒋先生已辞职。我能够同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合作。这样，我们就不会被李济深拖累了。

我的第二个大错与第一个大错接踵而来。在同年共产党掀起广州暴动后，我又过分相信陈可钰。当我同意部队从东江进军江西时，政治错误引起了军事战略的大错。当时我离开部队则酿成了另一个错误。

我不认为1927年后有任何大错是属于军事范畴的。1929年，从湖北退到广西后，我不应该匆忙进攻广东。我应该休整一段时间，整顿我的部队后再挺进广东。然而这并非大错。同理，1930年如果我继续进军湖南而不掉回头去同十九路军接战，谁也不能断言结局如何，所以这也不是个大错。在政治领域，1927年后我基本上不拥有犯大错的权位，没有怀抱政治野心。

然后，我认为，广州暴动显露我在政治上失利，导致持续不断的负面影响。共产党给予我两次沉重打击，它们的南昌暴动，分裂了我的第二方面军。假如没有共产党，我确信我和唐生智能掌控南昌，而广州暴动则使我们完蛋。

我们在军事上的失利使桂系李济深产生偏见，以至于1927年拒绝支持汪精卫。许多朋友说，如果第四军在李济深领导下团结一心，而不是被别人利用，它一定能主宰全中国的命运。且看这些惨痛的内战记录：第四军同十九路军搏斗、同陈济棠拼命，陈济棠又掉转枪口去打十九路军。余汉谋转舵反抗陈济棠。可是，十九路军没人掉转枪口打陈铭枢，在我的第四军，除了共产党，没有人掉转枪口反叛我。

第四军很容易遭受攻击。唯有李济深才能团结整个第四军，唯有李济深才能提供正确领导。薛岳与其他将领都同意我的观点：李济深没有把他们领导好。虽然他是广西籍，但他在广东建立了他的勋业。然而他好像一个嫁出去的女人，把夫家的财富搬到娘家，只顾念自己的娘家。北伐开始后，李济深拿了广东的资源去资助广西。

在北伐战争期间，我对李济深说过，只要第四军保持一致，是他，而不是蒋先生，将拥有天下。事实上他有能力把第四军充当他的基本武力。但由于性格上的掩掩遮遮——有贼心无贼胆——李济深没有回答我，他只是付之一笑。

第十一章 淞沪会战与武汉会战

(1937年7月至1938年)

1937年7月初，我去庐山出席每年夏天举办的庐山训练团。来自全国各地大约1000个上校衔以上的中高级军官来此受训，蒋先生担任训练团团长，陈诚任副团长。孙连仲、黄绍竑和我被任命为第一期训练班的陈诚助理（正式任命由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蒋中正于6月6日签署），为期两周。黄绍竑、孙连仲各自兼任第一、第二分团的团长，每个分团相当于一个营的规模。由于我未担任兼职，我大多数时间用来协助陈诚。他对训练计划负实际责任，因为蒋先生经常不在。

我们都早早起床，为了健康，都要做早操，接着所有时间都是聆听蒋先生、何应钦、陈诚、杨杰以及其他名将讲课。我们像学生一样。训练课程的性质主要是政治。课程的目标是为了加强我们对党、国、领袖的忠诚，提高政治觉悟。我认为这类训练毫无意义。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来自北方的军官立即北上回营。黄绍竑离开庐山后，我兼任第二分团团长。^①

蒋先生聘请所谓民主人士，包括罗隆基、沈钧儒、张君勱出席庐山谈话会，蒋先生要表示他的抗日决心。7月17日，他在谈话会上表示，我们要抗战到底。那时，所有的人，包括反对过他的人以及共产党都支持他。这种团结局面是难能可贵的。

7月18日，第一期训练班结业，蒋先生逐一个别接见受训军官。他叫我准备参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宣示抗战到底。

^① 任命状是蒋以训练团团长身份于7月10日上午九时签署的。孙连仲继黄绍竑任第一分团团长，张发奎继孙连仲任第二分团团长。

加淞沪抗战。

我立即回到嘉兴。7月21日，我回营就向军官们传达了中央的抗日决心。我命令守卫苏嘉国防工事的师长李松山、阮肇昌，以及炮兵旅长蔡忠笏准备打仗。

一周后，我奉蒋先生指令去南京。一天下午，一批高级将领在蒋先生的官邸聚会。出席的有十多位将领，包括何应钦、顾祝同、张治中、陈诚、徐永昌。我们偶尔在蒋先生官邸开会。文官们有时候出席这些会议。在每次会议中，当蒋先生提出议题后，我们轮流发表己见，由他作出最后结论，然后聚餐。在饭桌上，蒋先生咨询我们对日本的想法。结论是，既然我们已经决心抵抗，我们必须积极主动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我对此一结论有何看法？我赞成，大家都赞成。我们的目标是想开辟第二战场，发动进攻把侵华日军分割开来；其次，鉴于上海是国际政治、经济中心，一旦爆发战事就会招来国际干涉。

蒋先生任命我为右翼军总司令，张治中为左翼军总司令，我们直属军委会指挥。军委会的工作人员记下了蒋先生的话。

这次会议也许是7月29日平津沦陷后召开的。德国顾问没有出席。外国人不会出席蒋先生官邸召集的会议。我不清楚德国顾问是否主张坚守黄河防线并选择上海地区作为主战场。德国顾问只向蒋先生与军委会讲。从战略观点来看，黄河流域的大平原易攻难守，而布满河流、湖泊、小溪的上海地区是易守难攻的。再者，黄河流域通过两条老旧的铁路——平汉线与津浦线；而上海地区布满了公路网及几条铁路，最著名的是沪宁路与沪杭路。

会议结束后我回到嘉兴。不久我和张治中都接到最高当局的命令，必须立刻拟定淞沪会战左右翼两军的作战部署。我们计划进军上海郊区。

我秘密下令阮肇昌师在松江集中，向龙华附近挺进，以配合左翼军；命令李松山师的一部分进军浦东，另一部分兵力拱卫金山卫、乍浦港以及杭州湾的其他要地。换言之，阮肇昌负责黄浦江的左岸，李松山负责右岸。根据最高当局的命令，我告诉他们去找村庄里的长者、保甲长，向他们索取苏嘉国防工事、要塞的地图与铁门钥匙。

中央把蔡忠笏的第一炮兵旅的第二团调拨给我——有时炮兵部队会分开来派遣到不同的地区去战斗。我命令炮二团去浦东，隶属于李松山师。我又派几名高级参谋去黄浦江右岸的南桥设立指挥所，把老弱病残送回后方。

张治中的左翼军——黄镇球的八十七师与孙元良的八十八师开赴上海。张部与我部是率先进军的。根据1932年5月5日中日双方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我们不准在淞沪地区驻扎正规军，只能驻扎保安队维持秩序。按照我们拟订的计划，孙元良麾下一支小部队换穿保安队制服进驻。1937年8月9日，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驻沪西第一中队队长大山勇夫中尉与一等兵斋藤与藏驾车强闯机场，被铁丝网内八十八师驻守沪西虹桥军用机场的守兵击毙。

我方的抗战记录断言是日方首先挑衅开火。根据我的《抗日战争回忆记》，当日军以两名武装人员强闯虹桥军用机场被击毙为借口，要求我方保安队撤出市

区之前四天，1937年8月9日，日本军舰就已集中在黄浦江与长江口，一万多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员随即在上海登陆。事实稍有出入：8月9日敌军在上海确无一万人之多，但也有几千个海军陆战队员，他们已经到了一段时期了。

8月13日我方先在闸北开火。倘若日本想同我们在上海开战，它一定要等增援部队到达沪滨才动手。日军不想在上海交战；否则它为何不在上海寻衅而是选择了卢沟桥呢？它打算从北至南一个省接一个省逐渐吃掉我们。从战略观点看，它显然不想开辟第二战场。简言之，我们采取了主动权——日军在卢沟桥攻击我们，我们挑起了八一三事变。但是我不能在《抗日战争回忆记》中披露这一点，因为我们一向宣称我们是在抗（抵抗）战。当战火点燃时，我部下——李松山师的官兵已经到达浦东。冲突爆发后，按最高当局拟订的战斗序列，我部是部署在吴淞与上海，我被任命^①为右翼军总司令（1937年11月）兼第八集团军总司令（1937年9月）。我离开嘉兴到了南桥指挥所，第八集团军总部仍留在嘉兴。在南桥没有设立单独的右翼军参谋处。我在第八集团军总部指挥作战，朱晖日仍然是我的参谋长。

除了原先隶属我的部队，第八集团军还包含刘尚志师与张奎基独立旅，都驻于浙江。作为右翼军总司令，我命令第八集团军与第十集团军驻扎浙江衢州。第十集团军是湖南部队改编的，由刘建绪统领。

最高当局交付我以下任务：对虹桥敌军发动佯攻，转移敌军注意力，从而支援左翼军发动的主攻。我调动部队是符合这一战略原则的。我命令张奎基带领独立旅去浦东，但他派了一个营去杭州湾。第二炮兵团派了一个营去浦东，一个炮兵连去杭州湾。我调动李松山师去上海地区配合左翼军作战。刘尚志师去松江地区充当第八集团军的后备队，第十集团军开往杭州作为右翼军的第二线兵团。

那时中央军一个师平均8000人多一点，其中7000多人是战斗兵，而满额的师应有1.1万人。我率领的部队大多数是地方部队改编的中央军，只有蔡忠笏的第一炮兵旅之第二团是例外。

同北伐时期相比，这时期的军官受到更好的科学训练，他们的士气比北伐时期高。炮兵旅军官的素质同我其他部队的军官相比高一些，他们受过更好的训练，都接受过特种训练，都是军校毕业生。士兵们也比以前训练得好，士气高昂。

我的部队装备不如第一流的八十七与八十八师。属下的部队，炮兵旅的第二团装备最精良，它拥有六门卜福斯式77毫米山炮和两门卜福斯式野战炮。每个营都像一家机关枪公司，我们既有轻机枪或气冷机枪，也有重机枪或水冷却机枪，都是中国制造的。我们使用“中正”0.79步枪。在俞大维指导下，中正式步枪比我们已往使用的步枪更短、更轻、更便于携带。所有的军官都配备了手枪，大多数是左轮手枪。大多数步兵武器是国产的。从整体来看，我们有足够的

^① 据张发奎本人说，蒋介石签署的任命状，有时比正式就任要迟些日子才下达。



1937年8月16日于上海附近左翼军南翔指挥所。右二起：杨虎、张发奎、张治中、李根源、张一麐、冯玉祥。

步兵武器，但是炮兵武器不足。

我非常高兴与激动，这是一场卫国战争——我参加过的第一次卫国战争。军人是准备牺牲自己的，许多军官写了决心书，期望为国捐躯。

当八一三战事爆发后，两架中国飞机意外掉下两颗炸弹落在上海公共租界杀死大量平民。^①当时我军飞行员想轰炸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日本海军“出云”号军舰（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中将的旗舰），由于公共租界就在黄浦江畔，掷弹时出现偏差是难免的。基本上，我们的空军，无论数量与质量都比敌人的空军羸劣，我们的飞行员不像敌军飞行员那样受过严格训练，而且缺乏空战经验。作为一名军人，我敢说，我们的飞行员十分勇敢。我观看他们在笕桥举行的空战演习，他们炸得很准。当然，同敌军当面作战是另一码事，他们好像没有战斗经验的连长首次进入战斗，恨得咬牙切齿。这显示经验的重要。虽然人们会说敌军的飞行员也没有实战经验，但他们得益于良好的训练。在上海，我们的空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我的战区比较平静，因为地处法租界边缘的南市是缓冲地区。黄浦江保护了浦东，我军和敌军都不把浦东视为重要战区。

8月13日夜晚，自南市到浦东横跨黄浦江的水底铁索网阻碍了日本舰船渡过黄浦江。否则我必须在黄浦江两岸上游部署大量守军，我将度过艰难的时光。

^① 当时报纸报道有1740人被炸死，1873人被炸伤。

凿沉大量船只阻塞长江之举做对了，因为我们的海军太弱了，只有小型的炮舰在长江上执勤，黄浦江上则什么也没有——我们的海军不能在黄浦江巡弋。

8月18日，左翼军开抵汇山码头与敌军发生接触，在此第一周的战斗中我颇为乐观，认为我军能把敌人赶下黄浦江，驱逐他们出上海。可是我也认识到，即使把日寇赶下黄浦江，他们也会反攻。但我仍然乐观，因为，不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能守住苏嘉、吴福两座国防要塞，后面还有南京防线——更加坚固更加精心设计，每条路都通向下关。我参观过这条防线，深受感动，汽车与卡车都在工事地下奔驰，换言之，我期待这是一场长期战事，一开始我们就知道会在上海受挫，会被迫后撤，已经准备应付这一后果。我们有广阔的领土，可以在敌进我退的过程中把敌人拖死。我们说敌人的腿是泥造的，它一踏上我国领土就泥足深陷，再也拔不出来。

既然预见到失败，我们为何在上海主动出击？因为，如若我们不抗日，它会欺侮我们。我们必须战斗，即使知道不免会受挫也要打。当然，倘若不发生卢沟桥事变，我们不会打八一三那一仗。防御战需要主动出击，否则我们会输得更惨，在上海主动进攻是正确的。在卢沟桥同日军作战是愚蠢的，因为敌人正是希望在那儿同我们开打。

在第一周的战斗中，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存在，怎样影响战局？由于我们不能通过公共租界与法租界进击虹口的日军，租界掩护了敌人，致使左翼军只能从闸北进攻敌军，所以敌人只需要守住虹口等待增援。它们不需要大部队扼守虹口，战事一开始虹口守军不多。倘若没有外国租界提供保护，敌军早就被消灭了。

8月16日，我造访了张治中的第九集团军指挥部。在我们讨论战况后，他打电话给“老头子”（蒋先生），转达我们建议——调派六个师到苏嘉、吴福国防工事，每条防线三个师。国防工事是我们的第二道防线。我们建议向上海调派尽可能多的援军。如果兵力达到最高点后我们仍不能消灭敌军，我们就应该撤退。设若我们得到六个师增援，张治中与我保证至少坚守要塞防线三个月（自开战日起计算）。蒋先生习惯性地答：“好，好！”但是没有下文。

把日本赶下黄浦江的计划没有成功，我们不得不从进攻战转为防御战。^①这样，外国租界就成了我们的庇护所，敌军不能穿过租界进攻南市。我们在浦东是安全的。

我在南桥指挥所度过大多数时间，常常巡视浦东。晚上乘坐小汽艇出巡，以免敌机侦察。在浦东我们没有修建防御工事。由于《淞沪停战协定》的约束，我们不能在淞沪地区修建防御工事。战事爆发后，我们挖了战壕，筑了机枪掩体。

浦东的炮兵阵地战事爆发后一个星期就建成了。首先，司令部的参谋们、

^① 8月22日夜晚，日军增援部队在川沙、狮子林、宝山登陆，向南面宝山—罗店—浏河线攻击。8月24日，陈诚指挥的援军与日军接战。

炮兵营营长及其下属必须勘察地形，以找出合适的地点，然后把大炮装上小艇。

我们只能把山炮与野炮搬到浦东。山炮可拆卸开了用四个兵抬走，野炮要用马匹拉动，但我们无法把重炮运到浦东，因为缺乏适合的道路。我建议铺设一条临时公路到浦东，但建议没有实现。

我利用浦东的地理位置，最大限度地发挥炮兵的效能，把我的炮兵阵地集中在浦东洋泾，隔着黄浦江对面就是虹口。我们把大炮隐藏在竹林里，炮兵位置是顶级机密。我们多数在黄昏向敌军开炮，因为天黑了更容易转移。有时在拂晓，炮击十分钟之后，就停一段时间，怕的是暴露目标，接着就转移阵地，避开侦察。

在浦东，我们向虹口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和日本总领事馆开炮，后者设防坚固，这一点我清楚，1946年我去参观过。

我们炮兵的主要目标是敌人的旗舰“出云”号。起初，我们打不中它，因为它不断移动。一天，上海海关有个中国人告诉我，有一位上海海关的高阶英籍官员愿意帮助我，他建议我派一名炮兵观察员穿便衣去海关大楼。我猜忖这个英国人是反日的，也许他崇拜我。我猜测，可能是他眼看我们打不中“出云”号，感到内心疚愧。

因此，我们在黄浦江江底，铺设了连接海关大厦与我们炮兵阵地之间的电话线。我们的观察员把出云舰的动向，随时向炮兵营营长报告。此后，我们就能在天黑以后极其准确地击中出云舰。老百姓称赞我的炮兵是“神炮”。可是，虽然击中，我们也只能打它个轻伤，打不沉它，因为我们的火炮火力不够。我们一开炮，它的水兵就躲到甲板底下。事实上，“出云”舰没有遭受伤亡。

要打沉黄浦江上其他敌舰也同样困难，它们也不断地移动。黄浦江上还有几艘敌舰，它们也不需要太多舰只。军舰多了只能成为我们炮火的目标，那些舰只不很大，即使出云舰也不很大。船舰太大就进不了黄浦江。

我们的炮兵与空军怎样配合？最高统帅部告诉我们，国军空军什么时候出动轰炸、有多少飞机等等。我们调整炮兵火网以配合空军。但是，没有直接的联络。我们的飞机常常在拂晓或黄昏飞来。

我们的空军没有误炸浦东，我们在黄浦江的另一边，似乎不会再出纰漏。

1937年8月16日，出云舰与其他日本军舰的舰载炮任何时候都能轰击我们，但它们确实没有对我们造成严重损伤，因为，想击中我们军事目标是不容易的。我们的大炮从未损毁，士兵仅仅遭受轻微伤亡。

敌人空袭造成的损失很严重，在短暂的初创时期之后，我们的空军实际上是耗尽了。我们的飞机不敢出外攻击敌军，而敌人的飞机却低飞掠过我军阵地，日以继夜。最糟糕就是拂晓时分轰炸，多数炸弹重50磅（1磅约合0.4536千克）或100磅，我猜测最大的重200磅。我们没有遭受惨重伤亡，因为我们挖了防空洞。此外，平民百姓都疏散了。当然，炸弹毁坏了建筑物。我们没有击落过敌机，这不是那么容易的，敌人拥有绝对的空中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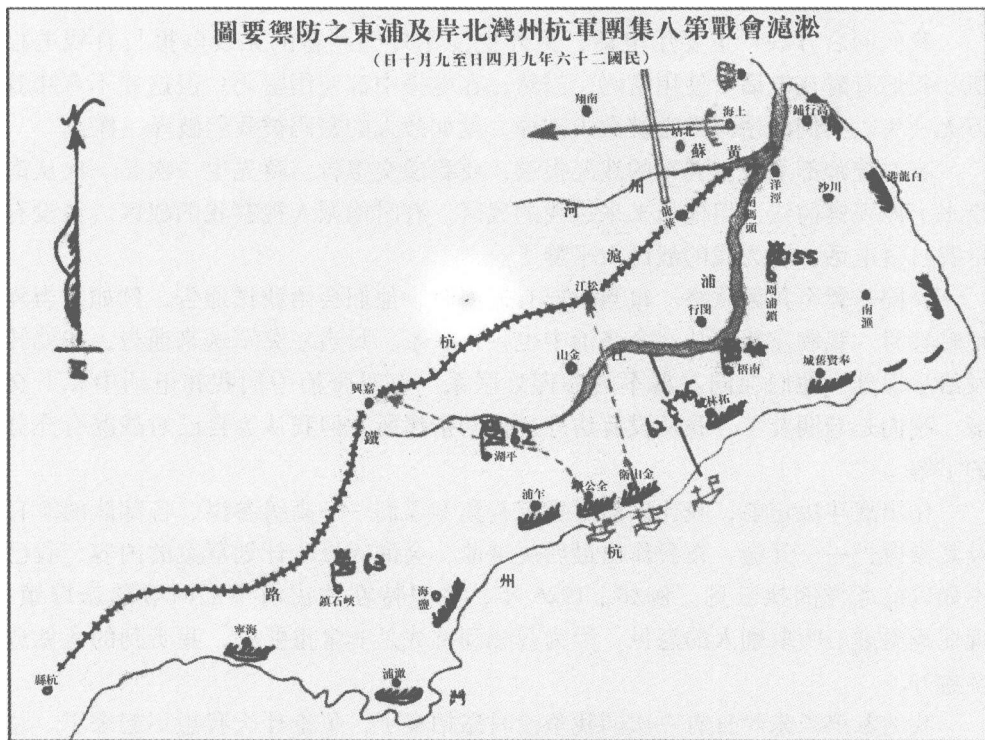
正如我已说过，我们的炮兵阵地是顶级秘密。那天，炮兵营长让新闻记者参

观竹林中的炮兵阵地，甚至在大炮前，手持双筒望远镜偕同几个士兵摆姿势拍照。翌日照片登上了报纸。我马上命令转移炮兵阵地，敌机立刻轰炸了原先的阵地。我要求中央扣押了这个营长。

我发布命令佯攻虹口的敌军，由张銮基负责组织与执行。我的士兵们一次又一次在河岸上我军炮兵掩护下，乘坐汽船或舢板佯攻敌军。其他场合，我们的士兵喊叫“冲！冲呀！”造成敌人错觉，以为我们要进攻，目的是骚扰敌军、使他们惶恐不安，迫使他们的军舰成日处于戒备状态。敌人的水兵一走上甲板探头探脑，我们就开火。距离这么近，我们能用手枪或机枪撂倒他们。有时我们派蛙人去炸敌舰，可是未曾对敌舰造成重大损伤。

8月16日，敌军多次试图登陆浦东。有时它们成功登陆，但我们常能打退它们。敌人也发起佯攻，正如我们对它们发动佯攻。我知道，他们不想主攻浦东，这对它们完全无用。坦白讲，倘若敌人真要浦东，我们会放弃它。

我采取各种措施防卫杭州湾，除了地堡——在战争爆发前我们就建成的永久性坚固地堡，我们还修建了野战工事——机枪、炮台、壕沟等等。我常常视察海湾鼓励士气。搭乘沪杭铁路从南桥到乍浦很方便，铁路就沿着海湾铺设。驻扎在杭州湾的部队派出巡逻队卫戍海湾。我们在杭州湾没有任何海军船舰执勤。我们组建了一个中队的渔船负责海上侦察。一发现日本海军船舰，他们就会报告我们。



淞沪会战第八集团军杭州湾北岸及浦东之防御要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提供）

我早已料到敌人会在杭州湾北岸的金山卫附近登陆。明末来自日本的倭寇曾在这一地区登陆，被戚继光赶走了。我从历史课本上早已知晓这一教训。这就是我为什么在战争爆发前就在那绵亘的浙江海湾修筑了防御工事。

我的参谋部门的情报处雇佣当地民众充当侦探渗入虹口敌军后方、公共租界及法租界。下属的战斗部队各自执行自己的情报业务，他们也派遣侦探深入敌人后方。各该部队长向我提交他们搜集的虚幻不实的情报报告——他们并不注重情报的准确性。我把这些情报资料交给参谋处。此外，各部队参谋处情报科也向总部的参谋处情报科提供报告。

我的总部常常能收到前线的报告，情报通常是准确的，前沿部队知道战况动态。在淞沪会战时，我们没有执行新颖的情报工作，我们的情报人员的确受过较好的训练，也比以前更有经验。但是情报工作是复杂的。例如，我们运用先进技术，情报员有时随身携带无线发报机。我们收到的情报较前快捷，但我不能说，它比以前更准确。

我的参谋都熟谙日军的组织，他们也分析个别单位的背景。他们对敌军力量的估量是以这两种因素为基础的。为了慎重，他们在呈交最后文本给我之前，会添加一些数目。这就是情报作业的全过程。

中央调拨给我一个通讯连，那是一个附属单位。我的总部用电话同前线部队联络，我们在浦东铺设了电话线。那儿原来是没有的。

我们同后方联系主要用电话，另外也使用外国制造的无线电报与有线电报机。我们有时在电话中使用密码，当然，在电报中都使用密码，但这并不意味着万无一失。我们的密码常常被敌人破译，就如敌人的密码被我们破译一样。

有时统帅部下发左翼军的战况报道，要我递交报告。蒋先生一次又一次从南京来上海视察前线，但他从未来过我的战区。有时他派人视察我的战区。他没有给我打过电话，因为我的战区太平静了。

我同左翼军频繁联络。每当战况有进展时，他们会给我送通告，例如，当阵地转移时。我和左翼军总司令张治中也频密联系。每当左翼军送来通告，我就转发给参谋处，他们会同左翼军的参谋处联系。有时张治中同我在电话中私下交谈，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从没有访问过他的指挥所，但我认为自己对战况有充分的了解。

作出战斗决定前，我比以前更重视召集参谋们——高级参谋、各部队的军官及其参谋长——开会。在我作出最后决定前，会询问战斗计划草案的内容，我已不如以前那样固执己见。例如，1926年，我坚持在攻占海南岛时登陆新埠镇；现在我更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因为我感到抗战是非常重要的，我听到的意见愈多愈好。

我的参谋长朱晖日有一次同我争论时猛拍桌子，争论什么我想不起来了。总之，他过分小心谨慎。朱晖日是四邑人氏，四邑人通常是相当固执，但我不在乎，他到底是我的同学与持续多年的老同事。

我不担心同下属单位的关系，因为我同各个部队长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当你同中央军的部队长有良好的私人关系时，那就平安无事；否则，就会荆棘满途。这就是私人关系的问题。

集团军用不着向我报告他们的实力，我只需要知道直属于我的师的人数及其下属单位人数。当一个师调拨给我时，它的师长会来见我。战争开始了。我知道所有的单位都不是满员的，但我估计他们缺额不是太多，他们都是新编的部队，所以我按满员人数打一个小折扣。

组织后勤工作方面，中央的后方勤务部负责运输武器弹药粮食及补给品——不易变质的食物如咸鱼、黄豆等等到浦东。供应品由沪杭铁路与小汽艇运送。沪杭铁路被炸毁过，但又修复了，火车照常行驶，多半在夜间运货。我们也利用卡车与骡马。

我把浦东的日华纱厂的纱锭与其他机器设备由黄浦江运到嘉善，然后用火车运到后方城市浙江金华。我也把该厂库存的坯布运走，它可以用作伤兵的绑带。我回到浦东即下令拆卸这座纱厂，我要浙江省政府派人去执行。一切工作都交付当时的省政府主席朱家骅。

处置伤兵时，我们有足够的时间用汽车把他们送回后方。当然，前线的救护站照顾轻伤伤员。前线有足够的医疗设施，救护站压力不大。

老百姓同北伐时一样热情帮助我们。除了渗入敌区侦察敌情，他们会帮助我们运送补给品与伤兵，他们可以得到酬金。不同的是，北伐时我们打的是野战，我们采取攻势；淞沪会战是一场阵地战，我们居于守势。在某些方面，我们不需要民众帮助，例如，运送伤员就不像北伐战争时那样迫切，那时候我们经常在追击。

我们受到汉奸的困扰，我的部属报告，黄昏时刻有人发信号为敌机指示轰炸目标，但是要抓获汉奸是不容易的。当然，有时我们会抓到个别汉奸。他们多数人否认通敌。我们没法取得证据，也没法调查，这是最棘手的难题。例如，在众多难民之中，我们难于辨认谁是汉奸。在嘉兴附近我们抓到一个哑巴，他否认资敌。我们不知道他是否真的是个哑子，他坚不吐实，我们就把该疑犯移交省政府处理。当然，有时我们会设法取证，我们必须十分警惕汉奸捣乱。

我想敌方人员没有渗透我军，不过在浦东，有一次我们抓到一个打扮成中国人的日本人。

在淞沪战役的大部分战区，左翼军首当其冲，我比较清闲，许多人来访问我。他们认为，我们能坚守浦东，这是一个奇迹。杜月笙赠送了一辆林肯牌防弹装甲轿车给我，他也送了一辆给张治中。沈钧儒、陈璧君、何香凝等人来访，我想他们是带有慰劳使命的。当然，有许多记者到访。

正如我已说的，我嗜饮酒，周恩来也善饮。他常来我的总部饮酒兼聊天。我们谈战况，饮酒，吃上海螃蟹。郭沫若、田汉也好杯中物，他们也经常看望我。我们都是朋友。

战争爆发后，郭沫若从日本回国，住在上海。自1927年8月初以来，我再没有见过他。从那一年起，我没见过共产党员。我也见过田汉，他是性情中人，我觉得他和郭都不适合做共产党员。

夏衍也来过，我认为他也是共产党员，他比较严肃。他告诉我，北伐时他在第四军当过兵，当时不少学生出于爱国热情加入了第四军。

郭沫若介绍钱亦石担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战地服务队队长，钱亦石是中共中央委员。事实上，中枢刚把他从牢里释放出来。他坦诚告诉我，他是共产党员。他说：“在战地服务队我将主要聘用共产党员。”他问我是否害怕使用中共党员。我清楚地告诉他，我不怕。我说：“我不在乎，我们现在共赴国难。”

战地服务队是我设立的，它直属于我，但我要求中央的军政部提供财政支援。战地服务队有四十多人，大多数是学生，大中学生都有，还有几个女孩子。其中大多数是中共党员。

战地服务队下部队表演文艺节目以维持士气，它也在民间开展宣传活动以加强抗日意识。战地服务队队员每天下乡，他们宣讲抗日的意义，勤奋而有成效。他们要求老百姓在国军撤退后坚壁清野、不同敌人合作。他们要求保甲长协助国军。别忘了，我们拥有保甲组织协助。怎样协助呢？他们派遣壮丁保护桥梁、维持地方治安。他们帮助我们对付汉奸。毕竟是当地民众比我们更明白谁是汉奸。

战地服务队不像在北伐时期那样有权组织民众或在军内实施政训，它的工作职能是比较有限的，我限制他们的工作职能，这就是我不怕起用中共党员的原因。我向中央呈报，战地服务队仅有权从事民众宣传以及下部队文艺演出。在此前提下，中央才批准成立。

在抗战期间，中央采取团结抗战的政策，但是没有实现真正的团结。中共在北方的部队重组归并为国军第八路军，由朱德任军长，彭德怀任副军长。在取消红军后，政府不能拒绝承认中共的部队，就只能把它们改编为国军。所谓民主人士与无党派人士主张军队国家化，我也同意。然而政府仍是清一色的国民党，共产党没有任何政治地位。

作为一个国民党员，我同意这一安排，因为，如果共产党员被赋予政治权力，国民党根本斗不过他们。原因很简单：首先，国民党的组织没有共产党严密，故缺乏竞争力；其次，由于共产党从未掌过权，故他们的精神状态比国民党员更昂扬有力。对这一安排，我内心的真实想法是：这样做不公平——共产党员可以战死沙场但不可以参加政府。倘若他们能够加入政府，历史的发展未必会达至中共以武力夺取政权的地步。

我已讲过，张治中与我起初是直属于军委会。8月杪，第三战区在苏州设立司令长官部以后，蒋先生兼任司令长官，顾祝同任副司令长官，我和张就改隶顾祝同的三战区。我的总部与三战区的联络就多于同最高军事当局的联络了。

9月份，张治中调任国民政府军委会管理部部长，左翼军分成两部分：左翼军由陈诚指挥，下辖陈诚兼领的十五集团军与薛岳率领的十九集团军；中央军由

朱绍良指挥，他还兼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我对此人事更动的反应是，中国有句古话：“阵前易帅。”这绝非良策，因为新的主帅对战场形势不甚熟悉；另外，阵前易帅会影响士气。如果张治中从左翼军调职是十分必要的，就应该由陈诚接任，殊无必要把左翼军分割为两部分。一分为二是出于人事考虑，要给蒋先生亲信的朱绍良安插一个要职。在那时，还有陈诚、张治中、顾祝同、张镇、熊式辉等将领圣眷甚隆。

1937年10月1日，蒋先生写信给我，要让一位德国顾问全权指挥浦东炮兵。我猜想是个炮兵专家来到浦东，我拒绝他察看炮兵阵地。我不信任他，我一般而言对德国人印象欠佳。他对蒋先生投诉，蒋先生便写信给我，要我信任他、同他讨论怎样在抗战中更好运用炮兵。蒋先生要我赋予他全权指挥炮兵。这样，我不得不带他到处参观，但我始终没告诉他任何东西。他也没有给我提供意见。

董显光带了蒋先生的一封介绍信。他也是道社社员，但实际上蒋先生不知此事。董当时在军委会国际宣传部任副部长，他来同我商讨有关宣传事务。

10月26日至27日夜国军撤出闸北^①时实行焦土政策，我对此并不赞同。这对敌人不会造成很大障碍，可是老百姓却先会深受其害。我相信中国古老的成语“坚壁清野”，意即搬走一切东西——甚至墙上的钉子——一切可能被敌人利用的东西。其目的是恶化敌军的供应。中国人使用这一成语始自宋朝抵御蒙古人入侵以及明朝抵御满族人入侵中原的日子。但是万万不可把自己同胞的家园烧得一干二净。

八十八师一个孤军营数百官兵在国军主力撤出后，坚守闸北阵地好多天，营长谢晋元上校是黄埔毕业生。我觉得他们显示了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

1937年10月31日，日军渡过苏州河进攻河（珠江）南的国军阵地，上海前线的紧张不安达到了最高点。朱绍良被任命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于是我奉命接任中央军总司令兼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此时薛岳接替陈诚任左翼军总司令，陈诚改任前敌总指挥。我认为这又酿成一次“阵前易帅”的重大错误，朱绍良调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并无迫切需要。我想这还是动机良好的，我敢说，调任中央军总司令是出于我的崇高威望，可以说我很少打败仗，我的新任命对激励士气有利。但如果从坏的方面猜忖调动原因，我敢说我被当作替罪羔羊。

根据命令，11月2日我把指挥所移到龙华西面的北干山。在朱绍良离任前，我见到他。我下令刘建绪的第十集团军从杭州移驻南桥，担负保卫杭州湾的任务。

黄琪翔被任为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抗战爆发后，他因保定军校学生陈诚的提携而重新“出山”。保定六期的黄琪翔教过陈诚所属的保定八期生。我派黄琪翔去指挥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吴克仁，他也是保定八期的。

香翰屏被任为第九集团军副总司令，我派他去指挥叶肇等人的广东部队。

^① 10月26日中国军队在日军攻占罗店——上海与南翔——上海公路的枢纽大场后，撤出了闸北与江湾。

我兼任第八、第九两个集团军的总司令是不合理的。当然，同样的事也发生过——1927年我同时担任第四、第十一军的军长。也许是因为黄琪翔不具备总司令的威望。我不能同时运作两个单独的总司令部。我做什么事都在第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的指挥所，第九集团军总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已经留给朱晖日。

打从那时开始，我的日子变得艰辛。敌军的攻势愈来愈猛烈。我日夜都在地下防空洞——我的指挥所度过，在微弱灯光下使用放大镜阅看作战地图，那是“老花眼”症状第一次出现。我偶尔也外出呼吸新鲜空气。电话铃常常响起，我总是很紧张。前线部队不断报告重大伤亡，并要求增援。我向三战区请示，然而发觉我们不能指望再有增援，但我不能将此实情转告前线部队。我命令他们坚持到底，绝不后退。我那时说，我派不出增援部队，但我已将他们的要求转呈三战区司令长官部。

那时前线的报告通常还是准确的，我的部队清楚地了解敌军的位置。我感觉自己洞悉战场形势。同内战的年代一样，军一级单位喜欢夸大伤亡数字以显示战事有多么惨烈，他们通常多报敌军的损失，而失踪人数往往申报为负伤。

我同蒋先生经常用电话联络。每当战场形势发生特别的进展，我就打电话给他，有时他打电话给我询问部队的部署。我答复他时，他总是说：“好，好！”



蒋介石（中）与张治中（左）、康泽。

有一天蒋先生打电话问我有关炮兵阵地的事。我讲以后，他说，错了，希望炮兵转移。想来，他甚至想干涉炮兵连的调配，就连我都从不干涉这一层级的指挥。炮兵单位的指挥官本来就有权决定该部战术运用。

虹桥与龙华的某些地区发生了逐屋巷战。我没有坦克部队或装甲部队。敌军的轰炸不算厉害，因为战场毗邻外国租界，上海的房子又造得鳞次栉比，敌机深恐误炸租界，所以轰炸还不算太凛厉。他们更恐怕误炸了他们自己的部队。敌机也没有轰炸北干山。

后勤供应还算畅顺。我们有足够的武器弹药，伤员处理也没有出问题。我们仍然有能力送他们到后方。据我了解其他战区曾流行过霍乱症，但我的部队没有。在淞沪战役中，我没听说有人使用过毒气弹。

虽然战事激烈，但很少士兵开小差，他们能逃到哪儿去？他们不能跑到行进中的敌军中去吧！他们害怕敌军的残忍，我们曾听到敌军施行“水刑”的报道。当然，我们的宣传对敌人有妖魔化的倾向，还有另外一点——我军绝大多数成员不是上海本地人，无处可逃，他们的家乡太遥远了。那时士气仍然旺盛。

我的主要困扰是，官兵们已经打得筋疲力尽，伤亡惨重，后援不继。我一到北干山就明了这些，已经没有办法挽回局势。撤退是唯一的出路。

蒋先生已经调动了全国调得动的军队到达淞沪前线，援军来自南京、贵州、东北、云南、广西等地，主要的例外是阎锡山部队。总共有 80 多个步兵师投入了淞沪会战，包含 60 多万官兵。如果加上炮兵及其他特种部队，总数便超过 70 万。^①

在淞沪会战整个过程中，我前前后后指挥过二十多个师，其中多数是在我移师北干山之后到达的。那么多第一流的中央军部队，诸如胡宗南的第十七军团都拨归我指挥过。在淞沪会战中我最多指挥过多少万官兵，这已不可能估算了。

当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巡视淞沪前线到我指挥所时，我告诉他，没法子再继续抵抗了。我说，我们必须撤退，但首先我们必须运送十个师到苏嘉、吴福国防工事，然后，后续撤退的师便有保障了。守住这些国防工事，我们就能重新集合从前线撤退的部队。这样，我们就能避免一场溃散。我要求陈诚向蒋先生传达我的意见，他同意了。

不久，我赴松江出席军事会议，这是蒋先生召集的。会场设在松江车站一节列车上，出席者有宋子文、白崇禧、陈诚、顾祝同、薛岳、孙元良、我以及其他将领。会上只有中国人，冯·福根豪森没有出席。

【这件事我忍不住要讲出来，因为我不知自己还能活多久。不要介意蒋先生知道了会发怒。】

那时淞沪会战已葬送了巨大数量的人命。在蒋先生莅会前，我们在火车车厢里讨论了局势。我们都认为，无法再抵挡敌军的优势火力。蒋先生到会后，高级军官们依次提出报告。我提议我们从淞沪前线转移十个师到苏嘉、吴福国防要塞工事，如是我们便能重新集结后撤的部队，以便确保有计划的撤退。我感到有信

^① 据孙元良 2005 年 5 月 27 日在其台北寓所对译者说，淞沪会战时，国军投入 85 个师，犹如古典小说上的车轮战法，又似《封神演义》中众神仙攻打三霄娘娘的黄河阵，所以被日军各个击破，来一个师打一个师。一个师被击溃了就用另一个师顶上去，孙元良的八十八师自始至终没有换下去，蒋介石耗十年心血训练的 20 个德械师全都葬送在黄浦江畔，中国锥形的空军也折损了逾半战机，海军舰只几乎全部在马当自沉封锁长江航道，抗战初期库存的弹药装备全部耗用在淞沪之战。当时的民气沸腾，不容许几十个师集结在上海周围等候到齐了才围歼日军。每逢一个师的伤亡达到 2/3，它就会被调回后方休整，让其他师顶上去。增援部队由后方运送到战地后，没有一刻的停留和准备，就加入了火线。敌人的炮弹好像雨点一样的散落我们的阵地。我们的炮兵在数量与火力上都无法与敌对抗，只有英勇的战士们以血肉筑了长城，来抗拒敌人犀利的火器。制空权也完全掌握在敌人手里，敌机一天到晚出没在战地的上空。我们部队没有立体作战经验，仅凭血气之勇，不知讲求疏散与伪装，更招致许多无谓的损害。我们的部队白昼行动大受限制，一切部署的调整和兵力的转移都在夜晚，这更使指挥与时间蒙受很大影响。战地是一片平静、不能徒步的川渠，纵横交错，这对于联络与地形的熟识均造成不少困难。在这种不利的条件下，各级指挥官当时都深深感到指挥一个防御组织不健全的大兵团作战，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心顶挡敌军的推进，我们的工事是坚固的，永久性的。

左翼军总司令薛岳同意我的建议，绝大多数人同意我的建议。大家一致认为，上海再也守不下去了。孙元良部处于最前沿的阵地，^①他特别坚持自己的观点：我们已无法再打下去了。【此时蒋夫人突然从上海来到，我还记得她穿着毛皮大衣。她宣称我们若能守住上海——我记得她说十多天——中国将赢得国际同情，国际联盟将帮助我们抑阻日本侵略。蒋夫人有没有提及11月3日在布鲁塞尔会议上九大强国签署的公约，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她谈到国际援助。与会者只有少数人同意她的观点。】蒋先生说，上海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坚守。

10月28日，德国驻华大使奥斯卡·陶德曼代表日方向行政院院长孔祥熙转交了所谓“和谈四原则”，会议上并没有提及日方提出的和谈条件。

有报道说，日军利用国军守军在援军到达前撤离海岸之机，于11月4日突然在杭州湾北岸多处登陆，然后迅速北进。我对此的看法是，我军在增援部队到来前撤离阵地，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杭州湾没有抵抗，那是事实；我们的部队疏于防范，也是事实。也有可能汉奸向敌人泄露了国军行动日程。^②

敌军的登陆威胁到我们的右翼，使国军无法坚守上海。我下令刘建绪的第十集团军进攻窜犯松江的敌军，但他行动太慢，敌军已抢先占据了松江。我也命令吴克仁率六十七军去松江，该部刚抵达淞沪前线，较少实战经验。

【淞沪会战的最后几日是混乱的。一天，蒋先生叫我去看孙元良。我要黄琪翔去找他，发觉他正在公共租界百乐门舞厅跳舞。我报告了蒋先生，他说：“混账！毙了他！”我没有枪毙他，我感到蒋先生只是说说罢了。

孙元良是黄埔一期毕业生，是蒋先生最宠爱的13个门生之一，号称“十三太保”^③。几年前，我听说他在江西被捕，蒋先生要处决他。他被特准与蒋先生通电话，他说：“我，孙元良在此向校长报告。我跪在您面前。您下令枪决我，是应该的。我活着是您的学生，死后也永远拥护您。”孙元良口才便给，蒋先生遂下令推迟执行，也许那天蒋先生心情比较舒畅。后来他秘密派遣孙去日本进修。然而，这些事我们都知道。等孙回国后，蒋先生又重新起用他。^④



孙元良

① 据孙元良将军说，第八十八师坚守闸北阵地76天，没有换过一次班，在三个月血战中补充过五次，每次都是用几个补充团来填补，其中若干官长有作战经验，士兵则全是新兵。

② 据英文的《中国周报》1938年8月13日报道，由于汉奸把中国军队行动的机密泄露给敌军，致使他们在中国军队增援部队到达前抢先登陆。

③ 此处有误，孙元良并非“十三太保”之一。

④ 孙元良在其回忆录上提起该案：1926年北伐途中在江西奉新前哨阵地任团长时，孤军作战力竭，奉师长命令后撤，但遭受诬陷。后经下属营长李良荣与负伤官兵向探望伤员的蒋介石辩白，才得以平反冤狱。蒋送孙大洋三千块去日本陆军大学深造确是事实，唯电话中求饶一事恐系讹传，与事实有所出入。

11月8日至9日的午夜，蒋先生打电话给我，要我命令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蔡劲军留在南市。我打电话给蔡，要他到北干山来看我。我传达蒋先生的命令后，他拒绝接受。我用电话回报蒋先生。蒋先生说：“毙了他！”蒋先生习惯在一时冲动时下达这类命令。

我试图规劝蔡劲军这位广东同乡服从蒋先生的命令。蔡是黄埔一期生，当过蒋先生的随从参谋，深获宠信。我指出，作为蒋先生的门生，他必须服从蒋的命令，为蒋效命。此外，留下来未必会有生命危险。我强调我与他之间的差异——他是蒋先生的学生，而我只是蒋的下属而已；他深受蒋先生的栽培，而我是自我奋斗一级级升到现有位置。可惜我说服不了他。警察们没有动摇，但蔡局长先逃走了。蒋先生似乎认为，他的学生一定要服从他，在这件事上，就不是必然了。后来蔡劲军向蒋先生写了份报告，就没受到处分。蒋先生的行为常使人感到莫测高深。我在《抗日战争回忆记》一书中忍住不说这件事，现在我来日无多，该说出来了。】

11月9日五时许，我看见（第五十八师师长）俞济时的部队路过我的司令部门口，俞济时本来隶属胡宗南的十七军团，那时因为调任中央军委总司令而归我统领。我问俞济时去哪里，他说奉命撤退，还问我有没有从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接到撤退命令，我说没收到。按规定，不接到命令是不准转移阵地的。

一小时后，我收到（第十七军团军团长）胡宗南转来的撤退命令。传令兵驾驶吉普车给我传递命令，可是他走错了路，开到胡宗南的军团部。公文封皮上打了三个“十”字，意谓那是“最紧急”。高级军官在任何特定地点是有权打开这类最紧急密件的，胡宗南打开并阅读了这个命令。他有权力这样做，但是他确实要承担全部责任。

收到这项命令时，我已经错失了指定的撤退时机，部队已陷入极度混乱状态，各级司令部已很难掌握其部队了。为什么撤退命令不能由电话传达呢？为了安全的缘故。此外，译成电码与解开电码需要更多时间。

此时，混乱蔓延开了。【蒋先生犯了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蒋夫人的愿望被证实是一种错觉，她太天真了，蒋先生怎能听从妇人之言去指挥一场百万人的大战役呀！】第三战区缺乏一个通讯联络的统一制度，这一点在撤退过程中暴露无遗。三战区命令我的指挥所参谋与集团军向青浦行军待命。我对此深感疑虑，因为前线离青浦仅50公里。那么多官兵集中，引起公路挤塞，只能导致混乱。

我在浦东的部队是同指挥所一起撤退的。只有炮兵营经由南市后撤。我的部队可以自己徒步行军，但是炮兵需要机动运输。由于我没有足够的卡车把八门卜福斯炮从浦东运走，便致电宋子文求助。他派来十辆卡车，等待装运南市撤回的大炮，所以辎重毫无损失。为此，我对宋子文感激不尽。此后浦东人见到我就夸奖这一奇迹——他们认为我是“关公”。

我命令吴克仁撤离松江，但是他没及时撤出，结果投降了敌军。^①

^① 日军大肆宣传吴克仁参加了和平军，这一谣言流传颇久。事实真相是10月9日吴克仁在指挥部队渡河时中弹殉国。军政部据敌后情报以为吴克仁叛变投敌。1981年旅美报人田雨时撰文为吴喊冤。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吴克仁为革命烈士。

我的部队大多数及时撤出，留在后面的只是伤员与掉队的。战地服务队队长钱亦石病了。队员们不忍抛下他，便留在南市陪伴他。

我的部队大多撤到了青浦。按理说，这不算是一场溃散，因为撤退是有秩序地进行的，事实也如此，这是一支败军呀！有几个军官跑了，士兵逃亡的多一些。但是谁也不能确定，究竟他们是开小差还是走错路跟错队伍，一部分人后来归队了。由于敌军紧随着追击，在打败仗后收容散兵重新整编是一项特别困难的任务。

敌机甚至在夜间也轰炸我们，公路上挤满了人。我的汽车慢腾腾前进，好像步行的速度。每逢撤退一开始，局面总是可悲的。我们不需要扯及其他部队了。我们谈一谈我的指挥所吧！我只带了几个参谋部门同事，指挥所其他同事都失散了。公路上难民并不多，因为大多数想走的人都早已走了，其他人则愿意留下来作“顺民”。

经过彻夜行军，大约早上四五点钟，我们到达了青浦。那儿乱成一片。我没有命令不敢行动，乃打电话给在苏州的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他正好在同南京的蒋先生通话，蒋意外听到我的问话，便说：“向华，到苏州去。”否则，我不敢离开青浦。这就是我为什么常说，虽然基督教徒不应该相信命运，但有时真的，一切都由命运注定。

第二天清晨，我同指挥所参谋与已集合的集团军一起坐车去苏州，那时敌军已逼近青浦。当我离开时，已经听到炮声，我看到了悲剧。整支集团军向苏州撤退，有些士兵找到了船只，我也找到一艘。我们离青浦后不久，敌机出现了，它们低飞扫射，到处听到乒零乓啷声音。有些勇敢的战士用步枪或机枪向敌机开火。“啪啪啪”的声音至少迫使敌机升高。这真是场悲剧。

那天深夜我到达苏州。次日清晨我去见顾祝同，他要我回到嘉兴去指挥刘建绪的部队。下令刘建绪派兵占领与控制苏嘉国防工事后，我坐着汽车向杭州走去，追赶已开拔的第八集团军司令部。

此时，我有些部属正沿着京沪公路撤退，左翼军大多数部队也沿着铁路和公路向南京退去，其余部队则沿着长江南岸后撤。

在撤退途中，粤军（六十六军军长）叶肇走进农家借了一身便服。当敌军到达村庄时，误以为他是一个挑夫，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逃到上海后，他穿这一身农夫服装摄影留念，还印了几张送给朋友。我保存着那张他给我的照片。

在杭州我停留了两夜，我必须向总部的参谋发布命令整编部队。然后去了嘉兴，敌人残忍地向我们发炮。杭嘉公路上挤满了从松江跑出来的难民，逆向而行。其中有些人累得走不动了，就在公路上停下来。公路很宽，他们并没有妨碍部队行军。我又从嘉兴迅速赶赴嘉善，到达时已是11月13日了。

我能从苏州一路平安赶到嘉善，是因为敌军占领松江后没有追击我们，他们停下来休息了。倘若它们沿着铁路围攻嘉善，我就到不了嘉善了。我在嘉善见到刘建绪，便重新整理了他的溃败部队，不许他们再后撤。但是他们进不了国防工

事，因为村里的长者与保甲长都携带了地图与钥匙逃走了。当敌机扔下炸弹在周围爆炸时，刘建绪与我坐在一座机枪掩体的顶盖上。人们会问，为什么我们不砸开国防工事的门锁，答案很简单：这么做需要时间与工具——哪里去找适用的工具呀！11月14日，嘉善失守。

我把嘉兴交给刘建绪，就和几名参谋离开嘉兴去了杭州。我在杭州停留了几天，在那儿我遇见黄琪翔，他已剃去了小胡髭。吴克仁投降后，他逃上一艘舢板，剃掉胡髭，脱掉军服。我同他开玩笑，说他好像割须弃袍的曹操。

我们在上海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虽然我们的军队人数庞大，但我们的武器装备比敌人差得太多。在训练方面，也远远落在日军后头。一流的中央军部队在装备与训练上都比其他部队先进，但同日军相比仍然差劲。我们的空军同日本空军不能比，海军简直不值一提。然而我们士气仍然旺盛，否则绝不能长期坚持抗战。在战争中，士气是最重要的因素。

淞沪会战是抗战中最重要的战役，它是自1904年日俄战争以来，远东最大的一次战役。正像我亲身参加的北伐临颖之战是内战中最激烈的一仗，我在淞沪会战中亲眼目睹了抗日战争中惨烈的一幕。

在淞沪战场牺牲这么多忠勇将士，是一大失着，消耗了从全国各地抽调来的国军精锐部队。淞沪会战我军伤亡率很难计算，可以说超逾一半。怎么分类统计伤亡？阵亡人数不到伤亡总数的三分之一，绝大多数是受伤；伤员中，重伤员不到三分之一；失踪人数很少，因为上海是个很小的地区。我的部属很少被俘，因为我们一失去阵地就能够很快撤离。

1938年11月28日蒋先生在南岳会议上说，我们犯的重大错误是由于疏忽了我们的侧翼与后方阵地、低估了敌军，我们把军队都派到前方，使敌人有机可乘登陆杭州湾。我的看法是，蒋先生完全掌握部队的调度与部署，他着重上海前线却忽略了两个侧翼，但我不认为这是重大的失误。即使敌军不从杭州湾登陆，或者登陆后被我们击溃，左翼军与中央军还是守不住上海的，因为我们缺乏援军。

我的观点是，我们的最大错误是没有派军队防守苏嘉与吴福国防工事。事情一开始就错了。把我本来驻扎在要塞的部队调到淞沪前线去死守，这本身是个大错，最佳选择是留在国防工事。倘若照我的建议去做，战况剧烈时可以派出增援部队，不必要求中央派兵增援。倘若中枢接受张治中与我的建议，派六个新兵师驻扎在国防工事，我们就能阻延敌军占领南京，在这段时期敌军一定会付出惨重的牺牲，它不可能进军那么快。

总之，【倘若不是蒋夫人要我们再坚持十几天，我们原本可以实行有秩序的后撤。】我们官兵的心理状态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如果他们知道我们有部队防守国防要塞，这对他们会起着极大的心理鼓舞，就不会忧虑开抵苏州后会发生什么变故。

我们还有一个重大错误是把国防要塞的地图与钥匙交给乡村中的长者与保甲长，那是些没有经历军事训练的人。至少应该由保安团队去守卫这些国防工事。

保安团队成员是受过军训的，他们不会擅自离开岗位逃亡。另外，保安团队当然不是当地居民，他们是由省政府组织的。把军队从南京调到上海前线也是一个错误——无论形势怎样严峻，南京毕竟是我们的首都。

在1938年3月举行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何应钦承认在淞沪会战中犯错，但他不敢批评最高统帅部，他只是承认撤退时过于混乱。【何应钦在台湾不敢说真话。除了此刻正在北京的张治中，^①没有人敢泄露真相。】

相对来讲，在淞沪会战中，成功地保卫浦东是我最满意的经历。首先，在三个月的战斗中，敌人从来没有能够在浦东上岸；其次，我妥善运用了炮兵部队。我从未造访上海的外国租界，虽然去那儿很方便。我也没有让我太太去过南市。

在淞沪会战中，我从一开始打到结尾，同时张治中、陈诚、薛岳顺利地指挥着左翼军。此外，我一身担任右翼军、中央军、第八第九集团军等四个总司令的职务。然而，我甚至没有见到我的名字出现在何应钦所著《八年抗战之中国》一书的淞沪会战章节中。

我在杭州停留几天后，蒋先生要我去南京。我把杭州交给刘建绪，可是我的司令部留在那个城市。到南京后，我碰到汪精卫。他邀我出席他的家宴，还有其他宾客。他没有表现出悲观情绪，也没有把书籍用品搬到户外。

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充满了信心，他认为他能守住南京，我也是这样看法。我们中国军人信奉以下教谕：“不成功，便成仁。”唐生智要我做他的副司令长官，我说：“好！”为什么？因为担任副司令长官所负的责任比较轻。

我觐见蒋先生，告诉他我同唐生智的谈话内容。他说：“不，回到前线去。我已经决定任命罗卓英为南京卫戍副司令长官。我希望你去指挥几支桂系部队，你指挥他们比较合适。”蒋先生考虑到我过去跟桂系的渊源。他要我去江苏宜兴指挥桂系第八十四军夏威与第七军廖磊的部队。

第八集团军总部迁到宜兴。最高统帅部命令我占领敌军沿着京沪铁路向南京进攻部队的侧翼阵地，其他敌军则沿着京杭公路依傍长江向南京进发。

（根据朱子家所撰《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一书，在1937年12月2日与6日的最高国防会议常务委员会第54次会议上，蒋先生准备接受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转交的日方三项和议条款：（1）日本保证在华北无领土野心，仅要求与华经济合作。（2）中国加入反共协定。（3）日军退出中国领土。这三项和议条款已取得白崇禧、顾祝同、徐永昌和唐生智的同意。）实际上，我对陶德曼在南京的活动毫无了解，甚至不知道他试图从中调停。

我到达宜兴时，敌军已逼近广德与常州。12月2日，江阴陷落。我已无能为力。

那时是否有苏联飞机与飞行员协助中国空军我不清楚，我没见过苏联飞机。

^① 据张治中在其回忆录中诉说：“上海之未能一次总占领，统帅部失机于先，三次叫我停止攻击。后来大战展开，除陆军外，又没有配合有力的空军……因为缺乏空军和炮兵的配合，以致未达到占领全沪的目的。”

南京是由上海的溃军防守的。想一想，它要耗多少天才能从上海跑到南京呀！我部下的勇士们认为：为什么跑这么快？敌军来犯，我们应该随时抵抗！别人跑得更快。我军刚到南京，敌军已踏上我们的门槛。溃兵既混乱又无组织，没有时间去重新组织与整顿，所以南京是没法防守的。设若我们有一支劲旅驻扎在南京，敌军不会这么快就攻占南京，这座龙盘虎踞的城市至少可以守一个月。

敌军逼近时，城门紧闭，唐生智悄悄溜到长江对岸的浦口去了。为此他受到惩罚——以后他就一直走下坡路了。罗卓英跟着唐偷跑，但他未受处分，因为他只是副司令长官。12月12日至13日，南京弃守。

邓龙光刚到南京，他没有时间重新整理粤军，只好带了几名亲随突围。如果我奉命防守南京，我也会试图突围。

然而，我的部下，多数不能突破敌人重围，转移伤兵更是不可能的了。我接到撤往浙江于潜的命令。在途中，我遇见一家难民，带着小孩，我问他们往哪儿逃。他们告诉我，他们是松江人氏，他们不知道往哪里跑，只是紧跟着部队。我说，你们是平民，可以留下的，未必有什么危险。他们回答：“我们不愿做亡国奴！”面对人民的爱国情怀，我深受感动。

1939年12月20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到达浙江金华后，召集会议考查战绩。与会者有驻防浙皖边界的高级军官。会议决定撤销第八集团军编制，将我部移交黄绍竑。

我认为这是一种惩罚，虽然没有明文提及。这是我首次遭遇这类的事，我猜忖他们不想要我，也许有人认为我已不适宜担任总司令。也可能是基于以下事实：白崇禧到了金华，而我指挥的部队竟是桂军。黄绍竑原是广西人。因此，我移交了军级单位，便同总部参谋人员及集团军一起退往后方的江山。

战地服务队在江山重新建立。我们撤出上海后，钱亦石去世了，他的队员们把他秘密下葬后，一个个逃出敌占的上海，许多人打扮成难民或苦力。

我任命余海湛为战地服务队队长，他是陈公博的亲信、陈的北大同学。是否我故意遴选非中共党员负责该队呢？是的。自从我的集团军司令部被解散后，我将部队移交给其他人。

1938年1月6日，我们抵达江西贵溪执行解散我的司令部之工作。在贵溪后方军医院发生了伤兵事件。在那里伤兵确实给当地民众制造了麻烦，那时军纪松弛了。我有权处决五名肇事伤兵。在那个地区，我是最高长官，不需要向上级请示；如果需要，我可以下令处决严重违犯军法者。

1月9日，我去武汉路过南昌。我向薛岳罗卓英推荐我的第八集团军司令部被编遣的参谋们。诚然，那些参谋都希望我举荐，但并非每个人都愿意侍候薛岳与罗卓英，当时我国的人事制度未踏上正轨。薛岳说：“好！让他们来吧！”我计划把集团军移交给薛岳。

我从南昌去长沙，然后赴武汉。1月11日，我到达武汉就拜访陈诚，向他报告撤销第八集团军司令部的事项。当夜，我见到了汪精卫。我告诉他有关我在

淞沪会战期间的见闻以及随后发生的事，他没讲任何悲观的话。

我每天都见到陈公博，他住在黄献臣的家里，这段时期我每天都去那儿。

到了武汉，才了解陶德曼的调停意图，他的使命成了人们的话题，变成公开的秘密。由于我反对和谈，我担忧政府可能接受和谈条款，许多民众不愿意对日妥协。由于南京惨败的阴影，许多高级将领动摇不定，但我相信蒋先生是坚定不移的。早在庐山谈话会上，我就发现他对抗战前途持坚定、乐观态度。

1月19日，我觐见蒋先生。他要我再度统率第八集团军。我说我不想重为冯妇，但最后不得不服从命令，但蒋批准我请假两周。我下令，在返回故乡彩岭村时，我要求司令部成员与集团军官兵在贵溪听候命令。自1923年以来我没有回过家乡，这是我探望亲属的一个好机会。

2月5日，在接到蒋先生急电催我马上接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后，我离开彩岭村去武汉。政府要我去打日本鬼子，我很高兴，这种心情同打内战时截然不同。我感到乐观。这是一种奇特的现象，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中华民族拥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我敢断言，在军人中间，不存在沮丧情绪，人人都很乐观，人人都希望继续抵抗，大家都确实感到乐观。考虑到淞沪会战与南京保卫战的失利，我们的战略目标是以空间换取时间。一旦敌军泥足深陷，它们会投降或逃走的。这不只是我个人的感受，我的观点代表了绝大多数军人的观点。从小我们便受到爱国教育——投降是可耻的。我们必须继续战斗。倘若没有乐观精神，就没法继续战斗。正如常言所说，世上有两种军人，一种是屡战屡败，另一种屡败屡战。我们属于后者。这是专指军官而言，士兵的平均教育程度是那么低，我们不能指望他们具备远见卓识。

2月14日，我在武汉谒见蒋先生，讨论有关第八集团军事务。3月3日，我去长沙重新组建第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我下令司令部与集团军移驻江西萍乡进行重组与训练工作。

3月29日，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会议在武昌揭幕，我25日抵达武汉。在临全会之前我会晤了汪精卫，国民党左派人士情绪低落。我们都已知道蒋先生将会在临全会上当选国民党总裁。【我们都知道CC系掌控了党的选举，二陈兄弟拥有极大权力。】

我们所期待的事终于成为现实，蒋先生当选中国国民党总裁后，他陪同汪精卫走上讲台说，设立副总裁职位是个好主意，而汪先生是此职位的最佳人选。如果副总裁由党代表选举产生，汪精卫可能选不上。【谁会当选？陈果夫。蒋先生知道CC系的实力，这才指定汪出任副总裁。】

【汪精卫热泪盈眶。】国民党左派很不高兴。【他们流泪，我也哭了。我感到，站在国民党的立场，汪精卫应该当选总裁，而不是蒋先生。依据国民党的历史，汪精卫比蒋先生资格老得多。蒋先生无权独揽党政军大权。他在政治上否定了汪精卫，没有提及军权，同样不赋予汪精卫党权，太过分了！】

【临全会决议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目的是加强蒋先生对国民党的控制，抵

消陈氏兄弟——他俩已掌握了党权。所有这些都引起了党争。】

黄琪翔、郭沫若、叶挺、陈铭枢和我并肩拍了张照。1927年，郭沫若任过我统率的第二方面军党代表，其余人都是第四军的。周恩来称我们为“五虎将”。那天他到场了，但没有同我们合影。



1938年3月拍摄于汉口的“五虎将”。左起：黄琪翔、陈铭枢、郭沫若、张发奎、叶挺。

4月12日，我回到萍乡。5月13日，我的司令部进驻河南郑州准备作战。在去郑州途中，我到了汉口。5月17日，我一到汉口，蒋先生就命令我暂时停留武汉候命。那时欧震的第四军与其他单位归我指挥。离开第四军时，我曾决心摆脱它。可是，第四军官兵仍然尊敬我。第四军驻武汉的后方办事处人员同我商量有关李朗如是否需要出售第四军在香港的房产，将所得款项汇来武汉协助伤兵治疗的事。第四军在淞沪会战时隶属于薛岳的第十九集团军，伤亡惨重。我想，这么做是正确的，于是派冯次淇持薛岳与我签署的信件告诉李朗如出售该屋。李朗如拒绝了，说买房的钱是唐生智的。

6月6日，接到蒋先生命令，保卫大武汉的计划已经拟就，我被任命为第二兵团总司令兼第八集团军总司令，薛岳任第一兵团总司令，孙连仲率第三兵团。我们都隶属于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副总司令是罗卓英。第九集团军与第七十军隶属于我，前者由吴奇伟统率，其基本队伍由第四军军长欧震指挥。我在第八集团军总部实施指挥。

那时官兵们的素质比起淞沪会战时要差一些，士兵未受过良好的训练。士气有所低落，但一切都还正常。就如我常常说的，军队的士气与人民的支持是战争

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是不可分离的。

在武汉时期的军队装备，总的说来，数量与质量方面同淞沪会战时期相似，医药与通讯供应就不大充足了。我们的装备远远比不上敌军，虽然我军人数量众多，但我们无法取胜。我知道，打败仗是不可避免的。

我要求陈诚介绍合适人选接替朱晖日担任我的参谋长。我希望我的参谋长在中央人脉良好且能上达天听。陈诚推荐他的保定军校同学、河北籍的陈宝仓，他侍奉陈诚多年，陈诚对他十分器重。我想既然是陈诚的亲信，陈宝仓对我可以有所帮助。朱晖日便调任粤汉铁路卫戍司令。

在军委会设立陈诚主掌的政治部后，第二兵团也设立了政治处。周恩来出任陈诚的副手，郭沫若掌握政治部第三处。在这一时期，陈诚与郭沫若成了好朋友，他俩常常来我的司令部。

第二兵团政治处的功能是武装军队的头脑，负责军队内部的政训以及促进军民合作。政治处的经费由军委会政治部提供。政治处的人事由军委会政治部任命。我推荐福建人郑震宇任政治处主任。我认识他时，他还在伦敦大学念书。他从中央政治学校毕业后，由陈氏兄弟保送去英国留学，但他对陈氏兄弟心怀不满。由于我同陈诚的交情，中枢接受了我的推荐，任命他为政治处主任。中央还派遣黄埔毕业生吴吕熙担任政治处副主任，政治处的人员包括文官与军官两种。文官人数较多。政治处绝大多数军官是黄埔毕业生。

战地服务队划归政治处管理，其工作性质与人事没有改变。唯一的变化是，服务队不再直接由我指挥。军需物资的运输由第二兵团经理部主任萧文负责，其执行官是周钰。

6月12日，日本陆海军围攻安庆。18日，我的司令部迁到长江北岸的鄂东浠水。6月22日，敌军进攻长江南岸的战略要塞——马当，它在江西境内，接近安徽边界。这标志着武汉会战的开始。马当要塞的司令逃跑了。^①6月26日，马当迅即沦陷。马当失守为敌军军舰打开了长江的大门，也使我军守卫湖口与九江愈益艰难。

我们海军敷设雷区及使用鱼雷艇，试图阻挡日舰进攻湖口。但由于我们的船舰太小，效益不彰。可以说，那时我们的海军陷于崩溃境地，我们的水雷没什么大用处，因为敌人拥有扫雷舰。

此时，我亲眼目睹十几架苏联战机与日机缠斗。其中一名苏军飞行员弹出飞机跳伞降落在广济附近一个村庄。村民们把他带到我的司令部。在他的飞行夹克背后印着中文：“我是俄国人，来此帮助你们抗日”。这样确实可以保证他的安全。所有的俄国飞行员，夹克背后都印着这些中文。

我们倚靠俄国人。我们的飞行员在淞沪会战勇敢献身，整个空军损失惨重，

^① 日军特别陆战队有一艘炮舰、三艘汽艇被岸上炮兵击沉，但要塞守军在敌海空军猛烈炮火（毒气弹）及优势兵力围攻下伤亡殆尽，被迫放弃要塞。张发奎所述要塞司令逃跑系误传。唯援军第一六七师师长因率驻湖口之一旅两日行程走了七日，部队未抵阵地全失，以延误时机被蒋下令枪决。

已经无法补充飞机与飞行员。俄国飞行员同日本空军打得很艰辛。我没指挥过空军，但我知道俄国人打得很勇敢。他们整天枯坐在战机里，下了飞机也仅仅去澡堂洗个澡。他们甚至在飞机上用餐，这样，警报一响就可以马上起飞迎战。虽然有新颖、先进的苏联飞机参战，日寇仍然拥有空中优势，援华的苏联飞机到底是有限的。

7月5日，湖口在激战后失守，国军伤亡惨重，九江继而遭敌军围攻。7月6日，我的司令部奉命转移到长江南岸的江西瑞昌。我去了汉口。

最高统帅部把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划为第九战区，由陈诚指挥。战区是依照作战需要而划分的。第一兵团的任务是保卫鄱阳湖西岸以及南昌地区；我的第二兵团是保卫九江及长江南岸的重要据点；第三兵团负责卫戍平汉铁路沿线；第四兵团由李品仙统率，负责防守广济、罗田以及长江以北的鄂东要津。

这样，我们扩大了空间，我们的战略是以空间换取时间，打持久战。我们撤到武汉还有一段路程，敌军愈是深入，它就愈是要提心吊胆。

7月15日，我带了必要的随员去九江。我在这个城市设立了指挥部，视察了这一地区的防御工事。我防守的地区布满了湖沼，长江从中间横亘。在理论上，这种地形有利于防御。但是在另一方面，敌军兵强马壮武器精良。由于它们掌握了制空权，长江就变成了敌人的交通干线。他们想在哪儿登陆就在哪儿登陆。横跨长江的水底铁丝网竖立后没有用，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没有海军。

第九集团军（吴奇伟）、二十九军团（李汉魂）、六十军（卢汉）、七十军（李觉）以及二十五军（王敬久）调归我指挥。二十九军团包含李汉魂兼长的六十四军和李玉堂的第八军。六十四军包括粤军部队，是李汉魂率领他们从广东北上，参加河南战役的。中枢调拨给我彭孟缉的第十炮兵团，我可以按需要部署。

与参谋们商讨后，我决定了部队的部署。我命令兵团的一部分防守鄱阳湖西岸的星子与姑塘；第二部分防守九江地区与长江，鄱阳湖毗邻的我军主要阵地；第三部分防守瑞昌与长江以南地区。这些部署是基于我的估量：敌军将在九江与姑塘登陆，然后利用长江直逼武汉。我同九战区司令长官部与第一兵团保持密切联系，同第三兵团联系较少，与第四兵团全无联系。

7月21日，两名苏联军事顾问来到我的司令部，他们是军委会派来的。苏联顾问不是派到我属下的军级单位，他们只限于军事范围。即使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鲍罗廷任总政治顾问、加伦任总军事顾问时，国民革命军也没有安插过苏联政治顾问。

7月初，德国顾问离开了中国，我很高兴。我一直认为，德意志民族是建基于军国主义原则的，而且它们与日本军阀有所勾结。

7月22日、23日晚上，敌军在庐山脚下、鄱阳湖西岸的姑塘附近登陆。他们由“水老鼠”——汉奸的协助，扫尽了我们在长江与鄱阳湖布下的水雷。我们挡不住敌人的优势兵力，溃散后退到九江。7月25日早上，敌军的军舰炮击九江，在浓烈的烟幕与炮击下，敌军在该城三个地点登陆。面对敌军毁灭性

的炮火，我们捱过了恐惧的时光。我把指挥部转移到庐山脚下。从前线上来的报告判断，我知道已经无法继续抵抗——所有的部队长都说他们不能再坚守下去。

25日下午，遵照陈诚的命令，我转移了阵地。我命令第四军——除了前一日黄昏抵达的一个旅——与陈公侠指挥的六十四军一五五师防御狮子山要塞与赛湖之间的二线阵地；李汉魂的二十九军团司令部与七十军防御赛湖与牛头山之间的阵地。我希望他们占据这些阵地以保障大部队有秩序地撤出九江。苏联顾问同意这一部署，我的指挥所移至马回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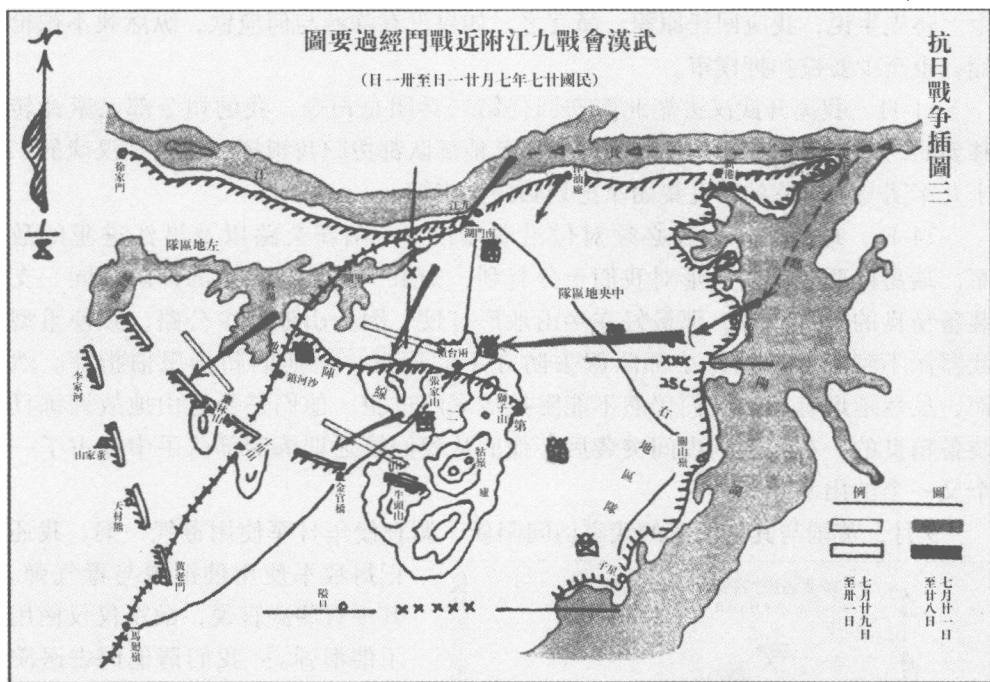
由于敌军炮火猛烈，我们不能在白昼行动，只能在夜间行军，直至7月27日早上，我的司令部还未到达马回岭。第四军（欧震）抵挡住敌军的进攻，使我的部队得以撤至新的阵地。7月28日，我命令第四军占领我们的第二防线后面、马回岭以南的阵地。为什么我要把我兵团的主力部队配置到铁路以西呢？蒋先生命令我守住马回岭以南的战线，我想放弃铁路、把防线转移到铁路以西的多山地形，联系右地区之第四军，形成一个逆八阵地，诱敌深入我中央的袋形阵地，适时从左右两侧转移攻势将敌人包围歼灭之。由于蒋先生不同意我的计划，我不得不继续防守马回岭以南的防线。不料最高统帅部认为我过早撤退，未奉命令擅自行动，更以为我想保存与我有历史渊源的第四军之实力。^①

7月31日，我收到蒋先生的电报，命令我把南昌——九江铁路的防守责任移交给薛岳与吴奇伟，吴所指挥的第九集团军刻正隶属于薛岳。要我回到武汉，这相当于撤职，我立即明白这是处罚。我思忖蒋先生的不快是因为我没有派第四军增援九江防线，而命令它与其他部队南撤。但我不能拒绝返回武汉。

8月1日，我去南昌。此时我的司令部参谋、集团军以及附属单位正向江西武宁进军候命。到了南昌，薛岳告诉我，他也收到蒋先生的电报，称我因南浔铁路之役要负失职之咎。

我继续去武汉，途经长沙。【何应钦是我去武汉途中遇见的头一人。8月6日他对我说：“向华，你很幸运，尚无陈诚，你可能被扣押。”我问何以见得，他解释道，蒋先生十分气愤，蒋感觉到我在刻意袒护第四军——没有派它去增援九江前线，然而十分幸运，陈诚坚称我是奉了他的命令行事的。换言之，陈诚为

^① 从档案查出，张发奎曾呈交详细报告给蒋介石，陈述九江作战失利的直接原因：（1）交通线如九星、九瑞、瑞昌至阳新、瑞昌至德安以及南浔铁路北段早已彻底破坏，以致筑城材料运输不及，阵地无法巩固，野战工事仅三分之一，故不利长期固守。（2）运输不良，兵站设施欠缺。前线部队白昼困于轰炸，夜间一面做工、一面运米，兵力疲惫，警戒自难周全，故自敌在姑塘登陆后，九星路不能利用，在九江附近部队将近十万，仅恃九江至马回岭小径为后方联络线，因之粮弹之补给、伤兵之运送均无法实施。士兵枵腹应战，伤兵呻吟道左，作战精神顿形颓丧。（3）警戒疏忽，致任敌在姑塘从容登陆，事前既失于察觉，事后复无法驱逐，敌在十二时登陆，至四时一刻始接第八军电话报告，致失增援时刻。各部通讯器材缺乏，致各军、师间及步、炮间纵横方向联络均欠确实，各自为敌，互不相谋，故不能适时互相策应、收协同之效。（4）高级将领缺乏自信心，中下级干部多无力掌握部下。职此次在浔数日，与师长以上各将领晤谈，每多借口新兵过多、防区太广或武器不足、战斗力弱而动摇必胜信念；盖以中下级干部掌握不力，精神涣散，故每逢敌机袭击，多数溃散，甚至有未见敌人已溃不成军者。



武汉会战九江附近战斗经过要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提供）

我背了责任。何还告诉我，当蒋先生下令我回汉时，何对蒋说我没做错事，但蒋先生没有接受何的忠告。】

最高统帅部怀疑我出于自私动机想保存第四军不想牺牲实力，蒋先生认为我应该派它去增援九江前线。如果我这样做，我军在九江可能坚守多几日，但迟早还是要撤出的；接着撤退令下之日，必会发生混乱；如果敌人尾追，我们将没有办法还击。如是则我的部队终将没法后撤，会溃散或被消灭。调配与整合部队作有计划的撤退是不容易的。一旦撤退出现混乱，我就再也不能成功地组织分批撤退与重新组合部队。从九江撤退显然与从上海撤退截然不同，撤出上海时的状况使敌军长驱直入进逼南京。

作为一名高级将领，我有权决定属下部队的战斗部署，我所做的是符合逻辑的，任何将领都会这样处置。【蒋先生直接命令我返回武汉，确是他不尊重指挥系统，他本应通过陈诚下达命令。这是蒋先生第一次不顾指挥系统而直接向我发布命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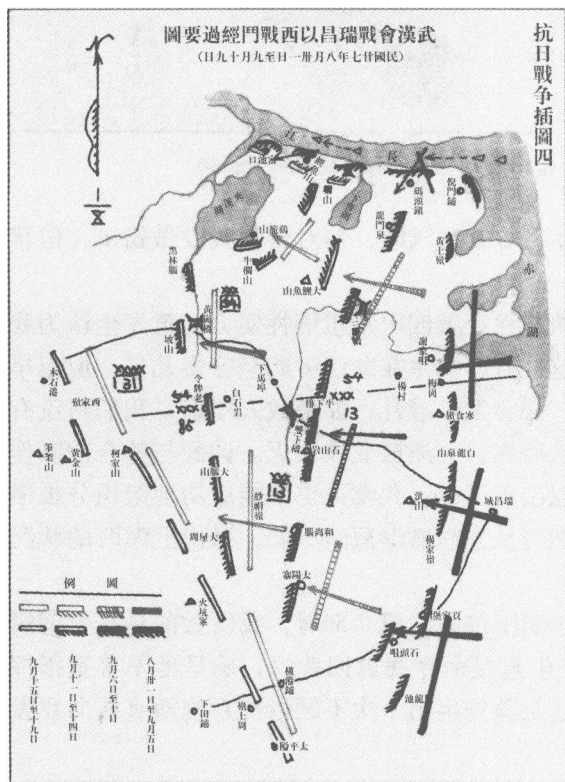
8月6日，我觐见蒋先生，要求接受军法审判，但他只是说，我首先应该休息几天。我坚持要受处分。他说没有处分的理由，又指着电报说，内文未提及这件事。他叫我回到岗位上去。蒋先生的态度怎么会变化呢？因为陈诚主动承担了责任，他对蒋说，我是奉他的命令行事。于是蒋先生不能率性扣押我。陈诚很够义气，他就是这样的人，有肩膀，敢负责。当然，如果没有陈诚，1936年我就再不能回部队了。最后，我建议放弃第二兵团总司令职，留任第八集团军总司

令。蒋先生说，我应回任原职。简言之，如果没有陈诚与何应钦，纵然我不被枪毙，也至少要被扣押候审。

11日，我离开武汉去湖北阳新回任第二兵团总司令，我的司令部已奉命转移到此。汤恩伯的三十一集团军与许多其他部队都拨归我指挥，但是李汉魂的二十九军团与吴奇伟的第九集团军已划归薛岳指挥。

24日，瑞昌失守。我必须对付沿着瑞昌——阳新公路以及沿江进犯的敌军。瑞昌以西多山的地形对我们十分有利，如果一支装备较差的部队要同一支装备精良的部队交战，那最好在多山地形打仗。因为山地缺少公路，致使重型武器派不到用场。我将小部队派去防守不同据点，使他们归汤恩伯指挥。然而，虽然地形有利，我们仍然不能阻挡敌军的进犯。他们是受过山地战训练且装备精良的。在一系列夜间突袭后，他们从我们缺乏训练的部队手中夺占了一个又一个的山头。

9月，英国与其他国家的武官访问阳新，调查侵华日军使用毒气一案。我还



武汉会战瑞昌以西战斗经过要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提供）

记得敌军使用催泪弹与毒气弹。其中有些武官说，敌军仅仅使用了催泪弹。^①我们请他们去医院参观。负伤官兵显示了敌军使用毒气弹的证据，他们是目击者。我们没有使用毒气——我们根本没有任何毒气弹，我们甚至没有使用催泪弹。我们并不具备可以发射催泪弹的特种枪。

9月18日，敌军进攻长江南岸的战略据点湖北富池口，那儿已经修筑了在马当要塞后方最重要的要塞——田（家镇）南要塞。我将蒋先生与陈诚的命令转达给五十四军十八师师长李芳彬：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守富池口。李芳彬是陈诚的十八军旧部。前一日，他曾违令后撤。现在，他被告知，要不惜任何重大牺牲坚守田南要塞以赎回前愆。

^① 据1984年10月6日日本《朝日新闻》报道，在武汉会战期间，日军共使用毒气375次，发射毒气弹4万发以上。至1942年，侵华日军已编成8个联队的毒气部队，每联队1500人，共计造成中国军民伤亡10万人。在淞沪会战与华北战场上，日军都使用过毒气。

9月19日，李芳郴写信向我保证：十八师官兵决心遵命坚守田南要塞。

9月24日，蒋先生命令李芳郴死守富池口七日等待援军，此举是为了使我们其他部队有时间撤退。如果富池口落入敌手，撤退将陷入溃散。我想亲自向李芳郴传达蒋先生的命令，但因患了重症脚癣而不克行走——一次敌机轰炸阳新，不能跑进防空洞——所以我打电话给李芳郴。他说：“总司令，我请示您报告委员长，我连三个小时都守不住！”考虑到李芳郴是黄埔生，我说：“李师长，蒋先生栽培了你，你理应感恩报德。不论你能不能坚守七天，你的责任是为他尽忠。我本人虽不是他的学生，但是为了国家和人民，我也应该为他尽忠，因为他是我们的最高统帅。”李芳郴一再重复那句话，要我转告蒋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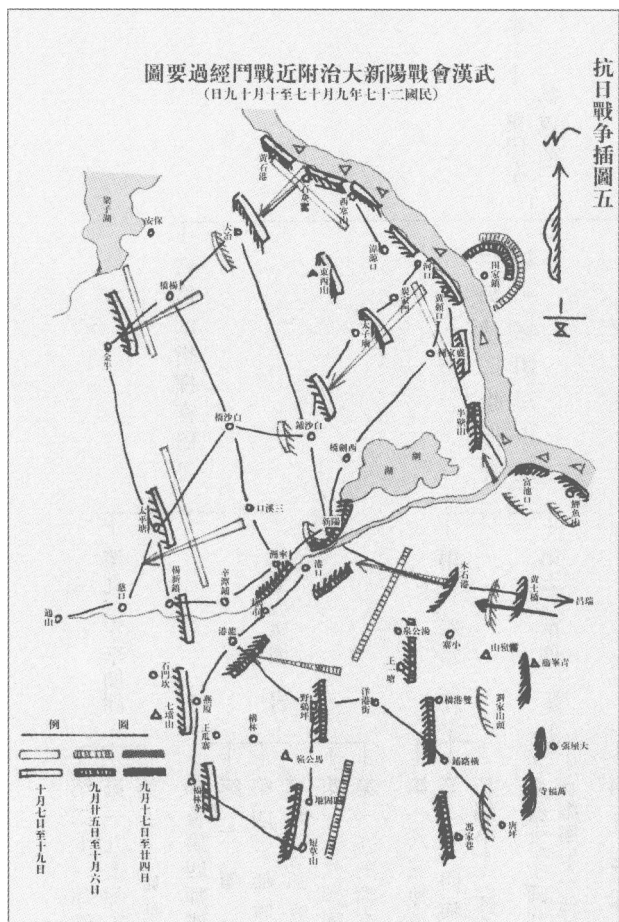
结果他并没有坚守七日，这是命里注定的。然而，当时他不应如此回答。如果没有蒋先生的命令，我会命令他掩护其他部队的撤退，然后让他自行撤退。

当我在电话中将他的答复转告蒋先生时，蒋先生嚎叫道：“立刻枪毙他！”我告诉蒋先生，李芳郴师已经撤离富池口。李芳郴自知要上军法处，已经先一步逃走了。

没有命令，是不准后撤的。部队长必须向上级报告局势。倘若通讯线路中断了，怎么办？处罚会因案情不同而有异，军事法庭是常年设立的。蒋先生有权下令立刻处决，因为李芳郴还没接战就违令后撤。我只可以扣押他。

我没有将这段插曲写入我的《抗日战争回忆记》，这段往事对蒋先生的威望是负面的影响——一位师长敢于违抗他的命令，这意味着他受到轻蔑。

9月28日，和富池口隔江相对的北岸田家镇，也失守了。敌舰可以直闯武汉。它们炮轰我们的阵地，在不同的地点登陆。我不顾严峻的局面下令小部队在邻近地区采取独立行动。因为敌军必须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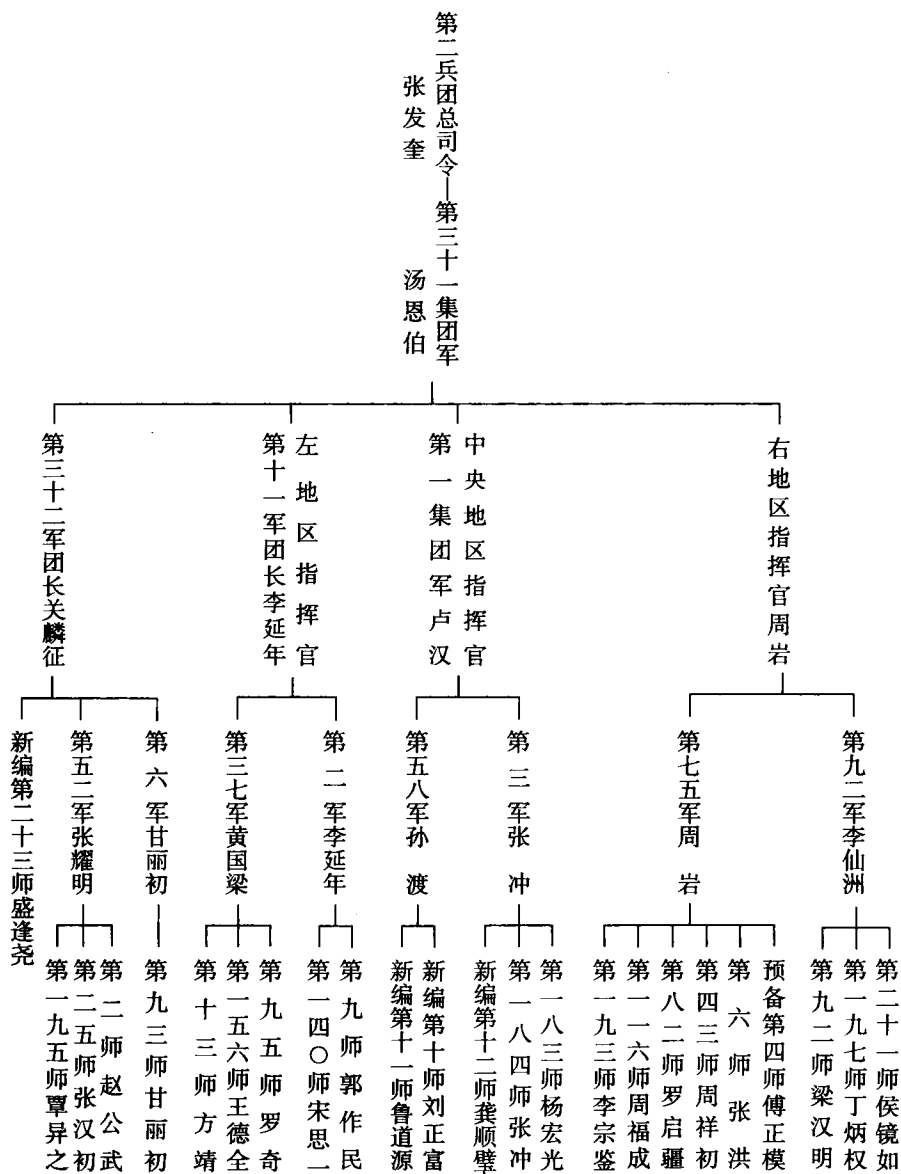


武汉会战阳新大冶附近战斗经过要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提供）

接一个攻占山头。我把此一决定向最高当局报告，保证我的部队能坚持三周，以便让最高统帅部有时间作出下一步准备。

10月20日，敌军攻占长江南的黄石，如是在阳新地区的部队便有被合围之虞，故我确定，到了撤退的时机了。我命令部属撤至金牛地区，到那儿重新聚集，归属第三十二军团关麟征指挥。我自己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崇阳。10月24日，在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召集的会议上，我的第二兵团奉命将关麟征（第三十二军团）与李延年（第十一军团）移交给罗卓英（第十九

武汉会战通山岳阳一带我军战斗序列表



在武汉会战中，许多名将归我指挥，例如汤恩伯、李汉魂、杨森、甘丽初、李玉堂以及卢汉。我同他们有着良好的个人关系，譬如，我同汤恩伯没有龃龉，其他人都见他头疼。在武汉会战中，我总共指挥了二十多个师，十几万官兵，在武汉会战指挥的部队比上海会战时更多。必须记住：当我在淞沪战场接任中央军总司令时，麾下许多部队已经遭受惨重的伤亡。在武汉会战中，伤亡都是由于武器不如敌人，但情况不如淞沪会战那样糟糕，具体数字我不清楚。^①但我可以估计我的第二兵团伤亡率大约是三分之一。

我们没有丢下伤员，有时间把他们移送后方。撤退是有秩序地进行的。但医疗设施不如淞沪会战时，因为武汉会战是野战（按：指不是在上海那种民居集中的地方），我们常常需要带走伤员。武汉会战失踪人数比淞沪战役多，因为战地是山区，前线也更加宽广。

官兵被俘的很少。敌人占领每个山头后，都需要喘一口气重整队伍，所以我们就能够及时后撤。开小差的案例不多，难民并没有影响军事行动。

汉奸的困扰可说微不足道，我收到过几宗汉奸活动的报告，抓获的很少。陌生人渗透到遥远的村庄是不容易的，因为农村的保甲组织相当严密。汉奸在寻找食物与庇护所方面都有困难。在上海，情况就不同了，他们很容易藏匿在人海的广厦之中。

以我所知，部队有传染到霍乱与痢疾，但病例不多。

我的部队并没有得到苏联援助，中国仅仅通过新疆得到数量有限的苏制武器与车辆，由于共区接近苏联，所以一部分供应品落入了共产党手中。然而，苏俄也直接向中央政府输送援助物资，他们不希望国共双方在争夺物资方面引起冲突。

同在北伐期间一样，我们自己决定战略方针，苏联顾问只是在会议上提供他们的意见，有时我们接纳他们的意见，纳入我们的计划中，最后的决定权在我们手中。我想不起他们有没有提供任何导致重大决策的建议。苏联顾问刻苦耐劳，他们从不谈论政治，约束自己只谈军事议题。他们同我们一起留在前线，与我们一同睡觉——从九江撤退时，他们同我们一起睡牛棚。我们之间关系非常和谐，从不争吵。他们态度谦恭，对我们很尊重。我一直认为俄国人是最好的顾问。

在武汉会战中，国军大致上没有犯下战略错误。

11月28日，蒋先生在湖南南岳军事会议上说，马当要塞失守是武汉会战期间我军最大的败绩。我同意，马当要塞失守造成了最严重的后果，以致打开了武汉的大门。

从一定程度上牺牲人力以赢得时间，以此角度比较我们在武汉与淞沪两大战役，很明显，我们在武汉赢得了更长的时间，因为我们吸取了沪战的教训。在淞沪会战，我们牺牲很大，但赢得的时间较短；在武汉，牺牲较小而赢得时间更多，我军展开在一个宽广的地域。倘若我们把军队集中在武汉，淞沪会战的悲剧就会重演——敌军可以直挺武汉逼迫我军决战。淞沪会战不能称为“防御战”，

^① 日方认为在武汉会战中日军伤亡3.55万人，中方认为是25.6万人。专家估计日军伤亡的确切数字应是10万人左右。中国军队宣布伤亡将士254628人，日军则宣布毙伤中国军队197439人。

武汉会战才是。当然，在多山地形作战时抵挡敌军与撤退，通常是比较容易的，而敌军追击我们是比较困难的。

在崇阳，我奉命构筑从蒲圻到通山的防御工事，以防卫长沙。可是敌军于11月6日迅速攻占了这两个县城，我的司令部后撤到湖南平江以北的南江桥。11月12日，岳阳失守。

关于13日的长沙大火——当时我的司令部距离长沙只有几小时的车程（那时的汽车每小时只能行驶十公里）——突然间我看到天空变成深红色，我感到迷惑。

原来这是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擅自实行焦土政策。虽然这是政府的既定政策，但只限于在情况需要之时，并须最高当局下令才可以执行。然而张治中并未接到这样的命令，他应该执行“坚壁清野”政策，搬走一切东西，使敌人无处可住无物可食，简言之，不留下能被敌人使用的东西。由于长沙离我的司令部很近，张治中至少应该同我商量。后来在重庆见到他，我想，如果问他这一重大事故，是不礼貌的，所以没提及。

19日我去长沙，我住在唐生智公馆，见到陈诚、周恩来、郭沫若等人。翌日，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被枪决了。【他是军局十三太保之一。】但我感到应该枪毙的是张治中，他必须为长沙大火负全责。

第十二章 第四战区（上）

（1938年冬至1939年9月）

1938年11月20日，酆悌被处决之日，我与陈诚觐见蒋先生。蒋说他刚去广东见余汉谋，他要我去当四战区副司令长官，该战区包括两广，如是我能与我的乡亲常在一起。此前四战区仅含广东一省，由军政部长、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任司令长官，但仅仅挂名而已，他甚至未去过广东，由余汉谋代理。

余汉谋因10月21日弃守广州而受处分。在敌军登陆大亚湾后，他的第十二集团军不战而溃，人们说“铁城无城，汉谋无谋”，系讽刺当时的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与广州守将余汉谋。广州迅速沦陷是荒谬的！

起初，中枢想任命薛岳为四战区副司令长官、任命我为九战区副司令长官。余汉谋反对薛岳的任命，建议让我取代薛岳，薛听到此讯十分恼怒。

我不想接受四战区副司令长官一职，我很清楚，余汉谋绝非真心欢迎我去，他建议我去仅仅是因为他反对薛岳。我同余汉谋是广东同乡，是同学，也是第一师老同事。他的职位一直比我低得多：我当团长时，他甚至还未当上营长；他的飞黄腾达是在他推翻陈济棠之后。我和余汉谋并无夙怨，但也谈不上深交。

后来我在防空洞觐见蒋先生，他再次表示要我南下广东，我必须同意，他说，他会派李汉魂去广东接替吴铁城任省主席，李将会协助我。蒋当然知道李汉魂是第四军骨干。我自然同意了这一安排。

那天晚上我回到第二兵团司令部。政治处副主任吴吕熙被捕移送军法处。吴吕熙骄傲自大，欺侮郑震宇，郑经常对我抱怨吴。在武汉会战期间，他违令临阵不前。

我在一名副官伍千里陪同下去韶关，然后去余汉谋十二集团军总部所在地翁源县三华。我同余汉谋谈了有关我新职的问题。我告诉他，我会为他与他的同事跳火坑，叫他们别担忧，总有一天我会离开广东，把这个省还给他们。我回到韶关，我的司令长官部已经设立。然后我去重庆向中枢报告。12月，我被正式任命为四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被任命为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九战区包含江西的一部分与湖北的南部。

12月15日，汪精卫邀我赴家宴。我们都怕孤独。他说，军队与民众都对战争前途感到悲观。我告诉他，据我所知，民众仍然坚定不移，军队士气仍高昂。他说，军队给养不足、逃兵日增，老百姓度日维艰。我同意这种看法，试图安慰

他。他不吭声了，我们转换话题。

这次家宴中，还见到汪派的陈璧君、陈公博、顾孟余、甘乃光以及曾仲鸣。到中央述职时，我常常见到这些人。我坐汽车去桂林，路程有四小时。在那儿我听说汪精卫于12月18日去了昆明。我认为他离开重庆是一个错着，但仍相信他是对政治厌倦了。

我在桂林停留一两天，同广西省主席黄旭初谈了一次话。由于没急事，我的旅途很悠闲。从桂林回韶关是坐汽车，比坐火车更快。到了韶关我再度去翁源看望余汉谋。

在韶关，我得悉汪精卫通电主和，这份“艳电”是1938年12月29日在河内发出的。我非常失望。他离开重庆已经使我够失望了，通电主和则更糟糕。我自忖：“哈！我同他一起进餐时，他也不告诉我！”如果他坦率告诉我，我会强烈要求他别离开陪都。我完全被蒙在鼓里，甚至陈公博也不告诉我汪要出走的意图，尽管我和他连私人的事都不忌谈。我揣度，汪邀请我赴宴是旨在探试。倘若我也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或者对最高统帅牢骚满腹，他也许会将其计划和盘托出的。

1939年1月1日，我发布通电，宣告自己就任第四战区代理司令长官。我的权力很大，主掌广东、广西两省党政军大权。那时敌军占领了广东省大片地方，主力集中在广州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他们必须控制珠三角，这是他们的供应线也是逃命线。敌军也驻扎在广州与从化以北的小镇以及珠三角以东石龙一带。敌军虽在大亚湾登陆，但并没占领大亚湾以北地区。余汉谋的十二集团军驻扎在北江地区，他的主力面对从化地区的敌军。该集团军其他部队驻扎在从化地区与翁源之间以及惠州汕头一带的东江地区。第十二集团军包括张达的六十二军、张瑞贵的六十三军以及叶肇的六十六军，总共八个师、两个独立旅，大多数官兵是广东人。

广西没有敌军，由夏威的十六集团军驻守。该集团军下辖夏威兼领的第四十六军与韦云淞的三十军，总共六个师，都是广西部队，其中一部分在淞沪会战后一直由我指挥。

蔡廷锴与韦云淞并列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职。这是因为战争爆发后，蔡廷锴出山与政府合作，白崇禧帮他得到此职，其实他是一个“无兵司令”。

中央把六十四军划拨给我，是因为我同该军的前军长李汉魂有渊源。该军包含三个广东师，由陈公侠指挥。

我要求中央再多拨些部队给我。虽然陈诚不是我的顶头上司，但他很有权力，帮得到我。他把同我有历史渊源的人所指挥的部队调拨给我，诸如吴奇伟指挥的第九集团军，它包含欧震指挥的第四军与李振球指挥的六十五军，总共六个师。我自然同第四军关系亲近，然而六十五军也包含广东部队。那是余汉谋第十二集团军的一部分，余汉谋对此很不开心，但六十五军并非他的私人军队。此外，根据中央的组织表，一个集团军包含两三个军。

我将第九集团军驻扎在粤北始兴县的南雄，它需要训练与重组，留作预备队。接着，吴奇伟奉命兼任闽赣粤边区政府主席。保安司令部属下的部队驻扎在粤西南的西江流域以及海南岛。我们在四邑、珠三角东部宝安一带以及海湾地区没有驻扎正规部队或保安部队。在这些地区进驻国军太危险了，虽然敌军在那儿并未驻扎正规军，那儿实质上已经是沦陷区了。我们广东人把这类地区称作“三不管”。

广东全省保安司令由李汉魂兼任，陈诚的保定同学邹洪任副司令。保安团队的职能是维持秩序、清剿土匪等。保安团队可以在全省各地执勤。

有部分保安团队军纪不好。^① 大多数保安部队军纪不如正规部队，军纪涣散，军官素质低劣。军官们都喜欢在正规部队服务。

自卫团队由县政府组织与供养，置于省府监管之下。县长在本县兼任自卫团团团长。自卫团的主要职能是维护当地秩序——保护通讯设施、桥梁、仓库等。他们不是用来参加军事行动的，不能调离各该县份。各该保安团队的规模端赖所属县份的资源而定。

（据张发奎 1939 年 1 月 3 日日记记载）蒋先生下令，“游击队”名称只适用于沦陷区。他发出这份电报是答复我到韶关上任前的一项请示报告。那时我已经感觉，林林总总的游击部队正造成极度状态。我已经说过广东人热爱武器。日军侵占广州时，每逢有人呈报余汉谋，称自己拉起一支多人的队伍，余汉谋就任命他为这支游击队的队长，然而许多游击队是在自由地区活动而非在沦陷区作战。余汉谋深怕若不接纳他们，日本人就会利用他们作恶。

有些游击队是土匪组织的，另一些则是由自卫团队改编的，他们由广东省民政局的一个委员会规管，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伍观淇^②是当地名绅，也是李济深的同学，我们都尊敬他。他在番禺地区组织了一个自卫团。由于他的威望，很容易团结民众。后来，他与余汉谋一起撤退到粤北，余任命他为游击队司令。

有时一支游击队只有十个人，还往往是官多于兵，兵多于枪，司令就成了“无兵游击司令”。简言之，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各式人等都想攫取“游击队”的招牌，其中有些人借此保护非法鸦片贸易与聚赌、勒索民财以及种种不法行径。民众向我投诉遭受此辈欺压。于是，我决定了唯一的解决办法——只要有正规军、保安团队或自卫团队驻扎的后方地区，一律取缔游击单位。我相信这一句粤谚：“多只香炉多只鬼。”余汉谋则说，在后方撤销游击部队甚不必要，因为中央从来也没有给游击队提供过经费。

1939 年 2 月 1 日，我召集会议，向游击队的负责人们解释为什么要在自由地区解散各式游击队，并且阐明：游击队与自卫队是有区别的，就这样，后方的一些游击队解散了。另外一些游击队被改编为自卫队，被置于县长监管之下。但仍

^① 据张发奎 1939 年 1 月 21 日日记记载，驻潮安的保安部队非法扣留民用卡车。

^② 伍观淇是粤军老将，他率领广东省第二游击区四支队有 7000 人，有一次毙伤日军 200 多人的辉煌战绩。

然有人违令。

我们为战斗在沦陷区的游击队干部设立了游击训练班，还派党政人员去那儿巡视。其中有一个典型就是李福林的部下在中山县领导的游击队。人们说这是一支真正的游击队，因为他们就在敌人的鼻尖底下战斗。李福林本人在重庆。日本人曾想利用他，他假装就范，从敌人手中骗取一笔钱之后，就溜去了重庆。

我们也派人去视察与训练在“三不管”地区作战的游击队干部。其中一例是华侨赵志修领导的战斗在四邑的游击队。

游击队在广东省的抗敌中作出的贡献虽然不很大，但也有一定的成绩。例如，四邑与惠州的游击队帮助港澳人士通过封锁区去大后方。

四战区最主要的港口在汕头，它具备深水港，距离我们的后勤基地香港较近。其次是粤西南雷州半岛的广州湾（今称湛江），它具有优良的港口设备，建有公路通向钦州、北海及南宁。但是广州湾正由法国管治。法国人准许我们随意利用广州湾，与我们合作愉快。另外，在广州湾停泊的轮船比汕头少。第三是坐落在广州湾西部钦州湾合浦县的北海港。它的重要性不如广州湾，因其远离香港，陆上交通亦较困难。

在进口物资方面，我们主要依赖海上运输，陆上运输较不重要。四战区主要的国际陆上供应线是从广西龙州经过镇南关到谅山的公路。谅山是镇南关以南、中越边界对面的重镇，有铁路与公路通向河内与海防。

法国人在印度支那使用罕见的窄轨铁路，就如阎锡山在山西铺设的窄轨铁路一样，是为了排斥外人。

战前广西实际上独立于中央，桂系已开始修建通向谅山的铁路。然而广西实在太穷了，抗战爆发时才仅铺好路基。

靖西在镇南关的西北，面对着印度支那边界那边的高平。靖西地区的地形多山，没有公路，我们只好雇用挑夫运货。骡马驮了货物走下山坡时，很难保持平衡，惊险百出。

（据张发奎 1939 年 1 月 2 日日记记载）我打电报给蒋先生，要求派员到韶关指导党政军机关重组，并分割各自的权责，这是因为中央授权给我，但我办不成事。早在我去韶关之前就知道此行荆棘满途，因为余汉谋不会服从我。他向中央提议让我南下，只是因为他反对薛岳，利用我而已。

顺从我的人们只是表面上的。例如，我想调动一些不称职的师长与其他军官，但余汉谋不同意。除了四战区的部队，我不能调查属于我管辖的部队之内部事务。在赏罚方面，我没有发言权。另一个例子是，余汉谋统率的第十二集团军是唯一配置宪兵团的集团军。这个宪兵团成立于陈济棠时代，理应撤销，因为中央的组织系统表上规定宪兵团必须直属于中央。譬如，广西已经废除它的宪兵团，把它改隶中央。可余汉谋不守规矩，蒋先生允许他自把自为。

当我向蒋先生提出一个问题时，他总是要我就涉及广东省的一切事务同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与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商量。同李汉魂商量不成问题，他

本是我的部下，但牵扯到余汉谋时就不够顺遂了。

另外一件头痛的事是李汉魂与余汉谋之间的“心病”。自从他们在陈济棠手下任职起，他俩从未融洽相处过。余汉谋对李汉魂从他手里拿走六十四军使之直属中央一事，自然很不高兴。然而余汉谋不动声色，最后他失去广州的控制权。于是我处于中间人的尴尬位置。

鉴于局势危急，我请求中央派员重组党政军机构，换言之，我希望中央施压。1939年1月6日，白崇禧、陈诚、军委会委员长桂林行营政治部主任梁寒操应我的要求抵达韶关。他们要求我召集第九、第十九集团军师长以上军官以及我的四战区司令长官部高级军官开会。省主席李汉魂也出席了。在会议上决定了有关广东省党政军部门的权力划分。

我之所以要求（据1939年1月4日张发奎日记记载）余汉谋遴选中下级军官到我司令长官部的军务处任职，是因为军务处执掌人事、训练与征兵之权，我尚无合适人选。我的司令长官部大多数参谋自第二兵团时期就追随我，其中非粤籍者多于粤籍人氏。军务处由吴仲禧负责，他原先是第四军第十师军官，后调第十一、第十九路军等。大多数第四军军官追随薛岳去了，但许多十九路军军官失业了。我起用了一些十九路军的失意者。我必须把非粤籍军官从副官处调到参谋处，他们不懂广东话，故在副官处工作很困难。副官处执掌我司令长官部的资金与供应以及所有的社会事务。我必须依靠余汉谋调拨合适人选给我。

陈宝仓留任四战区参谋长，他被配备了一名副参谋长作为辅弼。大多数时间我设立副参谋长职位，那是军委会组织表上明定的职位，然而这个职位并不必要。

（据1939年2月17日日记载）蒋光鼐被任命为四战区参谋长，对此我当然欢迎，因为他是广东人，还因为他比较亲近余汉谋，可以充当我与余之间的联络官。我准备让过去的事永远过去。我准备忘记1927年他离开我以及1930年欺诈骗我的那些往事。我之所以请求白崇禧规劝蒋光鼐到任，是因为我担忧基于他的经历——曾任福建绥靖公署主任与福建省主席，可能不肯屈就我的参谋长。作为一个高级将领，我必须对此事“宽宏大量”。

蒋光鼐到任了，陈宝仓退居副参谋长。陈不在乎降职，他是河北佬，既不懂广东话又同余汉谋没有渊源，所以自知不能胜任。

中央的组织表上规定设立秘书长一职。长官部秘书长由中央委派，是文官但待遇同中将衔。长官部秘书长丘誉是陈诚的人，是个文官。我任用的人都是由正当管道升迁的，丘誉有一批秘书、书记协助工作，秘书中许多人是中山大学毕业生，有些是岭南大学毕业生，还有些是华侨。秘书处由秘书长主导下，掌管文件与通讯，以及为我草拟演讲稿等等。

中央的组织表也规定聘用一批人从事电讯与密码工作。我设立了一个机要处负责这些工作，指定华岳高负责。机要处受秘书长与参谋长双重领导。

另外，中央的组织表上也规定司令长官部配置一些高级参谋。我任命高参中的高若愚——湖北人，保定六期，我的武昌军官预备学校同学——担任我的随从

副官长，此职按规定要由中将衔的高参出任，^①还要配备两三名少将高参为副手。随从副官协助我工作，为我逐条研究文件等等；随从参谋也由参谋长管辖。

我任命几名总参议作为我个人的顾问。在中央的组织表上并无此职位，我任命这些人是为了让他们有点事可做——“有饭大家吃”的意思。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些人上报中央。有时他们只挂个名，有时我派他们去做联络工作，或者派他们下去巡视。他们也由参谋长统率，不过他们事实上没有很多事要做。他们都是谦谦君子。这些人都挂中将或少将衔，倘若是文官，都享有同中将、同少将的待遇。^②他们的饷银由司令长官部的经理处发放。

我任命翁照垣为司令长官部总参议，抗战期间白崇禧提携他，白崇禧安插这一类人是怕他们生计无着时会被敌人利用。然而白知道蒋先生不会加恩于翁照垣。【蒋先生对翁不怎么好。】白崇禧本人在桂林行营已经安插了好多人，包括许崇智的旧部陈道行。^③【他对蒋先生处置许崇智的方式十分光火，】所以白崇禧要我安置翁照垣。于是我任命他为总参议，他只是挂个名，上班与否，悉听尊便。

司令长官部及其直属单位人员超编严重，光是长官部便超编一百多人。^④各单位超编人数各异，他们的军饷由经理处按照军饷总数摊付。

四战区政治部工作人员是由军委会政治部派遣的。我从未安排人员到政治部，那是一个附属单位，它由军委会政治部供养。四战区秘书长丘誉兼任政治部主任。四战区政治部有部分文官是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生，其他是中山大学毕业生。著名画家刘大步负责美术宣传。

中统局与军统局在四战区政治部安插了不少特派员，我猜军统局人数比中统局多。

我同长官部与政治部人员一次又一次作个别谈话。我同一名士兵谈话三分钟就大致可估量到他的情况。有些人当然不讲真心话，只求明哲保身。但也有些人对四战区或他们自己的环境等各方面作出大胆批评。

1939年1月4日，战地工作队解散了，其成员调拨到机要部门和其他机关，因为他们不懂粤语。军委会政治部派遣第五戏剧宣传队到四战区。该队由政治部供养与管理，为军民演出戏剧与提供文娱活动，多数时间在前线演出。

第四战区也设立了兵站总监部。我确认原来在武汉会战时负责第二兵团经理部的萧文不适合担任此职，故呈请中央将他调任高参，另推荐总参议冯次淇出任

① 高若愚 1942 年 1 月才授少将衔。

② 总参议大多数是军人，参事则多数是文官，都享有中将待遇。而参议一职，无论军职、文职都是少将待遇。

③ 陈道行（1900—1986），广东兴宁人。广东宪兵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期工兵科、法国陆军大学毕业，曾任第四集团军高参、三战区工兵指挥官、军委会参议。1946年7月授中将军衔，退役后移居美国。

④ 据张发奎日记所载，在四战区司令长官部与其直属单位共有 300 多军官，司令长官部及其直属单位的官、兵、挑夫总计有 2000 人。

四战区兵站总监，副总监周钰做了许多实质工作。

四战区设立了军法署，由我的老师李章逵^①出掌。他由几位受过法律训练的文官辅助。他们担负审讯工作，把裁决呈交李章逵批核。军法署审理各种违反军纪的案件。李章逵把裁决呈递给我，倘若犯案者是个士兵、士官或连级军官，我拥有最后决断权；倘若犯案者是校级军官，我加注自己的意见后呈报中央。我对法律的解释与军法署的解释有时不同，我作为战区司令长官，自然执法严峻一些，军法署通常判得较轻，释法也较宽大。设若犯案的是高级将领，我们向中央请示。对于重大案件的处理，我们也向中央请示，例如临阵脱逃。有时中央指示我们自行处理，有时会命令我们将案移交给它审理。军法署也会在参谋处提讯后审判汉奸案件。

两位苏联顾问从撤退湖南直至抵达韶关，一直陪伴我，另有几位苏联顾问来到我的长官部。其中一位是炮兵顾问，还有一位无线电报务员。俄顾问总数未超过十名。^②

此时苏联顾问同我们分开住，但我们仍负责他们的供应。我们为他们寻找房屋，给他们提供食物。他们多数吃中国餐。我派了一名副官与一个厨子去照顾他们。

来到我部队的苏联顾问并不是隶属于四战区，我出巡集团军或军的司令部时，从未见过任何俄国人。

1939年2月，海南岛失守。主要原因是驻军不足，还不是正规军，是保安团。海南岛失守的重要后果是粤西南，包括广州湾与北海市面临压力。可是，我感到敌人的主要动机是向美英法等国展示实力。^③

1939年4月至8月间，国军发动四次攻势的攻击目标是有限的，旨在与敌军接触，用小部队牵制敌军。虽然我们当时未打算夺回广州，但也不希望敌人小看我们。

6月23日，汕头失守。主要原因同样也因为在东江地区守军太少，我们没料到敌人会如此迅速进攻我们。在汕头陷落前，我到过汕头，它的陷落是我们的重大挫折。

汪精卫在河内时，并没有企图劝说我支持他，他没有接触我。蒋先生派谷正鼎与谷正纲赴河内规劝汪精卫回重庆。我认为，指望汪回来是枉然的，但我猜忖他会出国。一遇不顺心的事就出走法国，是汪精卫的习惯。

我听很多人说，1939年3月21日在河内发生的暗杀曾仲鸣案是军统局策谋

① 李章逵（1890—1953），广东东莞人。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曾任孙中山警卫团团长、大元帅府参军。1933年参加闽变，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中央委员兼政治保安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广州市副市长等。

② 张发奎日记中提及姓名的俄顾问有：奇柔夫、古西夫、伊萨也夫与加夫利洛夫。

③ 1939年3、4月，中国政府提议与法国政府合作，采取措施防卫印度支那。这一提议交付法国外交部与殖民地部后，被法国政府拒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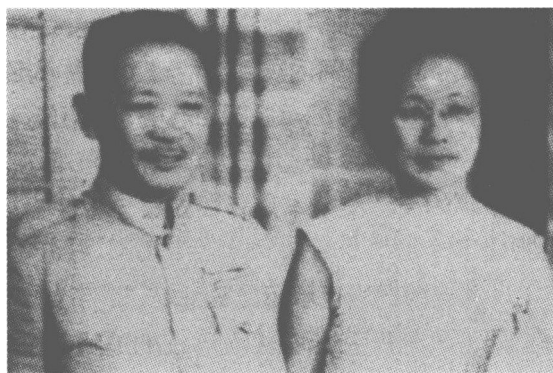
的。汪精卫本是谋杀对象，曾仲鸣被误杀了。暗杀曾的特工接着也被杀了。^①

【甚至国民党也承认此案是军统局所为，我相信，没有蒋先生的批准，军统局不敢派杀手赴河内。】汪的追随者告诉我，如果没有这宗谋杀案，汪精卫是不会投敌叛国的。他也许会出国。在如此压力之下，他根本无路可走。

暗杀案发生后，汪精卫离开河内。他到香港后，顾孟余试图劝汪出国。顾孟余是汪精卫集团的最重要成员，是汪的决策智囊，虽然他拒绝加入改组派。顾孟余赴港游说失败，便去了重庆主掌中央政治会议，^②他要表示他的政治立场，同汪精卫划清界限。

顾孟余没有让感情蒙蔽理智，然而陈公博就是这样追随汪精卫成了汉奸。我本人也是理智压倒感情。置个人仇恨于国家利益之上是错误的。很明显，汪精卫对蒋的仇恨，甚至更重要的——他妻子对蒋先生的仇恨（陈璧君始终怀疑蒋介石是1935年刺汪案的主谋），已经放在民族大义之上了。

1939年夏，汪精卫访问广州时，没有同我潜伏敌后的代表会面。我也没有秘密会晤汪夫人陈璧君。自从我在重庆与汪精卫午餐后，再也未同他接触过，他也未派人来探望我。我不知他曾否写信给我，总之，我再也未收到他任何来信。我认为，他不写信给我是因为最后一次会晤时，我表达了非常坚定的抗日态度。我同样没有与陈公博或任何汪精卫的追随者作任何接触，几年后，朱朴告诉我，那一段时间他曾打算在香港拜访我的妻子——她常常访港。我在英国初晤朱朴时，他还是个留学生。他回国后，在闽赣浙皖边区是我的秘书之一。考虑到追随汪精卫对这位年轻人更合适，我就把他介绍给了汪。朱朴解释道，他要求我妻子打电报给我，请我指点迷津：究竟他应该离开汪精卫投奔大后方抑或留下为汪服务？我的妻子能够使用密码与我通讯，但她拒绝会见朱朴。朱又想拜访第四战区



张发奎与妻子刘景容

兵站总监冯次淇的妻子，她也因朱朴与汪精卫的关系而拒绝见他。朱朴两处碰壁，陷入不知所措的迷惘。最后他选择了追随汪。在他妻子病故后，他娶了伪南京维新政府行政院院长梁鸿志的女儿。

1939年8月13日，我向广东民众发表广播演说，谴责汪精卫叛国投敌。8月16日，余汉谋与我率领四战区党政军各界签署通

^① 此处张发奎叙述有误，策划该案的是军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率领的“十八罗汉”，在现场开三枪打死曾仲鸣的是戴笠贴身警卫王鲁翹。事后陈恭澍晋升军统第三处处长。王鲁翹赴台后官至台北市警察局局长，1985年9月2日在台湾省警务处副处长任上死于车祸。

^② 此处张发奎记忆有误，顾孟余早在1936年出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而继罗家伦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是汪精卫叛逃两年零七个月之后的1941年7月。

电谴责汪精卫，电文是梁寒操起草的。^①

我确曾与汪精卫很亲近。在此之前，我确认汪精卫值得崇拜，因为他的学识、品性以及辉煌的革命历史。我认为他叛国投敌，主要是他妻子的影响。【另一原因是蒋先生对他过分施压。作为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只拥有名义上的权力，但蒋先生仍然不让他保持这一虚位。蒋先生只允许他担任国民党副总裁，而这一职位有名无实。】汪精卫出走的后果是：许多汪的追随者失业失势，咸感到汪精卫受了委屈。

【我也对蒋先生不满，因为他自私与独裁。】在汪精卫离开重庆之前，他甚至没说过任何反对蒋先生的话。我们感到，由于蒋先生坚持抗战到底，我们唯一的前途是紧跟着他。虽然他的偏见对我们不利，但我们对他毫不置疑。我所提的“我们”指的是哪些人？是薛岳等人——我们这些不能指挥蒋先生亲信部队的将领，【我不必提及该等中央嫡系部队的番号。】

【我敢毫无疑问地说，薛岳、余汉谋、白崇禧与我不是反蒋人士。为什么确认这一点呢？因我们寄信心与希望于蒋先生。我们不顾忌蒋先生的各种缺失，仍然不转向反对他，是因为他坚决抗日。薛岳对蒋先生的忠诚更甚于我。在那段时期，薛岳向我出示他的日记内文，说在抗战期间我们必须全心全意拥护蒋先生。他为何向我出示个人日记？因为那时流传了很多谣言，薛岳并不了解我的态度。】

【我根本不相信蒋先生会怀疑薛岳。许多人不知道薛岳与陈诚的关系，这种亲密关系使蒋先生充分信任薛岳。我可以这样说，陈诚与薛岳的关系比陈诚与我的关系更为亲密。】

1938年11月，薛岳被任命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1939年4月兼任湖南省主席。1940年7月，陈诚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事实上没有理由在鄂西设置第六战区，那儿并无战事。鉴于老关系，陈诚让黄琪翔任副司令长官，他继续起用许多邓演达的追随者，例如严重被任命为湖北省政府民政厅厅长。

我到韶关不久，陈诚要我给他刚出山的保定八期同学郭思演安排一份职务。郭原任虎门要塞司令，日军逼近广州时，他临阵退缩，最高当局要逮捕郭。我拒绝了陈诚的请托，尤其因为当时我尚未正式接管四战区，所以无权给郭洗脱罪名。最终，陈诚亲自安顿郭思演，让他在六战区服务。陈诚有时做事不很公平，我举另一个例子：他要我代表李芳郴向蒋先生求情，盼望我要求蒋先生宽恕李芳郴。我拒绝了。毕竟李芳郴是违反军令临阵退缩的罪人。

作为战区司令长官，我同蒋先生保持着直接联络。在淞沪会战时，我隶属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武汉会战时，我隶属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当我想同蒋先生交谈时，通常是先打电话给军委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张治中，才能直接同蒋接通。

在桂林，我常去看望李济深。他常常表达对蒋先生的不满，对蒋扣押他于南

^① 为了嘉奖张发奎，蒋介石特颁发奖金20万元，梁寒操5万元。

京汤山一事念念不忘，认此为“一箭之仇”。然此一箭并不严重，更未致命。对于有些人来说，殊不必要报此仇，然而李济深报复心很强。照理说，抗战高于一切，可是他置个人仇恨高于一切。他憎恨蒋先生，时刻盘算反蒋，心里想：“我忠于你，你却扣押我！”

从这件事看，我认为广西人很少能够得上“伟大”——李宗仁在这方面可算是不寻常的了。李济深能留在桂林是由于桂系领袖尊敬他。他住在属于李宗仁的一座房屋，正对着李宗仁的居室。可是我怀疑，桂系会否听他的话。国难应该重于一切私怨的。

桂林行营成立于1938年12月，其职能是节制第三、第四、第九战区。设立桂林行营原因是军委会从重庆对华东、东南三个战区实施指挥相当困难。我觉得无此必要。粤谚有云：“多只香炉多只鬼。”

我向桂林行营呈交报告，但不必咨询它或请示它批准什么。在人事问题与军事行动方面我接受它的指导，而非指挥。事实上，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很少指导我们。白同他的故乡桂林感情很深，他是“老马识途”。

李宗仁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桂系的三个巨头，只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留在本省。桂系成员在桂林行营服务的没有位高的，当然，在中低级职位上不少。

林蔚是桂林行营参谋长，他是蒋先生的亲信，吴石是参谋处处长，梁寒操任政治部主任，后二者也是中央的人。梁寒操是个文人，是孙科的追随者。他外号叫“高要（籍贯）能人”，虽只是个师范毕业生，但既聪敏又博学。

白崇禧必须遵循与传达中央的命令，可以说他并无实权，只是代表中央，但他负有对广西省政的指导责任。一般认为桂林行营是在指导而非指挥军队，但是由于白的背景（军委会副总参谋长）与地位，他能够指挥夏威的第十六集团军。

我有权指挥两广的省政府与省党部，可是我的权力范围是不固定的。事实上我对地方上的党政事务不大过问，由四战区政治部同党政部门维持联络。

广东省政府设在韶关，李汉魂兼任广东省党部主委，CC系的余森文任省党部执委会委员兼书记长，CC系掌控了广东省党部。高信、^①孙甄陶可能也是CC系分子。其他执委中，丘誉和邹洪是陈诚的人，黄麟书是陈济棠的人，伍智梅是孙科的人。^②

我不介意CC系控制省党部。我的困扰是余汉谋掌握军权，不听我的话。我同CC系驻粤首长的关系良好，因为我同陈氏兄弟相处融洽。每次我去首都，都

^① 高信（1905—1993），广东新会人，留学德国柏林大学与弗莱堡大学，专攻土地经济学。1936年由陈果夫引荐出任广东省政府地政局长，后历任省府秘书长、广州市党部主委、阎锡山内阁内政部长。赴台后历任台当局“教育部”次长、侨委会委员长、国民党中央委员等，著有《华侨革命史》、《八十自选集》等。

^② 据张发奎日记1939年4月1日以后记载，省党部执委会由李汉魂兼主任，其他执委有：余汉谋、姚伯龙、缪培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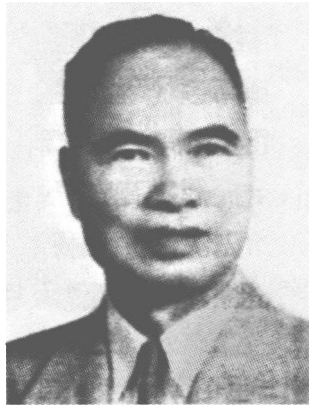
拜访陈果夫、陈立夫兄弟。

CC系对广东省政府的影响有多大？李汉魂应付得很巧妙，他起用不同派系推荐的人，也包括CC系。省府委员是中央委派的，但也咨询李汉魂的意见。李汉魂推荐CC系的重要成员曾养甫担任省府委员，曾在广州失守前曾担任广州市长。他做广东省府委员只是挂名的，那时他住在重庆，在行政院任职（滇缅公路督办、交通部部长等）。我和曾是好朋友，他是东江地区的客家人。

顾翊群是省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他是中央的人。吴飞是薛岳的人，其余省府委员^①都是李汉魂的人。吴铁城任广东省主席时，他尊重军人。于是余汉谋的人马被任命为县长与专员。李汉魂接掌省政后，撤换了许多县长，每个省府委员都可以推荐县长人选，然而，省府委员认可的都需要加委，通常李汉魂推荐的人选都会被接纳。至于专员是由中央委任的，李汉魂可以作出推荐。他上任后对专员职位变更不多。不少事情他会同我商量，我常常向他坦诚表达己见。

李汉魂委任我的三弟嘉斌出任汕头警察局局长。后来汕头沦陷，嘉斌失业，李汉魂任命他为罗定县县长。在这段时间，嘉斌同法籍妻子离婚。我妻子收养了他们的孩子——男孩名威立，女孩名丽芳。

1939年5月成立的广东省临时省议会省政府只是装点门面，有名无实。省政府仅在不重要事项上倾听省议会的意见。陈济棠的“文胆”林翼中担任议长。^②



林翼中

余汉谋1936年7月就任此职兼第四路军总司令，抗战爆发后改兼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他任省绥靖主任，负责地方安全重任，故其权势甚于省政府主席。事实上，这个职务是不必要设置的。在中国人的政治中，人事考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广西省政府设在桂林，省主席黄旭初兼任省党部主委。掌控广西国民党机关的肯定不是CC系。没人能渗透广西省，广西人充塞了国民党机关。李任仁^③是广西省参议会议长，前所述的广东省临时参议会的情形也适用于广西省参议会。李宗仁兼任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任副主任。战前的广西闹独立，反对中央，它保留原有的行政系统，不许外界干涉，即便中央，既不能也不会太多过问广西的事，遑论一个战区司令长官！

1939年6月3日，由四战区司令长官部与政治部联合组建的四战区特别党

① 其余省府委员是：胡铭藻，兼任省府秘书长；何彤，兼任民政厅厅长；朱晖日以及林友松。省主席李汉魂兼任建设厅厅长。

② 此处张发奎回忆有误，林翼中出任广东省临时参议会第二届议长是1943年7月的事。

③ 李任仁（1886—1968），广西临桂人。1911年加入同盟会。1931年任广西教育厅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政治委员会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军委委员会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等。

部，它直属于中央党部组织部的军队党务处，省党部与地方党部不能干预。

我是特别党部的特派员，这是中央党部指定的，这一职位高于省党部主委。政治部负责特别党部的工作，政治部工作人员兼任特别党部的职位，特别党部的负责人来自政治部。我们军人事实上只挂个名字。

特别党部成立时，司令长官部及其直属单位的军官只有五分之一以下是国民党党员，特别党部成立后，部队中，从司令官到伙夫兵，包括外党党员，都必须加入国民党，这就是国民党的特色。荒谬的是，人们都知道有些人明显是共产党员，但是即使他只是军内的一个低级司书，他也隶属于国民党。

国民党的组织太松弛，这是不合理的，毕竟它没有必要让全体官兵加入。其唯一后果是造成混乱。例如，孙宝刚^①本是国家社会党党员，我任命他为高参。现在他必须加入国民党，所以事实上他跨越两个党。

扪心自问，要求军内人人都加入国民党是谬误的。这样做也是无效的，因为士兵们毕竟对三民主义一无所知。了解三民主义的真谛应该是加入国民党的先决条件。我怀疑有没有五分之一人能解释三民主义，甚至有些团长也是瞎查查。然而，共产党的组织完全不同。申请加入中共者，需要经历一段候补期，或者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同样所有的政府机关都要配置国民党党员，想进政府任职就必须加入国民党。例如，张嘉璈被任命为（行政院铁道部）部长，先要加入国民党。

在国民党的体制下，省政府主席的夫人便自动出任省妇联的主席，即使她是个文盲也不例外。在这种情形下，她甚至不必视事，自有人为她代劳，代拆代行。我的太太很少参加社会活动，我不让她抛头露面，我认为妇女必须照顾家庭。

1939年6月20日，陈诚与朱家骅委任我同李汉魂一起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广东分团部共同主任，我只是挂一个名。政治部成员负责三青团的训练与组织工作。我记得蔡劲军是三青团广东分团部筹备办公室主任。当然，蒋先生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总团长。不久广西分团也成立了。

我明白，成立三青团是为了刺激与迫使国民党去抵消CC系的势力。担任政工的黄埔毕业生通常需要加入三青团。表面上，三青团支持总干事陈诚，实际上，三青团不是陈诚的势力范围。有些三青团负责人并不支持陈诚，毕竟团里许多人不是黄埔生。

三青团在军中所做的不多，其目的是在军中树立一面旗帜，显示三青团关注

^① 孙宝刚（1909—1990），江苏金山人，东吴大学物理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曾任冯庸大学物理教员，1933年任陈济棠主办的广东军校少校战术教官，1937年后任一五四师九二二团团长沙、一九六师参谋处长、五十四军高参、军令部第二厅办公室主任参谋、四战区长官部高参、广州行轍副官处长。1949年赴香港，50年代热衷于反共反蒋之“第三势力”，由美方资助印行《民主与自由》周刊。参与筹组“民主反共建国同盟”。1956年由张发奎资助旅费赴印度出席亚洲各国社会党代表会议。晚年在香港精武体育传授八卦掌。著有《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等。

军队。三青团的重点在学校。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许多学生感到他们必须加入三青团，因国民党掌权。

在第四战区，我不清楚谁为中统局工作，也不知哪些人是中统特务，因为战区内的中统负责人不需要向我报告。中统特务的职责是考察国民党员的忠诚与否。我约莫知道军统特务是哪些人，因为每当他们派人负责战区内的活动时，他们都会通知我。这个人常常告诉我，戴笠派他来同我合作，他很有礼貌地说“敬请指导我”，但事实又非如此。每当遇到特别案件时，我会同他商谈。军统特务在军队内部工作，他们的主要职责是考察部队对领袖是否忠诚，考察部队领袖是否忠诚。

湖南人李崇诗^①在韶关负责军统工作。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归他指挥。我不能问，他也不会告诉我。戴笠的人并不属于我管，而是有他们自己的组织系统。当他们发现军内有人不可靠，他们会报告我，于是我们会下令逮捕，疑犯会转解到军统局。如果他们想逮捕一个在四战区范围内的平民，有时他们会报告我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由当地政府扣押，然后将疑犯解送军统局，这类处置我们不可置喙。

军统特务们待我很好。当他们想逮捕从香港去重庆探望道社社员孔祥熙而途经韶关的杨德昭时，他们同我商量。李崇诗告诉我杨德昭与日寇勾结，汉奸温宗尧（1938年3月出任梁鸿志的“南京维新政府”立法院院长）派一个日本人去香港送信给杨德昭。军统特务已见到这封信。我说：“我要小心。我自己也不能保证汪精卫永远不会写信给我。我和他终究是老朋友了。如果你发现一封汪精卫写给我的信——假定汪曾经寄过这封信——那么我也要被怀疑了。”我不让军统人员逮捕杨德昭。我说，倘若军统想抓他，可以在重庆抓他。李崇诗打电话给戴笠，戴说我是正确的，他还算敬重我。可是，戴笠要求我敦促杨德昭把温宗尧的信函交出来。我说那没问题。

戴笠又要求我催促缪培南与邓龙光从香港回来。邓龙光在南京突围后，去武汉呈交了一份报告，然后去了香港。至于缪培南，自广州陷落后一直滞留香港。戴笠知道他俩常常在杨德昭家里打麻将。

我必须转述戴笠的要求，杨德昭交出了温宗尧的信。到重庆后，他被任命为行政院参事。我必须承认，我钦佩军统局的本事，他们竟然有办法暗中窥见了那封信。

有时候，军统抓了人才告诉我，有时甚至自始至终不告诉我。我想起一个关于李新俊率领的视察组的事件。他们是黄旭初派到韶关来的，李新俊与他的哥哥在战前就已加入军统局。为了某些原因，军统杀了李新俊的哥哥。李新俊勃然大

^① 李崇诗（1904—1996），湖南平江人，黄埔六期步科。抗战后历任军统局香港站副站长、滇缅国防公路警务处处长、财政部广东缉私处处长、中美合作所参谋长、广州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谋长。1946年起任军统局上海站站长、国防部二厅办公室主任。1949年初任广州警备司令部稽察处少将处长。赴台后任台当局第五、第六次“国大”主席团主席、“国家安全局”顾问。1980年退休。

怒，去了广西。白崇禧对他十分器重。当李新俊访问韶关后，返回广西途中，在湖南被逮捕了。广西当局自然要向我查问。我发觉是军统抓了他但不承认此事。我告诉戴笠，李新俊若在广西出什么事，我绝不介怀，但他来韶关视察的旅途中出了事，我就要负责。如果他不获自由，我将直接向蒋先生申诉。戴笠立即释放了李。这就是我敬重戴笠的原因，因为他是个讲道理的人。

李新俊是梅县客家人。在军统局服务的粤籍人士，不是梅县客家人就是海南岛人。例如军统重要负责人郑介民就是海南人。

我知道，军统局贵州息烽训练班的毕业生都加入军统。它很重视中央军校的毕业生，每一期毕业生都有一批被送去息烽训练班。他们未必都是优秀学生，因为些人不肯去做这类工作，而当特务是自愿的。息烽的毕业生可以晋升上尉，然而军校毕业生只能叙少尉衔，至多是个中尉。这就是为什么当李崇诗给我上尉衔的军校毕业生时我就知道他们都是军统特务。但是，我们不能问他们。

在四战区，息烽毕业生还成不了气候。我不可以拒绝接收他们，因为他们是奉中央的命令来的。我通常安排他们当副官或参谋，尤其是到参谋部情报处任参谋，我不让他们指挥军队。一位师长要求我委派他的儿子到特种部队当连长。我说：“不，你的儿子已经受过特务训练了。”

有时，息烽训练班的毕业生协助我的司令长官部情报训练班培训各级军官。他们受过特种训练，在情报工作中的职位高于我们的情报官。他们也在集团军、军、师的各级司令部充任参谋，尤其是情报参谋。

除了息烽训练的军官，我不能辨认哪些军官是军统局派来渗入我们的机关的。每当我询问李崇诗，某人是否特务时，他有时也会回答是或否。

我同军统特务相处和睦，因为我同戴笠私交甚笃。他们视我为前辈，对我极为敬重，会将活动通知我，当然，他们不告诉我详细情况。但我从没有感觉他们在监视我。

我同军统打交道基本上没问题，有时当我认为某些事情不太妥当时，会向他们直言。例如，有一次在韶关抓到三辆走私鸦片的卡车，我拒绝服从中央。戴笠想以我们的私人关系来劝说我放行，我拒绝了，李崇诗来找我，我态度仍坚定不移。军统局操纵鸦片买卖，戴笠说这是政府的财源。李汉魂当然服从中央，他允许鸦片运至韶关，还命令县长们在各辖区予以保护。【最终，蒋先生亲自打电报给我，叫我放行这批鸦片，我只好服从，我不能无视蒋先生的命令。我将这批鸦片密封后运到汕头，再转运到四战区境外地区。】

军统局中军人多于文职。相反，在中统局，文官多于军人。我知道，来自中统与军统的人员，在司令长官部不同的机关任职。

鉴于所有官兵都被要求加入——许多人已经加入——国民党，军统局与中统局很难划分他们的管辖范围，这就是产生摩擦的原因，双方都捞过界。我不管这些事。军统指控某些人左倾，而中统却指控这些人右倾，发生了许多这类琐事。曾有人因叛逆案被捕，但不关我们的事。

军统比中统权力更大。蒋先生对它极为重视，戴笠拥有庞大的权力，它的组织比陈氏兄弟的中统更严格、更秘密，它较少受制于私人关系的影响。如果一名（国民）党员被认为对领袖不忠，军统局会立即逮捕他；中统局则强调忠于陈氏兄弟，他俩的态度可以总结如下：“我俩是忠于蒋先生的，蒋先生不必操心我们的追随者，只要他们忠于我俩。”中统局有没有在我的战区抓人，直接抓人抑或请示省政府后再抓人，我并不清楚。

有关公民权利——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等中央规定的这类基本人权，由省政府民政厅负责落实，四战区政治部协助民政厅执行。例如，政治部发现某一本书违犯中央的法规，它就以我的名义下令省政府停止发行或充公这本书的全部存货。实际上在韶关出版的书很少。

省党部、政治部与省政府从中央接到同样的命令。有时我召集党政军联席会议或党政联席会议。在战时，大多数的省主席兼任省党部主委，所以很少争执，多数事情是由省政府掌管的。例如，省政府报告我将要召开群众大会，我将此事交给政治部，它就派代表参加，省政府与省党部同样派代表参加。

如果民众想自行召集大会，那就不同了。民众不会自己组织会议，通常是由政治部或其他机关安排的。有时，工会会要求政治部协助他们组织庆祝大会，譬如庆祝劳动节。这需要请示政治部批准。

一开始，中央就告诉我，不允许共产党发展武装力量，中央从未减少它的反共警告。蒋先生领导抗战，同时也提防共产党。

曾生领导的“广东省第三游击区独立纵队”是我命名的。曾生是惠州客家人，中山大学毕业生，共产党员。他的部队在“三不管”地区宝安活动，其中有些人是沙头角本地人。



曾生

曾生的部队不需要我们提供财政支援，我们也管不了他们。当我们要求他们派干部来受训时，他们拒绝。虽然他们不听我们的，但要求官方认可，那就最好称他们为游击队了，我们不想给他们正规游击部队的番号。就这样，如果他们的辖区沦陷于日军，他们就必须在敌人的后方作战。另一方面，当胜利来临时，这支部队就必须解散。

曾生隶属于香翰屏（四战区挺进队东江指挥所所长）。香的第九集团军在淞沪会战中溃散后，他无事可做，所以我派他去惠州指挥所。我委派张文做他的参谋长。香翰屏对张很不满意，说他左倾亲共，要求我调走他。其后，香翰屏被中央任命为闽赣粤边区总司令，我命令他把部队转移到兴宁。

曾生独立纵队的一部分在转移去兴宁途中在平山被包围缴械，以致损失几百人枪，这是由于共产党违抗军令。可能是我下令解决该部的，如果他们违令。并非我

们不想同共产党游击队合作，而是他们常常“游而不击”。每当他们抗命或拒绝调动，他们就会被迫缴械。后来，曾生的部队加入了王作尧^①领导的游击队，他也是客家人，我不清楚王是否共产党员。也不大清楚中共在粤赣边境的活动。

冯白驹领导的“广东琼崖抗日自卫军独立纵队”则隶属于十二集团军参谋长王俊的弟弟、海南卫戍司令王毅。日军占领海南岛海岸地区后，冯白驹与王毅撤退到岛上多山的中央地区。我知道冯白驹是共产党员。

海南专员吴道南曾捕杀共产党员，他是李汉魂得到我同意派去海南的。他是海南籍人氏，原先曾在第四军服务。至于他为什么要杀共产党，原因那就说不清了。倘若共产党员抗命，这类事情便会发生。

1939年，叶剑英被任命为一个军事顾问团团团长（胡志明是团员）。他去重庆路过韶关时，我见到他。那时他可以公开行动。

蔡廷锴出任粤桂边区总司令，这是中央应我的请求任命他担任此职务的。他获授权指导边区的党政工作，但粤桂边区不大。他的职责是团结当地民众应变——应付该地区一旦沦陷后的复杂局面。他本系西江地区罗定人，就在那儿设立总部。他有一批十九路军旧部在粤桂边境地区活动，有些人组织了自卫团队，就此由他收编。实际上蔡廷锴的职位有名无实，他本人在桂林消闲。任命他当边区总司令的主意出自白崇禧，安置这个职位是因为十九路军。白崇禧要确认原十九路军的军官不会再给中央添加麻烦。

蔡廷锴的十九路军旧下属张炎（曾在闽变时担任福建人民政府军委会委员兼人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被任命为雷州半岛第七游击区保安司令。张炎与李汉魂都是粤西南高州人。李汉魂当了省主席就安排张炎出任高州地区督察专员。就像安置蔡廷锴一样，中央害怕张炎制造麻烦，中央利用他们，他们也利用中央。张炎像蔡廷锴一样，他不留在雷州半岛，而在柳州消闲。我认为张炎的妻子郑坤廉是共产党员，因为张炎是行伍出身，其妻却是中山大学毕业生，夫妻两人的教育程度相差太大。

那时军级单位定期向我呈报实有人数，他们呈报给我的数字同呈报军政部的数字相同，但我知道他们的确实人数。

军政部定期派遣点验委员^②到四战区清查人数。有一次我对一位少将点验委员说：到第四战区来清查点名是不必要的，我的下属部队都是缺额，我们都申

① 王作尧（1913—1990），广东东莞人。1936年加入中共。抗战时任东莞游击大队大队长、东江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广东省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61年授解放军少将军衔。

② 军政部点验委员会于1942年秋在重庆成立，由何应钦兼主任，钱大钧兼副主任，委员15人，均少、中将衔。辖4个直属组，担任点验川康黔滇四省部队。每战区设一分会，组长、分会主任由委员兼，组织和分会各组组长均以上校、少将衔充任。共有官兵300余人。据第一组中将组长、第三分会中将主任方墩回忆，所谓点验只是一个形式。各个组员的收入超过了薪俸好多倍，例如1943年川康绥署（邓锡侯）送组员每人3000元节仪，组长5000元。据方墩承认，自1942年9月至1943年6月，共得到贿款10万元，故此点验只具虚名，无补实际，反而增加大量点验费用，使各部队弄虚作假合法化。但也有如李良荣八十师不行贿、不受勒索、不理点验组那一套的情形。

报满额并且收到足额的军饷。然而多余的军饷并未落入我个人腰包，是存进四战区后勤部的账户。我告诉他，应该把我说的话呈报中央。他接受我的说辞，我邀他一起进餐，向上呈报毫无问题。

这一阶段的军官素质同武汉会战时期相比，没有明显的差异。四战区对军级单位实施他们自己的训练计划。司令长官部在南雄县修仁设立了四战区干训团，它提供两周的训练课程，重点在于政治训练。

蒋先生兼任干训团团长的，就如他兼任四战区司令长官一样，我只是副职。在每一个战区都是这样安排。除了我，李汉魂任教务长，余汉谋很少光临。政治部派人来实施政训，苏联顾问也帮助我们。

中央还派了两个炮兵营来，由一位炮兵团团长指挥。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协助干训团的工作。

我在韶关办了四期干训团。（据张发奎日记记载，干训团于1939年5月17日开办，第一期受训干部有726名）。送第一期干训团的大多数是中层干部：县党中负责人、县系与高级文官、营长与高级军官，其中军人较多。有时组织特种军事训练班轮训班长。在毕业前，我曾个别会见干训团各班的成员。我着重广东省的干部，因我发觉广西气氛不大好，就没有要求广西派干部来受训，我觉得不必要。广西有桂林行营，另外，广西省政府实施它自己的训练计划。还有一个面子问题，我担心，如果我邀请广西派干部来，它会拒绝邀请。

情报工作的基本原则是让不同机关的情报人员完全隔离与互相独立，这是取得准确情报的唯一方法。然而，军统局有时也向我提供有关四战区敌情的报告。

长官部的情报作业与省党部、省政府的情报作业之间有时会互相配合，中央与地方的党部与政府都会向我提供四战区内共产党渗透的情报并要我警惕，最高统帅部向我通报重要的国际时事。

坦白讲，中国情报工作是十分差劲的。我讲个笑话：有一次我派遣情报人员去前线的前沿阵地，既没知会第十二集团军、广东省政府，也没有报备军统局与中统局。结果是，所有这些部门也派特工去同一地区，同样不知会我。不知如何，所有特务都在当地聚会了。由于他们都需要向上级报料，于是编造了有关敌



何东

军在三水地区的情报。当然，他们的报告并非完全一字不差。鉴于长官部从不同管道得到相同的敌情报告，我们以为情报一定是精确的。我们的作战参谋拟订了包围敌军的计划。然而，我们发现该地区根本没有敌踪。我们开展调查，才找出真相。

我要求何世礼^①在香港同英国官方与情报部门联络，特别是了解英国人对我们抗战所持的态度。当然，我不是公开派遣他去的。何世礼是香港本地人，他完全胜任这项工作。他的父亲罗伯特·何东^②爵士现在还健在。李克成也参与了我们在香港的情报工作。

征募新兵方面，征兵法只是在战时实施。省政府负责征募 18 至 25 岁的壮丁来填补正规军与保安团队的缺额。省主席李汉魂兼任军管区司令，以下还有中央指派的师管区司令与团管区司令，后者由行政督察专员兼任，前者负责组织工作，其成员由中央委派。但李汉魂与行政督察专员都不负责任何特别组训练工作。

军级单位直接告诉中央，需要多少新兵。中央遂发布命令给军管区司令李汉魂，他转发给兼任团管区司令的行政专员依次将命令下达保甲长，征募一定数量的新兵，然后将他们送到师管区。师管区司令把新兵组织成若干个连，指挥军官去作时间不同的新兵训练。依据中央的命令，这些军官把一定数量的新兵移交给军级单位。比较健康的新兵就成为战斗兵。中央通常把广东新兵派发给含有广东部队的军级单位。至于那个军是否驻扎在广东则无关紧要。例如，如果六十四军驻扎在湖南，广东新兵就会被送去六十四军驻地补充行列。这样做很有必要，因不同的省份有不同的方言、习俗要适应。

无论何时，倘若需要，上述办法也适合于征募较年长的士兵，如 25 至 30 岁者去补充运输部队，有时它被称为“铁肩军”。有时候，规矩会被打乱，例如，较年长的士兵倘若体魄健康，便会被送去战斗部队充数。

① 何世礼（1906—1998），19 岁考入英国胡烈芝皇家军事学院，毕业后继入英国勒希尔炮兵学校，后赴法国方丁布鲁炮兵专门学校深造。1920 年返国后，历任东北边防长官张学良侍从参谋、炮兵连、营长等。抗战时间投效三战区，在河南兰封一役亲赴第一线指挥炮兵摧毁日寇炮兵阵地。1939 年 3 月，受第四、第九战区任务为驻港联合办事处主任，负责搜集日本海军情报与联络港英当局。1944 年奉调后勤部中将副司令，负责与其在美国参谋大学（1934 级）的同学魏德迈将军总部联络协调，使美援物资得以顺利接收，因而荣获美国银叶勋章。1946 年底擢升联勤总部中将副总司令，1949 年任联勤代总司令，翌年由台当局防务部门常务次长调任驻日代表团团长。1952 年接任台当局驻联合国军事参谋代表团首席代表。1959 年晋升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1962 年辞军职回港继承遗产。1998 年 6 月东北大学成立 70 周年校庆，捐赠 50 万美金建筑校舍，命名世礼教学楼，并偕子女亲往参加庆典及新楼剪彩仪式。1998 年 7 月 26 日晨，无疾而终，享年 92 岁。

② 何东（1862—1956），广东宝安人，皇仁书院毕业，经营地产成为香港巨富。历任香港多间大机构董事局主席。1899 年被港英当局委任为太平绅士。1915、1955 年分别获英皇乔治五世与女皇伊丽莎白封赠爵士勋衔。中华民国成立后，他先后获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总统颁予各种荣誉奖章。1919 年获香港大学颁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23 年，在中国陷于军阀割据期间，曾斡旋于吴佩孚等人之间，建议召开圆桌会议，为统一中国作出努力。抗战期间，多次以巨款支援抗日军费。一生获多国政府颁授勋章。何东于 1956 年逝世。张发奎口述这本自传在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当时何东已去世，此处系记忆有误。

兵役部门为保安部队征募新兵的方法很简单，保安部队直接呈报它的司令李汉魂，需要多少新兵。李汉魂就下令行政专员兼团管区司令，通知征兵数字。师管区司令不必插手。当然，保安部队赶在正规部队之先，就能完成征兵任务。至于新兵本身，自然较愿意进入保安部队。一则，他能留在广东，二则他不必去打仗。

政府的征兵规定从来没有完全实施过。富人付钱给穷人让后者替代服兵役，当局对此毫不介意，只要有人愿意当兵充数。按规定独生子可以免服兵役，但这条规定常常被忽略。所有的省份都发生过强迫征兵的例子。我自己亲眼见过压迫虐待新兵的悲剧。遇到这些不正常的事，我就会命令李汉魂作出纠正，他终究是尊重我的意见的。例如，我曾下令不准用绳索把新兵拴在一起。

在抗战时期，开小差现象比以前好一点。抗战时逃兵较少，是因为逃兵不敢回到他们的故乡。否则，他们会被保甲长抓起来送回部队，然而他们当然可以去其他地方。

当一名逃兵加入另一支部队后，他原来部队的军长无权去逮捕他。不过，另一支部队不会纵容逃兵加入。开小差的事常常发生在行军途中。如果是临阵脱逃或者携枪逃亡，那就要枪决。倘若情节比上述两种轻微，逃兵会被遣送回原部队，他会被禁闭。唯有他的原部队才能断定他逃跑罪名是否成立。那时的军纪比起往昔第四军的军纪差得多了。

那些可怜的文盲士兵是没机会晋升的，很少有机会成为军官，因为政府已开始选派军官到军事院校受训，大多数中层干部成了军校学员。当然，特别勇敢的士兵仍然可以颖脱而出，^① 在这类情况，升任军官前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但是这种例子很罕见。

另外还有一个感情的因素。在募兵制度下，兄弟、堂表兄弟或亲戚一起去参军，他们会被编在同一个单位；在征兵制度下，他们往往要分开。这就增加了逃跑的欲望。

如果军队驻扎在士兵的原籍省份，开小差的会多一点，这往往发生在打败仗的时刻。打了败仗之后，逃兵问题通常会显著一点。^②

这一阶段我们的武器与医药供应同武汉会战时期相比差不多。可是，在汕头失守之后，我们的医药补给更困难了。因为我军使用进口的西药，所以医疗情况进一步恶化了。^③

① 据军委会军政部统计，抗战爆发时，国民党军中下级军官（上校至少尉）共13.4万人，其中旧式陆军中学堂和小堂出身的约3万人，保定、黄埔及各兵种军校出身的约6万人，入伍出身4万余人。战时伤亡严重，中下级军官每年须补充4.5万人，其中3/4由各种军校及速成训练班培训，其余从士兵提升。因为伤亡过大、过快，1943年时，部队中正式军校出身者仅3758人，其余均为非正式军校（包括速成训练班）及入伍出身的军官。据统计，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中央军校与各分校毕业学生共15万多人，另各种速成训练班训练了97577人，从士兵中提升了84235人。

② 据统计，八年抗战共抽壮丁1400多万人，实际送到部队1200万人，其中90%以上是文盲。

③ 据1939年11月4日张发奎日记，伤病士兵得不到适当照顾，有些人看来像乞丐。

我们战区得到两门105毫米重炮以及其他武器，还有车辆，但所有这些装备是中央调拨的两个炮兵营带来的。

中央是这样补给我的部队的。四战区重庆办事处是赵志尧^①负责的，他还兼任第九、第六战区驻渝办事处主任。他报告军需署署长陈良^②四战区长官部与属下部队的需求数量。军需署便会给赵一张中央发放之供应品清单。赵再将此单交给后方勤务部次长俞飞鹏，然后由俞把供应品运交四战区兵站总监。多数是用卡车运送，有时用火车。

战区附属单位与军级单位都在重庆设立他们自己的后方办事处，直接领取军饷与供应品。我不需要掌管他们的财务、军需或人事，我只须指挥他们作战以及督导他们的训练，他们的供应品也是送抵四战区兵站。四战区兵站分配所有的供应品——弹药、医疗与通讯器材等——到我的长官部、作战部队、附属单位以及军级单位。运送方式视当地情况而定，运输兵部队是由兵站、长官部与军级单位组织的。有时使用机动车辆运送。

军队每天食用的口粮，由中央付钱给四战区兵站，兵站再通过当地政府购买大米。战区兵站透过各级兵站将大米分发给长官部及军级单位。军米如果有剩余，军级单位可以出售。

军级单位可以直接购买食米，当四战区兵站不能分配大米到军级单位时。例如，当部队在行军时，在这种情形下，战区兵站会付钱给军级单位。食米由连级单位出面采购，买米剩下的钱可以用来购买副食。部队长不会中饱私囊，部队长捞钱是透过“吃空额”，而不是伙食尾子。

有时候，军纪差的部队会以自己订定的价格强制性买米，有许多军民冲突是因为买米而引起的。此后，只要可能，我们尽量避免让基层单位直接买米。当然，军级单位更愿意收现金代替供米，因为出售剩米有损于军队的形象。副食品常常是由军级单位在当地采购的，但有时兵站会向部队分派卤鱼等副食品。

中央怎样把军饷发下去供长官部及下辖部队使用呢？赵志尧从军需署领出军饷，通过银行汇到战区。司令长官部经理处处长收到的汇票是署他与我两人的姓名。经理处遂将军饷分发到战区内的部队。长官部的军饷是交付副官处的。只要军饷有结余，余款就会由经理处保存在一项专款中。这项专款并非信托给一个委员会，经理处处长签收这笔余款后，交付处理的职员保管。所有的账目都是公开的，这是我的基本原则之一。

长官部经理处处长以我的名义准备预算与账目，仅对我一人负责。如果我叫

^① 赵志尧，浙江青田人，陈诚的师范学校同学。年轻时做过钱庄。1934年任十八军驻京代表。1938年1月陈诚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部长时，赵任政治部总务厅厅长；6月陈兼湖北省主席时，赵任湖北省财政厅厅长；1944年陈任国民党军委会军政部部长，赵任军需署署长；1946年陈升国防部参谋总长，赵任国防部预算局局长。

^② 陈良（1886—1994），浙江临海人，日本青山农学院毕业。历任黄埔军校经理科长、军需署副署长、军政部会计长、联勤副总司令、粮食部政务次长等。他是国民党统治大陆最后一任上海市市长，在任仅42日。

他发军饷给一批士兵，他就要照办，我为一切承担全部责任。简言之，他好像是指挥官的私人秘书。

中央定期发放军饷，很少延宕。长官部与所辖部队需款毕竟不多。军饷往往有剩余，我常常坚持按满额领取军饷。有时我的特务营严重缺额，这就既省下军饷又省下食米。

我的四战区从海外华侨得到不少援助。抗战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是一场决定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旅居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泰国、缅甸及印度支那华侨争先组织慰劳医疗队，有时称“战区服务队”，他们完全由华侨自己出钱资助与装备。

菲律宾华侨写信给我说，他们想派一个服务队直属于长官部，我表示热烈欢迎。这个队一到达祖国，就向行政院侨委会报到，后者派他们到四战区。侨委会不会违反华侨的意愿，中央也不会置喙，因为这个服务队是财政独立的。

有几支慰劳医疗队在四战区服务，因为华侨希望为他们崇拜的人服务。他们为什么崇拜我？由于我在北伐时的杰出功勋。这些慰劳团来了就向我报到，我们给他们提供住房、分配工作。这些慰劳医疗队平均有二三十人，他们到医院照顾伤员，有时下部队演出歌舞节目。美国华侨没有派慰劳团来四战区，因为太远了，他们捐钱汇来。对美国华侨与东南亚华侨，我感到也许对后者更为亲近一些，因为距离近些，而且他们在保存中华文化方面成绩可嘉。

在这段时期，四战区的通货膨胀开始了。有些公务员确实表现勤奋努力，但是无可否认，贪污腐化在很多部门孳生，不少案件涉及鸦片。我不能容忍鸦片在我的战区泛滥。（据张发奎 1939 年 1 月 18 日日记）我下令韶关卫戍司令部把妓院与烟馆搬迁到城外偏僻地区，但我必须眼开眼闭。卫戍司令是余汉谋的人，这是不能随便更换的职位。在韶关，我没有自己的部队，可奈何！这么一来，至少夜间我不会见到烟馆与红灯区。

这一时期，我给四弟勇斌相了亲，对象是黄琪翔的妹妹。当时勇斌在长官部担任军医处副处长。他要求我允许他在结婚前恋爱一年左右。我说：“不行！马上结婚，否则你不能带她外出！”为什么？毕竟是我这个当大哥的照顾他长大并供他完成医疗课程。军事观念使我在家庭事务上也倾向于独裁。黄琪翔与我是好朋友，我认识他妹妹时，她还是个小女孩，我仍然称呼她的乳名“新妹”。他俩于 1939 年 6 月 14 日结婚，这宗婚姻十分美满，他们很感激我。妻子与我从他儿子三个月大就收养他，从她女儿威妮（云芳）八个月大就收养她。

1939 年 9 月 3 日，爆发欧战。在所有的战区中，我的四战区受影响最大：敌军向我们施压，印度支那也受到影响（欧战爆发后，中国政府再次向法国政府提议：共同保卫印度支那，但法国政府没有回答）。

1939 年 10 月，我们从韶关疏散老弱病残，此前敌机空袭次数不多，欧战爆发后敌机频频空袭。可是，轰炸还不算凛厉。我只负责疏散长官部与战区部队的老弱病残，附属单位与军级单位的老弱病残由各该单位的部队长负责疏散。

9月1日，由军委会委员长蒋中正签署文件，任命我为军委会战地党政事务委员会四战区分部主任，设立这个新职是为了加强我对党政部门的权威。原先长官部政治部为我执行与党政部门的联络工作，已经远远不够了。出任分部主任后，我就可以在影响战局的事务方面直接向两广的省政府与省党部发布指令。我发布命令只是在绝对需要的时候。当我接到老百姓遭受贪腐、不公祸害的报告时，会向涉案的省主席建议改进。我绝不干预，这确实是一种协作或协调的关系。

我对广东党政部门的督导多于广西，这是由于我同李汉魂的历史渊源。我对广西党政部门必须更有礼貌。

军委会战地党政事务委员会分部在所有的战区都建立了，其成员是一批高级干部——李汉魂、黄旭初、余汉谋、夏威、吴奇伟等等。这一分部设立哪些机构呢？它是空的。长官部秘书长丘誉任分部的执行秘书；政治部、特别党部、政府机关与我的长官部人员，只是在四战区分部挂个名。

（据1939年9月29日与10月2日张发奎日记记载）我一再要求蒋先生把我调到一个纯军事的职位上，我有许多困难，上司都不知道我的苦衷，我的下属不服从我，做事不先请示我。然而，蒋先生拒绝了我的请求。

第十三章 第四战区（下）

（1939年10月至1944年春）

1939年10月6日，我被任命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我推荐余汉谋为副司令长官。蒋光鼐辞去战区参谋长职务，基本原因是“心病”——他不能忘却往事。于是，副参谋长陈宝仓暂代理参谋长。中国的人事问题是相当复杂的，其他所有的战区参谋长与高参，同在中央的军令部一样，都是陆军大学毕业生，但陈宝仓不是。军令部经常批评我们的作战计划。有时，在呈报作战计划给中央之前，我们先给在广东的陆大毕业生过目，如第十二集团军参谋长王俊，他是我与余汉谋的武昌军官预校同学，后来毕业于保定军校、日本士官学校以及日本陆军大学。我们给他看时，他总是说：“好！”可是交给军令部，总是挨批评。这就是派系歧视的证据。

还有，长官部参谋处处长郝家骏是陈宝仓推荐给我的，他也不是陆大毕业。他是北方人，也是陈诚、陈宝仓的保定同学。这就意味着，在我的长官部，没有陆大人才。

陈宝仓告诉我，他简直不能胜任参谋长这份工作，不是因为无能，而是因为派系歧视。他说，四战区应该聘一位陆大毕业生出任参谋长。故我请桂林行营参谋长林蔚物色适当人选，我自己也考察适任人才。

陆大商标是十分管用的。陆大毕业生中，起初是保定系多，抗战爆发后，黄埔系爬头了。于是军令部与各战区筛选参谋时，优先录用陆大毕业的黄埔生。

陈诚、薛岳与我都没上过陆军大学，顾祝同、蒋鼎文、钱大钧、胡宗南也未上过陆大。当黄埔毕业生大批进入陆大时，保定毕业生已经占据了军内许多重要职位。

在第一、第二次北伐时，黄埔生好像小鸡。在第三次北伐与“剿匪”战役中，黄埔生成长为小公鸡。到抗战时，才长成大公鸡。^①表现最杰出的是杜聿

^① 据国民党军委会铨叙厅统计，抗战开始时，指挥200万国民党军的高级军官，经铨叙的正式将官共有1247人（未经铨叙的有500余人），其中出身于地方军校及行伍者393人，内有总司令2人、军长35人、师长63人；出身保定军校者388人，内总司令4人、军长25人、师长36人；出身陆军大学者215人，内有军长2人、师长9人；留学国外军事院校者159人，内有军队1人、师长6人；出身黄埔军校者92人，内有军长7人、师长20人（陆大与留学国外者多为黄埔毕业生）。至抗战后期1944年，黄埔与陆大出身的将官大增，均已达千多人。陆大出身的将官绝大多数任参谋长与参谋处长，黄埔出身的将官任正副集团军总司令以上者32人、军长40人、师长132人；保定及地方军校出身的将官较前减少，但绝大多数战区正副司令长官由这几种出身者担任，另有军长71人，师长149人。留学国外军事院校人数虽增至285人，但无出任军、师长者，而担任集团军正副总司令以上的有9人。由此可见，抗战期间任军长以上的高级将领多为保定及行伍出身，少数为黄埔出身。师长级将领主要为黄埔、地方军校及行伍出身者。到1944年，军队主要指挥官、师长直至集团军总司令的职位由黄埔出身者充任已占1/3至1/2，显示黄埔军官在抗战八年间发展之快。

明。然而保定生仍然占着更多重要军职，大多数的战区司令长官是保定生，仅胡宗南例外。

许多高级军官是四校联谊会的成员，但该地有名无实，起不了任何政治作用，仅仅在会员间联络感情而已。

在黄埔系人员中，胡宗南控制的部队最多。他的部队驻扎在西北地区监视共产党，所以损失最轻微，而且得到最佳供应。蒋先生对他抱有很大期望，甚至大陆“失陷”的最后岁月，他对最高统帅一直竭诚尽智、效犬马之劳。

在战时，戴笠的权力大大膨胀，“十三太保”也都飞黄腾达。陈诚迅速崛起，在军人中，他享有最高的政治地位，他还通过三民主义青年团掌握党权。他敢于对蒋先生直言，既有力又具决策性，对蒋先生帮助极大。我们很感激陈诚，他言出必行，所以我和他相处融洽。

（据张发奎 1939 年 10 月 21 日日记载）我反对李汉魂兼任第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李汉魂建议组建第三十五集团军，下辖六十四军与新编第二军。他与我都感觉应召已抵达韶关的邓龙光是最适合的总司令人选。邓亲近李汉魂，李做过六十四军军长。但我们不能让邓立即上位，恐怕别人批评我们徇私。因为，邓龙光未参加武汉会战，所以李汉魂建议由他自己先兼任一段时间，然后再让邓龙光接班。所以，我向蒋先生举荐李汉魂任第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副总司令。蒋先生接受了我的推荐，李汉魂只是挂名而已。

这样，余汉谋的人就认为我不公平。批评我的是十二集团军参谋长王俊。当我们计划组建三十五集团军时，他问我为什么让李汉魂兼长该集团军。我答：“为什么？他毕竟是最合适的人选。”王俊问我为何不举荐他，我答：“你必须辅助余汉谋。”要知道，是中央派他下来辅助余汉谋的，他以前一直在中央（任陆军步校校长兼军政部兵工制造研究委员会主委）。

（据张发奎 1939 年 10 月 30 日日记载）我感到蒋先生似乎误解了广东省的党政军人任命，因为邓龙光与李汉魂是原第四军骨干，六十四军可以视为第四军的分支，其大多数军官是前第四军的成员。新编的第二军包含第六保安旅与三个盐务缉私团。组建新编第二军时，并没有遇到太大障碍，因为保安旅本来就是军人，他们愿意并入正规部队。新编第二军驻扎在北江地区，由邹洪^①指挥。周钰原来是从长官部兵站调去接任保安旅副旅长的。

我举荐六十六军军长叶肇接替余汉谋任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在南岳军事会议期间蒋先生称赞了叶肇，此后的第一个纪念周张发奎呈交了书面推荐。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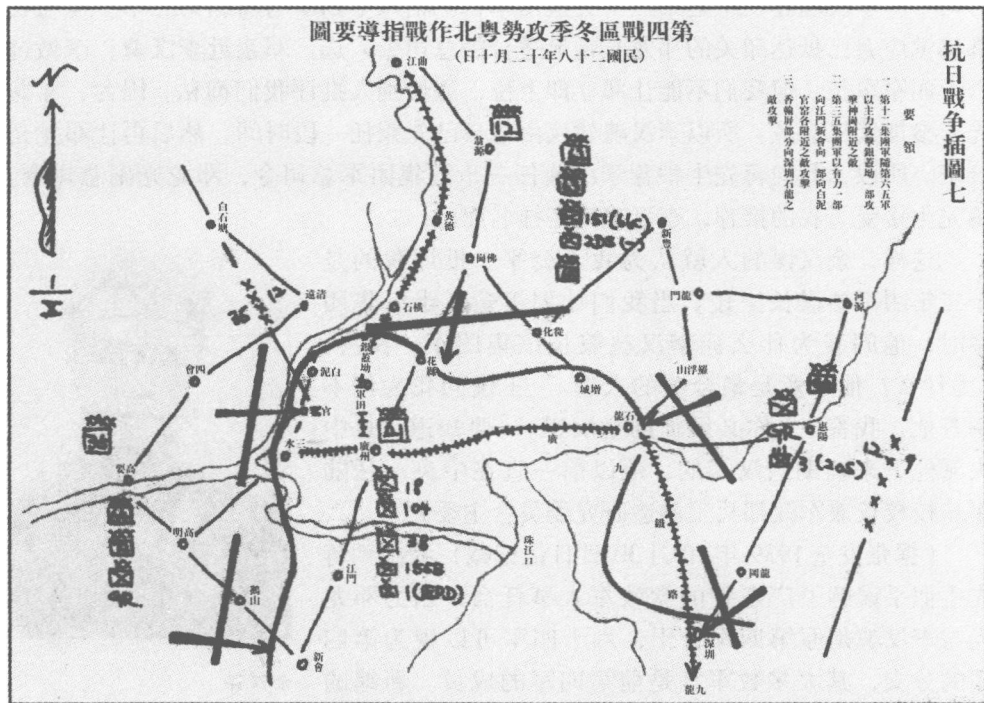
余汉谋

① 邹洪（1887—1945），广东五华人，保定八期，官至粤桂边区总指挥，抗战胜利前病故。

月31日张发奎日记说，因余汉谋阻碍，事已告寝。)叶是余的“权臣”兼同乡、同学，也是我和余汉谋的武昌陆军预校同学。然而叶肇的任命没有兑现，因为余汉谋不想放开十二集团军的指挥权。你要知道，四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职位是“空”的。

1939年11月15日，敌军在空军掩护下从钦州湾龙门港镇登陆。他们不费多大力气就占领了北海与海湾地区其他地点。他们目标是南宁，企图借此切断四战区连接印度支那的国际供应线。供应品从印度支那运到龙州，由此经过左江运到南宁；一旦南宁陷落，我们便没有陆上路径运送来自印度支那的供应品。

(据张发奎1939年11月15日日记记载)我请示桂林行营直接指挥钦州与防城的军事行动，因为白崇禧坐镇南宁与昆仑关，桂林行营已经在昆仑关以北的迁江设立了指挥所。虽然钦州湾处于我的四战区范围内、我负有前线军事行动的全责，但桂林行营并未通知我进驻。



第四战区冬季攻势粤北作战指导要图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提供)

(据1939年10月16日张发奎日记记载)基于以上原因，我以胃病为理由向白崇禧请假一个月，实际上我的病部分是政治性质的，白崇禧准了假。

我打算回故乡，但10月20日敌人突然在广东发动攻势。他们沿着公路与铁路向韶关逼近，旨在切断粤汉铁路。所以26日我放弃了回故乡的念头，只是赴始兴休息几天，坐汽车去只需一小时。我让余汉谋指挥广东的战事。

此时，敌军在广西遇到小规模抵抗。10月24日，南宁失守，我们来自印度

支那的国际供应线被切断了。虽然我们仍据守着龙州，那座城市已经失去它的重要性，因为已经没有必要把舶来品运送到南宁去了。广州湾成了四战区主要的供应基地。

我早已预料到敌军会攻取龙州，我知道敌军要攫取龙州以便拱卫南宁。他们什么时候想要龙州，什么时候就能拿下。当时不动手只是因为暂时不想动弹。

12月4日，国军弃守昆仑关。我认为这是战略上的大失误（据张发奎1939年12月4日日记记载），昆仑关具有巨大的战略价值，那儿只是略微抵抗了一下，我军本来可以坚守的，不必撤得那么快。

桂林行营参谋长林蔚与白崇禧一再要我赶到迁江。12月6日，我终于遵照白崇禧的指示去了迁江。8日，我一到迁江就出席了党政军高级官员联席会议。在收到蒋先生的电报指名要白崇禧留下指挥桂南战事后，我当天就离开了迁江。

我开始巡视西江地区与粤西南。定期巡视战区以及发生战斗的地区以提高军民士气，是我的责任。我去了平乐，从那儿坐船去梧州。12月17日抵达邓龙光总部所在地肇庆。

此时，粤北形势转为危急。我坐船，在没有交通工具的地方步行，于27日匆匆赶回韶关。在大坑口镇遇见余汉谋，他已经把他的十二集团军总部转移到韶关以北。诚然，我的长官部在我回来之前是不能行动的。余汉谋与我一起去了韶关。很巧，在我们到达韶关那天稍后，陈诚与李济深也到了。翌晨，我见到他俩。

此时，陈烈的五十四军（从十八军整编分出来）从湖南撤来韶关。可是该部没有派到用场。因为敌军突然停止了进攻——1940年1月2日，日寇攻占新江（在翁源西）与英德后，撤回他们原先的阵地。

根据余汉谋呈交给我，而我又转呈给中央的报告，我们在粤北打了一场大胜仗。这并不真确，尽管余汉谋印了一本小册子《粤北大捷》，为我作了一番宣传，事实上我们被打败了。我无法评论其他战区的所谓大捷，但我确实了解在我自己战区发生的事，我是在现场担任指挥，所以我应该知道。我们把这场战役视为胜仗，只是因为敌人攻下新江与英德之后马上后撤并未进攻韶关。人们必须先打胜仗才能宣称立功，余汉谋宣称他已立功，我自然不想去同他作对。于是，我决定利用这个“粤北大捷”举荐余汉谋接替我担任四战区司令长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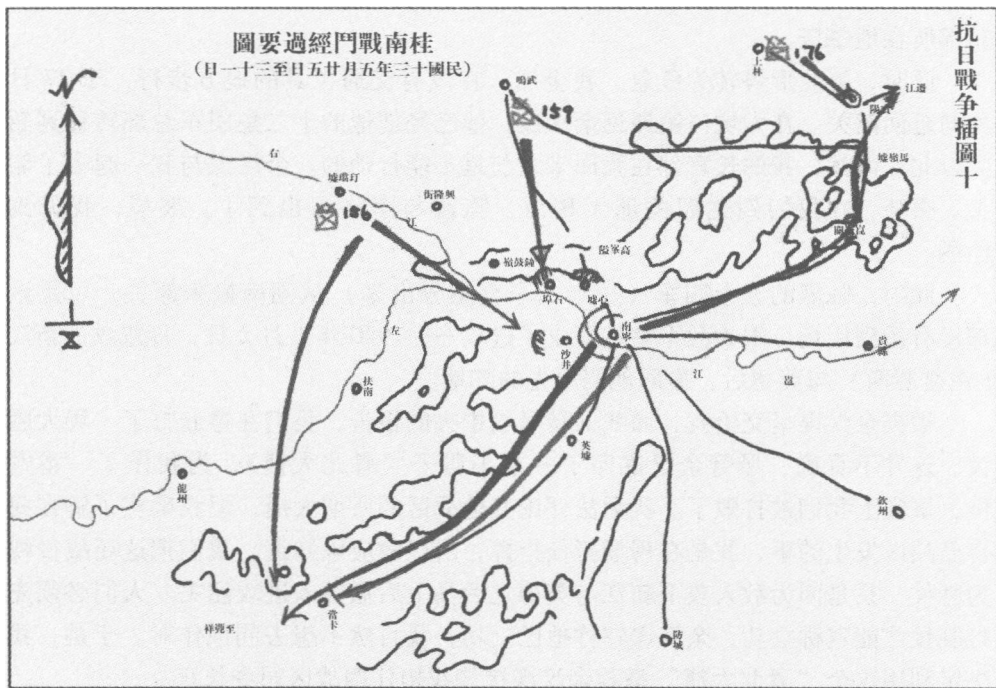
我明白敌军在广东、广西前线都兵力不足，他们决定从广东撤军用以增援广西。1939年12月24日，日军第二十一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在九塘被击毙，另一个旅团被包围在八塘。昆仑关大捷干得好！

1940年1月7日，我收到蒋先生的电报，说以后由余汉谋指挥西、东、北江地区的军事行动，由我指挥桂南的军事行动。因此，1月10日我把这三个地区的指挥权移交给余汉谋。同一日，我要求把四战区划分开来。鉴于余汉谋观念封建，我想还是我离开广东为妙。当然我是很不开心的。如果中枢认为由他指挥广东几个地区的军事行动是必要的，我可以直接向他授权，殊无必要由蒋先生越级

向他授权。

我属下的军官反对我的要求，他们认为我应该继续负责两个省。总之，我的要求——让余汉谋接任——被拒绝了，我十分气愤，我不想去广西。毕竟白崇禧、陈诚、李济深都在广西指挥战事。于是，1940年1月12日，我回到了故乡。但是，在收到蒋先生的几封电报以及陈诚、白崇禧、张治中的催促后，我终于不得不去了广西。1940年1月20日，在长官部作战处长郝家骏的陪伴下，我回到韶关，接着去了柳州。在那儿，陈诚与李济深同我们一起出发，赶赴迁江指挥所。

1月27日到达目的地，白崇禧、李济深、陈诚坚持要我接手迁江指挥所。虽然我身边只有郝家骏一员，白崇禧还是要我指挥桂南军事。我想这样不对头，我说，最好等到长官部的参谋班子都到齐了再接手。他们说，那没有问题，他们留下桂林行营参谋长林蔚以及其他作战参谋协助我。2月1日，我不得不同意就任了。翌日，我要求白崇禧请蒋先生把四战区一分为二。



南桂战斗经过要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提供）

作为四战区司令长官，我亲眼目睹了许多奇怪的事。敌军向南宁以北我军阵地发动进攻，白崇禧等人要我签署一项命令。这项命令是改变战略，撤退前线的部队。我质问，为什么这是四战区的责任？虽然那个阵地属于我四战区管辖，我既非收到过战事发展的报告，也没有指挥过那儿的战事。他们说，如果我同意这一战略改变，我就应该签署这项命令。我被迫签了。

形势充满了矛盾。白崇禧要我打电话给叶肇。他的三十七集团军在粤北战局

稳定后，已经从广东调到广西归白指挥。白抱怨叶肇不服从进攻甘棠的命令，那儿敌军人数不多，攻击甘棠是为了掩护大部队的撤退。当然，白要我打电话给叶是因为叶是我的广东同乡。

我叫叶肇服从白的命令，他拒绝了。我说：“这是我的命令！”他答：“我还是不服从！”他率部又回到广东。他如此骄横是由于蒋先生在南岳军事会议上过分夸奖了他，称赞他能干与勤奋。他也感觉蒋先生对余汉谋无可奈何。

为什么我认为（据1940年1月张发奎所撰之《每月回顾》）我军高估了昆仑关的重要性？夺回昆仑关付出了很大的代价。^①以后我们仍要继续同敌军作战。我们把主力部队集中在昆仑关、八塘、九塘（都在南宁市属邕宁县的昆仑镇境内）以及其他邻近地区。白崇禧感到昆仑关是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点——宋仁宗时名将狄青在此夜度昆仑关，救平侬智高叛乱。然而，在冷兵器时代的宋朝，要扼守昆仑关比现在容易。我告诉白崇禧，我们必须发动攻势牵制住敌军，使它们不敢轻举妄动。现在我们就面对敌机以及受过良好的山地战训练与装备精良的敌军了。

1940年2月2日，宾阳陷落。主要原因是叶肇不服从命令。倘若他遵令率领两个师进攻甘棠的敌军，宾阳是不会失守的，战场的形势也将会完全不同。于是，昆仑关再度弃守，敌军长驱直入上林与武鸣。

我为何要批评高级将领战斗意志薄弱？很明显，白崇禧在面对日益恶化的战场形势时犹豫不决。另一个因素是指挥部与前线部队通讯联络的瓦解。

1940年2月11日，敌军开始撤退，我们追击敌军，收复宾阳和昆仑关。敌军一路退到南宁及其周围地区。我们逼近敌军，有时发生小规模冲突。我到广西之前，战况并非如此。

广西民众帮助我军，可是对此我没有留下特别强烈的印象，只是觉得坚壁清野政策执行得很好。

我还记得所见到的敌军暴行，一路上我见到被敌军残害的民众，^②这是我在淞沪、武汉会战中从来未见过的惨况——当时，特别是在上海，我只见到随我们一起撤退之难民遭遇的痛苦。

（张发奎日记1940年2月9日、18日记载）军委会首席苏联顾问访问了赣南前线，与我讨论了未来的攻势作战计划，在战略与战术方面双方观点一致。我不记得同苏联顾问讨论军事行动，因为不存在分歧意见，通常最容易记住的是引起争执的讨论，而不容易记住的是一帆风顺的讨论。

1940年2月1日，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开始迁移柳州。22日蒋先生莅临柳州，召集四战区高级军官会议检查桂南战役失利原因，并追究责任。为了宾阳失利，

^① 昆仑关之战，中国军队集中了27个师共25万人。其中主攻昆仑关的是第三十八集团军，突击部队是当时国军唯一的机械化部队——杜聿明的第五军，下辖三个师：二百师、二十二师、荣誉第一师，加上直属战车团与重炮兵共5万人，然而在桂南地区的日军仅一个师团、一个旅团，共1.7万人。

^② 1940年2月14日张发奎日记写道：我听说敌军强迫约2000民众充当挑夫。到达南宁时，敌军打发他们回家前，把他们的右臂都砍掉了。

我请求处分，结果记一大过，这是我唯一受正式惩戒的案例。至于早先已发生的溃退，白崇禧、陈诚与李济深代我向蒋先生解释：当时我不在现场，桂南战役是他们三人指挥的，我仅仅是奉召在撤退命令上签字而已。他们也请求处分。叶肇被逮捕押送重庆接受军法审判。



蒋介石与张发奎等到战地巡视。

我发现（据张发奎 1940 年 3 月 31 日《每周回顾》）迁到广西后，肩上的担子减轻了。因为事务远比以前简单了，我不必再操心那么多难题了，所以在桂南承担了全部军事责任。第十六集团军以及在广西的其他部队都隶属于我。

中枢派遣邵百昌^①来四战区任炮兵指挥官，还派来丘士深的第二工兵团。黄镇球派陈淦来当四战区防空司令。斯重淦被任命为通讯指挥官。

由于伤亡惨重，我的部队打得筋疲力尽，严重缺额。^② 想要补充缺额是极困难的。在广西征兵没有什么不同，像广东一样，同样的问题出现在广西。有一次我亲睹一名壮丁跳到河里逃跑，被湍急的河水冲走。

这一时期我们的装备同在韶关差不多，我们最担忧的是医疗设备与药物的供应。我们有一座后方医院，前线则有一批野战医院与救护站。士兵每月有两元的医药费，但随着通货膨胀加剧，几乎买不到什么东西。有时冬天过去棉衣还没有运到，士兵只好挨冻。随着战事的持续，士兵们的情况无疑日益恶化。

在解除武装后，我们仍视所有日军官兵为敌人，这是国际战争与内战的最大差异。在内战中，我们解除对方武装后，并不视其官兵为敌人，当时交战是由于政治观点歧异。但抗日战争就不同了，是为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而战。我们的箴

^① 邵百昌（1898—1981），湖北黄冈人，保定六期、维也纳炮兵专科学校、德国防空学校毕业。曾参加武昌首义，历任国民党军队师、军参谋长，陆军炮兵学校教育长、江宁要塞司令、九战区炮兵指挥官、远征军炮兵指挥官、军训部炮兵监、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炮兵指挥官。

^② 据张发奎日记 1940 年 4 月 10 日所说，只剩下五十四军的两个师及九十三师可用。后来，六十四军的一〇〇师与五十九师缺员 7000 多人。

言，正如蒋先生所说，是“忠党爱国”。

军级单位把战俘移交给我。我们讯问所有日俘官兵，有关部队番号、经历等。讯问后，就押解他们去桂林行营，再转解重庆。实际上，我们俘虏日军不多。^①日本反帝同盟西南分部是在重庆的一些日本人组织的，由觉醒了日本战俘组成。^②

1940年3月11日，我们发起桂西南攻势的目标是有限的，并非志在收复南宁，仅仅是为了同敌军保持接触。在1940年6月法国被纳粹德国占领后，我们的注意力便集中到了越南。7月2日，敌军攻占了桂越边境的龙州。

1940年5月27日，吴石出任战区参谋长，这是林蔚推荐。吴石是桂林行营参谋处处长，保定三期、日本陆军大学毕业。陈宝仓再次担任副参谋长。郝家骏被李昆冈取代，李是陆大毕业生。我的长官部又吸纳了几位陆大毕业生担任高参。

吴石接任参谋长后，1940年夏季战事平静下来了。他带了一名参谋策骑走遍了桂南战场。我再次请求将四战区划分开来。1940年8月4日，蒋先生接受了我的建议，设立第七战区，交余汉谋指挥，但余汉谋一如既往，不肯放弃第十二集团军的指挥权。

七战区包含广东省北、西、东江地区以及海南岛，粤西南仍归我管。我觉得这不公平。无论从地理抑或从军事观点考虑，海南岛都应该隶属于我，但是海南岛卫戍司令王毅是第十二集团军参谋长王俊的弟弟。我对中央说，这样划分不妥当，但中央无视我的意见。我决定辞职，要求另派职位。我不满意时就会请辞，但我的请求被拒绝了。

第三十五集团军组建不久，邓龙光就接替李汉魂任总司令，我委派朱晖日任副总司令。七战区成立时，三十五集团军理应划归四战区，但是中央命令新编第二军脱离第三十五集团军，直属余汉谋，驻扎于西江地区；六十四军移防粤西南，直属我。这就意味着邓龙光成了无兵司令，他待在西江地区的总部将成孤家寡人。对这一局面，他自然不高兴。

我要求蒋先生保持固有的指挥系统——新编第二军仍然隶属邓龙光，他依序列已归余汉谋的七战区。为了加重分量，我要求蒋先生把我调职。1940年8月27日，他终于接受了我的建议。

在粤西南，我们握有党政大权，李汉魂属于余汉谋与我双重领导。

1940年9月22日，敌军越过四战区边界进入越南。10月30日，我军收复南宁，我们又报了一次胜仗。事实上，敌军是自动撤出南宁的。为了宣传目的，敌人每撤退一次，我们便上报一次胜仗。中央对此十分了解，这些都是虚假的胜利。但是，我能肯定，在敌军占领南宁几个月中，我们同它接仗过，有时交火很厉害。

^① 八年抗战俘虏日军官兵共250万人，这是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时的统计总数，但在日本投降之前日军被俘人数至今没有露布。抗战八年间，军政部长何应钦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至六届全代会作军事报告11次，皆列举日军伤亡统计数字，唯独无日军官兵被俘统计数字。

^② 1940年4月26日，张发奎观看了西南分部演出的话剧《三兄弟》。

我军向钦州湾追击敌军，当部队经过钦州附近一个村庄时，当地的傀儡组织——“保安会”向我们开火。我的部下包围它几天后将其解除武装。我们问他们为什么开火，他们的回答很简单，全无民族大义：日本鬼子离开前说，他们几天之内就会回来的。我们枪决了“保安会”的头头。11月14日，我们收复钦州与北海，日军从龙州撤往越南。11月30日，我们收复镇南关。至此，我的战区内已无敌军踪迹。

（据《抗日战争回忆记》记载）敌军驻守南宁的人数不到我军的十分之一，因为他们拥有第一流的防御工事与通讯设备。

敌军的空袭给柳州造成很大损失，有时候损毁很严重。有多次我们必须疏散老弱病残，以至于全体居民。我们预料到敌军会用伞兵部队登陆。我们举行过军事演习，训练士兵对付敌军的伞兵，也准备好应付突发事件。

自12月16日至1月22日我率领林蔚、吴石、梁华盛以及首席苏联顾问等人去宾阳、昆仑关、南宁、钦州、防城等地作战地巡视。这种巡视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从中研究敌人的设施及部队部署等，我对敌军所筑防御工事的质量留下深刻印象。在占领桂南与粤西南期间，他们在计划修筑的连接北海与钦州、南宁的临时窄轨军用铁路上，已铺设了一部分路基。我们主持了军事演习，也作了汉奸调查等等。

（据张发奎1940年11月16日与24日日记载）我要求把四战区合并到邻近的战区，因为军令部下令把六十四军与五十二军拨归军委会直属，除了六十四军的一五五师留在粤西南，我属下两个军都被调离四战区，我感觉自己成了“无兵将军”。蒋先生的政策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他常常把军级单位调派到危急地区，等原驻地发生危机再调兵回去。我认为，新到达的部队对这一地区肯定不够熟悉。我要求把四战区合并到薛岳的九战区，然而这一要求被拒绝了。

军令部副部长刘斐^①在中央同我作对。原因很简单，每次去重庆时，我从不请客送礼。余汉谋带许多礼物送给军令部高官，所以他们对他很好。自从吴石接任四战区参谋长后，一切都转入顺境了。但是刘斐与林蔚是死对头。如果这是真的，我为什么起用吴石？因为他与林蔚关系良好。中央又把我属下部队的大部分划到其他战区，仅仅留下十六集团军。^②

（1941年2月10日至13日，张发奎去韶关出席第七战区的军事会议）我同

① 刘斐（1898—1983），字为章，湖南醴陵人，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历任国民党参谋本部作战组组长、五战区参谋处处长、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军政部代次长、国防部参谋次长。程思远在《刘斐将军传略》序中坦承：“在一九四六年国共战争爆发后，为章先生以参谋次长参加官邸作战会议，存心作出了许多错误的部署和献议，使国民党军受到非常不利的后果。”具体表现在叫王泽浚四十四军由海州撤向徐州；叫黄百韬带一个兵团去援救王泽浚的一个军；叫黄维兵团奔驰千里赶到双堆集袋形之地挨打；叫刘峙轻易放弃工事做得极好、粮弹储藏极丰富的徐州；叫杜聿明以三个兵团在公路上排成无法作战的难民式长龙，像一个庞大的软体动物。他一面对蒋介石及军事当局虚与委蛇，一面暗中将所有军事配置和布置以及作战计划，和盘、及时地托向中共，致令国民党军虽拥现代化武器与陆海空三军密切配合，却难逃被歼的结果。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等。

② 在1941年5月31日的《每周回顾》中，张发奎说，他的任务很简单，只指挥十六集团军。

七战区保持密切联系，因它离我最近。

我住在一艘停泊在码头上的大帆船上，毗邻我的长官部，旁边还有一个山洞，权充防空洞。那儿风景十分优美。我妻子在桂林赁屋居住。我们不时互相探望。



1940年初在桂林聚会为白崇禧母亲祝寿。前左起：郭德洁、刘景容、马佩璋；后左起：夏威、李济深、白崇禧、何应钦、关麟征、唐生智、张发奎。

我被许多访客包围。去大后方重庆的人们，从韶关与广州湾坐汽车到柳州，由此坐火车到贵州独山然后乘长途汽车去重庆；或者直接坐汽车去重庆。从湖南、江西及广西其他地区去重庆的人们也途经柳州。（陈济棠夫人）莫秀英、（胡汉民夫人）陈淑子及其女儿胡木兰就在大批访客之中。

缪培南应我的邀请来到柳州，他住了几天就去韶关接替李振球任六十五军军长。但是他在这个职位上只做了没多少时间。

1940年1月，陶希圣同汪精卫决裂，在奔赴重庆途中经过柳州，我会见了，谈话的内容没什么特别。我对他不太了解，他不是汪精卫最初的追随者，叶蓬也不是真正亲近汪精卫。甚至周佛海也不是真正亲近汪精卫，他从来不是改组派的成员。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傀儡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我和其他四战区高级将领发布通电谴责汪逆。紧接着桂林行营的撤销，1940年6月桂林办公厅成立。李济深的职位低于白崇禧原任的军委会委员长桂林行营主任，他无权指挥军事行动，也无权指导党政机关，他的职位是空的。白崇禧是真正拥有在广西决定一切的权力的人，虽然他身在重庆，但他真正控制着广西省的党政军事务，是广西实际上的“灵魂”。

林蔚留下来担任桂林办公厅副主任，大多数有独到见解的人留下来了。李济深不甚注意我对广西事务的作为，他对我甚有礼貌。在另一方面，我也尊敬他，他曾经是我的长官。

我跟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没有轱辘^①。我指挥军事行动，把集团军的训练、人事与整编事务留给他做。我不太过问广西省的事务。民团的重组是因为中央要使地方民兵系统一体化。^②

在我迁到广西以后，我同广西党政机关有了更多的直接接触。我必须予以更频密的指导，但是我们之间的关系保持着相当的礼貌。我对他们有求必应。当然，他们不会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我这方面也不会强人所难。表面上，每个人都服从我。

军委会战地党政事务委员会四战区分部于1940年10月被解散，这是中央的决定。也许它认为战区司令长官的权力太大了，也许是省主席们对蒋先生表达了他们的不满。分部撤销后，我和广西党政机关的联络工作再次交付战区政治部执行。

省党部与四战区政治部协助省政府负责有关基本人权的问题——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等等。由于桂林是一个文化中心，黄旭初必须处理许多这类问题。^③在柳州，一切都很平静。

长官部决定区内所有参谋人员必须是国民党党员。^④中央关于所有军人必须加入国民党的规定，此时执行得更严格了。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我们假装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为了利用他们的才能，我不怕使用共产党员。

左洪涛是我的秘书，起初他跟随我是当战地服务队队员。后来我叫他当秘书，因为我发现他有才华。他和妻子胡聪华都是共产党员，胡也是战地服务队队员。他俩是战时在柳州结婚的。

在广西我并没有遭遇共产党困扰，这是因为广西传统上的“闭关”政策。广西当局对党政部门掌控很严格。

我同四战区政治部主任梁华盛^⑤之间关系颇融洽，他是黄埔一期，我认为他是蒋先生的得意门生、“十三太保”之一。我认识他的尊翁梁海山——老同盟会员。我待他如子侄辈。在会议之外，我称他“华盛”而不是“梁主任”。梁华盛组织了一个足球队，以他的名字取名“华队”，其队员是在政治部兼职的中山大学毕业生。这个球队很出名。

① 有传说，夏威瞧不起张发奎。

② 据黄旭初说，1940年，区一级的民团团部被撤销了，它被改组为区保安团团部，可是二者没什么实质区别。

③ 据黄旭初1967年8月8日在香港接受夏莲瑛访问时说，国民党省党部有个调查机关负责出版工作，但与四战区政治部联络不多，是政治部在柳州较多负责出版等问题。

④ 张发奎1940年8月14日日记说，这一决定是遵照中央的规定：非国民党党员不能再予雇佣，在8月底之前所有人员必须加入国民党，否则就要解聘。9月18日记载：黄旭初与张发奎讨论了防范中共渗透等问题。

⑤ 梁华盛（1904—1999），广东茂名，黄埔一期。历任排、连、营、团、旅、师、军长，1936年任国民党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参谋，1940年10月14日任四战区政治部主任，1943年任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抗战胜利后，任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兼吉林省主席，1948年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沈阳防守司令官，翌年调任广东绥靖公署副主任。

侯志明是政治部副主任。1929年当我们发起第二次护党救国运动时，我扣押过他。但这不算什么，我们从来不考虑往事，政治就是这么样。

原先的战地服务队又重新建立了，队长是非中共党员的官其慎，这时我已注意不让中共党员出长这个部门。战地服务队后来改组为政治部剧宣四队。就这样，有一阵我们四战区拥有第四、第五两个剧宣队。有一年我过四十几岁生日时，我同第四剧宣队全体成员合影留念。我至今仍保存着这张照片，一到香港就把它挂到书房的墙上。

梁华盛就任四战区特别党部执行秘书后，大多数原任职员被调走了，^①因为梁华盛带来了自己的班子。我仍旧是特别党部的特派员，但我眼开眼闭。

中统局派出新官进驻四战区，他叫陆树珊，浙江人。军统局也派新官入驻，名叫杨继荣，他与李崇诗是湖南同乡，后来他又被另一个湖南人郑兆一接替。我同中统、军统的关系没有差异，我遭遇到同样的鸦片问题，甚至可以说，我到处都遇到这类问题。贵州、云南出产的鸦片通常是经由柳州运到广州湾的。

有一次黄旭初就鸦片运输的事向我请示，我问他有否问过白崇禧。黄说，他已经问过白，白要他问我。按理说，黄应该先请示我。我说我不能扣查中央代销的鸦片，但不允许它在我的战区装卸，然而我可以允许他过境，不会检查运货车厢，这批鸦片是用火车运往韶关的。

后来，国民党中央委员、粤西南籍的陆幼刚^②路过柳州，他问我：“为什么粤西南要遭受鸦片之毒害？”我说：“这话由何说起？”他解释道，他刚回过故乡，见到许多鸦片。【余汉谋派遣他的宪兵护送鸦片从韶关运到粤西南。我打电报给邓龙光的弟弟、第六十四军一五五师师长邓鄂查扣鸦片，他说他不能扣押这些鸦片，那是由余汉谋的宪兵一路护送的。我问他：“你是我部下还是他部下？”他答道，在军事行动上他服从我命令，在其他事务上他不能遵循我的命令。我气愤极了，但又无法报告中央，由于货主本是中央。我想惩罚邓鄂。后来邓龙光派朱晖日来，为他的弟弟说情。】

我扣留了鸦片后，留到每年6月3日禁烟节，将之付之一炬。我决心执行中央的既定政策。

1941年1月，发生了“皖南事变”。新四军是抗战



韩德勤

^① 据张发奎1940年11月25日、28日日记，国民党四战区特别党部的职员，除了主任秘书林骆与两个部门负责人之外，都被调走了。

^② 陆幼刚（1894—1983），广东信宜人，北京大学毕业。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广东高州起义。历任大元帅府秘书、法制委员会委员、鹤山县县长、江门市市长。1935年任广东省政府秘书长、国民党第五届候补中监委。抗战期间历任军委会军风纪巡察团中将委员、广州特别市党部常委。1945年5月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执委。抗战胜利后当选广州市参议会议长。1948年当选第一届国大代表。1949年赴香港，后去美国任洛杉矶某中学校长。著有《国父史略》、《广州革命史迹》等。陆幼刚路过柳州时是国民党军委会军风纪巡察团委员，抗战胜利前才当选国民党中委，此处张发奎记忆有误。

爆发不久后成立的，叶挺被任命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我相信，叶挺选择“新四军”这一番号，是由于他以前同第四军的渊源。他视第四军为“老”，中共的新四军为“新”，意谓继承“铁军”的精神。

新四军不是一支大部队，它在长江南岸敌后开展游击战，但是战绩不彰，它一心想扩充实力。中央命令它北上。我相信是叶挺违令拒绝，他想留在江南皖赣浙边区扩展共产党的势力，但是中央不允许新四军在那儿发展，而新四军在江北穷乡僻壤是很难生存的。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报告中央叶挺部抗命，中央除了缴械新四军别无良策。

中央军包围了新四军，缴了它的械；中共党员们走投无路。有人说项英不是在现场被杀，而是后来中弹的。^① 叶挺被俘。蒋先生命令顾祝同不可处死叶挺。另一方面，蒋先生也不想释放叶挺，蒋知道叶挺有翻江倒海的本领。【我相信陈诚在此事上也起了作用，陈与叶是保定军校同学，也是第一师同事。】

中共党史专家胡华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一书中断言，1941年1月5日，新四军按照中央的命令在北上途中被国军包围袭击。^② 我不相信胡华的说法。

当时局势十分险恶，新四军与第三战区的摩擦日益增加，新四军不服从三战区司令长官命令，那是事实。如果政府下令解散新四军，政府一定会被人指控“反共”，那时流行不少攻击政府的言论，民众都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这就是政府下令新四军北上的原因，旨在减少摩擦。后来新四军被缴械是因为它违令抗命。在那种情形下，中央政府别无选择。倘若我在中央掌权，一开始我就不会允许成立新四军。在延安周围设立共产党的军事基地已经足够了，为什么要让他们遍地开花？

（从张发奎日记知，1941年3月23日蒋委员长在重庆设午宴后，同张发奎讨论了中共问题。3月29日在国民党中央五届八中全会上以及4月18日，蒋委员长和张发奎等人讨论过中共问题。）有关中共问题中央指示我严加防范。在我们内部增强对中共的秘密监视，例如针对第四剧宣队中的共产党员。

可是我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因为我早已吩咐官其慎监视他们。此外，我感觉他们并不密切接触群众，因为他们都不是广西人氏。他们在民众中主要是从事抗日宣传，表现得勤奋努力，我没感觉到他们在为共产党作宣传工作。事实上，那时第四剧宣队共产党员比从前少了，有些已经离开，有些结了婚，尤其是女队员。女人同男人不一样，婚后她们通常不会再上班了。在这段时期，我继续看望常来四战区访问的郭沫若与田汉。他们富于文人的气质，不落俗套。

① 项英在事变后突围而出，辗转隐蔽两个多月。1941年3月14日凌晨在泾县南部赤坑山一个山洞熟睡时，被副官刘厚总开枪打死，凶手志在掠取项英身边财物。

② 根据大陆史学界杨奎松的研究结论，蒋介石的两次手令都是要求新四军由皖南原地北渡，即在南岸繁昌一带渡江，到江北无为一带集结，使其不至于再参加对韩德勤部之攻击。然而毛泽东命令项英走苏南路线去镇江渡江。叶、项没有理会蒋介石的命令，而执行毛的命令。此时顾祝同七万多大军已把新四军军团团包围，只留下往北一条路。叶、项要改变路线就一定要对三战区部队采取突围行动，从而引起两军的激烈冲突。

（1941年12月24日张发奎日记记载周兆棠^①同张讨论了四战区党部的党务改革与人事变更。）中央党部军队党务处处长周兆棠于1941年尾同我谈了约束党纪的办法。

我的苏联顾问同我一起到了柳州，1941年5月接任的是炮兵顾问普鲁恰洛夫。1941年4月13日，日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中立条约”意谓互相尊重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与“满洲国”双方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但这没有影响我同俄顾问的关系。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来看望我，除非有事商量。自从分开居住以后，我们的关系更加形式化了。我对“中立协定”当然很不高兴。我感到很奇怪：俄国人一边帮助我们，另一边又同日本人签署中立协定。我同苏联顾问谈及这件事时，他们说，这是国家政策事务，他们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向我保证，他们来中国是全心全意帮助我们。

此后，我们对俄顾问自然抱有多一分的戒心。我们不让他们知道机密。那时中共已渗入所有的社会活动。之后苏联对华援助的变化我不清楚，这是中央的事。

每次去重庆我会见到不同的重要人物，有时我在午宴集会上见到俄国人^②。我记得在一次苏联大使馆举行的特别聚会上，当我们往杯子里倾倒伏特加酒时，主人马上往酒里掺白开水。

1941年3月初，敌军对北海作出短暂占领。我相信这是敌人意图骚扰我们。我在3月上旬准备在海湾展开的准备措施都是防御性质的，没有永久性的。主要问题是兵力不够，我必须依靠当地民团部队来保卫粤西南。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我的战区受到极大影响。25日，香港陷落，日军切断了我们同外部世界的一条生命线，敌人加紧了对我们的封锁。在经济上，我们遭逢了巨大的困难，但在精神上，我们很高兴——美国卷入了战争。那就意味着日本的敌人更多了，我们的抗战前途更加光明。我感到，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加速了敌军崩溃之日的到来。

在日军进攻香港前不久，我妻子去香港，把收藏的名画运回故乡，把画卷同文件混杂在一起装箱。其余的私人记录与照片就留在香港。日本人打进香港时，我家的用人把它们扔入水井，我的私人记录与相片就是这样失落的。

林赛·莱德上校等人离开香港进入自由地区，组织了英军服务团^③。其中一

① 周兆棠（1901—1973），浙江诸暨人，黄埔二期辍重兵种毕业。参加过两次东征，北伐期间历任长沙兵站总监部负责人，上海兵站总站长、军需署科长等。1940年任国民党中组部军队党务处处长，1942年真除少将处长。1945年5月当选国民党第六届候补中执委，1947年11月授中将军衔，1948年当选第一届立法委员。1949年赴香港，后赴台湾。

② 张发奎1941年4月4日日记写道：4月3日，蒋先生设午宴招待苏联首席顾问以及苏联驻华大使馆成员。

③ 英军服务团由香港大学原教授赖廉士（Lindsay T. Ride）组建，负责蒐集日军情报、为中国军队偷运医疗设备、接送重要人员潜出或进入香港。自1941年12月起，赖廉士上校从设在香港的战俘营里救出许多英军战俘，该团总部设在桂林，以广西作为前线基地。

部分靠挂在余汉谋的七战区，另一部分靠挂在我四战区。该团成员包括了医生与技术人员。多数成员是华人，但部分医生与技术人员是英国人。另有一些从香港来的医生，在我四弟勇斌率领下到我四战区，加入了长官部医务处。

那时我月饷有 320 元，^① 在战时我们的饷银打了对折，但我每月仍能领到 1000 元的特别津贴。战时蒋先生还支付特别费，考虑到通货膨胀币值下降，特别费有几十万元，我从中国农民银行提取。

我的有关裁撤长官部冗员命令没有确实执行，^② 只要有足够的钱供养，我们就让他们留下来。他们无处可去，人们说我是“菩萨心肠”。

1941 年 7 月，国民政府将原由各省政府征收的田赋改为田赋征实^③后，部队的食米供应方面，由中央向各省规定每年应征粮的总数，各省主席再将征粮数摊派到属下各县，然后保长告诉民众把应缴粮食送到县政府，由县府报给行政专员，后者依次呈报省政府。省政府交给我一张全省各县的征粮统计单，我将食米定量分派给军级单位。每天的配给米可以增加至每人 25 两。我告诉省政府部队需粮总数后，它就命令每个县向附近的军级兵站缴送一定数量的食米。

民众送粮到收集站时会遇到各种困难，县府会说粮食太湿，或者说米质欠佳；还有一个计量的问题。县府会责备农民所交粮食缺斤短两。所以每缴 100 斤粮就要带备 110 斤防范官府刁难，这对老百姓来说是艰辛的。但无论如何，冲突只涉及农民与地方政府，而与军队无关。从军队的观点来看，田赋征实是件好事。可是，军队与县政府之间产生了摩擦。例如，后者送米到兵站时，也会被指责斤两不足。有些亏空数可能是在谷仓里被老鼠吃掉了，因此，县政府送粮时也需要比定量多些。然而，军队与县政府之间的冲突比民众与县府之间少得多。

军队不再被卷入买米时与民众的冲突后，地方政府当了替罪羊。^④ 由于广西不是产稻地区，要满足军粮需求是困难的。各种各样的委员会和会议都在殚精竭虑，想方设法透过田赋来完成稻谷征收任务。当省政府不能征收规定数量的稻谷，或者驻扎该省的军队超逾原计划的数量时，地方政府就会为军队采购稻谷。米价由中央规定，费用由中央支付。麻烦就出在，由于通货膨胀加剧，地方政府

① 据 1941 年元旦起实施的国民党军队暂定薪饷表，上将月薪 320 元，中将 240 元，少将 180 元；上校 154 元，中校 124 元，少校 100 元；上尉 66 元，中尉 50 元，少尉 42 元；准尉 32 元，上士 14 元，中士 11 元，下士 9 元，一等兵 5.5 元，二等兵 4.5 元，新兵 4 元。

② 据张发奎日记 1940 年 11 月 24 日日记载，长官部人事编制比军委会组织表规定的数字超编两倍多，长官部秘书科已扩编成秘书处。1942 年初设立的编辑委员会已经吸纳了一批冗员。

③ 1940 年粮价飞涨，军需民粮需求孔殷。严家淦任福建省财政厅厅长兼田赋管理处处长，创立田赋改征实物制度，改用农产物交税，对当时国库收支调度、军粮民食的供应等有极大稳定作用，获国民党中央肯定，推行于全国。后严家淦调重庆任战时生产局采办处处长。1941 年国民政府明令田赋一律改成征收实物。按 1941 年田赋正附税额法币每元折稻谷二市斗或小麦一斗五升。1942 年又将征收标准提高到每元税款折征稻谷四市斗或小麦二斗八升。1943 年实行产棉地区折征棉花，每元税额折征皮棉五斤，对棉纱、麦粉统税改征实物。1944 年又扩大到对糖类统税征收实物。

④ 黄旭初在 1963 年 2 月 16 日香港《春秋》半月刊撰文说，田赋征实“加重了地方政府办理军队副食品的困难”。

简直不能吸引农民以官价出售自己的稻谷。

我感到，米价应该由县政府规定，如果中央提供的经费不够支付合理的市场价格时，军级单位应该将他们“吃空额”积累下来的储金来补差额，这样，地方政府就不必承担额外负担了。我认为，应该这样做，我们四战区在柳州就是这样做的。^①

中央对付通胀的举措是不妥当的。为了应付日益上涨的米价，我和不同阶层的人们讨论这通胀问题后，便命令黄旭初根据中央的规定限止物价。可是，强行管制物价是不可能的。

军级单位仍然直接采购食米，（据张发奎 1941 年 1 月的日记记载，每个官兵每月食米津贴是四元）当地方政府不能得到足够的食米时，就只好征收田赋抑或以现金购米。军级单位能得到的副食品供应不足，有时连食米也不足。多数时间，我的士兵营养不足。^②

长官部与战区部队的补给方式没有区别。^③ 1942 年 6 月生效的“独立军事供应”政策是何应钦的决定。按照这一新规定，各战区司令长官部、集团军、军部的兵站，全部隶属于军政部军需署。我的长官部兵站总监必须直接向军需署提交预算报批、提交结算供审核。上呈的文件仍以我的名义，但兵站总监要与我分担责任。这个新主意是为了减少贪污的几率。

中央继续从我的战区抽调军级单位。有一阵我只剩下三十一军（1942 年 7 月 8 日，十六集团军第四十六军奉命集结到湖南衡阳），我这四战区成了“三代单传”：四战区一十六集团军一三十一军。仅此一军，仍要配置在桂越边境的漫长国防线上。我几乎成了“无兵将军”。

四战区干训团设立在柳州附近的大桥。在修仁时，着重于政训；到了大桥，军训与政训并重。训练班比以前时间长，因为学员比以前少。此时考虑到广西的特殊情况，只训练军事干部。广西人一切都想自给自足，有他们自己的制度，他们不需要我们的政训课程。（四战区最后一期，即第九期干训班是 1944 年 5 月 7 日结业的。）我们训练广西与粤西南的中下级军事干部，也设立了一个班长训练班。

组成 1941 年 7 月 1 日设立的干训团国民党特别党部的，是干训团的指导员与职员。谢膺白被任命为干训团特别党部的特派员。

十六集团军大多数中下级干部是中央军校第六分校——广西军校的毕业生，

① 据广西民政厅厅长邱昌渭向中央报告：“民国三十年五月二十八日张长官表示：如果各部队长官肯拿出良心将缺额旷饷填补主食代金之不足，购办军粮是绝不会累及地方政府的，在柳州的部队便是这样办的。”

② 据张发奎 1941 年日记记载，官兵的副食品津贴是相同的，每月已从一元增至四元。

③ 1941 年四战区经常性支出如下：长官部 45045.9 元，特务团 42814.52 元，工兵指挥部 1306.91 元，经济战指挥办公室 28521.11 元，军乐团 863.02 元，越南特种部队（营）15207.4 元，编余军官团 12279.78 元，第一第二运输团、马车、牛车以及民船 194221.68 元，三个担架队每个队 43120.67 元。每月总计 443953.33 元。



韩汉英

当时的校长是甘丽初^①。广西军校毕业生自然比不上中央军校毕业生，毕竟在资金、装备与师资方面都比不上中央。六分校以前尊李宗仁为领袖，而此时，六分校毕业生渴求拥有中央军校毕业生一样的期别认可。例如，六分校首届毕业生要求被认可为中央军校某一期毕业生的资历。同样的请求也由陈济棠所办的燕塘军校毕业生提出来，在陈济棠下台后他们被认可是中央军校第四分校。四分校第一任校长是陈芝馨^②，他也是第四军旧人。他与妻子在广州沦陷时溺毙。他的继任者韩汉英也是第四军的。

作为陆军大学的考试委员会主任，我和参谋们负责在柳州举行的考试。考试在多个地点举行，试题是中央拟定的。

比起在韶关，我在柳州维持军纪方面遇到更大困难。在柳州，问题更为复杂，因为它是交通枢纽，而韶关比较偏僻，面积小得多。中央禁止军人赌博，我试图执行这规定，但很困难。我下令处决一名偷羊的特务团士兵，军法署建议之量刑轻了一级，但我考虑到军纪已经松弛，遂下令“杀一儆百”。为了维系军纪，我从重量刑。我还记得一宗处决偷铁士兵的案子（1942年6月18日，士兵叫张纯志）。我想这是我否决军法署的判决、决定死刑的另一案例。这两宗判处士兵死刑的案子都是在柳州轻罪重判。人们称赞我严格维系了军纪。

吴仲禧接替李章达担任柳州四战区军法署署长。李章达去重庆后报称他不再回四战区了。

我通常会拒绝（见1941年11月26日日记）商人邀宴。倘若我接受了一个商人的邀请，势必要接受其他商人的邀请，这我办不到。

战时中央命令推行节约储蓄运动。我下令处罚一家餐馆，因为它在宴席上端出超过规定数目的菜肴（见张发奎1944年1月6日日记）。我认为，午宴最多容许四菜一汤，我们必须节省每一样东西。一天，一群银行家邀我去酒楼用餐。我见菜肴超过四碟，便问酒楼主事人有否收到中央的命令。他说：“收到。”我问：“那么为什么你今天端出这么多菜肴？”主人家说：“我们怕你不够。”我告诉酒楼负责人：“你违反了中央的命令。”我执行中央命令，其他人做不到。只要我看到违令行为，我一定执行惩戒。作为地区的最高长官，我责无旁贷。酒楼付了罚款。

节约储蓄运动没有禁酒。我们什么酒都喝，白兰地，甚至香槟——都是海关

^① 甘丽初（1901—1950），广西容县人，黄埔一期。1938年任第六军军长，曾入缅作战。后任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抗战胜利后任广州行辕参谋长、广州绥靖公署参谋长、桂林绥靖公署副主任兼桂东军政长官。

^② 陈芝馨（1895—1938），保定六期步科毕业，历任粤军排连营团长。1928年1月再接任第四军二十六师师长。1936年8月任中央军校四分校中将主任兼高级军官教育班主任。1937年授陆军中将。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四分校迁往德庆县。11月6日在三水马口河面沉船遇难。

充公的走私货，当时法律禁止进口洋酒。我们要做的就是给海关付一笔钱。当然，我们也饮国产酒。

军队与民众合作极佳。例如，我从情报单位知悉日军正想进犯广州湾，这本在我们意料之中。我希望把三位当地名人安全转移。其中许爱周^①是当地缙绅，陈学谈和戴朝恩是“广州湾的杜月笙”，他们掌控了地方权力。没有这三个人，日本人休想在广州湾站住脚。这三人中，我仅见过陈学谈。我打电报给他，要求他们三人去柳州。陈没有来，他留在广州湾，秘密帮我搜集敌方情报；另两位遵命来了柳州，虽然他们从未见过我。反而有些认识我的人，往往会拒绝我的要求。



许爱周

1943年2月16日，敌军在雷州半岛登陆，攫取了广州湾，我们被完全封锁。我们依靠戴朝恩的部队收复雷州半岛与广州湾，他们在广州湾附近开展游击战。四战区在当地军事行动中与这些地方部队合作。

陈骏南负责的经济游击战指挥办公室的主要职责是，通过营造“气氛”、制造谣言来促成社会动乱与恐惧，以便破坏敌占区经济。具体做法是透过文字上的宣传，如标语、出版物等。

（据张发奎日记1943年4月16日记载）又一个俄国顾问团抵达柳州，团长是格里高列也夫，他是负责斯大林格勒西南部防御战的苏军师长。先前的苏联顾问团便离开了。

这时叶挺到桂林找我。^②发生新四军事件后，叶挺被送交赣南行政督察专员蒋经国，随后又被解送到陈诚的第六战区。由于粤军第一师的老关系，陈诚待叶挺很好，他没有把叶挺当作俘虏，让叶的小女儿陪伴他。但也仅限于如此。

蒋先生知道叶挺曾同我亲近——我从少年时代就认识他了，便把他交给我。我给他和他的家庭找了一处房屋，给他金钱与食米。^③我常常去看望叶挺与他的妻子。我给他行动自由，当然，他是被监视的。

^① 许爱周（1881—1966），原籍广州湾。小学毕业后跟从父亲学习经商，开创“福泰号”专营花生油等食品杂货，后来在吴川、赤坎、霞山及碇洲等地开设“仁和号”、“广宏泰”、“天元号”，以广州湾为基地，经销黄麻与蒜头，又在香港开设“广宏泰”，从香港进口外国货品。上世纪20年代开始经营地产，在赤坎填海取得大量土地，30年代进军酒店与商住物业，成为富豪；且成立顺昌航业公司，与外商竞争沿海与内河运输。抗战期间，以广州湾为基地经营大安、太平、泰丰、广利等航业公司，大量购买轮船，其商船远达东南亚各国，成为航运界巨子。1949年在香港设立仁兴矿务公司，1952年注册顺昌航业有限公司，1957年与关奋发、彭国珍等创立中建企业有限公司，购入皇后大道中前香港大酒店原址兴建中建大厦，随后又建亚细亚行，开始在香港发展地产业。他去世后，生意由长子歧伯、次子士芬、三子世勋继续经营。许士芬曾捐助香港大学推动地质研究，该校设立许爱周科学馆以纪念其父。

^② 1943年8月7日张发奎日记载：叶挺携带了一封陈诚亲笔函去见张发奎。

^③ 张发奎日记1943年8月7日记载：收到陈诚的信后，张发奎给了叶挺5000元和400斤米。

蒋先生在重庆同我谈及叶挺，要我用和善的方式劝说叶挺脱离共产党。后来我收到蒋先生来信，重复前述意愿。故我（于1943年9月28日）在我的桂林寓所与叶挺谈话。我向他出示蒋先生的信函，而他声称他根本不是共产党员。

我知道他在说谎，我猜想中共一定撤销了对他“留党察看”的处分，这意味着自动恢复他的中共党籍。我反驳道，新四军是共产党的部队，如果他不是中共党员，中共为什么会任命他为新四军军长？再者，如果他不是中共党员，那么西安事变发生后他怎么会向我表示有信心营救蒋先生脱险？他仍然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我说，他的副手项英已肯定是中共党员。这一点他承认。最后，我要他写一封信给蒋先生，表明自己并非中共党员。他拒绝了。我们吵了起来。他很固执，坚持自己在新四军不是承担责任的人。我向蒋先生报告：叶挺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却拒绝写信保证这一点。我已经尽了力，还能做什么呢？

10月3日，我要叶挺带着家眷去柳州，早先是他妻子来桂林会合的。他不肯，最后他独自去了。我给他安排一处房屋，常去探望他。虽然我没扣押他，但他总是埋怨我派人监视他。不久我就让他返回桂林了。我感到这样我所担负的责任就减轻些了。

不久之后，叶挺失踪了，他的妻子来找我太太和李济深。她还说他们饲养的羊被偷窃或失踪了。李济深与我调查了此案。我诘问宪兵第五团团团长刘炜（1907—1969，广东大埔人），他告诉我，宪兵部队已经奉命逮捕叶挺了，他告诉我整个故事：一天黄昏，便衣宪兵去偷羊，羊儿大声嘶叫，叶挺闻声出来察看，宪兵向他出示了宪兵团长下达的逮捕令。刘炜告诉我，他奉命秘密逮捕叶挺，把他送回陈诚那儿（据叶挺之子叶拯民所撰《我的父亲叶挺将军在华莹山》，叶挺于1943年12月25日被扣押）。刘说，叶挺要求允许他的小女儿来陪伴他，他很宠爱这个女儿。我说，他的请求可以批准。我通知了在桂林的叶挺妻子。^① 我不知道当时她是否已是共产党员，她与叶挺结婚时并非共产党员。

1941年杪，廖承志被捕了，蒋先生免他一死，因为他是廖仲恺的独生子。但是蒋先生软禁张学良是错的。起初他被幽禁在江西萍乡附近一个小地方，由一个宪兵排看守，不能会见任何人。^② 有一次，管理这的一个宪兵排的高参告诉我，情况是可悲的。此人携带全家陪伴张学良，他甚至找不到一所学校送儿



廖承志

^① 据张发奎日记1944年2月1日记载，张当日看望了叶挺的妻子，告诉她最新的消息：叶挺在湖北恩施。四战区长官部要求蒋先生发一笔钱救济叶挺的家眷。另外，长官部给了叶家一万元钱，并要求第五宪兵团团长刘炜好生照顾叶挺全家。

^② 此处张发奎误信谣谚。张学良被软禁期间，可以会见各种性质的友人，甚至同周恩来互通函件。

子上学，因为关押地点太偏僻了。^①后来张学良转解到贵州省息烽郊外一处僻静地点。

长官部的机要部门于1943年1月6日被撤销了，机要处处长华岳高辞职。这个部门原来是为安置他才设立的，所以不需要再维持下去；机要处的人员便并入我的工作人中。

1943年春，政治部副主任侯志明接替梁华盛任政治部主任。政工人员训练班设立，它持续了一两个星期。我和高级将领都向学员训话，强调要加强精神训练。^②我感到政工人员不懂军队政治工作，觉得他们的工作是毫无价值的，他们工作并不认真，傲慢自大，好像1929年流行的不良风气重新出现了。

我从没感觉到自己被监视，我不认为中央要监视我。我为人一贯光明磊落，蒋先生了解我。

1943年10月，我被指令兼桂林步兵训练中心（设在桂林的军委会干训团与驻华美军合作，接受美式配备，用轮带式教育法准备反攻）副主任，蒋先生兼任一职，罗卓英任教育长，实际上由美国人托马斯·阿姆斯将军负责。阿姆斯将军嗜饮，有一次我们两人外出痛饮，用英语交谈。我饮了酒就很兴奋。他是我深交的第一个美国人，也是同我专业对口的第一个美国人。当时美国人在中央都充当指导的角色。^③

白崇禧常常去中枢，故我们也常从他那儿收到指示。在桂林干训团受训的学员大多数是来自第三、四、六、七、九战区的中层军事干部，训练完全是技术性的。受训学员分成两个部分专攻机关枪等课程。

我觉得步兵训练中心很不错，有效率。第一，由美国顾问教我们使用现代化武器；第二，提高我们的士气。受训军官回部队后对抗战前途更有信心。他们很乐意来受训，因为在此学会许多军事技能。此外，在受训期间，虽然气氛有点紧张，但是他们能享受良好的生活待遇。

只要我有空，就会去干训团，有时还留在那儿，每一届六周的课程我至少要

① 此人名叫刘乙光（1903—1982），湖南永兴人，黄埔四期政治科、中央警校特训班毕业。1926年加入中共，翌年4月脱离中共，1928年春任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军训队长，1930年任中央政校第一期教官。1931年任政工队队长、指导员、政训室主任、复兴社特务组组长、临沅特训班中队长。1936年起任军统局直属的张学良管理处中校主任，连任13年。1948年授陆军少将衔。1949年去台湾。他携带全家守护张学良25年，至1962年才交棒。张学良被软禁后，初由励志社招待，每日吃100多元的西餐，顿饭成席；到雪窦寺有专用小汽车、白马、轿子，任其驰骋山野、登山观景；配备了专职的按摩医师。离开黄山去萍乡时，征用公路局客车8辆，拉夫15人。在凤凰山时配备了专用厨师2人，又雇人专为他划船垂钓。在贵阳期间每月有一卡车供应品从重庆运来。在新竹清泉时，省府每月拨25万元招待张，每四日买半只猪，鸡鱼都是整箩筐地买。

② 据张发奎1943年10月13日日记，张向政工人员训练班讲话，指出过去的政治工作难于进步是因为部队长与政工人员本身的缺点。

③ 美国人查尔斯·罗曼纳所著《史迪威的指挥问题》一书披露，有107个美国军官与71个美国士兵在国民政府服务。早先，张发奎只是与美国人偶尔有所接触，例如美国大使馆武官偕何世礼于1940年3月2日与4日拜访张。1941年12月1日，欧文·拉铁摩尔（1941—1942年美国国务院派往蒋身边的特别顾问，此人亲苏亲共）与张发奎会谈等等。

出席三分之一时间。有时我会作精神讲话，有时也学些东西。常去那儿是因为我对军事训练感兴趣。我的战区，大多数时间是平静的。另外，我想同其他战区来的军官多作接触。军官们是常有调动的，其他战区的军官很可能有朝一日会调到四战区。通过频密的接触，我可以增进互相了解与彼此感情。

我在干训班从不表露个人观点（见1944年3月6日日记），我不爱出风头，从来不向中央承担具体责任。罗卓英是负实际责任的中国军官，我的高参之一周雁宾担任我的译员，并负责我与训练中心之间的联络工作。

将官们——师长、军长，高参们被派到印度兰加受训。我知道军官们被派去美式训练营，因为由我经管这件事。许多四战区的高级军官都要求去兰加，他们乐意去。

我同美国空军有一定的协作关系。我派士兵去守卫四战区内的机场与飞机。省政府与曾养甫的交通部负责机场建设。我认识许多美国空军将领。第六十八混合编队指挥官克林顿·文森特将军极嗜杯中物。

我的战区没有收到任何美式装备，我们知道美国装备是十分精良的。【蒋先生在分配俄制与美制军需品上表现得自私，大部分分配给由黄埔毕业生统率的中央嫡系部队。】我没有向中央要求美国军需品，我觉得不必去要求，既然一点也不给我，总有它的理由。我的部队得到一些美国医药用品，但数量不多。

我运用四战区的箴言“公诚廉毅”去鼓舞四战区下属的士气，这也是我为战前（由张天爵）开办的志锐中学选择的座右铭。张天爵是华侨，原籍四邑开平，这是第四军军官张德能的家乡。张天爵尊崇第四军，亟欲为1928年在粤东五华潭下马鞍山中弹阵亡的第二十六师许志锐师长建立纪念物，于是他为四邑乡亲子弟在广州收购了一所中学，改名为“志锐中学”，内也附设小学。他从美国、菲律宾及其他地区华侨中募集捐款，第四军官兵的子弟入学免收学费。

当日军威胁广州时，张天爵率领志锐中学教师与四邑学生转移到开平，最后去了始兴。他向我请示，我告诉他，可以在韶关重建学校，那儿也正好是许志锐的故乡。我们拟定了建校计划。然后，学生回到了家乡。我出任校董会名誉董事长^①，我从李汉魂太太办的广州儿童教养院挑选了八十名优秀儿童作为新校的核心成员。原先李汉魂太太想调拨给我八十个孩子，但我坚持自己挑选。

有些民众送子女来志锐学校，学生总数达到二三百人。我的养女琼芳，侄女玉芳（贵斌的女儿）都在该校上学。有些学生来自富裕家庭。这是一座非常有名的学校，我聘请了一流的教师。我从海外华侨募款，这就使校舍成功地重建于韶关。1941年7月，志锐中学暂时迁到柳州大桥四战区干训团所在地，我领养的孩子威立与丽芳也入学了。1942年1月，学校搬到韶关的新建校舍，但是有些广西当地的学生留下了。李汉魂能在韶关就地照顾这个学校。

^① 董事长为当时的第四军军长欧震，副董事长为李汉魂与吴奇伟。当时临时筹集了5万元法币充作开办费，每月从第四军公积金中拨5000元作日常零用开支。志锐中学高、初中共322名学生，其中有20多名系烈士遗孤。

1943年1月日机轰炸志锐小学，琼芳受了伤。在柳州一家军医院动手术后，到贵阳继续她的学业。后来志锐中学又搬到我的故乡清化乡。

（据张发奎1943年12月1日日记记载）我很为六十四军担忧。中央派了一个粤籍人士到六十四军当师长，邓龙光自然忧心忡忡，他不喜欢见到中央安插军官入六十四军，他要我想个办法。我向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林蔚解释道：中央派人来就成了陌生人，最好是派一位与六十四军有渊源的人来。林蔚告诉蒋先生，他接受了我的提议。我推荐四战区干训团教育长张显岐，他做过六十四军参谋长。

我在柳州的岁月中，未能见到广西与中央的关系得到改善，然而体制上有些改变，譬如民团得到整编，但是中央连半个人都安插不到广西！人事牢牢控制在桂系首领的手中，甚至连陈立夫都不敢渗入广西的国民党。我从没把自己视为中央的代表，争取广西靠近中央。广西与中央之间的联络员是白崇禧，故不需要我厕身其间。蒋先生要我去广西是由于我同桂系的历史关系，他认为我同广西比较亲近。事实当然不是如此。

（据专门在敌后从事破坏活动的特种部队的美国准将麦可·林赛1944年7月31日致史迪威将军的电报）我加入了李济深、余汉谋、薛岳、龙云等在四川的异议集团，协议一旦同重庆的联络被切断时，便在华东成立一个以李济深为首的自治政府，我们花了不少时间讨论过一个计划：倘若敌人切断我们同重庆的联络，为了军事利益的便利，在东南设立一个党政军联合机构——不是政府。如果发生这样的事，在东南由顾祝同、余汉谋、薛岳与我指挥的部队需要这样的机构，我们公开讨论设立这个机构，白崇禧也参加了讨论。在上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我们讨论了这一议题。这一机构隶属于重庆政府，可是我们期望在缺乏联络的情况下重庆不要插手控制。我们都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我们离重庆太远了。我知道这个计划已呈交蒋先生，但他认为不必予以执行。

如果设立这样的机构，考虑到资历，白崇禧或李济深要担负领导责任，其他人甚难胜任。可是人们也不能断言李济深想利用这一计划推翻蒋先生，因为谁也不能确定李会主宰这一机构。此外，我相信，即使他负责这一机构，其成员也不会盲目跟随他反蒋。因为除了李济深，其他人并不反蒋，连李济深本人也不公开反蒋。

【至于薛岳与我，确实公开对中央分配美国军事援助物资的不公表示不满。蒋先生一定知道我们公开发牢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反蒋，不满并不必然意味着我们是反蒋的。】

我记得在桂林行营被撤销后，李济深被任命为军委会军事参议院院长^①，我规劝他赴重庆就任新职，他不肯去，滞留在桂林。我知道他有一个计划——从与他谈话以及他对蒋先生的埋怨知悉。他同蔡廷锴、黄琪翔、张炎、陈铭枢等粤籍将领过从甚密，我不知道他与非粤籍将领的接触，他们秘密成立了一个组织。李

^① 1944年3月9日，桂林广东同乡会举行了欢送会。

济深没同我谈及有关组织的任何事，但他企图试探我。我不表态，也许他以为我并不反蒋。

李济深同共产党的关系颇好，他与周恩来联系频密，关系热络；当叶挺在桂林时，他同叶保持十分友好的关系。李还同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等左翼文化人士亲近。那时许多左倾知识分子居住在我的战区。中央知道李济深左倾，那就是桂林办公厅被撤销的原因。

战时我去过重庆七八次，每次都是接到重庆电报才动身的。有几次是出席国民党中央全会，但无权投票。我是中央监察委员，通常是开完中央执委会议才开监委会议。有时蒋先生特别邀请我去重庆，但我从来不逗留太久，多则十天八天，少则三四天。通常我只带一名副官或者随从参谋。在重庆我常住在曾养甫家里。一天，我们去视察盐田，座车在城郊一座桥附近发生故障。村民们听我们讲客家话，便自动前来帮我们推车，原来他们也是客家人。

当时许多人都在重庆，譬如唐生智。中央对他很冷淡，大概是因为他派了他的弟弟唐生明去参加汪伪政权^①。中央对陈铭枢的态度更差，不给他什么职务，蒋先生恨他。倘若他不掀起闽变反蒋，现时他的地位一定会很高。陈济棠也在重庆，他在广东主政未下台前，从意大利订购了一批军火，后来他吩咐军火商暂时不要付运。抗战爆发后，他要军火商发货，将此献给政府，所以政府对他甚好，他被任命为农林部部长（1940—1942）。^② 冯玉祥也在重庆。他送我一只金表，上面镌刻着我的姓名；他写了许多私函给我，似乎希望我展出这些信。

在重庆我出席过道社的会议，会开得频密，时每月开两三次会，该社的成员在重庆十分活跃。在顶峰时期道社有大约四十人。^③ 王伯群^④、杜月笙、钱永铭

① 唐生明是戴笠派到沦陷区去诈降的，行前蒋介石当面赠予1万元特别费，当时约值黄金20两。唐生明去上海后，重庆方面假戏真做，对他发布通缉令，还让其兄唐生智在重庆《中央日报》连登十日“脱离兄弟关系”启事。唐生明利用旧日与汪精卫、陈公博、李士群、周佛海、梅思平等汪伪大头目的关系，保释营救被俘地下工作人员、暗中策反汪伪军政头目，还窃取日军机密情报，导致100多艘日舰在琉球群岛覆灭。

② 这笔军火与机器的订单价值200多万元，是陈济棠在欧洲考察时慷慨解囊的，另又赠蒋介石1000万光洋，借祝寿表示修好之意。当年全国在“献机祝寿运动”中共捐献665万余元，陈济棠一人之捐献竟超过全国寿礼款总数的80%。途经意大利时，陈济棠请中国驻意大利大使刘文岛以700万港元向意大利洽购飞机，以供抗日之用；获悉上海“八一三”抗战消息后，又给李扬敬拨去港币15万元，作为接济上海粤籍同胞返回穗、港之船票费用。

③ 1941年，道社成员致函张发奎祝贺新年并表示他们寄望张在新的一年里取得胜利。信件由许世英、王正廷、屈映光（北洋政府内务总长）、钱永铭（交通银行董事长）、吴蕴初（天厨味精董事长）、马德骥（海军少将）、董显光、王德昭、樊光（财政部参事）、张恩隍（交通银行秘书、铁道部总务司长）、朱兆阳、浦志栋、楼兆元（叙昆川滇铁路党部主委）、李绶、李晋（中央救济准备金保管委员会常委）等签署，夹在李晋1941年春寄给张发奎的信中。

④ 王伯群（1885—1944），贵州义兴人。1905年赴日，加入同盟会。1914年回贵州策动其弟王文华（黔军左翼司令）反袁独立。1920年任广州护法军政府交通部长。1924年在上海创办大夏大学。1928年后历任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兼招商局督办、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等要职。抗战爆发后，大夏大学迁贵阳。1944年12月20日病逝重庆。其妹王文湘嫁何应钦。弟王文华官至黔军总司令、孙中山大元帅府军事委员会委员，1921年3月16日在上海一品香旅社被贵州军阀刘显世派刺客暗杀。

是最活跃者，会员涵盖不同领域，许多是实业家。^①

有时我们在孔祥熙家开会，孔祥熙通过王伯群加入了道社。蒋先生信任孔，让他接长行政院（1938—1939任院长；1933—1937年，1939—1944年任副院长）。我们推动孔祥熙，让他推动蒋先生，即我们希望通过孔祥熙取得蒋先生的信任，以便推行我们的实业计划；希望通过孔祥熙取得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力。例如，当我们想掌控财政部盐务署时，就同孔商量。我们的社员之一——缪秋杰得到了盐务署署长一职。我想，董显光被任命为行政院新闻局局长就是因为孔祥熙向蒋先生推荐的。



孔祥熙

王伯群是上海大夏大学的发起人与董事长，许多道社成员，包括我本人，都是该校董事会成员。王伯群有清醒的政治头脑，他的妹妹是何应钦的夫人，但是何应钦没有加入道社。他怕蒋先生愠怒。

^① 根据近年解密的“二战”时期日本军政档案披露，张发奎、卢汉等国军高级将领加入道社均由日本军方背后策划。多次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驻美大使的外交界元老王正廷是道社名义上的理事长，而发起人、铁道部财务司长张竞立负责该社日常事务。核心人物是著名银行家钱永铭，他是可以常与蒋介石说得上话而又行事低调的人物。张竞立，浙江人，东京高等商业专科学校毕业，长期在北洋政府铁道、交通部门任职，因而与满铁株式会社有所渊源。他是红帮前辈，徒弟极多，同日本政要犬养健、重光葵以及满铁株式会社总裁松冈洋佑颇有交情，1929年建立道社，竭力拉拢国民党党政军要人、金融名人、实业家、沪上闻人、帮会大亨入社，旨在鼓吹中日亲善、促进中日经济合作，撮合驻日大使许世英、孙中山之子孙科以及财阀王伯群、孔祥熙入社都是出于此一动机。1927年12月，张发奎赴日本休养时，日方军务局局长松井石根中将出面宴请张，又安排他参观日本陆军大学与陆海军士官学校，让张参观在横滨郊外举行的军事演习，均带有炫耀武力之目的。张发奎在东京中华会馆结识张竞立，一见如故，1936年由张竞立介绍加入道社。1939年底，日方曾派密使去粤北韶关游说张发奎支持已从重庆出逃的汪精卫，被张发奎怒斥撵走。同年冬，张竞立辞去战时财委会副秘书长职务，赴香港安排了军统人员冒充宋子文弟弟宋子良与日方代表的“摸底”谈判，翌年又安排钱永铭秘密访日。此时张竞立的老友、满铁总裁松冈洋佑已出任日本外相。由于日本军方黷武派阻挠，钱永铭斡旋和平受挫，日本宣称承认汪伪政府，不再视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为和谈对手。1941年4月13日，松冈外相与斯大林签署《日苏中立友好协定》，致使张竞立、钱永铭的和平努力付诸东流，道社自此陷于低潮。1942年4月17日，王正廷的儿子王慕玮在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馆秘书任上被日军残杀（事见胡志伟所著《外交界抗日九烈士殉难纪实》，刊台北《传记文学》1995年3月号），王正廷怒不可遏，转而坚决抗日。张竞立知事不可为，遂停止为中日和平而奔走。张发奎终其一生都不知晓道社的亲日背景与满铁株式会社的背后操纵，只以为道社是政经要人喝酒交际拓展生意的高级会社。

第十四章 四战区与越南

(1940年至1944年)

1940年初我移驻广西时，在广西与印度支那边境上采取了一些战备措施。边界由大约三十个碉堡防守，那是清朝留下的，大炮也是那个年代的。我委派了几个要塞指挥官，每人负责几个碉堡。所有的要塞都归龙州边境防卫部指挥。要塞指挥官由中央任命，负责广西与印支边界地区的外交与军事事务，也负责维系安全与秩序的边境警务，采取反走私行动等等。然而，他们不负当地的行政责任，由龙州专员负行政责任。

我没有派遣正规部队进驻龙州地区，当地仅驻有地方民团。对我有关加强龙州与镇南关地区防务的建议，中央既未拨付经费也未增加装备，故我无能为力。

1940年6月，法国本土落入纳粹德国手中，敌人马上向我们施压，欲以和谈来结束我们的抵抗。^①当敌军逼近龙州时^②，为什么我派兵去靖西与德保防卫滇桂边界与滇缅公路^③而忽略龙州地区？由于敌军已占领南宁，龙州对我们已经不重要了，经过印度支那的供应线已经无望，我们就不必再派兵去防卫不重要的地区了。一旦敌军占领龙州，我们将完全失去那一地区的城镇。此外，把供应品运到龙州要遭遇巨大的困难，要从靖西启运。从龙州出发，我们终究没有一条出路，唯一的退路——越南已被日军占领。

1940年7月2日，敌军轻易攻占龙州。由于兵力不够，我们没有作出多大抵抗。当时中国对越南作出了“积极备战”措施^④：我命令准备食米、医药、通讯与运输设备，简言之，准备进军越南。

如此整军备战，是由最高统帅部下令。我当然赞成中央的命令——出国打仗总是一种荣耀。如果最高统帅部给我足够的部队，我计划率领至少三个军进击越

① 1940年6月13日，法国政府宣布巴黎成为不设防的城市，6月23日宣布与德国签署停战协议。同一日，张发奎在其日记中记述，敌人乘盟军败绩之机，染指上海租界，轰炸香港新界与广东交界的深圳，借此威胁港英当局。敌人还胁迫法国禁止战时物资经越南运入中国。他写道，听说法国政府已完全接受了日本的要求。张援引了印度支那总督凯特鲁斯6月20日下达海关的指令：禁止中国货物经过印度支那——主要是经由滇越铁路运往中国。法方还同意将中越边界的控制权交给日方。此一协议签订于6月25日。张发奎6月25日日记说，敌军明显欲利用欧洲局势的骤变来结束战争。

② 张发奎6月2日日记说，七千多日军正逼近龙州。

③ 张发奎1940年6月28日日记说，张奉命派遣五十四军与第六军去靖西和德保。

④ 6月24日，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为法国停止中越运输提出抗议。7月7日张发奎日记说，除了抗议，中国正在向印支方面敌军积极备战。

南，主力夺回龙州后挺进谅山，右翼以一个军从靖西向高平进军作为牵制。这一计划是假定云南派一支小部队牵制滇越铁路沿线的敌人，防止他们集中兵力增援。^① 我们的军事计划着重龙州，因为龙州对面的谅山具有一流的交通设施连接河内、海防以及越南其他重要城市。我们计划直捣东京此“东京”（法国殖民者口中的河内，而非日本东京）湾的海防。我们的目的是从法国殖民统治下解放越南人民。我很同情他们，想帮助他们一个弱小民族——反抗殖民统治，这完全符合孙总理的遗训。此外，我回顾早在1930年至1931年的冬季，如果我有机会，早就帮助印度支那人民反抗法国人了。诚然，我们进入越南也意味着捍卫我们自己的边界，必须保卫经由越缅的国际供应线。

李济深的军委会桂林办公厅对人越问题^②没做什么，它既未筹款也未为进军越南谋划。李济深只是同我讨论过越南问题。

我没有就有关进军越南的计划同印度支那法国当局的代表作过任何接触，法国人反对我们进入越南^③。在中法之间根本不存在合作。中央没有指示我对法国采取任何行动。我也不清楚中央的对法政策。在越南问题上，除了最高统帅部，我并没有同中央的其他机关接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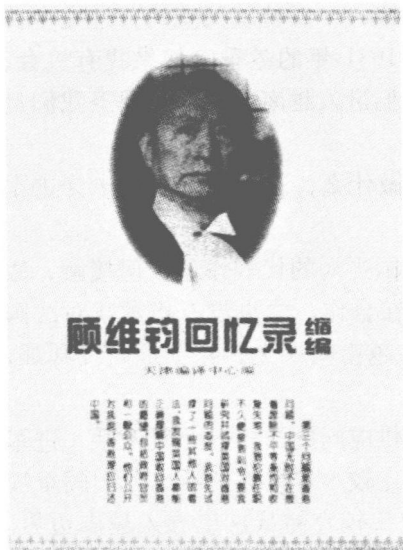
在我们进军越南方面，我遇到的主要困难是供应问题，食米尤其棘手。进军越南边境地区，最为重要的是靖西地区，因为它比较难于接近，所以我们颇重视该地区的补给问题；其次，靖西没有沦陷，那就比较容易从这里渗入越南边界。当然，如果国军要进入，我们需要越南人民的支持。

① 黄旭初的回忆录也有类似叙述：1940年7月18日，英日签订协议关闭滇缅公路三个月，中国计划派遣陈烈的五十四军与关麟征的第九集团军从云南进入越南恢复国际运输线。他说，蒋介石致电李济深、林蔚、张发奎、黄旭初敦促制订计划为五十四军进军越南筹募经费。

② 法国沦陷后，武元甲、范文同、高洪岭以越南解放联盟成员身份在桂林接触过李济深。李告诉他们，盟军计划进军印度支那，要求他们协助中国军队进入越南。当他们将此事报告胡志明时，后者表示：蒋介石的军队基本上是反动的，只有苏联红军与中国红军才是真正的盟军。在交换意见后，胡志明主张他们回到中越边区去活动。早先，1940年6月，胡志明已经要他们去延安。这一行人刚抵达贵阳，胡志明就通知他们中止延安之旅，因为法军被德军击溃了。这是武元甲所著《胡志明——越南革命之父》一书所披露的情节，此文是武元甲口述的，1962年由河内外文出版社出版后译成中文。1938年，胡志明从莫斯科来到中国，从西安到延安，加入了八路军。不久，他加入了叶剑英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去衡阳，任教于政府军的游击训练班。胡志明在这个顾问团负责党务工作。后来，他去了柳州与桂林。1940年2月，返回延安。显然，在加入这个军事顾问团之前，胡志明到过重庆。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教授何廉（1895—1975，湖南邵阳人，留美经济学博士。1936年后历任行政院政务处长、经济部次长兼农本局局长、中央设计局副局长、联合国社会经济及人口两委员会中国代表。1948年任南开大学代理校长。1949年赴美，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及东亚研究所教授。著有《财政学》、《所得税比较论》等）于1970年6月17日告诉夏莲瑛，1938年至1939年他在重庆化龙桥红岩村周恩来住所见过胡志明两次。当时何廉是经济部次长。他与周恩来很熟。一天，他去看望周恩来，此时一位年长、看上去有病容的人进来，穿着中山装。周恩来向何廉介绍：“这是胡同志。”第二次，何廉到达时，胡志明已经在场，何廉问周恩来这位是谁，周说：“印度支那的胡同志。”几年后，何廉问陈诚“胡同志”是谁。陈诚说，他就是胡志明，一直由张发奎庇护。

③ 在那一时期，法国确实没有决定对策。中国驻法国大使顾维钧1940年6月4日拜会法国政府新任殖民部长路易斯·罗兰，称刚收到国防最高委员会蒋委员长电报，指示他接触法国政府，咨商后者是否愿意同中国政府合作采取措施保卫印度支那。如果可以，中国政府准备在人力与物资方面尽其所能作出援助（这是中国政府15个月内第三次提议）。

在要求张佩公在制订有关越南的计划时要组织仁人志士加强情报工作之前，我从未未见过他。^①那时我一个人也不认识。我知道他是一个反法革命家，越南河东人，是保定军校毕业生。他同我说广东话，穿中国军服。那时有一批越南、朝鲜军人在国军服务。张在南宁军校服务，可是我想不起那时他干什么职务了。我告诉他，要团结一批越南人唤起民众反抗法国殖民主义者。



《顾维钧回忆录》封面

我没有同胡学览^②接触过，我记得中央要我同张佩公和胡学览接触，但后者没有来。至少，我没见到他。我知道他在桂林，他也是保定军校毕业生。张佩公告诉我，胡常常生病。我对他的政治背景没有什么印象。杨清文断言，胡与张是超党派人士，胡在桂林办公厅情报局任上校参谋，他为人深沉、平和，头脑清醒，不像张佩公，活生生一个粗鲁的军人。张与胡是保定二期同学。越南共产党想从胡那儿得到情报，他的女儿胡安兰也是共产党员，他的女婿后来也成了重要的共产党员。杨清文是客家人，生于西贡。他于1926年加入国民党。1933年出任中国国民党越南党部执行委员兼执行秘书。1940年到中国，在四战区有关越南与越南人的活动中起了一个重要作用。

我也知道黄南鸿在广西省政府任职，但我没有要求他在越南问题上协助我。因为他在广西住了很久，我思忖他已归化成广西人了，我想他不可能对我有多大帮助。

我见到张佩公后，战区参谋部情报处派人去联络越南人。情报处是潘奋南负责的，他派遣李芝兴和吴多谦去河内。李芝兴是广府人，他后来娶了个越南华侨。吴多谦是越南华侨，原籍海南琼州，军校毕业生。除了河内，四战区还在高

^① 据张发奎1940年7月22日日记，张佩公已经到达柳州，从他那儿接受了指示。6月10日，顾维钧向法国外交部长保尔·博杜安重复这一提议。15日，他在南部波尔多再次向法国外交部秘书长夏尔·鲁克斯提出，那时法国政府已撤出巴黎。同时，中国外交部6月8日发电报通知顾维钧，已向在重庆的英、法大使提议军事与财政合作，也已致电驻美大使胡适接触美国政府。6月18日，博杜安劝告顾，在提出中法合作之前稍作等待。在《德法停战协定》签署后，顾再次提出中法军事合作问题，还提议在昆明举行中法会商，可是法方拒绝会谈。法国期望美国援助也落空了，因为美国在1940年夏奉行不卷入印度支那危机的政策。

^② 胡学览，越南清华人，保定军校毕业，曾在军委会参谋本部担任中校参谋。他是越南光复会与越南独立党的重要干部，虽然胡为蒋介石做事，但他确实在帮助越南革命者。无论国民党、共产党或其他人，只要反法他都帮助。1940年6月后，胡志明指示共产党人同胡合作。1966年9月23日，夏莲瑛在香港同时采访他与张发奎以及同年11月13日、1967年1月21日与10月9日单独访问他时，他提供了有价值的报告。

平与谅山设立了情报机关，秘密进行宣传工作，组织与训练越南人从事反帝斗争。情报部门还设立在边境地区。^①

最高统帅部没有正式拒绝我夺回龙州的建议^②，但不给我调派部队，故我什么也做不成。当然，中央的忧虑更多，譬如，法国对我们进兵越南的态度。

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9月19日报告，法国政府已屈从日本的要求。在法国允许日军假道印度支那进攻中国，允许日本使用港口、铁路、机场等设施进攻中国西南地区之后，中央仍没有下令四战区迅速对越南作出反应。^③

我还记得印度支那新任总督德古海军上将9月初没有提出过合作对抗日本的请求。^④继9月22日《法日协定》在河内签订，日军进入越南后，德古将军并

① 在一份1967年3月在香港为张发奎提供的资料中，李芝兴开列了四战区参谋部于1940年设立的机关。边境地区：（1）1940—1941年，靖西情报科由王一平负责，后被刘其武接替。（2）1940—1943年，龙州情报科由曾品武负责，后被叶世超接管。在越南：（1）高平情报科由李芝兴负责。（2）越南行动科由王辉负责到1943年，后由李芝兴奉命兼任此职。另外两个情报科于1941年成立：（1）谅山情报科由李芝兴兼，直至1942年并入高平情报科。（2）吴多谦负责的河内情报科。吴被日本人逮捕后，河内站1943—1944年由一位苏氏负责。

② 张发奎7月30日日记说，面对一触即发的战局，四战区必须夺回龙州，因此他再次向中央建议。他也指出，由于食米、副食供应困难以及气候恶劣，他同意改变部队的部署，进驻靖西与天保。他评述最高统帅部对军事行动的指示不如过去坚定。

③ 8月19日，顾维钧打电报给外交部，称他已收到明确的报告：法国政府训令它的驻日大使，同意让日本使用东京（河内）湾作为海军基地，利用东京地区作为进攻中国的陆军基地。次日，张发奎在日记中说，由于顾的报告，最高统帅部下令四战区迅速作好准备。可是，根据最新来自不同方面的情报，敌人尚未制订进军越南的确实计划。他也指出，由于财政匮乏及桂西缺粮，他担心，要完成四战区的进军越南计划是困难的。同时，顾大使也要求维希政府同意，它不会反对中国军队进入越南。1940年8月21日，顾向法国副总理赖伐尔提出这一议题，但赖伐尔说，这一议题不属于副总理职权之内。8月23日，他对博杜安说，倘若法国政府允许日军通过或进驻印度支那，中国军队将不得不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去面对局势。博杜安答复顾，如果由于法国与日本之间有了事先的协议，对日军进入印度支那不予抵抗，那么当然也不会对中国军队的进入加以抗拒。法国外长说，他要求中国政府发表一个声明，称：如果日本军队在印度支那登陆，中国将认为这是对中国安全的直接威胁，因此中国军队将立即进入印支，以便采取必要的自卫措施。他说，这样一个声明将有助于法国对日本的谈判。中国外长王宠惠因而发表了这样的声明。8月27日，顾对法国殖民部长赖默里说，如果日军经由印度支那入侵中国，中国政府有必要派军队进入印支抵抗日军。如果法国决定不抵抗，中国将单独抵抗日军。《法日协议》于8月31日在东京签订。张发奎是日之后日记说，有关越南的军事部署已经完全就绪。如果日军深入越南，中国的抗日战争一定会跨出中国边界，表明此战已具有世界大战性质，中国将战斗到日本停止南进。

④ 新任总督德古与广州的日本占领军西原将军的谈判也同时在河内举行。9月2日，中国驻河内总领事打电话给顾维钧说，德古将军告诉他，谈判已经破裂，日军将于9月5日发起进攻，德古要求中国合作。9月4日，中国外交部致顾维钧的电报确认印度支那已经要求中国军队从龙州边境进攻日军，并派出一个中国空军战斗机分遣队。于是日本人撤回了它的最后通牒，提议恢复会谈。9月5日，博杜安告诉顾，倘若日本军队未与法国达成协议即进兵印度支那，他们将遭到抵抗，在那种情况下，法国政府有可能成功地抗拒日军的非法进入，并有可能决定不要中国帮忙。他说，无论如何，法国政府需要保留决定是否要求中国帮助和合作的自由。顾说，他希望再次澄清，如果日军以任何借口侵入印度支那，中国政府希望保留派遣国军进入印支的行动自由。张发奎9月10日日记说，他收到蒋介石电报，包含有关越南的指示，但未记下指示的具体内容。

没有要求我提供援助^①。据我记忆，法国政府从未希望中国军队进入越南。^②

张发奎9月22日日记指出，日军七千多人进占同登，在那儿与法军激战。根据中央的命令，我们制订了进入越南抗击日军的计划。我们感觉日军已经泥足深陷于越南，我们组织越南人民，特别是法军中的越南士兵将日军牵制在越南，使它们无法侵入云南或广西。

几天以后我到接近越桂边境的靖西与其他地点作了巡视。^③我念念不忘已制订的进军越南计划。巡视这些地方是为了研究当地实况——人民的组织、军队的士气、训练等等。我访问了百色、靖西，密切注意黔桂公路，这是军事行动的生命线——中央将通过这条公路输送士兵与供应品到百色，再转运靖西与南宁。这次巡视，我还去了独山和贵阳。

1940年11月杪，敌军从龙州撤往印支后，我派了少量部队进驻龙州。我们知道，如果敌人从越南进攻我们，他们会从谅山发兵。我们宁可被打散也不愿被俘虏，少量的部队就拥有更大的机动性。靖西才是我们进击越南的最重要基地。

1940年12月16日至1941年1月2日，在巡视南宁与粤西南归来后，我在桂越边境的东兴设立了一个监察站。东兴隔一条小河面对着越南芒街。虽然名叫监察站，这个机关执行着情报任务。^④另外，我派黄亚盛^⑤去东兴负责联络东兴地区的越南人。黄是个文官、华侨，是原籍防城的客家人。抗战爆发后，他回到祖国，仍说越南话。我们希望同越南人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东兴并没有变为有关越南行动的重要基地，因为东兴在军事上并不重要。我们不能在这个地区部署大量军队，因为多山、人口稀少以及交通设施贫乏。再者，芒街不是重要的军事目标，即使我们攻占了它，由于交通不便，也不能直捣河内与海防。

四战区始终一贯计划对越南采取军事行动，特别在1940年11月30日四战

① 9月22日，日军从镇南关进入谅山，与德古军在同登打了一仗。后来，德古将军急忙要求中国驻河内总领事请中国军队进攻日军。这是蒋永敬所撰《胡志明在中国》一书所载的，此书引用了9月23日中国总领事向重庆所发电报的内容。

② 在9月22日与日本签订协议后，法国反对中国军队进入越南。9月23日，博杜安告诉顾维钧，德古终于在河内签署了协议，鉴于日本只派六千日军在海防登陆，不存在威胁中国的可能，因此他要求顾转告中国政府，不要派国军进入印度支那。他说，根据德古上将23日上午十点半发来的电报，协议内容如下：（一）允许几千个日军在海防登陆；（二）允许使用三个机场；（三）允许一师日军从广西进入越南经由海防撤走。顾根据政府的训令，当即向法国政府提出正式抗议，谴责法国政府与日本缔结一项准许日军在印支登陆以进攻中国的协定。

③ 1940年9月28日，张发奎离开龙州，去了河池、田东、百色、天保、靖西，再回到广西田东，然后去贵州省的独山与贵阳，10月11日回到柳州。10月4日在靖西接到日军入侵印度支那、法国驻军指挥官的态度、越南的总形势，特别是“法属印度支那惧日、对日妥协”等报告。见张发奎日记1940年9月28日至10月11日。

④ 据李芝兴说，王明聪奉命负责这个监察站。1942年潘奋南接替王明聪，后者奉调至设立在靖西的粤西南情报站。

⑤ 据杨清文说，黄亚盛曾在法军的一支地方部队服务过。

区扫清了敌氛之后，我们都对这一计划抱有很大兴趣。^①

张佩公征募越南特种部队成员。^② 特种部队官兵在张佩公协助下从四战区派遣到中越边境，由当地父老协助工作。他们一共征募了一百多人，其中多数是居住在边境地区的越南人。

越南别动营的补给方面，我向中央申请额外经费。^③ 在靖西训练几个月后，特种营的官兵跨过边界进入高平执行越南境内的情报工作与抗法、抗日活动。有些人被赶回中国领土，因为经常有进出边境的行动。日军不得不配备一部分兵力去对付他们，因此就减少了对我们的压力。

在这一阶段，我同张佩公的联系非常频密。但我并不知道越南共产党在他招募的部分青年中吸收党员，经训练后派遣到高平去。^④ 我不知道张佩公做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共产党同张的部属接触。说真的，即使我知道也没关系，我从不歧视越南共产党。对于越南人内部不同的政治派系我都一视同仁。我所想的就是越南革命成功。我对张佩公与印支共产党合作，设立越南解放联盟办公处的事情一无所知。^⑤

征募桂越边境战地政工队的成员由张佩公负责。^⑥ 我任命张佩公为这个战地服务队队长，由他征募中越两国的队员。经过训练后，队员们被派到边境地区从事政宣工作。他们并不越过边境进入越南。这个服务队的财政支持来自中央拨款。

① 1941年3月3日日记指出：当前四战区的唯一任务就是决定有关越南的军事计划。可是，最高统帅部尚未下达具体指示，四战区的建议还未被批准。1941年4月4日日记指出，张发奎在重庆同军政部次长刘斐讨论过四战区入越军事整备与粤西南的海湾防御。4月26日、5月1日日记也谈及入越准备。5月8日日记说，张收到蒋介石手令即召集参谋会议传达，还下令迅速加强越南与海湾地区的情报工作。

② 1940年10月13日，张发奎在柳州向特种部队官兵训话。

③ 从长官部1941年预算中可知，特种部队那时扩充为别动营，每月经费为15207.4元。

④ 武英断言张佩公同胡学览讨论过计划，后者报告共产党说，重回越南的时机已成熟。他们转报胡志明，胡同意抓住时机返回越南。武英等人会晤张后，报告胡志明说张是蒋介石的特务，胡志明要他们与张一刀两断，但是仍同胡学览合作。在1940年10月会议后，共产党决定恢复越南独立同盟会，胡学览成为主席。“越盟”已在中国政府登记注册，而且胡学览当时在李济深主持的军委会桂林办公厅第二局任上校参谋。胡志明也要求武元甲、高洪岭和武英去接触张佩公征募的青年。武元甲、高洪岭与武英于1940年11月抵达靖西，同他们取得了联系。胡志明主张设立训练班以吸收张部下的青年人。武元甲等吸纳了40个青年，包括黎广波、黄森和彭江。训练班在依族聚居地区建立了。经训练后，这40个青年回到了高平。胡志明与2名印支共产党员于1941年1月返回了北坡。

⑤ 不顾胡志明同张佩公断绝关系的指示，武元甲、高洪岭、武英想利用张佩公以及他的组织来推动越共自己在边界地区的活动。因此，他们接触张佩公并在靖西设立了越南解放联盟办公处。武元甲等人也同国民党保持联络。1942年4月12日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在靖西正式成立。它包括印度支那共产党、越南民主党和越南独立联盟的成员。杨清文断言，张佩公组织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是为了扩张他自己的影响力。中国政府并不知晓这个联盟的成立。

⑥ 1941年4月27日，张发奎在柳州向桂越边境战地政工队训话，其多数成员是中国人。张同他们个别谈话以确定他们是否胜任。杨清文说，这个政工队有一百多名官兵，皆未受过特别训练。他们被称为“第一边境战地政工队”或“四战区中越战地政工队”。一位重要的越盟领袖黄文欢使用化名李光华加入了战地政工队，担任中校译员。1942年他陪伴政工队到靖西，从那儿潜赴越南。

关于张佩公案，^①我只记得下令逮捕张，但已忘了该案的案情。我记得的是，一开始我就对这些越南人头疼，他们常常惹麻烦。张不久就获释了。唐英也许是张佩公被捕的原因。^②在那个时期，我们并不反共，遑论国际共产党了。

我从未下令逮捕在广西的越共或越盟成员，^③也不知道在四战区是否发生过这一类的逮捕。因为军统局可以不知会我，而在四战区执行秘密逮捕。

关于越南民族复国军进入广西，^④我收到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的电报，说大批越南人进入广西，请指示对策；夏威（十六集团军总司令）也报告越南人入境，请示处置办法。我命令他们不要伤害越南人，虽然根据国际法，他们必须被解除武装遣返交还法国当局。有大约一千越南人跟随民族复国军进入广西，有些从高平进入广西，其他人从谅山。他们集结于凭祥。我命令将他们迁移到左江流域的绥罗与扶南，同时向中央报告。他们中有五百多人带枪，但他们的步枪没用，因为这些枪是法国制造的，我们不能供给他们合用的法制弹药。

对民族复国军，我只知道，他们受到法帝与日帝的双重压迫，他们走投无路，于是来了广西。我不想详细讯问他们，因我十分同情他们，感到他们应该得到解放，我对他们深具信心。当法国人要求我遣返这批越南人时，我绝对否认广西出现越南人非法入境。法方向国府提交抗议，中央认可我的报告，同样否认越南人的踪迹。我的战区涵盖很宽广的地域，法国人没法找到他们。

农经猷、黄良以及其他民族复国军领袖来到柳州。我被告知，农经猷是个富有的地主，六十多岁了。他曾经资助复国军，并携带全家随军越境来到中国，其他人是单身来的。农经猷与黄良会讲中国话。我并不了解复国军内的不同派系^⑤。

这一群越南人中间有工程技术人员，有些是妇女。这批越南人的教育程度是比较高的，都会讲法语，许多是革命干部，其中有些人刚从越南的监狱中释放。我善待民族复国军，供应他们食宿。所需经费由我向中央请示拨款。

^① 1941年4月30日，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正式成立不久，张发奎下令紧急查处“张佩公案”。次日召集参谋会议，讨论了有关越南战事的准备以及处理张佩公案的原则。

^② 据杨清文说，张佩公指定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平孟居民华人唐英为分区指挥官。唐英利用越南革命的名义从事各种邪恶勾当。当地政府报告了省政府，再转报四战区长官部。四战区监察科科长杨继荣奉命调查该案，于是唐英被监察科逮捕。接着，四战区政治部派部里一名不熟悉越南形势的科长吴铿华接任边境战地政工队队长职务。由于吴的背景，政工队有时被称为“政治部战地政工队”。

^③ 据武元甲回忆，阮海臣去靖西，向国民党举报武元甲和范文同是共产党。当地的国民党遂改变了态度。武英则回忆说，胡志明提醒他，蒋介石等人假装友好，正想方设法把越南共产党干部一网打尽。

^④ 民族复国军是在法日激战谅山时，由亲日的越南复国联盟领袖阮强梯组建，由陈中立与黄良领导。在日军支持下，复国军打起“反法”的旗号进攻法军，吸引当地青年加入。在1940年杪，法、日军曾联合“清剿”游击基地。陈中立领导的民族复国军拥有三千官兵，其中包括法军内的越籍逃兵，他们遭受法军进攻。陈于12月杪被法军俘获处死。此后黄良领导一千多个越南人进入广西。

^⑤ 复国军进入广西后，分成三个派系，分别由黄良、吴革和农经猷领导。杨清文回忆说，吴革是谅山的华侨，一个粗人，曾在中国当过低级军官。由于越南人中间缺乏合适的人才，当时吴革负责复兴军的军事。黄良负责政治事务。

民族复国军在左江流域滞留几个月后，我要他们去柳州。^①我在四战区大桥干训团下设立一个特训班，专门训练五百多名民族复国军成员。年长的成员如农经猷没有参加特训班，但他们也留在大桥。后来我让他们迁到侨乐村，那儿有一排住屋，是许爱周他们丢空的，我拨出来给越南人住。那儿离我的长官部只有五分钟路程。

特训班提供政治与军事训练。^②政治训练着重民族解放，主要口号是“打倒法帝国主义”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向越南人灌输三民主义，但没有要求他们献身于三民主义。在私下交谈中，他们称赞三民主义与国民党。军事训练着重普通的术科。我设立干训班训练越南干部，旨在让他们协助“华军人越计划”，可以说，越南人能为我们的抗日战争服务。然而，我的主要动机是帮助他们取得民族独立。

军事教官由四战区干训团提供，政治教官由四战区政治部提供。特训班经费由中央拨付。我一次又一次向特训班训话，由于多数人不学中文，讲话由翻译复述。当然他们中间会讲粤语的比会讲国语的多，也许由于他们较多接近越南华侨。当时找一个越语翻译殊不容易，我们只好寻找华侨充任此职。有时杨清文随我外出充任译员。他是客家人，越南华侨。大约在此时抵达柳州，其职位相当于中校。我要求重庆来的客人为特训班讲课。^③于斌主教到四战区慰劳将士时，谈及越南人，我建议他讲几句话，他用法语演讲。慰劳团的成员给越南人注射防疫针。

1941年8月1日，四战区设立靖西指挥所，由于边境离开柳州太远，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感到有必要在靖西设立指挥所。那当然需要钱。我们向中央请款，中央批准了，我派陈宝仓去靖西负责。我感到，把他调离长官部是个好主意，因为他最近降了职。我配置一个师与三十一军军部驻扎在靖西，隶属陈宝仓管辖。可以说，设立靖西指挥所意味着“华军人越计划”具体整备的启动。

指挥所的情报机关同四战区参谋部情报处并没有互相配合。设立靖西指挥所以后，越南别动营——号称“前进特遣队”或“前进纵队”——便隶属于陈宝仓了。别动营不久就解散了。陈宝仓告诉我，它的内部情况太复杂，但他未谈到共产党。我也派了第一边境战地政工队去靖西，隶属于陈宝仓。

军统局在人越计划方面曾与我的长官部配合。一个肥胖的越南华侨、琼州籍

^① 1941年9月10日，在大桥的四战区干训团举行了柳州人民欢迎越南革命同志大会。张发奎在罗文干（1888—1941，广东番禺人，牛津大学法律硕士。回国后曾任清廷广东审判厅厅长。1912年后历任北洋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大理院院长、财政总长等。1929年任调查中东路事件专员。1931年任国府司法行政部部长。1932年兼外交部长。1938年任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西南联大教授。1941年10月病逝广东乐昌）与田汉陪同下出席了这一大会。

^② 杨清文说，张发奎任命杜从戎负责特训班，杜是湖南人，黄埔一期，后来被曾天节接替。

^③ 1942年2月9日张发奎日记说：1941年11月2日，他邀请白崇禧与黎会南向特训班讲话。1942年2月27日夏威刚就任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即向特训班演说。张自己也讲。1943年7月24日，陈立夫演讲。

的邢森洲^①负责河内附近一个机关^②，当他往返越南途经柳州时，常来看望我。名义上，他为侨务委员会服务，但实际上是戴笠的人。他以华侨的身份来看望我，我却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王之五是军统局驻靖西特派员，而名义上他是侨委会的代表。邢森洲与四战区驻越南情报机关之间没有任何联络。军统局驻四战区特派员杨继荣^③很少将越南情报报告给我过目。杨继荣主管的四战区监察处负责军统局的边境情报工作。^④戴笠和杨继荣都不了解四战区的情报活动。我们不会，也不能让别人知道我们的情报活动。

杨继荣组织的越南干训是由我管辖的。我偶尔去那儿向学员训话，但从不过问它的运作。财政方面由中央直接拨款。它设在田东，名叫“西南干部训练班”，以防法国人提出抗议^⑤。接着，西南干训班迁移到柳州。^⑥

第二边境政工队队员全都来自越南干部训练班。^⑦第二边境政工队素质优于第一队。我任命杨清文为第二队指挥官，他率领第二队去靖西，从属于靖西指挥所。

中统局在“入越计划”上承担何种任务？我在柳州期间，陆树珊负责中统局与四战区之间的联络工作。我不认为中统局在越南十分活跃，它没有在协助国军人越方面做很多事。

我没有就有关越南问题同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接触，那时我不认识他。

① 邢森洲，广东文昌人。历任军统局香港区区长，军统局海外部越南专员公署主任、监察院监察委员、甘宁青区监察委员行署委员。

② 据杨清文说，邢森洲做事不够谨慎。他的机关设在南定，1941年遭到搜查，许多在这个机关工作的人被杀，一百多人被捕。接着，这个机关迁移到越南另一个地方去了。

③ 杨继荣（1909—1992），湖南邵阳人，黄埔四期政治科毕业。1933年后历任国民党军八十二师政训主任、军委会别动总队政治部上校主任。1938年任军统局长沙办事处少将主任。1940—1944年任军委会委员长桂林行营第一组少将组长、调查室副主任兼特别党部书记长、军委会桂林办公厅谍报组组长、西南干部训练班（或越南干部训练班）代主任、广西省政府缉私处处长、军统局桂林办事处处长、西南民众情报指导处处长以及四战区调查室主任、军委会西南战地干训班主任。1946—1948年任国民政府主席武汉行辕中将交通处处长。同年任长沙绥靖公署中将副参谋长兼主任高参。1949年赴台。

④ 据杨清文说，四战区监察处也负责军队情报，它也开始训练四战区的优秀班排长。他们受训后回到基层单位从事情报工作，别动军就此建立。在广西的别动军叫做别动军广西纵队。在其他战区也会开设类似的训练班。

⑤ 据杨清文说，邢森洲在南定的机关被搜查后，中央派他去接管。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他正赴越南途经柳州。此时组织越南革命党派联盟的计划正在进行。杨继荣建议戴笠将杨清文借调给西南干训班，于是杨清文担任政治与实用文化教官。训练班中越南人多于华侨。有些华侨是邢森洲介绍来的，有些学员来自特训班。越南青年来自河内、海防、西贡等地，总共有二千多人受训。训练课程持续两年半至三年。杨清文任教时，课程已教了一半。结业时，一部分受训学员被分派到中央军校桂林分校。

⑥ 据杨清文说，1941年春张佩公被扣押后，西南干训班就出了麻烦。干训班迁移到柳州新标兵营，因为田东离越南太近了。由于共产党煽动，干训班早就应该内迁了。武元甲、范文同等人在越南干训班学员中兴风作浪。1942年2月12日，张发奎在一次参谋会议上讨论了干训班的效用。6月25日举行第一届学员毕业典礼，张与四战区政治部主任梁华盛出席了典礼，并发表演说，戴笠宣读了蒋介石的训词。

⑦ 据杨清文说，有100多名毕业生被分派到四战区政工队，他们又被送到四战区长官部接受进一步训练。政工队设立4个训练班，每个班配置16名军官，总共64人，其中多数是中尉军衔。此外，在靖西本地招募100多人。张发奎日记首次提及第二边境政工队是1942年11月4日，那天张以“怎样做人”为题向政工队发表演说。

1941年9月6日，四战区长官部设宴欢迎越南华侨回国参观团，团长陈礼仁报告了越南形势与华侨现况。我们指望他们协助“华军入越计划”。该团成员多数是广府人与潮州人，其中有些人是为了逃避日军压迫^①而进入广西，其余人是越境进入中国的，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愿意协助我们。

在1941年10月22日的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后，当我向蒋先生报告越南情况时，与他讨论了军事行动问题。^②蒋先生惯于个别会见下属，由于四战区没有其他重要事项，我就提出战区最重要的人越问题。

四战区有没有在越南建立基地？^③我们建议，倘若我们不能派军队入越，就应该派人去建立游击基地。为此，我们在大桥设立了游击战训练班。一百多名华侨与越南人在此受训三个月。此后，我们派他们去靖西，他们由此越境进入越南。他们真的在越南建立游击基地吗？我不知道。

访问昆明时，^④我同龙云讨论过越南。龙云对我礼数十足，但他似乎对华军入越计划不怎么感兴趣。他对越南问题的态度与我不同。他本来是个军阀，无意帮助弱小民族脱离殖民统治，此人深受封建观念之影响。

我在云南同没有越南国民党领袖武鸿卿与严继祖接触过^⑤。1942年2月12日，我召集参谋会议讨论了这一问题，也讨论了运用越南干训班、重组越盟、建立游击基地，征募华侨以及制订有关越南人民的计划等等。当时我们制订了更多的具体计划策动驻越法军中的越籍士兵抗暴起义。3月5日，为求对越策动工作能迅确推展起见，第四战区制定了“对越策动计划大纲”，规定工作方针为“为求进出越南作战便利之目的，战区应利用政治、外交等手段之掩护，积极策动组织越南民众武力，并各地华侨，争取法越政府暨其部队之向力，及扶植指导越南诸党派，以期控制全部越南之潜力，使能与国军立于同一战线，共同打击倭寇。最低限度不使供敌所用，以期我入越作战收最大之成效”。

1942年3月10日至4月12日，我在苏联首席顾问与不同级别的下属陪同下

① 越南华侨也受到法国殖民当局的压迫，从邢森洲的《越南现势报告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可知。

② 从张发奎10月22日、9月18日、10月31日及11月5日日记可知，张向蒋介石报告四项：（1）四战区“华军入越计划”的准备工作；（2）接纳华侨协助入越行动；（3）有关抵消敌军对海湾经济封锁之对策；（4）对军队整顿的看法。蒋要张写一份报告。稍后，在9月18日的柳州参谋会议上讨论了军队的部署以及增拨两个军充实入越部队。10月31日，张接到白崇禧命令后，召集师以上军官及十六集团军参谋长开会，讨论入越准备工作。

③ 据张发奎11月11日日记，他请求白崇禧提请蒋介石批准在越南设立基地的建议，还请白崇禧向蒋呈交三份有关越南的报告：（1）军队重组的看法；（2）入越行动的看法；（3）请指导入越军事行动与海湾行动。1942年2月12日日记指出：参谋会议讨论了建立游击基地问题。

④ 1941年12月30日至1942年1月5日，张发奎访问昆明。

⑤ 1940年9月，已把总部从重庆迁到云南开远的越南国民党领袖，要求中国政府支持他们组织越南革命军，进入越南，建立独立政府。中国当局仅给予有限的援助——提供必要的经费、训练人员以及强化组织。但这并未提升他们所组织之革命军的士气。此见于1941年1月23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报告。

巡视边境地区，我想巡察军级单位以及民间组织对入越计划的准备工作^①。

在靖西，我视察了指挥所与第一边境政工队。^② 流动政工队的性质同边境政工队一样，它在边境开展政治工作，但并不越境进入越南。该队拥有几十名队员，越南人与华侨都有。在龙州，我视察了三十一军，并与龙州边区专员座谈。^③

我们在龙州同法国领事与天主教神父陈嘉言之间发生了摩擦。^④ 法国领事故意制造麻烦，他对我们持消极态度，陈嘉言偏帮法国。我们必须特别警惕。

有一批在电报通讯班受训的越南人加入了中国国民党。^⑤ 这批越南的无线电报务员参加了电报通讯班。他们跟随各种不同的越南群体进入越南，但仍然接受我们指挥，也直接向我们报告。除了无线电报报务员，我想不起还有没有其他越南人加入国民党。

① 3月10日，张发奎坐汽车离开柳州去南宁、田东、靖西、龙州、凭祥，然后返回龙州、南宁，4月12日返回柳州。3月11日在南宁，复国军副司令吴革向他报告了该军进入广西的详情。据杨清文说，在复国军由左江地区转移柳州时，黄良赶走了吴革。吴革留在南宁。张在南宁巡视了防御工事，他发觉无论在战术观点抑或技术观点都不合格，因此作了指示。他也视察了第一七四后方医院、十六集团军、四十六军以及第十九师。3月15日在田东巡视了第一三八兵站与第七医疗队。详见3月11日至15日日记。

② 张发奎3月16日抵达靖西，3月20日离开。他向边区政工队训话，并听取了报告。他巡视了指挥所辖下的部队、附属单位、一三五师、保安团以及第一别动队。他注意到靖西离边界很近，那儿走私、赌博盛行，遂指示要根除此两恶。

③ 在靖西至龙州途中，张发奎一行沿着边境在硕龙、宝圩等一连串的小村庄停留，到龙州是3月25日。每一处都留意当地情况。在他的日记中特别指出公路被破坏，影响了交通。在下雷乡与亨口之间四十里路，村庄很少，人畜同居。在龙州，他视察了兵站医院与伤残人员收容所以及市郊的防御工事，后者受到批评，三十一军与一三一师也受到批评；还去了第二别动队及第二工兵团的第二营。晚间他会见了四战区长官部派遣越南等地的情报特派员吴多谦。详见张发奎日记3月20日至30日。

④ 据1942年3月29日日记载，张发奎同当地军官与高职文官讨论了应付法国领事与陈嘉言的问题。3月29日至4月1日日记载，到达凭祥后，3月30日至4月1日张发奎一路走访小村庄，视察一八八师及防御工事，他又召集会议讨论法国领事问题。退到维希的法国政府愈来愈反对中国军队进入越南。1942年3月（也许在张旅途之中），高平军区的法军指挥官里尔告诉靖西指挥所主任陈宝仓，法国无意协助日军进攻中国。里尔意欲传达德古将军的愿望，即安抚中国，且阻止中国军队进入越南。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于1942年1月3日宣布蒋介石已接受中国战区——包括原来的印度支那、泰国陆上与空中、现在及将来——一切盟军部队的最高统帅职位。1月8日，法国驻美大使盖斯顿·亨利·海耶会晤美国国务院欧洲司代理司长爱特顿，告知：维希政府，关注维持它的领土完整，不希望给中国人任何占领印支领土的权利，无疑，中国想在战争结束时掌握这块土地。亨利·海耶也试图使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确信，从中法关系的观点考虑，国军人越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宋子文回答说：“如果法国认为让日军过境印度支那是一件必然的事情，那么中国对由此引起的后果而被迫采取行动保护她自己时，法国不能对此举的必然性持反对态度。”详见美国国务院外交关系文集第753页：《一九四二年的中国》。

⑤ 在张发奎返抵柳州翌日，1942年4月13日，举行了加入国民党的仪式。张监督。1941年9月2日他曾出席电报通讯班的开学典礼。4月1日张乘船离开龙州，在龙州西南的弄吕登岸，他视察了宾阳地区的防御工事，一路向南宁至龙州间的要津山圩进发。他巡视了正规军单位，还向保甲长们讲话。在苏圩，他批评一七〇师精神不振，智识贫乏，占据民房。他继续巡视吴村周围地区，这是南宁至钦州与南宁至龙州公路的交会点。从吴村取道大塘、下雄，张4月12日抵达柳州。两天后，他向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报告了旅程。详见日记4月1日至14日。

不顾法国的反对，我们继续拟订国军进入越南的具体计划。^① 我同昆明的自由法国委员会没有接触。我们不同自由法国合作，犹如不同维希政权合作。中央与四战区在这个问题上步调一致的。这两种法国实体都反对国军入越，我对这两伙人都无所期待。当他们想接触我时，我只希望保持民事联系。

在我出席1943年9月6日至13日在重庆举行的中国军队党中央执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之后，我出席了中枢的军事会议^②。我怎样看待蒋先生对四战区使命的指示“防御第一，进攻第二”？（见10月5日日记）我当然想入越作战，但蒋先生感觉时机不成熟，理由很简单：我们没有足够的兵力。正如我已说过，当敌军从我的战区撤出后，大多数时间只有第十六集团军归我指挥。此外，中央必须更多关切法国政府的反应。^③

我1943年11月5日同印度支那总督德古的代表会谈过，^④ 但正如我已说过的，我们既不同自由法国也不同维希政权合作。

① 1942年6月8日，召集参谋会议讨论有关进军越南的草案。6月22日与29日，参谋会议讨论有关越南人抗日计划草案以及参谋长吴石同军委会外事局有关越南问题的商谈。11月9日，参谋会议讨论编辑入越军事资料手册事项，一种发给军官，另一种发给士官与士兵。11月25日、26日、28日，龙州专员兼边区卫戍司令雷醒南向张发奎报告边区详情。11月30日，参谋会议讨论越南的军事地理。12月27日与1943年1月11日，靖西指挥所主任陈宝仓向张报告边境详情。1月14日，参谋会议讨论调整军队部署，决定以当时的兵力为基础，四战区的主要责任是保卫南宁和准备进军越南。6月29日参谋会议讨论考察入越准备工作。7月27日讨论越南问题。东兴调查室主任潘奋南报告边境形势，越南革命联盟也出席其中部分会议。

② 会议于9月15日在重庆举行。21日白崇禧要求张发奎讨论中国军队入越部署。9月24日张出席参谋总长何应钦召集的会议，讨论国军入越问题，重点讨论三项：（1）设立兵站之准备；（2）决定设立机关专职对越、缅、泰的宣传；（3）设立机关专门解决有关四战区进入越南事项。张在此后几天日记中都指出，这些事项必须与不同的部门商议才能得到妥善解决。这一连串在重庆举行的会议是在罗斯福、丘吉尔8月份在魁北克会议上决定加强对日作战力度及向中国提供有效的援助后召开的。罗、丘决定设立东南亚盟军总部，由路易斯·蒙巴顿上将统率。

③ 那时谣诼已在越南广泛传播，称中国军队将入越抗击日军。10月3日法国驻越部队总司令摩顿派遣里尔去龙邦秘密会见陈宝仓，他警告说：如果中国军队在边境采取行动，日本会乘机压制驻越法军，后者一定会抵抗入侵越南的外国军队，无论它是中国、英国、美国、日本抑或其他国家的军队。倘若中国军队开始行动，法军一定会抵抗（详见1943年11月4日《（侨委会）驻越南办事处副主任王之五报告》）。在华盛顿，越南解放委员会驻美代表1943年10月20日向美国国务院递交备忘录，坚决反对中国军队从海防进攻日军。他断言，从历史上看，中国是越军的世仇（详见美国国务院《美国外交关系·一九四三年中国部分》）。

④ 许午言和方炳西11月5日带了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德古的代表去见张发奎，他们讨论了侵越日军的情况。军统局驻四战区外事处特派员方炳西专程去重庆向戴笠汇报了会议内容。张继续拟订入越计划。10月16日开会讨论越南问题，26日同雷醒南（1894—？，广西邕宁人，保定三期步科毕业。1936年1月授少将。1943年1月5日任广西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947年1月晋升中将。1948年2月任内政部禁烟委员会滇黔特派员）与吴奋飞讨论。1944年1月4日许午言（1909—？，四川眉山人，黄埔六期，陆大十三期。历任国民党军政部参谋、科长，军委会参谋总长办公室少将高参、陆军总司令部第一处长。1948年任整编一一六旅旅长、西南军政长官公署警卫师师长。1949年赴台，任台当局防务部门中将领部员。1965年退役）来见张讨论印度支那军状况。2月20日，四战区参谋长吴石与张讨论他对入越行动的看法。二人决定让林蔚呈信给蒋先生，表达自己的观点。2月21日，陈宝仓与张讨论组织与运用越南特训班问题。

我认为最高统帅部对人越参战计划并未予以高度重视。^① 我感觉到蒋先生与最高统帅部的成员不想在越南作战。倘若他们真的愿意，他们会调派给我必要的兵力。然而，我们仍继续制订入越计划。1944年4月16日至5月23日，四战区参谋长吴石率领部属作了一次边境巡视，准备入越行动。^② 同时出现了如何安置在中国境内之越南人的问题。^③ 他们中间有些人在越南坐过牢，有些人是由日本人控制的。

我的立场如下：民族解放是他们的共同目标，根据孙总理的三民主义，我们必须扶助弱小民族。然而，当他们本身分裂成许多派系集团时，我们怎样着手扶助呢？我建议他们成立一个名叫“越南革命同盟会”^④的统一组织。这个联盟的功能是帮助越南人回到祖国为独立与民族复兴而战斗。为此，他们不应该继续分裂成许多不同的集团。我请求中央批准我们的计划，组织越南同盟会。中央批准了，组建了一个筹备委员会。

为了组建这个同盟会，我咨询了阮海臣^⑤、张佩公和农经猷。我想，是张佩公把阮海臣介绍给我的。他来柳州是为了协助组织同盟会。阮海臣能讲粤语。

军统局的杨继荣建议新组织定名为越南反侵略同盟会^⑥，军统局并非唯一赞成这一名称的单位，其他单位也有人附议。有人希望沿用旧称越南独立同盟（简称越盟）。1944年5月1日，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八次扩大会议在北坡举行。5月19日越盟正式成立。该党决定它的新方针：民族解放问题被提高为全民中心任务，还准备着手武装起义。全会决定维持与发展北越的游击基地，以此作为武装起义准备工作的中心。越盟同几个月前复活的越南独立同盟会不可混淆。我说，辩论名称是无意义的，因为据我所知，许多越南人，例如阮海臣就不是越盟成员，也不接受它。阮海臣等人都同意我的见解。我知道，在柳州的部分

① 1944年2月24日日记指出，22日张在桂林亲自向蒋介石要求对人越问题作指示，但未得到具体指示。为了敦促最高统帅部重视越南问题，张特地撰写了他的观点，交林蔚上呈蒋介石。

② 1944年4月15日，张发奎邀请苏联首席顾问与参加巡游的所有参谋人员出席午餐。他解释道，那次巡视的主要目的是准备入越军事行动以及制定防卫南宁的战略。4月19日，张在日记中指出，除了雷州半岛的小部分敌军，四战区已经清除了辖区内的敌军，所以，除了积极准备入越作战，他的工作是轻松的。

③ 据严继祖在重庆撰写的报告，在四战区不同类别的训练班有702名越南青年，其中36位是女孩，他们从属于下列训练班：（1）100多人在西南干部训练班；（2）300多人在特训班；（3）200多人在靖西第二边区政工队；（4）40多人在第一边区政工队；（5）20多人在电报通讯班。有关西南干训班的越南学员人数，严的报告与杨清文的回忆存在很大差距，杨清文说有1000多人。当严继祖撰写报告时，他不可能看到军统局直接管理的西南干训班呈交中央的报告，而杨清文却持有这份报告。

④ 1942年1月20日，张发奎与吴石、杨继荣、李昆岗讨论了组织越南革命同盟会一事。2月12日，参谋会议讨论了重组越盟问题。

⑤ 阮海臣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张发奎日记是1942年4月16日，张巡视边区回柳州才四天，就同阮海臣等人讨论了“越南反侵略同盟会筹备委员会”以及这个团体的发展问题，其他与会者身份不明。杨清文说，阮海臣是越南河东人，是越南老革命党人，曾在中国云南、湖南及韶关讲武堂接受军事教育，在中国担任军职多年。他本属于越南国民党系大越党人，但在登记简历时，并未注明党籍。

⑥ 据越南反侵略同盟会筹委会的杨清文说，军统局建议使用“反侵略”字眼是要同东南亚其他地区惯用语保持一致。

越南人是越盟成员，我也知道共产党员控制了越盟。

当反侵略同盟会正在组建时，1942年5月8日发生了特训班副主任黄良拔枪对准翻译吴国良的事件，这是越南人的内斗。^①我下令扣押黄良，但不久就开释了。

1942年5月11日，特训班学员结业后，仍然继续受训。他们无事可做，没人带领他们回越南。我一次次派部分学员去靖西，把他们安插在陈宝仓麾下，发给他们步枪与轻机枪等，我对他们确实不错。他们从靖西与镇南关越境进入越南。由于地形多山、交通不便，他们在靖西特别活跃，在那儿从事情报工作与政治工作，组织他们的同胞。

一些夏季特训班学员要求我提供建筑材料，他们说，想在长官部附近为我盖一座越式房屋留作纪念。我给他们材料，他们修建了一座有趣的小木屋，同中国式房屋迥异。于是，我从帆船迁到了那座小屋。

越南确实让我头疼。有时同他们讨论问题时，我会发脾气。我催促他们忘记党派分歧团结起来。^②他们却经常埋怨这埋怨那。我要他们牢记这一事实：我们只想帮助他们，而绝不想取法国人而代之。

四战区政治部负责建立越南反侵略同盟会筹备委员会，我把组织筹委会的责任交给政治部主任梁华盛。由越南人自己遴选筹委会成员，我们不会指定筹委会成员^③。反侵略同盟会后来改名为越南革命同盟会^④。因为在越南人中间存在很多分歧，有人反对“反侵略”字眼。最后我建议取名越南革命同盟会。

有人说我逮捕黄良，是因为他妨碍越南革命同盟会的成立，^⑤有关蜚短流长一直存在的，是越南人的内部分歧。我对黄良是失望的，我感到他的私生活也不够检点。我同杨继荣商量黄良问题，然后派他去息烽受训。他再也没回来，我也

① 1942年5月8日张发奎日记说，当晚又发生了另一件事，原因是特训班第二分队队长管理松懈。翌日，张下令对涉案学员采取纪律措施。5月11日，张出席结业典礼后，命令将黄良与吴国良移交给军法处。5月14日，农经猷偕同特训班助理主任邓有庆向张详细报告了训练班内部的复杂情况。5月17日，张向训练班学员训话，19日召集会议讨论特训班整顿问题。6月7日，再度向特训班学员训话。

② 1942年7月1日，四战区政治部主任梁华盛招待筹委会成员。张发奎在会上发表演说，鼓励“越南革命同志”忘记党派与个人恩怨，团结起来推翻日帝与法帝。7月15日，张与张佩公讨论了有关越南工作的进展。

③ 1942年7月，反侵略同盟会筹备委员会有19名委员与9名基本成员。没有任何党派背景的阮海臣出任主委，其他18名委员，6名是越南民族解放联盟，其中2人是共产党员；6名是复国军；3名越南国民党；6名无党派。蒋永敬估计在此28位成员中有5人是共产党员。1942年7月，10名越南国民党成员在中国国民党鼓励与支持下从云南到达柳州。

④ 1942年7月28日《四战区政治部报告》指出，同盟会的章程与其他文件已经通过，计划于8月10日在柳州举行成立大会。正式定名为越南革命同盟会。

⑤ 1942年9月25日张发奎报告说，黄良误解了中国政府对越南人的帮助，还煽动越人破坏越南各党派的团结。经梁华盛调查后，政治部逮捕了黄良。越南革命同盟会成立后，1942年10月4日，张向越南战区工作队成员解释道：逮捕黄良与邓有庆是出于整顿纪律的需要。越南战区工作队是特训班的真正名称。后者只是用来避免法国人的反对。黄良是越南反侵略同盟会的筹备委员。

不希望他回来。至于邓有庆，我记得他被捕，但记不起为了什么原因。^①

越南革命同盟会于1942年10月1日正式成立，我出席了成立典礼，主持了执委会成员就任的宣誓仪式。^② 执委是由越南人选举产生的，当然，选举结果要我们最终认可！我并不知晓越南人的政治倾向。阮海臣与张佩公是该会最重要的成员，他俩当选执委会常务委员。他俩比别人主意多，农经猷年迈寡言。三人常委会成员之一的武鸿卿是个年轻人，“小淘气”之一，我对他印象不错。我对严继祖印象也不错，他也很年轻。陈豹与张中奉也不错。

越南人在会章^③上签名。起草会章、政纲与工作大纲由四战区政治部负责。^④ 在签署前，越南人修订了部分内容。

这个团体由中央资助，越南人制定每月预算，包括工资等所有开支。我们从中央领款，再交给该会。另外，我们供应越南人每人每日25两食米。此后，所有的活动都以越南革命同盟会的名义开展。^⑤ 该会在越南北部开展活动。我不知道他们做了些什么事。^⑥ 中央任命四战区政治部主任梁华盛为该会的指导代表。^⑦ 他代表我执行命令，也向我报告一切事务。

长官部外事处主要关注越南问题，兼任外事处主任。同长官部的其他部门相比，外事处的地位比其他部门的层级高一些，因为直属于我。长官部外事处与重庆的外交部联系方面，外交部派遣吴本中，后来是李金发到四战区外事处任特派员；国民党中央党部派来杨树华，事实上他是中统局派来的，方炳西是军统局派

① 据杨清文说，邓有庆是黄良的追随者。他被扣押不久，1944年秋天桂柳战役后就返回越南去了，最终死于越南。

② 10月3日，张发奎宴请该会代表，有七人被选入执委会：张佩公、阮海臣、武鸿卿、严继祖、陈豹、农经猷和张中奉。设立了七个处，阮海臣负责秘书处，张佩公负责军事处，武鸿卿组织处，杨清文宣传处，陈豹训练处，农经猷财务处，严继祖社会处。在七位执委中，阮海臣1942年7月登记为无党派，张佩公、陈豹、张中奉是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成员，农经猷是复国军领袖，严继祖、武鸿卿是越南国民党领袖。共产党员没有当选执委。据杨清文说，正式筹组同盟会的过程中，发生了许多变化。阮海臣与张佩公反对包容共产党。当时张佩公是这个组织的核心领导人。

③ 会章指出，根据孙总理的教导与中国的民族政策，同盟会是为越南民族解放而工作。对内，它要团结所有的越南革命力量；对外，它要团结中国与全世界所有反侵略的民主国家抵抗侵略者，以便达致越南的独立与自由。其政纲指出，该会最高目标是将全体越南人民同中国国民党团结在一起，推翻日帝与法帝，光复越南国土，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它的工作大纲指出，同盟会要团结全体越南人民发动武装斗争去消灭在越南的所有日帝与法帝势力。

④ 据杨清文说，是他起草文件的。他当时负责越南革命同盟会宣传处，似乎文件是由他与政治部合作草拟的。

⑤ 该会首先从事三项重要任务：（1）在柳州各种训练班中吸收会员，从越南青年开始；（2）出版越南文与中文月刊；（3）在各地设立该会的办事处，东兴由严继祖负责，靖西由武鸿卿负责，柳州由陈豹负责，在昆明设立该会的分会。

⑥ 据菲利浦·戴维勒所著《越南历史（一九四〇——一九五二）》披露，国民政府给予每月十万法币的津贴在北越海防港从事谍报活动与破坏活动。

⑦ 据1967年5月30日与6月7日夏莲瑛访问梁华盛时得悉，指导代表没有常设机关，只有一两名政治部成员充任助手。

来的；三民主义青年团派来一个姓林的，内政部派来一个姓陈的。^①

特派员协助我制订有关越南的计划。我们经常碰头，我出题目，他们提供建议。有时会意见分歧，但我待他们有礼，没有视他们如下属。

我要求中央派谢慕韩^②来当外事处副处长（于1942年12月2日到任）。他是湖南人，保定军校与陆大毕业。是友人推荐给我的。在越南问题上，外事处与政治部二者维持联络。政治部为我——四战区司令长官拟订计划，然后呈交给我，我便以外事处主任的名义下达外事处^③。

阮海臣离开柳州是因为金钱困扰，他分配同盟会的资金不合理。作为常务委员，他有权处置经费。农经猷也许是财务处唯一的名义负责人，但他老了，只是挂个名。四战区扣押了阮海臣，但很快就放了他。

革命同盟会分裂以及反对张佩公的性质是什么，^④我实在想不起来了。张佩公似乎行事专横独裁。由于个性强悍，军人出身的张佩公容易独断独行。正如我说，我常常为越南人感到头疼，他们争吵不停。1943年下半年革命同盟会的活动减少了些。

当同盟会在组织过程时，1942年8月29日胡志明被逮捕^⑤，我对此事全无印象。你必须明白，在那时他并非重要人士。作为四战区司令长官，我十分忙

① 据杨清文说，起初，中统局、军统局与外交部是最直接关注越南工作的机关。接着，国民党中央决定此类工作应该集中到四战区，上级机关应委派特派员。

② 谢慕韩（1894—1972），湖南耒阳人，保定三期炮科，参加过辛亥、北伐诸役。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第八路军参谋长、桂林行营办公厅高参、四战区外事处副处长、湖南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949年参加长沙起义，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南省政府参事。

③ 张发奎日记谈及外事处有关越南的活动如下：1942年12月21日张以外事处主任的名义邀请越南革命同盟会的朋友。1943年1月20日，他出席张佩公设的午宴。1月7日，在外事由同盟会负责成员与各部门负责人召集会议讨论人越计划。1月31日外事处召集第四次会议讨论联络事项，参谋长吴石等人出席。2月1日谢慕韩呈交报告，开会详细讨论怎样在法军越南士兵中开展工作、怎样在越南人中间消除内部矛盾以及怎样在人越军事行动中开展工作等等。

④ 据张发奎1943年7月3日日记说，他下令指导代表注意这个问题，寻求解决。1943年5月，侯志明已接替梁华盛担任政治部主任，兼同盟会指导代表。此前，6月10日，四战区政治部召集会议讨论同盟会问题。6月19日，张出席同盟会举办的纪念范鸿泰殉难（1924年6月19日他在广州沙面域多利旅馆舞厅谋刺到访的印度支那总督马兰，事败后投珠江自尽）19周年大会。张在讲话中鼓励越南革命家弘扬范鸿泰的革命精神，团结一致，消除党派歧见，共同负起救国救民的责任。他也指出，同盟会应该把三民主义当作最高理想。6月29日，张召集同盟会执委会及总部成员开会，讨论如何加强与组织同盟会以及设立指导代表机关问题。据杨清文说，张佩公对同盟会表示不满，离开柳州去了桂林。大越党成员又出了事，这个越南政党在柳州也有党员。7月14日，四战区政治部一名科长何泽祥向张报告，武仲东与大越党其他成员正计划破坏同盟会。张即下令卫戍总部逮捕这批人，下令何泽祥关注同盟会的内部形势。

⑤ 1942年8月，胡志明离开越南，目的是想会晤中共中央委员会。表面上，他是越南独立同盟会与国际反侵略会越南分会代表的身份去重庆觐见蒋介石。他装扮成一个依族的盲人，手持“胡志明，记者，越南华侨”的名片。在越过边境后，他被逮捕，囚禁在靖西，详见胡著《狱中日记》。据张发奎1944年7月23日向中央呈交的报告，胡志明以国际反侵略会代表的身份来华，由于其所持的三种文件——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会员、国际新闻社特约通讯员证明书、本部军用证明书等，尽皆1940年签发，已告失效，所以被天保县境内街长乡保安队以日谍嫌疑拘捕。

碌。我记不得是否收到过各色越南人士来信呼吁释放胡志明，^①我只记得胡志明来过柳州，他怎么来的，我记不起了。他的案件也许是由地方政府逐级上报给我的。^②

中央并没有指示我“转化”胡志明^③，也没有指明怎样处置他。叶挺是唯一由中央交给我“感化”的人。

1943年9月10日，我释放了胡志明，因我希望他加入革命同盟会，进而加强同盟会的实力。他当然很乐意加入。我对法国持强硬态度，法国是同盟会“革命”的首要目标，日本只是第二目标。日本入侵越南时，法国已经统治越南好几十年了。

我当然知道胡志明是共产党员，但我没有询问他。许多越南人告诉我他的真实身份。我会见他时，他就用“胡志明”这个名字。我当然知道，共产党会使用许多化名。我知道他的真名是阮爱国。我当时并不知道，早在1925年他就在广州^④苏联领事馆担任翻译、被捕前几年一直在中国。在他来柳州前，我不知他的底细，毕竟我以前未接触过他。

我没有向中央请示开释胡志明——我先放了他再向中央报备，中央同意我的做法。我开释他并不是在他于狱中写信给我，答应重组越盟在河内的情报网为我方效力以此换取他的人身自由之后。也许他写过信给我，但我不记得他说过什么。无论如何，我不会因为想利用他的情报网而释放他。我在越南布有我自己的情报网。我开释他的主要动机是帮助弱小的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然而，在准备入越军事行动时，我还确实利用过他的情报机关。但当时国军进入越南是为了帮助越南人民赢得独立。

胡志明住在侨乐村我拨给越南人居住的房舍中。^⑤他没有再搬家。我没有派

① 1943年黄文欢写密函给在云南的越共党员，要他们动员越南人士写信向张发奎抗议，要求他立即开释这位刚从越南来华的老革命家。

② 据张发奎1944年7月23日的呈文，胡案是由乡公所呈县政府，再上呈专员公署，转军委会桂林办公厅，最后交付四战区政治部调查。胡志明在《狱中日记》一书中说，他辗转广西13个县18所监狱，在被捕后4个月才押解到四战区长官部，然后押送桂林囚禁40天，再解回四战区政治部。据萧文1946年11月1日复国民党中央秘书处有关越南问题时披露，桂林办公厅于1943年1月将胡案移送四战区政治部。据当时的四战区政治部主任梁华盛1967年接受夏莲瑛访问时回忆是张决定把胡志明送交政治部察看。

③ 据梁华盛1967年5月30日与6月7日在台北会见夏莲瑛时回忆，在胡志明被囚于政治部期间，每天由特务排排长监视与送饭。梁同胡谈话十多次。梁认为从言语文字推断，胡“似于三民主义抗日政策均有深切了解”，而且“才思老练，气度平和”（见张发奎致蒋介石、吴铁城函，1944年1月23日）。梁华盛建议处决他，但中央复文说，最好是“转化”他。梁的话被当年一份报告证实，这份1943年7月撰写的报告称，已确定胡志明是共产国际的积极分子。政治部奉命观察与“转化”他。据杨清文说，胡志明在政治部出版物《阵中日报》上撰稿。武英则断言，胡志明为四战区编印的报纸撰稿是为了向越南传递消息，他描述胡志明的处境是“软禁”。

④ 在广州，胡志明同泛太平洋工会联盟保持联系，那是由被压迫民族联盟组建的。1925年他创立了越南革命青年会——印支共产党的前身。

⑤ 据1944年1月23日张发奎呈交给国民党中央的报告，直至那天胡志明仍处于政治部“察看”“感化”之中。

人监视他，不清楚是否中央的指示。胡志明从未对我讲过那一类的话。

我不时去看望他。我对他印象非常好，他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头脑冷静，工作勤奋。我和他私人关系也很不错。我对他很友善，因为我钦佩他。我和他年龄相近，他比我大六岁，能讲流利的国语——怎么学会的我就知道了。他对法国很痛恨，我已经知道他为了越南革命而多次入狱，我钦佩他的革命精神。他告诉我，他是共产党员，但眼前目标是越南的自由与独立。他特别向我保证，五十年之内越南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当时除了胡志明，我记不起曾认识其他越共党员。

1943年12月，我奉命兼任越南革命同盟会的指导代表。^①胡志明任副职。当时设立的指导代表办公室主任萧文^②是陈诚与罗卓英的保定军校同学，我知道他的父亲是越南归侨。萧文与邹鲁都是广东大埔的客家人。邹鲁介绍他加入国民党，他从第四军时期就跟随我。在武汉会战时，他担任我的第二兵团兵站总监。转进柳州后，他在四战区任高参。萧文负责越南革命同盟会的重组，我将此重任交付给他，当然，他还是要听从我的指示。在这一时期，特训班学员加入了革命同盟会。起初，会员只限于少数人，由特训班派代表，后来就整体加入了。

我出席了越南革命同盟会海外代表大会（1944年3月25日至28日召开）。^③除了越南国民党、越盟、复国军，若干小政党也出席了，还有在柳州的大越党，它的领袖是一个残废老人^④，他是被法国人打残的。胡志明当选执委会候补委员。^⑤大会并未成立张佩公领导的临时共和政府^⑥，也许同盟会拟订临时政府名

① 据1943年11月8日《吴铁城致何应钦函》与12月22日《何应钦将军复吴铁城函》，张发奎11月在重庆指出，侯志明资望太浅，希望中央派一位资深人士接任指导代表。结果中央要张兼任此职。

② 萧文（1906—），广东大埔人，中央陆军官校七期步科毕业，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随营学校教官、第十营政训员、团指导员。1932年任中央陆军官校南宁分校上校科长、第五十军八十师政治部主任。抗战爆发后任四战区干训团政训处副处长。1942年任四战区教导总队上校副总队长、干训团特训班办公室主任、四战区长官部外事处少将处长。1946年任粤北师管区司令部副参谋长、闽粤边区总指挥部参谋长、广州行营第四处少将处长。1948年任广州绥署中将高参。1949年在香港通电起义。新中国成立后任广东省政协委员。据萧文的邻居马维岳（广东新会人，日本士官学校二十期工兵科毕业，1947年11月21日授少将衔，同年退役。他曾在萧文任团长的五十四团当过营长）1965年6月3日在香港对夏莲瑛说，萧文热情帮助越南独立事业，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很聪明，也很有野心，一心想向上爬，有时糊涂又很鲁莽。

③ 张发奎在日记中说，他在大会上起了突出的作用。3月24日他召集越南问题讨论会，准备大会演讲稿。他在演讲中，鼓励与会代表团团结起来一起肩负越南革命的重任，然后他和代表们一起用餐。3月27日他出席了上午会议，他在日记中说，他的指示是代表们能够接受的。他也出席了下午会议。当晚，萧文同张详细谈论了各位代表的政治背景。3月28日他出席了上午的会议与闭幕式，中午他款待代表们及部分下属。

④ 据杨清文说，此人姓李，1967年仍住在香港一家法国人经营的医院。出席大会的代表共有十五人，他们并非代表政党而是代表七个组织，其中之一就是越南革命同盟会的七人执委会，大越党只有一位代表——阮祥三。蒋永敬估计其中至少有四位代表是印支共产党员。

⑤ 大会选出七名执委：张佩公（无党派）、张中奉（无党派）、陈豹（无党派）、蒲春律（复国军）、严继祖（越南国民党）、黎松山（印支共产党）和陈廷川（复国军）；三名监委是阮海臣（无党派）、武鸿卿（越南国民党）、农经猷（复国军）。胡志明（印支共产党）与阮祥三（大越党）当选候补执委。

⑥ 法国人菲利浦·迪弗勒所撰《越南史（1940—1952）》断言，临时政府包括阮海臣、武鸿卿、胡志明、黎松山、蒲春律与严继祖。杨清文也断言，大会并未成立临时政府。

单等他们回国后再宣布成立。

在这一阶段，我密切联系的越南人领袖除了胡志明，还有阮海臣、张佩公、农经猷、张中奉、武鸿卿、严继祖和胡德诚^①。在所有这些人中，虽然武鸿卿与严继祖比胡志明年轻，但我对后者印象最好。当我对黄良失望时，我对越南人整体感到失望。然而共产党是经过严格训练的，胡志明工作勤奋。其他越南人都是私生活不检点，故我把希望寄托于胡志明。

革命同盟会是由于胡志明集团、越南国民党成员与其他集团之间的内部分歧而导致分裂的。^②他们都在争权夺利。我能做的就是居间调停以及规劝他们各尽所能。他们为个人利益大吵大闹委实使我头疼。胡志明从来不为小事争斗，他不像其他人那样使我头疼。越南人在政策上没有大分歧，只是为琐碎小事争吵。他们毕竟在同盟会的原则、政纲与组织上是一致的。我们完全采取中立态度，绝不偏帮任何一方。我们着重于帮助他们达成民族解放。在抗战期间，我们的政策是同共产党合作，尤其是外国共产党。我期望越南人团结一心，回国后建立一个联合政府。

我不清楚我们有否记录胡志明在同盟会中的活动，因为我把责任交给了萧文，不过问太多细节。我没有援助印支共产党，只尽最大的努力支援越南革命同盟会，在这一组织中，共产党只占少数，而其他党派占了多数。我期望他们保持合作以便赢得解放与独立。胡志明没有公开同毛泽东接触，这是事实，当然，我不能说他们没有秘密接触。

我要萧文兼任战区外事处副处长。^③因为谢慕韩不适合做越南人的工作，他是个湖南人，不肯接近越南人，又不会讲广东话，只好改任高参。萧文比较适合做越南人的工作。

我不觉得萧文支持共产党排挤其他群体^④，我要他促进越南各党派的团结以便增强同盟会的实力。我记得1944年8月4日萧文在东兴逮捕越南国民党两名成员严继祖与武光晶的事，但他逮捕任何人都必须得到我同意。我不记得他俩被捕的原因^⑤，但我觉得越南人的私德实在不能令人恭维，我对他们完全失望。我

① 胡德诚是印支共产党员，他以越南民族解放联盟龙州办事处的名义活动。杨清文却断言胡德诚当时并非共产党员，后来才加入印支共产党。

② 越南国民党不愿意同共产党合作，萧文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但收效不大。

③ 1944年5月17日，张发奎指出，外事处许多成员对他们的工作表示失望，原因他们的主管（谢慕韩）不能以身作则（详见日记5月17日与7月10日）。

④ 1944年7月，在萧文的指示下成立了越南革命同盟会昆明分会。结果，印支共产党在五人执委会中取得三席，此五人互选产生的三人常务执委会中有两人是共产党员。

⑤ 事缘脱离越南国民党加入越南共产党的杨子江向指导代表萧文出示了严继祖与英方签订的妥协条约，指严继祖等人“私结团体，破坏同盟”并“勾结英法，出卖越南”。故8月4日萧文下令逮捕严继祖及其手下武光晶。与此同时，萧文还以越南革命同盟会的名义，宣布武鸿卿、阮祥三等人的“罪状”，指责他们反对改组云南分会是违反纪律和破坏革命同盟会（事见张发奎致吴铁城函，1944年8月29日）。后因国民党中央党部吴铁城指出严继祖尚无不利中国之举动，且严向英国建议之互助条件曾呈报军统局备案等因，要张发奎予以开释。

不认为萧文左倾亲共，倘若如此，我不会首先任命他为指导代表办公室主任，我对他相当满意。要不是1949年中共席卷大陆后他投共，我会仍然善待他。也许我不知道他私下所作的勾当，但我们当时并没有分歧。

1944年8月9日，我让胡志明回到北越。^①我期待他在北越渗透，革命——简言之，为越南独立而奋斗。我对此事考虑已久。^②我要他拟订一项计划——怎样开展他的革命工作。^③对他的计划，也许我修订了一些细节。我给他钱而非武器^④。

1944年冬，（张发奎的美国顾问）鲍曼告诉我，美国希望胡志明到昆明接受美式训练。^⑤几个越南人向我证实这些事。我猜忖，美国人知道他是共产党人，但他们有求于他。

在四战区，美国人接触过越南人吗？鲍曼曾在特训班作过演讲。他几乎没有向我表达任何对越南问题的看法，我很少跟他谈及越南问题；他也几乎没提起，因为越南与美国无关。

在越南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筹备处^⑥的目的，旨在组织侨居越南的中国学生。可是那时我正全神贯注于桂柳会战，我们自顾尚且不暇。

① 胡志明1944年8月9日离开柳州，9月20日他进入靠近越南边境的龙州、靖西与平孟。据梁华盛1967年5月30日与6月7日在台北接受夏莲瑛访问时说，是萧文担保胡志明的回越。

② 早在1月23日，张发奎就决定释放胡志明，让他返回越南。张报告国民党中央：胡志明对三民主义及中国抗日国策有深刻认识，此人能干、老练。他相信胡志明声称的在越南拥有20万地下武装，他也相信，倘若胡志明长期滞留中国，对中国不利；而把他遣回越南，则对中国无害（详见1944年1月23日《张发奎报告》）。张的建议没有早日实施，是由于革命同盟会中其他成员的强烈反对。

③ 胡志明的计划包括在中越边境建立游击基地与开展武装宣传。其目的如下：（1）向越南人民传达中国政府帮助越南独立的决心；（2）发展越南革命同盟会的组织与武力；（3）准备接应国军与盟军进入越南；（4）为越南的完全独立与自由而奋斗。（详见《胡志明致张发奎报告之“回越工作计划大纲”》）

④ 张发奎应胡志明的要求，给他通行证与其他证件、医药以及法币7.6万元。胡志明曾要求补给不同种类的武器弹药。

⑤ 胡志明透过美国空军希安联络上了美方，希安的座机在越南高平坠毁，获越南营救出险。希安被带到范文同的机关，范安排希安会晤胡志明。1944年底，穿着褴褛的中国军服与旧草鞋的胡志明出现在云南宜良。他在那儿逗留一周后去了昆明。在那儿，昆明美军感谢他营救希安之义举。当陈纳德将军问他越南人是否愿意组织营救坠落入越的美国空军机师时，他表示同意。他还同美国战略情报署人员有所接触。

⑥ 1944年10月21日，张发奎被任命为筹备处主任，签署命令的是三青团总团长蒋介石与总干事张治中。

第十五章 桂柳会战

(1944年春至12月)

1944年4月中旬当日军沿着黄河以南的平汉铁路发动攻击时，从敌军的能力估计，我们判断它会进犯广西，但其主力会用在廓清粤汉路，仅运用牵制行动来骚扰。有关敌军兵力，我有足够的情报。

当时我的战区中，在广西，仅有十六集团军的三十一军与四十六军，尽皆缺额严重。四十六军驻扎在桂北的柳州以北，三十一军驻在桂南的西江以南。它们的主力在南宁与龙州地区。三十五集团军六十四军的一五五师驻扎在粤西南。按常态来讲，我的战区是平静的，敌人仅是汇集在雷州半岛的一支小部队。

我同美国空军合作保卫柳州，桂林、南宁、儋州、梧州机场胜任愉快。文森将军常常来我的长官部讨论这一问题。正如我所说过的，我们合作愉快，他又善饮。

1944年5月27日，敌军在湘北发动攻击，第四军军长张德能奉命防守长沙，我派部队去湖南。^①我同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各有辖区，自然有所联络。在战术配合方面，我们互相交换涉及对方辖区的情报，双方的参谋处也保持联络。

斑马部队桂林总部参谋长马尔可·林赛将军安排美国人到我属下部队。^②美国设立他们的机构并派军官到我的部队，这不必同我咨商，但会通知我。1944年5月下旬，美国教官进驻四十六军与二十九炮兵团第三营。我当然欢迎他们。^③我一贯认为，外国人——无论俄国人抑或美国人——来援助我们，是出于友好、热情的动机，我从未产生“他们为什么前来指手画脚”的想法。从科学的观点来看，他们所作的建议与贡献是我们可以采纳的。我从未有过喜欢美国装备多于美国教官的想法。

① 据张发奎6月4日日记，他派四十六军十九师（缺一个团）去湖南衡阳协助第十军军长方先觉防守。

② 林赛与鲍德芮于5月11日拜访了张发奎，这个Z部队计划是史迪威拟订的，目的是在华东训练30个中国陆军师。

③ 据张发奎日记6月29日、30日，美国上校郭立智一行，来四十六军训练各级干部。1944年5月下旬成立的二十九炮兵团的三个营已经配备了美制75毫米山炮以及美国教官。这三个炮兵营各自配属于三十一军、四十六军与六十四军。Z部队使用的少量武器于1944年5月空运抵华东。

我十分欢迎来到我长官部与军级单位的美军观察组。^① 来我长官部的观察组由霍华德·鲍曼上校率领，有二十多个官兵。一开始，美国顾问团的编制就比俄国顾问团大许多，大多数低级军官是中尉衔。我聘请岭南大学教授麦国珍担任我的英文秘书，负责与鲍曼上校的联络工作，骆来添与李重生也担任同样职务。

美军派到三十一军与四十六军的联络组由鲍曼上校统率，美国人行事完全与俄国人不同。他们清楚地表明，他们是联络官而不是顾问。美国人的长处是，我们只须向他们提供合适的住处，其他一切都不用操心。他们有自己的后勤管道，不像俄国人一切都依赖我们供应。美国人着重舒适与享受，各种设备齐全——电冰箱、发电机等等。有时还摆阔佬架子。我命令下属，让美国人享用最好的设施，以后可以留下给中国军官享用。我们礼数周到。俄国人则不同，他们能同我们一起睡在牛棚。

1944年6月10日，苏联顾问格里哥里也夫等人离开，我到车站欢送他们。^② 我想，苏联政府从中国召回军事顾问是由于美国顾问取代了他们。此后我们依靠美国的军援，苏联的物资就变得微不足道。再者，中共问题也是原因之一。虽然俄国坚称他们没有干涉中国内政，但我们知道，他们同中共有所“勾结”。

虽然我估计敌军不会出动主力，但我必须为任何突发事件作好准备。我们拟定了疏散计划。我们的政策是“坚壁清野”。执行这项政策可不容易——一切东西都要搬走，包括家具等。通常是老百姓迁移到山区。为了执行政策，我们举行了演习。

估计到敌军会侵入，我们决定建立游击基地。在偏远地区设立了秘密仓库，用以贮存粮食与弹药，“民众斗争指挥所”则领导人民在敌后从事破坏行动。村庄与其他地方当局负责这些指挥所，它们是在军队撤退后充当民众的核心。

1944年6月18日，长沙失守。我对此并不惊奇，事实上我们已经打了许多次败仗了。三次所谓长沙大捷（1939年秋、1941年、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同所谓粤北大捷相似。敌军志不在长沙，犹如它们志不在韶关，它们只不过是佯攻而已。我的观点是基于一个简单的理由：我感觉敌人能攻占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倘若它们没有占领某地，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在整个抗战期间我思路一贯都是这样。一切都是时间问题。

史迪威的参谋预期，长沙陷落后不用七天桂林就会弃守，我认为美国人的神经太紧张了，也许他们把日军当作“天兵神将”也说不定。我不能设想他们为什么会以为敌军会如此迅速攻占桂林，毕竟从长沙步行到桂林也没这么快。

敌军占领长沙后没有追击国军，通常它们占领一个重要城市后都会休整。6月底，敌军主力开始朝南移动，沿着湘江向衡阳进逼，我估计它们要入侵广西，

^① 1944年7月中旬，16个美军观察组或炮兵组被派到长江以南的中国军队中。联络组被派到九战区与四战区的二十四、二十七集团军，和三十一、三十七、四十六、六十二、六十四、七十九、一百军，以及二十九炮兵团。

^② 苏联炮兵顾问早已离开，同年1月3日举行了惜别宴会。

扫清湘桂铁路，利用它们的空军基地压迫桂林与柳州，再袭击南宁，以便打开进入印度支那的交通线。但我认为，进逼广西还需要一段时期，因为我收到敌人兵力的精确情报。

6月下旬，白崇禧对防御桂林作出指示^①。蒋先生派白崇禧到广西来协助我，因为他是广西人氏，而我的部队又驻扎在广西。白率领一大群随员，其中包括工兵学校校长林柏森。我们每天巡视防御工事，忙个不停。白崇禧相信桂林能守住六个月，因为它的地形与防御工事有利。在我看来，桂林的地形无疑是有利于防守，有许多山洞，例如市郊的七星岩能够容纳好几万人。城墙高且坚固，还建有半永久防御工事。从理论上讲，桂林守得住，但我不相信能守六个月，因为我们的装备与战斗力都比敌军差次。我认为桂林能守顶多一两个月吧！我向白崇禧表示异议，但没有提出任何防守桂林的修正案。我相信我的下属认同我对局势的估计，不然他们会同我争辩。我经常同他们商议，我同参谋员与军长们商议比以前多。当然，最后决定由我作出。我对下属可说是“无怨无悔”。

1944年6月25日，我们决定疏散桂林。同军事行动有关联的某些人，例如电台工作人员被迫留在桂林城。省政府机关当然奉命撤离，但某些组织，例如与卫生、公共事业有关的部门必须留下一部分人。

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韦云淞奉命兼任桂林城防司令，指挥全城部队，维持城内秩序。他很乐观，表示完全有信心以他的能力守住桂林。考虑到守城要挨过很久的日子，韦部军官要求准许留下一些妇女充当军妓。也许有一些坏女人愿意留下。我没有批准这一要求。我们中国人不允许这类陋规。此外，我告诉他们，一旦桂林失守不能让这些妇女遭受浩劫！

从湖南来的几十万难民抵达桂林与柳州，作短暂停留后，去了柳州、贵州等地。

我还记得1944年6月26日在桂林会见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时的谈话内容。白崇禧与我在军用机场会见华莱士与陪同他的宋子文。他俩中途停留时在贵宾室与我们交谈了一小时，宋子文担任翻译。此时湖南形势严峻。华莱士垂询白崇禧对昆明防卫的看法，白崇禧说昆明能守半年，还侃侃而谈他的理据。诚然，中国的军人不愿在外国人面前示弱，这是他们的恶习。在这一场合，此种恶习更趋于极端，因为白本人与防守桂林的部队都是广西人氏。当华莱士问我对昆明防御的看法时，我摇了摇头，说守昆明六个月很难。由于白崇禧在场，我不敢再多说了。当然，我不能在已出版的《抗日战争回忆记》一书中提及此事。

6月杪，蒋先生下令四十六军“坚守桂林待命”，^②并发放三个月的粮食与弹

① 在6月23日至25日举行的会议上，白崇禧就桂林防御与疏散问题作了指示，出席者有张发奎、黄旭初等。

② 蒋介石给张发奎的绝密文件是限定于两小时内发出，于6月30日送达。文件指出，敌军主力明显意欲沿着湘桂与粤汉铁路南犯，国军必须“坚守桂林待命”。敌军沿湘桂线的进犯，必须被九战区与六战区的共同攻击及七战区与四战区的联合行动击溃。四十六军主力负责防守桂林，该军其他部队防守全州与黄沙河至桂林以北的阵地。三个月的粮食、弹药供应正送往桂林使四十六军能“坚守桂林待命”。

药给昆明，向桂林运送三个月的供应，意味着蒋先生要四十六军坚守桂林三个月，直至下一步命令。我相信，守城三个月是困难的，原因我已经提过了：我军战力与装备都比敌军窳劣。蒋先生习惯于为坚守某地规定一个时限，然而他常常不明白当地的真实情况。我同意蒋先生之集中我部主力于桂北的战略^①，如果我们分散兵力，那就意味着到处陷于弱势。我们准备撤到柳州以南，把桂南地区留给当地的保安团与民团的民兵去防守。

广西有些县组织了自卫团，其他县则没有。^② 我们催促每个县组织民众自卫团。由于四战区一直专注于进军越南，一下子把重点移到桂北，便带来许多问题：部队的运送、军需物资的运输等等。^③

7月5日，张德能在桂林拜访我，他说他奉蒋先生之命去重庆向中央报告，路经桂林。我问他，是否奉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之令撤出长沙，他说不是，但当时情况十分混乱，别无选择。长沙是守不住的，那儿没有城墙，只靠防御工事。张德能说，他下令几支部队渡过湘江到达岳麓山，那儿有他的部队驻守，有些防御工事是一流的，希望在岳麓山重新集结部队。他们征用了所有能找到的船只，但由于缺乏准备，部队失控了。此外，为时已晚，敌军已经到达岳麓山。士兵们渡过江到达岳麓山以南，向南溃退了。此时他留在长沙的部队也南撤了。^④ 我7

① 蒋介石给张发奎的绝密指示指出：三十一军主力要秘密行军至柳州待命，准备参加桂林战役，留下一部分防守南宁与柳州地区的阵地直至下一步命令。为了维持与后方的交通，有必要防卫黔桂铁路沿线的宜山、河池与南丹。三十五集团军六十四军的一五五师要继续执行当前任务。通向南宁与玉林以南的公路以及其他可能被敌军利用的交通线必须动员民众捣毁，四战区与广西省政府已奉白崇禧命令组织民众。所有壮男与物资必须疏散。七战区要准备秘密运送一个军参加桂林战役。三十五集团军要秘密调派一个师到梧州，一旦需要，就投入桂林战役。六十二军暂驻祁阳守卫湘桂铁路与零陵机场，如果需要将调往全州参加桂林战役。

② 在一份1944年8月底的油印文件《目前战局形势与广西官民的责任》中，当局号召民众组织自卫团协助军队打击敌人、破坏敌人的交通与供应线等。

③ 7月13日，张发奎命令三十一军进驻柳州，同日他命令疏散柳州居民。7月22日，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决定把军内老弱疏散到贵州都匀。

④ 一名在第四军服务过的军官，1967年向张发奎详述了长衡会战的经过：当敌军进攻长沙时，张德能指挥两个师——林贤察（1898—1967，韶关讲武堂毕业，参加过台儿庄会战、淞沪会战及三次长沙会战。抗战胜利后赴香港定居）的五十九师与陈伟光（贵州六枝人。1937年淞沪会战时任一〇二师六一二团团团长，后任第四军一〇二师师长，参加过浙赣会战与长衡会战）的一〇二师——以及第四军军部。第四军的九十师，由陈侃（1901—1949，广东兴宁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1926年回国参加北伐，入张发奎第四军黄琪翔团任作战参谋，汀泗桥之役依据情报拟订夜袭计划立功。淞沪会战时任第四军九十师二〇七旅旅长，武汉会战时任九十师师长。1944年6月在九战区第四军因岳麓山阵地失陷而被撤职。1949年奉中共指示赴潮安策反旧部，5月25日从香港赴汕头，一下飞机就被粤东“剿匪”司令喻英奇逮捕杀害。同年9月，喻英奇在廉江兵败被俘，押回汕头后被公审枪决）率领驻扎岳麓山，由薛岳的参谋长赵子立在岳麓山直接指挥。当敌军攻打岳麓山时，赵子立打电话给张德能，说薛岳命令张德能率领两个团立即增援岳麓山。张拒绝接受此令。赵告诉张，如果不相信，可以直接打电话与薛核对。提供情报给张发奎的人说，他听说张德能拒绝，但不知其有否打电话给薛岳。后来张德能下令第四军军部与两个团渡河去岳麓山，但是找不到足够的船只。为了防止落入敌军手中，所有的大船都已被征用南撤，只剩下一些小船与舢板可用。士兵们争抢船只，有些人落水溺毙，现场陷于混乱。张德能与部分亲信，包括那个线人，渡河开赴岳麓山以南时，岳麓山阵地已经失守。张德能与薛岳失去了联系，他派出一名传令兵吩咐三个师长集合部队防止进一步溃退，但师长们拒绝签署这些命令的收条。

月15日日记所载敌人使用毒气一事，也是张德能告诉我的。

张德能叙述他在长沙的经历时，看上去精神不错，但是我已察觉到他会受处分——把一名军长从前线召回来作报告是不可思议的。我带他去见（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白询及他的经历后吩咐设宴款待，让大家都聆听他讲述长沙战况。在午宴上，张德能又将讲过的话复述一遍。7月8日我见到白崇禧时，他向我出示一封蒋先生的电报，命令将张德能逮捕，押送重庆交军法署审讯。我问白崇禧，张德能是否大祸临头，他说没什么可以担忧的，还叫我安抚张德能。他规劝张德能起程赴重庆。事实上，白崇禧说，他只身来桂林，特地通知张德能来见他。白答应帮助张德能。

张德能去了重庆，并没有马上被捕。当然，我不知道他是否被秘密监视。我和白崇禧都没料想到他会被枪决。根据他本人所述的情况，他似乎罪不致死。有人告诉我，薛岳向中央报告：张德能违抗命令擅弃长沙，这才致张德能于死地。^①我相信这话是真的。

当然，我们都想救他。^②张德能擅自弃守长沙固然不当，但从他在桂林所谈的情况来看，长沙显然是守不住的。

张德能被处决后，有个贵州妇女带着几个孩子来找我，自称是张德能的妻子。我根本不认识她。我曾说过，我帮助张德能解决过他那湖南妾侍的纠缠。他当时向我发誓，永远不再娶妾、永远不忘我的大恩大德。我还真的信了他，可是他食言而肥。当他跟随薛岳参加这一致他于死地的战役时，他又娶了这个女人。当然，我对她提供了帮助。张德能被处决对第四军来说是一个悲剧的结局。我感到很难过，再也不过问第四军的事务。

第四军内部情况错综复杂，军纪涣散，我觉得它已走上末路。在长沙沦陷前，冯玉祥旧属、军委会第四军风纪巡察团主任委员石敬亭在巡察驻长沙的第四军后路过柳州，他对我说：“向华老弟，我要告诉你一些事。第四军没希望了，它的军纪很差。”他说张德能本应下部队视察防御工事亲近士兵，却沉湎于绘画、书法与吟诗。我感觉不妥，部队长应该像战国时的吴起一样经常亲近士兵，我们毕竟是用“带兵”一词来表示官长的职责。

此时日军在雷州半岛骚扰我们。^③我们未予抵抗。我下令六十四军一五五师放弃粤西南转进广西平乐，仅留下地方部队守卫粤西南。

第十军军长方先觉与一九〇师师长容有略坚守衡阳48日，当8月8日衡阳终于陷落时，高级将领全部被俘。他们逃出俘虏营去重庆，受到当局高度赞扬，

① 据第四军一名军官说，张德能在军事法庭上说，赵子立打电话给他，称薛岳命令他率两个团去岳麓山，可是薛岳否认下过此令。张德能也陈述，他向三个师长发布命令，不准后撤，但他不能提供进一步的证据，因三个师长都拒绝在命令的收据上签字。

② 见张发奎8月8日日记。

③ 日军从遂溪入侵廉江，不久就后撤。

荣膺国军最高战功勋章——青天白日勋章。四战区继续派兵去湖南。^①

我要求中央派出增援部队。九十三军——委员长嫡系部队之一（它的前身是国民革命政府警卫第二旅与陈诚的十八军第十一师）——被调到湘桂边境的战略重镇全州，^② 归我指挥。九十三军是黄埔一期生陈牧农指挥的新组建部队。我命令九十三军在黄沙河与全州修筑工事、准备阵地。

军事形势日趋严重，但我没有要求美制装备。据说，薛岳要求提供在桂林储藏的装备以及美国武器，但白崇禧说桂林并无仓存军用物资。^③ 我认为桂林其实有军火库存，只是白崇禧与薛岳的关系一直欠佳而已。

薛岳有无要求直接从陈纳德那儿接受补给，我不知情，但我想这是完全可能的。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薛岳的参谋长吴逸志^④写信给罗斯福总统，提出一些军事建议。美国人通常是会复信的，罗斯福复了信。蒋先生发现此事后十分恼怒。于是吴逸志被撤职，赵子立接任。起初，蒋先生甚至想扣押吴。

关于从空中补给陈纳德第十四航空队的驼峰空中运输队有多大规模，^⑤ 我一无所知。

我记不得是否曾支持在李济深（前排右一）领导下，成立一个临时政府——西南联防政府的计划^⑥。李济深心里可能有这样的计划，且同美国人商谈，想把我們当成他的资本。这并不奇怪。“买空卖空”乃是典型的政客伎俩。美国人知道薛岳、余汉谋和我都是李济深的前下属，但李济深确实从未同我讨论过这一计划。龙云对蒋先生不满，但我不能说他是反蒋的。

白崇禧在昆明对托马斯·廷柏曼准将说，李济深、薛岳、余汉谋与我正打算

① 四十六军一七五师（黎行恕任师长）奉派去湖南，详见8月3日日记。

② 8月14日至15日，九十三军从贵州出发，经柳州到达全州。

③ 林赛1944年7月21日给史迪威的电报说：白崇禧亲自通过林赛要求六个师的成套装备用以武装四十六军与六十四军，防卫广西。另一位将军赫尔报称：白崇禧预计衡阳两天之内就会陷落。

④ 吴逸志（1896—1961），广东丰顺人，保定六期步科，陆大将官班甲级一期、柏林陆军大学毕业。北伐时任第四军的团长、支队长、第八路军总参谋。抗战时任九战区前敌参谋长、战区参谋长、战区训练团教育长及党政分会委员。1939年7月12日晋升中将。1948年3月当选一届国大广东省代表。1949年2月12日任广东省政府委员。赴台后任“国大宪政”研讨委员会台北区两权第一研究组召集人。著有《长沙会战要术》、《薛伯陵将军实际统帅法之概述》等。

⑤ 自1942年5月至1945年9月，中美两国开辟从印度东北阿萨姆邦汀江等地飞越中缅印边境崇山峻岭（驼峰）到昆明、重庆等地的空中国际运输线。1943年1月，罗斯福决定将飞虎队扩编为第十四航空队，任命陈纳德为少将司令，独立行使指挥权。1944年11月，驼峰空运达34914吨；1945年1月至9月，平均每月空运达5万吨。在此三年内，飞越驼峰运华物资总数达780674吨，有力地支援了中国抗战，大大鼓舞民心士气。由于气候恶劣地形多山，三年内中美共坠毁飞机609架，牺牲飞行员1500多名。蒋介石坚持，一切空运补给品都要运交第十四航空队。1944年6月6日，史迪威改变驼峰运输配额，削减其他项目，把十四航空队的配给增加到每月8425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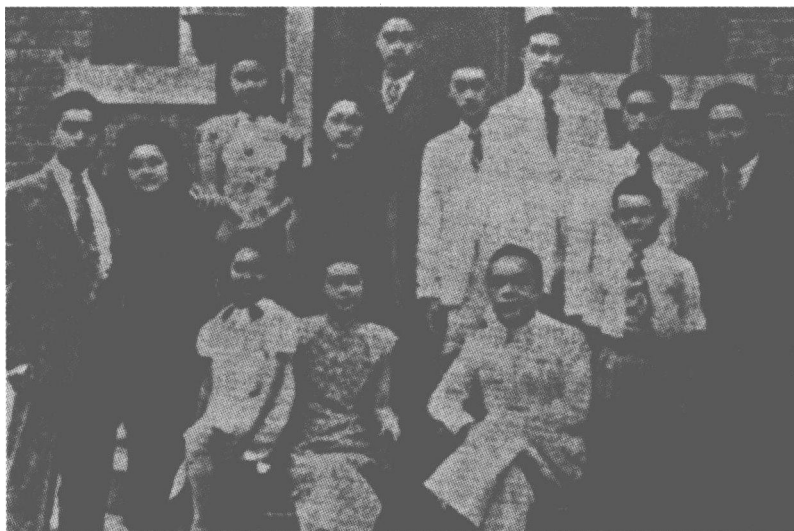
⑥ 据美国驻桂林领事林华特向史迪威的参谋长托马斯·赫尔报告，1944年8月9日，一位据信是李济深亲信的中国人向他递交了一封李济深写给美国最高当局的密函，该函指出，在不久的将来将成立一个临时政府，这个政府将由广东、广西、湖南、福建、安徽、四川、云南、西康（今西藏）等省政府以及大量军政领袖参加，并得到他们支持。他们的目标之一是建立一个国民党领导下的民主形式的政府来取代一党一人的独裁政府，将会有一封上述各省党政军领导人共同签署的通电公开发表。

掀起一个分离运动，白相信这是共产党策动的^①，这涉及我与薛、余的情节纯属传闻，说我们要策谋分离运动，绝无此事！李济深是反蒋的，白崇禧可不是。我简直不相信白崇禧会讲那种话，他对我很了解。他知道我们同李济深的关系——余汉谋、薛岳和我以前都是李济深的对立面。

8月17日，陈纳德说史迪威藐视蒋政府，建议直接向薛岳提供武器，但陈纳德无权分配军需物资——那是史迪威的特权。薛岳应该明白这点。

无疑，美国高级军官对薛岳印象很好，至于薛岳是否酬谢他们的好意，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常会晤陈纳德。对他印象很好，他对中国友善，非常中国化，他的十四航空队对我们很有帮助。陈香梅当时是个记者，到处跟着他采访。

不久，李济深回到了他的故乡广西苍梧。我知道他是去找麻烦的，蔡廷锴去了罗定，张炎回到粤西南。同一时期，许爱周与戴朝恩也回到玉林。



李济深（前排右一）全家合影

我拟订了一个全面反攻计划（见张发奎8月26日日记）。我一贯信奉攻势防卫，不赞成困守孤城，因为长期困守孤城是办不到的。我不愿意像衡阳之战那样，坐等敌军来攻打昆明。我不想在桂林重犯这一错误。我向白崇禧表达这一观点，但他不同意。

在9月上旬，敌军分兵几路进犯广西：第一路，沿湘桂铁路到全县；第二路，从道县与永明到龙虎关；第三路，从四会、广宁和怀集进攻梧州；第四路，从肇庆、德庆向梧州；第五路，从雷州半岛进攻儋州。

^① 白崇禧告诉廷柏曼，“华东的军阀”出力支持，但他们发动的任何政变都会注定失败。1944年8月12日，一个被描述为同李济深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军官在华南说，白崇禧已经同李济深决裂，策划中的政变将会流产。8月15日，廷柏曼与林华特向李济深澄清，美国将（对中国内政）保持“不干涉”政策（详见赫尔与史迪威1944年8月12日致萨尔旦函）。

敌军攻克衡阳后休息了一段时期，不是因为美国空军参战，而是在重大战役之后通常要休息一下，重整部队、补充给养、修理军械等等，交通断绝也使他们头痛。我们已经拆除了铁轨，把所有的机车与车厢都南撤了。

1944年9月7日林赛将军致史迪威电报说，由于我与重庆不睦，我只能少量控制或控制不了九十三、三十一与四十六军，九十三军本来是御林军，三十一、四十六军则是广西部队——当然我对他们要做足礼数。如果有人问，究竟中央军嫡系抑或地方部队容易指挥，我会答当然是前者。譬如，九十三军要是不服从我，我会告诉陈诚或者蒋先生；三十一或四十六军不服从我时，我报告蒋先生，连他都爱莫能助，他也只好对他们敬畏三分。叶肇违抗军令仅予扣押未予枪决便是一例。

1944年9月9日，我去桂林以北的全州。路上遇见六十二、七十九军以及四十六军的新十九师等残部^①，六十二军由黄涛^②率领，含有广东部队；七十九军由王甲本^③率领。他们从湖南撤至我的战区，军纪荡然。我命令这两个军的主官约束军纪，到指定地点集中。我命令将新十九师调回四十六军。^④撤入广西的部队一进入我的战区就要归我指挥，但这类命令要由最高统帅部下达。

我在高参们陪同下，巡视了全县的野战工事，发觉并不合格，全县没有城墙。再者，阵地延伸过于宽广，以致备多力分。九十三军军长陈牧农告诉我，蒋先生命令他死守全县三个月。问他能不能守三个月，他说能。因此，蒋先生下令运送三个月的医药、弹药、粮食等供应品去全县。这一切我都不知晓，也不知道全县守军的实力、城防工事的范围等详情。九十三军装备都是精良的美式装备——卡宾枪与冲锋枪。

基本上我不同意死守任何地方。死守的目的乃是等待援军到来后内外夹击粉碎包围圈，换言之，是为了等候机会反攻。这类战例，譬如1930年在南宁发生过。我们必须订定目标。在全县之役，守军奉命坚守三个月，甚至不惜与城池共存亡。没有援军派出来。我们派不出援军去全县的原因很简单——无兵可派。我认为全县迟早会陷落，牺牲那么多士兵有什么意义？在抗战期间，我从未滥用权力下令死守，我认为“死守”这一做法基本上是错误的。

我相信陈牧农无法实践他对蒋先生的承诺，我甚至认为他守不了三天。但是我相信，如果我尽最大的努力，我能在两周内利用湘桂线把所有军需物资运离全县。考虑到火车车厢与卡车数量不足，至少可以在短期内把重要军需物资后撤到桂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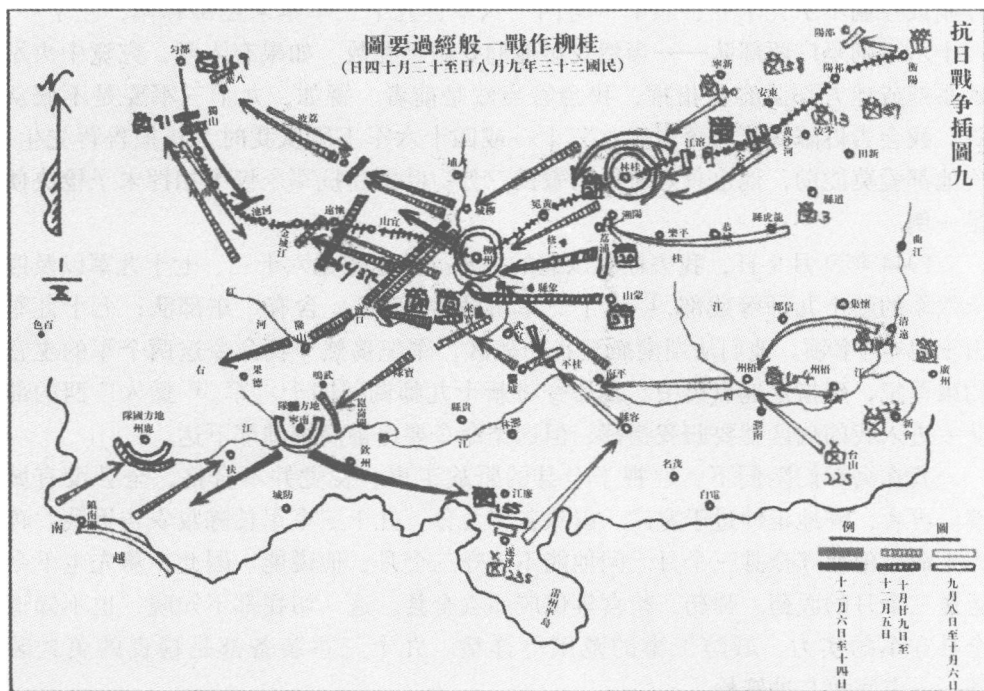
① 9月9日日记说，旅途中遇见上述部队残部七八千人。根据四战区报告，六十二军退入广西时剩下6300名官兵，七十九军剩3476名官兵。

② 黄涛（1900—1973），广东蕉岭人。云南讲武堂十五期，历任粤军排、连长，国民革命军营、团、师长。1939年9月任六十二军军长。1946年7月辞军长职。新中国成立后任广东省政协委员。

③ 王甲本（1901—1944），云南富源人，云南讲武堂十四期毕业、陆大十四期肄业。1938年任九十八师师长，1943年3月任九十九军军长。翌年9月7日在援救衡阳后退至湖南山中铺被敌军包围，以军长之尊亲自与日寇肉搏，被一日兵刺中腹部不起。

④ 1944年9月3日，四十六军军部与四十六军一七五师奉命从衡阳撤至柳州。

陈牧农承认他不能坚守三个月，我告诉他，他最大的错误是对蒋先生夸下海口。我问他为什么要吹牛。他说，他已作了承诺，驷马难追。我告诉他：“陈军长，坚守三个月是不可能的，我期望你守两星期。”我说，我会报告蒋先生，要求减轻他的负担。他感激我的关爱，承诺守城两星期。



桂柳作战一般经过要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提供）

我回到桂林后，9月11日打电话给蒋先生，我说，鉴于兵力不足、防御工事脆弱，守全县三个月是不可能的。蒋先生问我能守多久。我建议让九十三军在全县与灵川之间凭借有利的地形条件抵抗，然而，在9月27日前，九十三军不可撤至灵川以南。我解释道，把军用物资后撤，至少需要两星期。蒋先生同意我的建议。我告诉陈牧农，已经为他向蒋先生缓颊，但他必须对我信守诺言守城两星期。他感谢我帮他摆脱险恶环境。

当天，九十二军守卫黄沙河的部队未经抵抗就后撤至全县的主阵地。^①我打电话训斥他。黄沙河的陷落标志了桂柳会战的开始。谁想到，当敌人逼近全州

① 九十三军由四川开往广西时，沿途拉夫扰民，到处殴打百姓，在贵阳市架起机枪同保安部队斗殴。5月离开四川夔江，7月间到达全州。陈牧农治军疏忽，又不积极备战，有些军官竟用汽车运载物品去重庆出售图利，这些物资不是盗取国有财产，就是从湘粤的商人、难民手中压价买进的，也有强行扣留、明夺暗抢来的。九十七军一六六师师长王之宇、副师长黄淑皆住在重庆公馆中，怕吃苦不随部队行军。陈素农是浙江人，他接替被撤职的湖南人李明灏，军委会中的湖南系人员就扯陈素农后腿，不发给汽车运兵，所以九十七军的物资、给养还得士兵们背着行军，他们连草鞋都穿不上，光着脚板走路，造成士兵厌战畏战。

时，陈牧农恐惧之下，竟放火点燃贮满弹药与粮食的仓库^①。听说全县上空被火映成了深红色。9月13日晚上，陈牧农撤离全州，他拥有最精良的装备，却不能去争取胜利！

我报告蒋先生陈牧农擅自后撤，他命令我立即枪毙陈，接着我收到蒋先生的电话，确认他的命令。不然，我是不敢执行处决令的。蒋先生有权下令立即处决，但他通常是交付军法署审理的，例如张德能案。

陈牧农向我庄严承诺坚守全县两周，但敌人一逼近他就逃跑，我气坏了。损失三个月的医药、弹药、粮食供应所引起的后果是无可估量的。九十三军团以上军官要求我帮忙求情。我没有理由拒绝。另外，陈牧农已往是一员勇将。蒋的恼怒只是原因之一，有足够的理由判他死刑。但作为中国人，我必须为他求情，我们中国人常常强调人情。我请求蒋先生下令将陈牧农移交军法署审理。

9月17日，我派一名高级军官通知陈牧农出席会议。我不能告诉他，他将面临什么——若他知道就会逃走。他晚上才到。9月19日，我收到蒋先生电报，拒绝我的请求。蒋先生严令务将陈牧农枪决后的尸体拍照呈核备案。我将蒋先生的电报向陈牧农出示，问他要不要写一纸遗嘱。他要求我批准他与蒋先生通电话。我打电话给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林蔚，称陈牧农要直接向蒋先生报告，林答：“委员长已经休息了，不必报告，命令已经下达，请长官立刻执行就是了。”我告诉陈，我已回天乏术，我叫他准备遗嘱。我下令夏威负责执行。翌日，我离开桂林赴前方柳州指挥战事后，陈牧农被枪决。九十三军隶属于十六集团军，夏威是陈的顶头上司。

如果蒋先生不越权指挥，这一惨事不至于发生。全县在我的战区，蒋先生应该让我指挥，我绝不会命令陈牧农在第一个阵地死守三个月。是蒋先生自己的过失导致陈牧农之死，为此，我必须批评他。

我还能记起1944年9月14日史迪威将军访问桂林，他来看我，他讲一口流利的国语。在他就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先生的参谋长后，我曾在重庆见过他。史迪威问我桂林能不能守。我说，我不认为白崇禧所说的守六个月可行，史迪威同意我的意见，这就是古人所说“英雄所见略同”。

我赞成史迪威预先破坏桂林的机场设施的命令，我坦率告诉我军打不了胜仗。由于全县失守，离开桂林只有20里路的杨塘机场已受到威胁，我没有足够的兵力去保卫它。还有一个更小的机场完整地留着。三十一军没有移驻桂林外围^②，调动广西部队必须由白崇禧决定。他认为长官部决定以三十一、四十六军

① 据九十七军一六六师参谋长曹福谦回忆，全州是中国军队的西南补给点，堆积的枪支、弹药、大炮、机枪、被服、粮秣以及各种物资、原料，美制汽车、汽油，多到数不清，还有机械化的杜聿明第五军的后方仓库物资也堆积在全州，九十三军这一撤一烧，损失得一干二净，全州城郊烧了十几天的大火。

② 同张发奎商议之后，史迪威于9月18日修订了桂林防卫计划，上呈蒋先生，该计划中有一项乃是建议将三十一军移驻桂林外围，蒋先生同意此一建议并下达白崇禧。因此史迪威报告廷伯曼：白崇禧要去桂林执行此一计划，且已答应让中国炮兵指挥官听从美国联络官的意见。史迪威文件则记载：张发奎对他说，在桂林作战就如同我的判断力作对。

守备桂林的作战计划不恰当，遂把一八八师从三十一军抽出来改隶四十六军，因为他不肯让他的外甥、一八八师师长海竞强驻扎在桂林，又将四十六军军部与一七五师（师长甘成城是夏威夷的外甥）、新十九师和三十一军副军长冯璜以及一三五师（师长颜僧武是白的亲信）也调出桂林；留下守备桂林的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与一七〇师（师长许高阳），前者战斗力最差，后者系全部新兵的后备师。计划改变后，守城官兵都认为无异把他们送葬于桂林，愤愤不平，因此军心涣散、士气低落、纪律废弛、逃亡日增。白崇禧又命柳庆师管区征集新兵补充桂林守城部队，将未经训练的补充兵送上阵地。他下令屯集三个月粮弹，实际上屯集的粮弹不足一个月之用。而当桂北军事紧张时，他已回重庆去了。^①



海竞强

中央军校六分校毕业生防守的龙虎关于9月25日弃守。白崇禧与蒋先生商量于9月27日使用他们的主力部队进攻敌人收复龙虎关。梧州9月20日弃守，容县22日弃守。我认为，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在桂林与龙虎山地区守住防御阵地之际，对西江以北的敌军发动攻击。如果我们处处采取守势，我军将处于一个不利的局面。我希望在获胜之后，能派一部分军队去协助守卫桂林与柳州。中国古代兵法曰：“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我期望的是能够以攻为守。白崇禧与他的参谋们认为这太危险了，他们不敢采取主动进攻。于是我们决定在桂林与柳州都采取消极防守。

我们命令省政府经由各级管道通知保甲长征募劳工，再由他们向每家每户摊派劳力。有时连妇女也要充数出工，给他们每天支付一笔固定的酬劳。他们每天自备食物，日落才回家。军级单位不敢直接征募劳力。如果征募不到劳力，军人便得自己修建工事。

我们让省政府逐级下达命令给保甲长，为我们征募挑夫。军需署署长陈良从重庆来帮助我们制订计划。按规定，独生子可以免征，但有时也会破例。按规定军级单位不可以直接拉夫，但他们有时会违规。

一般来说，我发现抗战时期的运输问题比以前困难得多。军级单位与兵站的运输调度不甚妥切。面对敌军三面来攻，我们的运输设备却很分散。再者，军品运输常常被大规模的难民行动阻延，他们到处充塞着铁路与公路，涌进火车车厢填满所有能容身的空间，甚至攀到车顶。当然，我们不能禁止他们搭乘火车。

我们在通讯联络上遇到很多困难，没有足够的电话与收发报机。由于广西许多地区地形多山，无论使用何种设备都会遇到故障。我们的情报工作仍是不符合预期的要求。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就是指情报工作。敌人是

^① 此处英文誊本缺一页，经在美友人数十次赴哥大交涉补回此页，遗憾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以“无人懂中文”为借口，拒绝按职业道德补发此页。

经过良好训练的，他们派遣汉奸假扮难民渗入我方。^①譬如在淞沪会战时，我的部队发现有信号弹导引敌军轰炸目标，但我们抓不到汉奸。

作为桂林本地人，白崇禧认为他能运用民团凝聚民众，使他们负责牵制敌人的行动。实际上我和他讨论过几次，当湖南战局转危时，我早就向黄旭初作过同样的建议，我感到在抗战爆发以前，民团曾起到显著的功效，但我们都明白这是临时抱佛脚了。民团总部^②设立了，但没有足够时间去组织地区分部。

瑶族聚居在桂平、荔浦、桂林之间的多山地区。我们期望利用他们担任向导、侦察等工作。广西省政府负责对瑶族的政治工作，但由于平时对他们不够重视，所以想组织他们协助国军殊不容易。我们甚至不能在任何瑶区调查户数。我们没能动员他们参加抗战，因为我们撤得太快了。

（据张发奎 1944 年 9 月 5 日日记）我宣布所有官兵潜逃一律视作临阵脱逃。临阵脱逃是唯一死刑，我必须作此宣布借以约束军纪。我常在前线，由长官部高参李汉冲^③与少量下属陪同。李汉冲是陆大毕业生，由他同学推荐给我，他年轻、勇敢、有文才，且刻苦耐劳。

我感到吴石当参谋长并不称职，（据 1944 年 10 月 8 日日记）因为他的私生活不够检点。他不能以身作则，志大才疏，能不称官。9 月 24 日我们决定在一周内把长官部转移到六寨。由于我经常在前线，吴石在柳州指挥所负实际责任。意志坚定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但他消极、被动。虽然以前他提过许多建议，但他很少暴露思想。事实上，我真不该为此指责他，因为他大多数时间在中枢任职，从来没有带过兵。



吴石

我的前线单位对长官部，尤其是参谋处不甚满意（详见张发奎 10 月 19 日日记）。由于同事之间的意见不合，流言飞语太多，前线部队抨击长官部，总之纪律松弛了。长官部参谋们与前线的参谋们联络不够，也许我的参谋们有点骄狂。

十四航空队对桂林防卫的贡献很大，他们实施空中侦察，为我们提供敌军动态

^① 据一六六师参谋长曹福谦回忆，汉奸、日谍混杂在难民中间，甚难清查。敌人的先头部队和便衣队混在人流中进入我们的警戒线，哨兵没有察觉，不知混入多少人次才被第一线部队发现。第一线的连排长们就不分青红皂白，命令士兵向人流乱开枪才将敌人的便衣队与先头部队打出去，但同时也把逃难的民众打死了千把个。

^② 从 1944 年 10 月 14 日油印的《白副总长告广西全省民众书》可知，白崇禧拟定了民团组织大纲，由张发奎任民团总司令，黄旭初副职，下设十个地区分部指挥各该地区管辖县份的自卫团队，所有 18 至 45 岁的壮丁都要加入自卫团队。

^③ 李汉冲（1908—1972），广东梅县人，中央军校第七期步科毕业。1936 年任九十五师少校作战参谋，1939 年任中校参谋主任，1942 年任驻印军上校作战参谋，1944 年任四战区长官部高参、少将参谋处长。1946 年 3 月任广州行营参谋处长。1948 年 6 月任福建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949 年 5 月 21 日在闽西通电起义。新中国成立后任广东省林业厅副厅长，著有《国防新论》、《桂柳会战经过》等。

的情报；还轰炸敌人的交通线、仓库；也轰炸敌军，但并不容易，因为敌军同我们一样多数在夜晚行军，难以辨认。凡有关我部的事都由鲍曼上校的联络团通知我。

美国空军始终维持着空中优势，此时敌人的空军已经日暮途穷。敌军轰炸我们的城市与军队，但尚未造成严重伤亡，因为我们建立了相当出色的防空设施，能事先拉响警报。

9月下旬，六十二、七十九与六十四军抵达四战区。10月5日，杨森率二十七集团军抵达桂东平乐，辖有杨汉域的二十军与丁治磐的二十六军以及广西人罗奇的三十一军，后者系中央嫡系。这些全是从湖南战场溃败下来的部队，都严重缺额^①。

军、师级单位上报长官部的兵力数字比实有人数少，因为他们害怕再被指派担负艰难的任务。上报长官部的人数与上报中央不同，他们上报中央则是多报。

敌人沿西江进逼时，我们不顾中央作出在柳州、桂林取守势的决定，断然实施我先前提出之在西江以南发动攻势的计划（见张发奎11月11日日记）。美国人十分赞同我进攻桂平敌军的计划。鲍曼上校同意我拟订的攻势防御计划。我们也同其他美国人讨论进攻计划，包括同文森将军讨论过。我同鲍曼上校的关系很好，他从不饮酒，沉默寡言，如粤谚所说是个“执金都唔笑”的人。然而，他有幽默感。当然，他明白，在四战区几乎没有美制装备。

鲍曼上校与其他美国人对四战区有很大帮助，他们帮助我们拟订军事计划。他们深入战区，认真了解真实的战况，提出妥切的建议。他问我中央有没有把美制装备派发给四战区，我答“没有”，他感到这是很不公平的。他见到我确实未得到美制武器，所以对蒋先生很不客气。

10月14日，史迪威突然来柳州作突击巡视，与鲍曼直接到长官部来见我。他对人和气，有幽默感。我的部下认得他，通报说：“那老人来了。”

史迪威同意我的进攻计划，想知道我们需要多少实质援助、美国空军应怎样配合我们的进攻。他问我的部队有没有吉普车、冲锋枪与收发报机等等。我告诉他，什么都没有，他对我表示歉意。中央对各战区的待遇是不同的。史迪威对我（没提及共军）没得到美制装备感到惊奇。他要鲍曼为我领取一辆吉普、四把冲锋枪、一把卡宾枪以及十二套无线电台设备，这些设备原本属于驻柳州的美军联络组。史迪威本来不应直接给我，因为规定一切装备须由中央调拨。由于这些装备是给我个人的，我便接受了。

我留下一套无线电台设备，其余给了刚抵达的广西部队——同他们保持良好关系是必要的。这使我想起一则笑话：当六十二军军长黄涛见到长官部的新式装备时，他说：“这支卡宾枪太棒了，给我吧。”我说：“不可以。”他很生气，立

^① 1944年9月初，据报兵力如下：二十军4567人、二十六军4522人、三十七军2056人、六十二军6300人、七十九军3476人、三十一军9190人、四十六军20830人、九十三军20958人、六十四军11680人、一三五师（属三十一军）3800人、一五五师（属六十四军）2547人。以上数字不包括非战斗人员。一五五师有一个团与四战区之一部驻防高州与雷州半岛，并不包括地方部队。

即走出房间。此人脾气很坏，考虑到得罪了他后果不好，我叫副官立即把卡宾枪给了他。卡宾枪很轻巧，他也许要这把枪给他的卫士使用。

史迪威在桂柳会战中帮了我很大的忙。他是个好朋友，热心，长一张和气的脸庞，对我友善，热爱中国，竭力帮助我们。我们相处得非常好。史迪威在装备共军问题上与蒋先生意见分歧。他认为将落后装备补给同样参加抗战的共军是不公平的。他对我说，蒋先生在分配美制武器方面不很公平，把大多数给了他的嫡系部队。虽然共军并不在重要战区活动，但他们也参加了抗战，然而蒋先生甚至不给他们医药供应。我感觉史迪威有点偏见。他不懂得，援助共军就等于扶植它的力量，蒋先生看透了中共利用抗战扩充实力夺取地盘的“企图”。

中共的第十八集团军驻扎在一战区——一个不重要的战区，由阎锡山统领。所以，不给他们武器是公平的。但共产党嚷嚷道，为什么叫他们抗战而不发给武器，周恩来常常为此当众流泪……不仅感动了美国人，连我有时都不禁感到政府对共军有点不公。我觉得，至少要发点医疗用品给他们，毕竟他们也在抗敌。听了史迪威的话之后，我特别为国共关系发愁。但是，只要敌人存在，我就不必太担忧，我是发愁战后的国共关系。我很清楚，既然我们在抗战前没办法消灭共产党，那么，面对愈来愈发展壮大的共军，战后我们一定会面临更艰险的局面。

美国人希望蒋先生授权由史迪威来指挥中国军队，^①我十分支持。史迪威了解中国的局势，识中国文字，我们是盟国，我不知为什么有人认为让美国人指挥中国地面部队会让国人蒙羞。美国人建议利用共军对付日军以缓解军事窘境，^②这个计划很好，但我感觉不可能执行。

史迪威说，胡宗南部队应该用来充实前线。我认为，从国家民族的观点来看，从西北调胡宗南部队自然是合适的；但从国民党的观点，这很难回答，因为胡宗南部队一旦调离西北，共军就会填补真空扩大势力范围。有识之士会说，鉴于共产党奉行扩张政策，胡宗南部队驻防西北地区监视共军是完全必要的，中央政府别无选择。所谓十八集团军根本不服从军令，蒋先生从不信任共产党。政府管不了它们。

当时在重庆正举行国共代表会谈^③，我没太注意这事，因为我正全神贯注于前线军情的紧张局面。

10月18日，史迪威被美国政府召回，我感到这对中国是一大损失，因为他十分了解中国的情况，懂得中国军队的心理，且其本身工作勤奋。这位老人（时年61岁）经常巡视前线。当他认为蒋先生有错时，敢于当面直陈。

我计划调动六十四军（缺一五五师）与四十六军在桂平地区展开攻势。张弛率领的六十四军与邓龙光率领的三十五军军部已经从广东的七战区调来归我指

① 1944年7月初美国政府公开宣布，希望蒋介石让史迪威直接指挥，7月12日蒋原则上同意了这一建议。

② 美方计划用美国武器装备共军，由史迪威直接指挥。

③ 1944年10月13日，中共首席代表林伯渠在会谈中正式提交一封要求成立联合政府的函件给国民党代表。

挥。我下令六十四军发动攻击，四十六军充当预备队。虽然四十六军有两个师参加了长衡会战，但情况还不算太坏。四十六军同六十四军比较，我觉得六十四军强一些，它的装备较好。参谋长吴石与参谋处长李树正主张用六十四军与四十六军同时进攻敌军，对这种做法我有自己的主意。

我命令三十一军的一三五师（师长严僧武）与唐纪率领的广西保安团第一、第二纵队进攻平南西部敌军。以上部队组成左翼军。罗奇的三十七军配属邓龙光指挥，其任务是配合左翼的军事行动。

10月21日，六十四军对桂平（在西北北岸，已沦陷）发起进攻。该部从广东开拔，行军一千里路在进攻前一日才到达石龙，所以没有足够时间了解战场形势。它本应休息一下，但我没办法，进攻兵力不够。六十四军包含新组建的部队。

我很激动也很得意，这是我第一次向日寇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也是我第一次指挥空地联合作战。美国低级军官、士官、士兵加入了我们的前线部队，他们配备了无线电台，所以能引导第十四航空队的战机，这些美国人很勇敢；美军飞行员也很勇敢，他们低飞轰炸敌军，在能发现敌军时，战果十分辉煌，不像俄国飞行员要休息到奉命起飞为止。简言之，美国人给予我们热忱的支援。

我有信心夺回桂平，然而，我知道即使成功了，如果敌人反攻，我们仍会失败。我希望赢得尽可能多的时间。有人说，我们明知最后会失败还发动对桂平的攻势，这是为了显示我军的威武不屈精神。

10月27日，第一三五师与广西省保安第二纵队从平南地区后撤。翌日，我命令四十六军接替攻击桂平周边的蒙墟。28日，六十四军占领了三分之二的蒙墟，但当晚敌军增援时，又被迫撤出。我命令四十六军再次夺回。29日，我下令部队撤到桂平以西的新阵地。

我下令邓龙光守住武宣以便掩护国军撤至柳州以及阻碍敌军前进，^①当晚我奉白崇禧指示返回柳州。

10月31日，我下令部队摆脱敌军。我估计我们难操胜算，同时我们担忧桂林前线，敌军已经穿透桂林的周边（10月28日九十三军从高田撤至桂东北，10月31日敌军进抵桂林郊区。详见张发奎日记10月28日与31日）。我们担忧，敌军占领桂林后，将同从龙虎关进逼荔浦的敌军会师。换言之，柳州已遭受直接压力。故我们必须停止桂平攻势，我下令部队向柳州转进。莱德上校的英军援助团派来的爆破专家炸毁了蒙山——荔浦公路上的所有桥梁，以阻延敌军的前进。

我告诉鲍曼上校，中国士兵的士气已经崩溃，丧失了战斗意志。我的部队士气很低，里面包含了溃退的部队，进攻失利通常会使士气低落。在北伐期间，我部士气经常高昂，因为我们攻无不克。我对鲍曼无所不谈，把他当成中国人，优

^① 据1967年6月9日夏莲瑛在台北访问邓龙光时，邓说，当时张发奎对他说，除非他守住武宣，否则美国飞机会撤离柳州。

点与缺点都不隐讳。

既然我们地面与空中都占了优势，攻城部队多于敌军几倍，为什么打不下桂平？（详见张发奎10月25日日记）那很难解释，原因很多，主要是战术上的错误，特别是四十六军与六十四军之间配合得不好，步兵与炮兵、空军也配合得不好。另一个原因是天气不良。大雨、浓雾阻碍了我们的进攻，也削减了十四航空队的出动次数，以致放慢了我军的进程。

蒋先生（11月2日亲拟文稿）发来电报，要我“守住桂柳待命”。我的同事们同我一致认为这是做不到的。柳州不像桂林有城墙与山洞，防御工事薄弱，缺乏防守的所有必要条件。看一下地图，柳州城的中心是县政府，地处柳江的北岸，我的长官部设在南岸。全市两个部分只能以渡船联系，到冬天才能搭建浮桥。北岸容易受到来自桂林、桂平、平乐等各方面的攻击，因其北靠柳江，一旦战事失利，便无路可退，所以这座城是无法守卫的。再者，我指挥守柳州的只是从长沙溃败残部，我反对作出不必要的牺牲。我认为古话“不成功则成仁”是不智的。我报告蒋先生，柳州守不住，要求他改变命令。他没有答复。

我集中了柳州附近的部队，主要依靠杨森的二十七军^①。鉴于部队战斗力薄弱，我不得不采取内线作战策略，这就意味着我们放弃周边防御。坦白讲，这一策略比较容易执行，因为缩小了作战范围。诚然，如果有大量部队可以调度，我不会采用这一策略。在我的部队安置完成之前，11月5日，九十三军在桂林以南的永福被击溃。翌日，夏威与他的参谋长到达柳州。我担心我军会被包围，遂通知美军人员离开柳州。

我与参谋长吴石在我的去向问题上产生歧异。他主张我去六寨，但我认为离前线近些是必要的，可以激励士气。故我要他前去六寨，虽然参谋长通常要跟随长官。

11月7日，我命令杨森接手柳州地区指挥重任，命令与部属失去联络的夏威前往宜山候命。我们开始破坏柳州的机场与铁路设施。文森将军告诉我，他要陪伴我留在柳州。

11月8日，我的指挥所迁移到黔桂铁路线上的宜山，我去大塘以便指挥邓龙光部以及在柳州的部队。随行有鲍曼、李汉冲、几位下属以及若干警卫。离开柳州前，我下令烧毁我的越式木屋，我不想让日寇占有它，那是我们在柳州焚烧的唯一建筑物。在抗战期间，我在柳州与其他地区从未执行过焦土政策。

敌军逼近柳州，我命令二十六军军长丁治磐在柳江南岸尽可能坚守，该部虽在湖南激战过，但状态尚可。换言之，我授权他自行处理后撤事宜。

^① 除了守卫红水河与柳江的部队，其主力已集中到柳州。从张发奎10月4日、5日日记可知，张命令杨森率二十七军在修仁地区摆脱敌军向柳州集中。

11月9日，韦云淞从桂林来电称敌军已占领省政府所在地。^①我要求蒋先生允许桂林守军突围，但未获准。^②当天我与桂林的电话被切断。

韦云淞逃出桂林。^③城防司令一走，其部下便不可能继续抵抗，有些人突围了^④，伤亡极为惨重，三十一军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在七星岩山洞自杀身亡。^⑤

敌人使用了毒气，其实它根本不必违反国际公法诉诸这等残忍手段，要对付山洞里的国军只须使用烟幕弹就能奏效的。在战争中发生的事是讲不清楚的，敌人残忍极了。在那乱局中，幸存一命就不容易了，谁能保留毒气的证据？

（10月31日奥伯特·魏德迈将军接替史迪威担任蒋先生的参谋长，兼任中国战场美军总指挥。不久后，他催促九十七军的美国军官协助修筑阵地）魏德迈将军收到报告并转交蒋先生，指责桂林柳州两地抵抗不力。

三十一军这么快就弃守桂林，我也感到惊奇。正如我已说过，桂林的有利条件是多山地形、坚固的城墙与防御工事，它不应该这么快就放弃。至于柳州，我们没有接战，是的，在柳州始终没有抵抗。

11月11日，同夏威与长官部高参们商谈后，我决定根据桂柳战役的损失，重新部署部队。我下令所部坚守柳州以西的洛城—宜山—忻城一线直至下一步命令。11月12日，我的指挥所又后移到河池。夏威与他的部队失去了联系。杨森是个圆滑狡黠的人。他一直说部队集结不成，经常为自己找出些借口，故我不能有效地控制我的部队。

军事行动集中到黔桂铁路与公路。我原本期待敌军攻占柳州后喘息一阵，但事与愿违，它们尾追而来。我只有特务团伴随，缓慢地从一地撤到另一地。我希

① 下级官兵在桂林防御战的表现还是不错的：11月2日敌军向北门甲山北攻击被击退；11月4日，守卫屏风山、猫儿山各一排步兵，除重伤外，全部殉国；德智中学以西山地守军一连仅生还8人；11月6日，攻击北门的敌军战车8辆被我战防炮击毁2辆，敌伤亡颇大；7日敌攻西门之战车被击毁3辆，北门1辆；8日，敌集中15厘米口径的加农炮30多门、山炮百余门轰击城内，摧毁沿河之线守军阵地，才强行渡河突入中正桥以北盐街。

② 11月9日张发奎收到白崇禧电报，他将电文转达韦云淞与其他防守桂林将领，电文署日期是11月6日。

③ 桂林原来计划留市政府、警察局在城内维持秩序、协助守备部队作战，每户留壮丁一人在家看守私人财物。紧急疏散时白崇禧特准其亲信、市长苏新民、警察局长谢丰年疏散离城。因此桂林城内只剩下守备部队。守城官兵纪律松弛，各打主意。城防司令韦云淞、军长贺维珍、师长许高阳等，领得全军三个月薪饷及主副食费后，90%送回家里，仅携带10%的经费入城，他们是准备桂林失守发国难财的。下级官兵每晚四出去民房翻箱倒柜、搜寻财物，见鸡杀鸡，见狗割狗，把居民留在桂林的财物抢得精光。由于城防费被克扣绝大部分，全部副防御无铁丝网，仅用木材钉成木栅，无照明设备，阵前仅敷设少量地雷。

④ 11月9日晚上，三十一军擅自突围。后来蒋介石批准了这一行动。11月11日，林蔚打电话给张发奎，下达准许桂林守军突围的命令，但长官部与桂林的电话早已被切断。

⑤ 11月10日下午，韦云淞召集高级将领开紧急会议。首先责备一三一师阚维雍部队作战不力，被敌突破中正桥以北沿河阵地而窜入城内，造成腹心之患。他说，官兵伤亡过大、势难久守，征求各人意见。大家都不吭声，他就决定弃城突围。散会后，阚维雍回到师指挥所，让师部人员集合在会议厅等待他开会，回房后即以手枪自杀。他奉命守桂林时即下决心与城共存亡，写下绝命书寄给住柳州的家属。一七五师两个营奉命反攻时，营连长阵亡殆尽，城防司令部参谋长陈济桓阵亡，一七〇师少将副师长巢威受重伤。

望尽量接近部队，因为我认为，我在前线出现会对部队起到安定作用。我担心部队发生恐慌与崩溃，只要敌人尾追加速，部队就不免要溃散。

经过两星期几百公里的跋涉，我们后撤到六寨。部队的行进被大量的难民行列所阻碍。^① 为了避免敌机滥炸，他们只在夜间行动。撤离桂柳同撤离上海相比，撤离上海的情形更为混乱，但从上海逃出的难民没有排成一字长蛇阵，也没有延宕这样长的时间。在这段期间，第十四航空队继续执行空中侦察，并空袭敌军。敌机并没有轰炸我们，在撤退过程中，我从未见过空战。

11月14日，宜山失守。翌日，中央命令我炸毁怀远以东十几列货车，其中包括美援装备——武器、弹药、医药以及通讯器材。我从未知悉那儿贮存了那么大量的装备，诧异为什么中央不把它们分发给我的部队。把这么多装备移走是不可能的了，我身边只有卫队与特务团。我让他们随意选择，拿得动多少拿多少——卡宾枪、冲锋枪等等，我下令一家工程公司将这十几列货车全部炸毁以免落入敌人手中。

11月21日，蒋先生命令我部向南丹和六寨退却，还将汤恩伯部队暂时拨归我指挥，准备黔桂铁路沿线的军事行动。次日，我到达南丹时见到九十七军军长陈素农，他是汤恩伯的部属，我还见到汤恩伯的副手孙元良。我命令九十七军防守金城江。^② 原本的计划是汤恩伯戍守金城江以西的黔桂边境地区，但我们无法执行。我的部队都西撤了，无法再召回他们去抵抗，就只好依靠九十七军了。

我不能说九十七军对我态度良好，也不能说不好。中央嫡系部队一向待我不错，但在陈牧农被处决后，他在中央嫡系部队服务的黄埔同学对我态度有点改变。他们指控我因为最高统帅枪决了第四军军长张德能中将而予以报复。他们搞错了，张德能到第四军任军长是1943年的事，可我1932年8月就离开第四军了，他从未做过我的下属。翌年我去重庆出席四中全会时，重庆的若干陈牧农同学与同事竟在重庆大派传单，指责我诱捕陈牧农公报私仇，还在中央党部附近张贴“打倒张发奎！”“为陈牧农报仇！”之类的标语。其实枪决陈牧农系秉承最高当局之电令执行，中间且经我婉求曲容，无奈极峰电令再三，故终不免，何尝有半点私仇呢！

^① 据曹福谦回忆，公路上填满了人，连开步的空隙地方都找不到一小块。人走不动就横卧在公路中间，后边的人就踏在倒下去的人身子上走过去，有时先倒下的人将后来者绊倒，一连倒下几个。难民的脚肿得很大，用破棉花包着，像骆驼似的，左摇右摆行走。大人小孩饿死在路上，肚子胀得像一面鼓横在公路上，虽是至亲骨肉也不屑料理一下后事。烧毁的大小汽车像死乌龟一样，一辆辆趴在路上，长达数十里之长。其间有能开动的车，被前后的坏车挤着，也就不能动了。公路两边堆积的公私财物实在太多，只要你有力气就尽量拿，谁要有车就能领走一位十七八岁的姑娘当老婆。在六寨附近大山塘山脚下公路上横跨着30米高、250米长的钢骨水泥大桥。11月26日，国军为阻止敌军前进而炸桥，工兵一再喊叫，人流还是挤过去，逃难的人走得昏头呆脑，人流根本止不住。张发奎说：“丢那妈，不管啦！炸了算啦！”一声巨响，连桥带五六百民众同归于尽，血肉横飞。走不动的难民落在后边，成批被日寇抓去集体枪杀。日军在南丹、金城江、六寨、独山等地屠杀难民与本地居民总数逾十万人。

^② 11月10日汤恩伯奉委出任黔桂边区总司令。军令部划分四战区与边区的防区，金城江划归四战区管辖。

在赴南丹途中，我在一所茅屋过夜。通常我可以在学校之类的建筑物中借宿。在茅屋附近，我遇见著名影星胡蝶与她的丈夫潘友声。幸亏我们以前见过面，不然她不敢求我帮忙。故我让她搭乘一辆开往独山的军用车辆。所以此后她经常对人说，如果没遇见我，她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胡蝶

既然我对吴石不甚满意，为什么又要吴仲禧劝说他别辞职呢？^① 吴仲禧与吴石是福建同乡，吴石是高级军官，中国人爱以辞职表示清高。劝他留下不成功，最后我批准他请假。我把他的辞呈上交中央，建议让他换一个单位，并要求派人接替他。有些参谋悲观彷徨，另一些参谋则离开了。^②

11月24日我到达六寨，这是一个黔桂边界上的小镇，有几条街和许多店铺。我很诧异，负责戍守金城江的孙元良已到了六寨，他跑得这么快，太怕死了！我问他为什么来六寨，他不敢回答。我要他马上回前线去，不然我就枪毙他。他低下头回前线去了。他甚至不知道他的部队撤到了何处，我在《抗日战争回忆记》中没有提及此事。^③ 后来中央调查孙部的行踪，如果我报告他独自逃往后方，他不枪毙也要坐牢。

我打电话请示蒋先生，他要我去贵州，那就意味着离开我的战区。我本人想留在自己的战区，经东兰去百色。奉蒋先生的命令，我们准备把长官部迁到贵州都匀。^④ 敌军向六寨逼近。军中的老弱便遇到一个大难题。他们不能跟着行军，我们要打仗，随时都会后撤。既然不能妥善留下他们，就必须用铁路或公路把他们疏散到后方去，他们不能长途跋涉，又不能雇挑夫运行李，交通设施又不敷运用。无论动用何种交通工具去疏散他们，都会影响运兵。这真是件头疼的事，问题出在：后方已经变成了前方。

我必须决定把这批滞留在六寨的老弱安置到何方。当副官处长问我时，我指向地图，命令将他们送去贵州平舟（今平塘）。我派萧庆华设立一个后方办事处照顾他们。他去向贵州省主席吴鼎昌报告，我们欲在贵州设立办事处安置一批家属，需要设施与帮助。吴鼎昌答应帮助，这类要求是永远不会被拒绝的。后方办事处找到了居所，省府还供给食物。她们的丈夫直接汇钱去。我自己的家属由汽车送去贵阳。处理军眷是最棘手的事。战时军眷造成了大问题。如果她们被照顾

① 见11月22日日记。

② 参谋处长李树正辞职走了，接替他的是李汉冲。

③ 据曹福谦回忆，24日夏威的四十六军乱哄哄地撤下来，张发奎下令缴他们的枪，曹碍于友军，又不想开罪白崇禧的亲信，便未执行此令。他说，张发奎的汽车开到半路被难民挤坏，车抛锚开不动了，坐镇一方的司令长官也只好气喘吁吁地徒步爬山。

④ 11月26日日记说长官部一部分成员撤往都匀，指挥部人员只能乘火车了。

得周到，军官们就会全力去打仗。否则，挂念家属可能会影响他们的战斗力。

鲍曼与其他美国联络官从柳州出发，一直跟着我。他们有自己的卡车，在六寨还用上了电灯，因为拥有自备发电机。

11月27日，当飞机低飞掠过这个小镇时，我正站在汽车站，它暂时充当我的长官部。我们清楚分辨出是美国飞机，我们高兴地冲出去观看。料不到飞机上忽然扔下炸弹来，我的张姓警卫当场被拦腰炸成两段。很幸运，我站在门口，不然我也被炸中了。飞机还轰炸我们在六寨的高炮与炮兵部队。17架飞机低飞轰炸了半小时，把这面积不及3平方公里的小镇化为一片火海，长官部一员中将、两员少将、八员上校、近千名校尉士兵以及上万难民都葬身火海，尸骨无存，重要物资全被炸毁。事后查明原来是后方情报员译电报误将六甲译为六寨，结果美机未去轰炸日军前锋驻扎的金城江附近六甲镇，反而狂炸150里外黔桂边界国军驻地六寨。事后，译电员虽被军法署判处死刑，但四战区之元气已大伤。

美国飞机误炸，^①死了大量中国军民，这是我毕生遭遇之最大惨剧，桂柳会战也是我一生戎马所遇到之最不幸的战役。鲍曼交给我文森将军11月29日八点十五分从昆明发来的电报，他认识到误炸事件给中国军民带来的巨大损害，不知如何才能弥补这一重大过失。大祸已经酿成，忏悔又有何用！但我思忖，如果这么多炸弹扔到准确的目标——六甲的日军前锋，敌人的日子一定不会好过！绝大多数军用交通工具与重要设备的损失，当然增加了我们的困难，坦白讲，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再作出任何真正的抵抗了。四战区参谋处所有的文件——包括作战计划与军事训练——都化为乌有了。

11月28日我离开六寨经独山去都匀。贵州形势也乱开了，28日敌军占领南丹，且越过黔桂边界进入贵州追击我军。这是我们最不愿见到的局面，我们一直认为敌军进不了贵州，这本来就是往贵州方向撤退的原因。

11月30日魏德迈向蒋先生陈述：他接到报告称薛岳与我违抗进攻命令，然而蒋先生答称，薛岳的命令已下达，但给我的命令尚不足，已派特使亲自送达。我觉得魏德迈的说法荒谬：我们正在撤退，怎能进攻！我已几乎失去所有的新血部队了。其实我从未接到进攻命令，我对魏德迈所说我违抗进攻命令之事一无所知。

我打电话给蒋先生，要求免除我在黔桂线的指挥权（见张发奎11月30日日记）。因为虽然汤恩伯名义上归我指挥，但他直接指挥黔桂铁路线上他的部队。我不希望我的部队在听从谁的指挥问题上引起困扰，我想避免误会。既然我在广西就对部队失控，我成了无兵司令——失去了自己的战区，进入贵州，犹如一支败军进入了邻国。我感到处境尴尬，故请求蒋先生免除我在桂柳线的指挥权，让我回到自己的战区。我想回百色，重新指挥驻桂的部队——夏威夷的十六集团军与邓龙光的三十五集团军。12月1日，我接到蒋先生的电报，免除我在黔桂铁路

^①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印行的《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辑刊载了原九十七军一六六师参谋长曹福谦撰写的《湘桂黔大溃退目睹记》，有云：“六寨是个大集镇，被日本飞机炸平了，张发奎几被炸死。”

线上的指挥权。

桂柳会战失利的主因是士气低落，不同层级军官的战斗意志都动摇了。桂柳会战主要是由溃败部队担纲的，没有预备队，也无增援部队。其他因素是次要的。例如，我们犯了战略错误，但这一点并不重要。主要的战略错误是，在黄沙河失守后，所有的部队都应该集中防守桂林与柳州。例如，我们不应该企图抵抗龙虎关地区的敌军，兵力不应该分散。其次，进攻桂平失利后，我们所有的部队应该立即撤到柳州。如果这样做，邓龙光的部队便不会被切断，他就会有修筑阵地与集结部下。

广西人民对国军的态度不如以前了，他们以前很好、很合作。^① 态度变化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军纪变坏了，所以这次就没有跟随我们一起撤退。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的装备羸劣。

桂柳会战，三分之一官兵阵亡、负伤或失踪，被俘的却不多。失踪人数很严重，有些人在撤退途中乘机逃跑，情况比淞沪、武汉会战严重。当然，有些人后来又返回部队，我们无法辨别掉队者与逃兵。

运送伤兵很困难，我们主要用铁路运送。把伤兵从前线运走的机构，组织并不理想。但我记得，我们很少把伤员留下，留下来的只是个别事件。

那时药品与设备俱缺，伤兵已运往后方，轻伤员伤势恶化，重伤员则变成不治。在抗战期间，因医药不足而蒙受的痛苦与日俱增。我们一直面临霍乱症，但并非特别严重。

日寇 1944 年的进攻，兵力、作战计划等方面都是战争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中央没有给予我足够的权力行使四战区司令长官的职责。在桂柳会战开始之前，中央在决定部队调配与其他重要事务方面都没有同我咨商，只是把作战计划交给我去执行。蒋先生要白崇禧去广西协助我，^② 那就意味着我被剥夺了权力。我原本可以直接同中央咨商，这一下就不得不接受他的指导。白崇禧在桂林与重庆之间来来往往，名义上我要为桂柳会战负责；实际上，这是中央的责任。

在 1939 年至 1940 年的桂南会战与 1944 年的桂柳会战中，我的战区是全国十二个战区中唯一由中央派人来负责指挥的战区。前此在淞沪、武汉会战时，李济深与陈诚也莅临“指导”过。要不是陈诚肩负六战区重任，他也许会光临广西指导的；至于李济深，他早已出局了。中央派白崇禧来我的战区，似乎认为我能力不足。倘若中央真正认为我无能，那么为什么会让我继续充任四战区司令长官呢？答案很简单：让我留任四战区长官是由于我的威望。

^① 据曹福谦回忆，九十七军从重庆出发前，得了许多慰劳品，在贵州遵义、贵阳、都匀、独山都得大批的慰劳品，开过群众欢迎大会。民众期望国军打胜仗保卫安宁。

^② 一七〇师少将副师长巢威在《桂林焦土抗战亲历记》一文中述及：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对白崇禧一意孤行、改变他的计划深为不满。

第十六章 准备反攻

(1944年12月至1945年8月)

1944年12月2日我去贵阳。我去看望汤恩伯，并将除了四十六、三十一、六十二、六十四、三十七军以外的指挥权移交给他。^①我也见到何应钦，由于军事形势严峻，他被派到故乡贵州。

贵阳混乱得很。敌军于12月5日攻占独山。人们都预料敌军会长驱直入贵阳，民众需要疏散。我不相信敌军会直逼昆明与重庆，我不认为它们会走那么远。我认为它们会拿下贵阳，以便切断重庆与昆明之间的陆上交通。三日后，敌军突然撤出独山，一路退回广西。

鲍曼告诉我，他已接到命令，组织美军战区联络团随我去广西。他还说，麦克缪将军要他去汤恩伯那儿，但他拒绝了，他想跟我在一起。许多美国人被派到中国军队，有些在军级单位任联络官，其中有军士、少尉和中尉。^②

12月8日，我离开贵阳，沿着交通要道贵州公路，经安顺去广西百色。长官部同事、战区部队以及附属单位陆续抵达安顺，大多数人是赤脚走来的。有些下属离开了，有些辞职了，许多人悲观消极。每次打了败仗后，都会有勇敢的军官留下来，胆小者离开，开小差的并不限于士兵。为了维持军纪，我开除了所有不到安顺报到的军官以及不请假的军官，我觉得让他们离开比较合适。

为了等待安龙与八渡之间公路的完全修复，我在安顺逗留了近两周。它的主要部分是当地政府征募的苗族人修复的。12月21日，我起程去黔桂边界附近的安龙，途经沙子岭，公路在那里分岔，一条入滇，另一条入桂。

我在安龙度过圣诞节。我邀请鲍曼及其联络团成员出席圣诞派对，自柳州撤退以来，他们一直对我不离不弃，我感激他们在最艰难环境下给予我们援助。

12月27日，我们抵达百色，受到广西绥署与广西省政府的欢迎。邓龙光率领三十五集团军的六十四军与六十二军已由迁江到达田东；夏威的十六集团军经

^① 据罗曼纳·桑德兰著《一九三九——一九四五年的中国》一书记载，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包括二十六、二十九、二十、十三及七十一军共10个师；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包括四十六、六十二、六十四及新一军共11个师。但温哈熊译的《中日战争史一九三七——一九四五》称第二方面仅有四十六、六十四两个军共6个师，第三方面军有二十、二十六、九十四、七十一、二十九军共14个师。

^② 为了强化美军联络与训练人员的组织，1944年11月17日，魏德迈聚集在华的美国军事训练团、联络组以及现存的后勤学校转入中文训练与战斗指挥课程，由杜诺万将军统率。美军联络官下放到师一级部队。12月11日，两个美军联络团离开鲍曼，分别加入邓龙光的三十五集团军与夏威的十六集团军。

东兰与凤山到达田州，包括四十六军与韦云淞贺维珍带领的从桂林突围出来的三十一军官兵。广西幅员宽广，敌军终究无法消灭他们。罗奇率领的三十七军与中央陆军官校六分校主任甘丽初带领的学生军也抵达了百色地区。四战区剩下没有沦陷的地方，只有桂西北毗连贵州、云南、印度支那的一小块，剩下的广西地域与粤西南则是敌占区。

我重新部署我的部队，四十六军的一部分驻扎在凤山与东兰抵御河池地区的敌军，六十四军的一部分进驻武鸣地区抵御南宁的敌军；六十二军进驻靖西周边地区抵御印支敌军，准备进入越南。六十二军划归陈宝仓指挥，当他要就重要事务向六十二军下达命令时，必须通过我的批准，命令以我的名义发布。

十六、三十五集团军的游击训练营主要功能是：敌退我攻，敌进我退。在与鲍曼商议之后，我下令这两个集团军各组建一个游击训练营。集团军遴选的士兵要接受美国顾问的训练^①。游击训练营的组织同任何步兵单位相同。在田东受训后，他们就调配到接近敌人防线的部队。

我非常需要时间去整顿与训练久战疲乏之师，希望减少部队的数目。我计划裁撤在桂林败绩的三十一军，扣押韦云淞等人。这些措施对广西人将是沉重的打击。我知道白崇禧不会同意，却不知道蒋先生会不会在白的影响下阻止我的计划付诸实行。同时，我必须准备好同随时会来犯的敌军战斗。我军与敌军距离太近，小规模冲突时而发生，一切端视敌军的行动。倘若印支、河池或南宁的敌军在我们重组完成之前就发动进攻，我们将抵挡不住；在另一方面，倘若蒋先生不同意我的计划，我便没法执行整军计划。如果我保不住这一小块疆土与溃败的部队，我的军事生涯便会告终，会走上绝路。

我没有考虑敌人会进攻百色，因为百色对他们没多大用处。如果他们要取云南，那也不必进军百色，可从沙子岭直下黔滇公路。尽管如此我们仍旧要准备。敌军终究没有来。我的当务之急便是1945年1月在百色召集会议研究桂柳战败的原因、执行纪律措施以及实施我的整军计划。每逢战役结束后我们都会召集会议。

会议接纳了我的建议——事情往往如此。我撤了广西绥署第二纵队司令唐纪^②以及一三五师师长严僧武的职，因为他们在平南作战不力影响了进攻桂平。他们被押送到重庆听候惩处。我也撤了三十一军军长贺维珍与桂林城防司令韦云淞的职，但我让他们自己去重庆述职，由中央决定如何处分。由于我们经常打败仗，大多数会议都要采取纪律行动，奖励则不多。

^① 12月30日，张发奎巡视了设在田东的三十五集团军游击训练营，美国教官同一天抵达。美国空军在该集团军设立了一个情报组（详见张12月30日日记）。

^② 唐纪（1900—1968），广西柳州人，广西陆军讲武堂、中央陆军官校南宁分校六期毕业。历任连、营、团长。1937年任广西绥署防空处上校副处长，次年升处长。1941年任绥署副官处少将处长，1944年任绥署二纵队少将司令，8月率部参加桂柳会战，因作战不力被撤职查办。1945年6月获释。胜利后赴香港经商。

会议采纳了我的整军计划：裁撤三十一、三十七军及以六分校学生为主的学生军。保留十六集团军黎行恕的四十六军，下辖广西部队；也保留三十五集团军黄涛的六十二军与张弛的六十四军，这两个军都是广东部队。很难说是否有人对裁减广西部队的决定表示不满，无论如何，没人公开批评。

我把会议通过的整军建议呈交蒋先生，他全盘接受。我没有跟白崇禧商量，他内心非常不安。他认为我走极端：扣押广西将领、裁撤三十一军却保留六十四、六十二军。然而我是依据部队实际情况与战场表现而定夺的，三十一军大部分已在桂林折损了。此外，它打得很差劲也是事实。

我知道韦云淞等人不会受重罚，结果正不出我的预料。韦云淞知道我先前枪决了九十三军军长陈牧农，于是不顾自己承诺的“固守待命”，不战而逃，因为他觉得有白崇禧当靠山。如果没有白崇禧，他一定也会被枪决。蒋先生对桂系确实是委曲求全，相忍为国。

虽然我裁撤了三十一军，但仍保留了一三一师的番号，这是为了纪念在桂林殉国的阚维雍。一三一师并入六十四军，该军的一五五师则被裁撤。被裁撤的三十七军军长罗奇留在四战区担任参议。被裁撤单位的官兵并入保留番号的四十六、六十二、六十四军。保留番号的部队虽然仍旧缺额，但实力比桂柳会战开始时强。事实上，我把三十七军的九十五师并入六十二军。然而，中央马上觉得我兵力过剩，又把九十五师调出四战区。

学生军中的六分校学生并入了我的部队。甘丽初接替吴石担任战区参谋长，吴石离开了。我中意甘丽初，因为他是陆大毕业生，武汉时期在我麾下服务过。

在这次会议我得到了许多良策，会议决定组织游击营，经训练后快速渗入敌人的后方。他们受特种训练，擅山地战，已往我军缺乏山地战经验。对比之下，敌军受过山地战的严格训练，这一差距在桂柳会战时表露无遗。在会议上，三十五集团军与四十六军指出，军级单位不适宜于山地战。我的参谋与军级单位指挥官在会上对桂柳战中的舛错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批评。正确与否，最后由我决定。我把其中正确的意见汇编成一册《第四战区桂柳会战经验教训》，错误的意见则未编入此书。

我们建立了两个突击营。两个集团军挑选最优秀的士兵，给予良好食物与银，游击训练营便解散了。突击营每个营包含两个步兵连与一个运输连，每个步兵连包含四个排——三个战斗排，一个补给排。据我们的计算，如果每一次突击战斗需要三小时的猛烈射击，其携带的弹药至少可以维持七次的战斗；每一个战斗排配有三挺机关枪、一具火炮、六个掷弹筒、一挺战车防御机枪和十八支步枪，火力是相当强大。电讯亦远比一般部队来得灵敏，每营有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可以对空通话，我常以L-5小型飞机和他们联络通话；营连之间之通讯均配备对讲机，可以在短距内通话，这对于指挥增加了许多便利。他们的待遇极优——伙食费为原来的三倍，我要求他们发挥高度战斗力，乃特批这笔款项以补

充他们的营养。倘以原来的副食费，每个士兵每天仅能购买半斤青菜，那怎能维持其体力？遑论出生入死从事激烈战斗了！

突击营属于战区直属部队，由美国军官协助指挥，那些军官具有在欧洲战场突击战斗之经验。突击营在体力增强与良好训练下，五次突击邕龙路都取得辉煌战绩，使敌人的邕龙交通感受莫大的威胁。根据美国人的计划，要抽调许多官兵去补给与支援战斗部队。突击营直接由我指挥。

突击营集中在田东，由美国顾问提供敌后快速行动与山地战的特种训练，他们直接从美国人手中接受美式装备。鲍曼通知我，一旦装备运到，无线电台、冲锋枪、卡宾枪，都要发放给突击营。

在百色，我度过了我一生中最为艰难的日子。我率领一支溃军，天气严寒，部队没有棉衣穿，缺粮是最紧迫最苦恼的问题。由于百色地区多山，它不产大米，而出产大米的桂东、桂南地区都沦于敌军铁蹄。广西省政府也设在百色，可是它也在苟延残喘，不能在税收与采购方面满足部队的需求。省政府在敌占区采购粮食，派人去宾阳、贵县与其他产米地区，但是运作十分困难。

诚然，从以前的经历，我知晓百色地区的严酷环境。我们要求中央发放大米，中央不关心我们的要求。由于大雨、恶劣天气、交通故障等原因，粮食部运送粮食常常延误。运到的粮食不足时，我们只好喝稀饭。有时中央以玉米、红薯、芋头代替大米。有时粮食部发放现款让我们自己购米。粮食部常常低估了大米、玉米等粮食的市价，但由于军级单位的实有人数总是比上报的人数少，发下的钱也就足够满足军队的需要了。如果有盈余，就可以用来买肉吃。部队通常乐于接受现款而非粮食。当粮食部供应现货粮时，只要有点盈余，军队拿出去贩卖又是一件麻烦事。

美国人从空中运来大米与弹药，有时也用卡车从贵州运来。武器只是配给突击营。除了突击营，美国人没有训练其他单位。美军战区联络团在四战区对我们的援助较前增加许多，鲍曼的意见受到中央重视，每当我面临困难问题时，他就会打电报给魏德迈，后者会直接告诉蒋先生。美国人帮助我们上达天听。

1944年冬，在昆明设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这是明智之举，旨在加强与集中国军精锐部队准备反攻。这完全是魏德迈出的主意。^①

对何应钦兼任中国陆军总司令，^②我认为从资历上考虑是合适的，资历是铨叙中国军事要职的一项极重要因素，教育背景则是次要的。怎样才算资深呢？最重要是经验与纪录。人们往往只将某人的资历同另一人相比。譬如，何应钦比我

^① 1944年11月21日，魏德迈向蒋介石呈交的“α计划”，在昆明设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负责西南各战区诸部队统一指挥及整训工作。总司令由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任，辖有部署在昆明周边地区的第四战区张发奎部、黔桂湘边区汤恩伯部、滇越边区卢汉部、远征军卫立煌部以及杜聿明、李玉堂两个集团军，共28个军、86个师及其他特种部队。此时中印公路业已开放，美国武器及作战物资得以大量输入，预计国民党军可获新式装备之陆军共36个师，同时对反攻各部队之后勤设备亦大加改善，一时士气大振。

^② 魏德迈曾建议陈诚担任陆军总司令，但蒋先生属意何应钦。

资深，因为，在大革命的年代中，他在靖国联军黔军当旅长时，我不过是粤军的一名营长。在能力方面，何应钦与陈诚相比，陈当然比何精明强干，他坚定、果断、敢作敢为。当他1944年冬接任军政部长时，他不怕开罪何应钦。何是个老好人，但遇事漫不经心，不够郑重，对下属过于宽纵，所以何应钦主掌的军政部失序。陈诚接手后想大力整顿，他在部里纠正乱象，部务有所改善，但他并未享有何应钦那样的威望。资历与威望是最重要的因素。

1945年3月3日，军委会任命我为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四战区与十六、三十五集团军同时撤销。夏威与邓龙光被任为副司令官，四十六、六十二、六十四军直属于第二方面军司令部。卢汉被任命为第一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王耀武分列第三、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番号次序的订定取决于地理因素，第一在云南，第二在桂西北，第三在黔桂湘边区，第四在湘西。仅仅这四个方面军隶属何应钦，他并不统率整个国军地面部队。

这一任命使我感到惊诧。卢汉的任命是考虑到地方势力。在战前，中央的权力伸不进云南。卢汉既统领滇军，又指挥中央军；龙云保留云南省政府主席一职。在云南，并无敌军进占。

卢汉、汤恩伯、王耀武都于不同时期在我麾下任过职。此三人中，王耀武资历最浅。此外，高级将领中比他出类拔萃者比比皆是。我比其他三位方面军司令官都资深得多——在北伐时期我已升任将官。并非骄矜自负，最重要的是对国家的贡献。当任命下达时，许多人感到中央待我不公平。我的同事们对我同王耀武平起平坐一事感到愤慨，他们为我愤愤不平，咸认为中央此一决定不正确。我的同事，甚至夏威都认为，在撤销四战区之际，至少要任命我为陆军副总司令；倘若中央要我指挥第二方面军，理应让我兼任陆军副总司令。鲍曼对我的帮助一直很大，他分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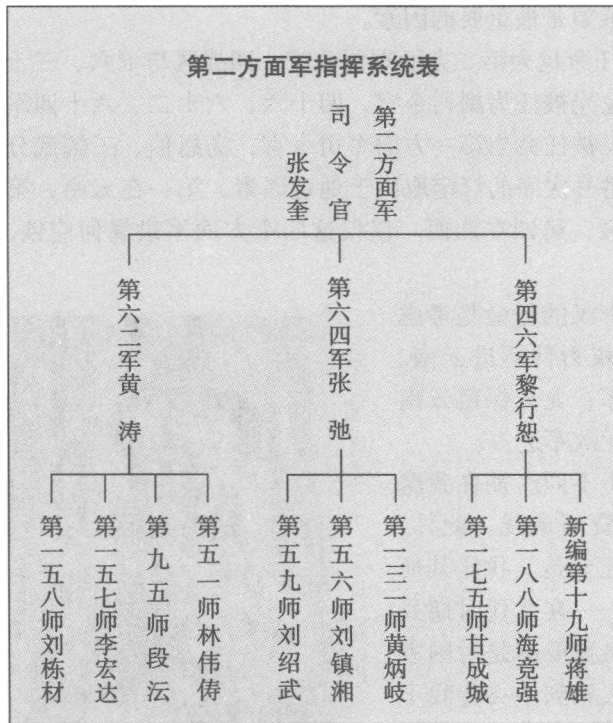


1945年身穿美军制服的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

我们大家的不满情绪，也感到把我放到与汤恩伯、卢汉、王耀武同样的等级是不公平的。实际上，同其他美国联络团的军官们相比，他也受了委屈，级别偏低。

坦白讲，美国人从史迪威到魏德迈都十分尊敬我。【至于中央，并不能说它不尊敬我，问题在于自始至终中央认为我不是嫡系高级将领。自抗战爆发以来，中央一直不调拨必要的装备给我，我一直忍气吞声。】我自忖，桂柳会战失利不能归咎于我，是白崇禧在那里指手画脚决定一切。所以我未因败绩而受惩处。我认为中央的任命不妥，鉴于此时并无战事，我乘机呈辞，要求转职。如果在战事进行之中，我不会辞职的。然而中央拒绝了我的请辞。抛开我个人职务派得不公平，我对方面军的设置是正确的，有助于加强与集中我们战斗力。

广西的军事行动由我与汤恩伯分担。从桂黔边界的六寨向东南方划线，经迁江、思练到来宾。汤恩伯负责线东的地区，我负责线西。大量敌军集结在第三、第四方面军附近，二方面军驻地也面对敌军。我奉命限期完成将四战区部队改组为第二方面军的工作。^①我必须安排十六、三十五集团军的人事出路，那些编余人员被列入（待命）军官总队。



美国顾问负责训练与装备的 36 个 α 师中没有我麾下的部队，我当然对此不高兴。四十六军也包含广西部队，虽然白崇禧在中央参与密勿，但仍未将四十六军属下的师纳入 α 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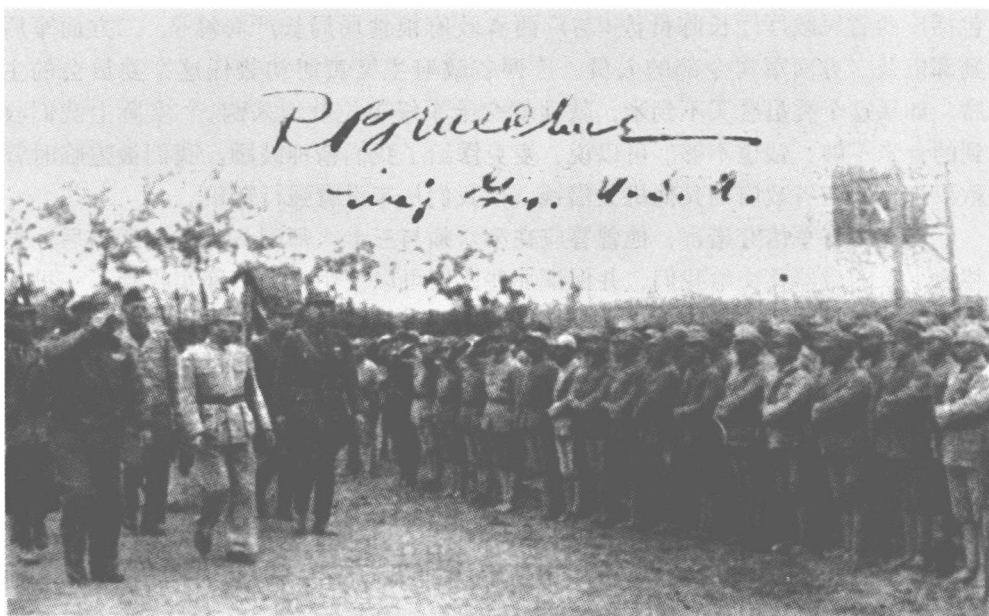
在美国顾问影响下，我们撤销了参谋处，改组为 G—I、G—II、G—III、G—IV 四个处，分管人事、情报、作战、后勤业务。这四个处直属参谋长。原任参谋处长的李汉冲改任 G—III 主管。美国人要求改行新制，鲍曼对我解释，美方只想改组作战处以求胜，他们不介意其他部门的内部组织

状况。我对新制并不欣赏，觉得旧制较适合，因为参谋处掌握了有关人事情报等一切职能，以前参谋长只能指挥一个部门——参谋处，改制后就要指挥四个部门。以前我只需要同参谋处长咨商就可知道人事等详情，改制后我必须同更多的人商讨，召集更多的会议。我告诉鲍曼，我不认为这一新制是个好主意。

情报与其他工作在新制之下执行时，与往昔没什么不同。总部参谋的人数一样，并未减少。四战区改制为第二方面军后，兵站组织有所改进。美国人帕尼上校被任命为二方面军兵站副监，由几个美国人负责兵站的财务。其他的方面军，也实施了同样的安排。

美国人吉伯特·契弗斯被任命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后勤部司令，原四战区兵站总监何世礼升任后勤部中将副司令。何世礼常来百色了解第二方面军的实际需要。我并不认为由美国人主掌中国军队的后勤补给这一人事安排不妥，因为美国

^① 起初限定 4 月 15 日前完成重组工作，后来顺延至 5 月底。从张发奎 4 月 15 日与 5 月 12 日日记可知，直至 5 月 12 日，他尚未收到第二方面军的组织表。



中国战区西南方面指挥官麦克缪（前左敬礼者）与张发奎（前中）在战时检阅部队。

人全神贯注于后勤补给，而我们则专心打仗。钱与粮食都在美国人手中，他们拥有运输卡车。简言之，我们完全采用了美式后勤制度。它的主要特点是第二方面军可以使用卡车把一切军品——包括大米与副食品——直接运抵军级单位，有时甚至按需要送抵连级单位。

这一制度有利也有弊。优点是军、师级的兵站取消了，中间环节的非法定利益也就不存在了，部队得到补给较前更快，但正如广东俗语所说的“多只香炉多只鬼”，无疑，新制减少了贪污舞弊。缺点是如果运货卡车因故不克准时到达军级单位，该军势必断供生活必需品。美国人的食物毕竟不同于我们，美国军人主要仰赖罐头食品——汤与肉以及巧克力，他们不需要燃料。有时蔬菜需要两日才能运抵目的地，那么他们就只好干啃，美国人是守纪律的。

4月初，麦克缪将军沿黔桂公路来看望我。他强调第二方面军的重要性，声言没有其他人够资格率领二方面军。他告诉我，其他三个方面军并未承担像我这样的重任。他劝我不要消极，不要辞职。但他没有指出我们的目标是哪一个海港^①。我陪同麦克缪视察了和田东受训的第二方面军突击营。

我对麦克缪的印象很好，他正直坦率、平易近人、毫不做作，也很善饮。我记得蒋先生有次对我说：麦克缪很好、很有趣。

麦克缪实现他的诺言，他给我们足够的现款去买米。设在昆明的后勤部拨款给第二方面军后勤司令部，由后者交付采购与运输委员会去采购食米。该会委员

^① 4月4日，麦克缪在二方面军的一次演说中表示，倘若不夺回一个海港，即使补给10%的军品也是有困难的。

包括广西省民政厅厅长陈良佐^①与广西省政府粮食局局长严海峰^②、二方面军后勤部以及二方面军司令部的人员。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兼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如果这个委员会买不到米，款项就交给军级单位就地采购。^③实际上我们收到的食米不够，钱也不够。可以说，麦克缪给了我们精神鼓励。我们被迫临时筹款买米，要向省政府与其他机关借钱，但我们从来没有强行征粮。

麦克缪将军信守诺言，他曾答应在第八师与三十八师配备了美制武器后，把替换下来的武器移交给我们，并保证那些武器可以使用。我们确实收到了一批武器与弹药。^④

我们官兵的待遇并没有太大改善，军饷增加是由于日趋严重的通货膨胀，然而我们不能准时收到军饷。

我仍试图辞职。1945年4月17日，邓龙光赴重庆述职，我乘机要他把我的辞呈面交蒋先生。但没有用，蒋先生拒绝我的要求^⑤。5月1日与6日，陈诚两次来信，希望我放弃辞职念头。5月3日，鲍曼告诉我，魏德迈与麦克缪很希望我不再坚持辞职^⑥。他们答应尽一切努力协助我解决困难。我要求鲍曼答复他俩，如果困难可以解决，我不坚持辞职。

我对李济深同谭启秀^⑦合作在粤桂边区苍梧进行的活动的看法如下。^⑧苍梧是在沦陷区，但那里已无敌军驻守，敌军驻扎在梧州。蔡廷锴在两广边区的下属

① 陈良佐（1887—1968），广西宾阳人。北伐时任第十军第十旅旅长。1928年11月任国民政府参谋本部高参。1938年任广西兴安桂林区民团指挥官。同年11月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1939年10月代理安徽省主席。1942年4月任广西省政府委员，1944年11月兼民政厅厅长。1948年在广西当选第一届国大代表。

② 严海峰（1895—1970），广西苍梧人，中国公学毕业。历任国民党县市党部执委，苍梧、桂平、平南等县县长。1940年12月任广西第十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943年4月任广西粮食管理局局长。1946年12月复任第十区专员兼保安司令。1948年当选一届国大代表。1949年赴台。

③ 1945年4月30日，采购与运输委员会召集第一次会议，决定由二方面军后勤部承担供米的全责，二方面军司令部提供协助。5月3日帕尼上校交付两亿元专款，遂转交该委员会，事见张发奎4月10日与5月3日日记。

④ 张发奎5月11日日记说，美国人开始供应武器弹药，但由于湘西战况紧急，空中与地面运输都用于支援第四方面军。

⑤ 1月3日蒋介石函复张发奎，指出革命者必须坚忍不拔，要张不再提出辞呈。更重要的是，不要让盟友小看我们中国人。蒋答应尽最大努力解决困难问题。

⑥ 鲍曼5月6日致张发奎函，称他接获麦克缪电报，并希望转达蒋介石的原话：“我们不接受他的辞呈，因为我们当前比已往更需要他的积极服务。”

⑦ 谭启秀（1887—？），广东罗定人，广东陆军将校团炮科毕业。1924年任粤军第三路司令，系暗杀廖仲恺案之要犯。1932年淞沪抗战时任吴淞要塞司令。1933年11月24日任闽变的福建人民政府第五军军长，失败后与蔡廷锴隐居香港。1937年5月授少将衔。1938年3月任军事参议院参议。1940年任四战区广东南路第一区游击指挥官。1946年7月晋升中将，同年退役。

⑧ 4月10日，张发奎接到玉林行政督察专员梁朝玘（1892—1969，广西北流人，保定三期步科毕业。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在桂军历任连、营、团、旅、师长。1933年3月任广西省政府委员。1936年1月授中将衔。抗战爆发后任广西绥署中将参军。1940年12月任广西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945年1月任桂东行署主任。1948年代表广西农会当选第一届国大代表。赴台后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的电报，报称：四百多个谭启秀的人马在李济深率领下抵达苍梧。

谭启秀，早在十九路军时期就投效蔡。李济深宣称谭启秀的手下驻在苍梧保护他。毫无疑问，他们正从事反叛中央的活动，李济深有着强烈的领袖欲望，他想凝聚他故乡苍梧的民众，以该县作为其大本营。人们都说这伙人勾结共产党。

我同黄旭初讨论了这个问题。为了避免误会，我要求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谭启秀的上司——命令谭返回广东，另派一支部队保护李济深。我建议让李济深去重庆，那就不会再制造麻烦了。彭泽湘从李济深、蔡廷锴那儿给我带来口信。彭泽湘一直是跟随李济深的，他从玉林赴重庆路过百色时告诉我，李济深付不起旅费。当然，他是为李济深制造借口。

接着，李济深要张炎采取行动，张炎在雷州半岛率领所谓“人民军”发难。兵变失败后，张炎逃到玉林。中央要我就地处决。我想救他，但不成功。我想救他主要是因为高参张励的要求。张励是湖南人，从柳州时期一直在我手下任职，他和张炎是陆大特别班的同学。

越南特训班、越南革命同盟会以及外事局都经由凤山与东兰抵达百色。许多领导人没有前来。移师百色后，由于更加接近印度支那边界，我们的计划变得更加具体与明确。

胡志明在昆明受训结业后，我在百色见过他。他要返回越南就必定要打道百色去靖西。这一时期鲍曼在百色会晤过他们。我同鲍曼聊过越南问题，他说我们应该解放越南。

3月9日，日军在印度支那发动政变，此举使我们的计划变得更加明确。我派遣特训班、第一边区政工队以及外事局去靖西。^① 特训班与外事局归靖西指挥所主任陈宝仓管辖，越南革命同盟会仍留在百色。

马维岳接任外事局副局长，虽然设置两个副局长，萧文仍负主要责任。马维岳在第四军就追随我，到四战区仍不离不弃。他做过柳州防卫司令、特务团团长以及长官部副官处处长。

特训班与第一边区政工队成员穿越边界进入越南执行宣传、唤起民众抗日、破坏与骚扰敌军等任务。由于高平没有驻留敌军，渗透边界是比较容易的，我向他们提供武器。^②

4月24日，敌军发动攻势牵制我军，这一行动是为了配合它们在湘西企图夺占芷江及其重要机场的攻势。我们的部队先撤退，然后反攻。敌军从武鸣与上林撤退，标志着它开始从广西各地撤走，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我命令六十四军与四十六军追击，并派遣两个突击营沿着南宁——龙州公路攻击敌军，他们搞垮

^① 4月10日，张发奎会见越南革命同盟会代表，他鼓励他们团结一致，吩咐他们迅速拟定进入越南的计划大纲。4月20日，外事局在百色设宴欢送后，越南人离开了。出席欢送宴的有张发奎、越南革命同盟会指导代表机关、特训班以及第一边区政工队成员等（详见张发奎日记4月10日、20日）。

^② 据杨清文回忆，他率领200多名特训班成员渗入越南。“三九事变”后，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指示萧文把握千载一时之良机，加强外事处实际工作，先颁发第一期入越工作经费国币500万元，并答应拨付两个团之武器，而目前应用之少量军火由第二方面军酌发。马维岳说，1945年5、6月，他带领36个越南人经高平进入苗族领地。

了敌军通往印支的交通线。

接着成立的突击队，^①每一个突击营组织一个突击队渗入敌后执行破坏敌军通讯、摧毁仓库、搜集情报等任务。每个单位包含15个战斗兵与15个运输兵，都是美国人训练与装备的。一位名叫戴维斯的美国军官与中国指挥官一起指挥敌后的袭击，美军通讯兵也加入了这些袭击。我们计划空投弹药，但不投大米，因突击队能够从当地民众中得到援助。

之所以要设立粤桂南区司令部，是因为我的总部有两个副司令官，我想指派邓龙光为粤桂南区司令，使他能独当一面。我没法照顾已裁撤的第三十五集团军总部朱晖日等人，故我请示中央同意设立粤桂南区司令部，于是邓龙光可以直接指挥第六十四军，我计划派该军去粤西南。邓龙光是粤西南茂名县人。我没有让另一位副司令官夏威也独当一面，因为无此需要，广西人能自己照顾自己。他的副参谋长孙宝刚回到我身边，让他出任总部副官处处长。

5月25日，我下令六十四军与四十六军派遣精兵分别进攻南宁宾阳。我们收到情报，称敌军正开始撤出南宁。由于这是事实，我们必须进击，这就叫做追击。我下令进攻南宁不需要先取得陆军总部的批准。自陆军总部成立后，我们就计划夺回南宁，汤恩伯的第一个目标则是柳州。可是我们的兵力尚不够执行此一计划。这次进军南宁是由于敌军撤出南宁。5月27日，六十四军占领南宁。南宁光复后，敌军从柳州通向北越的交通线就被切断了。敌军从南宁逃到龙州与宾阳，我下令六十四军沿南宁——龙州公路追击敌军，此时四十六军正奉命沿南宁——宾阳公路追击敌军。5月30日，我军收复宾阳。6月1日，四十六军另一部收复迁江，敌军逃向柳州。

黎行恕报告说，柳州的敌军似乎要向桂林撤退。与鲍曼商谈后，我命令四十六军向柳州挺进，并承诺光复柳州后定有重赏。按理我不应该命令四十六军挺进柳州，因为该城被划在汤恩伯的辖区。然而，眼看敌人后撤，我绝不能因为忌讳跨进不属于我的辖区而停止追击。四十六军进军柳州并没有由于缺粮而停止，这是中国军队与外国军队不同之处。美国人认为，如果他们后勤供应失当——即我部得不到足够粮食，我们就不能前进。然而事实是，我们经常购买红薯与芋头。至于燃料等，我们到处都可以张罗。中国军队被迫停止前进只有一种情况——弹药耗尽。

我对何应钦电令四十六军停止前进十分不高兴，鲍曼也同样不满意。仅仅因为我们正进入汤恩伯辖区而不许我们前进，这一理由太苍白了。我不顾何应钦这一命令，最终，我宣称四十六军没有收到我的命令。可能产生的负面结果是汤恩伯部也开抵柳州，但是我不必担心此事，因他们距离柳州还很远——正在八十里外的宜山地区。

6月4日，遵照陆军总司令部的指示，我命令四十六军主力留驻宾阳与南宁，那时机出现了，我要配合第三方面军收复来宾与武宣。我命令六十四军沿

^① 5月13日，张发奎与鲍曼讨论了组织突击队的议题，决定5月20日开始训练。

着南宁——龙州公路前进，夺回龙州附近的龙茗，六十二军进驻天保与靖西，准备进攻越北的敌军。

6月7日，何应钦与麦克缪在巡视途中乘飞机抵达百色，麦克缪来我司令部访问总是很高兴，我和他一起飞往南宁。麦告诉我，我的任务——收复雷州半岛是所有方面军司令官中最重要。雷州半岛上的精确目标是湛江，即广州湾。麦克缪与鲍曼说，如果我的部队有美式装备，一定能对雷州半岛敌军发动强攻制胜。



1945年桂西北百色机场。左起：张发奎、何应钦、麦克缪。

遵照麦克缪的计划，我部夺回广州湾后，将进占海康，由此进攻海南岛。这就是我们在1926年走过的老路。进攻海南必须同美国海空军配合，他们将在我们攻击雷州半岛时集结。不然的话，雷州半岛离海南岛太近，会处于海南敌军持续不断的威胁之下。而且，海南可以供美军作为海军基地。敌军已在海南岛南端的榆林修建了一个深水港，能容纳美国海军的大型舰只。攻占海南岛后，我军能从雷州半岛出发，经阳春、阳江与四邑挺进广州。

光复南宁后，美国人真的出手帮助我们了。他们的帮助最主要是后勤供应，最重要的是供应食米。^①我们为进攻广州湾作了准备。美国人经常在战事中设置重点，既然我部的任务是四个方面军中最重要，他们对我付出了最重大的关注。

美国人把“天之骄子”新一军，完整地由印度空运到南宁，它下辖三十八、三十五、十三师。他们甚至把新一军军长孙立人私人驯养的马匹与大象也空运回来。新一军先遣设营部队于6月12日飞抵南宁。

我的司令部迁到南宁。此时，鲍曼因功晋升准将。我常常到他住所拜访，他有

^① 中国战场美国后勤司令亨利·奥朗特与中国军队后勤部中将副总司令何世礼于6月13日抵达南宁，同张发奎讨论食米供应问题。

一只电冰箱。有时我在他的住所观赏电影。升任准将，使他的生活方式大为改变。

遵照何应钦6月16日的电报，我命令四十六军派出精兵配合第三方面军反攻柳州，此时已不必顾忌作战地区之限制。何应钦限令7月15日前夺回柳州，鲍曼与我都对他十分恼怒。不久前，四十六军逼近柳州时，何应钦叫停，现在他又要我派四十六军限期夺回柳州。同时，我命令四十六军新十九师派一个团去前进基地贵县，准备进攻广州湾。

四十六军一七五师于6月30日赶在汤恩伯部之前拿下了柳州，四十六军极为振奋。顾祝同断言，汤恩伯的二十九军于6月30日克复柳州，一七五师于7月1日才赶到，我认为这绝对是错的。^①毫无疑问，是一七五师先到。再者，敌军已经撤出，不需要战斗。

美国人，尤其是鲍曼，也对一七五师占领柳州而感到欢欣鼓舞。7月1日鲍曼与李汉冲飞抵柳州，他俩各搭乘一架L-5战机，该机只能搭乘一位乘客。美国顾问团有三架L-5机。鲍曼说，他想看一看在我原来的长官部门口那棵柚子树是否还存活。结果他发现长官部完全被毁坏，是日军撤退前焚毁的。柳州市大部分房屋都被日寇摧毁了。

当汤恩伯部到达后，陆军总部命令四十六军回到南宁——宾阳公路。我感到四十六军应该歇一下。何应钦责备我们占领柳州，鲍曼与我都很有气，鲍曼跟何说：“我们帮你收复柳州，你却对我发脾气！”早知如此，即使没有作战区域的划分，我也不应该让四十六军进入柳州。我实在太老实了，本该学得精明一点。

总的说来，鲍曼是瞧不起何应钦的，他常常批评何。何应钦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时，鲍曼就声言他不够资格、也没有能力负此重任。何应钦听到这话大怒，要求魏德迈把鲍曼调走。我不想让鲍曼离开，他对我帮助极大。我们共同战斗，相处融洽。鲍曼自己也不想离开，俗话说：走一处不如守一处。

我不仅与美军联络官相处融洽，而且同战区内的美国空军军官也关系良好。我爱开玩笑，爱喝酒。美国人也善饮，这就能使气氛活跃起来。阿姆斯将军、文森将军都是酒量好的朋友。

可是，美国人不像俄国人那样经过政治训练，他们有时也同我们谈论政治。他们常说：“委员长不把美制武器分配给你，这是不公平的。”当然，我们的上司被批评时，我们从不答话。苏联军事顾问从来不当着我们的面谈论政治或批评我们的上司。还有一点：苏联顾问是派来帮助我们的，我们理应对他们有礼，但他们对我们更加彬彬有礼，他们把我们当作上司来尊敬，他们强调服从。譬如，当我去一名俄国上校那儿，他一定会向我敬礼，美军上校却不会。在我们伸出手之前，俄国人不敢伸手，他们也不敢同我们开玩笑，他们很一本正经。

美国人对他们的上司，比对外国军官更不拘礼节，他们对任何人都一样，他们对任何人都说：“哈罗，哈罗！”又常常开玩笑，有时对他们的上司都不甚礼

^① 据何应钦回忆录，四十六军攻击与收复柳州是6月29日。

貌，随随便便。史迪威将军、奥朗特将军、麦克缪、文森等人，不仅同我们开玩笑，还同普通士兵开玩笑。在美军中，服从命令是铁律，但在业余时间，官兵亲如兄弟。这当然对军队上下阶级建立和谐关系至为有益，军官同士兵友善，会激励士兵勇敢战斗。但你要记住，我们中国军人的等级观念根深蒂固。美国对等级不在乎，不认为它有何重要。

我们的军事教育制度，起初是采用日本制度，现在则近似俄国制度，然而俄国人并不讲究享受。

总体来讲，苏联的顾问体制胜过美国的联络官体制。在苏式顾问体制下，我们是主人，俄国人听从我们。在会议上我们向他们咨询，但决定权在我们手中。同美国人在一起，召集的会议叫做“联席会议”，他们告诉我们，军事行动怎样谋划，他们希望我们怎样配合。同样，我们告诉他们，计划怎样干，例如撤退，整个过程怎样操作，希望美军提供何种协助等等。有时会有激烈的争辩，由战区司令长官作最后结论。简言之，俄国派顾问来为我们服务，而美国派联络官合作体制下协助我们。

我认为夺回广州的总体反攻计划是正确的。^①

6月7日，六十四军攻占龙州，7月3日攻克凭祥，敌军撤向镇南关——在印支边界上战略通道。驻扎在天保与靖西的六十四军从未进入越南，中央委实不想去越南打仗，它只是想牵制敌军。7月初，陆军总司令部要求桂越边境的部队严阵以待。可是，倘若侵入北越的日军派出主力部队进攻云南，第二方面军就必须派兵入越攻击敌军的侧翼与后方，占领河内与海防；倘若日军派主力进攻南宁或百色，第一方面军必须派它的主力部队入越攻击敌军的侧翼与后方，配合第二方面军占领河内与海防。我赞成上述有关越南的命令，但没有回应法国外交代表有关互相合作的请求，对法国人，我一直持负面态度。

接到陆军总部命令后，我召集了多次会议，决定采取何种方法达成指定任务。鲍曼与其他美国联络官都出席了军事会议。以前都是有需要才开会，到大反攻之前，我们改为每周开会三次。

韩练成率四十六军首先向粤西南挺进，新十九师（缺一个团）7月2日向贵县开拔，那个团提前去了贵县。两个突击营也去了粤西南。

同时，新一军逐渐运抵南宁，三十八师率先抵达。三十八师与四十六军新十九师派出的卫兵在南宁机场发生了打斗。新一军的官兵十分骄横。新一军完全是美式装备——最佳的装备。撇开装备，新一军也确实不错。孙立人有良好的军事素养，但我无资格评论他在缅甸战场的表现，因为我不知道那儿的具体情况。^②

^① 1945年7月初，陆军总司令部命令第二方面军在9月1日之前派一个军去进攻雷州半岛。接着，它的主力自梧州从西侧进攻广州。第三方面军派一个军进攻曲江与翁源，派部队进攻东江地区、汕头以及海湾上其他据点，从东侧进逼广州。中美两国空军支援地面部队，美国海军协助攻击雷州半岛、广州与香港。

^② 其实，孙立人扬名中外的营救仁安羌被困英军一役，是孙立人部下——三团团团长刘放吾指挥属下官兵冲锋陷阵、付出伤亡过半的惨重代价而取胜的。英国直至30年后才知真相给刘放吾颁发勋章。

他无疑是年轻一代中最有才干的军官之一。孙立人与他的副手贾幼慧都受过良好教育，都是清华毕业的留美学生，麾下师长如三十八师师长李鸿也很优秀。新一军是抗战爆发后由设在贵阳的盐务总局缉私总队改编而成的，许多军官是留美归国学生。

五十四军也陆续抵达南宁，其军长阙汉騫是黄埔四期，1936年在我麾下任十四师四十旅旅长。他是陈诚的人马。该军是中央嫡系部队，美式配备。我命令它卫戍南宁，留作二线部队。

7月22日，魏德迈来我司令部，我们讨论了军事计划，他对我友善。同史迪威一样，他很威严，不苟言笑，却很有幽默感，是一位优秀的参谋人才。他和鲍曼是我见过的美国军人中最严肃的两个。

7月24日，新一军三十八师开始向贵县进军，四十六军集中在陆川与玉林地区。我自己离开南宁去玉林，邓龙光已经率领攻击部队在那儿设立了司令部。26日，我们决定以进击广东廉江作为收复广州湾的第一阶段。按照计划，四十六军要在8月1日攻占廉江。可是，戴朝恩的突击营在安铺遭遇顽强抵抗。8月3日我决定下令新一军的两个师加入对雷州半岛的攻势。

美国人组织的供应线很出色，用飞机、卡车把粮食、医药、通讯设备与弹药运到前线单位。但除了突击营与新一军，没有部队得到美制武器。我同鲍曼在后勤问题上产生分歧。我希望在军事行动开始前就用水陆两路把军需用品运到廉江。他认为不必要，因为在战斗过程中，能够按需要空运到现场。结果是，恶劣的天气接连好几天阻碍了运输机起降。

美国空军执行对敌军的侦察与轰炸任务。他们对我们的地面部队提供的空中援助只是小规模。我计划在进攻广州湾时实施地空联合作战。

陆军总部原定8月15日进攻广州湾，为了集结部队与军品，请求顺延几日，上头批准了。8月10日，在我们对广州湾发动进攻前，传来了敌人无条件投降以及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消息^①。何应钦在南宁设立了指挥所。为了庆祝这一大好消息，美国人开机关枪代替难以采购的鞭炮。他们说：“我们无论如何都不需要机关枪了。”我们甚至举办了一场舞会欢庆抗战胜利。

美军8月7日、9日分别在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加快了日本的投降。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已经完蛋了，只剩下一个日本。很明显，它不能再无限期地顽抗下去；但我认为，如不掷下原子弹，日本不可能同意无条件投降。

8月9日，苏联参战，我对此没有多大反应。我对中苏友好条约十分失望。8月14日，宋子文与王世杰在莫斯科签署了这一条约，事实上，前者是全权代表，后者只是代表外交部签字而已。这一条约承认外蒙古独立，这是一个大错。这一条约伤害了我们的国家利益。作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苏俄的目的是帮助中共。基于共产主义的国际性质，苏俄不可能对我们抱有善意。它说友好，那只是

^① 张发奎8月10日日记说，他从中央通讯社得到此消息。

表面的。它训练中共党员，光是刘少奇就在苏联受训好多年，遑论别人。签订这样的条约是外交上的失败。在日本投降后四天再签这样的屈辱条约，殊无必要。

8月10日，蒋先生警告日军不得向未经政府授权的军事集团投降，我觉得这是正确的。我担心日军不向国军投降而向共产党投降。

8月11日，蒋主席通令沦陷区地下军及各地伪军，各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不得擅自移动。要求伪军将功赎罪，这是对的，因为伪军同日军一样，也可能向共军投降。这些措施是为了防止共军扩展势力。那时我感觉战争一结束，共产党问题马上就会折磨我们。

8月13日，我命令对雷州半岛的敌军发动第二次攻势。15日，盟国接受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天皇下令军队停止所有的军事行动。

8月15日夜，我在收音机前听到了日本天皇正式颁布投降之敕令后，耳边突然听到外面一阵沸腾器叫的音响，继而满天爆竹的火光，在天空交错飞舞。我即刻率领所有的高级幕僚，携了两瓶威士忌酒跑到何总司令的行馆（因为那时何应钦正在南宁），高举酒杯在大家狂欢中互祝抗战的最后胜利。

8月16日，我奉到上级意旨，对各部队颁布了中止战斗的命令，并附说明日本已宣布投降，我军即在原地中止战斗，静候命令的简短训令。

抗战最后胜利，一切战斗行动都停止了，我对于国家民族所负的责任也就告了一个段落。虽然还有很多战后的工作，仍须待我去做，但那是另外一个天地了。胜利、光荣、幸福，一切都摆在我的眼前。

战争终于结束了。在八年抗战中，从上海到百色，从华东到西南，我度过了艰难困苦的岁月。我总共指挥了四五十万军队，几乎全国各个派系的部队都有——例如东北军的万福麟部，川军的杨森部等，唯一的例外是山西的阎锡山部。我和我部下的士兵相濡以沫，甘苦与共。

抗战期间，我参加的最重要战役是当然是淞沪会战，其次是武汉会战。我参加了三个重要战役：淞沪会战、武汉会战、桂柳会战。可以说，在战略上这三次会战都是成功的，我们以空间换取了时间；但在战术上，我们失败了。讲句真话，我从未取得过一次胜利，可是我延宕了敌人的前进，还多次重创敌军。在整个抗战中，我们一直采取守势。在战争快结束时，我首次负责发动重大规模的攻势，可惜攻势刚开始，战争就结束了。

大多数海内外的同胞认为，我们以劣质装备与粗浅训练，英勇地与武器精良训练一流的敌军鏖战了八年，最终取得了胜利。然而从一个军人观点，我认为谈不上英雄史诗，我们所作的一切只不过是空间换取时间。

政府的英明领导，军民的竭诚合作以及高昂的士气，这三种因素使我们成功地以空间换取了时间。政府领导，我是指蒋先生的领导，他坚持抗战到底誓不投降。为了这一点，我钦佩他，事实上这是很难坚持的，这八年是相当艰难的岁月，但他从未动摇其决心。在日本提出看来比较合理的条件时，蒋先生仍拒绝接受和议。连我们失去大半国土时他也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然而汪精卫及其党羽却屈膝投降了。

在抗战期间不断传出断断续续的和谈消息，说蒋先生要同日寇媾和，我从来都不相信。他有坚强的性格，只要他决定抵抗，他就会坚持到底。即使有过秘密谈判，那也只是对敌斗争的策略问题。我钦佩他的抗敌决心，而非战略。例如，死守这种战略是一种严重的错误。

在前线的生活是快乐的，我们事事时时都精打细算，一只信封可以使用好多次。从总体来看，军纪是良好的，军民之间合作愉快。每次会战结束后我们撤退时，老百姓随军撤退，便是明显证据。我们保护难民，没人乘机盗窃，没人作弄百姓。看到他们露天睡觉行李放在身边也不怕失窃，我真感到欣慰。

虽然我们损失惨重，但仍凭借旺盛的士气坚持抵抗。士气仰赖政治训练。根据几十年的经验，我相信政治训练比技术训练重要，后者自然重要——一个士兵应该学会怎样开枪，可是他的头脑也应该启动，不仅仅是活动手脚。

在抗战期间，虽然在桂柳退却时我曾经伤心难过，但我从不悲观失望。美援对我们胜利起了很大作用。在物质援助方面，俄国人帮助过我们，但美国人的援助更加慷慨大度，美国空军保持了空中优势。

第十七章 接收广东

(1945年8月中旬至1945年底)

8月21日，我和鲍曼、李汉冲飞抵芷江。到埠后，我们得悉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將的代表今井武夫马上就到。所以我们决定在机场等候。不久，我们看到今井的座机出现了。飞机两翼末端缠着白布条表示是来投降的，伴随着两架中国空军飞机执行监视任务。今井在机舱口露面，腰间仍佩着剑。

那天晚上，何应钦召集四个方面军的司令官讨论受降细节，次日继续讨论。8月23日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接见今井，在场的有美军麦克繆少将、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等人。我和其他三位司令官在邻室目睹了全过程。今井一进门就向何应钦鞠躬。何应钦彬彬有礼，起立走过去同今井握手。

这是受降与接收工作的开始。今井武夫在22日上午洽降典礼举行时，呈献了日军驻中国（包括台湾）及北纬16度以北越南区内所有日军的战斗序列、兵力位置及指挥系统区分等各种图表，并接受何总司令授予的第一号备忘录。该备忘录指示日军投降应行准备的事项。乞降代表们，在一种不安和惶恐的表情之下，俯首帖耳地表示他们的服从。

从乞降代表携来的一束资料中，我不但明了了敌人在中国的全般兵力部署——海陆空三军官兵总数仍有109万人，而且很详细地明了了广东方面敌人的第二十三军辖有一〇四、一七九、一三〇师和八、十三、二十二、二十三四个独立旅团及海南岛与香港的防卫部队，总兵力13.73万余人。再从它们防御广州之部署与阵地各种设备，令我当时咋舌大惊。如果我进攻广州行动在其未投降以前实施，诚不知需费如何的心力和牺牲多少生命。在这里我感觉到敌人虽失败了，但它们军队的战斗精神和强韧不屈的情绪，以及井然不乱的纪律，依然是值得重视的。

今井离开后，方面军司令官们、行政院代表等人讨论了受降事项。何应钦要我去接受广东省——包括海南岛与香港的日军投降。【虽然蒋先生不信任我，自1927年以来他就一直不信任我，但他还是要利用我。】鉴于广东省的重要战略地位，美国人坚持要我去受降，蒋先生接受了他们的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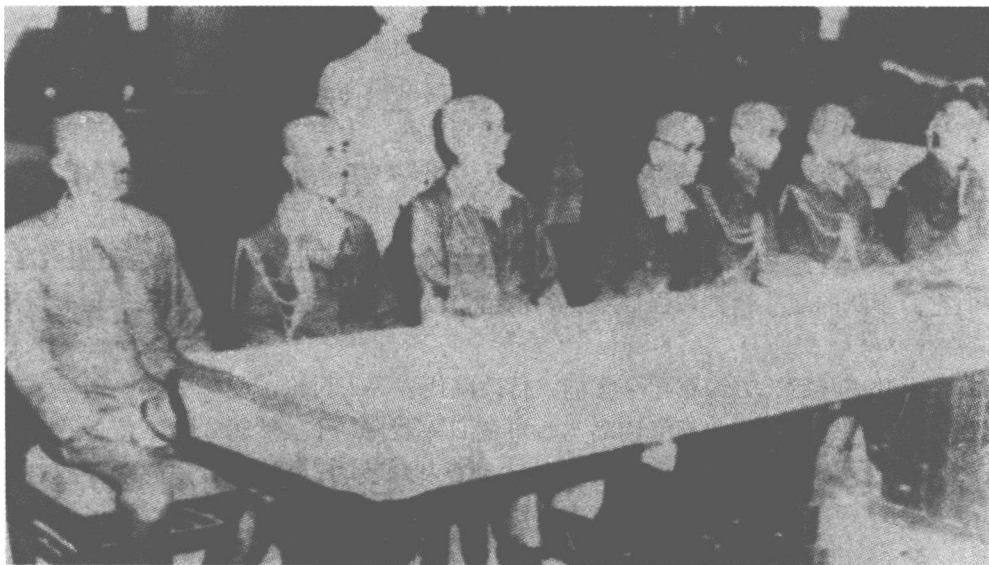
我知道是美国人要求让我去广州受降的，这是麦克繆告诉我的，他也到了芷江。我相信麦克繆说的是真话。【中央原来不想让我去广州，原定指派对中央非

常忠诚顺服的余汉谋，蒋先生与何应钦都对余恩宠有加。】事实上，无论从公理与私情，余汉谋都应该被委派去广州受降。毕竟他的战区在广东，他还兼任广东绥署主任。但是，他被完全排除在广东日军投降仪式之外。【我相信美国人讨厌他，他们对他印象欠佳，是基于以下事实：他从未打过胜仗——正如我已说过，“粤北大捷”不是一场真实的胜仗。美国人自然对我印象良好。】

【我相信美国人掌握中国战区 15 个受降区受降主官的人事决定权。我知道，美国人对薛岳的印象也欠佳。】作为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理应被指定出任长沙



南京受降现场，左起：萧毅肃、顾祝同、何应钦、陈绍宽、张廷孟。



日军签降书，左四冈村宁次，右二今井武夫。

受降区受降主官，但这一职位被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取代了。薛岳被派到江西受降，那儿敌军数量很少。第一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被指派去上海受降，他的部队空运到了沪滨。按理说，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应该主持上海受降。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被指派去主持北纬 16 度以北印度支那地区的受降。这样，四个方面军的司令官都担任了受降主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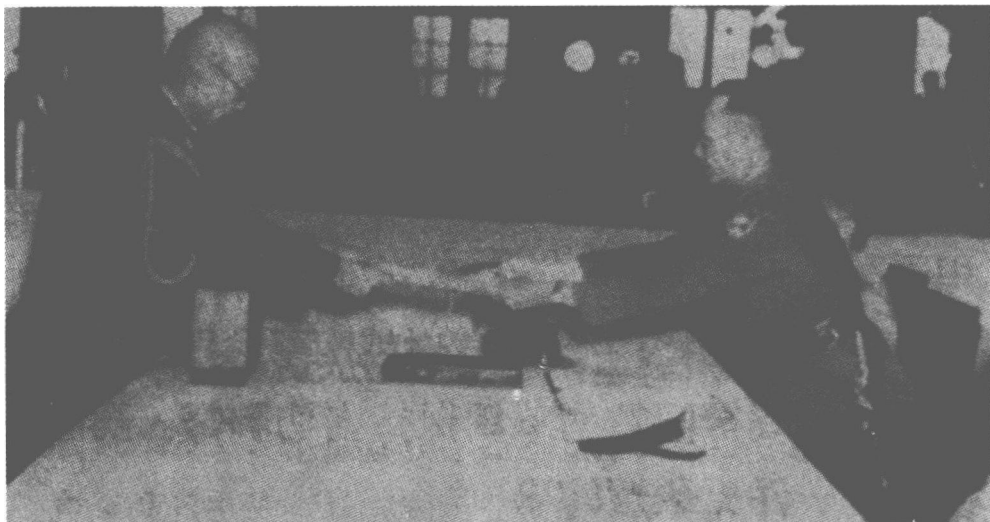
我不想回广州，原因实在难于启齿。自从广州暴动与我在政坛受挫后，我一直不愿再回广州服务。1929 年我打回广州，当时我想打下广州建立革命基地，但



何应钦在日本降书上签字。



冈村宁次在降书上盖图章。



何应钦接受日本降书。



何应钦检视降书，左麦克缪，右顾祝同。

现在是和平时期。我不想去广州还有一个原因。我曾猜忖，基于我对越南革命所付出的努力，中央会派我去印支受降。我想继续同越南华侨保持密切联系。再者，我觉得到外国去接受敌军投降是一件更荣耀的事。我对何应钦说，我不想去广州，我自信能帮助越南革命。他说，是蒋先生要我去广州的。

【期望纠正这一尴尬局面，我要求何应钦指派余汉谋去惠州以东受降，我必须给他一小块属地去主持敌军的投降仪式，必须给他一点面子。中央接受我的建议。】于是，中央改动了指令，我主持惠州以东地区之外的广东日军投降典礼。

余汉谋在汕头受降，然而那里只有一个旅的日军。

8月24日，我回到南宁就召集会议讨论接受日军第二十三军司令官田中久一中将投降事宜。我计划在南宁主持受降典礼。命令田中派代表前来，依照冈村宁次的先例，签署一份投降指令。选择在南宁是为了显示我们的军威。我们要传召战败国将官来南宁投降，像芷江那样行礼如仪。

我决定派新一军先去广州。鲍曼首先告诉我派新一军先去，何应钦随后才发电报给我。可是，即使他不吭声，我自己也会派新一军先行。虽然该军所含广东部队甚少，但其装备精良。士兵们干净、整洁，全都穿了胶鞋。我们要向广州市民与日本人显露新一军的军威。再者，新一军的驻地便于沿珠江前往广州。石觉率领的中央嫡系十三军跟着新一军去了广州，它原本是我们派去南宁参加反攻之役的。新一军负责维持广州的秩序，十三军负责维持广州郊区，例如石牌和九广铁路沿线的秩序。

在新一军到达之前，日军在广州维持治安。新一军到达后，日军集中到河（珠江）南与石围塘，它仍被允许暂时保存步枪与轻机枪，其他重型武器便移交给新一军。

我派邓龙光去粤西南受降。他率领四十六军及地方部队，四十六军一部分去了海南岛。^①我命令六十四军进驻四邑，那儿没有敌军。

我把六十二军移交给卢汉，也把原本由我管辖的越南革命同盟会与四战区外事处移交给他。外事局副局长萧文去了印度支那。滞留广西的越南革命同盟会成员与特训班成员也同时进入越南。

我同邓龙光吵了一场^②，事因我派参事黄品梅去粤西南调查现况（我知道他是军统人员），他同邓龙光的弟弟、茂名军警联合指挥部副主任邓鄂相处不好，后者指摘黄自吹自擂，我猜想黄有点骄矜。邓龙光扣押了黄，我叫邓放了他。邓龙光从廉江回南宁后，我告诉他，他无权扣押黄。他说：“我是副司令官！”我告诉他，副司令官也无权扣押黄，他只能由我授权执行命令。邓龙光提出辞呈，我当然不同意，结果我俩不欢而散。翌日，他找我致歉，我拍拍他的膊头说：“忘记这件事，我们饮一杯！”

8月30日我到昆明，何应钦告诉我，蒋先生同意英国人在香港受降，海军上将布鲁斯·福拉塞担任受降主官。香港是一个重要城市，英国人反对由我接受驻港日军的投降，并要求美国人向蒋先生游说。他们想要我们给他们一点面子，让他们在香港受降，但他们同意将日军所有装备移交给给我们，由中央派人去接收那些装备。蒋先生同意了。对允许英国人在香港受降，我感到，我们不应该同意这一更改，我们不应屈服于美国的压力。

对于香港受降任务，我感到特别兴奋。香港在国人心目中是一个国耻与创

^① 张发奎命令日军派船把四十六军（减一个师）运到海南岛海口（详见9月29日日记）。

^② 见8月28日、29日日记。

伤。在过去，它是罪犯的避风港、资本家官僚们的乐园。广东风气的败坏，以及广东政治的商业买办化，多直接间接受香港的影响。盟军最高统帅部首先划定香港地区归中国接收，根据战后领土主权完整及民族愿望的观点，是有充分理由的。英国政府借此时机将香港归还中国，未尝不是外交上明智之举。

但唐宁街的绅士们却见不及此，致使中英邦交在战后仅保留着一种黯淡的友谊。在德黑兰会议后，罗斯福总统本来想使香港归还中国，并使之成为一个自由港，波茨坦会议对香港战后的地位，亦有同样的建议，但均受英国政府的反对。中国接收香港的规定，遂因之而中变。

9月1日，我回到南宁。我派刘光凯到广州送备忘录给田中。我原定于9月3日在南宁举行正式受降仪式，使该方自由地区的人民，得到一种八年抗战所受苦难之慰藉，随后奉陆军总部命令，改在广州为正式受降地点。因此，特先组设广州前进指挥所，担任传达本部命令，并令中将高级参谋张励为主任，率领官兵百余人于9月6日乘盟机八架由南宁飞广州，作为我的全权代表，负责广州的一切事务。

当飞机起飞时，南宁民众不下万人围集机场，欢送他们东飞。在南宁市政移交工作完成前，我不能赴穗。此时，已被任命为广州市长的陈策已经抵穗，他派了一位代表到南宁来见我，那就是后勤部中将副司令何世礼，他是陪同美国人进入华南沦陷区的第一位国军将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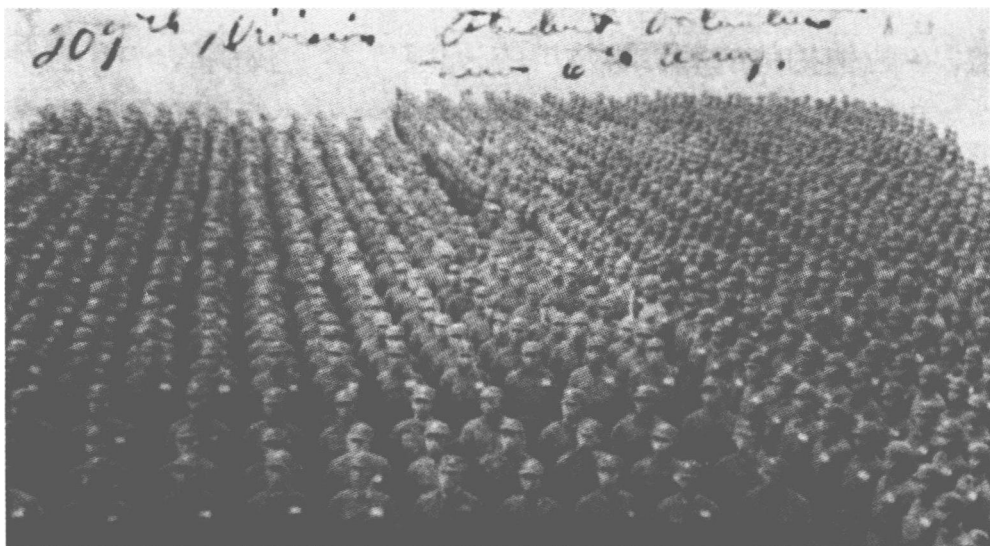
我知道军统局会派人去广州，但不知道派谁去，也不知道他做了些什么。

遵照何应钦的命令，我们于9月8日决定在抵达广州的翌日同美国人一起举行日军受降典礼。陆军总司令部指定在广州受降而非南宁，自然有它的理由。广州是一个大城市，也是敌军的一个重要枢纽。此时新一军与第十三军已经开抵广州。

9月10日，我奉蒋先生之命，兼任军委会委员长广州行营主任（正式签署命令的日期是9月17日）。于是我成了蒋先生在广州的代表，邓龙光兼任行营副主任，另一位副司令官夏威留在广西。广州行营主任掌管广东广西两省党政军大权。罗卓英被任命为广东省政府主席，黄旭初留任广西省主席，余俊贤任广东省党部主任委员。

我不想当这个行营主任，想去海南。自1926年攻占海南以来，我一直期望它有灿烂的前景。在战时，我思忖过胜利以后做什么营生，决心去开发海南，它极具战略价值。我把台湾与海南视为龙的双眼。倘若只注重台湾，那么龙就成了独眼动物。

海南是一个比较小的地方，只有十五个县、三百多万人口，故其政治形势比较单纯。我认为，物色几位优秀、廉洁的县长是比较容易的。当地气候属于亚热带，土地肥沃，每年三熟。日本人在那儿建立了采矿工业基础，岛上有一个优质港口榆林。简言之，海南地广人稀。我相信，在几年勤奋努力之后，会有丰硕成果。我同许多人讨论过开发海南的意愿，其中包括有兴趣在中国投资工业建设的



受检阅的国民党军新六军二〇九师

美国与南洋华侨。我觉得我们应该一起为海南做些事，他们也都对这一意愿表示热情支持。

战争一结束，我就要求中央派我去海南。^①我建议将海南划为直属中央的特区，就像当年把香山县改组为中山县，直属于中央政府，由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任县长。在芷江时，我抓住机会同何应钦谈及海南，我希望他向蒋先生与宋子文游说，让我去海南。但是中央告诉我，去海南时机尚未成熟，在广州还有重任需要我去执行。^②

9月15日，美国后勤司令奥朗特少将乘专机来南宁护送我去广州，鲍曼、我的参谋长甘雨初等人陪伴我同行。新一军军长孙立人等在机场迎接。鲍曼与我乘坐吉普车进入市区街道，那里挤满了欢呼欣喜的民众，街口搭建了彩牌楼，爆竹不停鸣放。我重回广州成为一件壮观的大事。广州市民以极大的热情迎接我凯旋归来。^③

① 8月21日，张发奎致军政部部长陈诚电报，要求把他的建议转呈蒋介石与行政院院长宋子文。

② 陈诚致张发奎电报于9月15日收到。

③ 据张发奎生前亲撰的《抗日战争回忆记》所述：“当我获知受降各部队依次到达指定地点，新一军亦已确定接防广州之后，我于九月十五日上午，率同主要幕僚乘机飞广州主持受降，我与广州别离十五年的悠久岁月，这一次载着胜利之冠荣归故乡，虽无画锦堂记中所描写的心情，但亦不禁感慨万千了。尤其当我的座机翱翔于穗市晴空的时候，俯视白云珠海，念兹一片锦绣山河，和数百万中华儿女们的久受敌人的蹂躏，更令我心头涌起了无限的伤感。飞机在市空盘旋两周才缓缓地降落。我接受了欢迎人员的热烈欢呼，检阅了欢迎行列及仪仗队后，即率领新一军的部队，举行广州进军的盛大仪式。汽车纵列、骑兵部队和全副美武装的步兵，以雄壮威武的姿态，通过了庄严而辉煌的凯旋门，巡行了市区的主要街道。当时我和鲍曼将军以同盟国并肩作战的象征，站在吉普车上，沿途受到全市夹道欢迎的民众的欢呼，国旗凌空飘扬，爆竹之声，不但激动了我的情感，而鲍曼将军也在被这东方式的热情所激荡，认为（这是）毕生第一次的愉快和光荣。”

我们遇见坐着日本兵的卡车，他们停车向我敬礼。他们没有解除武装，无疑，他们是奉田中久一的命令在街上维持秩序。

当晚我见到了一些前进指挥所的成员，他们安排我入住日本显要居住的宾馆，这就成了我在广州的官邸。

翌日，我们在中山纪念堂举行受降仪式。我坐在正中，两旁是鲍曼与甘丽初。田中久一中将没有佩剑，他与其参谋长富田少将，海南岛日军指挥官代表肥后大佐等三人，首先步入礼堂向我鞠躬致敬，挺直地立在我的面前，很沮丧阴沉地聆听我下达命令，继而战栗地签署了降书。站在面前的敌酋，他们的内心是悔悟，抑或是愤恨，我固然无从推知，但我看到的，是玩火者的悲哀，玩火者的收场。作为第二方面军司令官，我向田中下达第一号命令，他签了收条，保证遵守一切命令与指示。

郑鹤影来看我，他是军统广州站负责人，我认识他，他是郑介民的族人，在军统局很有权势。他告诉我，赶在结束战争状态之前，军统就派他来广州接触汪伪政府与伪军高层，那些家伙正密谋叛乱。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军统局就逮捕了汪精卫之妻陈璧君与伪广东省主席褚民谊，把他们送到一个秘密地点。其他伪府要员，包括省建设厅长李荫南、省府秘书长周应湘、财政厅汪宗准和何文灿都已被捕。

9月17日，我接见田中久一。不像何应钦，田中进门时我没有动弹，只是叫他坐下。他看上去尊严犹存。从他的外表、举止与谈吐，我立刻察觉到这是一个和气、有修养、温文尔雅的人，一点儿也不残忍。但由于日军的残暴，广州市民自然痛恨他，然而此时市民没机会见到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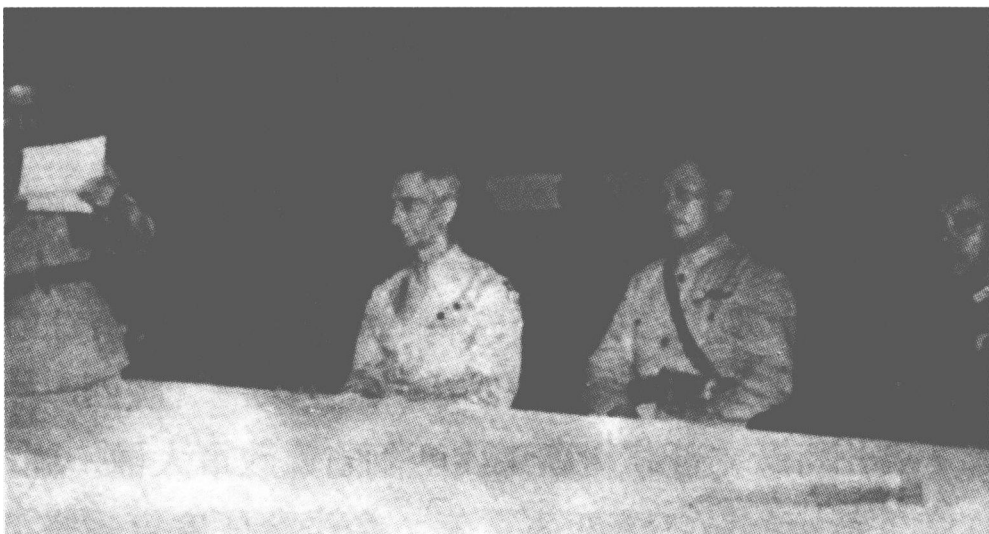
田中久一是个好人。我用“好人”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他告诉我别担心，说他是一个佛教徒，他能向我明确保证，不会逃跑也不会做任何出轨的事，意即不会自杀。他保证服从我的命令，尽到责任约束他的部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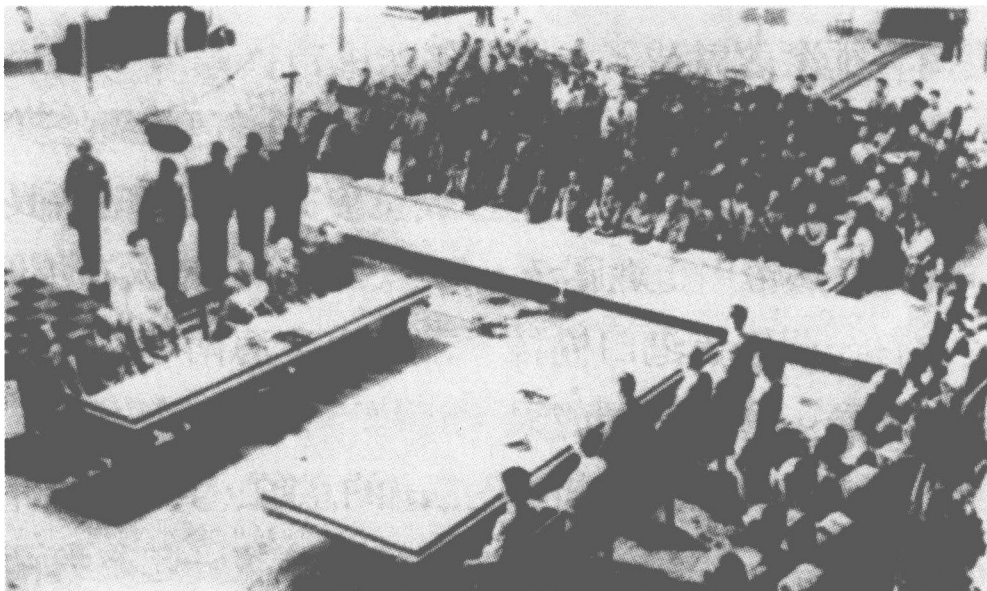
陈宝全

9月28日，我下令禁止流通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储备券，我必须在中央厘定伪币与国家货币法币之间的换算比率前采取这一措施。让伪币保持流通，那毕竟是不合理的，没有一个国家会允许战败的敌人或傀儡政权的货币继续流通。我的行动是正确的，但是人们，甚至人力车夫都反对我。对已经连续使用伪币好几年的市民来说，那确实是一个难受的时刻。他们很不高兴，迁怒于我。我听到他们说：“点错炮仗鼓错掌！我们不应该欢迎张发奎！”但我别无选择。几天后，中央决定了兑换比率。二百伪币兑换一元法币，我感到政府在接收敌占城市之前，没有谨慎地研究经济状况，太过低估了伪币。

我没有为广州行营设立单独的机关。行营一切事务都由第二方面军司令部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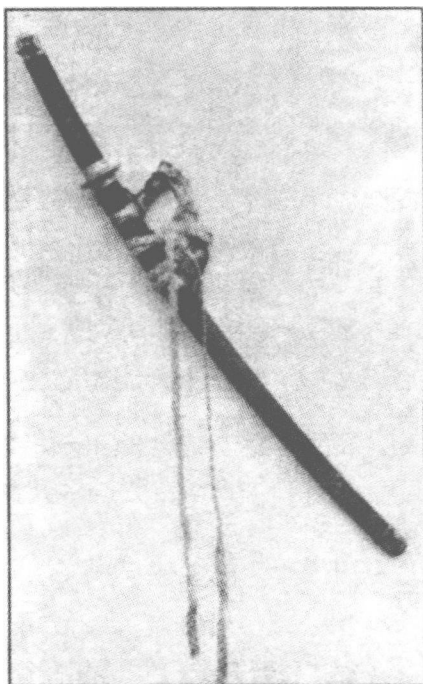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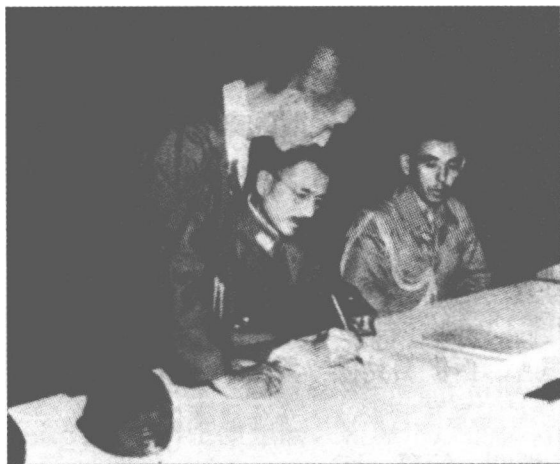
广州日本投降仪式。左起：翻译官骆来添、美国人鲍曼、张发奎、甘丽初。



广州受降仪式现场

行。甘丽初留任参谋长，陈诚调我的副参谋长陈宝仓去负责华北一个兵站^①，华振中接任副参谋长。他是我的同学，也是始兴同乡，曾在十九路军服务，后来在

^① 抗战胜利后，陈宝仓奉命接收胶济区，任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在兵站结束时被控贪污，就此成了无职军官。1947年由潜伏在四战区任军法总监的中共地下党员吴仲禧策反，1949年奉命赴台潜伏，因吴石案而暴露，于1950年6月10日在台北被杀害。



(左上)田中久一在降书上签字;田中签降书后呈交给张发奎的手枪(左下)与佩剑(右)。

十二集团军，隶属余汉谋。而后在薛岳的九战区，当薛岳不再想留他时，我让他来广州。缪培南任我辖区的联勤总司令部第三补给区司令。黄埔一期的黄珍吾任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10月2日，国府主席蒋中正与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签署了我晋升二级上将的授衔令。我在柳州时就获悉此事。同时晋升二级上将的有薛岳，余汉谋则是加上将衔，至1946年6月才实授二级上将。

我们迁回广州后，鲍曼将军参加了我们一些会议，但不再起积极作用。1945年10月他离开广州。他把他的双筒望远镜与左轮手枪送给我留作纪念，我送他一些象牙作为告别礼物。

我的首要任务是解除日军武装。正如田中久一所说，他对士兵保持严格的管控，所以缴械过程十分顺利与迅速。^①事实上他们自己遵从田中的命令缴出武器，再把装备移交给我们。自此，我们就视日军官兵为战俘了，他们被押入集中营。所谓集中营就是普通的房屋。我们简单地把日军战俘集中到一个地区，然后围上铁丝网。原居民暂时迁离。原来的营房，譬如黄埔军校旧址，当然可以暂时

^① 解除日军武装自9月24日开始，月底结束。

使用一下。

我任命廖鸣欧为战俘管理委员会主任。他是东江地区兴宁的客家人，曾在第四军薛岳部任职。【当薛岳不要他时，】我收留他在百色的司令部充任参议。

日本战俘保留他们的军事组织。由于我们没有适当的营房供他们居住，就不得不准许他们如此。有时五个或十个战俘合住一间普通的房舍。他们服从田中的命令，严守纪律，这一习惯源于良好的军事训练。然而，不久前他们还是穷凶极恶伤天害理，以征服者的姿态胡作非为。政治部每周一次派人向他们训话，这类“精神讲话”就是政训。日俘们为了显示他们的诚意，自愿在我的司令部修建了一座礼堂。每天我目睹他们整列走过，看上去行为良好，彬彬有礼，其中有些人是工兵专家，他们干得很出色。

民众对待日俘态度极好。有时我们派他们外出扫街，民众都不敢碰他们一下。

日本军民被安置到单独的集中营，我们对待他们像战俘一样。朝鲜人与台湾人——无论是平民抑或军人——都没有被关入封闭式集中营。当我奉命受降时，我决定不视他们为战俘。虽然台湾、朝鲜士兵违反军纪时比日本兵更加凶残，我还是决定对他们宽大。台湾人毕竟是我们的同胞。朝鲜人固然不是同胞，但他们已经被日本人奴役了好几十年。

在日军中，台湾人与朝鲜人多数充任低级军官——中尉，日本人不会让他们晋升较高职位。我对待朝鲜人台湾人与对待日本人就有此基本差别。日本人进中国是侵略，而朝鲜人台湾人是被日本人奴役，所以值得我们同情。日本人待朝鲜人台湾人像对待中国人一样，摆出征服者的架势。无论他们作什么罪孽，他们都不知道反思。虽然日本人对中国犯下弥天大罪，我们仍要原宥他们。虽然有些民众咒骂日本人，甚至凶过日本人，这是日本人咎由自取。

我执行宽大政策是我自己决定并报告中央，请求批准，中央同意了。我把所有的朝鲜人——平民与军人——都集中在一起。我把新一军的朝鲜族军官崔德新调出来，专门负责集中营的朝鲜人。换言之，我允许他们自治，从未派人去监视他们，也没有用铁丝网封闭他们，崔氏近年担任韩国外交部长，刻正出使联邦德国。我以同样方式对待台湾人，我指定一位台湾人负责，他的名字不记得了。台湾人与朝鲜人不多，各几百人。我们把财产归还给他们，但在广东，数量并不太大。

我们怎样处置战争罪犯？当民众向司令部检举某些日本士兵、军官或部队长在当地犯下暴行时，我们立即执行逮捕。在某些案例，没有人举报我们就执行逮捕。例如，我们逮捕了肥后大佐，但没人控告他，于是他获释，被当作战俘而非战犯。

事实上我们逮捕的战犯很少，他们被关押在一个地方。田中久一得到特殊待遇，我们确实优待他。他是中将军衔，我们让他住在河（今珠江）南集中营的一座房屋，由宪兵看守，一名来自台湾的客家人充当翻译，陪伴着他。

我见过田中好多次，有时我想问他一些事或者要他做某些事。10月下半月何应钦到广州时，他想在我的司令部见田中，他俩会面时我在场。田中进门时，何应钦起立。田中是个好人，但他的部下军纪很坏，积案甚多，例如日本兵向中国无辜民众鼻孔灌水致死，这些暴行都有照片为证。广州开庭审讯田中时，他辩称并未下令作恶。田中不是一个残忍无道的人，不像酒井隆在香港下令集体屠杀。然而，田中必须为他下属的灭绝人性行径负责，死有余辜。军队的事是很难说的。当统率许多官兵时，你不能保证无人违反军纪。田中统领十几万人，包括日军驻香港部队，他控制不了部下杀人强奸。几名日本将领因日军滔天暴行而被处决。^①

有一次去南京，我路过冈村宁次的住宅，他获准留在日本投降前他所住的豪宅中，唯一区别是他由中国宪兵监护。我认为不该待他太好，至少要叫他搬到小房子去住。

战犯由司令部军法处审讯。我们向中央请示，中央答复采取宽大政策，我们甚至释放了田中的参谋长富田直亮^②，他与其他战俘一起被遣送回日本。

田中久一上法庭受审许多次，最终判处死刑。然后他作为国际战犯被押送到上海。美国人要求把他押到上海由美国军法官与中央指派的法官组成合议庭审讯。结果，再度被判死刑，送回广州执行，因为他是侵占广东的日军首领。他被处决时我在南京。后来我听说，他处决前被五花大绑站在敞篷卡车上游街示众。为此，我训斥了我的参谋长甘丽初。如果我在广州，我一定将他关在密闭囚车中押往刑场。

没有任何台湾人或朝鲜人受审，正如我说，我们并不视他们为战俘，遑论战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无人犯下暴行，可是他们都是普通士兵或低级军官。许多美国人参与日本战俘等的遣返工作，他们都住在西方人聚居的沙面。当美国轮船开抵时，我让朝鲜人先离开，然后是台湾人，最后才是日本人。遣返工作持续了比较短的时间，1946年4月25日宣告完竣。

轴心国的国民中我只拘捕了一个德国人奥多医生，他在中国住了很久，是个纳粹党人。我见过他。我们掌有证据他参与政治活动。他的医疗设备被没收，后来被遣返回德国。我没有拘捕意大利人，许多意大利神甫来拜访我，他们害怕国军进驻教堂。

我记不得有关盟国国民被日本人囚禁的案例，我想就是有也不会多。

根据中央的命令，在国军到达之前，政府指定伪军的正规部队为“先遣

① 1947年5月12日，日寇陆军少将旅团长长平野仪一与驻市桥分队长五十岗孙三郎在广州被处决。

② 1949年9月，获国防部军事法庭宣告无罪开释回国的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日本招募日籍军官组成军事顾问团来华协助军训，该团团长就是前华南派遣军参谋长富田直亮，他化名“白鸿亮”于11月赴台，设立圆山军官训练团，对国民党军队中上级军官作短期的战术训练，讲述战争哲学及登陆作战等实务，蒋介石还亲自到场旁听。1951年，蒋介石决定增聘日本教官50人，扩展训练规模；另外建立一支名为中山师的半机械化模范部队，另聘日本教官46人，人事费用年耗26万美金。这支部队后来编为第三十二师。直至60年代才结束。

队”，就地维持秩序。陈诚向蒋先生建议立即遣散伪军，蒋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政府命令我在两个月之内解散伪军。我要求延期，因为广东省的伪军多达几万人，我担心他们抗命；如果操之过急，他们会投向共产党，或者上山落草为匪。那么，我们就没法解除他们的武装了。所以我规劝中央莫草率行事，要谨慎小心。上面答复说，限期两个月不可能再延长。

很幸运，我是广东人。再者，广东省伪军的高级军官对我很信任。我命令伪军集中到芳村、花地、石围塘周围地区，10月12日邀请他们的部队长来司令部出席会议。出席者有留日的师长彭济华和另一名师长李辅群。我告诉他们，有两种选择：遣散或者并入缺额的国军部队与保安团队，10月底就要定夺。他们回营后同下属商量了我的提议。大多数军官——包括李辅群与彭济华——报称，他们的下属愿意遣散。广东人就是这样——宁为鸡口毋为牛后，宁可挨饿也不肯被吸纳到其他部队。当然，他们知道我们不会信任他们。他们愿意领一笔遣散费各奔前程。

有一小部分伪军军官选择了并入国军正规部队或保安团队。我们吸纳了士兵，把部分军官送到韶关林挺华管理的待命军官团。其他军官选择回家。

我任命了先遣队指挥官招桂章，^①我们是老友，他是陈策在广东海军学校的同学，此人没有问题。我们遣散伪海军的高级军官。事实上，汪伪的所谓海军只包含几艘小艇，我们接收了它。

一切都顺利，我在限定的两个月内完成了整个遣散程序。我向中央报备中央批准我对伪军的有关安置，这不需要报批。只要两个月后不再向中央支领那些伪军的军饷，中央是不介意的。我向中央解释，如果我解散了全部伪军，他们在走投无路之下会上山为寇。

我以汉奸罪枪决了几个伪军混合部队的指挥官范德星等人。范德星原来是第十师师长，后任十一军军长，他被控在北江地区欺压民众。战争结束时他逃跑了，我的部下抓住了他向我请示如何处置，我下令立即枪决。我也下令立即枪决陈修爵、吕春荣和符永茂，后者是土匪出身，被控欺诈广州湾民众，吕春荣是粤西南的暴君。陈修爵原任粤军第一师旅长，我在韶关统领四战区时，他在粤西南（阳江）当县长。我们调他去干训团，快结业时省政府逮捕了他，他伺机逃跑投靠汪伪当局，仗势欺压北江地区民众。这四个汉奸都是粤西南人氏。陈修爵不知为何逃走了。我下令立即处决前并没有请示过中央，因为高级将领有临机决断之权，这类事不必请示，是他们违反军令、抗拒报到才遭此后果。

听说战后法国枪毙了数万的奸伪人员。国家的正义与民气必须伸张。文天祥的浩然之气，实足以代表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存条件。奸伪的政治主张，虽有其不同的角度，但卖国求荣的行为是罪无可逭的。

伪军也必须区分正规军与杂牌军。前者并不负责地方治安，他们受训打仗；

^① 10月4日，张发奎传召招桂章出席先遣队指挥官会议。

后者掌管地方权力，是当地民众的暴君。还有些有名无实，其主官系“无兵司令”，人称“游击单位”。我们分辨出游击单位，就命令他们集中缴械，其中多数人能服从命令。我们给军官安排工作，把士兵解散，枪械交还给地方政府。有些杂牌游击队我们未能成功地遣散，结果有些人去当了土匪。

我让曹启秀在司令部充任参议。戴朝恩想当遂溪县县长，我建议他在司令部当参议，他不想当参议，说当县长才能更好地服务桑梓。我说遂溪是个小县，为何不想去大县。他说没有足够的钱去津贴一个大县。一般来说，千里为官只为财，他却是个例外，他有很多钱，遂溪是个三等的穷县。他为人正直，我推荐他去罗定县。

我认为必须使用武力处置广东的共产党部队，同时拟订全面解决的办法。既然蒋先生决心消灭共产党，那就没有理由不在广东采取行动，我相信自己有能力在广东“剿灭”共军。曾生部共军不成问题，加上老弱总共才两千挂零人马。虽然曾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生，但他有些部下是土匪出身，还有些是广东省自卫团队的成员，其部下多数并非共产党员。他们处境很艰难，自然不想为曾生卖命。

我下令曾生将所部集中到惠州，他抗命，似乎察觉到我会解除他的武装。我派六十四军的刘绍武师与绥靖公署的保安部队去解决曾部。曾生部奉行共军的战术“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故不必打大规模的仗。再者，他们是广东人所说的“地头虫”，我的部队必须尾随追击。



冯白驹

琼崖纵队的冯白驹是个中学毕业生，部下有些是土匪，这并不奇怪。譬如，1921年我统领的第二十七游击警卫营就是土匪组成的。当国民党为推翻清王朝而斗争时，它也同土匪合作过。冯白驹只有不到一千人马，躲藏在海南岛的山区。

我向蒋先生要六个团，誓灭冯白驹部。四十六军有一个师驻在海南，但那时日本战俘——其中大部是海军——仍待在海南。再者，四十六军已内定调防广西。

我不能派十三军与新一军去“剿匪”，因为他们已内定调往东北，正等候美国军舰载运北上。余汉谋已带领他的广东部队去浙江就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

唯一我能调度的部队就是六十四军，其中一个师又被派去“围剿”曾生部，剩下的部队需要维持地方治安。

当时匪患严重，广州长期遭受土匪祸害。在抗战时期由于日寇入侵，匪情稍见缓和，基于爱国情怀，部分土匪团伙自动改编为抗日游击队。抗战胜利后，死灰复燃，他们属于“职业匪帮”之类。第二种类型的土匪包含汪伪军的残余、游击队以及其他混合部队。有些土匪团伙是由逃兵组建的。到战后，有些土匪团

伙被中共渗透与操控。有时共产党训练某些地区的村民，派他们回去制造动乱。

匪患为祸甚烈，殃及全省，最严重是在东江与北江地区。大多数土匪是迫于生计入草为匪的，当时政治形势恶劣，经济环境严酷。剿匪军事行动由广东省政府主席罗卓英兼任司令的省保安部队以及地方自卫团队负责，也得到军队协助。

自从1939年邹洪带走六个团组成暂编第二军之后，广东省保安处直属部队与保安团的实力大大削弱了。胜利后，我们组建了新的保安部队，总数增加到九个保安团。按规定，必须每个行政区配备一个保安团，筹集武器、军饷及遴选适任军官都需要时间。除了被遣散的伪军单位，我们只能征募新兵。

我认为，扑灭土匪的唯一办法是强化地方基层组织，甲、保、村、县之间务必密切配合。换言之，我认为要解决匪患，政治举措重于军事行动，在处理共产党问题时，这一点尤其显得正确。蒋先生的口号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消灭共产党，我把它改为“一分军事，九分政治”。例如，当一个陌生人进入一个村庄，或者甲内有人失踪多日，如果甲长立刻报告当局，那么共产党就没法渗透村庄。甲长必须为他所辖十户居民中全体成员的行动负责，例如，其中有人接受共产党训练后返回村庄，其他居民就应该立刻报告上级。可是，保甲制度徒有其名，不起作用。

共产党占据了乡村，还“骗取”了村民们的信任，每当国军来到前，村民会主动给它报警。虽然冯白驹是海南岛本地人，我相信如果政治形势良好，他会无处藏身的。

我认为广东省的汪伪政府成员罪恶昭彰，必须惩处。虽然汪精卫同我很接近，但我感到陈璧君在个人关系上一无可取。我一到广州，（陈璧君的妹夫）褚民谊就写信给我申述他的困难，希望让他尽快见到蒋先生。他说，如果他能见到蒋先生，蒋会谅解他的处境。褚民谊还对军统局的特派员说，陈璧君想见我。考虑到我的职务，我不能见他们——我们的关系只是私人关系，所以我派我的秘书长麦朝枢去探望他们，褚与陈他都认识。后来麦朝枢说，陈璧君对他讲，她知道我是不会去见她的。麦解释道，我因官箴不能前去，所以派他去，我想知道自己能为她做些什么。她说对伙食不满意，又说她希望马上见到蒋先生。他们被扣押在市桥。我对郑鹤影说，他们想吃什么就供应什么。我也建议郑请示戴笠。鉴于陈璧君叛国仅止于她一人，我认为她的子女与佣仆与她一起囚禁不甚妥当，应予开释。

我没有听到广州民众对汪伪省政府的抱怨与抨击，也没有广州市民对伪政府怀抱恶感的印象。在广州的伪府大员——伪广东省长褚民谊，陈璧君的弟弟、伪广州绥靖公署主任陈耀祖等人我都认识，陈璧君在广州是幸运的——她在广州度过的日子比在南京多。她同日本人打交道是比较强硬的，她就是这种类型的人。据我观察，陈公博、周佛海——这些人我都认识——在上海同日本人打交道也比较坚定，陈公博面对日本人时十分敢言；当日本人欺凌上海市民时，陈公博大胆提出异议，这就是上海市民对陈公博、周佛海印象良好的原因。倘若戴笠不在1946年3月死于空难，周佛海会离开监狱的。

无论在广州抑或上海，这些伪府政要都是汪精卫的追随者，他们鼓吹所谓

“和平”，其叛国的理由就是“中国打不过日本”，汪精卫组织伪府就是基于这一理念。事实上，日本人并不是平等对待他们，他们充当了傀儡。然而他们宣称，即使他们仅仅是傀儡，也要为老百姓争回一点权益。

我没有见到伪府在广州压迫民众的任何证据。如果确有这类事实，我至今仍相信，涉案的伪府成员一定会受到严惩，首恶枪决，从犯人狱，这是天经地义。

没有人抨击广州行营，因为它只是执行中央的命令。民众没有批评我宽纵汉奸，也没有人要求我逮捕伪府成员。

可是，（1945年10月19日至26日何应钦在广州时）在欢迎何应钦的群众大会上，有人突然要求逮捕四名伪组织首领——李辅群、广东省政府警务处长郭卫民、广州卫戍司令招桂章以及商会会长。何应钦命令我逮捕此四人。我们抓获了郭卫民与招桂章，但是商会会长逃走了。

翌日，郑鹤影带了李辅群来见我。我可以当场逮捕他，但他表示已被捕过，他不能保证政府能接管他的全部财产——有些旧式的钱庄与其他企业，他打算捐献给政府，可是他手下的职员不会移交有关文件。他建议我在逮捕他之前给他时间去处理业务，将财产移交给政府。我问他需要多少时间，他答一个月。我问，若是不回来怎么办，他答应不让我失望。我想，他可能以为军统局会保护他。从权责上考虑，我必须逮捕他，不管政府是否能接管他的财产。可是，我想，既然郑鹤影带他来见我，一旦李辅群弃保潜逃，郑鹤影可以作为证人，证明我没有收过李辅群的贿赂。再者，我发觉李辅群很坦率，相信他不至于骗我。故我准许他保释一个月做他必须做的事，这一安排只限我们三个人默契。

我来广州之前不认识李辅群，这段时期他常来见我讨论财产捐献给国家的事。他是伪军师长中唯一土匪出身者，战前在广州郊区市桥一带活动，人们叫他“市桥皇”。在朱执信收编他以前，他的所作所为酷似早年的李福林。他胁迫每位坐船的乘客向他缴纳两元买路钱，所以人们称他“李朗鸡”——“朗鸡”同粤语方言“两元”谐音。

李辅群隐居了一个月，满期那一日他独自到我的司令部投案。当他递交名片时，司令部人员感到震惊，因为此事我甚至没告诉过参谋长。我命令他进来，宣布逮捕。他苛虐民众，故民愤极大，经司令部军法处审讯后，判处死刑。他被解送南京复审，再度判死。所有涉及死刑的案件都要呈请中央批准，中央可能交付南京的高院复审，也可能派人到广州复审。

军统局为李辅群申辩，但是枉然。李福林去找许崇智的门路，可惜许崇智那时很少有机会见到蒋先生，遂把希望寄托于居正。这三个人一起去见蒋先生要求特赦。他们说，李辅群在珠江三角洲拥有一定的实力，最好是免其一死。倘若将来有什么突发事件，他可以出来为国家出力。蒋先生聆听他们三人的意见后，同意特赦，减为终身监禁。^①

^① 1959年李辅群被从上海市监狱押回市桥，同年9月19日被枪决。

陈璧君、褚民谊与其他汪伪政府要员被解送到中央受审，名单是中央指定的。结果褚民谊判死、陈璧君判无期徒刑。

我组织了一个肃奸委员会，由中央与省政府的代表组成，二方面军军法处长吴仲禧代表司令部，冯次淇任主席。在我回广州前，军统局已经逮捕了伪府重要成员，名单通知了我，其中一些人由军统直接解送中央，次要的汉奸移交给肃奸委员会。

在我回广州后，军统局继续逮捕重要汉奸，它给了我一张次要汉奸名单，我交付肃奸委员会调查。该委员会想实施逮捕时便会报告我，由我派宪兵执行。不必要的逮捕极少，因为中央颁布了惩治汉奸条例，规定哪些人可确认为汉奸，又把他们分成不同的种类：文化、教育、经济、政治、军事等等。在教育界，譬如，只有中学校长以上或者教育局处长以上才被视为汉奸。

处理汉奸案件条例

国民政府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令，兹制定处理汉奸案件条例，公布之，此令。

第一条 处理汉奸案件依本条例之规定，本条例无规定者，适用其他法律。

第二条 对于左列汉奸应厉行检举。（一）曾任伪组织简任职以上公务员或荐任职之机关首长者。（二）曾任伪组织特务工作者。（三）曾任前两款以外之伪组织交武职公务员，凭借敌伪势力，侵害他人，经告诉或告发者。（四）曾任敌人之军事政治特务，或其他机关工作者。（五）曾任伪组织所属专科以上学校之校长或重要职务者。（六）曾任伪组织所属金融或实业机关首长或重要职务者。（七）曾任伪组织管辖范围内任报馆通讯社杂志社书局出版社社长，编辑，主笔，或经理，为敌伪宣传者。（八）曾在伪组织管辖范围内主持电影制片厂，广播电台，文化团体，为敌伪宣传者。（九）曾任伪党部，新民会，协公会，伪参议会，及类似机关，参与重要工作者。（十）敌伪管辖范围内之文化、金融、实业、自由职业、自治或社会团体人员，借敌伪势力，侵害他人经告诉或告发者。

第三条 前条汉奸，曾为协助抗战工作或有利于人民之行为，证据确凿者。得减轻其刑，依前项规定减处有期徒刑者，仍应褫夺公权。

第四条 汉奸所得之财物，除属于公有者，应予追缴外，依其情形，分别予以没收或发还被害人，前项财物之全部或一部无法追缴，或不能没收时，追缴其价额，或其财产抵偿，但其财产价额不足应追缴之价额时，应酌留其家属必需之生活费。

第五条 汉奸案件，除被告原属军人复任伪军职，应军事审判者外，均依特种刑事案件审讯条例之规定，由高等法院或其分院审理之。

第六条 汉奸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日以后自首者，不适用自首减免其刑之规定。

第七条 收复区高等法院或其分院，开始办公后，政军机关应将所有汉奸之行为，财产及其他调查资料，移送检察官侦查。

第八条 高等法院或其分院审理汉奸案件。必要时得派推事赴犯罪地就地审判。

第九条 关于汉奸案件各级检察官均应行使侦查职权，移送该管检察官办理。

第十条 各地政府机关对于司法机关办理汉奸案件应切实协助。

第十一条 本条例自公布日施行。

吴仲禧告诉我，朱执信的老婆、广州执信中学校长拒绝将学校移交给肃奸委员会。吴说，肃奸委员会要逮捕她。我要他为朱夫人向肃奸委员会辩护，毕竟她是国民党的革命烈士遗孀。我传召她来见我，我吩咐她把学校移交给肃奸委员会，她拒绝了，称：“如果我是汉奸，那么朱执信也是汉奸！”最后，她的儿子劝她听我的话办了移交。

9月16日，我一到广州就召集座谈会筹划组织接管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中央政府、省政府各个部门以及二方面军司令部的代表组成，朱晖日任主席，负责接管敌伪财产。中央政府有一位部长写信给我，要求协助他的特派员。当此人持介绍信来求我帮忙时，我说这属于他的权力，只要有需要，我一定帮助他。

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特派员在接收某敌伪产业时发生争执，我便要他们请示中央，这一类财政部与经济部之间的争执很多，但他们从不提出较大的问题。当接管委员会想抓人时，譬如有人拒绝让他们接管一处财产时，委员会就通知我。如果我觉得应该逮捕，我就派宪兵去执行。

我们也设立一个局管理敌伪财产，局长林继庸是中央派来的，其核心由中央政府各部门、省政府各部门以及我的司令部代表组成，该局负责接管委员会移交的所有财产。有时敌伪财产管理局会遭到占住房屋者的反抗，不仅是占住敌伪房产者，还有占住普通民众房产者。我们回到广州后，军、政、党机关把房屋占为己有，部分要人赖在大屋不肯走，人称住“霸王屋”。当敌伪财产管理局向我报告有人抗拒接管行动时，我就派宪兵把住霸王屋的人撵走。

有时广州居民直接来找我或写信给我投诉侵权事例。倘若我见到适当的产权证明，会派宪兵将占住者赶走，不管是谁，限三日内迁走。有时我派车搬运他们的私人财物，弃置在露天场所，甚至赶走我的下属。在这方面，我的司令部与其他机关都犯有侵占民房的过错。华侨们对我特别感恩戴德。当然，有关征用财产的规定对任何人都是一体执行的，广州本地居民可以就近照顾自己的房产，而华侨可能没有亲友在广州照看他们的房产。

为配合落实政策，军统局把它接管的房屋缴出来，其实它接管的房屋不多。例如军统局在我回广州时接管了汪精卫在沙面的官邸，移交给司令部时开具了一份完整的清单，包括家具、设备、油画等。我平时嗜好收藏砚台，汪公馆存着好多。我留了些给自己，赠送司令部里每位师长一个砚台。当然，接收房屋要给军统局开收据，然后将此豪宅及其附属物品移交给接管委员会。后来这座豪宅充作广州行营招待所，我的家属在此住过。我留作官邸，因离司令部很近。

中统局接收了一些重要企业，要求中央把产权划归局方。我没有插手这些事务。中统局没有插手肃奸工作。

陈策任广州市长仅几个月，绩效不彰。他要求蒋先生派何世礼继任，但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属意他的亲信欧阳驹，于是欧阳驹继任市长。欧阳驹比陈策坚定果敢。他告诉我，党政军机关不按章缴付水电费，民众称之为用“霸王电”、“霸王水”。他说，只有我的司令部是按月缴付水电费的。于是我督导所有机关

按时缴付水电费。

我不得不承认，胜利冲昏了人们的头脑，他们疯了。国民党的接收无一例外，汤恩伯治下的上海，情况更加恶劣。

一开始，我就惩处了下属中的贪污犯。9月30日，我下令将梁逸飞停职候查，因为他瞒报了一笔轮胎账目，同案一名文姓男子牵涉此案被捕。最大一宗贪污案是军政部广州特派员莫与硕犯下的，他负责接收广东的军用物品，竟把其中一部分装备卖给了珠江三角洲的土匪头子高根。此案的暴露是因为土匪内部分赃不匀，他们内部有人向我们举报，还引领我们去观看为窝藏赃物而特地修建的房子，一部分盗卖的军用设备被隐藏在墙壁中。若不是此人举报，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我派一个营包围了这伙土匪，夺回了这批军品，其中包括几千支步枪，还有机关枪、弹药、车辆等。10月19日，高根匪帮二十多名成员被俘。

我曾讯问田中久一，为什么这批枪械没有被列入投降后移交的清单，他答这一批军品从日本启运，到广州时已是日本投降前夕，连货箱都未打开验收。他说如他把所有物资都列入清单，他要承担很大风险，所以开具清单时只列明百分之八九十的日本军品库存量。他深谙中国官场的腐败情况。

我据实向中央申报。莫与硕当时去了南京，中央找他时发现他去了上海。他在上海被捕，旋即押回南京转送广州。我奉命监视他，遂交宪兵看管。宪兵见莫与硕是黄埔一期及军政部特派员，就让他自由活动，只是贴身陪伴。有一天我在飞机场看到他，当即斥责他。他说，他还拥有一批军品尚未登录日本人提供的移交清单，请示我如何处置，这批货包含当时价格昂贵的汽油。我说：“你确实该死！你为何不呈报军政部？”他沉默不言。我叫宪兵把他交给特务团。

一个星期六的早晨，一名中央的高级军法官持蒋先生亲撰的处决手令来见我，他说：这是件重案，莫与硕必须立即处决。我说，军法处尚未接到这一命令，而且莫案尚未审讯。然而他找到二方面军的军法处长吴仲禧，当天下午就开庭审判，按规矩我们星期六是休班的。他们向莫与硕出示蒋先生亲撰手令，莫与硕阅后表现得很平静。我通知他的妻子立刻前来见最后一面，当天他就被枪决了。^①

广东省政府主席罗卓英责怪我执行前不通知他，莫与硕曾在罗卓英的十八军任过旅长。我担任闽赣浙皖边区总司令时认识莫，当时十八军归我指挥。甚至连

^① 在张发奎麾下做过二方面军参谋长的谢膺白在他发表于《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的回忆录中说：“张发奎枪毙田中久一与莫与硕李节文都是蒋介石所极端不高兴的……日本投降后未杀过一个日本战犯（按：这也不确，在中国审讯枪决的日本战犯为数不少）。莫与硕李节文是黄埔一、二期学生，蒋介石的嫡系死党，无论如何要代为掩护……张发奎屡次电请枪决，均置不复；张发奎到京开会请示蒋，蒋借故避而不谈，陈诚何应钦与莫李二人均有师生部属关系，也代二人极力洗刷。最后要张发奎将莫李二人解京讯办，实欲乘机开脱。张发奎想出一条计策，诡称莫李二人在解京途中突然逃脱拒捕，因而被押解卫兵乱枪击毙，电发，蒋介石大怒……”然而，从张发奎口述自传可知，枪毙田中久一是经过中央二审定讞（且有美国人参加会审）后维持原判押回广州处决的；而枪决莫李二人则是蒋介石亲自下手令让军法总署派大员南下监刑的。

陈诚都因为莫与硕案对我不满。莫与硕的黄埔同学、特派员广州办公厅主任李节文也受审，同时被枪决，这是广东省最大的一宗贪污案。

我也负责广西的接收工作，但可做的事很少。日本投降时，敌军已撤出广西。日本占领广西是1939年至1940年以及1944年至1945年，为时甚短，敌军无所作为。譬如，两次沦陷期间，南宁的学校都没有重开。我们只需要处置为数不多的汉奸。

我同英方有着密切与友好的接触。9月20日，英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福拉塞上将到广州作亲善访问，驻港英军司令菲斯丁将军也到访多次，我个人对他俩十分友善。港英政府要求我派人以联络官身份常驻香港，我派旅美华侨骆来添出任。

9月28日，我派遣一个宪兵排去香港，因为当时日军第十三军奉命集中在九龙塘等候美国轮船接载他们去大连，有些日军士兵不守军纪。菲斯丁将军十分合作，他对香港军管总督夏懋上将说，倘若派香港警察去逮捕违纪日军殊不适当，建议派国军宪兵前往。我派何世礼去香港同英国人磋商。接着夏懋上将也来穗拜访我，当我依礼到香港回访时，我见到中国军队根据口头协议，在街头执勤。我住在港督府。福拉塞上将邀我去他的旗舰出席午宴。

军政部派潘华国中将赴香港负责接收英方移交的一批军品，他的助手是莫与硕、周雁宾与余兆麒。后者是军统局所派，他享有少将待遇，但不是军人。

过了不久，中央命令我逮捕余兆麒，中央指他招摇与滥用权力。在战前他为中华民国驻古巴公使张惠长担任秘书时我就认识他。我告诉港府，将余引渡回穗。李宗仁白崇禧打电报给我要求保释，我说本人只不过是执行中央的命令，无权释放他。两周后，中央让我释放他。

在澳门事务上，葡萄牙对我们十分友善，我派作战处情报部前主任潘奋南去担任我的行营驻澳联络专员，他也被授权接管敌伪在澳门的财产，我们把一批汉奸引渡回广州。不久我下令逮捕潘奋南，但由于贪污证据不足，他被囚禁短时期就获释了。

我想收回澳门。胜利后我首次回重庆报告广东接收工作时，我向蒋先生、张群等人建议收回澳门。我一贯痛恨烟赌。我告诉蒋先生，只要切断大陆对澳门的供水，我就能和平收回澳门，只要一个营的部队就可以维持当地治安，我将为我的行动负全部责任。

张群反对我的提议，蒋先生说我想得太简单了：“收回澳门是任何时间都可办到的，可是香港……你能拿回香港吗？如果你决定同葡萄牙人打仗，你必须考虑英国人的反应，你也得准备同英国人打仗。再者，美国人会反对你，这一切都会导致严重后果。”我后来思忖，蒋先生是对的，我考虑并不周全，我的脑筋实在太简单。1946年4月4日，澳门总督伊海杜上校到广州拜访我，我没回访。

我坚持要去海南，同许多人谈及过这一意愿。战后我第一次去重庆见蒋先生时，就提出这一议题。蒋先生说，他赞同我的愿望，但时机尚未成熟，他要我首

先在广州做好本分工作。何应钦到广州时，我又提起海南。事实上，我与何应钦、宋子文一起访问了海南，后者是海南文昌县人。^①我想起一件有趣的事。我带了几位高级同事同行，包括李汉冲与甘丽初。宋子文带了他的秘书与一位姓陈的随员。我们搭乘军用货机，座椅设在机舱两旁。为了让宋子文坐舒服一些，我们带了一把椅子。可是宋子文习惯了摆官僚架子，他自己带了一张帆布床放在机舱中间。当他的随员用跪姿呈给他一封电报时，他正穿着衬裤躺在帆布床上，竟用脚趾头接电报。

我们都被这一侮辱行为激怒了，李汉冲向我提议：我们一起上去打他。他侮辱了高级将领：我是上将，李汉冲是少将，甘丽初是中将，余皆少将。那个随员是政府文官，他本不该给宋子文递信。旧时曾国藩被批评洗脚时见客。宋子文此举无疑侮辱了所有坐在机舱两旁的将官，但我阻止李汉冲动手。由于宋子文的官僚习气，我对他印象很坏。宋子文到访广州期间不想被打扰，拒绝开会与见客。但我们还是一起视察了新一军，这是战前他将广东省盐务管理局缉私总队改编成军的，他对新一军极为满意。

不久，新一军移师北上，不少军官眷属拒绝随军，原因很复杂，因为有些军官把钱都交给了他们的妻子。这些妻子中有些是酒家女侍。由于日本占领的影响，广州流行女侍陋习。有些新一军军官积攒些钱老是跑酒家。他们见到这些年轻的女侍穿着漂亮的衣服就想迎娶，其中许多女侍不是正经女人。她们嫁给外省籍军官是贪图他们英俊与多金。

我们不能阻止这类婚姻。我对新一军军长孙立人与三十八师师长李鸿说，要提醒下属小心。孙立人是留美学生，认为并非所有女侍都是不正经女人，有些还是不错的。我要他保持警惕，毕竟我是广东人，比他清楚得多。我自己当然从来不去酒家，人们也不敢邀我去这类场所；我在这类场所出现时宪兵会贴身保护我，会造成业者不便。当然我会去酒家出席婚礼，譬如徐景唐的儿子娶亲，以及诸如此类的庆典。

五十四军从南宁调来广东接替新一军的防务，驻扎在广州及其周围地区，军部设在沙面，军长阙汉騫是一位书法家，他送了我一副条幅。

我同军统局的关系与战时一样，郑鹤影负责军统在广东的活动，他尊重我。

我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广东分团主任，广州行营政治部主任黄珍吾兼任三青团广东分团总干事，我出席过两次他主持的三青团会议。

我同国民党内CC系的关系没有大问题，没有利益冲突，相安无事。当然，CC系在广东实力很强。在战时，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兼任省党部主委。胜利后，CC系的余锦贤当上广州市党部主委。我同CC系在安排广东省人事方面无大歧见，CC系当然会推荐人事，但那与我无关，那是广东省政府的职责。

^① 1945年10月26日，张发奎致函宋子文，希望宋帮助他到海南从事开发，也希望宋南来。11月9日，宋复函说，当地的地方绥靖与恢复秩序比抗战更为艰难，他答应在建设开始时帮助张达成这一心愿。

我记不起广州的中统负责人姓名了。无论如何，中统局不需要直接接触我。有需要时，我会同省党部联络，他们毕竟是CC操控着的。

中央党部指定我监察广东省党部的选举，134人投了票，余锦贤以全票当选。见此结果，我当着众人对他说：“余主席，如果你在134人中得133票更加合理。”他说他已劝告一些人，不要投他的票，我说：“但你为什么投自己一票呢？”他不能回答。

说到国民党的贪污问题，真的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在抗战期间由于敌人的出现，情况比较缓和。战后政府机关都在贪污，正如我所说，接收成了“劫”收。党政机构每一个层级都贪污。我真的拣不出任何干净的层级。广东省太大了，不可能把那么多县长都严格控制住，所以我想去海南。

接收这个历史任务虽已完成，可是整理受降后繁杂的任务，却令人感到不快。这固然因胜利的突然来临，使我们在时间仓促中不能预作详细周密的准备。而我们行政方面之低能与社会人心之腐败，也于胜利后不久之际，全部暴露无遗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奸莠乘机抢掠，加上接收情形的紊乱，和浑水摸鱼的贪污罪行，真令我感到我们虽赢得了胜利，但我们先哲遗下来的羞耻观念，却已荡然无存了。

我先谈接收的事情，这是战后行政的最大污点。首先是中央对于接收问题，根本没有全盘计划。凡接收机关的派遣，接收部门的分类，接收物资的处理，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如当我成立接收委员会时，中央仅派有军政部、交通部、财政部、中宣部和航空委员会的特派员到来，至于其他中央各部门有无派遣人员，及应接收何物，均无指示。但事隔月余，经济部、农林部、教育部、社会部、海军部等特派接收人员又陆续到来：如海军的船艇就须由军政部的特派员再行移交于海军部的接收员；有国营性的生产工业，就须再移交经济部的接收人员。甲移交乙、乙移交丙，其中损失和舞弊情事，就不难想象了。其次则物资之分类又没有详确规定，如通讯器材，究竟属于军政部，抑属于交通部？军用的化学工厂，究属于军政部，抑属于经济部？凡此均引起了接收工作不少的纠纷。接收委员会最初虽有一个概要的规定，但因中央各部门的步骤紊乱，竟无法顺利进行其工作。这些都是当时行政院应该负的责任。

多数接收人员的低能和贪污，更直接造成了接收工作的混乱。接收人员，为个人打算的多，为国家设想的少；藏匿埋没，折扣报销，贵贱调换，敲诈勒索，层出不穷。结果发财是私人，吃亏是国家，军政部特派员莫与硕和他的办公厅主任李节文的正法，亦不足以转变此种风气。发“胜利财”与“劫收”的名词，竟在这个时候添入了“辞典”。于是，人民由希望的高峰跌进了失望的深渊。胜利的光荣，也因此而黯淡褪色了！

共产党员仍在行营服务，副官处的科长左洪涛就是共产党。剧宣队在那时解散，原先的共产党员只留下十来个，我亲自给他们安排工作。例如，我任命何家槐任行营秘书，我把其他人安插在第四军同事经营的怀远出版社，有些人担任眷

抄、归档、译电码工作。

为什么当我出动部队“清剿”曾生部共军时，却在行营留用共产党员？我把党与个人区别看待，我善用人才，所有这些共产党员，包括左洪涛，都只是担任低职。“清剿”曾生是由于他抗命。

1946年3月7日，我荣获青天白日勋章。这之前发生了一件事：一天晚上，俞飞鹏在重庆邀请我、陈诚、顾祝同、蒋鼎文等人午餐，共有十五名高级将领出席。饭后，我们要求陈诚询问蒋先生，为什么我们得不到青天白日勋章。他说：“好，我会向蒋先生说。”就这样，不久以后，所有赴宴的将领都得到了青天白日勋章。

我认为这是最珍贵的两枚勋章之一，另一枚是铁十字勋章。青天白日勋章必须由蒋先生特准，所以获颁的军人比较少。当然，蒋先生自己也获颁过。在抗战期间，他经常佩戴青天白日勋章。

第十八章 广州行营

(1946年至1947年)

战后与战时，我同两广党政当局的关系不同。首先，战时我集中精力于军事，对政治的关注仅限于与抗战有关的事务，譬如，我不为县长们的贪污案费心。战事结束后，身为和平时期的两广行政长官，我必须关注贪污案。当某个县长被检举涉嫌贪污时，我必须指示适任的省主席开展调查，还有更多难题困扰着我。其次，战时好多贪污盛行地区处于我的司法管辖权之外。战后则不同，两广全部归我管辖。

我确实关注广东多于广西。广东省政府主席罗卓英是我的老同事，对广西我仍保持以礼相待。

1946年2月1日，中央下令裁撤第二方面军司令部，军委会委员长广州行营改称国民政府主席广州行辕，此举并未牵涉到组织上的变动；只是增设了政治事务部，它与中央、省政府以及社会组织一起处理问题。徐景唐被任命为广州行辕副主任，与邓龙光并列。中央想照顾他，给他点事情做。邓龙光与徐景唐都没有多少事可做。有时我派他们出去巡视。当我去南京时，我挑选其一代理行辕主任职务，通常是邓龙光。

在杜鲁门总统派遣乔治·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冲突^①后，中共要求把曾生的东江纵队与海南岛冯白驹的琼崖纵队调到华北去。马歇尔接受了共方要求，并派一名美国上校来见我。这个美国人要求我停止对共军作战，并允许他们撤往华北。我告诉他：广东根本没有中共的军队，广东只有土匪，故他来广州只是白跑。报纸报道了这一切。中共气坏了，马歇尔也气坏了。

我奉命到重庆，首先见到的是张治中，他说“你是第一位”，然后我见到军令部次长刘斐，他也说我是什么什么。我是仅有的一位敢于否认共军存在的高级将领，其他人都不敢。张治中与刘斐告诉我，由于马歇尔在蒋先生面前指摘我破坏调处，所以他要蒋先生召我来重庆，欲逼我承认广东省存在着共军。

^① 马歇尔于1945年12月22日抵达重庆，成立了以他为首的三人小组，着手讨论停止敌对行动及其相关事务。张群任国民政府代表，周恩来任中共代表。1946年1月10日，三人小组就停止敌对行动达成一项协议。据此，蒋介石与毛泽东各自命令他们的部队停战。协议也规定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以落实协议。实地作业小组由国民党政府、中共与美国派遣同等人数的代表组成，负责实地执行停战命令的条款。

张治中说马歇尔想见我，但我拒绝见他。既然他声称我破坏调停，我为什么还要见他呢？我绝不会违背良心去向那个美国佬“认错”！既然报纸都登出了我的声明，坦白讲，即使我有错，也不会认错。再者，直至那一天，我一直自省我的声明正确无误。

蒋先生要我会晤马歇尔作解释。我说，我没有错，怎可以认错？他说，这话没错。我说，倘若考虑我个人的利益，把共军撤往北方，对我维护地方治安的职责是利好因素，然而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考虑，承认共军的存在——不承认他们是土匪——那是大错特错。蒋先生语重心长对我说：“从内政考虑，经此八年抗战，军队疲劳空虚，官兵精神松懈，士气消沉，纲纪废弛，漠视命令，民众痛苦，经济凋零，社会动荡；在国际上，美国希望中国统一，希望现政府成为强有力的政府，但不希望一党专政。基于上述原因，我们不能不与共产党妥协举行政治协商会议。这个会议可说是一种政策，吾人应当遵守。俟共产党加入政府后，我们的困难自会增加，希望大家忍耐，各在自己的岗位上埋头苦干克服困难。我们不必忧虑，我有信心能控制住局面。”我告诉蒋先生，我相信以广东现有的国军兵力，短期内必可将两股“土匪”肃清。蒋先生仍要我忍耐，并谓应准许中共将曾生的东江纵队北撤，以应付马歇尔，至于冯白驹的琼崖纵队，只是疥癣之疾，可以拒绝让它调走。蒋先生劝我挽回马歇尔的面子，换言之，他也帮我挽回一点面子。当时马歇尔让张治中约我晤谈，欲劝我接受“调处”。但我因反对马歇尔之调处计划有助于中共扩张势力，便断然拒绝了与马歇尔会面。我想，当时正有许多人求见而不可得，像我这样断然拒绝马歇尔约会的人似乎少之又少。

虽然我不在中央，但我每次到首都都有人告诉我，马歇尔视毛泽东为土地改革家。我认为马歇尔被蒙骗了。

我要求蒋先生给我六个团的作战供应“剿灭”冯白驹部，我保证三个月内克敌制胜。蒋先生说：“好！好！”但从未发一兵一卒。

我告诉蒋先生，我们连强敌日本都打败了，殊不必接受美国的压力，他说：“你不懂！”他总以为我欠缺政治觉悟，视我为一个纯粹的军人。他从不与我讨论政治问题。难道1929年我没有拿起武器护党吗？但蒋先生总认为我受了汪精卫的操纵，并非出于我自己的意愿。

我反对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我认为共产党是不可信任的，……谈判解决不了问题。蒋先生召集高级将领解释了前述不得不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原因，与会者中不少人反对召开政协，主张“戡乱”到底。但没人敢于公开表达这一观念。蒋先生召集那次会议不是为了征集我们的意见，而只是宣布他的决策。

在重庆我住在曾养甫的住宅。一天周恩来要求见我，但他来到我的寓所时，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与他同来。他们两人进到客厅后，这个与周恩来同来的人，便气势汹汹地先自拍桌指责我，说曾生纵队及冯白驹纵队明明是中共军队，如何说是土匪？指手画脚，不但毫无礼貌，而且显然意图胁迫我；期望用硬的方法，强迫我接受调处。我见他如此无礼，便立即指斥他：“你不配和我谈话，请

你立刻出去！”

闻悉声音嘈杂，我的随从与曾养甫的随从都急忙从楼上冲下来，他们都有佩枪。周恩来见我发怒，立刻……向我介绍，说那人是中共宣传部长王若飞，并一再向我解释。我当时即对周恩来表示：“对于曾生纵队及冯白驹纵队的调处问题，我坚决拒绝接受，无谈判余地。请你们立即离开。”周恩来建议我们换个话题，王若飞不敢再吭声。我们谈了些别的事情，包括廖承志最近获释的消息。这样，周恩来同王若飞失望地离开了。

当周恩来和王若飞离去不久，叶挺打电话给我，说要来拜访我。叶挺本是我年轻时的同期同学，随后我当师长时，他又是在我手下作过团长。我到达重庆时，他刚从监狱释放出来。我们的私交一向很深，依理我应接见他，但他恢复自由后立即发表声明称他正申请加入共产党，他拥护毛泽东的领导云云。这一声明刊载于重庆多家报纸。我知道，所谓要来拜访我，不过是想来和我谈广东方面调处的一个借口，所以我坚决拒绝了他的拜访。我说，非常抱歉，但为了保持我们的友谊，我们最好不要晤面。他同样保证见面时不谈政治。我说，他可以保证不谈，但一旦扯及政治话题，那就一定会伤害我们的友谊。

叶挺希望他在广州的妻子携带其他四个孩子到重庆与他团聚，他的小女儿一直陪伴着他。在那时，飞机票概由广州行营控制，叶挺的妻子要求行营提供机票。那时我在重庆，我的参谋长甘丽初认为我对叶挺一家实在太好了。然而甘不能完全拒绝她的要求，因为他知道我同叶挺交情不浅。于是他给了叶挺妻子三张机票，她带了两个孩子去了重庆。我回广州后，甘向我报告了此事。不久，叶挺一家偕王若飞乘飞机去延安会见毛泽东。飞机失事，全家遇难。如果我在广州，我一定会给她五张机票，那么叶挺全家就无一孑遗了。当夜，廖承志又打电话来，请我谈话。由于我和廖仲恺先生生前一向很好，承志一贯称呼我为张伯伯，他在电话中说他一定要来看我，要亲自向我致谢，感谢我多年来对其母何香凝的照顾。虽然这位老太太对政府有诸多不满，但战时她并未附“匪”，一直住在自由地区，我一直照顾她，为她安排住房等等。他保证见面时不谈政治。我说，照顾令堂大人本是应有之义，殊不必为此感谢。

我揣测廖承志也一定为曾生冯白驹两个纵队之事而求见，所以，我当即在电话中拒绝与廖承志见面。我说，我们最好不要见面，因为一谈及国共两党的事，我们一定会吵起来，这样会伤害我们的关系。

遵照蒋先生的主意，我让马歇尔派人到广州安排曾生的部众北撤，那个美军上校再度来到广州。中共派来方方、（尹）林平、曾生、王作尧和另一个王姓男子以及一名女性政工干部。方方是共方首席代表，政府方面派出郑介民的部属，即军统局人员来穗。

我从未见过这些中共党员，我在留日同学联谊会宴请他们，还举行了舞会，有乐队伴奏。我没有请那位美国上校到场，我不想招待美国人。我对马歇尔偏帮中共余怒未息。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马歇尔的无知促成了中国大陆迅速“赤化”。

廖承志其他中共人员也来了广州，他要求我派人去香港护送其母来广州看他。我对这一要求感到惊讶，因为他自己可以去香港探母。但我还是满足了他的要求。何香凝来了广州，住在我家。

美国人派了一艘客轮到惠州附近的沙鱼涌接载曾生的部众，我派人监控了整个过程。在曾部登船时，点算总共有 2300 多人（包括老弱），目的地是青岛。

我继续坚持海南岛只有土匪没有共军，中共一筹莫展，周恩来无计可施，马歇尔也无可奈何。他们对曾生部北撤已感到满意。冯白驹不敢靠近广州，因为我从来不承认他的合法地位，我仍打算“剿灭”他。但我无法诉诸行动，因为中央不肯发兵。那时我在海南只有两个保安团。

由李汉冲建议，我派人监视三人小组分遣组设在沙基的电台，我下令秘密干扰它的电讯。中共向我埋怨电台常受骚扰，我说：“不会吧？”

【蒋先生自相矛盾。他一面同中共谈判，一面秘密下令高级军官剿共。换言之，他谈判与“剿共”同时并举，那就是为什么马歇尔对他发怒且责备他不诚实。

我是反对一边谈判一边作战的。蒋先生应该扪心自问，他有没有能力消灭共军，如果答案是能够，他就不必要接受马歇尔的调停；如果答案是不能，他就应该诚心诚意同中共谈判。最初中共所提的要求并不苛刻。我听说他们要求七个省主席席位与四个部长席位，包括内政部，那仍然使政府能控制多数的省份。^①如果政府在掌握多数省份之际犹无法与中共公开竞争，夫复何言！考虑到政治竞争是非常必要的，我认为他们提出的条件可以接受。

然而蒋先生谈判与作战同时进行，他认为这是一种政治策略，故不肯真诚地接受马歇尔的调停，然而又不具备足够的财力自行解决共产党问题，这就是他败走台湾的根本原因，这是咎由自取。如果我们真诚地接受马歇尔的调停而中共拒绝并进攻我们，我相信美国人会在军事上提供援助。结果是和谈破裂后，美国政府宣布断绝一切对华援助并禁售剩余军火予我们，正值敌我战事进入决战之际，因缺乏补给而影响士气，以致国军经常不战而退。我也思忖，马歇尔后来几次上庐山求见蒋先生，蒋故意去奉化避免见马歇尔，此举严重开罪了美国，导致大陆沉沦。】

我认为政府派兵收复东北是正确举措，但是最大的军事失误是迅速解散伪满军队。【这是蒋先生最大的军事失误，也是陈诚最大的军事失误。】“满洲国”成立后，由日本人训练伪满军队长达十几年，这支军队训练、装备、纪律均佳，其实力不可低估。陈诚是个容易冲动的人，他一意孤行，结果我们失去大陆。

胜利后，林彪与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进入东北，他们收容被遣散的伪满军

^① 根据毛泽东在重庆出席重庆会谈的会议纪要，中共要求陕甘宁边区及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山西五省由中共推荐之人员担任省府主席与委员；绥远、河南、江苏、湖北、广东五省由中共推荐之人员担任副主席与委员；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个特别市由中共推荐之人员担任副市长。东北各省得由中共推荐人员参加行政；中共在政协会议上又提出要占据行政院几个部长席位。

人，把它改编成共军。换言之，数十万伪满军人充实了共军。当我看到报纸的消息我就感觉政府已成涸辙之鲋，因为共产党已经接通了联结苏联的国际路线。张学思的出现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毕竟，他的长兄张学良仍在缱绻之中，引人同情。】俄国人理应把日本装备移交给我们，可是它给了中共。虽然政府派杜聿明去东北任保安司令，但为时已晚。

政府犯下的另一个错误是从中原派人去东北担任重要职位而非起用东北耆宿，例如1945年派熊式辉任东北行营主任兼行营政委会主委。他有此才干，但爱摆官僚架子。杜聿明是个小有才干的军人，但心高气傲。

把东北四省立即分割为九省也是一个失误。四省行政应该原封不动保持一段时期，直至局势安定才可变动。可是东北本地人只有少量被安插到重要职位。九个省的负责官员中多数人没有行政经验，原来是军人突然被委任为省政府主席。

【蒋先生与】国民政府第二个重大军事失误是在共产党问题获得解决之前就下令裁军。许多军级单位被裁撤，导致军官们突然失业。问题不仅仅限于给他们吃口饭，此举影响士气。裁减军队与民生息这是对的，可是执行过程太仓促了，这是大多数高级将领的观点。这事又得归咎于陈诚，此人鼓吹裁军最力。【他又十分冲动。】

我在粤北设立了一个编余军官团，这样广东就有了两个编余军官团收容失业军官，其中有些是在广东遣散的，有些是中央调来安置的。^①编余军官团中的一部分人被保送到杭州警校受训成为警官。譬如，一个营级军官可望培训成县警察局局长，其他军官也可以担任科长之类的文职公务员。士兵的安置方法是让他们复员回家。

1946年6月实施军事整编，我们采用了美式编制，把参谋总部置于国防部下面，陈诚出任参谋总长。【但蒋先生把军权交付陈诚，而非国防部长白崇禧。】陈诚明显地权力大过白崇禧，后者只负责军训以及其他庶务，倒是很像他在战时担任的军训部部长职务。我觉得为迁就人事而损害制度是错误的。【蒋先生采用了外国的制度，但却把该制度下某些职务的权力予以修改。倘若陈诚出任国防部长，我相信这个职位就会变成军事系统的最高位。蒋先生派人担任不同的职务犹如在麻将台上换位子，就这几个人轮换着这些职位。】

我去南京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邀我到大使馆午餐，只是粗茶淡饭。我发觉他也相信毛泽东是个土地改革家。应邀的有十多个客人，包括国民党的张治中、李宗仁、何应钦和薛岳以及青年党的要员，没有中共党员。话题集中在军事调停上。

1946年11月和谈破裂，其实和谈早已失控，中共赢得了许多宝贵的时间。我觉得直截了当使用武力消灭他们的时机已经成熟，这是荡平“匪”患的唯一办法。我坚信，倘若每个人都像我这般坚如磐石——我不夸口——虽然中共的势力已经膨胀，但其实力毕竟有限，我们有强大的军力与较佳的装备，如果国民党

^① 据李汉冲1947年呈交的一份意见书，广东一省就有7000多个失业军官，鉴于裁军工作迄未完成，这一数字还要增加。

深谋远虑，中共绝不会成为我们的心腹大患。谈判破裂以后，我们未能击败共军，这是由于军官们缺乏积极进取精神，军纪松弛，各级军官皆然。

我感觉国军过分强调占领战略据点（见张发奎 1947 年 1 月 24 日日记），我认为，共产党到哪儿我们就应该跟着打到哪儿。如果他们退到某地，我们就应该追击，而非集中兵力固守战术据点。在北伐时，我们从未留下部队固守战术据点。再者，我们应该把戍守战术据点的任务交付给地方部队。相比之下，共军从不配置大量部队坚守战术据点，他们打了败仗就撤退，从不恋战。

政府军当时还有足够的兵力去追击广阔战线上分布的共军，我们仍然比共军强大。只是胜利后，政府军的将领趾高气扬，居功自傲，他们小看了共军，他们以为只要服从领袖就万事大吉。蒋先生失去大陆的主要原因是：大多数高级军官告诉他：他们一定能消灭共军，看上去都信心十足，人人都不敢说出相反的观点，于是个个都拍拍胸脯说：“一定成功！”我们中国人忌讳批评死者^①，然而历史批评是难以避免的。我不必点明所有夸下海口的将领，只举胡宗南为例吧！

1947 年 3 月 17 日我去南京。在蒋先生官邸举行的会议上，我听到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说，他手下的部队将迅速收复延安。蒋先生闻言笑容满面，他爱听好消息，听到坏消息则生气。3 月 19 日，胡部的确攻占了延安，胡宗南告捷，蒋先生很高兴，我深受感动。接着刘斐告诉我，共军已经撤离延安，在胡部抵达前甚至连伤员都疏散了。

我一直感到高级将领对蒋先生不说真话，这是最大的危险。翌日，蒋先生邀我共进午餐，我提醒他，下面呈上来的报告不可尽信。我说：“要消灭共军，光听报告是不够的，有些人对您不讲真话。您应该根据军法下达严峻的命令，对打败仗者限期惩处，每一位部队长都要准备为败仗承受后果。”此时实际上所有的前线指挥官——军长与师长——都是黄埔毕业生。这一时期胡宗南无疑是最重要的黄埔领导人，他的部队兵力最强。

1946 年 11 月召开的国民大会，蒋先生遴选了一批军人，我被选为制宪国大代表^②。对制宪国大我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对 1946 年 12 月 25 日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我也没什么特别的看法。

当然，我对政府行宪抱有极大的希望，但我知道实现这些希望是另一回事。对 1947 年 4 月 17 日国民政府与行政院改组、张群出任行政院院长，我感觉政学系是一群渴望做官的人，是一群没有政策的官僚。政府分配政务委员与各部会长名额时给青年党留了 4 席，民社党 2 席，国民党 14 席。我觉得张君勱拒绝出任部长是对的。如果我是党魁，我也会同样拒绝担任政务官。民社党确实比青年党更开明进步，后者接受了政务委员与部长的席位。

我的职位从军委会委员长广州行营主任改为国民政府主席广州行辕主任后，

^① 胡宗南 1962 年病故于台湾，亦即张发奎接受夏莲瑛访问前四年。

^② 由“国大”代表选举总事务所主任委员张厉生签署的当选证书是 1946 年 11 月 2 日签署的。

权力没有变更。

黄旭初担心李济深在苍梧从事不轨行径，他不知应如何处置李，于是打电报问我怎样能把李撵走。

由于已往第四军的渊源，我仍旧尊敬李济深，基于念旧，我对他不存敌意。胜利后首次去重庆时，我建议邀李济深到中央任职。只要蒋先生同意，一切都没问题。蒋先生说：“好，好！”我派李济深的追随者舒宗鑑^①去看望他。舒宗鑑是海军军官，广东人。我要舒转告我的建议，希望李赴重庆。李济深同意了，但他提出条件要求中央拨付接替被调走的谭启秀部前去“保护”他的盐务管理局缉私营之专款。他说，这个营已经几个月没发饷了。我建议蒋先生给李济深一个职位使他能照顾他手下的士兵。

李济深到了广州，住在广州行营招待所。逗留的一星期内，他会见了许多老部下。我们派人以保护的名义跟踪他，当然知晓哪些人上门找他，所以他没有机会搞事。

李济深去了重庆，我要求戴笠派人保护他，在陪都为他找了一处房子。蒋先生给了他一些职务^②——我确信已经成事。

国民政府还都南京（1946年5月5日）后，我去南京公干，李济深请我吃饭，他还担任一些职务，在南京有一所房子。接着，他去了香港，在那儿再度与蔡廷锴一起反对中央，同他们一起的有宋庆龄、何香凝、彭泽民、冯玉祥及陈铭枢。换言之，反蒋的人聚集在一起了。

胜利后蔡去了香港。他派代表去广州索回了被敌伪侵占的他私营的印刷厂设备，还应我邀请访问广州，逗留约一个星期。我要求蒋先生给他一个职务，比照李济深的例子，我想蔡廷锴有点事做便不会制造麻烦了。我劝他去南京谒见蒋先生。蒋先生给他参议之类的有名无实衔头。他回到广州说，蒋先生待他极好。一两天后他就离穗回港。

他们这伙人在广州进行活动的负责人是张文，他是李济深的追随者，陆大毕业生。当军委会桂林办公厅裁撤时，由李济深推荐他到柳州的四战区长官部担任参议。胜利后他离开了。广州还有两兄弟——李明雨与李明欣（1890—1955），李济深的广东陆军讲武堂与陆大同学，都是军人。后者在桂林办公厅当过总参议。李章达也加入了这个反蒋团伙。我知道这些人在密谋，但只要他们并不公开搞事，我就不去惊动他们。一切都在高度保密中进行，他们的总部设在香港。

广州行辕军法执行监吴仲禧、行营秘书长麦朝枢以及黄埔四期的张励都是这

^① 舒宗鑑（1894—1976），广东番禺人，满族，黄埔海军学校第十五期毕业。历任广东海军局民生舰舰长、广东舰队飞鹰舰舰长、舰队副司令等。1933年参加闽变，任福建人民政府军委会处长。1936年升海军少将。1938年任广东西江绥靖公署参谋长。1940年任军委会桂林办公厅第二处处长。1944年3月任军事参议院参议。1949年8月13日在香港通电起义，1954年任政务院参事。

^② 蒋介石原拟任命李济深为国防部长以羁縻两广将领，李拒任与何香凝、蔡廷锴等人在广州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并将民促中央机构迁往香港。

一集团的成员。直至中共席卷大陆我一直不知内情，不知这个集团的人事。(1946年5月4日)广东省政府主席罗卓英下令军警逮捕中山大学教授梅龚彬，他是李济深集团的成员。我相信是省党部要求罗卓英抓人的。我叫罗释放梅。梅龚彬一个平民，一个学者，又患了肺结核症。省党部宣称梅是共产党员，我相信他不是。李济深派人找我关说。梅龚彬囚禁一个月后获释，我叫麦朝枢以广州行辕的汽车接往我的住处，旋即保护梅上船赴香港。

对于越南，我不再负任何官方责任，胡志明还是送了一面绣花旗帜表达他对我大力相助的感激。^①

有关中国军队在越南的表现，越南人告诉我他们军纪松弛。1946年2月在河内建立联合政府一事，是我们一直都希望看到的。

有关张中奉涉及的一件事情^②我全然不知，我没有密切关注越南的事态发展，我的职责不需要我去做那些事。

阮海臣和联合政府其他成员离开了河内。虽然胡志明没有驱赶他们，但他逼得他们不得不出走。我在南京见到他们。他们告诉我，胡志明压迫他们。我指出，他们在柳州时占了优势地位。事实上，他们离开越南只是因为斗不过共产党。我劝他们回去，但他们不听我的。他们在南京抨击胡志明的政府是共产党。此时我们的中央政府最害怕共产主义，由于同中共敌对，我们的中央政府也同外国共产党敌对。

我仍然用许多方法帮助越南人。胡志明派了两个代表到广州来见我。^③他们表示期望中央派一百多个军官帮助他们训练军队。这显示胡志明政府仍然倾向我们的中央政府，你要知道，胡志明通过我接触中央。我想帮助他们，这是一个友好援助的问题，在南京我介绍他们去见陈诚、吴铁城、陈果夫。萧文带他们逐个拜访。我们的中央大员认为，胡志明是共产党，我们不应该援助他。

胡志明的代表回到广州时，我又会见他们。他们购买了通讯器材与医疗用品带回越南，我也送了一批药品给他们。

我去南京述职时，抽空拜访了国民党中央财务委员会主委陈果夫，我希望中央帮助越南人。陈果夫问我是否知道胡志明是共产党员，我说知道。他想知道为什么

① 1946年2月14日，胡志明致函张发奎，称他乘萧文回国的机会，让萧捎给张一面绣花旗帜以及一箱香槟酒以表示他的尊敬与崇拜。希望张访问越南，并继续支援越南革命。同样的感情表达于以下组织各自写给张的信：1946年2月17日由张中奉、黎松山、蒲春律签署的越南革命同盟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河内商会会长阮文英、中越文化协会2月17日由李世全、范甲睿、杨清丈签署，东京福利协会2月17日由陈庆州签署。河内商会的信强调法国帝国主义者压迫越南人民的滔天罪行，并指出中国是唯一帮助越南人民争取自由独立的国家。

② 在1946年12月1日胡志明致张发奎的一封信中，他断言张中奉被阮海臣、武鸿卿等人掳走，称不知道张中奉是否还活着。他说，由于法国统治的祸害，越南北方人民正在挨饿，交趾支那正在战祸之中，再加上阮海臣、武鸿卿等人制造麻烦，所以他们的工作很艰难。他希望张指导他，在何种情况下，他们从事的革命工作会取得成功。他还表示，越南人民期望张访问越南。他送给张发奎一些肉桂与一本英文书，由马维岳转交，以表示对张的崇敬与挚爱。这本书谈及他的行政、外交，也提供了一些法国统治越南的照片。

③ 据杨清文说，1947年秋天，他陪伴河内政府工商部部长阮德臣和王荣来华寻求援助。马维岳也记得阮德臣于1946年、1947年交接的冬天来华寻求援助。

我仍然想帮助他。我说，很简单，他不是中国共产党员，而是外国共产党员，他是印度支那共产党的代表，他在反对帝国主义，而不是反对我们，他在为越南独立而斗争，我们应该帮助他从法国统治下解放他的祖国。陈果夫斥责我左倾。我对这个问题看法不同。我坚持说，问题在于非共的越南人没有能力同共产党竞争。我向他解释：越南人斗不过共产党是因为他们工作不够勤奋。有人告诉我，那批越南人从广西返回越南后，越南人民对共产党的同情多于对其他党派的同情，所以不需要担心援助胡志明会引起什么不良后果，他正在寻求我们的援助。

我说过，有关学潮、集会等事务，由行辕政治部以我的名义配合省政府、省党部去处理。但是我卷入了1947年5月的学生示威，因为他们直接向我请愿与投诉。

导致岭南大学学生罢课的原因，是粤中师管区的一名副官与几名士兵想搭大学的顺风车，司机不肯，副官叫士兵殴打了司机，或许还有几个学生。于是，岭南大学校长李应霖率领学生代表来见我，后者都是一些有影响力人士的儿子，包括李应霖与徐景唐的儿子。他们要求部队道歉并禁闭肇事士兵。我无条件接受了他们的要求。我告诉他们，要向全体学生讲话。如果我能说服他们，他们就得马上复课；如果不能，他们可以继续罢课。代表们同意了。

1947年5月5日，我向岭南大学与岭南中学全体学生发表演说，听众坐满了大礼堂。我讲得很简单，我们接受他们的要求，也希望他们立即复课。学生们接受了我的提议，学潮和平解决了，事情没有政治化。

粤中师管区司令姓温，他不肯禁闭那个副官。我坚持我的命令，那个副官当然十分不安。我把他叫到行辕，我说过几天再回去吧！危机过去后，我放他归队恢复原职。我答应开除士兵们，但我们没有兑现。毕竟祸因不在士兵身上，事情出在副官身上。要蒙蔽学生还是容易的，这是一个策略。



高信

不久，又发生了中山大学学生领导的工人与其他阶层的群众示威。我准许他们游行，但不许他们进入沙面，特地派了士兵守卫桥头。

很快我就收到情报，知悉是共产党分子正在煽动中山大学学生上街。我叫广州特别市党部主委高信来见我。我们讨论了如何处置迫在眉睫的游行示威。我们获悉已订定的游行路线是经过行辕、省政府、市政府转到长堤，然后向沙面前进，到我的官邸呈交请愿信。我建议去取得机器工会领袖的协助，要求他组织一支反制力量。我不能派宪兵，那会让人指控使用暴力镇压。

高信与我一起去拜访机器工会主席，我本来认识他。我问他马上能动员多少会员，他说二百多人。我们告诉他，要运用这些“义士”妨碍学生游行，准备一场打斗，但讲明不可采用不适当的手段，不可搞出人命。

原定游行的1947年5月31日，我的行辕也作好了准备，铁门紧闭着，士兵

架设好机关枪守卫。他们奉命阻止纵火，其他士兵手执水管，一旦游行者逼近就用水炮驱散他们。我自己去沙面，留下值班军官指挥特务团。

游行的八百名中大学生按计划举着旗帜向行辕前进，在呼喊口号呈递请愿信后就离开了，我们不必使用水龙。他们到省政府、市政府如法炮制，然后向长堤进发，一路呼叫口号。这时他们被机器工会的“义士”们堵塞了去路，他们假装挑运水果与其他货物，为了方便识别，每人手腕上缠一块白手帕。学生们见状气极了，于是冲突发生了，造成一些损伤。这时我就下令宪兵维持秩序，两群人都离开了现场。

6月1日，中央下令保安团逮捕中山大学某些教授与学生。6月3日，我召集调解会议，与会者有学生代表、工人代表、学校负责人以及政府官员，这一事件就此和平解决。鉴于中山大学这个国立大学是属于教育部管辖的，我以这次中大学生游行为题向教育部递送了一份调查报告。

共产党在中山大学很活跃，他们同中山大学的三青团支部成员也发生过几次冲突。岭南大学是教会学校，传统上远离政治。这是广州两所最著名的大学。还有两所私立大学：吴载民的国民大学与陈炳权的广州大学。

为了准备行宪，（国民党）中央下令少数党成员已加入国民党者验明身份退党、辞去公职以及退出军队。换言之，国民党不再容忍那些跨党人士。我告诉孙宝刚——我知道他是民社党党员——离开行辕，他是在柳州时进入四战区任高参的，随后他做过夏威夷的参谋长及第二方面军司令部副官处处长。有个姓苏的行辕秘书自报系青年党党员，我也叫他离开了。我吩咐在行辕工作的中共党员，包括左洪涛、何家槐离开。没人承认自己是中共党员，但他们愿意离开。中央没有指示要逮捕他们，^① 仅是公开煽动闹事者被捕。

在试图扑灭鸦片、赌博、走私诸役，我都受挫，基本原因是吏治腐败。

我认为，连保这一制度是不够的。每个甲的成员必须为本甲之内任何成员过错而受罚。只有这么做才能扑灭中共对村庄的渗透。为此，我下令省政府执行连坐罚则，可是我的下属只是在表面上顺从我。

中央要我兼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因为罗卓英政绩欠佳，太多的人抨击他“卖官鬻爵”，如出售县长职位等。另外，他同广州市市长欧阳驹积不相能。譬如，当欧阳驹强烈要求省政府缴付水电费时，弄得省府很不高兴。

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征召我兼任省主席，我表示绝不接受文职任命。虽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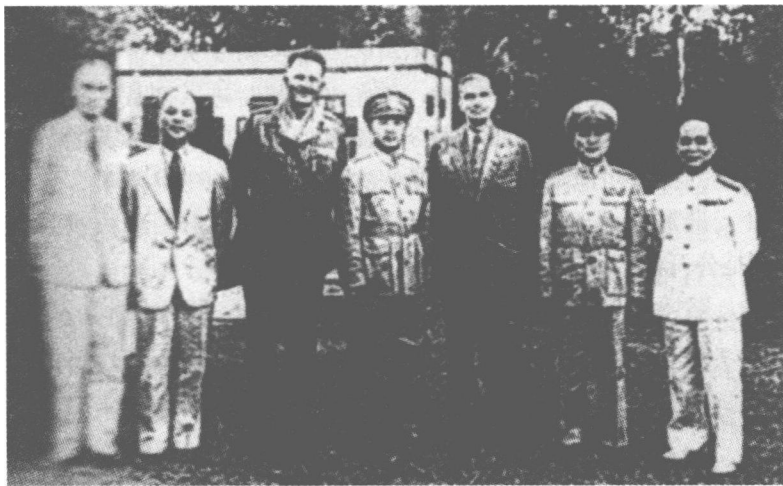
^① 据麦朝枢回忆，在四战区时，张发奎任命李章达为军法执行监，荐王昆仑（1933年加入中共。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政务委员、北京市副市长、第五至六届民革中央主席、第一至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为政治部主任，麦朝枢为副主任，所有以前第九集团军总司令部战地服务队的人员都转任秘书职务，由张直接指挥工作，故意绕开陈诚委派的秘书长丘誉；左洪涛、何家槐分别为张起草演说词和对外发表的文告，同样指定麦朝枢代阅，不送丘誉审核。1946年，广州市党部查禁中共党员张铁生主办的《自由论坛》，蒋介石要国民党中央党部执行党纪惩办李章达、许崇清等五人，另电张发奎将左洪涛、何家槐扣解重庆讯办，张发奎乃将左、何二人资送香港。何是1934年加入中共的。新中国成立后，何家槐任全国文联委员，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

我的不少下属如李汉魂、薛岳、吴奇伟、罗卓英都接受了省主席的任命，但多年来我一直坚持这一态度。

我同领事团的成员有所接触，他们多数住在沙面。杨慕琦从日本战俘营获释后，休养了一段时期又回任香港总督。他来穗拜访我，我也作了回访。1947年5月2日他再次来访，同我道别，为我颁授C. B. E（英帝国司令）勋章。^①其实这类颁授勋衔仪式只要英国驻穗总领事出面就够格了。

1947年1月20日，美国政府颁予我棕榈叶自由荣誉勋章。^②美国人给我大面子，按理，我应该在南京美军中国总部接受这一枚勋章，但弗兰克·法雷尔舰长——我在柳州认识他——要求驻华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团团长巴大维将军授权给他在广州给我授勋。美国人还招待了一顿大餐——有二十多张餐桌——以资庆祝。

在1945年5月战况激烈时，志锐中学从绍兴疏散到清化乡。胜利后，志锐中学迁回广州。起初它使用辅群中学的房产与设备，该校原属李辅群，已被政府接管，此时只剩下五十来个孤儿，他们是无处可奔一群。接着，该校又迁往韶关，改组成省立学校，由省政府承担财政责任，我担任财务委员会主席。由于旧



1947年摄于广州，左起：英国驻穗领事、欧阳驹、菲士丁、张发奎、杨慕琦、罗卓英、陈策。

① 褒奖状称：英军服务团总部设在张将军统率的第四战区两年多，鉴于所有的通向我们前方阵地的交通线都要经过他的战区，也仅仅因为他的同情与持续不断的协助，英军服务团才得以顺利圆满达成一切任务。正由于他自身树立了一个感人的榜样，他的属下军官在战区内同我们通力合作，竭诚援助，致使中英两方的协作臻于完美，使我们毫无损失地顺利撤走服务团总部及其数百名中国雇员，同时在他英明指挥下及时摧毁有关设施，有力地延宕了敌军向桂柳的进逼。

② 褒奖状曰：为了一九四四年九月四日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非常卓越的服务，兹授予张发奎中将金棕榈自由勋章。作为第四战区最高指挥官与中国陆军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将军以其技巧、勇敢以及完全献身高级职守的精神，对我们的共同敌人施展了积极的军事行动。他在整编所属部队、发起成功的反攻、收复南宁机场与南宁市区、把敌军逐出印支——柳州走廊期间，发挥了最佳的领导才干。在日本投降前，第二方面军成功地把敌军赶出中国的西南。该方面军坚如磐石、同舟共济、士气高昂。这一绩效是张发奎中将在中国历史上最危急情势下所发挥的高水准指挥艺术所显现的直接成果，也反映了驻华盟军对他的最高信任。

校舍已被日机炸毁，我们必须另觅校舍。

1947年4月27日，我召集了一个座谈会，到有16位前第四军高级军官，决议由缪培南、朱晖日、邓龙光等27人组织编纂委员会，编印《第四军纪实》，由谢膺白担任主席。李汉魂、陈济棠后来都加入了，后者与张天爵留下一份草稿，让张天爵任编辑，但以后没进展。^①

5月13日蒋先生告诉我，中央正计划设立海南特别行政区，让我主政。他叫我仔细研究有关海南行政、军事机关的所有问题。^②虽然到那时为止我想开发海南的意愿一直未能实现，但我一直在搜集有关海南的资料。自此，我上呈中央开发海南的计划之实施便指日可待了。

我拟订的计划^③规模甚大，海南长官署组织建议案规定：秘书长下设置机要处与编译处，经济规划、行政及建设委员会，总参议处，参议处以及以下各职能局：秘书局、民政管理局、教育局、建设局、社会局、公共安全局以及两个署——人事署与审计署。海南特别行政区长官署要设置一千个职位。我的计划之主要特点是琼崖警备司令部，我希望它直属于国防部，这样就可以负责消灭匪患。警备司令部下设三个警备旅，每旅下辖两个团。其他军事单位还有：摩托化炮兵连、工兵营、通讯营、警卫团、军乐团、运输部队、海南海岸巡防队、宪兵营、海南军需局、海南军医院以及海南防空局（详见《琼崖警备司令部指挥系统之编制建议案》）。我打算暂兼琼崖警备司令，海南文昌籍的韩汉英将担任我的秘书长兼警备副司令。我相信，除非冯白驹的琼崖纵队、土匪、海盗都被消灭，否则海南建设不可能开展。

7月初，我去南京，蒋先生告诉我，韩汉英可以襄助我。任秘书长，还要物色合适的人才出任其他职位。

陈果夫来看我，我也回拜他。他说，要派一些人到海南帮我做事，他叫谷正纲给我一张名单。我当然认识谷正纲，他原来是汪精卫改组派成员，后来又投靠CC系。陈果夫想把CC系分子安插到重要部门——海南的职能局当局长，我拒绝

① 《第四军纪实》编纂委员会由以下27人组成：张发奎、缪培南、朱晖日、邓龙光、吴奇伟、麦朝枢、张弛、谢膺白、吴逸志、华岳高、陈见田、曾天节、潘奋南、李宗岳、吴种石、李大光、林祥、王超、邓定远、马维岳、曾晓峰、陈公侠、凌仲冕、叶菊生、魏鉴贤、陈宗骥、方遐君。常务委员：陈公侠、马维岳、叶菊生。总务组、编撰组、征集组分别由曾晓峰、邓定远、王超负责。1947年5月18日至11月30日在广州怀远文化服务社共集会15次，全部书稿悉已审核完毕，决定先印5000部，部分赠送第四军旧同袍，余交书店发售。此书前有蒋介石于1929年8月15日撰写之“蒋序”以及张发奎于1948年夏月写的“张序”。书末附有编纂委员会之“本书编纂经过”一文，日期署为1948年5月1日。

② 见5月13日蒋介石致张发奎电报。

③ 据原任张发奎第四军政治部主任、行营中将高参的麦朝枢回忆：张发奎知道国共内战不可避免，欲置身事外，遂有开发海南之意念。他自忖与美洲华侨有特殊感情，欲以他个人的名义来号召，成立一家华侨企业公司，集合几百万美元的股本不成问题。海南岛铁矿蕴藏丰富，农林副牧渔都有很好条件，开发了这个世外桃源可以坐观成败。张与麦朝枢、李汉冲等人拟就意见书、计划书及企业公司组织章程、招股章程，交何应钦带回重庆给蒋介石。

了。财政部长俞鸿钧推荐一位粤籍人士给我作为海南财政局局长人选。我在南京同各界人接触，准备去海南赴任。

魏德迈7月23日去南京，我在何应钦设的午宴上见到他。马歇尔对中国的局势感到绝望，美国政府派魏德迈来看看究竟还有没有希望。中央下达指示，各部门都要竭诚接待魏德迈。

我遵照蒋先生的建议，7月29日飞赴台湾，他说，台湾与海南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政治、社会、经济各方面，我都可以将台湾的经验当作海南的样板。我将有关海南未确定的事务交给了韩汉英，蒋先生对我寄予极大的希望。

我由李汉冲陪同，他改任高参，不再任行辕参谋处处长。我要他做高参，他就可以跟着我到处走。他是我的智囊之一，上海的杨德昭也以私人身份加入了我们的旅行，还有一位秘书。

台湾光复后第一任省主席魏道明正在南京述职。我见到了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我耗费大多数时间参观学校、工厂等。我们环岛旅行两星期，受到热烈欢迎。许多人认识我，并赞赏我不把台籍日军战俘当作俘虏处置这一善举。我在台中见到了田中久一的翻译。

台湾有许多客家人，岛上人口大部分是客家人与闽南人。后者控制了岛上的经济，客家人则支配乡村地区。海南不像台湾有那么多的客家人，只有几个县讲客家话，宋子文的父亲原本姓韩。

台湾的气候与海南相似，后者稍热一些，可是地理特征不同。海南的中部地区多山，日本人曾拟订计划修筑环岛铁路与公路；台湾则山区在东南部。

台湾有许多专业人士，特别是医生，每三四条街就有一个医生；海南则专业人士奇缺。我想在台湾招聘专家到海南服务，特别是医生。

我同省政府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提供给我许许多多相关资料，那都是日本人留下的。日本人对海南付出很大关注，他们也计划开发海南。台湾是對我提供



张发奎晚年访台与总统府秘书长郑彦棻合影（左图）；张发奎夫妇慰问金門守军，右一为香港苏浙同乡会会长徐季良（右图）。

海南资料最多的地方。

我想探望张学良，他已从贵州息烽迁到台湾，软禁在新竹县竹东镇。没有蒋先生的批准，就见不到他。我没有获得批准。

在二二八后，魏道明接替陈仪主掌省政。我看他的政绩不坏。我看一切事物都不趋极端，不会说特别好或特别坏。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台湾。^① 岛上日本人留下的教育设施、建设等等给我留下良好的印象。在整个旅途中，我都悬念着海南。

回到广州后，我就准备去海南赴任，期望广州行辕裁撤。我感觉它已经不再需要存在。

我的海南计划在中央遇到障碍，8月5日中央来电指出海南不必设置警备司令部，而只批准设置一个警卫旅，含两个保安团，外加一个团由中央派遣。换言之，只允许我指挥原计划六个团的一半。

我叫韩汉英别再同中央讲价了。我再也不想去海南了，因为中央不允许设立海南警备司令部。我推荐韩汉英去海南暂时代理。鉴于中央允许我在海南行政署下设立一个军事局^②，岂不是要求这个军事局执行警备司令部的职能吗？军事局并不拥有警备司令部那么大的权力，我就只能以海南行政署的名义发布军令，那比起海南行署长官兼警备司令所下的命令，效果要差许多。再者，海南行署隶属于行政院，而有关海南的军事必须通过行政院才能转达国防部。

我不认为中央拒绝我设立海南警备司令部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人不同意警备司令部这一制度^③，我相信中央好几股势力在刁难我。因为我从来不带礼物“孝敬”他们。【像马鸿逵、余汉谋之流到南京去时，确实带了整卡车的礼物孝敬权贵人士。】我从未送过任何权贵哪怕一个斗零（五分钱）的礼物！虽然我的地位并不高，我在国民党与国军的资历却很深，那也是他们不敢忽视我的原因。

许多人劝我别再坚持设置海南警备司令部，包括韩汉英、陈策、郑介民、王俊——他们都是海南籍人士，还有道社的许世英。8月19日行政院院长张群写信给我说，行政院会议已经通过了我的任命，他希望尽快发表。

9月6日，我写信给蒋先生反映我的意见：设立警备司令部消灭海南土匪，是我们开发海南计划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此信由邓龙光亲自送往南京，同样内容的信也交付南京的政军要员。

我委托各色人等帮我劝说蒋先生，才使他最终决定同意设立海南警备司令部并让

① 这是张发奎1966年对夏莲瑛所述。此后，1972年8月，他由苏浙旅港同乡会理事长徐季良陪同赴台，并参观金门防卫。张抵台之日，即为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大陆之时，蒋介石伉俪在士林官邸以茶会招待张，互叙离衷。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张未有人台证，即购票搭机飞赴台北参加祭奠，蒋经国躬亲接待，执礼甚恭，并在天母为其物色居停。从此张发奎经常往返港台之间，也曾入荣民总医院作体格检查。

② 见8月16日韩汉英致张发奎电。

③ 8月19日韩汉英致张发奎电称，魏德迈来华后，提出要改革军事组织，在没有土匪的地区，警备司令部都要裁撤。

我兼任警备司令一职。^① 他们指出，毕竟在台湾已经设立了警备司令部。关于此事，陈诚与薛岳出力最多，他俩当时是蒋先生的私人参谋。中央要我同宋子文商量所有其他的海南事务，此时宋已被任命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宋子文看中这一职位。我已说过，中央一直在考虑派人接替罗卓英，罗已被调去东北协助陈诚，任东北行辕副主任。

1947年9月30日，宋子文抵达广州。按惯例，他应该先住在广东省政府的宾馆东园，但他不肯去，硬是要住入广州行辕的宾馆。看在老朋友的份上，我让他入住了。

宋子文坦率告诉我——我们是老朋友——他想兼任广州行辕主任。我想，他感觉只当省主席成了我的部下很没面子。我说：“好呀！蒋先生已经同意我去海南了”。他说：“海南人民不同意把海南改制为特别行政区。你不能做些别的事吗？”我说：“你为什么要说这些话？”他说：“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就去吧！海南同乡会已经安排欢迎大会，你将会看到他们是否同意海南改制。”我说：“开玩笑！你讲嘢！中央已经批准海南改制。”他说：“中央不会宣布此事！”

宋子文催促我改任广州行辕副主任。我说：“笑话，我犯什么过错要受降级处分！”作为特别行政区，海南是属于中央管辖的，但是广州行辕主任仍然有权处理海南有关绥靖事务，此后我仍然要做他宋子文的下属。所以我说：“我就要去海南了，我以后仍然是你的下属。”为什么我要做他的行营副手呢？宋子文说：“这无所谓。你当副主任，我将让你负责行辕一切事务。几个月后我会把广州行辕归还给你，你还可以接任广东省主席。”我拒绝了这一提议，说：“国家大事不可以这样当儿戏的！”他真是把中华民国当作他的私有财产。

我们谈了几个小时，任何人都别想贿赂我或胁迫我。说几个月后给我当广东省政府主席，真是笑话！显然他不知道，不久前我曾拒绝这职位，他不知道我永远拒绝出任文职。他以为可以随心所欲，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把我当作小孩子，认为我会轻易受骗。他甚至没有常识！他不了解我。

宋子文不希望海南直属于中央，而希望归他管辖。既然他不想让我去海南，蒋先生自然听他的话，改变了让我去海南的主意，不让我去。【我对蒋先生失信之举十分恼怒，至今仍余怒未息。】

蒋先生命令我调查妻子刘景容涉嫌在省港之间从事走私活动。我告诉蒋先生，我不可能调查自己的配偶。我说，他最好派别人去调查此事。^② 他接受我的意见，派别人去查。结果查明我妻子清白无过。

8月中旬，魏德迈将军访问广州，我至飞机场迎接。他住在沙面的美国总领事馆。我估计他要逗留三几天，遂邀他午宴。当然，我同他很熟络。

我送他离穗时，他向我埋怨，军统局的特务阻止他在广州会见两个人。在他抵穗前，美国驻穗总领事馆已准备了一张想会见他的人士名单，由他自己决定会晤谁，然后发出通知。来客代表了不同的集团，也包括共产党。魏德迈说他邀请

^① 见韩汉英9月18日致张发奎电报。

^② 9月6日张发奎致蒋函件由邓龙光呈交。

这两位客人到美国总领事馆，但驻守桥头的便衣警察阻止他们进入。这两人很机智，随即致电总领事报告受阻，并要求总领事派人来护送他们进入沙面。总领事照办了，便衣警察无可奈何，这两个人自然要向魏德迈诋毁政府。

我向魏德迈解释，他应该知道，在中国我无权干涉秘密警察的行动。我甚至不知道在广东有多少秘密警察，也不知道哪些人是秘密警察。他说，这样做十分糟糕。他来此是了调查中国的真实情况，例如官吏的贪污。他说由于政府的反民主特性，形势变得令人绝望。我保持沉默，不能苟同他的见解，然而我也不能否认他的话，所以只笑了笑。可是我得承认，官吏贪污无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11月中，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与众议院开始聆听行政当局给予法国、意大利、奥地利临时援助的提议，共和党领袖动议将援助扩大到包含援华项目。我认为美援只是一剂强药，但不能根治痼疾。我感到蒋先生过分强调美援，其结果是他更屈从于美方的压力。我仍然认为我们能够用武力消灭共军，但必须采取主动。

9月29日，亚历山大·格兰顿爵士到访，我也作了回访。10月初，香港警务处处长麦景陶也到访。

虽然明文规定只有军人才有资格担任行辕主任，但是10月15日，宋子文还是接替我担任广州行辕主任，还兼任广东省政府主席。邓龙光留任行辕副主任。徐景唐调任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原参谋次长黄镇球调任广州行辕副主任兼代省保安司令。

我被调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显示了中国政治的杂乱无章。【宋子文与蒋先生都把一切国家大事当成他们的家事。】

我把所有的行辕文件移交给宋子文。前此，第四军的文件已移交第二方面军，复又移交广州行营，由行营参谋处处长保管所有的文件。

我不让宋子文占用我的沙面官邸，毕竟我是国民政府主席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

对于我在广州行营/行辕的表现，我不敢说广州全体市民都对我印象很好，我仅能说，我虽无显赫功劳，却未曾玩忽职守，绝无作奸犯科。我不能论及我的下属，但我对他们心知肚明；然而我自己两袖清风，脂膏不润，仰不愧天。^①

宋子文委派韩汉英去海南担任专员，还委派骆来添任毗邻香港的广东省宝安县县长，因为骆对香港十分熟谙。

广州行辕主任这个职位很快就改组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因为文官是没有资格担任行辕主任这一军职的。改组后，宋子文就有权管辖两广。绥靖主任与行辕主任的区别不大。

^① 据曾任第四军参谋长、长官部中将高参的谢膺白在政协文史资料上撰文说：“张发奎自从带兵以来，约束自身相当严格。生活相当俭朴，不敢浪费。”

第十九章 内战失利

(1947年11月至1950年)

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是一份高职，国民政府还委派四名属员为我服务。李汉冲原来是行辕高参，湖北籍的余少将担任参谋，一名黄埔毕业的上尉担任副官。第四位是中校衔的秘书。这四位都是我自己挑选的。政府还配备了两名警卫、一辆专用轿车、一个司机以及每月几十加仑汽油。

这个委员会的成员至少要二级上将，但无职位，也不可兼职。虽我被任命为战略顾问，但却无事可问，也从未接到开会通知，我无事可做。

我决定着手撰写抗战回忆记，不然我的随员也会感到厌倦。我让李汉冲负责回忆记的准备工作，职员们从广州行辕借用有关文件，并制作了副本。

1947年11月，我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以前是由军队直接向国民大会提名自己的代表，由于要给青年党与民社党提供席位。这一计划就废止了，必须回原籍参选。

我家乡始兴县的民众选我，我本人不花多少力气去竞选就当选了。县政府颁给我当选证书，证明我出生于清化乡。我能顺利当选始兴县国大代表，原因很简单，首先，这个县只有大约九万人口；其次，始兴出来的人出类拔萃者很少，没有人成为政府高官，所以我成了唯一的候选人。^① 为了表示尊敬，选民们甚至不愿选一位候补代表备用。

我留在广州，虽然蒋先生催促我去南京，我婉拒了，借口我忙于撰写回忆记。直至1948年3月29日国民大会召开前，我才起身赴京。4月19日蒋先生竞逐总统大位，我当然选他。只有两位候选人，虽然居正在国民党内资历很深，但他对党国的贡献是不能同蒋先生相比的。

副总统选举，广东与美洲、南洋华侨代表一致支持孙科。广东代表为何不支持徐傅霖？^② 徐傅霖是我的小同乡——北江地区和平县人，也是客家人。我知道广东省代表对徐傅霖态度欠佳，因为他早年曾反对国民党与中山先生。他是康有

^① 张发奎当选广东始兴县国大代表的证书于1948年3月由广东省选举事务所主任宋子文及其他四人签署。

^② 副总统候选人有六位：于右任、李宗仁、程潜、孙科是国民党党员，徐傅霖是民社党领袖，莫德惠是无党派。

为梁启超的支持者，曾在北洋政府任职。^①除了民社党成员，不会有很多人投他的票。

在一次广东代表的集会上，有人提出：谁不选孙科谁就是混蛋，所以大家都举手支持孙科。那时形势对孙不利，李宗仁的实力很强。

孙科竞选副总统是蒋先生推荐的，李宗仁报名竞选前请示过蒋先生，因蒋是党的总裁，蒋先生为他开了绿灯，但又不希望李当选，便吩咐孙科加入角逐。孙科对薛岳、吴铁城、马超俊、我以及其他广东民意领袖说：“蒋先生要我竞选副总统，怎么办？”我们当然回答：“好呀，我们支持你！”

据说蒋先生也鼓励于右任、程潜角逐副总统，甚至还怂恿莫德惠参选。【蒋先生担心李宗仁会当选。】桂系的势力已经从中越边境的镇南关延伸到山海关。黄旭初仍任广西省政府主席，白崇禧在中央任国防部长，李宗仁任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主任。我们支持孙科，他是广东同乡、赞成他的政见和他是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三种因素都有。再者，我们认为他是理想的副总统，因为他是国父中山先生的儿子，在国民党内有辉煌的历史。

我们开会制订竞选策略。我们掌握了约二百票，那显然是不够的，必须从其他省份的代表中争夺选票。薛岳与我确实为孙科竞选雪中送炭，薛岳每天设宴拉票，所有的餐馆，午餐晚餐都被预订一空。我们每天饮宴，不必惠钞，一切费用由竞选基金支付，该基金主要由海外华侨募集。我自己没有设宴，只是出席别人邀约的宴席。我要做的事就是发电报给旧金山富有的华侨陈披荆，他捐赠了十万港元。此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出力气。

我们同CC系在助选方面是有所合作的，细节我记不起了。

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试图在4月23日的第一次投票中争取我的选票。她知道我同李宗仁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许多年前，也知道我困居广西时同李宗仁的关系。我们已经知道李宗仁会当选，我告诉她：“很抱歉，广东与华侨代表一致投孙科的票。”

既然采用秘密投票，我怎能确认广东与华侨代表的票都是投给孙科的呢？毫无疑问，这是良心问题。我们广东人最讲究良心。如果他们不愿投孙科的票，他们会公开表示。广东代表几乎是清一色投孙科的票。至于华侨代表，他们甚至不认识非粤籍的候选人。

有一份小型的《救国日报》免费派送给每一位国大代表，那天早上我们每人收到一份。其发行人龚德柏是李宗仁的人马。该报指责1917年孙科任广州市长时，在沙面用色情影片款待外国领事团成员。龚的绰号叫“龚大炮”，他随心所欲，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毫不顾虑文章的后果。

我们勃然大怒。大会休息时，薛岳宣布广东代表与华侨代表在休息室举行

^① 此系指孙中山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时，徐傅霖竭力反对在誓约上押指印，且徐与冯国璋、黎元洪等北洋要人私交甚笃。

会议。我们都上楼去，每人手执一份《救国日报》。我们决定去质问龚德柏。薛岳找了两辆公共汽车，都由宪兵保护。作为国民政府参军长，他有调动交通工具的便利。我们说：“谁不敢去就是衰仔！”广东人最怕被人叫“衰仔”。海军上将陈策拄了一根拐杖也跟着去了。当我们上车时，马超俊夫人拦住去路，试图叫我们下车。薛岳咒骂她：“你不是广东人！”随即推开她。马夫人是个胖子，她站不稳向后倒下，幸亏我正在旁边把她扶住了。不知不觉中，薛岳成了我们的领袖。

我们中间身强力壮者闯进报社大喊：“龚德柏在吗？”他们不称呼“龚先生”。答复传来：“你们想干什么？”四五个人冲进去，我们跟着进入。双方吵起来，又打了起来。有差不多上百人进入了报社，对方有十多人，薛岳挥舞着陈策的拐杖对准了对方某人的脑袋——陈策没有离开公共汽车，他有一条腿是假肢。恐怕薛岳打伤此人，我企图挡住这一击。拐杖打中那人的耳朵，他的血溅到我身上。那就是报纸报道我被打伤的原因。双方都有受伤的。我们到楼上搜寻龚德柏，但不见踪迹。如果龚德柏在场，他一定会被打死。^①

薛岳叫宪兵去传唤警察到场负责。我们当然说是他们先动手。这个问题不需要调查。孙科受到侮辱，我们被激怒了。孙科是我们广东人的领袖，怎么可以捏造这样下流的谣言！可以想象我们当时是如何的义愤填膺。双方都提出了控告。在该案开庭前，我们离京去了广州。

直至今日，如果龚德柏去美国，他也不会受欢迎，那儿有华侨国大代表同他算账。要知道，袁世凯御用的进步党党魁汤化龙是在加拿大维多利亚中华会馆被一名华侨洗衣工人刺毙的，因为他反对孙中山；陈炯明手下的师长、炮轰孙中山总统府的祸首洪兆麟是在轮船餐厅被一位侍者枪杀的，因他帮助陈炯明背叛孙中山。海外华侨对孙中山是那么的忠心耿耿，他们还集资在上海买了一所住宅送给孙中山。

在4月24日第二次投票前，郭德洁对我说：“这一次你应该把票投给德邻（李宗仁的字号）了！”我答道：“我还是不能。”但是，到4月29日第四轮投票后李宗仁当选了，我立刻前去向他致贺。郭德洁看上去面有愠色，她很小肚鸡肠。

孙科的落选是由于一开始蒋先生就没有明确指出他选择谁当他的副手，他本应向国民党的同志作出具体的指示。在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部指明他们各自的候选人。作为总裁，蒋先生能够也应该指明谁是国民党副总统的候选人。倘若蒋先生这样做了，李宗仁一定选不上。我作这样的评论并非出于对陈立夫辅选失利

^① 据张发奎旧部刘汝曾回忆，张发奎常在新街口的龙门酒家饮茶。捣毁救国日报那天，他一早就到该酒家召集一群广东同乡，包括龙门酒家的广东员工在内——乘坐两部大卡车浩浩荡荡直驶白下路该报馆，一声吆喝，棍棒齐飞，把报馆打得稀烂。宪兵到场时，张大声喝道：“你们不要动，我是张发奎，这里的一切责任由我一人承担。”声落手起，仍然叫打。这位宪兵队长登时给张将军的气势吓住了，呆若木鸡，一时不知所措！之后，这宗事件没有下文，就此不了了之。

的同情，我认为陈立夫是很公道的。在同我们私下聊天时，他提到蒋先生此一重大失误。我们都为孙科落选而感到沮丧，好像在战场上打了败仗。随后选举立法院院长。我没有帮孙科竞选，因为我在立法委员中人脉不够，帮不了他。

5月20日举行正副总统的就职典礼，我们问李宗仁是否需要定做正式的中式文官礼服，他答道，不必要了，因为他问过蒋先生，蒋声称可以穿他自己的军服。可是蒋先生自己改穿中式长袍马褂，李宗仁却全副军人装束跟随蒋先生入场，看上去活像蒋先生的马弁。蒋先生确实不应该使李宗仁陷于如此这般尴尬境地。



蒋介石（中）与
李宗仁（右）在
正副总统就职典
礼上。

出席总统就职典礼后，我去上海安家，不想再回广州去了。我想确认，不再有谣谚说我想给宋子文找麻烦。我到上海才几天，薛岳就打电话给我，说蒋先生要我速去南京，他建议我乘飞机去。我说我会搭火车，有什么着急的！

蒋先生想任命我为长沙绥靖公署主任，接替调任湖南省主席的程潜。我拒绝了这一任命，我感到不能胜任此职。我知道军队内部情况复杂，要想统合当地驻军相当困难。我感到局势已无望，政府军士气低落，我们已无法消灭共军。

我拒绝去汉口，使蒋先生对我印象变坏。他拍桌子道：“你是不是党员？”我说：“是。”他问：“我是总裁吗？”我答：“是。”他说：“既然总裁要你去，你就得去！”我问：“下属可以向上司表达意见吗？”他说：“可以。”我说：“有关这一任命，我希望总裁知道，你是希望我挑二百斤重的担子。我挑不动，我只能挑五十斤，所以请派给我一个五十斤重的担子。”他问：“哪个职位是五十斤重？”我说了我能挑起衢州绥靖公署的担子。原任衢州绥署主任的余汉谋已经被宣布接任陆军总司令一职。我知道蒋先生想让汤恩伯接任衢州绥署主任，但尚未宣布。蒋先生问我为什么看中这一职位。我说，当年我任闽赣浙皖边区总司令时，司令部就设在衢州。我熟悉那个地方，同浙江的民众相处融洽。他说：“你

这是抗命，我要你去华中！”我说：“我确实不能去。”他说：“你违抗我的命令！”拂袖而去。那天他脾气很暴躁。国军在陇海线受挫，我们的谈话被电话打断。我听到蒋先生下令空军轰炸敌军。

我回到上海，完成了《抗日战争回忆记》。李汉冲要求我向福建省政府主席李良荣推荐，给他找一份肥缺。这是陈望汲的主意，李汉冲是福建长大的，陈是福建人，是李汉冲的老师，也是李良荣的老师。他也向李推荐李汉冲，后来李汉冲当上了福建省闽西行政督察专员。

我想躲避蒋先生，故不想待在南京，怕蒋先生再来找我，势必引起尴尬局面。我决定偕妻子刘景容去华北与东北旅行，我想看一看东北的现状，那儿我从未去过。吴奇伟夫妇与我们同行。

吴奇伟原任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的副手，行辕裁撤后他无事可做。没有官做，他自然不高兴。他给我看一封儿子从杭州空军幼校写来的信，儿子说：“爸爸，当你瞑目伸腿时，你还能做什么？你快60岁了。虽然我家并不富裕，但也有房有地。你应该安享暮年。”我看了很感动。

1948年7月初，我们飞抵北平。我拜访了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接着飞去沈阳，拜访了东北行辕主任兼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我也见到周福成（第八兵团司令官兼五十三军军长）与罗友伦（第六军军长）。我们在沈阳逗留约一周。作为一个军人，我的兴趣专注于军事范围。鉴于我是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事实上我属于老一代的军人而当时在沈阳的国军将官属于年轻一代，所以部队长与高级将领都让我参观他们的防御工事。我们乘火车旅行，参观了沈阳附近的一些工厂。长春被共军包围了，我去不成，连飞机也不能降落，那儿没有直升机。

从沈阳飞赴锦州，逗留约一周，也参观防御工事等。我们住在范汉杰家里。范是广东大埔县的客家人，曾在陈铭枢的第一旅当过参谋长。我原来就认识他。黄埔军校刚成立时，陈铭枢推荐范入校，毕业后出任第十师副师长，后来在十九路军当副参谋长。

范汉杰陪我们坐火车去山海关，转赴秦皇岛，何世礼原先在那儿担任辽宁葫芦岛及河北秦皇岛之秦葫港口司令；1946年底擢升联勤副总司令后，仍兼冀热辽边区剿匪副总司令，负责辽西走廊至北戴河之防务。我们在那儿逗留两三期，然后由范汉杰与何世礼陪我们坐火车去唐山。在唐山过了一夜，见到第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他正担任津唐地区守备任务，该军前身是粤军第一五一、第一五二师。我们赴天津时，与范何二人道别。

我发现防御工事做得不错，但士气之沮丧使我吃惊。虽然局势十分紧张，但我们的将官们仍然醉生梦死。我们的阵地完全是防御性质的。国军占领沈阳、长春等地后，我们只能控制大城市，抱住不放，却无法渗透共军控制的郊外地区。我们的部队完全依靠空运补给。我们到处居于守势，共军却可以处处采取攻势。当时我们只有采取攻势才有希望取胜，但处于守势便无人能发动攻势。唯一可行

的是尽可能坚守下去。在郑洞国指挥下，自1946年5月起，国军一直占据着长春，但他们无法配合友军联合作战以溃围而出。

至少，国军应该扫清沈阳—锦州的铁路线。我并不知道，顺应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大维将军的建议，国军已拟订了1948年5月起清扫沈锦走廊的计划，但卫立煌不肯执行。^①

在东北，我会见了省政府主席们以及省府委员们。东北的政治形势比军事形势更差。同将官们一样，政府官员也都醉生梦死。我注意到，我们面临危急存亡的时刻。在赴东北之前我一直持悲观态度，亲眼目睹东北形势后，我变得更加悲观失望，但我不觉得将官们与高官们有同样感觉。既然国军到处都采取守势，我还有什么话可说？没有人能够力挽狂澜于既倒，我们迟早会输个精光，这只是个时间问题。那时难以估计国军还能戍守东北多久，这要看共军何时发动总攻。

我在天津滞留三四天后回到北平，住了约一星期。傅作义邀我午宴，他像战前我在山西见他那时一样，反共意志极为坚决。他似乎非常乐观，表示有信心控制局势，对共军表示藐视。

傅作义对中央的后勤工作表示不满。有几个中央嫡系部队归他指挥，但却直接从中央接受补给，他甚至不知道他们得到些什么。无论如何，中央嫡系部队的装备比他的部队精良得多。

傅作义说，美国人建议直接给他补给，他已经同意了。装备运给蒋先生并不必然意味着他能得到一些，中央在分配军品方面是不公平的。此外，倘若美国人直接补给给他属下的部队，就可省下十分宝贵的转运时间。然而，他告诉我，最高当局不同意，坚持一切美援物品都必须通过中央发放。他没有告诉我哪一位美国人提出此建议。^②

我们从北平飞回上海。1948年8月19日实施物价与工资管制以及发行金圆券等，我不认为这些措施会卓有成效。通货膨胀已经引起了经济混乱。财金改革只是以金圆券取代了法币。我不认为蒋经国到上海实施限价措施会成功，因为这触犯了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

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修筑了广阔的防御工事。我去杭州旅行，见到沪杭

^① 时隔37年，卫立煌的机要秘书赵荣声才著书泄露：卫立煌早在1938年就秘密加入中共。1948年他用密电码透过远在巴黎的甥婿汪德昭同中共联络。四平失守后，他拒绝国防部打通沈阳向外交通线的计划，拒绝出兵解锦州之围，以致东北全局糜烂，国民党军队丧师30万。新中国成立后，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② 1948年7月，西太平洋美国海军司令奥斯卡·贝奇上将提出一张估计价值1600万美元的物资清单，这些物资都是傅作义急需的，美方建议优先运送给华北“剿总”。几天之内，美国三军参谋长同意尽可能提供这批军品。1948年8月30日，司徒雷登、巴大维与何应钦同意这批特别赠送的军品中30%由美方直接运去华北傅作义部，10%运去青岛作防卫山东之用。10月4日，中国政府根据以上共识，按比例指定各该军品的目的地让美方运输机送达。其中有价值200多万美元的军品于10月16日运抵天津。但是，据傅作义堂弟傅作信回忆，这批美制军火运达天津后，经后勤部门拆开一看，箱子内的枪械都缺乏零件，不堪使用。此事使傅作义灰心丧气。

之间正在修筑大规模的防御工事。

1948年9月23日，济南失守。10月15日锦州陷落，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被俘；10月20日长春沦陷，另一位副总司令郑洞国投降；11月1日沈阳易手前，卫立煌抢先登机逃回北平。在东北旅行时我感到悲观，我没有料到败得那么快，没有意识到士气一触即溃，也没想到大城市失守犹如多米诺骨牌效应。

几年后在香港，我问卫立煌有关沈阳撤退的往事。他声称，蒋先生到最后关头才告诉他可以离开，他熬到最后一天才走，混乱的情况难以言状，有些高级军官携眷同行。每个人都在飞机上争位子。当然，造成飞机不能起飞。最后机长宣布机件发生故障。于是卫立煌一行在机场度过长夜，翌日才飞离沈阳。他一到北平就被扣押，解往南京候审。

徐州局势也急速恶化。徐蚌战场危急时，蒋先生想把桂系部队从武汉地区调到前线增援，虽然武汉没有险情，但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拒绝了。【他拒绝调兵当然是错误的。既然他是奉命调走武汉周围的部队，一旦武汉因而失守，他不必负任何责任。】

投入徐蚌战场的大多数部队是由蒋先生的黄埔子弟指挥的。但是蒋先生忘了在西北还有另一支由胡宗南率领的黄埔部队，那是蒋先生最精锐的部队，有着最佳的装备。

此时，林彪率部离开东北入关，进逼北平。鉴于局势紧张，我感到留在上海不智，乃返回广州，那是1948年12月的事了。由于顾忌宋子文，至此我一直不愿回穗。

我回到担任广州行营主任时入住的官邸，毕竟我是总统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回穗次日，宋子文邀我出席午宴。他告诉我，他已决定辞去广州绥署主任与广东省政府主席职务，希望蒋先生派我去海南——现在可以改制为特别行政区了。我告诉他：“抱歉得很，不用了，简直开玩笑！现在我不要这个位置你却要我去做。政府的职位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就可以安排的！”他也告诉我，他要蒋先生委任余汉谋任广州绥署主任、薛岳任广东省政府主席。

宋子文派他的秘书长邹琳^①来同我商量去海南的事，我以同样的话回答邹琳。

【白崇禧不仅拒绝调兵增援徐蚌前线，他还想逼迫蒋先生把权力移交给李宗仁，其心迹可见于12月24日的“亥敬电”——逼宫电报。他当然不承认自己向蒋施压。】

容光明陪同美国驻穗总领事来看我，以前我未见过此人。他一开口就说：“为什么你不要求蒋介石到中山陵切腹自杀？”我也同他说笑：“你去要求他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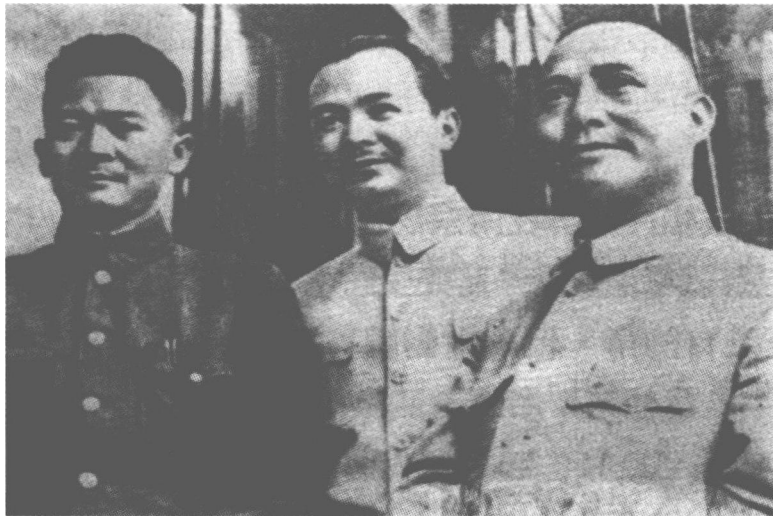
^① 邹琳（1888—1984），广东大埔人，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历任四川屏山县知事、广东军政府司法部司长、国民政府财政部秘书长、财政部政务次长、国防最高会议委员、广东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四战区经济委员会主委等职。1947年11月至1949年2月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1984年在香港逝世。著有《粤碁纪实》。

他说，如果今后李宗仁出头，美国政府会支持他。^① 他说这些话只是代表个人意见——当然，外国人斟酌字句是谨慎的。如果李宗仁愿意出头，我当然愿意帮助他，因为他作风民主，许多人都有这一看法。

我去看望当时任驻德军事代表团团长的黄琪翔。蒋先生叫他回国写一份报告，然后又叫他回德国去。他已经拿到飞机票，正准备把行李托付海运。蒋先生突然命令他留下来改任战略顾问。他对我一声不吭就失踪了，后来才知他去了香港，加入了李济深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那伙人信任他，因为他一向左倾。我相信，如果蒋先生让他回德国，他绝不会出走投共的。

此时北平已被包围，1949年1月15日，天津失守。国军在徐蚌战场全军覆没。共军趁胜挺进到长江北岸。

1月20日，蒋先生宣布任命我为海南特别区行政长官、薛岳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余汉谋为广州绥署主任、朱绍良为福州绥署主任。



张发奎（左一）与黄琪翔（左二）、吴奇伟。

你看，现在他同意让我去海南了，可我再也不愿意去那儿了，李宗仁与陈诚尽了最大的努力劝我去上任，指出党国正陷于危险境地。我告诉他们，我有我自己的价值判断，毕竟这个国家不能光凭个人的兴致来治理。

1949年1月21日，蒋先生宣布暂行引退，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如果我是李宗仁，我不会贸然接受这个代总统职位，我会直截了当告诉蒋先生，他必

^① 据香雅格在香港告诉张发奎与刘震寰：马歇尔在南京时，李济深写信给他说：“你们美国现在支持蒋先生反共，我相信用蒋先生的办法去反共，共产党是越反越多。”当时我们想，也许是蒋委员长个性太强，不愿叫美国人过问中国的事。等到魏德迈将军来华向蒋委员长建议由美国代替中国接管东北，俟东北局势稳定后再交还中国。结果，遭蒋的拒绝。随后，东北终于全部沦入共产党手中。至此我们才发觉蒋委员长对于共产党问题，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来。于是，司徒雷登向美国政府提议：在中国找出另外一个人来，用团结国内人士的办法，来共同应付共产党侵蚀。这就是蒋下野，由李宗仁代总统职的经过。这一切表明，蒋介石下野，不单是由于白崇禧逼宫，最要命的是司徒雷登的“泰山压顶”。

须移交权力。为了党国的利益，既然蒋先生要李代理总统，他应该让人家有职有权——权力与责任是不能分开的，但李宗仁适得其反。

蒋先生筹划播迁台湾已久。1948年12月29日他就任命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他早已开始把战略物资运往台湾，这是人所共知的事。

1月22日，李宗仁表示愿意与中共重新开始谈判。和谈是他的新猷。他以为中共会体谅他，不会相逼太甚；他以为他能坐下来同中共谈和——他太天真了！他过分轻信中共的“离间计”：中共曾公开宣称，若李宗仁掌权，中共愿同他谈判^①，但绝不同蒋先生谈判。

我一向不反对和谈，基本上没什么可以谈的。当我们比对方强时，才可以谈判；双方势均力敌时就没法谈判；敌强我弱时，还有什么可谈的？

我不认为长江天险守得住，因为我们内部太复杂了——我知道蒋先生是不会交出权力的。也因为民心士气的沦丧。

我认为和谈无疑投降，唯一出路是战斗，有道是“不成功便成仁”。我没有将这一观点告诉李宗仁，当时我不在政府。李宗仁代理总统职位后，他走的是亲美路线，甘介侯想当驻美大使，他自以为有办法解套。甘介侯是李宗仁的外交智囊^②。李宗仁的外交常识完全仰赖他。这两人的关系始自北伐时期，我初见甘时，他还是一个青年人（张发奎比甘介侯大一岁）。

傅作义突然转向，与叶剑英开始谈判，天津落入中共手中。中央已无力给傅作义部增援人员与物资。他见到局势无望，便认定唯一出路是投降。1949年1月杪，共军进入北平。

我听说傅作义的女儿是中共地下党员。我不知道她对父亲有没有影响，抑或有多大影响。然而，我相信，如果蒋先生给他大量美制武器或者美国人积极支持他，他是不会投降的。如果美国海军陆战队不撤出青岛，他不会投降的。我认为，美方撤走海军陆战队是不智的。美国人应该帮助傅作义。虽说美国海军陆战队只有一支小部队，但他们可以增援的。他们不仅不该撤出青岛，而且应该派陆军来华。我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军事干涉中国内战，援助傅作义就意味着援助国民政府，傅是反共的。

我听说卫立煌从南京到了广州，住在爱群大厦，受到良好待遇，但受到宪兵

^① 从历史上看，李宗仁同中共早有联系。据刘仲容回忆，1936年11月李宗仁、白崇禧接张、杨电报，要求速派代表一人到西安有要事相商，刘遂于西安事变前五日到达。事变发生后，刘以广西代表身份在西安公开活动。中央军进驻西安后，刘仲容秘密赴延安会见了毛泽东，并答应秘密接待中共代表团赴广西见李、白。此后，张云逸到广西，受到李、白秘密接待。抗战爆发后，刘仲容代表李、白长驻延安年余。1939年调离延安时，毛泽东亲函介绍刘给在武汉的周恩来，为中共军委会情报科做地下工作。刘仲容在白崇禧身边14年，官至国防部参议，1949年3月28日奉李、白派遣秘密北上向毛泽东乞和，向毛周汇报长达七小时。此人两次北上，来去安全，均系李宗仁向毛泽东担保。

^② 据曾任粤桂联军总司令的刘震寰回忆，1949年冬，岭南大学校长、美国人香雅格受美国国务院的委托，到香港会晤刘震寰与张发奎：“想不到李宗仁上台之后，使我们更加失望！李的野心比蒋更大，但他比蒋更没有办法！尤其是李的代言人甘介侯，曾经跑到司徒雷登大使那里，向他威胁着说：‘如果美国不帮助中国，我们准备和苏联联络。’司徒雷登认为简直是岂有之理！”

监护。我去爱群酒店看望他，发觉他已去了香港。

李宗仁哄我帮他忙。我告诉他，已经没什么事值得我去做了。他想让我出任行政院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因海外华侨对我有极佳的印象。我婉拒了。为什么？我感到，此一闲职无所作为，也于大局无补。

李宗仁问我愿意做哪个职位，我答，最好让我做陆军总司令。留任此职的是余汉谋，他于1948年1月就任，1949年1月奉命出任广州绥署主任，至此无人接替他的原职。我同意任此职，但以三个月为限。我觉得，做陆军总司令才能所作为，因为我名闻于军界，不仅在两广，而且在其他省份的军人中部享有盛誉。在淞沪会战中，有八十个师——其中许多是黄埔军人率领——的部队先后由我指挥过。其次，我可以助一臂之力，因为我是广东人，又长期同广东将领共事，我对广东党政领袖血脉相通，亲密无间。李宗仁重视这一事实——我是粤人，能协助他笼络广东将领，原本在两广之间是存在着隔阂的。薛岳、余汉谋都是粤人，倘若发生分歧意见，我能够从中协调与斡旋。

李宗仁当然知道薛岳与我从小就是好友，桂系最怕薛岳不肯合作，薛是个很倔强的人，当他发怒时，除了我，没人能同他沟通。

【薛岳的轻率鲁莽可由一件事上得到充分证明：他就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后不久，在会见美国合众社记者时宣布他的“三反原则”——反蒋、反桂系、反共。在合众社服务的吴福昆为薛岳作翻译。合众社的洋人记者听了十分惊愕。虽然蒋先生离开了政治舞台，但他仍拥有显赫权力，所以薛岳反蒋并不令我们感到惊奇，然而他怎么可以说要推翻代总统（反桂系）呢！？该洋人深怕出错，乃向薛岳核实。薛岳说，你没听错。翌日，这篇报道登在所有的报纸上。】

【当我看到报上登出的这篇访问记时，感到震惊。我怎样解读薛岳说此话的动机呢？他既糊涂又固执，他攻击李宗仁，因为他被桂系人士惹恼了。我告诉薛，他必须立刻否认那句话，鉴于我和他悠久深厚的友谊，我是唯一能保住他省主席官位的人。不仅我与他个人交情很深，我们两个家庭都关系亲密。我告诫他时，他一直保持沉默。】薛岳听从我的劝谕，否认了前述讲话。我们对吴福昆解释，薛岳太鲁莽了，我们说服合众社记者莫再追踪此事。

【李宗仁没有为此惩戒薛岳，李对此宽宏大量，只是“置之一笑”，没有小题大做。我不知道薛岳现在脾气如何，但那时他确实太鲁莽。这一事件说明了李宗仁一伙为什么那样切盼我出山。】我感到我能在广东、广西之间搭建桥梁为李宗仁做些事。

那段时期我虽不能算是余汉谋的亲密朋友，但战时他毕竟任过我的副手。我曾经难于同他相处，但战后情势不同了，我同他之间不再存在利益冲突，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李宗仁感到，如果出了什么问题，由我去同余汉谋倾谈比他或白崇禧出面要容易，反之亦然。

我为什么只答应做几个月陆军总司令？如果我能够调和鼎鼐，便能顺利做三个月；如果不能做到，那就是尸位素餐、滥竽充数了。

1949年2月12日，李宗仁与行政院院长孙科签署了陆军总司令的任命状。我同余汉谋一起去粤北韶关办了移交手续，陆军总部已从南京移到韶关，在那儿住了几天，同总部所有人员作了个别谈话。林柏森^①是副总司令。汤尧任参谋长，他是陆大毕业生，不是广东人。我保持了原班人马，唯一例外是兵站总监换了何民任，他原任四战区与广州行营兵站总监。



林柏森

陆军总部是由宪兵警卫的。我不喜欢他们，遂调动广州绥署特务团北上执勤，该团团长名叫黄志仁，原本隶属于广州行辕。这一调动不成问题，因为余汉谋已把衢州绥署的特务团调到广州。我把陆军总部从韶关迁到广州，占用学校的校舍。

参谋总长顾祝同给了我两亿金圆券，这是作为周转基金，可供我自行处置。譬如总部人员薪饷如被拖欠，我就可以从基金中拨款发饷。我告诉他，鉴于金圆券不断贬值，我要把它兑换成港币以便保值。他同意了。我记得这笔钱约合港币四万元。

那时的陆军总司令有多大权力？我负责军事行政，包括人事、训练等，并不负责作战——那是归参谋总长管的。当我接任陆军总司令时，这个职位是空的。我不知道陆军部队的调动，也不知道部队的驻地。共军在徐蚌战场给予我们沉重打击，部队经常在调动，蒋先生不通知何应钦的国防部，直接向部队下达命令。我们不晓得胡宗南部的精确位置，也不知道该部有否与共军作战。当胡宗南部队列入会议议题时，无人知悉该部的最新动态，即使顾祝同也不清楚。胡宗南简直不理睬陆总。

对我来说，想在训练方面有所作为是更不可能。我不知道需要训练的部队在哪里。大多数新成立的部队容纳了大量新兵。既然不知道待训练部队在哪里，我又怎能关注其人事配置？只有参谋总部通知下来，我们才登录人事更替。陆总并不负责供应与发饷，那是联动总部的责任。

在中国，实力是最重要的。李宗仁只有两广的部队，主要是白崇禧在华中统率的桂系部队以及余汉谋统率的广东部队，例如在广东的六十四军。

作为广东省主席，薛岳只肯与白崇禧一致行动，这还是我居中斡旋的结果。随着共军的逼近，谁也不能置身事外。我能做的只是协助解决各派系的分歧，而非练兵与整军。我在广州耗费大部分时间用于修补关系。副总司令林柏森留在韶关，他在顾祝同、余汉谋主掌陆总时都担任副手。我不能努力求得顾祝同与我们

^① 林柏森（1897—1960），广东镇平人，保定九期工兵科及日本炮兵学校毕业，曾任营长、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工兵主任、陆军工兵学校校长。1935年4月授少将衔，1936年10月晋升中将，1938年2月任军训部工兵监。抗战期间多次参加工兵作战。1946年6月任陆军总部中将参谋长兼后勤总司令部工兵署署长。同年以军队代表出席“制宪国大”。1949年任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总统”战略顾问。

合作，他绝对服从蒋先生。人人都知道他只效忠于蒋先生一人。【总之，蒋先生下野后，他的侍从室仍保留着，成为一个袖珍的政府，他还掌控着军、政、党、经大权。我当了陆军总司令才知道这些秘辛。】

由于我自己拒绝去海南，我向李宗仁推荐李汉魂去，他也同意出任此职。我派以前在我手下任广州行营政务处长后续任广州绥署政务处处长的鲁广文陪同李汉魂去南京见李宗仁。我托他们带信给李宗仁，强调团结的重要。他俩回穗时捎回李宗仁2月17日的复函，说李完全同意我的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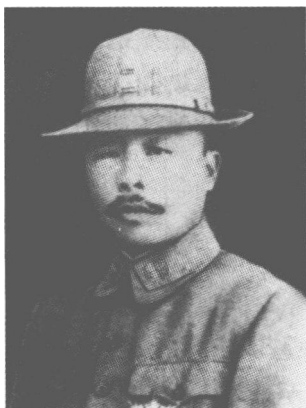
李宗仁想要李汉魂当他个人的参谋长，这一职务必须是上将衔，而当时李汉魂仅挂中将军衔，所以他也愿意升一级。2月21日，李宗仁任命他为总统府参军长，加上将衔。这一任命主要是为了在两广之间加强团结。

李汉魂与我想要邓龙光去海南，邓同意了。我们向李宗仁建议，但李宗仁却任命陈济棠为海南行政长官。^①余汉谋、薛岳与我企图劝说陈济棠拒绝任命。我们希望他让邓龙光那样较年轻的人去海南，邓龙光比陈济棠小六岁。我告诉他：“你真蠢，你是不做老子，做儿子！”意谓他原来是余汉谋的上司（陈任军长时，余是陈手下的副师长），当了海南行政长官，在地方绥靖事务上就成了广州绥署主任余汉谋的下属。陈济棠不听我的。

李宗仁留在南京，而立法院院长孙科决定南迁广州。我当然对他们的不和感到可惜。有人想我联络立法院内亲李的委员们解决这一尴尬问题，但我没工夫同那些人磨嘴皮，而是集中精力于军事。2月22日，李宗仁南下广州，亲自规劝孙科迁回南京。

2月27日，浙江省主席陈仪被捕，这是怎么回事？陈仪企图游说汤恩伯投共。我们中国人是最重感情的。陈仪是汤恩伯的恩公——他曾资助汤恩伯赴日本留学，独力栽培他成才，这二人关系亲密。设若汤恩伯不听从陈仪的游说，他就是对恩人不孝；反之，他若听从陈仪，那就是对蒋先生不忠。蒋先生提拔汤出任高职，也有恩于他。于是，汤决定向蒋先生举报。蒋先生命令汤逮捕陈仪。陈坦承与中共“勾结”，但未被即时处决。汤恩伯向蒋先生乞求饶陈一命。蒋先生同意了，陈仪被押送赴台。当然，蒋先生与陈仪私交甚笃，让陈仪多活了十六个

^① 1949年2月22日李宗仁与陈济棠密商两个小时，当晚又与孙科一起到梅花村陈公馆拜访后，才于23日广州举行的行政院452次例会上通过孙科关于任命陈济棠为海南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兼海南建省筹委会主委的提案；3月7日又决定由陈兼任海南特别区警备总司令。这些任命有邹鲁、孙科等建议，暗中有宋子文支持。为了酬谢，陈济棠把广州梅花村的豪宅让给宋子文居住。陈济棠为解燃眉之急，曾捐出港币80万作为海南行政署的开办费与招兵费，又以港币70万从泰国进口军粮，还以私人产业向中央银行押借港币30万元（加上以私人名义在港澳借款及以私人黄金百余两向银行抵押借款2万多元），以设置海口市政府。陈济棠的兄长陈维周当时极不同意他垫出这笔巨款去做官，但陈济棠说：“海南素称天险，共军没有飞机和军舰，绝不可能飞渡。不用说固守一年半载，即三年两载也不成问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定爆发，到那个时候，不用说恢复以前的地位（南天王），连大总统也有我份。”1947年张发奎作出海南警备总司令部组建三个警备旅的编制计划，国民党中央不同意设立警备司令部，且只允配置三个保安团；然而陈济棠出任海南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后，其直属战斗部队兵力达7万人，约18个旅。但战线过长，备多力分，最后还是撤往台湾。



陈仪

月。直至1950年春，蒋先生在台北复任“总统”后，才执行枪决。

1949年3月中，何应钦接任行政院院长。他同李宗仁的关系并不友善，但李、白诚邀何应钦组阁，是因为视何应钦为蒋的嫡系人马，他们希望何应钦帮助安抚蒋先生。【我建议何应钦成立战斗内阁，希望他改组行政院，精简政府部门。我希望他抛开蒋先生，自行控制局面。我劝他别害怕。他说：“你讲的都是对的。你可以这样做，但我不能，因为我要收拾蒋先生的烂摊子，我不能抛开他。”这完全是私人关系的问题。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何应钦一贯效忠于蒋先生，自从黄埔建校，经历两次东征、北伐、龙潭大战、西安事变、抗战直至内战，始终忠贞不渝。我与他的谈话便是明显的证据。薛岳、余汉谋、白崇禧都认为必须这么做，正如我说过，连何应钦本身都认为我说得对，可是我的建议没法执行。】

【薛岳、余汉谋与我要求何应钦委派朱晖日接替黎铁汉^①的广州警察局局长职位。黎铁汉是蒋先生的人，他在侍从室服务过。当然，朱晖日是我第四军的旧部。何应钦同意我们的建议。蒋先生对此大为不悦，尤其对我不悦。他知道薛岳听从我，知道我在幕后策划。】

作为陆军总司令，我到南京向参谋总长与国防部长述职，适逢4月1日政府方面和谈代表团离京赴平。我仍然反对当时的和谈。举行和谈是为了争取时间，但中共不愿意让我们赢得时间。我回顾北伐期间，那几个大军阀从来没有派人来同我们和谈——如果他们不能打，就一定吃败仗。吴佩孚和孙传芳一直打，直到彻底完蛋。我告诉白崇禧，基本上无甚可谈。我没去机场欢送和谈代表。



汤恩伯

我见到陈诚，他也来南京向李宗仁述职。我还清楚记得那个场景：一个北方籍学生冲入陈诚派来接我的汽车中企图行刺，所幸他未被击毙，我们送他人医院。陈诚说国家正处于危难之中，他知道我的个性倔强。他重新提起海南话题。【他想知道为什么我拒绝去海南，我告诉他我不是一只夜壶——需要时才拿出来用。】

我见到陈诚，他也来南京向李宗仁述职。我还清楚记得那个场景：一个北方籍学生冲入陈诚派来接我的汽车中企图行刺，所幸他未被击毙，我们送他人医院。陈诚说国家正处于危难之中，他知道我的个性倔强。他重新提起海南话题。【他想知道为什么我拒绝去海南，我告诉他我不是一只夜壶——需要时才拿出来用。】

^① 黎铁汉（1904—？），广东安定人，黄埔二期步科。历任排连营团、副旅长。1932年任委员长侍从室侦查组组长。1945年6月授少将衔。1946年1月任国民党政府参军处警卫室主任。1947年任广州市警察局局长。同年任广东省警保处副处长兼广州警备司令。1949年4月15日任“总统府”参军。

我并没有与何应钦、李宗仁一起努力争取美制武器借以装备白崇禧部以及我们能影响到的部队。

我通知李汉冲辞去那个专员职务。4月11日我也写信给朱绍良，要求让我去，他刚就任福建省主席兼福州绥署主任。为什么？我发觉陈望汲是中共地下党员，我怀疑李汉冲左倾。我想，如果发生什么变故，我必须承担责任，因为我推荐他当上了闽西行政督察专员。

薛岳对中共操纵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采取了果断措施。他下令逮捕了在省政府任职的民革成员陈侃与梁一飞^①。前者曾是第四军军官，在薛岳麾下升到师长。几个月前，他告诉我，薛岳让他去潮州当县长，他问我要不要上任。我劝他莫去，我知道他是民革成员，然而他不听我的劝谕，走马上任去了。后者在我手下做过广州行营高参。他俩都是东江地区的客家人。他俩被当地法院审讯后枪决了。

不久薛岳下令保安团逮捕了廖鸣欧^②，他原先也是第四军我的下属，东江地区的客家人。宋子文当广东省主席时，他当了一阵惠州专员。薛岳用电话通知立即枪决廖鸣欧，罪名是加入民革。我看了廖处决前写的遗嘱后，不相信这一罪名。廖在遗嘱中嘱咐儿子永远不要踏入政界与军界。他说，他以前为国民党而活着，现在要为国民党而死。我抗议薛岳未经审讯就处决廖鸣欧。薛岳给廖的家属一万元钱，家属问我是否可以收下。我告诉他们可以，于是他们收下了。

和谈没有成果。正如我所预料，共产党提出的条款无异于限期投降的最后通牒。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③屈服于银弹攻势，4月20日共军渡江，江防国军全面崩溃。

南京陷落前夕，李宗仁飞往桂林。4月23日他叫



戴戎光

① 梁一飞（1911—1949），原籍梅县，寄籍潮州。日本士官学校二十六期炮科毕业。历任中央陆军官校教官、军委会办公厅上校参谋、一五七师参谋长、第二方面军少将处长。胜利后兼任二方面军前进指挥所少将副主任。1946年任广东省保安司令部高参。因与中共联系策动保安部队起义而被捕。1949年5月30日在汕头被杀害。1953年被广东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② 廖鸣欧（1902—1949），广东兴宁人，云南讲武堂步科十五期。历任李福林、李济深、张民达部教练、营副、营长等职，后擢升徐景唐部第五军之团、旅长兼潮梅警备司令。1929年初因反蒋失败出走日本、法国、德国。九一八后任十九路军七十八师参议、第四军五十九师参谋长等。1937年秋在薛岳第一兵团司令部任副参谋长。1938年7月授少将衔。1939年调任湖南省军管区副司令兼耒阳警备司令。随后任广州日本战俘管理处处长。1948秋任惠州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中共档案称“一九四九年五月密谋起义，因事泄，六月三日在惠州被杀”。

③ 戴戎光（1904—1965），江苏阜宁人，清华大学、黄埔六期炮科、日本陆军炮兵学校毕业。归国后历任陆军二百师营长、第五军作战科长、新二十四师参谋长等。1942年入缅作战。1946年12月任陆军总司令部军械处少将处长。1948年6月任江阴要塞司令兼江防司令，同年9月授少将衔。著有《汤恩伯江防总崩溃中的江阴要塞》等。

李汉魂与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带信给我，说和谈已被中共武力所摧毁。他说，来广州前他要在桂林停留几天，因为他的广州住所正在修缮，而且因为他很累。我听说有个美国人^①乘专机去桂林见李宗仁，我不知道他们商谈什么。



1949年，李宗仁在桂林公馆。

我们要求李宗仁来广州，他没来。我知道阎锡山、居正、李文范（司法院副院长）衔中央党部之命去桂林催促李宗仁赴穗。于是我决定赶在他们前头去桂林，告诉李宗仁不要去广州，要他警惕。居正、薛岳、余汉谋都同意我的见解，【我们鼓吹反蒋，】他们要我快去。【李宗仁的确陷于重重困难，因为军队不在他掌控之中，还因为他的政府有职无权，有名无实。我知道蒋先生不肯把政、军权力移交给他。】

我告诉李宗仁，他已无路可走。首先，他可以从消极方面作出反应，公开宣告他所面临的形势，使全世界都知道所谓代总统只是一场滑稽戏；然后他就辞去这个“代总统”职务，让蒋先生回任总统，这样他就不会承担失败的责任。其次，他可以采取积极行动，那就是【他不必顾忌蒋先生，既然蒋先生已离开政治舞台，他就必须依法办理移交。李应该揭露蒋先生的错误行径，】组织战斗内阁，寻求美国援助。我相信美国人会援助我们的。^②

【我当时是反蒋的，】如果我是李宗仁，我会采取积极的行动。如果李宗仁没有反共的勇气，他就应该采取消极态度坐下来同中共谈判，实质就是投降。李宗仁怎样回答？他同意我的观点，但没有表示他会怎样行动。李宗仁回忆录说，我建议邀请蒋先生来广州，然后扣押他。实际上，我从未建议他扣押蒋先生。

阎锡山、居正与李文范于5月2日飞抵桂林。^③翌日，朱家骅与陈济棠也飞赴桂林。^④他们的立场基本上与我不同。【他们与李宗仁以为，他们能跟蒋

① 这是美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路易斯·克拉克，他于1949年2月初在广州开设使馆办事处。1964年6月7日与5月9日他在香港对夏莲瑛说，他和邱昌渭一起飞桂林觐见李宗仁。此前，4月22日蒋李会晤后，他见到蒋介石，但蒋什么也不肯说。所以他提出要见李宗仁。在桂林，他与李宗仁谈了五个小时，可是李宗仁也不肯透露谈了些什么。

② 据李汉魂回忆，5月1日李汉魂去看望刚从桂林回穗的张发奎。张说，他已告诉李宗仁，如果李不能从蒋先生手里取得政、军权力，就应该辞职，并领导西南各省长期抵抗共产党。

③ 次日李宗仁致函张发奎，感谢张的来访，告知阎、居、李文范三人到访，并给张一份他们四人的谈话记录副本供张研究。李还补充说，他送两份副本给何应钦，其中一份转交蒋先生。

④ 李宗仁与阎锡山、居正、李文范、朱家骅、陈济棠5月3日谈话记录如下：第一点指出，自李宗仁代总统职以来，没有达成和平与政治改革，列举失败原因。第二点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李宗仁不相信继续代理总统能够取得任何成效，他希望辞去代总统职，要求蒋先生复职。他自己欲以副总统身份赴国外寻求援助。第三点指出，李宗仁开出他愿意继续代行总统职务的六个条件，如果蒋先生不愿复任视事。第四点指出，除非上述条款得以落实，否则李宗仁执意求去。六项条件如下：（1）根据宪法明文规定李宗仁

先生讨价还价。我认为提出这些条款是枉然的。蒋先生绝不会把权力交给李宗仁。】

结果是，蒋先生不肯交权，5月8日李宗仁仍然去了广州。【白崇禧、薛岳、余汉谋、李汉魂及我都感到失望。李宗仁太天真幼稚了。人人都知道，蒋先生可以不要职位，但不会不要权力，且一日不可无权。早在1927年8月，他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宣布下野，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放权力。溯自黄埔军校成立以来，他一直不肯放权力，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李宗仁也应该知道。在这样的环境下，为什么他还想继续恋栈那个代总统呢？再者，他与蒋先生的关系是受到以前不愉快事件的影响的。】

李宗仁必须有个地方居住。孙科与吴铁城建议薛岳把他的官邸让给李居住，我当广州行营主任时，这原来是行营的宾馆。薛不肯，他说这是省主席的官邸。那些人都惧怕薛岳，他又那样固执。于是孙、吴要我去劝导薛岳。他一看见我就说：“你要我搬家？”我说：“不，我只是要你腾一半地方给李宗仁入住。”他说：“为什么一定要我腾房？”我说：“你必须腾，就这么回事！”他说他住的是省主席官邸。我说：“笑话！这不是你的官邸。东园是省政府的宾馆，你没有资格住在这儿！”我很生气，责备他不讲理。他最后同意了，他怕我。他拗不过我，自然我比他更倔强。我比他年长几个月。在搬去市政府宾馆之前，李宗仁只和薛岳同住了几天而已。

粮食部部长徐堪希望让他入住我任广州行营主任时居住的沙面官邸。这是一座大宅，维修困难且费用昂贵。我弟弟在东山有一所住宅，正需要修葺，于是，我让他入住沙面，他同意负担东山住宅的维修费用。

我常常去看望李宗仁。那时他经常与白崇禧、薛岳、居正、童冠贤（立法院院长）、邱昌渭（我做四战区司令长官时，他任广西省民政厅厅长，此时任立法委员）以及我聊天。许多事情我们都不告诉余汉谋，我们知道他亲近蒋先生。

李宗仁、白崇禧要我写信给居港的顾孟余，要他来穗。我同顾孟余相识已久，他是个小心谨慎的人。胜利后我在上海遇见他时，他总是要我莫告诉别人我

【接上页注释】

绝对有权改编军队与改组政府人事。(2) 总裁必须命令把运去台湾的中央银行库存金、银、外币运回来还给政府，以挹注政府的必要开支。(3) 总裁必须下令把已运去台湾的美援装备运回大陆，分配给前线部队。(4) 军队必须一体服从命令、调动与遣散，违反军纪者必须依法接受政府的惩处。(5) 为了遵守宪法与避免党内争执，训政时期的以党领政制度必须废止，例如最近设立的代行中央政治委员会职权之非常委员会必须废止。国民党的所有决议只能被视为对政府的建议而非命令。(6) 根据刚从溪口回来的居正报告，总裁指出，以他个人的观点，最好的办法是他出国愈快愈好，愈远愈好。既然如今局势严峻，迫切需要外援，故建议总裁出国以达致国内与国际合作之成效。从蒋经国1949年4月22日日记可知，在4月22日杭州会议上，蒋、李、白崇禧、何应钦等人一致同意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会之下设立非常委员会，凡政府重大决策，须先在国民党中央获致协议，再由政府依法定程序实施。

曾见过他，也不要把他的地址给别人。陈延炯正好去香港，我叫他捎信。顾孟余来广州只住了几天。我们谈论政局，【我那时知悉李宗仁给了顾二十万港币作为顾在香港新建组织——自由民主同盟的经费。^①该组织的核心由童冠贤与其他立委如黄宇人、甘家馨（友兰）、陈克文、周天贤、任国荣（中山大学教授）、张纯明、黄如今（前东北大学校长）、程思远等人组成。该组织编印期刊，政纲是反共与反蒋，其成员大多数是国民党员。我没有与该组织联络。我在政府中担任陆军总司令，顾孟余认为我与薛岳是政府成员，最好不要加入。李宗仁馈赠张君勱的民社党五万港币。后来张君勱在香港对我说，李宗仁给顾孟余二十万，只给他五万，这太不公平了。张君勱对李宗仁很恼火。就这样我才知道李宗仁资助顾孟余组织民主同盟的内情。】



涂公遂

5月19日李宗仁派甘介侯去美国争取美援。甘想当大使。此人同我、薛岳、白崇禧接触不多，我们未同他讨论过大事，同他的关系不好也不坏。除了李宗仁，甘同郭德洁的关系最好。

由于某种原因^②，美国大使馆没有随政府搬迁广州，这就是成语“落井下石”的又一例子。倒反而是苏联大使馆迁到了广州。

军事形势迅速恶化。我出席了国防部的会议。白崇禧报告说，他已无法控制武汉，该城市是5月15日撤守的，白的部队撤至湖南。5月20日西安失守，蒋先生决定保卫大上海，但这个大都会于5月25日陷落。

何应钦发觉已无法再当行政院长，乃提出辞呈。白崇禧、薛岳与我希望居正继任。我们期望居正任院长后会组织一个战斗内阁，任命白崇禧为国防部长、任命我为参谋总长。行政院长、国防部部长与参谋总长是战斗内阁最重要的职位。居正说，如果我和白崇禧愿意赴汤蹈火，他便同意出任院长与我们同舟共济。

居正常常和我们讨论局势。虽然我们确实与他有所接触，但没有特殊联系，他属于上一代的党政元老。到这危急存亡之秋，我们的观点才趋于一致。我们都

^① 据程思远回忆：1949年8月，顾孟余来到广州住沙面陈伯庄家中，同李宗仁长谈三日，顾卒答应出来领导自由民主同盟，张发奎也愿意予以支持，并建议把这个组织加一个“大”字，这样就变成了自由民主大同盟。9月初在广州秘密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顾孟余为主席，童冠贤、程思远、邱昌渭、黄宇人、甘家馨、李永懋、尹述贤等为干事。并推童冠贤为书记，程思远为副书记，周天贤为组织组长，涂公遂为宣传组长，何义均为政治组长（未到职），陈克文为财务组长。李宗仁援助港币20万作为开办费，李还支给顾孟余港币3万元。一年以后又补助他美金6000元。此外，干事、组长每人港币5000元。这些钱都在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离职时拨给李宗仁的一笔专用款项内开支的。刘因此不能去台湾，其后到新加坡经营金融事业去了。

^② 司徒雷登想透过他的燕大学生黄华同中共联系，大致中共与美国正式建交。但中共当时倒向苏联，无意同美国建交，故司徒只是单相思。

认为，采取坚定态度是必要的。

薛岳、白崇禧与我组成一个核心，讨论所有的大事。有时我在代总统官邸度过整天时间，往往是一边商讨国事一边进餐。我们三人对李宗仁谈及居正出长行政院的事，对他来说，任命居正当院长先要得到立法院通过。

薛岳在争取立法委员同意票方面大显身手。【在竞争行政院长席位方面，他花费很多钱宴请立法委员。钱来自省政府的公费。】他成功地劝说立法院院长童冠贤投居正一票，也得到广东省立委潘朝英^①的支持。

5月30日，立法院投票决定居正任命案，结果仅差一票落选。他一听到投票结果，不通知我们离开了广州。在投票时，广西籍立委韦永成（韦永成的妻子是蒋先生的侄女）、程思远都滞留香港缺席院会，这就是李宗仁欠缺决心的证据。那天，他俩没理由待在香港。据李宗仁回忆，另一位桂系主委张岳灵^②也待在香港。在总结落选原因时，我们认为李宗仁要负主要责任：既然他把居正任命案交付立院审议，他为何不通知广西立委他本人的意愿！那就是我们对李宗仁愤怒的原因，觉得他是在敷衍我们。

鉴于居正任命案仅以微小差额失利，薛岳、白崇禧、李汉魂及我建议李宗仁在立法院重新提出该案。他同意了但未实行，却不同我们商量突然提名阎锡山，甚至连白崇禧都被蒙在鼓里。当时我问白，他说他闻此大吃一惊。李宗仁的举止真是深不可测。白崇禧、薛岳与我都被惊呆了。李宗仁提名阎锡山任阁揆是否为了迎合蒋先生的旨意，这留下了千古谜团。我们问他为何不重新提名居正，他不予回答。

阎锡山的立场就不必提了，他同李宗仁根本没有渊源，他对蒋先生唯命是从。鉴于我们在阎内阁不能有所作为，白、薛与我讨论，对挽救危局我们究竟还能做些什么。像何应钦^③一样，阎锡山当了院长也要兼任国防部部长。我们要求李宗仁告诉阎，不要兼任防长，让白崇禧出任此职，让我担任参谋总长。我们想仿效美军体制，恢复国防部的权力。白崇禧比我资历深：在北伐期间他任国民革



何应钦

① 潘朝英（1915—1987），广东顺德人，北平辅仁大学毕业，美国天主教大学国际公法博士。1939年在美国创办《中国日报》，历任乔治城大学、天主教大学政治学和法学教授。1945年返国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专门委员、南京益世报社社长。1948年当选行宪后第一届立法委员。1952—1956年任美国西东大学远东学院院长，1963—1965年任美国七海大学人文学院院长。1966年、1969年出席美国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报告及讨论有关越南与中国问题，曾与于斌、雷震远等人创办东亚问题研究所、双圈出版社、双圈周报等。著有《美国对东北问题外交》、《中美第一个条约》、《北京红卫兵》等。

② 张岳灵，广西恭城人，曾任广西省政府科员、秘书。1935年任阳朔县长。1936年改任桂林县长。抗战爆发后任第七军秘书。1938年任安徽立煌县（今金寨县）县长。1939年任安徽地方银行行长。抗战胜利后与李品仙等在上海合伙经商。1948年当选行宪后第一届立法委员。

③ 当何应钦就任行政院长时，徐永昌接替何应钦任国防部部长，在4月22日的杭州会议上，李宗仁取得蒋介石的同意改组国防部，将参谋总部隶属于国防部，任命何应钦兼任国防部长（事见李汉魂回忆录）。

命军副总参谋长时，我只是师长军长，他职位一直比我高。

我们同李宗仁商量这事，他同意执行我们的计划。碰巧——好像做戏一样——那天我们三人同李宗仁商量时阎锡山上门求见。我们对李说：“你现在就去同阎说，叫他辞去国防部长的兼职。”我们在楼上等候，李下楼见阎。当他返回来时，我们问他：“结果怎样？”他说：“我忘了告诉他。”无怪乎薛岳称李宗仁“扮猪食老虎”（意谓装懵扮傻）。直至那一天为止，我都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李宗仁背弃了我们三人。许多人都不想说出此事的内幕秘辛。

国防部长必须出席军事会议，阎锡山却很少出席，军权集中在参谋总长顾祝同之手。

白崇禧、薛岳与我急切要求快刀斩乱麻。【我们催促李宗仁同蒋先生摊牌，】要求李离穗前同蒋先生解决悬案。^①

① 下列文件概括了薛岳、白崇禧、李宗仁与张发奎的观点，用毛笔书写，未署日期与起草人姓名，注明“密件”。

文件共八页，以毛笔写成，分甲、乙、丙、丁四部分。甲部分为目的，共四条：

子 统一事权，集中力量。

丑 改革政治，刷新阵容。

寅 建立和稳定革命根据地。

卯 抗拒与肃清腐化与恶化势力。

乙部分为“方针”，分“急进的做法”与“缓进的做法”两项。所谓“急进的做法”共六条：

子 对×表示一明确的态度，务使其将全部资本交出包括政权、军权、财权及一切金银、外汇、物资、军械等，最好能促其出国。

丑 彻底驱除在粤之一切顽固分子或停止其活动并改组国民党。

寅 废除以党领政之制度。

卯 改组国防部。

辰 加强两广合作，以两广为中心，建立革命根据地。

巳 革新政治，肃清一切贪污无能自私分子，重整革命阵营。

这六条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所谓“对×表示一明确的态度”，其中的×，指的乃是蒋介石。

文件接着叙述采取“急进”做法的理由，共五条：

子 ×之原则既决不肯轻易放手，不如与之作具体的最后谈判，使之无法推诿。

丑 必须迅速处理一切，才能争取时间。

寅 必须彻底改革，才能争取民心与国际援助。

卯 必须彻底改革，才能肃清内部一切矛盾，达到集中与统一。

辰 必须彻底改革，才能破灭×再起之幻想。

其后，文件叙述“顾虑与困难”，也是五条：

子 与×破裂，无法获取其拥有之资本。

丑 可能即调兵入粤，以图镇压。

寅 目前军政费无法自给。

卯 立法院顽固分子之势力甚大，仍可能利用立法院牵制政府。

辰 两广兵力不足以应付共军或×军之侵入。

以上各处的×，也均指蒋介石。

文件提出的“缓进的做法”共三条：

子 对×作较温和之表示，仍请其将全部军政权及资财交出，使统一指挥。

丑 对顽固分子逐渐疏远。

【经过一番讨论，李宗仁撰写了一份文件给我们，他列举了蒋先生下野后所犯的“罪行”，计有十条，我们中国人爱用“十大罪状”这个词。文件是油印的，供我们研读。除了薛岳、白崇禧与我，李宗仁撰写这份文件时还有其他人在场，但我不记得了。】然而，唉！李宗仁太懦弱了，他不敢付诸行动。他仍紧紧抱着代总统这个宝座，表现得优柔寡断，还寄望于蒋先生支持他，既不敢得罪蒋，又不敢对蒋发火，还常常向蒋讨教。李宗仁欠缺毅力。1929年我在宜昌发难反蒋时，并未同任何人结盟。我从来都是择善固执，不问成败。李宗仁本应择善固执不顾成败的。

【当蒋先生派宋子文来广州时，我建议扣押他。知悉他要南下，我建议薛岳：“我们这么穷，把他扣起来问他要钱。我们从哪里还能领到军饷？蒋不会给我们任何东西了。宋子文最怕死！”薛岳不赞成我的主意，所以没有实现我的愿望。

宋子文只住一晚上，最要紧是取他的钱财。作为军人，我头脑简单。我从来不想扣押蒋先生，即使在1927年他派宋子文来广州试探我们肯不肯邀他到访时，我可以请他南下，然后扣押他，但我无意做这样的事。薛岳与我当年在广州都是反蒋的。】

撤出武汉后，白崇禧在广州同我们讨论了未来的计划。他的华中剿总部队正驻扎在湖南，其主力沿着粤汉线部署。那时他已感觉到湖南省主席程潜与华中军

【接上页注释】

寅 一切改革措施，均采援进，使力量充实，基础较稳固后再进行上述急进的各项办法。

文件的制订者认为，取“缓进的做法”理由如次：

子 希望诱致×交出若干资本。

丑 ×或可不至于立即派兵入粤。

寅 对×不即时决裂，留有斡旋余地。

但是，文件的制订者又认为，这种做法也有其弊端：

子 时机紧迫，不容许获得逐渐改善之机会。

丑 由于×之高度警觉性，决不肯交付全部本钱，甚至一部分亦不可能。

寅 由于×之高度警觉性，可能仍派兵入粤。

卯 除非即时有所表现，我们无法争取民心，提高士气。

辰 与×不摊牌，不能获得国际之信赖与援助。

巳 无坚强明朗之态度表现，革命力量不能号召集结，反动分子无法肃清。

丙 结论：在比较权衡之后，认为急进的做法可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丁 值得研究的实际问题，计六条：

子 两广兵力如何充实，包括肃清土共问题。

丑 财政问题如何解决。

寅 以党领政之制度如何废除，包括非常委员会。

卯 立法委员如何争取。

辰 与×摊牌之方式如何。

巳 对中共之战略部署。

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陈明仁是靠不住的了。^①

当时决定，白崇禧派广西部队第四十六军去粤北。中央军的沈发藻（十三兵团司令官）、胡璉（十八军军长）、刘安祺（二十一兵团司令官）驻扎在粤北与桂南。换言之，我们的防线从四川经湖南、江西、广东到福建，经过半个中国的河山。我觉得任务艰巨，但如果我们顽抗，仍可延缓共军前进，不论前途看上去多么黯淡，我们还是要有作为。我们感到，鉴于蒋先生与美国的关系欠佳，如果李宗仁能建立一个坚强的政府，美国可能会援助我们的。

正如我已说过，我限定自己只服务三个月，期限一满我就辞职了，李宗仁接受了我的辞呈。这三个月我可谓一事无成，仅两广将领关系有点改善，至少我们做到了经常聚在一起商讨。我把职位移交给参谋总长顾祝同，于是他兼任陆军总司令。我把就任此职时他给我的两亿金圆券还给了他。此时，两亿元只能兑换一点点港币了。顾祝同见此十分惊奇——他完全忘记他曾同意我将金圆券兑换成港币。我把金圆券贬值后，因来回兑换所赚的现款分发给陆军总部的同事，顺带用于举行一个告别餐会。

李宗仁想任命我为侨务委员会委员长，但由于我婉拒而没有发布。我知道蒋先生不同意，但若我肯任此职，那还是当得上的。然而我不愿当，坦白讲，我对李宗仁厌倦了，他作茧自缚，犹如风中之烛。我对他特别失望的两件事是重新提名居正食言以及不肯劝阻阎锡山兼任国防部长。我告诉李宗仁，他可以任命我为战略顾问委员，他与阎锡山于7月22日签署了任命状。6月杪，我离穗赴港。

7月14日至20日蒋先生访问广州后，我听说原先拟订的防卫湘赣粤边区计划被废止了，代之以蒋先生的集中所有兵力据守广州的计划。据说黄埔一期毕业的广州卫戍总司令李及兰奉上级命令拟订了炸毁海珠大桥（联络珠江南北岸）的计划。我写信给薛岳与余汉谋，催促他们保留原订的战略^②，但他们没有答复。

我同广州的领导人们保持紧密联系，邱昌渭与李汉魂常来香港。9月14日，李宗仁亲自写信托邱带给我，希望我回广州；9月15日，白崇禧也亲撰信函催我回穗，但我没回去。

我不知道蒋先生是否想离间广东将领与李宗仁的关系。【但我知道蒋先生9月22日至10月3日来穗时，曾表示希望我回广州，他要白崇禧、余汉谋、薛岳、李汉魂分别打电话给我，传达他要见我的意愿。其中仅薛岳添加他自己的意见，劝我

^① 此外，张发奎对蒋介石的评解是理性的。例如顾维钧1970年到香港拜访以前的军政要员，他问张发奎，白崇禧防守广州最后的屏障溃散，是否由于蒋介石命令宋希濂将军率部撤离防线。张毫不犹豫地答道：“长沙—厦门—汕头—潮州这道防线之所以失守以及随后广州的陷落，其真正原因在于程潜投向了共产党。程潜是湖南省主席，也是湖南国军的总司令。他投共后，部署在这条防线上的白崇禧将军所部湖南部队纷纷跟着投共，防线左翼因而崩溃，并且使得右翼宋希濂将军统率下的委员长嫡系部队不可能再守住剩余的防线。”（典出《顾维钧回忆录》1997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第893—895页）

^② 蒋介石召集顾祝同、薛岳、余汉谋、刘安祺等十多位将领开会，分析早先军事部署之外错，他特别希望刘安祺部队不要派往粤北，以免广州成为空城。这表明，直至1949年8月，蒋与广东将领们在战略部署上仍存歧见（事见张发奎1949年8月23日日记）。

留在香港莫回去。也许他认为我回穗有危险。后来李汉魂在香港告诉我，他在广州觐见蒋先生时，蒋大嚷：“是向华在反对我！告诉他小心点！我要看他怎么死！”李汉魂说当时蒋先生怒不可遏。我相信他不会骗我。蒋经国到我弟弟在东山的住所拜访，留下一张名片致意，名片后来由留在广州的副官捎来香港。

我说另一件蒋先生不按制度办事的例子：朱绍良是福建省主席兼福州绥署主任。蒋先生从台湾命令汤恩伯去福州接替朱绍良这两个职务。这是个大笑话。汤恩伯告诉蒋先生，他是总裁，这类任命须由李宗仁与行政院副署，否则交接不成。蒋先生要汤别担心，他写了个手令让汤向朱出示。汤恩伯到福州机场后打电话给朱绍良。见面后出示手令，朱很高兴解脱这两个苦差事。他收拾行李，乘坐同一架飞机返回台湾，只带一个副官。省政府由秘书长办理交接。

这事没人知晓。汤恩伯不敢向在广州的中央政府报告，阎锡山顾祝同对此事毫不知情，代总统更不知道福建发生了什么事。好一个笑话！

我们只是从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口中知悉此事，他赴台觐见蒋先生后回穗途中在福州停留，汤恩伯会见他时告诉他已办了交接手续。国民党的总裁竟能这样蛮干！

接着，李宗仁在广州对蒋先生说，他调动人事却连代总统都不让知道，这是不妥当的。蒋先生答应今后小心行事。后来李宗仁赴港入住医院，我前往探望，他告诉我那次同蒋的谈话内容。】

【把广州从直属中央的特别市改制为普通的省辖市，其意图是在加强广东利益方面具有更大的灵活性。9月30日，第四军旧部李扬敬接替欧阳驹任广州市长，还兼任广东省政府秘书长。广州市政制是薛岳提出建议，由李宗仁批准执行的。欧阳驹是吴铁城的旧属，他被怀疑不可靠，因为他太亲近蒋先生。】此时共军逼近广东，刘安祺部没有移防粤北，胡璉部则离开赣南阵地开赴汕头，然后去了金门。结果四十六军只好撤到广西，政府的防线宣告崩溃。

广州失守的最后关头，政府迁往何地又引起争论。有人主张迁往云南，其他人主张迁往四川。10月12日，政府迁往重庆。陆军总司令部由副总司令汤尧率领迁往云南。从顾祝同手中接任陆军总司令不到两个月的关麟征去了香港。另一位副总司令林柏森也去了香港。把陆总迁到云南是个大错。为什么？陆军总部应该设在首都。此外，许多设施被丢弃了，譬如总部经营的一家印刷厂遗留在广州了。显然，那么多印刷设备不可能用飞机或卡车运到云南去。

李汉冲到了香港，他想劝说警卫团团团长黄志仁^①投共，他俩是陆大同学，黄拒绝了。有些官员去了海南，其他人去了台湾与香港，如鸟兽散。

11月20日，李宗仁来香港治病，我敢说他的病并不那么严重。他入住太和医院那天晚上我去看望他，他说他能得到美援。我劝他不要去美国，建议他入住

① 黄志仁（1908—1984），浙江龙游人。中央陆军官校八期军训班毕业后任上海复旦大学上校军事教官。1943年毕业于陆大特别班第五期。1946年后历任陆大研究院少将研究员兼兵学教官、陆军总司令部少将总务处长兼警卫团团团长等职。1949年脱离军界定居美国。

香港玛丽医院。

我根本就反对他去美国，我相信欧美人士势利现实：如果你有实力，你不去美国他们也会援助你；如果你没有实力，即便你去白宫“哭秦廷”，人家也不会可怜你。我感到李宗仁败退后只剩下少许国土赖以生存，殊不必乞灵于美国来收拾残局。

我并没有劝说李宗仁辞去代总统一职，海南岛仍在我们手中，我希望他去那儿。我就是这种性格，局势愈艰难，我就愈坚强。如果他辞去总统职，就好似临阵脱逃。

至今我仍不能谅解李宗仁。他明确答应我，49天——不是48也不是50天——后，同美国谈判美援结束，他就会回来。为什么是49天？我不知道。当时我以为他是讲真话。但我也察觉李宗仁情绪不稳定，便去罗便臣道李公馆找郭德洁。我说，希望他们会回来，她感谢我的关怀，表示他们一定会回来的。

得悉李汉魂要陪伴李宗仁赴美，我想要李汉魂奉劝李宗仁不要去美国，抑或他不陪同李宗仁去美。可是李汉魂的家眷在美国。我说，如果他一定要去，就应该自己单独购买机票，而非与李宗仁夫妇同行，如果有需要，我送他一张机票——当年赴美机票仅五百美元，但他不听我的话。

【我必须说，他有点自私。眼看着政府处于风雨飘摇境地，他却弃之不顾，连他主掌的内政部都扔下不管了。】

李宗仁也连交接手续都不办就走了。12月5日他离港前夕，我去他家道别，我再次表示希望他们尽快回来。我没有去送行，因为我去机场不方便。

李宗仁一行是乘坐专机离港的，甘介侯对此行作了全盘安排，包括抵美以后的政治活动。李宗仁受甘介侯影响甚深，也对他极为倚重，他也是李宗仁亲信中唯一通晓英文者。李离港后，我知道他不会回来了，因他把大批行李由海路运往美国。如果他计划回来，那就不必把家当全部运走。广西的友人们告诉我说，德公托运了一百多件行李去美国，我这才知道他对我说谎。

论到成败，李宗仁在坚定、耐力方面远远不及蒋先生，他缺乏不拔之志。然而，无可否认，在为人处事作风民主方面，他是首屈一指的政治人物，而且虚怀若谷。

此时共军威胁重庆，11月29日政府西迁成都。不久，12月8日，决定迁都台北。

【在撤离重庆之前，因西安事变被囚禁的杨虎城全家被处决。我不知道杨虎城为何不能开释，倘一定要继续囚禁，为何不押送台湾？全家坐飞机去台湾也不是件难事。】

胡宗南部队号称“60万大军”，却不发一弹就瓦解了。他们从陕西一路退到四川再到西康，这是最意料不到的事。共产党摧毁了我们的士气，战争的胜负不是依靠武器而是士气。

白崇禧部队向海南岛转进途中大多数都在两广边界地区与粤西南被歼。隶属白崇禧的中央军第一兵团黄杰部3万多官兵，越过边境退至越北。在撤退入越的

两支部队中，有一支是武鸿卿率领的，他协助“中华民国”保存了一支1.5万余官兵（白崇禧部败退，国军分为两路先后退入越南，一路是黄杰率领的第一兵团于1949年12月12日经思乐县的爱店先入；另一路是武鸿卿统率由各部败退官兵临时仓促编成一师与一旅“越南建国军”于12月21日经龙州的水口关后入越。当时共军志在消灭国军实力而不急于攻城掠地。广西省政府于十日内自桂林迁梧州、柳州、龙州。12月8日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决定将渡海赴琼不成的残余部队组织成越南志愿军，以流寓广西的越南义士武鸿卿为总司令，让这位越南国民党领袖统率入越。武氏将三、十、十一、十七各兵团以及华中长官公署直属部队、“国防部”突击总队、桂西师管区等撤至龙州的零星部队收容整编，而未经参战尚属完整的广西省政府警卫大队也被编入，且成为这一路主力。12月18日下午，武鸿卿等完成编组，将国军官兵、地方团队、军眷、义民、省府警卫大队等1.5万人编为一个师与一个警卫旅南撤。军行十余里到下冻即受共军袭击，激战两小时击溃共军后进逼越境水口关。12月21日，武鸿卿到东溪与法军协商约定，让国军开入东溪，转赴凉山。途中悉获黄杰部已被法军缴械，乃决定转往陆南。沿途屡次遭遇越共、法军袭击。1950年1月1日，法军以九架飞机轮流轰炸，并投烧夷弹烧山。龙州第七区专员伍宗骏被击毙，余众突围进入森林，又遇越共伏击。1月5日，法军大部队截住去路，武鸿卿、黄南雄两位越籍领袖与法军商订约章十条，各执一纸，并请越南保大皇帝担保，法方保证将孤军送返台湾，次日武鸿卿部放下武器，全体徒步到兴安搭船赶来姆法郎。高级将领由法军空运至河内，经十天的讯问，于1月16日交给黄杰。全部官兵分驻于来姆法郎、蒙阳两个营区。不久迁往富国岛，1953年夏全部遣返回台）的劲旅，堪称济困扶危、高义薄云。我在四战区五年多对越南革命党人的竭诚支援总算得到了适时的回报。我在香港闻悉此事，也老怀堪慰了。他们被解除武装后关入富国岛集中营。经过“总统府”战略顾问林蔚多次赴越南折冲樽俎，才于1953年6月分七批遣返回台。

白崇禧华中“剿总”的联勤分支机构——第九补给区司令许高阳^①赶不上撤退的队伍，他把联勤总部的军需款项占为己有，来了香港。他本应去海南归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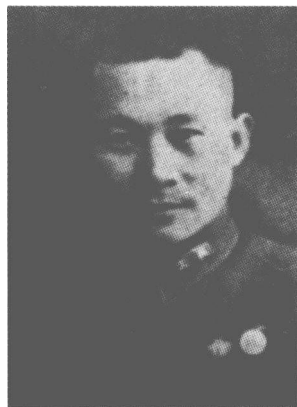
【负责余汉谋部与驻在赣南的中央军之后勤供应的周游^②也同许高阳一样，

① 许高阳（1906—？），湖北武昌人，中央军政学校南宁一分校四期步科毕业，陆大十三期。曾任南宁军分校大队长。1934年6月任桂系第四集团军总参谋处参谋。从陆大毕业后任五战区长官部兵站总监参谋长。1938年任广西绥署参谋处长。1942年任四十六军一七〇师师长，率部参加桂柳会战。1944年任军委会桂林办公厅高参。1948年9月授少将衔。1949年3月任第九补给区司令。

② 周游（1894—1959），广东阳春人，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毕业。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连、营、中校团副。1936年任广东军管区司令部副参谋长、中央陆军官校四分校（广州）少将高级教官。抗战爆发后，任四战区兵站部少将分监。1944年7月任广东省政府委员，次年8月免职。1946年任广州绥署第三处少将处长。1949年任海南防卫总司令部后勤司令部中将司令。1950年去香港。周游被通缉后，常被流亡香港的军人敲诈。其不义之财散尽后，在太平山下以写稿维生，是《天文台》报的长期作者。

卷款来港。由于中央不能从广州补给这些部队，当局给了他大笔美元、黄金与银元让他随军就地采购。当然，为了报账他只使用金圆券，在金圆券急骤贬值之下，来回倒腾的巨额差价都落入他自己的腰包。周游赶不上后撤的速度，在他的后勤官兵到达指定地方前，应受补给的部队已经后撤，有些部队已被共军缴械，其他部队则投降了。周游便携巨款来港。在台湾的“行政院”以李宗仁的名义发布了通缉令。周游没有心肝又没有脑筋。倘若他天良未泯，他本应携款去海南然后随军撤台。他可把手持的金圆券按原来的面值交还有司，就这样，他仍能借一泻千里的金圆券贬值而发一笔财。

由于卢汉投共，我们又失去了云南。12月9日，蒋先生派张群去昆明，卢汉扣押了他。陆军副总司令汤尧也被捕。^①



吕国铨

李弥率领第八军等从滇南撤至缅甸，其中二十六军军长吕国铨^②是黄埔二期毕业生。他的副手彭佐熙^③是他黄埔二期以及陆大同学。彭是广东罗定人，曾在四战区与广州行营任过高参。李弥的部队总共有三四千人。后来转移至泰北。

我为李宗仁拟订了计划，^④我们期望他回来，当时海南还在我们手中。我希望他回来领导我们，重整旗鼓收拾旧山河。海南可以成我们的革命基地。我们不希望蒋先生复任“总统”。

12月25日我致函李汉魂，建议由香港各党派与无党派的民主人士团结起来组成一股新的反共力量。例如，我想起青年党领袖李璜与民社党成员伍藻池。我认为新力量应该包括顾孟余那伙人。这股力量是不会同蒋合作的。

① 此处张发奎回忆有误，汤尧跟张群到昆明后察觉气氛可疑，在事变前一日悄悄溜出昆明，回到设在曲靖的陆军总部。12日顾祝同电令汤尧任陆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监督云南军政事务。汤即积极指挥第八、第二十军反攻昆明。1950年1月2日，顾祝同召汤回台北，蒋召见汤，慰勉有加。14日顾祝同亲送汤与李弥回云南蒙自，宣布委任汤为第八兵团司令。24日晚，汤尧在蒙自二塘山被解放军俘虏。此后在战犯管理所关押，1957年死于狱中。

② 吕国铨（1903—1983），广西容县人，黄埔二期步科毕业。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连、营、团长。抗战爆发后任第九集团军九十八师二九二旅旅长。1939年6月授少将衔，任第六军九十三师师长，先后参加八一三淞沪会战、桂南会战和滇缅防守战。1945年后任桂东师管区司令、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副总指挥、二十六军军长。1952年返回台湾。

③ 彭佐熙（1901—1986），广东罗定人，黄埔二期辎重科、陆大毕业。历任排、连、营、团、旅、师长，先后参加徐州会战、衡常会战、昆仑关会战、远征印缅诸役。1948年9月22日授少将。1949年任二十六军副军长，12月10日任第八兵团中将副司令兼二十六军军长。1950年1月滇南战役失利后退入越南，1953年去台湾。

④ 1950年1月22日李宗仁亲自写信给张发奎，说复兴国民党的问题相当复杂，必须考虑时机是否成熟，他派黄旭初向张表达自己的观点。

白崇禧托程思远和我联系，^①程思远在香港与海南之间来来去去，他传达白崇禧的意愿，要我同顾孟余的自由民主同盟密切联系。我每日同顾孟余等人商量，但我们的努力并不成功，我们不能取得一致意见。】

如果李宗仁履行承诺，在49天后回来，他应该去海南岛，白崇禧仍在那儿。但我听李宗仁的秘书黄雪村说，他走的时候就不准备回来了，这同我先前从桂系人士口中所知是吻合的。黄雪村曾陪伴李宗仁赴美。他回港后对我说，他认为李宗仁这一着做错了，黄雪村随后去了台湾。

1950年3月1日，蒋先生复行视事，回任“总统”。我不支持蒋先生此举，然而，我也不反对他。

李宗仁在美国突然声明，他已经命令我在广州开展地下活动。在作出如此公告前未曾同我商量，这本身也不符合事实。他采用了中国政客的机巧权术，吹牛皮放大炮。我发表声明否认他的妄言，刊载于3月13日香港各报。

我认为此时已无希望守住海南。我们在海南的战斗能力很薄弱。国军退至海口，转进岛南榆林。^②当榆林形势危急时，余汉谋、陈济棠、薛岳和白崇禧撤离海南去了台湾。

虽然白崇禧曾两次——1927年8月与1949年1月——逼迫蒋先生下野，但白崇禧还是敢于返回台湾，这显示了蒋先生人格的伟大。

由于美国不肯保证后勤支援，而国军又不能自力维持守军的后勤供应补给，4月23日蒋先生命令海南岛国军全部撤台，同一日共军进占海口。

5月2日，共军占领海南全岛。

^① 12月13日白崇禧从海南写信给张发奎说，程思远已到海南告知张所作的努力，认为建立革命力量拯救危局是他们共同的目标。他希望张同顾孟余等人商量，并将讨论结果告诉他。

^② 余汉谋4月13日写信给张发奎，告诉他前一日抵达榆林。他表示决心战斗到底。

第二十章 创建第三势力的努力以及类似的牵连*

(1950年至1962年)

1950年，我接到台湾方面通知，说国民党党员要重新登记。我探询孙科的意见，他是当时滞留香港的国民党党员中地位^①最高的，我问他有否收到这类的通知。他住在浅水湾畔，他回答说收到了，但已扔进字纸篓里去了。于是，我也把这一纸“指令”扔进了字纸篓。

我们一些反蒋的朋友打算组建一个新的国民党，孙科以前的亲信傅汝霖^②建议组建一个类似李济深^③的组织，他认为孙科是最合适的领袖人选。他期望顾孟余^④一伙以及所有既反共又对台湾当局心怀不满的人都能加入这个新颖的国民党组织。傅手里有几个钱，愿意为新的组织承担经费，我便同意了 this 建议。

傅汝霖不常接近孙科，他是满族，从前是汪精卫的改组派。还有哪些人同我们联络呢？梁寒操^⑤、陈剑如、刘维炽^⑥，他们都是太子系的人马。

我们游说孙科，被拒绝了。他说：“我们国民党党员不可为此！”既然事不可为，傅汝霖就离开了香港。

自从孙科拒绝了我们的建议，我们再没有同顾孟余接洽。顾孟余的自由民主同盟是1949年在广州成立的，其核心是立法院院长童冠贤^⑦、黄宇人^⑧以及一些立法委员。李宗仁给了顾孟余20万港币组织这个团体。

诚然，我对顾孟余熟稔已久^⑨。胜利后我每逢在上海见到他时，他总是叫我勿告诉别人我俩曾晤面，还叫我勿将他地址透露给别人，他一贯小心谨慎。

我没有同顾孟余一伙合作过，更没加入他的团体，因为1949年我担任陆军总司令的职务。顾孟余认为薛岳^⑩与我不宜加入民主同盟，这个小组织最好不吸纳官方人士。

我没有在香港加入这个组织，因为考虑到它太狭隘了，内部情形欠佳，我的朋友们似乎也不想加入这个组织。我也未同香港的其他同类组织或党派接触。我以游泳打发时光。

* 因翻译/校注者对本章涉及的人物作了较大篇幅的注释，为便于读者阅读正文，版面不致支离，故本章注释体例改为章后注。——编者

美方的倡议

有一天，尤金·王告诉我，广州岭南大学原校长香雅格想见我。我认识这个美国人已久，算是老友了。广州“陷共”前他离穗，我在香港见过他，但未深谈。他回美国去了，现在又来到香港。尤金·王是我的老友王恕（行宪后第一届监察院监委）之子，也是岭南校友。他是一个出色的职业赛马骑师。

我在香港一家旅馆^①会见了香雅格，他能操流利的粤语，故我们不必通过译员便可直接交谈。我和香雅格单独会面吗？不，尤金·王在旁作陪。香雅格博士问我是否愿意出来领导大陆的反共游击战争。他说：“许多中外人士都认为，如果你肯出山，必能在华南地区重整旗鼓。”人们都说我是南天王^②，而游击战就要扎根华南。我告诉香雅格：“你错了，我本人一贯反对偶像崇拜。是的，我曾对国军与若干战役作出一定贡献，可是我不能凝聚百姓。”我继续说：“我不仅不能唤起民众领导百姓，而且认为组织游击战是绝对办不到的。第一，共产党已得到人民的拥护，而游击战是要依靠民众支持的。任何人一踏上大陆国土就会被围捕。第二，中共是以游击战起家而壮大的，我们在这方面远远不如中共。第三，要成功地从事游击战争，必须由富有经验的机构来指挥。”

香雅格问我是否认为蒋先生能重回大陆。我告诉他，我总认为，一旦一个政权被推翻，它就很难东山再起了。这类复辟的事中国并非未出现过，曾有过下台的统治者重新掌权的先例，但那是十分罕见的例子。在民国成立后，这是千真万确的，哪一个下野的军阀武人能卷土重来？香雅格博士对蒋先生是抱着负面态度的，他也是反蒋的，他认为蒋先生太独裁了。

香雅格博士问我能做些什么。我说，有信誉讲原则的人应该创建一个新的秘密的政治组织以及一支新军。香雅格问我，这件事怎样才能办成。我告诉他，为了开拓未来，我们必须组训青年群众。他问我在这方面我们应如何去。我说，我们在香港必须凝聚一批人作为重新振足的核心力量。我提到顾孟余、童冠贤、张国焘^③、李璜^④、李微尘^⑤和伍宪子^⑥。我提的只是重要人物的姓名。我钦佩顾孟余、童冠贤隶属于顾的自由民主大同盟，然我对童不甚了解。

我原来不认识张国焘，但我尊重他。我知道他曾在中共高层任过要职。我一直钦敬中共党员的学识与艰苦奋斗精神。譬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精神是值得钦敬的，对张国焘也可作如是观。我不清楚他脱离中共的原因。

青年党党魁李璜是同台湾当局对立的。我没有提及青年党另一位领袖左舜生^⑦，因为他当时靠拢台湾当局。此前我仅同左舜生见过一面，那时他在南京担任农林部部长。

李微尘宣称他是无党派人士，但被人当作民社党党员。许多人说他是党员，他都否认。他中英文俱佳。

伍宪子是民宪党主席。

香雅格博士问我卡逊·张会不会来。我说：“我相信他会加入。”当时张君勱^⑧在印度。

香博士问我对许崇智评价如何，许是他的老相识。我说许崇智是个好人，上海“陷共”前许氏离沪来港。许也有个组织^①，名律师赵冰是主要成员，那也是反共又反蒋的团体。曾任国民党中央执委的湖北人方觉慧^②是这个团体的智囊。

香博士提议让许崇智来一起商谈，我说这是个好主意。

我想，香博士原本只是来香港探望我的，虽然我直率地拒绝了组织游击战的建议。作为一个军人，我仍然坚持要组建新生力量，此后外界称之为“第三势力”。我认为，美国人挑中了我，是因为我身份地位超过一般的流亡人士，港英当局对我相当礼遇。

遵照香博士的建议，许崇智与我在尤金·王的寓所共进午餐，顺便聊天。香博士是个十分谨慎的人。他说：“回到美国后，我会走访华府。也许我能见到一些要人，如果他们问我在香港有没有见到你俩，我不能说我没见过。他们会问我，既然中共‘攫取’了整个大陆，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倘若反共大业开展有望，我会写信给你俩。”香博士回国述职去了。

我没有把同香雅格的会晤情形告诉顾孟余等人，在尘埃落定前我不想讲出去。一段时间过去了，香博士杳无音讯。许崇智一次又一次问我美国人有没有联络我，我答没有。

有没有任何别的美国人就大陆问题接触过我呢？记得有个美国要人来香港，他想在酒店会晤我和顾孟余。我俩拒绝了，因为酒店里记者云集、不易保密。我俩提议在美国驻港总领事馆会面，不巧那个美国人再也排不出时间，然而顾孟余还是在邹安众^③家里同他见了面，我知道谢澄平等人也在场。

此时，我得知美国人正在资助蔡文治的活动。一天，我的故乡青化乡新岭村的邻村一华屋村的远亲华秉钺来看我，抗战时在柳州（四战区长官司令部）他做过我的副官。



涂思宗

他告诉我，他参加了游击队。我问，他和谁一起打游击。他说，他是涂思宗委派的。我问他，游击活动由何方资助？他说由美国人出钱。我问他，美国人的财政援助交付给谁，他答，蔡文治^④。

我猜测香雅格博士回美国后见到了一些政府要员，因为他离港几个月后，有个美国人^⑤上门拜访我，还带来了香博士一封信。此人我从未见过，他说他并不代表美国政府但他代表美国人民。他能讲几句国语。他在中国住过很久，来香港也有段日子了。他是个生意人，但我认为他在香港还负有其他重要使命。我估计他有斯堪的纳维亚（北欧）血统，他大约50岁。

他说他想带两位刚来自美国的客人来见我，他俩将长期负责同我联络。他俩同样不代表美国政府，而是代表美国人民。总之，没有一个美国人会承认他代表着美国政府。

我拒绝单独会见那两个美国人，我说我必须偕同许崇智一起见客。他们说：“您是我们的联络对象，香博士的信写明由您独自收启。如果我们会见许崇智，我们将会做错事情。”我说：“香博士上次是同时会见我与许崇智的，如果我单独会见你们，岂不是出卖了许崇智？”许崇智在北伐时曾是我的长官^⑨，我坚持要让许崇智加入我们的讨论，那个美国人最后同意了。

蔡文治的自由中国运动海陆空军总司令部组织与人事表

名称	基地	负责人	训练科目	绩效
总部	茅崎	总司令蔡文治（化名吴定），副总司令黄秉衡（孙复刚），参谋长杨子余（黎东明）。第一处 ^⑩ 主管人事与训练，处长谭彼德；第二处主管通讯，处长林湛；第三处主管敌后，处长陈伟连；第四处主管事务，处长贝健白		训练了千余名极端不满台湾而钦慕蔡文治的军人，做了一些敌后情报与策反工作
军政干部训练学校	塞班岛	校长贾克逊海军上校，副校长西门氏中校与王之（石心）。办公厅主任陈应鸣，政治部主任朱立克，教官20人，译员8人	马克思主义批判、爆破、射击、空投知识、游击战术	先后办两期，第一期学员127人，第二期182人
作战学校	茅崎	校长林湛（文鼎贵），副校长丁一明，教育长威士第少校	游击战，地下战，政治战，心理战，战车驾驶、跳伞	共办三期，学员共305人
通讯学校	茅崎	校长刘永昆（柳元），教育长彼得史少校	电学基本原理、机务、收发报、明密码、实地通讯	共办三期，学员共202人
仓库与劳动学校	冲绳岛		仓库系储存物资器材，劳动学校系犯规学员集中营	曾囚禁200人
香港工作站	办事处设于九龙西洋菜街一书局和白加士街×号三楼	站长赵万邦，副站长马大卫，总联络官丁孝元。第一组管总务，组长欧阳康；第二组管人事，组长张兴华；第三组管军事，组长温靖，第四组管情报，组长徐富嘉		组织庞大，干部罗致千人以上，在大陆设6个游击军区，共23个纵队及8个直隶大队的游击武力。西北区司令蔡雨时，华南区司令黄秉衡兼，华中区赖少堂，东北李刚，西南区司令雷默然，东南区温靖兼

我找了尤金·王做翻译，许崇智也是他父亲的朋友。我俩赴王公馆的午宴会见那两个美国人。我们选择王公馆是因为地处乡间的寿臣山。^⑧

那两个美国人是何方神圣呢？其中之一我是认识的。战时驻扎在昆明，是陈纳德将军麾下志愿援华抗日的飞虎队空军上校，后来是南宁空军基地的主官。要知道，对美国人来说，上校军衔是很高的。他此行负责同我们联络，有决策权。另一位是个年轻人，才三十来岁。

许崇智与我开始同这两个美国人谈话。他俩问我俩，谁是香港的民主人士，应该做些什么，美国人民应该怎样帮助我们。我说，我们必须把（反共）活动扩展到海外去。我把上次同香博士提到的人名重新讲了一遍。他俩问：“你能否邀请上述人士聚会座谈？”我答应了。他俩似乎疑云满腹，问我：“你能请来顾孟余和张君勱吗？”我说除了张君勱，其余人现都在香港，我告诉他俩，张君勱一定会来香港的。我要求他俩会见顾孟余等人。他俩说不必了。许崇智说，他会拟订一份工作计划书。

筹备工作

这次晤面之后，我告诉顾孟余，美国方面派了两个人来见我和许崇智。我建议召集筹备会议，他同意了。

于是我们开了一张与会者名单。我着重那些已向美方推荐的人。没人同意左舜生加入。

我们不知道美国哪一个部门在支持我们。我现在也不知道因为美国人只是说他们代表美国人民。我们对他们的认识仅限于此（战盟与自由中国运动都有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东京盟军总部的背景），所以我们宣称我们代表中国人民。我同顾孟余等人讨论过这一点，决定以后不再穷根究底。我猜想我们是同民主党打交道，因为那几个美国人不喜欢支持台湾当局的人。他们喜欢反共的民主人士，至少不是蒋先生的支持者。设若我们高举反蒋的旗帜，他们会更为满意。

那两个美国人不想会见顾孟余等人。另一方面，顾孟余等人也认为他们没有必要去会晤美国人。他们认为，在组织正式成立前，不宜暴露自己，仅我与许崇智去会晤美国人就够了。刘震寰^⑨常来拜访我，也见许崇智。刘的叔叔是老同盟会员（刘古香）。他想同我们合作，常常谈及如何致力于救国。有鉴于1923年至1925年刘震寰、杨希闵统治广东那段时期的劣迹，我和许崇智都很鄙视他。

许崇智和我第二次会晤那两个美国人仍安排在尤金·王寓所。许崇智递交了我们拟订的计划，美国人说他们会加以研究，称他们无权对此作出决定，必须提请美国人民核准。最后，他俩要付钱支持我们的活动。^⑩我表示抗议。我说我们不需要从他们手里拿钱，我必须为了国家表明我们的立场。我说：“坦白讲，我们有能力筹集款项资助反共活动。”那是正确的——我们自己有本事在香港募集三十万港币。我告诉美国人，俟将来我们的团体站定脚跟，我们会向美方告贷，到那时银码会不小。

会后许崇智对我大发雷霆。他问：“你从哪里、用什么方法可以筹到三十万港币？”我是秉持国家民族的观点，而许只是持着实用主义的观点。^②于是我们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他倚老卖老仗势欺人，因为他与蒋先生同年。他用粗口辱骂我，他说既然美国人肯出钱，为什么我们不收钱。我再次向他耐心解释此中原因。从此以后，我不再是他的下属了！

那时我们每天召开筹备会议。有一次，许崇智解释说，他有困难，因为他背着包袱，意谓他原来的小组织（太平洋政论会）。他说他不能不服从他的组织，他需要钱。其他人认为他反动，会议就不欢而散了。

整个事情是复杂的。许崇智的观点是太老旧了。他以为他凭年龄与资历有足够资格来统驭我们。这个老军头的头脑里充斥了陈腐的观点，导致在座的德高望重人士对他鄙夷不屑。顾孟余表示，如果许崇智加入这个团体，他就要离开。许崇智想开倒车，他还想当我们的领袖。我问顾孟余，倘若让许崇智走开，他肯不肯留下。他同意了。

许崇智与李璜之间的观念分歧是很尖锐的，李璜也表示倘若许崇智留在团体内，他就不加入。李璜说，许崇智的思想停留在五十年前，他不认为许能同我们合作，他开玩笑说：“我们的观念已经落后了，许崇智的观念则大大落后了。”张国焘与其他人都认为我们不可能与许崇智合作。于是，许被我们斥退了。

我告诉美国人，我们不缺少许崇智这个人。他们说：“第一次会面时，是你提出让他加入的，这不是我们的主意。我们坦率告诉你，你也可以查阅一下香博士的信，只有你，而非许崇智才是我们联络的对象。第三势力是你的婴儿，如何抚育他长大同我们无涉。从今以后，我们将直接找你谈。”我说：“好吧，我们继续合作。”

早期的重要成员

可以说，香港的自由民主人士加入了第三势力。顾孟余不顾他从李宗仁手中拿过二十万港币开办费，毅然解散了自由民主大同盟。他撂挑子了，因为他发现大同盟中的成员不是为革命工作，而是专营私利。他发现那伙人行为不检。他把自己认为品行端正的成员带到了我们的组织。

在我们努力下，有一些群体加入了组织：国民党的前党员，如我本人、顾孟余、童冠贤、周天贤^③、黄如今^④和任国荣；然后又加入了民社党的王厚生^⑤、罗永扬、刘裕略^⑥和伍藻池；青年党有李璜、刘子鹏^⑦、谢澄平^⑧等。青年党的何鲁之^⑨他仅出席过一次会议，然后他说他太老了不能再出席，也不能做什么事。此外，他想访问台湾。我和他谈过两三次，此后再也未见到他。

青年党的翁照垣^⑩也加入了，但他要求我们为他保密，他要求别告诉青年党。翁照垣是青年党的英雄。他告诉顾孟余和我们中的一些人，他正协助美国政府从事情报工作。我对他颇了解，他是个可靠的人。虽然我不知道他具体做些什么，但绝不是以在大陆打游击招摇撞骗的人。我们团体没有分配他做什么工作，

后来他去北婆罗洲经商。等他因病回到香港时，我们的组织已经解散了。

我们的组织也包容了曾是中共高干的张国焘与龚楚^⑧，还有其他人，但都属于中共等级制中的低层次人员。张国焘是唯一的中共最高层干部，龚楚属于次高层。

第三党（又称农工党）的代表是丘学训、李琳，民宪党的代表是伍宪子。

我们知道李宗仁有他自己的组织，但内情不详。我们没有要求李宗仁加入我们的组织^⑨。

我们没有一位领袖。在民主运动中，人们不能坚持要自己充当领袖，他必须在众人拥戴下才能成为领袖。我们决定同李宗仁仅仅是保持联络，这种个人之间的联络由我出面，因为他常与我通信。每当我收到他的来信，我就给成员们传阅，阅后收回。

我们想邀请李宗仁去东京开会，黄旭初^⑩正在那儿。黄旭初不是我们组织的成员，但我同他保持私人的通信联络。他去日本是为了避免他往昔部属的无度需索。

程思远是我们中间最早的反共者之一，他本来是立法委员，所以一直同童冠贤院长联系。他属于顾孟余的派系。我们推举他为团体的秘书。

桂系加入的人还有广西省政府原民政厅厅长张威遐^⑪、林茂^⑫，还有李新俊。他虽不是广西籍人氏，但在省政府做过事（1948年10月至1949年任广西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

我们同友联那帮人也有联系。友联派其创始人之一陈濯生^⑬同我们合作。我们每月补助友联机构一千元。顾孟余认识友联那帮子人，陈濯生敬重顾孟余。我们都知道经援友联这回事。

陈濯生还不是我们的正式成员，并不出席我们的会议。我们感到友联那批人值得我们崇敬与支持，那是一群非常勤奋的青年。他们在新界地区运作，搜集大陆情报。他们掌握的许多资料是我们需要的。可以说，友联机构起了我们的“视野计”的作用。

我们同友联在一些原则上形成了共识：自由与民主，反对独裁统治。

我们常常召集会议讨论组织问题。人们通常在我的寓所聚会，因为港英当局对我十分礼遇。在香港，建立政治组织是犯法的。但是我认识香港警务处处长麦景陶，当年他官式访问广州时，我是国民政府主席广州行辕主任。在那段时期，我本身也访港三次。麦景陶非常敬重我。1949年，他特准我携枪迁居香港。

我对美国人说，我希望他们会见核心成员，因为我只是个军人，在组织工作方面并非内行。此外，设若美国人不肯会见他们，人们可能以为我一手遮天。我说，如果他们拒绝会见核心成员，我不能再干下去了。我也告诉美国人，我不希望尤金·王继续担任我们之间的传译工作，我察觉他对这份工作不大满意。他们同意了。我指定麦国珍上校——我在四战区当司令长官时的英文秘书之一——继任译员。

我们的团体遴选了九位成员去会见美国人：顾孟余、童冠贤、张国焘、李璜、李微尘、伍宪子、黄如今、张君勱（还在印度）以及周天贤。在我寓所中，我把他们一一介绍给美国人。美国人说，他们代表美国人民请教我们，怎样才能有效地帮助我们。他们还鼓励我们组织起来，勇往直前。

张君勱仍滞留国外，但他同我保持联系。他说他同马歇尔元帅有深交^④，并欲透过马歇尔同美国政府达成更佳的协议。我们期望马歇尔会帮助我们。我们请教美国人，我们是否可以直接派人去美国洽谈。美国人说，倘若我们能直接同美国政府接触，那可是个好主意。我们召唤张君勱回香港，言明我们要派他去美国。他同意了。换言之，我们期望他去美国从事外交工作。

组织方面的困难

1952年3月中旬，张君勱回到香港。如前所述，美国人不相信他会回来，然而他来了。我带他去卢先生的浅水湾寓所会见美国人。

张君勱在香港逗留了两星期，其间我们经常召集会议，修订与润色我们组织的文件，组织名称叫“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我们通过了同盟的宣言与组织纲要，这个同盟自然是政治性的组织。

张国焘为同盟草拟了不少组织规章，因为我们需要共产党的组织精神。在筹备阶段，童冠贤与李微尘草拟了同盟的组织大纲。张君勱是起草同盟宣言最着力者（原注：《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宣言》原件由张君勱用毛笔写成并签署，有25页），他在草案上签了名。既然我们同张君勱一起签署了《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筹备期间之组织纲要》（原注：签署者有张君勱、张发奎、童冠贤、顾孟余、张国焘、李微尘，原件用钢笔写成，有6页）、《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公约》（原注：六人签署，原件用钢笔写成，4页）以及《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生活公约》（原注：同样由六人签署，原件用钢笔写成，4页）。为什么童冠贤、顾孟余、张国焘、李微尘和我没有签署这份宣言呢？张君勱签了那份宣言就走了，我们仅仅是忘了签署。

张君勱立即离开是因为急于赴美，他参加了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中华民国”代表团。

张君勱建议在他抵达美国之前就发表这份同盟宣言。张对美国之行的成果深具信心，但我们觉得准备工作尚未就绪，发表这篇宣言的时机尚未成熟。

顾孟余认为，以建立组织与鼓吹（反共反蒋）来代替少数可靠同志之间的精神合作尚为时过早呢。顾是最谨慎小心的。

从一开始，顾孟余同张君勱就意见不合。他俩情绪化地成为对立面，顾孟余在存疑的细节惯常是小心翼翼的，他对条件成熟之前成立正式组织抱有戒心。在另一个极端，张君勱则过于自信。

最重要的分歧原因是张君勱甩不掉他的包袱，那就是民社党。当孙宝刚等民社党员出走并且反对张君勱时，他提出了“毁党组党”的口号。他说要解散民

社党，重组一个新党，但他一事无成。他绝不甘心断绝自己同民社党的联系，说人们都知道民社党主要是由他的学生们和亲戚们所组成的。

顾孟余和我都是国民党员，但只能算是失联党员。在1950年，我们同盟中没有任何人遵命办理国民党员重新登记。张国焘被中共开除后也算是无党派人士了。第三党（农工党）的党员也是如此。仅剩下民社党还存在着党组织。顾孟余认为这一现象拖慢了我们建盟的进度。

张君勱同顾孟余早先没有交往。美国人对顾孟余的重视远甚于张君勱。他俩都是学者，然美国人似乎不太看重张君勱。

李璜突然退盟，理由是“家庭责任”^④。那时他为香港油麻地小轮公司总经理刘德谱服务，月薪有1000港元之多，他还在其他公司兼职。他说，他同情我们但他害怕加盟，因为香港政府的管治十分苛严^⑤，他只是为稻粱谋。

我告诉其他人不要担心。我告诉他们，对英国人要顽强些。我说，我会对一切后果负责。要知道，我们已经同美国人作了一项秘密安排，一旦形势危急，我们中间的八九个人可以避居菲律宾。

美国人想在文化宣传活动方面援助我们。顾孟余是从事这一类合作的最佳人选，他的小组织早（1950年4月1日）已开始出刊《独立论坛》。美国人要求我通知顾孟余扩大他的活动，还允诺给予财政援助。我告诉顾，他同意了。我们每月津贴独立论坛8000元港币。

张君勱要求我们支援他办的刊物《再生》，该刊由王厚生负责。我们同意每月津贴港币6000元。

我们计划在香港创办一份报纸，但美国人认为行不通。他们认为将资源集中在几份期刊更适宜。所以我们创办了《中国之声》周刊，由张国焘负责。这本刊物的预算高达每月1.8万港元，创刊于1951年10月11日。

我们还创办了期刊《华侨通讯》，由罗吟圃负责，每月预算是港币8000元。

我们耗费港币五万元收购了嘉罗印刷公司。美国人问我们每月需要多少经费。我们答道每月约需美金一万元。这笔钱我们可以自行分配。他们用美金现款付款，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办法。他们把钱交给我，我交给顾先生，让他开具收据。顾先生很谨慎，决定让不同的人分管现金与账簿。邹安众被指定负责账目，卢衍明负责管理现款。由他出具收据交付美国人，然而我们不必向美国人说明怎样支配这些金钱。

卢衍明是一个生意人，住在浅水湾。一开始就由顾先生介绍加盟。顾先生隐居在他那九龙塘寓所，他有两个住所，一个在香港，另一在九龙。

不久，谢澄平退盟了。他是《自由阵线》半月刊的负责人。他开出条款，要担任同盟的秘书长。顾孟余说我们不能接受任何需索，于是谢澄平离开了。我们感到人才济济，财力丰沛，所以不在乎。

……

我们设立了一个执行委员会，由张国焘、顾孟余、张君勱、童冠贤、李微

尘、伍宪子、伍藻池、任国荣、周天贤、黄如今和我组成。其中三人组成常务委员会：伍宪子、顾孟余和我。

会议决定，今后同美国人接触限于同盟中央常委会三名常委。美国人认为此事有助于保密。换言之，我们三人可将其他人的意见转达美方。当讨论一些特别事项时，其他成员偶尔有机会见到美国人。例如，李微尘会晤美国人讨论过文化宣传方面的事。

我们三位常委每周至少在我寓所会见美国人一次，有时两次。通常是两个人都能见到，有时我们只能见到一个美国人。有时他们离开市区或者正好休假。回忆起来我们卷入此事不止几个月，长达两年多。我会见退役上校的次数要比那个年轻人多。

常务委员不是经选举产生的，谁可以出任同盟中央常委，谁可以主管一个部门，通常是由顾孟余说了算数。同盟的组织纲要中没有规定设立同盟中央常委会这一核心机构，这是在会议记录中敲定的。会议记录只有一份，当然，不需要多份，我们都签了名。我负责保管会议记录，所有的文件都保存在我寓所，因为警察不敢进入我的居所，那就是他们要我担任同盟中央常委的原因之一。

每一位中央执行委员每月可以领取津贴港币 1200 元，《中国之声》负责人张国焘可领得特别津贴，顾孟余、张君勱和我三人分文不取。虽然张君勱本人不受薪，但有人为他治装以及支领赴美的旅费。

我们设立了以下部门：组织部，部长任国荣；财政部，部长邹安众；政治部，部长周天贤；军事部，部长邓龙光^⑧；华侨事务部，部长韩汉藩^⑨；宣传部长黄如今。李微尘出任同盟的秘书长。

各部门的部长月俸为 600 港元，副部长 400 港元。同盟的秘书当然也受薪。总计同盟每月支出要 8 万港元，相当于 1.4 万美元。这个预算金额是同盟中执行委员会议定的。

有一天，美国人告诉我，伍宪子去了台湾。他们说，从情报系统得悉此事，问我们是否晓得。我十分惊讶，乃询问伍宪子的家人。对方说，他去了澳门。后来，台湾报纸披露了他的行踪。

我将此事告诉顾孟余，他对我们三位最高负责人中有人出此下策感到失望。伍宪子在台湾逗留了两星期。回港后，他打电话探询我是否有时间去看他，因为他有要事告诉我。见面后，他问我是否知道他去了台湾。我说当然知道。他解释道，他去台湾原本只想逗留一日，旨在请蒋先生给他签发赴美国的护照。到了台湾，蒋先生说他要到台南，要伍找（“行政院”前院长）张群、（“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和（“中央改造委员会”秘书长）张其昀。蒋先生说他几天之内就会回台北，所以伍宪子就等着，然后台湾方面有人要他留下过双十节^⑩。我们觉得伍宪子背叛了我们，便把他开除了。^⑪

我们需要守秘

同盟的成员有二三百人，入盟必须有两位盟员介绍。在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

完成审查批准申请后，新盟员要签名。我不会会见那么多盟员，但是我查看盟员名单。

盟员中多数是知识分子，许多人是教师，其中还有些学生。我们从大陆（流亡者中）吸收青年。其中有些人本系军校学生，也有些工人，他们渴望打回老家去。盟员中也有一些生意人。多数盟员是自立自给，不需补助。大多数人在大陆任职于国民政府或从事教育工作。我们遵照组织纲要第十一和第十二条规定，在工人和学生中建立了小组。他们是同盟的基层干部。

小组是按照地区来组织的，在新界居住的人们不方便来市区开会。会议通常在夜间举行，因为多数盟员在工厂做工，在学校教书或上学。如果在一个特殊地区有三个盟员，他们可以申请成立一个小组，其中有一人任组长。小组成员不超过十人，当成员增加时，一个小组可以拆成两个小组。光是香港一地就有十多个小组。小组开会时，盟员们会畅谈他们的抱负以及工作进展。

我们并不组建基层细胞，我们本来就是从最低最基层开始的。我们原来计划在同盟达到一定发展阶段时布建细胞，但达成这一阶段前，同盟已经解散了。

同盟的成员对内部组织了解程度很有限，小组成员只知道组长是谁，连上一级的负责人姓名都不知。组长只知道他所隶属的地区负责人，地区负责人则是向组织部部长负责。同理，从事军事工作的人仅仅向军事部部长负责。换言之，组织是垂直单线的，在较低层次的不同部门并无横向的联系。这样，一旦有人被捕，他不可能暴露整个组织。人们必须牢记，同盟是一个地下的秘密组织。同盟的成员只知道同盟的名称以及最高领导人姓名。

我举出一个我们欠缺保密观念的例子。张君劭在香港时，港府警务处政治部向他下达三张传票应讯。通常第一张传票是在被传人应讯前一日颁下的，设若不理它，第二张传票会在次日下达。我劝告张君劭别理它了，反正他快要去美国了。

第三次传票下达也不应讯后，港英当局搜查了张君劭居住的妹妹家。我打电话给警务处处长麦景陶，保证张君劭那天早上就已离开香港了。

那时谁见了我都要按规定向政治部报告。陈济棠的哥哥陈维周^⑨在香港住了十多年，一直无须向政治部报到。有一天他来看望我，我们聊了一下。第三天他收到传票，要他向政治部报告谈话内容。有人告诉我，我住宅的电话被官方窃听了，我不相信。麦景陶对我发誓，那是谣言。

政治部没有同我（直接）接触过，它不敢！政治部的侦察部门有次派一个探员找我，通知翌日上午十点半应讯。这名探员竟是我昔日的下属，他解释道，他不能抗命不来我家。我致电麦景陶，他马上电告侦察部门声称，即使他本人也不敢贸然传讯我。侦察部门负责人说，他仅仅是问问我十点半这个时间对我是否方便。这些内情都是孟世光告诉我的，这位警务督察奉麦景陶之命，在麦与我之间担任联络官。麦景陶对我说，如果发生不顺心的事可以立即找孟世光解套。我确实未去过警务处政治部。毕竟，他们若想见我，可以上门

或者打电话来。

我们的影响力逐渐扩散

我们想在海外华侨中开展我们的运动。我们派遣了李新俊去北婆罗洲推展活动。他伪装成新教的传教士，我们付酬给他家人协助他工作。他在中华中学执教，还经营山打根日报。他现已退休。伍藻池被派去澳洲。他要求我们派他去那儿，因为在彼邦有亲友。民社党党员周祥光那时在印度，张君劢推荐他为同盟驻印代表。顾孟余的追随者黄天石被派去曼谷。黄是潮州人，去时独身，后来他带了新婚妻子回港。

在海外华侨中推展同盟的活动是困难的。同盟起初在华侨学生中积极开展活动，周祥光在印度任教时，盟务发展甚好。

坦白说，同盟对社会影响力并不大，在一百多年帝国主义统治后，许多香港人的头脑已变得麻木了。同盟没有能力对此辈施加很大影响，但是我们能够对来自大陆的人们产生影响。从大陆来的年轻知识分子确实对我们寄托很大希望。他们希望我们催生第三势力。他们对国民党已失望了，因为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迅速失去了大陆。在另一方面，他们中许多人害怕在大陆上厉行的清洗运动。他们自然转向能领导第三势力的人们，这正如我年轻时转向国民党一样。

我为何肯定我们对大陆来的年轻知识分子产生影响呢？非常简单！购阅民主刊物的人全是从大陆出来的。我还会向你提供另一证明：凡刊登顾孟余或张君劢文章的刊物，销售量都特别高。我们津贴或出版的四种刊物，平均销量为每期约2000份。哪一期《中国之声》杂志若有顾孟余或张君劢的文章，我们会印3000本。

每期2000本中，在香港出售的大约有1200本，其余则销在海外。我们刊物的读者对同盟了解很多，他们不知道同盟的组织情况，但他们知道有组织存在，他们尊敬同盟的领导人。张国焘与张君劢没有做过大官，所以没有被国民政府的贪污丑闻牵累。就顾孟余而言，虽然他做过铁道部长，但他未贪污过。

渗透大陆的努力

军事部负责组训同盟中的一些成员。我们有些年轻人被派遣到大陆做地下工作，他们都是志愿者。他们相信自己有本事得到自由进出大陆的旅行证件。

在那时，人们已经需要旅行证件了（在1950年前，华人出入香港是无须持有官方凭证的；在20世纪30年代前，华人去日本、欧洲都不携护照）。有些人回到大陆投考中学或大学，我们提供经费，他们从事情报工作。

我们派遣了多少青年去大陆呢？统计数字各异。我相信，不管我们第三势力能否搞出些名堂，美国人最重视的是搜集大陆情报。我相信，我们从美国人手中得到的钱是编列在特务经费预算项目上的。

有些青年忠诚地执行了他们的工作任务，另一些人则相反，他们根本没有返

回大陆，而是滞留在新界。他们简直是捏造情报报告。事情终究要露馅，因为有人看见他们在新界。⁵⁹

究竟诚实的人多，抑弄虚作假的人多呢？后者较多。例如，美国人希望了解广九铁路沿线共军的部队序列、人数、番号以及指挥官姓名。我把任务下达给军事部。该部派人进大陆侦察，不料此人待在香港胡乱编写情报。他经我们把情报交给美国人后，对方说全是假的，因为他们早已知悉，报告中所提到的一支特种部队那时正驻扎在东北。

还有一个例子，有个无线电报务员被派去广东省侦察。美国人相当聪敏，他们自己经营一个电台，同我们的报务员交换信号，于是美国人发现，此人正在香港水域蒲台岛附近的渔船上发报。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想涉足情报工作。那时我见过一位姓吴的华侨，我想他是在美国驻港总领事馆任副领事，从事政治工作的。他对我比较坦率，他说，希望我帮他物色一些人从事情报工作。我未曾答应这一请求。我感觉90%的情报是假的。如果我接受假情报，我必然会发出假情报。这就是美国人一直对我印象良好的原因：我从来不对情报工作怀抱信心，也从不声言在大陆拥有游击部队。抗战时我统率四战区，早就见过情报人员炮制情报的事，这一诡计竟沿袭到了香港。

龚楚从大陆搜集情报，我初次会见那两个美国人后不久，他们问我是否能派20至30名无线电报务员去日本冲绳（按：琉球群岛最大岛群，在西太平洋，自东北至西南延170公里）受训？他们说，最好是单身人士，但如果够格，年轻的已婚者也可以吸纳。在香港有许多受过训练的无线电报务员，其中有些人在大陆上当过通讯兵，有些人一直失业，还有些人在渔船上充当报务员。许多年轻人流亡到香港，深感前途渺茫。我们花了些时间去组建这支通讯队伍，我们派出三十多人去冲绳岛，其中有些人已婚。他们被高薪所吸引——大约月薪150美元。这伙人随后被派往日本茅崎⁶⁰，当时仍在美军占领之下。

然后，我发觉，这两个美国人同蔡文治有着联系。虽然我已知晓蔡文治在美



老年蔡文治

方支援下正在对大陆开展游击战争，但这一切对我来说是新奇的事。事情是这样曝光的：一天，美国人问我是否认识蔡文治。我说我当然认识他，他是陆军大学毕业，当过何应钦任陆军总司令时的陆军总部第三处处长，当时我在第二方面军任司令官，他的地位比我低得多了。美国人说蔡有一位驻港代表。他们问我是否愿意见一见他，问题便是这样提出来的。我感到很困惑。美国人正在帮我们搞组织，为什么他们又突然扶植蔡文治？最后我答应了，我说愿意见他。他们告诉我，此人将会在某个夜晚来拜访我，我说好吧。

一天晚上，那人出现了，他竟是我熟识的黄秉衡^⑤。我说：你此着错极，我们相互很了解嘛，为什么需要美国人出面向我介绍你？为什么你不敢独自来见我？事态已发展到黄秉衡出任蔡文治驻港代表，正准备在大陆开展游击战争。他给蔡文治驻港人员发薪，出任这个团队的主官。蔡本人在冲绳岛，业已吩咐黄秉衡同我们建立联系。黄秉衡告诉我，他们同这些美国人已经挂上了钩，我感到我们同蔡方是一鼻孔出气的。

蔡文治去过美国，他的英语甚佳，他能直接同美国人交谈。

黄秉衡没有拜访我们同盟的其他人，他不想见其他人。他很胆怯，当我在电影院中撞见他拍他脊背时，他只是露出平静的微笑，马上走开。他常常戴墨镜。自然，我由于在香港地位优越，我能够随心所欲。



黄秉衡

蔡文治很有礼貌，他说，派黄秉衡来拜访我是要告诉我他正在做什么，而且他十分希望我们站出来领导他们。

美国人很希望我们同蔡文治合作，蔡既反共又反蒋；我们则既反共又不支持蒋。杜鲁门政府的政策是支持反蒋又反共的人士，也支持反共而至少不支持蒋的人士。

我们同蔡文治合作，因为他反共反蒋；我们对台湾当局不满，我们反对独裁统治与极权主义。蔡文治要求我们派人去冲绳担任他的秘书。顾孟余派了胡越^⑥，他是友联机构成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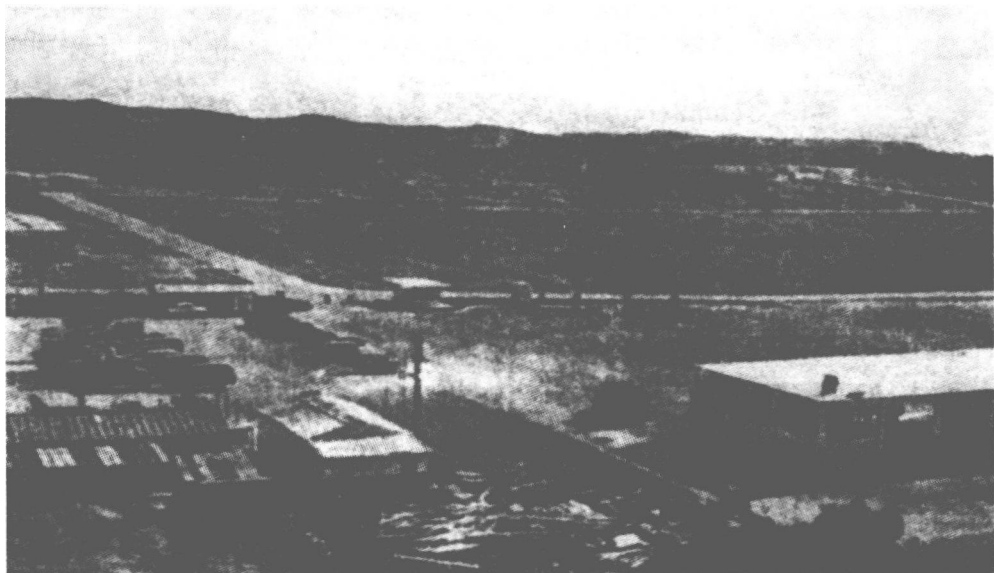
我向美国人建议，除了无线电报务员，我们应该派遣优秀的青年军人与知识分子去冲绳岛受训。有些从大陆逃出来的中学毕业生不想去台湾。我向美国人解释，美国在远东地区是需要帮助的。当一支部队训练完竣后，倘若我们要反攻大陆，那就能派上用场；倘若不能反攻，只要这支部队维持下去，它仍然能在东南亚地区协助美国。那里有许多华侨居住。美国人接受我的建议，同意提供政治训练。在训练期间，每位成员可以支领月薪 100 美元以上。美国人规定受训者必须是未婚人士。

童冠贤负责考核盟内其他人士推荐来的年轻知识分子。廖秉凡^⑦负责对青年军人的考核。他俩审查对方的思想以确信来者不是共产党渗入的特务。大约 80

名青年被送去冲绳岛，其中包括邓龙光的侄儿和我以前的英秘林定宇。其中有一些是技术人员。有一个我过去的卫士被派去接受驾驶训练。这些年轻人来自全国各地。

到达冲绳之后，林定宇见到了我任广州行辕主任时的副官之一余鸣皋，他正辅佐蔡文治。虽然名义上由蔡文治负责整个冲绳训练项目，但实际上财政、训练等一切都由美国人主宰。

美国人要在香港寻找一批东北籍青年，以便训练后空投东北从事情报工作。蔡文治叫黄秉衡在香港招聘志愿者。许多青年被优厚的待遇所吸引，冒充是东北籍人士同意受训后空降回乡。其中没有一个是招募的，我深信其中甚至没有十个人真系东北籍，他们多数是南方人。这批人被送去冲绳岛受空降训练。



“自由中国”运动冲绳岛驻区

黄秉衡告诉我，在大陆潜伏的游击队将响应他们的登陆行动。他不仅提出此类主张，还向我出示大陆游击单位的组织图表及首领名单。于是我知悉涂思宗^⑧负责广东省的游击作战，刘震寰负责广西^⑨，梁国齐与华秉钺皆隶属于涂将军。

他们给予美国人一种印象：地下工作已经在广东全省布建。美国人认为，既然确有其事，他们将派遣空降部队与无线电装备去获取情报。美国人太天真了！在我心目中，我知道蔡文治所声言的一切都是虚假的，但我不想说穿它。我对黄秉衡或美国人都没说些什么。

涂思宗来看我。他要求我吩咐黄秉衡给他增加经费，他知道我说话管用。涂有些下属原来是我率领北伐第四军（铁军）时的老部下，涂也知道华秉钺在我麾下做过副官。他说有三百多个游击队员在青化乡作战，我知道实无其事，华没有一兵一卒在那儿作战。我记得国军撤离广州前，我拨给华一百多支枪，多数是

来福枪（步枪），要他在我故乡组织游击队。

华领了枪械，组织了农民游击队。当共军进驻我家乡时，他干不下去了，就将枪支埋藏地下，同他哥哥一起逃到香港。但我不能说穿这事，因为涂会炒华鱿鱼！故我假装不知情。接着，华秉钺告诉我，涂正要派遣他与其他游击队领袖去冲绳岛接受美国人的空降训练。

涂思宗口中的其他游击队都是不存在的单位。我也知道，刘震寰所称尽皆虚妄，他在广西没有一兵一卒。涂思宗欺骗蔡文治，蔡又欺骗美国人。涂思宗仅仅是想混饭吃，黄秉衡也是如此。他们只是想骗过美国人。在每一级都存在着欺诈行为。天真无邪的美国人竟认为那一切都是真的呢！他们说，他们会支援的。于是，那些家伙编出各式各样的谎话以骗取美金，那是一个大骗局。

由于美国人过分天真，我们的年轻人空降到大陆去打游击了。这当然是他们自己作出了错误的抉择，他们志愿空降大陆打游击战。为了谋生，他们什么也敢答应。但当空降行动启行前，他们逃跑了，他们心里明白：末日来临了。例如，有一个原在中央政大求学的山东人，攀越训练营的电网。很幸运，他会讲广东话。逃到横滨后他去一家中国餐厅吃饭，讲广东话，慢慢向人打听怎样能回到香港。他回香港后来看我。于是我知道了，秘密是怎么泄露的。他告诉我，美机从茅崎基地起飞。受训者必须出发，因为他们拿了人家的钱。

正如我已说的，美国人对我的军事才能深具信心，相信我有本事在华南地区凝聚民众支援。然我告诉美国人，别相信那些人的话，那都是谎话。如果我想做，我一定已经骗了美国人好多钱。证据是，蔡文治事实上已经从美国人手里拿到好多钱。我的处境与蔡文治不同，因为我拥有国际知名度。许多人知道张发奎的大名。他们知道我为国家效劳，永远不会无视国家利益。但蔡文治不同，他做的一切事都是为了美元。

邓龙光介绍他的粤西南同乡陈深来见我，此人行伍出身，一直升到邓龙光的三十五集团军师长高职，一直跟随邓龙光。陈深是三十多名青年的领袖。他声称只要他和他手足能回到粤西南，他一定能成功地发动游击战争。他说，他能征召三四十个粤西南的流亡军人。这些人原本部是他的旧部。这个诚实的陈深坦白告诉我，与其饿死在香港，他宁可回老家战死。

我向美国人报告了陈深的事。我说，陈深愿意回乡打游击，苦无武器与船只。美国人说：“我们会援助他的。”雇一艘帆船载陈偷渡回大陆，在当时谈何容易！最后，我们买了一艘船，又租了一艘。陈深召集了不少粤西南同乡，他的游击队终于扩大到七十多人。他们住在一所牧场，小规模地接受训练。教官教会他们，一旦船沉了如何自救。

军事部成立后，陈深隶属于它。他与部众一致认为准备就绪，但缺乏军事装备。美国人说他们会在适当时候交付武器。他们会派一艘船在国际水域同陈深的部下碰头，陈深的部下接收武器后就向粤西南进发。

战士们集合在蒲台岛，领取了食物与大陆钞票，其中有些是假钞。在一场暴

风雨中，他们出发了，但是美国船没有按照约定时间在公海出现，他们不得不返回。

他们作了第二次尝试，但其中一艘船在抵达国际水域前被香港水上警察截捕，另一艘得以逃脱，陈深在另一艘船上，那是租来的。他在新界西贡上岸，即向我报告。

港英当局想把俘获船只上的人们递解出境。我们担心他们会被遣送到台湾去。于是我们同港府谈判，表示倘要驱逐出境，就撵到澳门去。英国人给我面子，释放了所有战士也归还了装备——麦景陶从中帮了不少忙。

美国人吩咐我们卖掉那艘船——那船价钱并不昂贵——用卖船所得充作这支部队的遣散费。那艘船卖了两三万元钱。

除了陈深的流产远征，同盟再没有发动任何其他军事行动。

竞争美援

我同蔡文治联系，我建议他解散他的组织，加入我们的同盟。盟内其他人也赞同这个主意。我告诉蔡文治，对他们说来，光有军事行动是不够的，他们必须成为政治行动的一部分。军人必须接受政治家的领导。既然我们已经组建了同盟，他就应该加入进来与我们并肩战斗。

此时，蔡文治告诉我，他已建立政治组织，那是完全仿效自由法国运动而为。在政治组织下，他组建了军事部门，叫做军事委员会；在军委会之下，设立海陆空军总司令部。未征求当事人同意，他就拟定了军事委员会成员名单，由香港与大陆的著名军人组成。有些人甚至是在台湾的。这张名单是油印的。

我的姓名被列为海陆空军总部总司令，蔡文治自己位居副总司令，兼总部参谋长与陆军总司令。邓瓿——邓龙光的弟弟，刻正在香港——被列为海军总司令，黄秉衡列为空军总司令。请注意，他做这些事从不同人商量。

我说，这样办事是错误的。我叫黄秉衡同我一起到厨房里把这张名单烧了。由于这是油印的，无疑还有复印本。我本人在香港不必担心害怕，我没有任何问题。可是倘若港府拿到这张名单，其他人就会有麻烦了。我问黄秉衡，他住所有没有复制品。他说没有，他刚收到这份给我的。接着他去厨房烧掉了这张纸。我不知道蔡文治的团体里的任何文官，我只见到这张名单，上面写的都是军人。

我们的美国朋友也帮助蔡文治，他们已经把他送去冲绳。事情已很清楚了。但是他们只能做不能说。他们说，援助是来自美国人民，但事到这一地步，很明显，是美国政府所为。否则，那些美国人怎能确信每月这笔津贴能按时发放呢？

我问美国人，他们对蔡文治的组织是否了解，倘若了解，他的后台老板是谁？他们说，他们不清楚这事，组织自由中国运动不是他们的主意，但他们退一步承认，美国人民已经派人去援助冲绳岛上的蔡文治。

我特别反对组织军事委员会与海陆空军总部。美国人问我，是否愿意去冲绳岛参观访问。如我愿意，他们会送我去那儿住三天左右然后回港。很明显，美国

人已经同港英当局达成谅解，因为当我们派青年去冲绳岛受训时，他们无须经过出入境部门办理任何离境手续，蔡文治在香港征募的人员也是如此。

我说：“对不起，我不去！”他们希望我走一趟，因为蔡文治不能来香港。⁹⁹同一时间，蔡的党羽在冲绳散布消息称我很快会去那小岛就任总司令职。他们挂出了欢迎我去就任总司令的标语牌。当然，他们也希望顾孟余去冲绳。

当时英国人当然已侦悉事态的进展。英国人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但他们未插手干涉，因为自日本投降起，我已同他们建立了联系。他们尊敬我。但是，说到底，蔡文治那伙人与我不同。

蔡文治拒绝解散他的组织加入我们同盟。我们盟内的老先生们认为他错了。所以我拒绝出任总部总司令这个职位。不仅如此，我反对海陆空军总部这一组织。为此，我同蔡文治分手了。他认为既然他有美国人支持，就不需要加入我们这个组织。

蔡文治想控制战盟在港的老先生们，以便让他们加入他的“自由中国运动”。他写信给张国焘说，……张发奎是个军阀，是蒋介石第二。他期望老先生们同他合作。收到此信后，张国焘向我出示。张国焘回信说：“你说张发奎是军阀，所以你反对他。你根本错了！他手下并无一兵一卒，所以没有必要去反对他。即使他掌握军权时，他也不是军阀，何况在今日香港他一个兵也没有，怎能成为军阀？”张国焘把蔡文治痛斥了一顿。蔡文治不仅写信给张国焘，也写信给顾孟余。我想，他给同盟内所有的老先生们都写了信。

同盟与蔡文治的组织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鉴于我们不能走到一块儿，美国人对我们与蔡文治是分别予以援助的。可以说，美国人对我们香港的文化运动和蔡文治的军事行动的支援是同步进行的。

突然间，蔡文治逮捕了胡越等二十多位我们派去冲绳协助训练工作的干部。他抓的都是他认为不可靠的人。事实上，他甚至逮捕了余鸣皋¹⁰⁰——是他自己招募余去冲绳的——原因只是余从前与我有过联络。是的，他还拘捕了我从前的英文秘书林定宇以及我从前的卫士。蔡辱骂他们是“反革命分子”。

他们被关押在一间房子。从冲绳岛回香港的人们向我报告此事，他们告诉我，被捕者未受到虐待，只是丧失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被捕者可以集体外出，譬如饭后出外运动与游戏，然而他们老是有美国兵或蔡文治的亲信尾随监视。被拘留者当中没有无线电报务员，因为美国人不允许蔡文治拘押报务员，美国人亟须报务员效力。

我闻讯后向美国人提出抗议。我说，他俩应该记得，当我们派盟员去冲绳时，美方没有告诉我们，这批人是去加入蔡文治的“自由中国运动”的，也没说是蔡文治要求派人去的。如今我们探悉其中有些人已被蔡文治囚禁，我希望，把我的盟员全部送回来，否则我要将事情真相向全世界宣布。美国人说，既然事态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设若有一个被囚禁的盟员回不到香港，他们都会承担全部责任。结果，他们全都回到香港。

同盟领导成员之间的歧异

顾孟余决心去日本。他起行（1952年5月）前三天，才通知我们。他的太太也通知了我太太，因为我俩过去都是汪精卫的追随者。我俩之间互相都很了解。当我太太告诉我时，我说我对此事一无所知。我问顾，他说他再也不能忍受港英政治部的折磨了，他想去日本。

顾孟余很胆小。那时他住在坚尼地道。他不想去政治部应讯，但又不能不去，因为这儿的政府不是我们自己的政府。政治部的便衣警察并不是那么彬彬有礼，对外国人的态度迥异于对待中国人。通常他们让客人坐着应讯，有时还礼貌性地端出一杯咖啡。顾孟余却感到对方很不礼貌，自始至终不让他坐下来谈，好像审问犯人一样^⑥。按照常规，便衣警察未让你坐下，你可以自己坐下来。然而我们中国人有自尊心。在另一方面，英国人告诉我，顾孟余对华籍督察态度倨傲，他一再托词拒绝应讯。

顾是他自己决定去日本的而非同盟方面以派遣。我们认为，既然事已如此，我们最好让他去日本开展我们的盟务。他没说明同意与否。

顾孟余秘密搭乘一艘日轮赴日。他的朋友李先生——一名归国的留日学生，为他安排一切，此人是汪伪政权成员，战后移居日本。日本人向顾孟余提供一臂之助，你要知道，顾孟余进入日本是豁免使用护照的。一开始，他停留别府（Beppu，日本九州岛东北部城市，在大分市之西）。

顾孟余手中的同盟财权办了移交吗？没有变化，邹安众仍然负责同盟的财务部，卢衍明仍旧管现金，美国人仍然付钱给我。当顾孟余离港时，我们期望同盟总部迁往日本，但这项计划最终没有实现。

顾孟余希望甘友兰（家馨）、邹安众、刘汉文（原任童冠贤秘书）以及黄如今去日本协助他工作，但谁也没有去。

我们同日本副首相（首相吉田茂）绪方竹虎^⑦的关系属于什么性质呢？他出任副首相前住在香港，日本政府派他代表吉田首相出访东南亚。他想会见我与顾孟余。我们不想去旅馆会见他。他的一位旧同学认识陈维周，乃建议陈氏设宴，让那个日本人同我和顾孟余在宴席上晤面。我在陈维周家里见到他，顾孟余未去，因顾不认识陈维周。

陈维周的同学充任译员，绪方竹虎说他对未见到顾先生感到惋惜。我建议俟他回程路经香港时由我请他便饭，但他说回程在香港机场只能停留一小时。故我说我们以后再谈。

绪方竹虎希望我们建立一支军队。日本人是很有趣的。他们像美国人一样，他们想同多种政治力量保持联系。我们谈到了反共，仅仅是泛泛而谈，没有谈到我们的同盟。

1952年5月14日，张君劭绕道日本去美国，他以前见过马歇尔将军一两次，对马歇尔存有幻想，以为老朋友会帮他忙。结果在华府碰了一鼻子灰，他太天真了！在美国，张君劭同李宗仁合作并不愉快，他对李宗仁印象欠佳。张君劭发

现，李宗仁耽于空谈。

1952年9月，李微尘从张国焘手中接办《中国之声》的情况如何呢？我在团体成立后才认识张国焘，先前我并不认识他。他说他以前见过我，但我想不起了。我没有同他讨论过他在南昌暴动中所起的作用，我们怎会谈那些！如果我们不是作这部回忆录，南昌暴动这个题目永远不会想起来。不，我不知道他在那场暴动中起过什么作用^⑥。

可以作出结论，张国焘事实上不适合当领导人。为什么呢？他的私生活腐化，喜欢打麻将，不关心其他的事。他说话不负责。他把他家的女佣都列到中国之声的员工薪酬册中。谁也分得清这是他的私人开支，不属于公费。我们都在为同盟效力，他应该把时间用到政务上去。张国焘希望把中国之声的每月预算从2万港元增加至2.2万元，他无视同类杂志的每月预算已减至6000港元。顾孟余先生对此感到头疼，感到难以对付张国焘。我生气了，我说我来搞掂他，乃把预算减至1.8万元。张国焘问我：“中国之声的钱是属于谁的？”意谓我无权削减预算。我说，既然其他刊物预算都减少了，他也得跟着减。张不答应。李微尘说，他想做恶人，接办中国之声，因为没人敢得罪那个老人。1952年9月4日至18日，李微尘夺了张的权，月开支进一步减至1.7万元。林伯雅又接管了李微尘那摊子。

张国焘不再出席同盟中央执委会的任何会议，但他也不辞职，因为他不想失去那份生活津贴。同盟已经实施两种纪律：个人纪律与集体纪律。张国焘自己起草的《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公约》规定，不出席会议必须请假。可张国焘倚老卖老，从不请假。

你知道，当同盟派宣铁吾^⑦——蒋先生昔日的追随者，曾任淞沪警备司令——与我去他家探望时，他是怎样为破坏纪律行为辩护的吗？当我们要求他申述缺席的理由时，他直言他不想去开会。问他为何不请假，他说：“有必要吗？”然后我们问：“不是你自己起草同盟公约的吗？”他说：“是的。”所以我们说：“如果你自己不遵守公约，你怎能指望其他盟友去遵守呢？”他的答复是非常有趣的，他说：“向华，为什么你把政治弄得这么严肃呢？”最后我说：“如果你不满意现状，你为什么不辞职呢？”他不想辞职，也不想请假。我再次提醒他，公约是他自己的作品。

告别张国焘后，我对宣铁吾说：“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成为毛泽东，而张国焘成为张国焘了。很明显，张国焘是不适合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的。”

我怎样评论那篇说我飞往日本于1952年10月15日同顾孟余、张君勱一起发表同盟宣言的报道呢？（原注：乔治·泰勒文章《台湾新貌》1953年4月发表于大西洋杂志，区平节译后于《中国之声》第7卷第6期第82页，1953年5月12日出版）不，我没有去日本，张君勱也没去。宣言是1952年10月10日发布的（见1952年10月10日出版的《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宣言》）15页的小册子。

改变环境与扩散成果

麦景陶称我是第三势力的领袖，但我不想成为领袖。在我一生中，我从未有过任何领袖欲。他问我，同盟的总部设在哪里，我回答设在东京。实际上是设在香港。他问我同盟拥有多少会员，我答香港有两三百人，海外有一二百人，总共四五百人。他告诉我，他不喜欢蒋介石、毛泽东以及李宗仁，他最喜欢我。我说：“非常感谢你！”且断然告诉他，我们的活动只涉及中国政局，对他的职位绝对无害，而且也不会扰乱香港的安宁。我向他出示了同盟的政纲。

1952年11月共和党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我感觉我们的前途将变得更为艰难，因为共和党是支持蒋先生的。

张君劭说，他离香港太远了，所以派遣民社党的重要成员金侯城⁶代表他出席会议同我们讨论同盟存在的问题。

金侯成不是同盟成员，他想倚仗年龄施加影响力。我们不要他，我们拒绝他出席会议，因为他不是盟员。最终，我们决定让李微尘寄送会议记录副本给张君劭与顾孟余，使他俩知悉会议情况，我们一直这样做，也将会议记录的副本送交同盟的各部门与各支部。我们现在仍是这样做。

同盟中央执委会并没有根据同盟组织纲要第十条，在一年内召开代表大会显示同盟的正式成立，国民党倒是根据时间表定期召集代表大会的。这里牵涉到会议地点、费用、旅费等种种问题。

张国焘宣布退出。那次见面后我见过他一两次，但此后再也未见过他。他不出门，保持安静。

顾孟余想在日本创立一所学校训练第三势力的青年与干部。他的友人李先生想帮助第三势力。李先生拥有一幢房子可充当校舍。张君劭同美国国务院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无下文。

顾孟余在同社团、作家、工商界领袖建立联系方面有所建树，他创办了一所商业学校。后又草拟了一个计划，设立编辑委员会从事翻译工作，由李圣五负责。李不是同盟成员，他协助顾孟余。该项计划自顾孟余离港赴日本后执行，英文、法文、德文都译，童冠贤也承揽部分翻译工作。

顾孟余争取日本政府资助中国学生去日本读书，他同旅居日本的彭昭贤⁶接洽这一安排，但毫无进展。彭昭贤同我们有联络，但不是同盟成员。后来他同来自台湾的中正中学校长韩云南谈妥由韩招收香港学生到日本念书。依据这一计划，有成百名流亡学生去了日本。

顾孟余对盟务持消极态度。他感到同盟变得腐败不洁，认为我们应该解散它，重新来过。他去日本后不久就提出重组建议，草拟了一个新组织的计划，名称是中华大同盟。这一新组织的政纲与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类似。可是只设三人出任新组织的负责人，稍后增至五人，暂时不再吸纳新成员。原来我们同盟的盟员中，被顾孟余等视作好人的，将被指派工作，但不吸纳入新组织。我在同盟中央执委会上提出这个主意，但未讲明是顾孟余的主意。会议讨论了这件事。

美国外交政策的变动

共和党上台执政后，蔡文治还继续派人空降大陆，继续了一段时期。倘若有人声称他的故乡有几百人准备迎接空降者，他就会被派遣空降登陆那村庄。就这样，鉴于华秉钺声言我的故乡始兴县清化乡有一支游击队，他被派空降那个地区，还配备了我们去受训的无线电报务员之一。那位报务员以为华秉钺不会说谎，因为他在我部下当过副官。他愿意追随华。美国飞机还载着其他人飞去大陆，但我不知道其他人降落在哪儿。

华秉钺和报务员降落在清化乡附近。他俩被当地村民抓住，村民已效忠中共政权。两人被押解到广州，案件由中共传媒报道出来。华秉钺被控以台湾特务罪名而处决^⑥，报务员宣判入狱。他说他什么也不知道，他唯一的任务是照看发报机。我想，此人仍在广州监狱服刑。他的姐姐去广州探监，把情况写信告诉在香港的父亲。他父亲接着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在这宗惨败中，蔡文治确实欺骗了美国人。他在大陆上根本没有潜伏人马。除了我刚才提到的报务员，我不清楚其他空降人员的下落。我相信许多人都牺牲了，没有人成功地完成任务。中共的社会组织极严密，他们全部被捕。后来我从共产党报纸所刊出的在华南被捕空降人员名单，才洞悉详情。

最大的惨剧发生在三十多人空降海南岛之时，他们全部被俘处决。我相信其中很可能有我们的盟员。

共和党政府改变了民主党政府的外交政策，但美国新政府不能立即废弃冲绳训练营以及正同我们一起进行的建军事宜。共和党人说，他们将支持反共不反蒋的人，不再支持反共又反蒋的。他们不容许蔡文治继续反蒋。

美国人同蔡文治磋商，叫他去台湾，把他的部众并入国军。蔡文治接受了美方的政策更易，他去台湾同当局会商。蒋先生派军统局（当时职务为“国防部”参谋次长兼大陆工作处处长及负责对中共情报作战的国民党中央第二组组长）郑介民充当与蔡之间的联络员。当郑介民担任北平军调部三人小组国军代表时，蔡文治在郑麾下做过参谋长。当局希望蔡文治解散他的部众，承诺根据各人特长分配工作，而蔡本人可获委相当的官职。蔡文治不肯，他还想完整地保持这支部队，也即保存他自己的实力。那时蔡拥有约二百多官兵。郑介民拒绝了蔡提出的条件。蔡文治回到了冲绳，美国人送他去了华盛顿特区，他还待在那儿^⑦。美国人太天真了！

蔡文治的部下被遣送台湾。我认为，对于那些想去台湾的盟员，我们无话可说，他们应该去那儿。然而，我们盟员中任何人想要回香港的，应该让他们回来。就此事与美方谈判后，我们盟员中的一部分人被送回了香港，是美国人送他们回来的。在港府方面倒没有刁难，既然这些人无须签证离开了香港，自然也无须签证返回香港。同盟中有部分人自愿遣送台湾。

愿意去台湾的比较多。我们的盟员中，多数人回到香港，但有些人已经牺牲，这是令人十分沮丧的。报务员中间极少数人回来。青年军人和知识分子的大

多数回来了。

美国外交政策的改变对同盟的影响不大，因为我们没有反对蒋介石，我们没有攻击台湾，我们只是批评它而已。鉴于美国的政策已变，我们决定不给美国人留下停止援助的机会。我们自动放弃美援。我们决定同美国人定下一个停止美援的日期。美国人想继续支持我们，问询顾孟余是否可以在日本继续从事文化活动——反共宣传活动。顾说“对不起”，他不想再在日本从事任何活动。李微尘建议我要求美国人从文化上支持我们，而非政治上支持。我向美国人建议让李微尘、张国焘或童冠贤在香港继续进行文化活动，他们三人都擅长写作。美国人拒绝了这项建议。他们说，如果顾孟余肯负责任，他们才愿意继续支持。这两个美国人回到美国去了，从此我再也没见过他俩。

我们决定放弃美援的主要原因乃是同盟内部出现了复杂的局面。正如我所以说，顾孟余成了同盟的核心，却态度消极。

同盟开始分裂

我们减少了活动。我们停止了海外活动，还把干部们的生活津贴减少到原来的三分之一。我们不想使美国人觉得，一旦我们停止接受美援，我们就完全瘫痪了，这是挽回面子的做法。

同盟向我和其他几位成员借过钱。当我们存放在香港政府的四万元港币押金——我们出版或津贴的四份期刊每份要付一万元——因停刊而退回时，这笔借款都归还了。这笔钱要在杂志停刊一年后才能取回。此外，我们以四万元卖掉了嘉罗印刷公司。同盟亏欠二万多元翻译费，可当时付不出现款，就只好分期拨还了。

我们自1953年11月起就停止支付干部们的生活津贴，也停止津贴《再生》杂志，我们停止出版《华侨通讯》，但《中国之声》延续了一个短短的时期。（原注：停刊号于1953年12月28日出版）

我们先后派童冠贤和邹安众去日本见顾孟余，商讨同盟的重建问题。我们期望他别退盟。

顾孟余怀疑同盟已被敌人渗透到什么程度了呢？我已经说过伍宪子访问台湾的事。张君勱指出，台湾已派特务混入我们的同盟。我不承认。有人怀疑宣铁吾，他的家眷在台湾。他是黄埔一期，曾是蒋先生的“太保”^⑥之一，又是蒋的小同乡，还在委员长大本营做过事。我不相信宣铁吾是奸细，我不认为同盟已被台湾特务渗透了。

当张君勱鼓吹强硬态度时，顾孟余是否主张对台湾采取温和态度呢？是的，顾孟余不相信“战盟”会像张君勱的文章那样赤裸裸地攻击台湾。当顾孟余看到那些文章，他很不高兴。我们其他人的意见呢？我同意顾孟余的观点，童冠贤也是。但事实上要确定哪些文章构成攻击，哪些文章只是批评，那是不容易的。

顾孟余宣布，他不再为同盟承担任何责任，以后他和同盟之间只能是互相支持而已。顾孟余的建议就是要解散同盟，然张君勱反对解散。于是同盟决定暂停

活动几个月。

1954年8月18日和27日，同盟决定改组。这总比解散好。我们决定保留同盟的名称，但组织应该采用政治组织的联盟这一形式，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组织。大家都认为战盟改组成为联盟是必要的。事实上，张君劢已经打算只派一名代表驻盟。于是，改组委员会成立了。

此时，顾孟余正式退盟。他是我们组织的重要核心，接着张君劢也在美国宣称退盟。当时同盟的三位领袖是顾、张和我。由于其中两位退盟，我也得退出。坦白说，我是个军人。既然别人退出了，我不想再继续了。我们解散了同盟，焚毁了它的文件，其中包括与蔡文治有关的文件。

战盟解散的最重要原因是顾孟余的退出。这次失败后，我认识到，组织团体终究是一步错棋。同盟受挫于内部矛盾。张君劢保留了他自己的组织——民社党，他不能与它断绝关系。

当盟方的决议交付基层讨论时，民社党的盟员征询张君劢的意见。虽然我们不必请教任何人，我们通常还是咨询顾孟余的。我们的口号是“自由与民主”，所以意见分歧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办法可以把战盟发展成为一股力量了。当战盟有点钱的时候，人们还可以为钱做点事；但当不再有钱时，人们问我们：“你的力量在哪儿？”

我们流产的努力

离开国民党后，我第一次加入一个复杂的政治组织。早先一切都很简单，我一直认为只要追随孙中山的信徒汪精卫，我不会走错路。从青年时代起，我一直是孙逸仙博士的追随者。

在同盟组织起来时，我崇拜偶像，认为我们必须拥戴一些名人，如顾孟余、张君劢、张国焘、李璜、童冠贤来担任我们的领袖，因我尊敬他们。我甚至认为，许崇智往昔位高权重，理应成为领袖。陷入如此的偶像崇拜，我从根本上错了。我把这些领袖当作了庙宇中的佛像或教堂中的耶稣受难像。我认为，我们要领袖，他们能筹集经费。我以为，同那些人合作，我们就可以发展一个组织，催生一支真正的力量。抱着这种目的，我决心专心致志促成他们的合作。然而，我发现，所有这些人同常人无异。我的理想幻灭了。

张君劢使我十分失望。当然，他从来未做过官，他的私生活和道德品质^⑧是值得崇敬的。但他的性格不够强，说得到做不到。我知道君子应责人宽，但在政治领域，不约束部众是行不通的。我想张君劢不适宜担任政党的领袖，虽然他是一个好人，我钦佩他不屈不挠的精神。

我也对顾孟余失望，他具有良好的品格，但同样不够有力。我原先就知道这一点，那么为什么我仍指望他成为一个出色的领袖呢？请看我们周围是些什么人吧！当我们一来到香港时，我们能寻找谁来充当领袖呢？我一向崇拜偶像，如果汪精卫不投敌叛变，我会继续追随他的。

同盟内的其他负责人许多去了台湾，例如宣铁吾，他找不到事情做。这一点加强了 my 信念——他不是渗入我们内部的特务。周天贤去了台湾，韩汉藩去了日本，黄如今去了巴西，伍藻池去了美国。李微尘从澳洲回来后，去了新加坡从事广播工作。

有人去大陆吗？没有！我敢说，盟员没人去大陆。

有些人留在香港从事教职。例如，任国荣、邹安众在新亚书院执教。

童冠贤要求我为他荐一个教席，他说他不想再搞政治了。我介绍他去崇基学院教书。李应霖那时是崇基校长，我同他私交甚笃。他不只是一位教育家，也十分关心政治。

我没有再同那位为香雅格博士带信的美国人作进一步接触，当他把责任转移给另外两个美国人后，事实上，他多数时间在香港度过。以前每年遇见他几次。有一次我见他作为贵宾出席英军辅助团的会议，我们彼此瞥了对方一眼。但近几年我未曾见过他。

我同其他组织的联系

张君劭同中国民宪党代表李大明^①和洪门致公总堂代表在美国联络，谭护和李大明希望同盟加入他们的组织。张君劭同意这个主意。然后他希望美国成为第三势力运动的中心。我们不想加入这个被推荐的组织。李大明强烈反蒋，我们绝对不支持他。长期以来李大明与谭护一直都反对国民党。

同盟没有加入自由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54年8月20日由中国国民党复兴同志会、民宪党、致公党、自由阵线社、中国民主大同盟等组成，推李宗仁为主席，李大明为秘书长，吴尚鹰为驻华府代表。九个月后因李宗仁主张国共恢复谈判，与救国纲领相违，以致众叛亲离，形同解体）。（原注：参见《自由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宣言》，1954年8月20日发表，印刷品，一页，由李宗仁、李大明、谭护、谢澄平、陈中孚^②签署；副本寄给张发奎、童冠贤、李微尘，后有张君劭手写的附言，声称他已收到李大明寄来的宣言。哥伦比亚大学藏有此宣言的缩微胶卷）顾孟余对此从来不感兴趣，我也一样。我们对谢澄平都抱着否定态度。

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于1954年秋天解散后，我没有加入中华民国反共复国同盟会。同盟解散后，基层盟员希望我出任该会的领袖，但我没加入。那个组织也没有成形。

王同荣^③、林茂、罗永扬等人希望组织中国自由民主联盟，但它一直没有成立。许多伙人计划成立一个又一个的组织，我哪一个团体也不加入。首先，我不想做领袖；其次，即使同顾孟余、张君劭在一起，我们也缺乏凝聚力。同盟内的其他人我都不佩服。谁能成为新组织的领袖呢？简言之，自从同盟失败后，我不想再搞任何政治组织了。然而，《联合评论》是一份政治刊物。

1958年创刊的《联合评论》周刊是由下列团体组成的：（1）无党派的黄宇人、王同荣与我，原先是国民党员；（2）民社党党员：梁友衡、罗永扬、刘裕

略；(3) 青年党党员：左舜生、李璜；(4) 自由阵线集团：谢澄平、刘子鹏，后者也是青年党党员；(5) 友联机构：胡越、史诚之。

人们希望在我家聚会，但我坚持第一次会议应在左舜生家召集，虽然左宅小且狭窄，我还是要表示我并非领袖。但是此后的会议可在我家举行。在左家开第一次会时，我问左舜生：“将来还想去台湾吗？”他说他绝不去台湾了。我说，既然如此，我绝对支持他担任总编辑。

我们讨论了是否需要组织一个团体，然后出版一份刊物或者先出刊物后搞组织。我们决定从办刊物开始，然后讨论了成立组织的事。于是，这就不是政治组织了。我们中间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加入其他政党了。一切都依靠思想与政治立场的一致。

我们的政策是鼓励民主，反对共产主义。在1958年8月15日创刊号上，我们表示宗旨是善意地批评台湾，毫无保留地抨击共产主义。

左舜生估计，刊物每月需要友联机构、自由阵线集团和我提供2000多元经费。到付款时，我付了我的一份，港币700元，自由阵线集团给了500元，友联也付500元，尚缺400元，由其他人分担。

自由阵线很快退出了。联合评论出版第二期后，它就不肯付款了。我们短缺五百元，友联以在联合评论登载广告的形式付这笔钱。自由阵线的退出，再次肇因于谢澄平想当领袖。

台湾方面知道了我支持这份刊物，有人问我支持的原因。答案很简单：没有这份刊物，人们无法了解台湾发生了什么事，不论好事抑坏事。至少，这份刊物有勇气批评台湾。

友联集团与联合评论采取了同样立场，这就是友联同我们能够合作的原因。可是，产生了小的分歧。联合评论的宗旨是无条件抨击中共和建设性地批评台湾。偶然批评过了头是难免的，于是刊物被禁止进入台湾。友联机构的另一出版物《祖国》同样被禁入台。后来，由于亚洲基金会的影响力，联合评论不再批评台湾，刊物又恢复运销台湾。亚洲基金会当时是支持台湾的。

1962年5月，友联机构撤出联合评论。因为友联接受了美援，亚洲基金会对友联说“如果你们继续同联合评论混在一起，我们不再援助你们”。友联的代表在会议上解释了他们退出的原因。许多人批评友联的退出，但我说友联做对了。我们必须谅解而且原宥他们。他们依赖美援，所以不能独立自主。《中国学生周报》是友联唯一赚钱的出版物，其他部门都是亏蚀的。

为什么亚洲基金会先前不予干涉呢？我相信真正的原因出在内部——亚洲基金会被推诿成撤离的借口。联合评论已经经营了几年了，亚洲基金会不可能不了解形势。据我了解，友联内部有一批人，包括玛丽亚·燕^④，主张同我们分手。后来，友联有两人以个人身份留下了。

当友联撤走后，刊物剩下了三伙人：无党派人士、民社党和青年党。我把捐献额增加到每月1000元。后来，刊物每月开支增至3000元，我不能再增加我的捐款额度了。其他人也不好意思要我增加捐助。我们想办法填补差额，于是稿费

减低了。朋友们被劝说捐钱，这是一场很艰难的斗争。我真佩服左舜生的精神，那实在值得钦佩。

联合评论创刊后，几年过去了，仍然没有建立组织。“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原因很简单。民社党和青年党有他们自己的组织，而其余人不属于任何党派。设若我们新创一个政治组织，他们势必要离开他们已建立长期联系的政党。

因为缺乏经费，联合评论在1964年10月停刊。刊物只依靠我每月提供的1000元，以及吴敬敷经营纽约版所赚的些少利润——从那儿我们总共收到3500美元。当这些钱花完之后，我们无法再继续下去了。

由于编印联合评论，我现在同左舜生、李璜比较接近。

组织第三势力我没有取得任何利益。联合评论集团组织政团失败以及刊物结束，使我感到气馁。当我初次来此时，我是满怀热情的。

除了张君勱所著的《第三势力》一书外，人们还能在哪里能找到第三势力呢？

【注释】

① 孙科（1891—1973）：系孙中山之子，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1947年4月出任国民政府副主席兼立法院院长。1948年5月出任立法院长，12月任行政院长，拒与中共和谈，称“决不轻言妥协”。1948年12月25日被中共列名43名“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之一，排名第13。1949年2月18日毛泽东在《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一文指出：“孙科之所以成为战犯，是因为他一向赞助蒋介石发动战争并坚持战争”。同年3月辞职赴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希腊游历。1952年12月定居美国加州，被举为中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长。1965年返台参加孙中山百年诞辰庆典，旋受聘为“总统府资政”，次年出任“考试院长”。1973年9月13日因心脏病逝世台北。自1924年起一直是国民党中执委，1945年任中央常委，故1950年是香港国民党党员中地位最高的。

② 傅汝霖（1895—1985）：黑龙江安达人，1895年生。五四运动后与王昆仑等北大学生组成九人小组，口号是“读书自由，政治自由”。1922年护校（校长蔡元培）一役，组织民治主义同志会，以东北四川老乡关系，与国民党建立政治关系，创办《民生周刊》。是年民治会加入国民党，1924年孙中山北上，傅去铁狮子胡同中山临时住宅协助工作，由孙科出钱策动邹鲁谢持秘密组织国民委员会，傅加入充当反共核心。1926年3月在西山会议派二大当选中执委。1930年7月当选国民党中执委会常委会宣传部委员。1931年5月任陈济棠广州国民政府政务委员会委员，12月回任国民党第四届候补中执委、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1934年1月出任内政部常务次长。1935年12月任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委员长。1945年5月任国民党第六届中执委。1946年11月当选制宪“国大代表”，翌年当选立法委员，5月出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1949年冬到香港主持中国实业银行。1985年3月7日病故美国。

③ 李济深（1885—1959），字任潮，1885年生于广西苍梧，早年毕业于设在保定的军咨府军官学校（后改名为陆军大学）第三期，曾留学于日本。1926年任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北伐期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广东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第八路总指挥，留守广州。1933年策动闽变，在福建组织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兵败后逃亡香港。次年在香港主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35年任桂系军政府主席。1948年1月和冯玉祥、谭平山、蔡廷锴再次在香港组织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主席。12月自香港进入解放区。1949年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后历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副委员长等。1959年10月病故北京。

④ 顾孟余：1888 生于北京，原籍浙江。清光绪中叶赴德国柏林留学，思想上崇拜梁启超的改良主义，反对孙中山、黄兴，反对革命，尤其反对同盟会。1922 年回国，任北大经济系主任及德文系主任，投机转变，加入国民党。时北京国民党市党部分裂为左右两大集团，其中翠花胡同派由顾与徐谦主持，号称左派，初则主张联俄亲共，继则反对西山会议，拥戴汪精卫排斥胡汉民、张继等。1925 年初李大钊到孙中山荐贤名单中的第一名即是顾孟余。当时汪精卫在孙中山身边担任秘书，所以顾颇受汪青睐。1926 年 3 月 18 日，北洋政府以“假借共产学说，煽聚群众，率暴徒闯袭国务院”罪名通缉李大钊、顾孟余、徐谦等五人，顾遂离北京南下，由汪提携出任国民党中央执委兼中宣部长。1927 年任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主席之一、军事委员会委员。1928 年奉汪令赴武汉煽惑唐生智称兵作乱，1929 年秋汪精卫在香港组织国民党地下中央反蒋时，顾是汪的主要策士，同年 12 月参与广州兵变。1931 年与汪精卫在上海召集分裂的“全代会”自封为中委，成为汪记“改组派”骨干。1932 年蒋汪合流，汪掌行政院，即任顾为铁道部长以示酬庸。1936 年任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1938 年拒绝参加汪伪政府，中枢嘉其深明大义，乃任之为中央大学校长。孙科辞职后，李宗仁邀顾组阁，顾坚决拒绝。还曾主张与中共谈判。1949 年来港创办《前途》杂志，不到五期即停刊。顾孟余退出战斗同盟后离日赴美，卜居加州柏克莱，担任美国国务院中国研究中心和加州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顾问。1969 年 7 月赴台定居，聘为“总统府资政”。1972 年 6 月病故台北。

⑤ 梁寒操（1899—1975）：广东三水人，1923 年毕业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加入国民党，起初任汪精卫秘书，1926 年 5 月汪下野，将梁介绍给孙科任秘书，渐成太子系核心人物。1927 年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后历任国民政府财政部参事，武汉国民政府铁道部主任秘书、铁道部参事、总务司长。1931 年任国民党中执委，1933 年任立法委员兼立法院秘书长。1939 年任委员长桂林行营政治部主任。1940 年改任军委会总政治部副部长。1943 年任国民党中宣部长。1949 年赴港，1951 年去塞班岛自由中国运动军政干部学校任政治教官。1954 年回台湾，任中广公司董事长。1975 年病逝台北，著有《三民主义理论之探讨》等。

⑥ 刘维炽（1892—1955）：广东台山人。太子派形成于 1923 年，同以胡汉民为首之元老派对立。孙科就职后，任用刘维炽为市政厅秘书。刘别字季生，长期追随孙科，官至实业部长、侨委会委员长，宦囊最丰。

⑦ 童冠贤：河北省宣化县人，1894 年 5 月 16 日生。天津南开大学专科毕业后，公费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剑桥大学及德、法等国立大学研究所研究政治学与经济学。1925 年返国后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暨南大学、中山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央大学教务长。早年随顾孟余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中央工作，嗣衔命北返，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华北分会委员，故其政治上属于改组派。1929 年南京举行国民党三大时反对开除汪精卫党籍，退出党务工作，抗战期间才复出担任国民参政员、监察委员、晋陕区监察使。抗战胜利后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冀热平津分署署长。1948 年当选立委，嗣在派系斗争中获桂系支持当选立法院院长。1949 年 8 月，李宗仁让顾孟余组织自由民主大同盟，童任书记。抗战时顾任央大校长，童任教务长，加上改组派与桂系本有渊源，所以 10 月初自由民主大同盟迁香港后，童冠贤热心捧顾固非偶然。自大同盟、民主中国座谈会到战盟，核心成员中，实质上的决策人物都是童冠贤。李微尘加入决策是后期的事，战盟组织纲要也是童、李二人起草的。1965 年退休后，由儿女迎养至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定居。1981 年 8 月 7 日逝世于加拿大。

⑧ 黄宇人：1905 年 6 月 22 日生于贵州省黔西县中和乡，中学未读到一半就投奔黄埔军校，1926 年 10 月毕业，分发北伐军补充师，在团长陈诚麾下任连指导员，旋奉国民党中央组部长陈果夫之命回贵州筹备党务，因贵州军阀周西成专横暴虐而逃回南京。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由陈果夫吸纳到中组部普通组织科指导股任干事，三全大会后升股总干事。1930 年 8 月任江苏省党务整理委员兼组织部长。1933 年由陈立夫选派赴英国留学，翌年春入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选读政治学、比较政府和地方政治。七七事变后，提前回国参加抗战，先后出任军委会第六部留日归国学生训练班训育组副组长、国民参政员、三青团中央社会服务处处长、军纪巡察团委员、三青团贵州支团筹备主任、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主任委员、三青团中央常务干事、三青团贵州支团干事长、青年管理处处长、国民党中央常委等职。1948 年 11 月，孙科继翁文灏

任行政院院长，立法院院长出缺，黄宇人主导的立委反CC系联合阵线推举吴铁城竞选立法院院长，不巧吴铁城被孙科邀请入阁，黄宇人转而循北方籍立委武和轩提名，支持童冠贤。童原已准备举家迁台湾，闻讯即回南京参加选举。黄迅即促使立法院补选正副院长，使CC系立委来不及赶回南京时，12月24日童以简单多数当选院长。1949年6月1日移居澳门，1950年10月因不出席会议被立法院取消立委资格。旋应顾孟余、童冠贤之邀，以桂系人员退出为条件，加入李宗仁出钱、顾童牵头的自由民主大同盟，又规劝童冠贤辞去立法院院长职。1951年4月任独立论坛督印人，化名黄如延。同年5月任反共抗俄联合阵线25人核心之一，10月任《中国之声》社编辑政策委员会委员。旋与童冠贤、张国焘、彭昭贤、李微尘起草“战盟”组织法，又因与李微尘意见不合以及顾孟余受港英政治部警告，而力主张顾联盟25人核心解散。1952年10月10日张君勱在美国发表“自由民主战斗同盟宣言”，独立论坛被迫停刊。1958年8月任联合评论督印人，又与张发奎合办兴中出版社。1964年10月因罗永扬等人欲提名张发奎、黄宇人等参加台湾的反共救国联盟，一怒之下将联合评论停刊。1965年6月在胡木兰、冷静齐支持下创办中国民主论坛，1967年7月停刊。1972年移居加拿大依亲，自1971年起因胡越的劝勉开始撰写回忆录，至1981年4月写成《我的小故事——国民党失去大陆的原因》上下两册，计50万字。

⑨ 1931年张发奎与陈铭枢、蔡廷锴大战衡阳后，第四军只剩700余官兵，忍痛让蒋介石收编。1932年张流寓沪上，第四军流落在南京、上海军官几十人无处安置，乃找当时的行政院长汪精卫要求安置，汪一味敷衍。情急之下，张找汪摊牌，以率部上门请愿威胁。最后由陈璧君建议交铁道部长顾孟余安插，特地设置路警管理局，下设四处，编制近200人，这才安置了第四军几十名中上级军官。这是张发奎对顾孟余产生好感的主因。

⑩ 薛岳（1896—1998）：字伯陵，广东乐昌人，保定军校毕业。早年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营营长。1934年任第二路军总指挥时率师追击长征途中的红军。1946年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1947年调任总统府参军长，1948年12月25日被中共列为43名“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之一，排名第27。1949年1月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兼任海南防卫总司令，赴台后任“总统府”一级上将战略顾问、“行政院”政务委员，后转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主委。1998年5月3日病故台北。

⑪ 香雅格为避免外界注意，来港后并未下榻酒店，而是在半山旭和道15号一家“外国记者俱乐部”订了一个房间，秘密地住了下来。

⑫ 张发奎签署文件只草书一奎字，骤视之，颇似“大王”二字，张氏闻呼，不以为忤。又，张任护法大总统府警卫团营长时，力抗陈炯明叛军，誓不投逆，乃率部上山，以待反攻，粤人遂多以大王称之。

⑬ 张国焘（1897—1979）：江西萍乡人，1897年生，1918年入北大理学院，翌年任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干事，是五四运动骨干成员之一。1921年7月出席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任大会主席，1922年底代理中共中央书记。1931年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身份到鄂豫皖根据地掀起大规模“肃反”，捕杀红军官兵2500多人。1932年建立川陕根据地，三年后将红四方面军扩大至8万多人。1935年10月在四川马尔康另立“党中央”，自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36年6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1936年因红四方面军渡河西征失利，西路军几乎全军覆亡。次年3月在延安被批判，撤其红军总政委职，降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8年4月，借赴陕西中部县祭黄帝陵之机，在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协助下坐胡宗南专车去临时首都武汉，投奔国民党，遂被中共开除党籍。抗战期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还一度在戴笠手下一个游击训练班讲授中共的游击战术。抗战胜利后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在任内亏空公款法币4亿余元。1945年5月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执委兼中央组织部设计委员会委员。1948年11月赴台，1949年冬迁居香港，化名“凯音”参加第三势力，任《中国之声》周刊社长。60年代初接受美国亚洲基金会资助撰写《我的回忆》。1968年移居加拿大，1977年中风后人住多伦多一所免费的老人病院。1979年12月3日因院方照顾不周，冻毙于老人院。

⑭ 李璜：四川成都人，1895年生，18岁入上海震旦大学，23岁入巴黎大学修历史学与社会学，获文科硕士衔。1924年回国，历任武昌大学、社会大学、成都大学教授。1923年12月在巴黎与曾琦等同学创立中国青年党，以国家主义反对国际主义，以全民政治对抗阶级斗争，故回国后发展党务同联俄容共之国民党势成水火。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青年党人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及关外之游击作战皆有相当战

绩，始为国人所注意，而当政者亦改变初衷，公开表示合作。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被聘为国防最高会议下设之国防参议会参议员，继被遴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并连任主席团主席四年。1946年被特派为赴美国旧金山联合国制宪大会中国代表团代表之一。1947年被任为经济部长，未就任。1949年大陆解放后避居香港后到台湾，任“总统府资政”。1991年11月病逝台北。

⑮ 李微尘（1902—1977）：系李大明胞弟，原是民社党党员，第一届国大在南京召开时张君劝吩咐他急草一份文件赶会。李即向张索取行政院政务委员一职。民社党加入政府后，张未谕以此职，却特地在民社党内设立政务委员会，自任主席，命李为委员，由此李对张君劝产生芥蒂。李氏中英文俱佳，工于心计。张勋复辟后，康有为在咸阳古道偷一佛寺藏经，酿成丑闻，然李微尘仍烧冷灶投奔此一过气遗老门下，寄居上海愚园路康公馆三年余。李于抗战时做过西南运输局局长顾问，抗战胜利后又在陈伯庄主持的京沪杭铁路管理局任过局长顾问。然其在香港自夸从未做过官，常常谴责流亡官员。因其手脚勤快，擅长计谋，故很快取得张发奎信任，以秘书身份跻身战盟最高决策层。张国焘退盟、谢澄平另起山头争美援等，都是李微尘纵横捭阖的恶果。“二战”期间李在香港曾任《中国晚报》主笔，日占时任陈友仁秘书，抗战胜利后还主编《京沪周刊》。战盟散摊后主持创垦出版社，主编《热风》半月刊。1956年应邀南下新加坡，主持《南洋商报》笔政及电视广播新闻部门。1966年出任新加坡总理公署新闻秘书，1969年荣获国家行政功绩金章，1975年退休。1977年11月18日病故新加坡，举殡之日李光耀亲临致悼，备极哀荣。

⑯ 伍宪子（1881—1959）：广东顺德人，名庄，清光绪七年（1881年）五月初七生。16岁入万木草堂听康有为讲课，17岁后为《香港中外新报》、《广州时敏报》、《博闻报》撰写评论。24岁奉康命助徐君勉办《香港商报》，主商报笔政7年。1913年到北京，办《国民公报》，回粤任省内务司长，翌年入都任财政部顾问，总统府咨议。1916年5月5日，梁启超组军务院，伍任政务委员长，后应冯国璋聘任副总统咨议。1918年办《唯一日报》。1922年任国务院参议，1928年主《世界日报》笔政。1946年8月国社党与民宪党开联席大会于沪，合并称中国民主社会党，张君劝任主席，伍宪子副主席，旋当选国府委员，未就。1947年8月民宪党退出民社党，民社党之革新委员会选伍为主席。1947年冬在香港创办《人道》周刊，翌夏停办。1951年冬应台湾当局邀请赴台，留住。回港自1956年起任教于联合书院中国文学系，1959年10月7日病故香港。

⑰ 左舜生（1893—1969）：湖南长沙人，上海复旦大学毕业。1930年7月与陈启天等人创办《铲共》半月刊进行反共宣传。1935年7月当选青年党中央执行委员长。抗战期间三次连任国民参政员。1946年1月自渝返沪，创办《中华时报》，复刊《青年生活》。翌年5月出任农林部长。1948年12月25日被中共列为43名“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之一，排名第41。1949年4月携眷迁台，9月赴港创办《自由阵线》周刊，重树反共旗帜，并先后在新亚书院、清华书院讲授中国近代史。1969年10月16日病逝台北。

⑱ 张君勱（1887—1969）：江苏宝山人，前清翰林院庶吉士，南京高等学校肄业，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学学士，曾任冯国璋之总统府秘书。1924年任上海国立自治学院院长时讲授“唯物史观之批判”，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次年改名政治大学，以后张组织的国社党，民社党骨干多系政大师生。张还协助梁启超创办研学社，邀请印度诗人泰戈尔、英国哲学家罗素、德国经济学家兰德荣等来华讲学，故张在青年学生与学术界声望日隆。然其赋性固执，好出风头。1933年4月与张束荪、罗隆基等人在天津组织国家社会党，当选中央总务委员兼总秘书。1946年8月国社党与民宪党在上海合并为民主社会党，举张君勱为主席，主张“政争决于选举，不决于战场”，反对共产党的“人民战争”。1946年11月代表民社党出席制宪国民大会。1948年12月25日被中共列为43名“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之一，排名第43。1949年4月避居澳门，11月赴印度讲学，历时两年。此后遍游印尼、澳洲、美、德、日、意、英、越、新等国讲学，并著书反共。1955年应斯坦福大学之聘赴美定居，1969年2月患肺炎病故旧金山。

⑲ 指太平洋政论会，由许崇智挂名，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前主委方觉慧经营。太平洋政论会与张发奎领导的英武学会在50年代初期吸引了不少流亡香江的国民党党政军特人员。蔡文治为了拉拢方觉慧，曾把方的孙儿派到塞班岛受训。许崇智（1887—1965），字汝为，广东番禺人。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于第三期步科，历任粤军总司令、国民政府委员、军事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监察院副院长等。1948年7月3日受聘为“总统府资政”以迄1965年1月25日病逝香港。曾与张静江、蒋介石结拜为异姓兄弟。

⑳ 方觉慧（1886—1958）：曾参加辛亥武昌首义。民国成立后，历任军政分府顾问、鄂军总部主秘、大本营咨议、东路讨逆军军饷局帮办等职。北伐时任第十一军党代表、军委会总政治部副主任代行部务。1928年后历任国民党第3—6届中执委、湖北省政府代主席、中央训练部部长、河南省党部主委、鲁豫区监察使、华北九省市党务指导专员、广东省党部主委、湖北省党部主委等。1947年当选国大代表。1958年11月10日以肺癌逝世于台大附属医院。

㉑ 邹安众，湖南新化人，上海复旦大学毕业。1926年任北伐军叶开鑫部政治部主任。北伐成功后历任南浔铁路局长、铁道部会计科长、平汉铁路副局长、道清铁路局长。抗战爆发后，任贵阳交通银行经理。抗战胜利后任汉口交通银行经理。赴台后任交通银行代总经理兼董事，后辞职来港任教新亚书院，教授财政、经济、会计课程。1966年退休后转任香港信义中学校长。1967年8月2日逝世于九龙法国医院。

㉒ 蔡文治（1911—1994）：湖北黄冈人。微时在唐生智部师长夏斗寅麾下任文书，奉派陪夏公子读书远赴东瀛。他俩入士官学校不久，九一八事变突然爆发，所有留日学生均被遣返回国。那时政府为优待归国留学生，特准不经考试便可入读刚开学不久的军校九期。1934年5月军校毕业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师连长、少校参谋。后入陆军大学正则班十三期，从此青云直上。抗战爆发后，任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一厅上校科长、少将科长。1938年夏任军令部第一厅第二处（作战计划处）处长，参与全国各战区作战计划的制定与军队编配调遣。1942年初任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成员、代理团长。1943年以随员身份跟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会后赴美国参谋大学第二十三期研习作战学。1944年春参与中、英、美、法四国联合参谋部在华盛顿召开的军事会议，制定盟军亚洲作战计划。同年秋任陆军总司令部第三处（作战）处长，不久升任中将军参谋长。1945年8月随何应钦赴南京主持日军受降事宜。1946年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委员、参谋长。1948年任徐州前线指挥部参谋长，国防部第四厅（主管美援装备的洽谈与分配）厅长，国民政府参军处中将参军，翌年调任第三厅（作战）厅长。解放军渡江后，弃国防部三厅厅长职南下组建游击部队。后流亡香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陆军战略情报部拟在部内设立一个临时性质的“敌后工作委员会”，物色一个中国有为军人协助其事，训练中国军人在敌后与美军配合，开展游击战争与搜集敌后情报。此案由新任国务卿艾奇逊批准，由卸任国务卿马歇尔推荐起用其西点门生蔡文治。所需经费在陆军战略情报部临时费项目下支给，用“敌后工作委员会”名义签署。这一临时性秘密机构，被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称作“亚洲抵抗运动”，以免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因“中国”字眼而引起纷争。而蔡文治应承其事，竟将“亚洲抵抗运动”改名为“自由中国运动”，然而本质上蔡文治不过系美军华裔顾问性质，但在形态上，蔡文治俨然成为美援下反共反蒋的第三势力领袖人物。自由中国运动历时三年，美方共支付近一亿美元，其中包括美国顾问的薪俸、保险、眷属福利费用等等。

㉓ 据程思远所著《政海秘辛》（1988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页235）透露，此人名叫哈德曼。

㉔ 中山先生北上后，1925年春广州革命政府为巩固后方，由代理大元帅胡汉民下令东征，讨伐盘踞惠州的叛逆陈炯明。左翼滇军与中路桂军都屯兵不进，代帅深恐右翼孤军深入发生危险，乃调粤军第一师第一旅及警卫团吴铁城部增援东江，当时张发奎任第一旅第一团团团长，一举攻占五华、兴宁。节制各路东征军队的正是粤军总司令许崇智。

㉕ 东京总部第一处处长原先由蔡文治的陆大同学张雪中担任。后经王治事变以后，此职才由脱离王治靠拢蔡文治的谭彼得接任。张雪中是江西乐平人，黄埔一期，陆大将官班甲级一期毕业，曾参加东征、北伐、南口战役、台儿庄会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豫南会战、豫中会战诸役，官至第七、十三绥靖区司令官以及衢川、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1948年授陆军中将。文鼎贵，本名林湛，广东高要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二期骑科毕业，历任第九集团军骑兵师副师长、中央军校第四分校军官团少将教育长、军训部骑兵监、第六十三军军长、国防部中将部员，是张发奎亲信。蔡雨时系陆大十三期毕业。雷默然曾任职于昆明联勤总部。温靖是陆大十三期，曾在薛岳九战区长官部任参谋长。

㉖ 寿臣山在香港岛南区黄竹坑，深水湾以北，今香港仔隧道东侧，以香港名绅周寿年（1861—1959）名字命名，周在清末曾任京奉铁路局总办，1926年被港督委任为第一位行政局华人议员，同年更获英皇乔治六世封予爵士勋衔，抗战期间周劝募救国公债有功，由国民政府授予三等采玉勋章，被誉为德、爵、寿三者兼备。

⑳ 刘震寰（1890—1972）：广西柳州郊区基隆村人，出生于大地主家庭。1909年考入广西优级师范学堂，1911年由堂叔刘古香介绍在广州秘密加入同盟会。回柳州后变卖田产挹注革命经费。同年11月10日率领民军冲入柳州军政机关，迎刘古香为右江军政分府总长兼统领，奉委为帮统。1913年9月12日起兵讨袁，兵败后逃亡香港。1916年6月回广西，拍家产用以招抚民军绿林，被军政司司长陈炳焜任为游击副司令。1921年6月驻梧州时，暗中联络粤军夹击军阀陆荣廷、陈炳焜，被护法政府委为广西陆军第一师师长，翌年奉委为广西绥靖督办。1922年1月滇军旅长龙云擅自脱离滇军总司令朱培德返回云南，孙中山电令刘在河池阻击，勒令滇军回桂参加北伐，刘违令放纵滇军回滇，又赠银洋30万元给唐继尧作为从香港回滇路费。同年12月奉中山令讨伐叛徒陈炯明，1923年1月15日以讨贼军粤桂联军总司令进占广州，逼陈炯明通电下野，迎中山回穗。4月，奉中山令，与滇军杨希闵部击溃北洋政府任命的广东督理沈鸿英。1924年1月大元帅府讨论政府名称，刘提议定名“国民政府”，下旬由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议决定案。刘震寰、杨希闵部二万余众围攻惠州陈炯明部四五千人，历时一年未下，被疑为“养寇自重，保存实力”。此滇桂两部在粤大开烟赌，横征暴敛，鱼肉人民，且无止境地向大元帅府索饷索械。因此引起中山震怒，传召二人申斥：“你们戴了我的帽子，却来蹂躏我的家乡”。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病重，陈炯明命林虎、洪兆麟入犯广州，刘杨二人意志动摇。黄埔军校组成东征军击溃叛军，陈逆逃往闽南，刘杨二人均按兵不动。1924年12月，与英帝、北洋军阀段祺瑞、云南军阀唐继尧、广东军阀陈炯明勾结，意欲推翻大元帅府。6月4日，大元帅府罢免刘杨二人职务，6月12日刘杨两部兵败，刘携200万巨款逃往香港。复又派人秘密去两粤联络绿林、土匪企图死灰复燃，然刘在港两三年嫖赌抽大烟挥霍殆尽，被迫去云南依傍龙云作食客。抗战时，经龙云推荐，刘得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又在昆明出任中苏友好协会会长。1945年10月，龙云被免除云南省主席，刘在昆明站不住脚，乃迁居香港。50年代初亲撰《第三势力宗旨》小册子派发于流亡人之中。1972年病故香港。

㉑ 据刘震寰说“对于工作的开展，美国愿意暂尽绵薄，先以五十万美元做开办费用。以后的经费，他们希望港方同仁提供预算。这位美国朋友说毕之后，立即从皮包里面拿出来一张由美国国务院签署的美金支票来，要交给张发奎。但对于这笔钱，经过大家的一致见解，认为在工作未开展以前，没有使用该款的必要，并未接受。对于这一点，刘氏认为香港朋友是充分的表现了大国民的风度”。典出《西南老将刘震寰传记之十：最初在香港搞第三势力内幕》，刊于《春秋》第175期，1964年10月16日出版，作者金典戎曾任北平行辕（主任孙连仲）参谋长、东北行营交通处长，哈尔滨警备司令，其本人流亡香港后也加入了第三势力。

㉒ 据李璜回忆：“许崇智在石塘嘴开厅大宴群雄，酒酣耳热，一面高谈其反共大有办法，一面命女侍为之捶腿，意在令美国人闻声而至；或者因其开口甚大，志不在小，而美金终未到手”。

㉓ 周天贤（1908—1989）：湖南临澧县人，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1937年7月，中止东京早稻田大学研究院学业，回国参加抗战。历任三民主义青年团湖南支团组训组长、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省参议员、三青团中央干事、国民党中执委、立法委员等。据黄宇人在《国民党失去中国大陆的原因》一书中回忆，1948年底，周曾秘密邀约三青团各省市亲信人员去汉口开会，要他们回去发动所谓局部和平运动，逼蒋早日下野。1949年9月初，李宗仁授意顾孟余纠集桂系立委组织自由民主同盟，推举顾为主席，童冠贤为书记，周天贤为组织组副组长。避居香港后，他又处处以代表桂系的姿态自居。战盟解散后，周回台湾继续担任立法委员。1989年8月17日心肌梗塞逝世于台北中山医院。

㉔ 黄如今：曾任东北大学校长、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书记长，此处英译为 Huang Ju - Chin，疑译错——与另一黄宇人（Huang Yu Jen）混淆，然此处人名似应系黄宇人。

㉕ 王厚生：著有《中国之路》（又名《第三势力与中国前途》）。

㉖ 刘裕谔：1950年代任《联合评论》执行编辑。

㉗ 刘子鹏（1912—1993）：浙江龙泉人，立法委员，青年党中执委，在港任自由出版社总经理，主编《自由阵线》周刊。

㉘ 谢澄平（1905—1992）：安徽当涂县采石矶人。18岁考取上海自治学院而未读，但得该院院长张君勱许其拜之为师，并承张氏介绍为梁启超弟子。翌年考取北京大学。1925年初，与各大学社组织标榜国

家主义的团体国魂社，发行国魂周刊，国魂社为以后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北京团部的骨干。1932年正式加入青年党。1930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1936年获东京帝大史学博士。自1930年起先后任教于成都大学（诶何鲁之）、广东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中央大学、珞珈山特训班、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国立东北大学、四川大学。1935年主编青年党的《青年生活》半月刊，1944年兼新中国日报总主笔。翌年随李璜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1947年4月青年党参加政府，由左舜生延揽为农林部政务次长，同年11月当选国大代表。1949年底，至九龙。12月3日左舜生创办之《自由阵线》周刊创刊于钻石山456号，因经营不易，由谢澄平接办。他增加“自由阵线”篇幅，继则成立自由出版社，接着创办英文版《自由阵线》双周刊，又设立平安书店、福利书店、田风印刷厂、《中声晚报》、中共问题研究所等坚持反共。1950年，在美方支持下，与张发奎、顾孟余等人搞第三势力，标榜反共反蒋，以中间力量的立场出现。5月18日与美国国务院巡回大使杰赛普晤面。颇得杰氏好感，答应透过亚洲基金会给予每月两万元的补助，协议由《自由阵线》周刊与美方合作，先从文化方面做起，建立据点，再由文化运动发展到政治运动，最后及于军事运动，形成第三势力整体架构。翌年在美方经援下成立自由民主战斗同盟，创办《中国之声》、《独立论坛》、《大道》等刊物，积极鼓吹第三势力理论。又与马义、齐星士等人合办自联出版社，延请徐东滨、丘然、徐速、侯北人、关颖仁、余英时等人加入自由阵线编辑部。1953年在港策动成立两个外围组织：独立民主运动与中国青年民主同盟，后者骨干为胡越；许冠三、陈濯生、丘然、徐东滨，创办《祖国》杂志，组成友联出版社。1959年因人事与财务问题（据香港《展望》月刊1961年4月号披露，自由出版社十年接受各类美援共港币2800万元，其中1/7耗于赌马；6月号称：美援正式入账仅800万港币）离港，远走东京，自由阵线与自由出版社亦告落幕。1960年执教于东京上智大学，1969年任加州大学史学荣誉教授，历16年撰写《中国文化史新编》。1992年8月7日病逝加州，享年87岁。

⑤⑥ 何鲁之（1891—1968）：青年党创办人之一，四川华阳人，留法学生，曾任成都华西大学教授，1947年任国民政府委员。1949年冬与杜鲁门的远东巡回大使吉赛普在港晤谈，决定发展第三势力，于是参与创办自由出版社，创刊中英文《自由阵线》等。回台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1968年卒于香港。

⑤⑦ 翁照垣（1892—1972）：潮州人。1925年参加中国青年党，1929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1931年自法国航空学校毕业后回国，出任十九路军一五六旅旅长。1932年淞沪战事爆发，翁率部以装备落后的血肉之躯奋起抵抗，同日寇的铁甲车、炮兵缠斗34日之久。日寇三易主帅，增兵至10万人。1933年参加闽变，出任闽南民军司令。1937年任一战区前敌总指挥，1938年任七战区东江游击司令。抗战胜利后解甲归田，1949年移居香港。著有《一·二八淞沪血战史》、《淞沪血战回忆录》及《翁照垣阵中日记》等。

⑤⑧ 龚楚（1901—1995）：广东省乐昌县北乡村，16岁投入粤军当兵，遂入韶关滇军讲武分校，历任粤军连长、鄂（程潜）军少校参谋，1925年加入了中共组织，到北江一带从事农运工作。宁汉分裂后，龚任北路农军指挥，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陈嘉祐第十三军麾下补充团。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后，龚率部脱离十三军，参加了八一南昌暴动，翌年1月23日在湖南宜章与朱德、陈毅等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担任第二十九团党代表。4月，红四军在郡县与毛泽东所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会合，后历经五次反“围剿”，广西百色暴动诸役；历任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常委、中共长沙市委书记、广西省政府（俞作柏）办公室机要秘书、省府船务处长、南宁公安局长（中共对俞作柏、李明瑞的策反主要是由龚楚出力的）、红军第七军（张云逸军长、邓小平政委）参谋长兼十九师师长、红十二军三十四师师长、红七军军长兼政委、东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东路军总指挥、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红军总部代总参谋长、中央军区参谋长、湘粤桂边区红军总指挥等职。1935年5月，叛变投靠国民党。抗战期间，在五战区孙连仲部任上校参谋处长，驻守江苏徐州以西的陇海铁路。后回第七战区任少将参议，七战区第一抗日游击纵队司令。1942年以复任张发奎的四战区第四十六军少将参谋长、军官训练团总队长、军委会少将参谋等职转战南北。胜利后退役，一度担任徐州市长。不久去职返粤，出任广东省参议员。后任广州行轍少将高参。1949年3月任仁化县县长，5月任广东省北江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949年底赴香港。50年代初，加入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担任组织部副部长。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后，美援停付，香港的第三势力自动瓦解，龚楚改名龚松庵，脱离政治漩涡，转而兴办实业。此后40年间，他曾移居美国拿了绿卡，但因语言阻隔和生活习惯差异，又重归香港。1990年返回大陆故乡定居，1995年在家乡去世。

⑳ 从张发奎、李宗仁来往函件知，张发奎主张李自动辞去代总统，以在野身份推动第三势力运动，1950年1月16日李复黄旭初电云：“组党尚非其时”。于是香港的第三势力运动遂以顾孟余、张发奎两人为中心分途发展。顾孟余和童冠贤倾力邀请黄宇人加入自由民主大同盟，黄则提出条件：大同盟必须和桂系撇清关系，与桂系分手。后来黄宇人力劝李宗仁，李终于同意桂系退出大同盟。从此自由民主大同盟无疾而终。

㉑ 黄旭初（1892—1975）：广西容县人，陆军大学四期，在新桂系中从排长升到军长，拜陆军上将，自1930年至1949年入主广西省政府兼国民党中央委员近二十年。七七事变前夕，桂系利用民气，掀起北上抗日大纛，获得全国民众响应。可黄旭初在梧州秘密接受大批日援军械。抗战军兴，李、白在国民党中央与战区担任要职，无暇兼顾广西，黄旭初权力逐步膨胀。解放军渡江时，黄旭初在广西“减租限田”，还派出土地改革督导团，以笼络人心，然黄旭初大哥、大地主黄晓初在家乡容县带头违抗，广西土改不了了之。1949年12月赴香港。1950年春，奉李宗仁指示，在蓝塘道张发奎公馆开秘密会议，在九龙青山酒店碰头筹组第三势力。黄本人秘密收购了香港《中声日报》，要该报成为第三势力反共反蒋的喉舌。同年秋，蒋介石派雷震、洪兰友来港，邀黄赴台，被黄婉拒。1950年夏，香港华侨日报刊登一则黄旭初贪污的新闻，黄聘律师关学林入稟法院控告该报诽谤名誉罪。华侨日报总司理岑维休自知理亏，在香港各大报显要位置连登三日向黄旭初赔礼道歉的启事，并赔偿1万元讼费，又将涉案记者开除，始获与黄庭外和解。1951年移居日本横滨，1958年末返回香港。旋被台湾当局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1975年11月18日病故于九龙。

㉒ 英文原文为 Chang Wei -，缺字。译者自《广西通志》之《民政志》分册查明系张威遐，1947年1月22日接陈良佐任广西省民政厅厅长，1948年10月转任桂林绥靖公署秘书长。

㉓ 林茂：黄旭初的亲信，郑介民的表弟，曾在国防部二厅任职，还做过柳州专区行政专员。

㉔ 陈濯生：张发奎、顾孟余利用美援资助陈濯生开办友联出版社、友联研究所，出版了不少高质量的学术性书刊。后者专门搜集与分析大陆资料，提供美国方面参考。友联成立于1951年，创始人陈濯生、胡越，核心人物有史诚之、徐东滨、邱然、萧辉楷、刘圃林等。陈、胡二人原参与黄宇人的《独立论坛》，后加入谢澄平《自由阵线》，由依附而独立。美方予以长期经援，并委托搜集大陆情报且派遣人员赴大陆活动。因经费充裕，友联集团发展速度极快，其分支机构遍布新马泰婆罗洲等地，宣传活动以香港、新、马为主。友联表面上系文化出版机构，实质上是政治性集团，设有不公开的政治组织中国青年民主同盟。该同盟由胡越任主席，徐东滨任秘书长。该盟以《祖国》周刊为喉舌，报道大陆动向，探讨反共策略，又以《大学生活》与《中国学生周报》争取大中学生。友联经费来自香港美新处、美国之音、亚洲基金会、福特基金会以及天主教会。其中美新处与友联签约，按期收购该社出版之书刊；亚洲基金会则分类签约补助。另该社每周将大陆重要新闻整理汇译成英文资料，并收购中共书报影印副本后售予美国各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机构。然而自1959年起，台湾当局抗议美方支援友联的反蒋政治活动，致使其主要经援者亚洲基金会逐年削减补助。1964年《祖国》改版为月刊，此后逐渐萎缩；友联出版社则转为出版大中学教学参考书与学术论著，于1980年代中期结业，所存资料全部售予浸会学院图书馆。

㉕ 1945年夏，张君劢应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之邀前往讲学，但他提前于1944年底赴美，在国会图书馆取得一个专用阅览室准备有关中国哲学史的讲稿。国民政府通过教育部汇出美金3000元，作为张在美国的生活费，他的弟弟张家璈也在华盛顿，对他略有资助。张君劢藉博士学者与国社党党魁的名义，频频走访美国国会议员、政界闻人以及著名科学家。1945年5月，他又被指派为中国出席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成立大会代表团团员（共八人，宋子文任团长），凭借此一衔头，张君劢的交际层次更为提高，会晤马歇尔是在这一段时期。

㉖ 据李璜回忆，他是1949年9月中自成都飞来香港的，“时张君劢先生在澳门，约谈之后，亦劝我留在海外，再行集合同志，徐图恢复。殊不料在香港一年有半，接触下来，谈到恢复只有令人灰心丧气。逃来香港之亡命客，除青少年外，多数旧习甚深，虽有仇恨，已失斗志，不足与谋国事”“策士型（人物）中有一位霸才无碍的李微尘先生，却为我所欣赏。我之得晤某院长（译注：童冠贤），亦微尘强载我往。某院长居太平山顶之一别墅；入其座中，并无言及若何政治计划，而遂以万元美金支票付我，请我随

意去办书刊，令我莫明其妙。茶点虽具，我无法耐坐，拂袖而去。微尘追出门外，惊问何故便去；我便以四字答之：“太不成话！”夜，微尘再来，向我道歉，我只以“霸才无主始怜君”七字安慰之，劝其自作长计，莫白负时光。自是，微尘不复来了……但感到如此混乱而且污浊的环境，实令人难于安居。适韩战因美国出兵直捣北韩，中共败退，俄国有增援之谣，遂使香港富商恐惧。我之东道主人刘德谱兄约我去游南洋，以作狡兔之谋，因于1951年夏初离港南游，止于北婆罗洲，前后居住了七年，离开香港是非场所”（《学钝室回忆录》页720，726—727）。

然而李璜的回忆录，只字未提及，他本人多次出席在黄宇人寓所定期召集的“民主中国”座谈会，仍以不能守秘为理由，坚决反对左舜生介入。1950年12月在张发奎的蓝塘道寓所举行的座谈会上，李璜报告说，青年党的老友赵毓松（曾任吴佩孚的秘书长、汪伪政府教育部长）已在东京与麦帅取得联系，麦希望香港民主反共人士团结起来，在华南举事牵制中共，东京盟总可予以支援。李璜又说，赵毓松写信让他在香港策动，他认为机不可失。张发奎遂派程思远赴日考察。直至1957年8月，李璜还在香港出席了大团结运动的第一次座谈，进而成为翌年成立的中国民主反共联盟的核心成员。

④ “尚有妄人蔡文治在冲绳岛美军基地设立党政军机构，自称海陆空军总司令，一时开府建制，俨然独立一军国也……蔡妄人不知从何处得到我的香港住址，也来信聘我一个高等顾问，并写明月致车马费美金若干。我收到后，立即原封寄还，并附告将离香港远游，不再过问国事，盼勿再来函件。然而这封无聊函，毕竟为我添上麻烦。因此聘函系一个身穿海军服的美国娃儿与我送上门来；这一下，引起香港警察总局政治部的注意，把我请去，问我在香港有无军事行动。幸我还留有寄还聘书的邮局挂号收条在手，为之说明我并不认得蔡某其人，其来信已为原封退还。原来香港如此复杂，香港警察总局政治部已经将政治色彩显露而又有党派（背景）的重要人物，都一一加以注意着的。言论自由与信仰自由，英国人有其传统习尚，并不加干涉；但殖民地政府最怕这些亡命客有所行动，把香港局面弄乱了。因为我在殷实而有声望商人刘德谱家里住过，其政治部主任都知道、对我尚算客气，不过东问西问，也盘诘我两点多钟，使我甚为难受”（参见《学钝室回忆录》，页724—725）。

④ 邓龙光（1896—1979）：国大代表，曾任广州行辕副主任。

④ 韩汉藩：曾任国民参政员。

④ 据程思远说：“台湾当局知道顾张联盟有美国中央情报局作后台，不好公开出面破坏，便从收买伍宪子入手。伍宪子在重金引诱下秘密去了台湾，事前曾相约双方严守秘密，但台湾当局敦促他参加一个庆祝二十的纪念大会，并故意介绍给美国大使馆的官员见面。随从台湾当局就向美方提出抗议，说华府正在支持台湾，另外又支持张顾在香港搞第三势力来破坏台湾。美国当局不得已把那个哈德曼调回去加以申斥。几个月后这位好汉又回到香港，对张顾发牢骚说：‘你们说没有钱不好办事，但有了钱又闹纠纷！’从此，去菲律宾小岛建立基地的宏伟计划就被束之高阁了”。（参见《政海秘辛》页238）。

④ 据伍宪子门生胡应汉说：民41年9月19日侍坐，吾云：“先生由台回，外面流言先生得了台湾三万美元，又说先生应台湾当局之请，将游美国，俾此间反蒋者减少一个领导人物。吾则不信先生坚卓平生，肯改变于一旦！”先生云：“吾于民37年即欲游美国，今仍有此打算；此何关台湾事？吾认为共产党、共产国际要彻底摧毁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实绝不容宽恕它。故认定凡反共者即是朋友，即须合作。台湾当局几度相邀，台湾是中国反共基地，我何故不去？我平日虽不满意国民党之一党专政，然为了反共，即无意算旧账，即须并肩作战。我去台湾即本此观点而去。反共不一定在香港，游美国更可以反共。流言何必理它！事实尽可以答复它！”。引自胡应汉辑著《伍宪子先生传记》，香港四强印刷公司发行，1953年2月初版，页96。

④ 陈维周：陈济棠五兄，热衷于占卜算命星象堪舆之术。1935年，他专程去奉化溪口蒋介石祖坟观看风水，又两次窥见蒋介石端详面相，判断蒋氏晦运将至，必定江河日下权威不保，又让参谋翁半玄扶乩称陈济棠“大运已至，机不可失”，当可乘机问鼎中原，取蒋而代之。于是便有1936年6月1日陈济棠发动“两广事变”。事变前5月19日与白崇禧密谋时，陈维周称已就两广反蒋事与日本驻港领事接洽，已取得日本军方谅解，既派军官援粤，又可在华北对蒋介石施压，使蒋腹背受敌。然事变不到40日就被收平，经五次迁移、三次埋葬，最终安置到花县“龙口正穴”的陈母遗骨也惨遭盗劫。陈维周性格贪婪，长期承

办广东多种捐税，从中牟取暴利。

⑤② 李璜说：“此时在香港，如此品类不齐、穷极无聊者众，美国人竟遣派两三浮薄少年前来，立谈之顷，莫明其妙，便乱散美钞，或三五万，或十万八万，并无整个计划，而姑以试试看的心情，令一些手中已无寸铁之时过人物，为之入大陆觅情报，或打游击；美钞这样化法，只有被骗而大闹笑话。因是传闻有刘震寰骗得六万美元，声言拿去广东打游击，而本人先在九龙新界未动，于是有‘在新界打游击’的笑话流传”。（《学纯室回忆录》，页723）。

⑤③ 茅崎镇：在东京神奈川县。1951年春，美国中央情报局透过盟军总部第二处拨出东京神奈川县茅崎镇上一座兵营的几幢木屋充作自由中国运动的总部。美方派一名少校和几名助手协助蔡文治筹办来自香港的受训人员之接待工作。流亡香港初期予蔡以经济援助的陆大十三期老同学刘永昆夤缘出任自由中国运动通讯学校校长，迅即率领一批通讯技术人员由香港经冲绳来东京。刘永昆在程潜上将麾下任华中补给区司令。1949年后，刘携带巨额美金并把大批军用物资运港，换成港币后便成了富翁。刘在台湾被通缉在案，所以成为蔡文治的核心，蔡夫人吴佩琪出任通讯学校英文教官。

⑤④ 黄秉衡（1901—1989）：浙江余姚人。毕业于山东烟台海军小学，曾去美国学习飞行技术。1923年在广州大沙头参与创建航空学校、担任飞行主任兼教官，并一度代理航空局长。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航空顾问。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航空处处长。1929年任航空司令兼中央军校航空班主任；9月任军政部航空署副署长。1931年真除署长。1933年任全国航空建设委员会委员、中国航空协会员，翌年任航空委员会总务处长。1938年任重庆空军司令。1939年任空军第一军区司令官，次年任航空委员会参事室首席参事，次年任中国驻美大使馆空军武官。1945年任国民政府参军。黄秉衡于1920年粤军驱桂之役曾驾水上飞机向桂系盘踞之观音山投弹，1930年参加中原大战，因功受勋多次。1949年挟巨资来港，由上海富商王晓籟之子介绍，结识蔡文治。1951年被蔡文治任命为自由中国运动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兼香港工作站站长，化名孙复刚。1968年5月才自港返台，1979年冬自港赴美定居。1989年1月16日病故于洛杉矶。

⑤⑤ 胡越（1922—1980）：原名胡灵雨，笔名司马长风、高节等，辽宁沈阳人。1946年夏毕业于国立西北大学。1949年4月从北平至广州，6月至台北，与殷海光、许冠三、劳思光等举行学术座谈会，每两周一次，提倡自由民主；12月至香港，助丁文渊（同济大学前校长）筹办《前途》半月刊，参加第三势力活动。1951年奉顾孟余派遣至塞班任海外联络员。蔡与顾、张二人分裂后，胡在蔡文治压力下脱离自由民主战斗同盟，宣誓参加自由中国运动。嗣蒙塞班训练学校校长王之赏识，出任政治教官，并为王之撰写《我们的基本信念》一书。1953年向王之出谋献策，向美方建议摘除自由中国运动的招牌，由王之取代蔡文治领导这个500人的华人团体，大家给美国国防部当雇员，支取高薪，且绩优者予加入美籍。东窗事发后，分裂活动被蔡文治教平，王之被蔡逐走，张发奎系统人员遭受整肃，胡越险些入狱。1954年遣散返港，与陈濯生等人合办友联出版社，出版《祖国》周刊、《中国学生》周报、《儿童乐园》杂志、《大学生生活》月刊等。1956年任《联合评论》周刊编辑。胡又暗结港澳青年组织“中华自由军”潜入大陆后，历数年之久。1970年后历任榭仁学院、浸会学院中国现代史、现代文学教授、友联出版社社长等。1980年5月旅游美国时在纽约机场中风，6月25日因积劳过度胃出血逝世。

⑤⑥ 廖秉凡（1908—？）：湖南益阳人，生于1905年，军校六期，陆大特别班五期，陆大研究院十期毕业。1942年后历任军委会西昌行营少将高参、参谋处长。1946年后历任中央训练总团教育处长、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第三处少将处长、广州行轅军事处长、广州绥署第三处少将处长、陆军总司令部办公厅中将主任。1949年曾在香港加入44人声明公开拥护中共政权。1978年后担任广东省第五、六、七届政协委员。1985年6月、1997年12月连任全国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及广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顾问。

⑤⑦ 涂思宗（1897—1981）：毕业于陆军大学第一期。早在国民革命军东征时，即历任连营长，血战梅县的松口和大埔的三河坝，身先士卒，枪法如神。北伐初，出任第一军（军长何应钦）第三师第七团上校团长。与北洋军阀孙传芳部之周荫人军激战于闽浙线，由闽东福安直捣杭州，晋升第二十二师少将师长。抗战军兴，奉委为福建汀龙师管区司令；不久调任第九集团军中将军参谋长。之后返回重庆，服务于军令部。抗战胜利前，盟军陆空部队进入中国战区，涂奉命在桂林设立军政部办事处专司联络。1949年后解

甲南来，蛰居九龙，在颠沛流离中犹以韬锋余生，与张发奎、蔡文治等流亡军人图谋恢复，任华南游击军区副司令。其时寓居屯门附近之清凉法苑，1981年4月20日病逝九龙玛嘉烈医院。

⑤⑧ 然而刘震寰本人不承认自己加入过第三势力，遑论入袋六万美金，刘自称托病不见美国人哈德曼，且对张发奎说：“我和你们的意见完全不同，我主张团结台湾，你们主张由自己来干。如果我去出席，我们两个人先就有两种意见，叫美国人看来不是笑话吗？我不出席并不是表示消极，你就告诉美国朋友说我病重就得了！”，典出香港《春秋》杂志1964年10月16日刊载之《西南老将刘震寰传记之十：最初在香港搞第三势力内幕》，作者金典戎。

⑤⑨ 雷啸岑在《忧患余生之自述》一书（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10月版，页178）中说，1952年10月5日上午10时左右“忽有香港（警务处）政治部的洋帮办率领武装警察八名，驰来高士威道廿号四楼《自由人》社搜查，经一小时翻箱倒篋工夫后，把我办公桌上的所有公私函件一概取去。又在助理员顾君的房内搜出正在冲绳岛搞第三势力的中国军人蔡文治给顾氏的密电本，还有蔡氏署名委派军职的空白委任状与关防私章等等，即将顾君捉将官里去。顾系前任主编（刘百闵）所用的助理员，我素不相识，更不知道他给蔡文治在香港搞招兵买马工作……次晨如约前往政治部报到，一洋帮办大声诘询在顾君房里抄出各项违禁品是否我教他干的？我声明顾君非我所雇用的人，彼此素昧平生，他跟蔡文治往来，我更不知道。但那洋帮办并不满意我的解释，反问我知不知道犯了相当严重的罪行？……那位私通蔡文治搞第三势力运动的顾君，不久由港府递解到台湾去了”。

⑥⑩ 整肃的矛头指向张发奎派去的人以及参与王之倒蔡的人，以塞班学校教官为主。张发奎口述一概提冲绳岛，其实他对蔡文治的机构部署茫无所知——冲绳仅仅是自由中国运动属下仓库与监狱的所在地，其军政干部训练学校设于塞班岛，总部与作战学校、通讯学校设于东京神奈川的茅崎镇。塞班岛是太平洋西部马里安纳群岛之主岛，邻近关岛，面积比香港岛略小，战前由日本统治，人口有3万。1944年美军强攻塞岛，日军战死3万余人，守将南云忠一自杀，2万多平民死于战火，另有4000多妇孺跳崖自尽。战后名义上由联合国托管，实际归美国管治。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中央情报局与驻日盟军总部寻求在中国大陆重建其情报网，于是便选择在塞班组建亚洲抵抗运动学校。蔡文治在香港招收流亡军官，部分受训者事先不知道要空投大陆。

⑥⑪ 警务处政治部一再通知顾孟余应讯，然他置之不理；最后乃出传票，限期到案，且声明若再抗命，即以拘票从事了。顾只得如约而至。进入办公室后，站立许久，不得就座，然后由一洋人厉色云：“我们知道你在中国政府作过部长，可是这儿并非中国大陆地区。你来到此地，就得接受本地政府的约束。虽然允许你在此搞政治活动，却不能允许你有违背法令之自由，否则驱逐出境”。洋人对顾申斥一通后，挥手叫他“回去吧！以后随传随到，不得违误”。顾孟余遭此凌辱，遂萌离港之意。事见雷啸岑（时任香港时报总主笔，曾任安徽省教育厅长）撰《政海人物面面观之顾孟余》，原载香港《大成》月刊1974年11月1日，页26。

⑥⑫ 据香港星岛周报1952年7月10日出版的第35期报道，绪方竹虎是记者出身，战时曾任《朝日新闻》编辑局局长。1944年小矶国昭继东条组阁，绪方入阁任国务大臣兼情报局总裁。1945年春绪方为拯救日本于败亡，试图与搭通重庆内线的汪伪考试院副院长缪斌议和，意欲取消汪政府，设留守处，停战罢兵，让蒋氏还都南京。因日本军方反对，此一“重庆工作”告吹。战后，他由吉田茂提携复入政界发展。《中日和约》签订前，吉田欲派绪方访台，借此探听中国内部政情，顺便遍访东南亚寻求政经情报。启行前会见了经日赴美的张君勱，始知香港第三势力概况。绪张会晤消息传到台湾，使他抵台时受到隆重欢迎，蒋介石接见绪方三次之多，何应钦告诉他：蒋总统很关心张发奎的态度，如果不存异心，政府是希望他来台湾派他一些用场的。绪方抵港后与张会见时，张对张君勱指摘尤多，曰：“我是军人出身，原不懂得政治，但他们称为政治家的又何尝懂得政治呢？”

⑥⑬ 1927年8月张国焘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参加南昌暴动，担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农工委员会主席。

⑥⑭ 宣铁吾（1897—1964）：浙江诸暨人，1924年入黄埔一期，1945年入陆军大学将官班甲级第二期受训。自1924—1949年历任排、连长、国民政府警卫旅参谋长、国民政府警备司令部参谋长、陆军第八

十八师参谋长、军委会委员长侍卫长、浙江省保安处长、陆军第九十一军军长、财政部缉私署署长、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淞沪警备司令、中训团上海分团主任、衢州绥靖公署副主任、浙江省政府委员、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副总司令等职，曾参加“一·二八”抗战与淞沪会战。党政职务任过南京中央军校特别党部筹备委、三民主义青年团浙江支团筹备主任、中央训练团上海分团主任等。彭昭贤任内政部长时赴沪视察，时任上海警察总局局长的宣铁吾对彭说：“天下的都市当以上海为最乱：上海七百万人口中，顶多只有一百万人有正当职业，其余六百万人除开妇女和小孩，人人都是天天乱动脑筋，时时刻刻打算浑水摸鱼！至少这些人需要依靠扰乱社会来维持生存。如此这般，上海市面哪有不乱之理！”流亡香港后，无论“民主中国”座谈会与战盟，宣铁吾都在核心地位，内部纷争常仰赖宣从中奔走调解。然其携港财物均被妻妾卷逃，晚年穷蹙了倒，终于回台湾。1964年2月6日病逝台北。

⑤ 金侯城（1881—1968）：江苏宝山人，1881年生，1900年被江苏省选派赴日留学，1912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后，回国主持宝山县议会。1913年入中国银行襄理金融。1936年后历任国民政府铁道部简任秘书、民社党秘书长、国大代表、民社党最高顾问等。1968年元月15日病故台北。

⑥ 彭昭贤（1898—1979）：山东登州府牟平县人。1921年协助熊希龄筹划赈灾，护送五列车粮油抵俄，顺便应苏俄之请赴俄南协调华籍红军近三万人回国事项。旋考入莫斯科大学进修社会科学。1925年秋毕业回国，任教燕大、华北大学。后赴沪联络工人、学生、帮会以行动配合北伐军攻占上海。蒋总司令抵沪后，委彭出任第四纵队政治部少将主任。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回任国民政府简任秘书，复调纽建内政部主任司长五年，1930年荐参谋总部上校科长盛世才赴新疆，造就盛世才三年后出任新疆边防督办，雄踞西陲十一年半。1933年夏，奉蒋命赴新疆调解内争，劝论盛世才释放汪精卫所派宣慰使黄慕松回京。彭氏留疆十个月，游说苏俄驻迪化代表，促成俄方以三百万金卢布的军火援盛，遂击败马仲英、张培元，巩固了盛世才在新地位。又向盛进言用俄援武器装备绕道西伯利亚归国的十多万东北抗日义勇军，新疆局面遂告稳定。1934年夏调任陕西民政厅长，历十年。抗战胜利后，出任内政部长。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决定与中共和谈，彭被委为北上五代表之一，中共即表示反对。1949年8月携眷抵港，居半山罗便臣道75号二楼，彭被委加入第三势力由该团体决策人童冠贤推荐，一度任中国民主战斗同盟青年部副部长。不久，举家迁居日本。1979年5月9日病故纽约。

⑦ 据解放军中南军区司令部的档案记载：“1952年4月14日，‘自由中国运动’武装特务四人空降于粤北翁源县鲁溪圩地区。经当地民兵围剿，俘正指挥华秉铨等二人，击毙副指挥谭天等二人，缴获电台两部，枪四支。”

⑧ 蔡文治去美国后受聘担任美国国防部顾问，负责研究国防军备，直至1978年退休，并加入美国国籍。1980年政治立场作180度转变，9月应叶剑英邀请回大陆访问，参与筹建全国黄埔军校同学会，任理事（会长徐向前，顾问聂荣臻、许德珩）。还联络少数海外黄埔同学及其家属，成立黄埔同学海外联谊会，任副会长。1984年2月1日与李默庵、宋希濂、侯镜如在美国《华侨日报》发表《旅美黄埔同学及其家属促进中国统一筹备会宣言》称欲“为促进中国统一而奋斗”。同年应邀回大陆出席黄埔军校建校六十周年纪念会，发表演说《融化冰霜为甘露》。1994年1月9日死于华盛顿。

⑨ “太保”是指蒋介石的黄埔门生在北伐胜利后组织的锄奸团体复兴社骨干，但宣铁吾未成为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只是复兴社中央干事。

⑩ 1917年梁启超任财政总长时，曾以中国银行总裁相委，张君劭知中银情况复杂，乃转荐弟弟嘉璈。其一生好名之心胜过好利之心，所以把中银总裁这个肥缺放弃了，似有自知之明。

⑪ 李大明（1904—1961）：宪政党前身是康、梁保皇党，张君劭早年在日本师从梁启超。在革命浪潮冲击下，保皇党改名宪政党，在檀香山办了一家小报，由李大明主持；该党又在旧金山办了一家《世界日报》，由伍宪子主持。抗战前伍宪子离美返港，该报遂由李大明接管，任社长，聘留学生黄伯英任编辑。社论每日一篇，由李大明与黄伯英轮流执笔。1946年11月，第一届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民社党在政府分得一个部长席位，此系李大明所垂涎欲得的，但张君劭却给了别人，只给李大明一个副部长职位。李对张君劭大为不满，抛弃副部长的乌纱帽，拂袖回美国去了。1950年代初，张去美国拉拢宪政党人，李大明积愤未消，在《世界日报》上扬言要张君劭向宪政党公开道歉。

⑦② 陈中孚（1882—1958）：江苏吴县人，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1917年11月任大元师府军委会委员。1926年任广州国民政府秘书。1929年任江苏省政府委员。1931年12月任国民党第四届候补中央监委。1938年3月投靠日伪任维新政府行政院院长梁鸿志顾问。1941年任汪伪国民政府委员。

⑦③ 王同荣（1900—1970）：安徽人，国民党籍国大代表，《联合评论》周刊社务委员。《联合评论》于1958年8月创刊，不久成舍我由台北赴港，对左舜生和黄宇人说，他从台湾动身时，雷震特别嘱咐他转告左、黄二友，《联合评论》中的王同荣乃是国民党特务，要加以小心。国民党中六组驻港特派员孙家麒亦经香港自力出版社推出《我为什么脱离台湾国民党》一书透露，王同荣属于调查局特工，台北情治机关每次开联席会时，调查局常有《联合评论》提供的小报告，而陈建中主持的第六组则无，陈乃雇用王同荣，王即“一稿两投”，详细的报告交给调查局，较不重要的寄给国民党中央第六组。典出《五十年代香港第三势力运动兴亡始末》，《历史的暗流》页117，台北元尊文化公司1999年1月出版。

⑦④ 燕云：原名邱然，另有笔名燕归来，北大文学院毕业。1955年3月受国际笔会秘书长大卫·卡佛儿委托，在香港组织国际笔会香港中国笔会，选出黄天石为会长，燕云为义务秘书，会员有易君左、左舜生、罗吟圃、黄思骋、徐东滨、徐速、孙述宪、胡越、陈濯生等近四百人，盛极一时。1950年代后期移居新加坡。1960年代赴德修读哲学博士，嗣任教于瑞士苏黎世大学。1950年代曾在香港自由出版社印行《新民主在北大》等反共作品多种。

第二十一章 在香港的日子

(1949年6月以后)

开始新的生活

1949年6月，我的妻子、义女琼芳与丽芳、义子威立以及侄女玉芳、云芳^①陪伴我赴香港。我们住在蓝塘道住宅，后又迁居大坑道，过着隐居式的悠闲生活。家里饲养了几只善唱的小鸟，房子周围是百花杂陈的花圃，闲来无事，也乐于自己去栽植修剪那些花草。清晨必在附近散步。有时找旧日袍泽缪培南等人聊聊天，或在家里看书写字打发时光。

威立在广州岭南大学念书，不久就离穗去了美国，丽芳在香港一家中学上学，勇斌的女儿云芳当时还是一个小女孩，她一出世就由我们收养，她的弟弟成立生在香港，也由我们收养。国军撤出南京时贵斌的女儿玉芳与琼芳都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念书，她俩南下广州同我们一起赴港，翌年又回到金陵女校。

萧文、李汉冲、吴仲禧和张励早已抵港。共军占领广州后，他们告诉我，想回归大陆，问我怎么打算。我不反对他们的意愿，因为他们在香港无事可做，何以维生！？他们回广州去了。

不久，李吴张三人回香港来游说我投共，我说：“不！我像个老嫗，毋须再醮。我有儿女与外孙，我不能离开他们，他们也不让我离开。然而你们像少女一样，是可以再嫁的。”他们说：“好，但我们也是您的外孙。再者，您说过要回大陆的。”我提醒他们，我从未说过要回大陆，我只是说过不反对他



张发奎与妻子刘景容银婚纪念。

^① 据崇正总会老人披露：张发奎早前在战场上被击中腹部，以致影响生育机能，终其一生无所出。

们回去。我的态度是：我本人既不去台湾也不去大陆，但我不反对任何人去那儿。

接着李宗仁在美国宣称，他在香港时就已任命我为华南游击部队总司令。我吩咐李汉冲帮我将我的声明交给报馆，否认有此任命。

麦朝枢^①也在香港，我每天都见到他。5月19日，他来函催促我回大陆。后来他独自回大陆去了。

我昔日的部下大多数去了台湾，譬如做过我的参谋长的陈宝仓、吴石、梁华盛、侯志明、丘誉等等；少数人留在大陆，例如左洪涛、李章达、莫雄^②等。甘丽初留在大陆指挥反共游击战争，1950年死于大陆。他的家属去了台湾。

有一部分旧属来了香港，如马维岳、杨清文、廖秉凡、潘奋南。

我率领第四军时的高级将领大多数去了台湾，例如薛岳、黄镇球、朱晖日、吴逸志、韩汉英与欧震，由陈诚照顾他们。

吴奇伟、李朗如与黄琪翔留在大陆。当然，中共党员叶剑英、张云逸、周士第等人没算在内。

缪培南、邓龙光来了香港。这些都是我率领第四军时麾下的高级将领。

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与蒋光鼐也是第四军将领，同我平辈或比我位高，他们留在大陆，成了民革的要员。

陈济棠去了台湾。

上述我所提及的人，不少人在大陆获委高职。譬如张云逸官至广西省省长，叶剑英任广东省省长；李朗如（原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副党代表）、吴奇伟等出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左洪涛任广东省政府秘书长。

吴奇伟偕妻子来香港时给我打了个电话，我邀他共进午餐。吃饭时，我提及1948年他儿子写给他的那封信，当时我读了深受感动。他哭了。我叫他别回去了。他的妻子要求我别再多说了。她说，她丈夫在给我打电话以后就哭过了。

谢膺白^③的例子是很可悲的。中共席卷大陆时他在香港。翌年，他想回广州，我曾劝阻。他比我年纪大，在此地生活很舒适——他的女婿在香港是个成功

① 麦朝枢（1896—1973），广东台山人，国立北大文学士。历任国立广东大学秘书、广东建设委员会秘书长、国民政府秘书、广州市府委员、上海文大总务长。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1927年1月任湖北省政府秘书长。1932年4月1日至6月20日任上海市社会局长。1973年逝世。

② 莫雄（1891—1980），广东英德人，广东陆军讲武堂毕业，加入同盟会。参加过讨袁、东征、北伐诸役，历任排、连、营、团团长。“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升税警总团中将团长。1934年至1939年在赣粤省三任行政督察专员。1940年任四战区北江挺进部队第八纵队司令，后任顺德县长、韶关行政督察专员兼“清剿”指挥官。1947年3月授少将衔。新中国成立后，任广东省政府委员、省政协副主席。著有《攻打观音山广州起义军》、《白马会盟》等。

③ 谢膺白（1892—1957），又名娶白，广东博罗人，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毕业。回国后在陈炯明部任漳州宪兵队副官。后毕业于黄埔二期，参加东征北伐，历任团、旅、师、军长及黄埔军校教育长等。1927年7月任第二方面军参谋长。1937年4月授少将衔。1943年1月任军事参议院参议。1946年7月晋升中将，还曾任广东省政府高级参议、顾问。1945年3月5日任江西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1949年夏被解放军俘虏，关押于武汉战犯管理所。1957年11月死于狱中。

的商人。他不听我的话回去了。

华岳高来香港看我，他同我是同乡，年纪也相近。自20年代以来他一直跟我，做了多年机要秘书，他的弟弟娶了我的妹妹。我要他留在香港，给他找工作。他说他不能从命，因为吴仲禧与左洪涛对他不错。他俩要他别离开广州，答应保护他。他已经答应了他们，所以他要回去。

回到广东后，华岳高被清算斗争，左洪涛也保护不了他。在被押回始兴县公审的途中，他从疾驰的汽车上跃下企图自杀，最后在始兴监狱中撞墙身亡。

1952年左洪涛^①被中共指控贪污。对此我并不惊讶，胜利后接收广州时，他曾非法攫取了几辆汽车。他贪图享受，我不认为他有资格做一个共产党员。

我拒绝应邀去大陆与台湾

大陆有许多人劝我回归。叶剑英任广东省主席时叫李朗如^②与李章达来港看望我，转达叶的意愿，要我回广州看一看。他不敢说更多的话。

何香凝托人捎信给我，李济深亲自写信给我^③。这封信是李朗如捎来的。李济深要求我回大陆，他回忆我们当年如何强烈反共，然而中共掌握了真理。

章士钊每次回港探望他的小妾都来看我，但他不谈政治。我见了他几次。^④

蔡廷锴受周恩来委托叫他的儿子蔡绍昌带信给我。^⑤蔡廷锴叫儿子传口信云：“尽管彼此的政治观点不同，但私人关系不应该改变”，他要年轻一代称呼我“张伯伯”，叫儿子转达问候。他的儿子在香港经商，我常常见到这对年轻夫妇，我也常常见到李朗如的儿子，他也在港经商。

所有这些人都希望我回大陆参观访问。后来，看到我坚决拒绝，他们就不再骚扰我了。

李宗仁的亲信程思远访问北京（按：时维1956年4月29日）后来找我，他说访问了大陆许多地方，为共产党讲了许多好话。他说周恩来托他问候我，还委他以重任——劝说高级民主人士返回大陆。我问游说对象是些什么人，他答：广

① 左洪涛（1909—1990），湖南邵阳人。黄埔六期，1927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上海吴淞区行动委员会宣传部长、粤赣湘边区纵队参谋长、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华南分局、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广东省第四第五届政协副主席等。

② 李朗如（1889—1963），广东南海人，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毕业。留日期间加入同盟会，曾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1912年任南京临时大总统府参军兼卫队长。1914年任中华革命军参谋长。1921年5月任非常大总统府侍从秘书，北伐时任第五军参谋长。1917年任广东省政府委员。1931年任广东革命政府参谋处处长。胜利后获委广州市长，未就职。1948年加入民主促进会。新中国成立后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广州市副市长等职。著有《商团事变》。

③ 7月19日李济深致张发奎函，催促张回大陆，在那儿，他的大多数旧同事都加入了革命阵营云云。

④ 据曾任军委政治部副组组长的刘志披露，1964年章士钊来港探亲时，曾数度访晤张发奎，密谈后，张在寓所宴请这位毛泽东同乡、1949年国共和谈代表团成员。张发奎很少在寓所留客用餐，李微坐在张府商谈公事后，张发奎从不留其便饭。招待章士钊，是罕见的例外。

⑤ 见1956年11月16日蔡廷锴致张发奎函。李朗如于10月21日也要蔡绍昌带信给张，信中说蔡廷锴在广东。蔡廷锴传达了周恩来对张的问候，称“请兄回祖国观察一下，并请兄有所指教”。

西的夏威、黄旭初、李宗仁等；广东的我和另几位。周恩来要他提醒我有一张郭沫若、陈铭枢、叶挺、黄琪翔与我抗战时在汉口的合影。周称呼照片上是“五虎将”——除了郭沫若，我们都是军人。照片上我们靠得很近，手臂缠着各自的肩膀，看上去很亲热。我确实已经忘了这张照片。周恩来要程思远对我讲，照片中五人，叶挺过世了，剩下四人除了我，现都在大陆。

此时我同台湾党政方面关系只是一般，我不支持蒋先生也不反对他。1950年，我收到台湾寄来的国民党员重新登记表格时，立即扔进了纸篓，因为我感到国民党的性质变了，我再也不想当这种党员了。我感觉台北正在进行的国民党改造，只是“换汤不换药”，国民党是没得救了！

从此，我不再是国民党员了。我自1931年以来一直担任的国民党中央监委，可是这个监委会只打蚊子。鉴于CC系大权独揽，中央监委会不敢批评，也就有名无实了。

一年多以后，我想出国旅行。我想申领“中华民国”护照，“外交部长”叶公超告诉我，蒋先生吩咐，我必须去台湾同他谈一次话。我拒绝了。



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复任“总统”。

在台湾的许多友人劝我去一次，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陈诚^①。自从共事于粤军第一师以来，我们一直是好朋友，我们的友谊始终不渝，他常常给我写信。

我同薛岳之间的关系不只是朋友关系。虽然我与他从未正式换帖结拜，然而实质上亲如兄弟。他的妻子以及弟弟都叫我“大哥”。但是我一直没有和他通信，我不想招惹蒋先生的怀疑。然而，十年前，我妻子刘景容去台湾看望过他。

^① 见1952年8月7日、11月14日，1954年3月23日、10月19日，1960年1月20日陈诚致张发奎函件以及黄镇球致张发奎函等等。

我同陈诚通信，因为他毕竟是“副总统”。他代表当局。我知道他同蒋先生十分接近。我告诉他，我想做什么，他就会答复我。

1954年2月，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准备就绪，国大秘书长洪兰友来香港催我赴台出席会议。我告诉洪，蒋先生是第一届国民大会选出的“总统”，由于第二届国大代表无法选举，蒋先生理应继续担任“总统”。第一届国大代表没有资格参加新的选举。我说，新的选举必须在大陆“光复”以后才能进行。

洪兰友常常来香港同这里的民主人士接触。^①

1960年2月，筹备召集国大第三次会议时，国民党派胡健中送来一函，希望我会。我重复叙述了对洪兰友说过的不该出席二次会议的理由，胡要我写封信给蒋先生，我拒绝了，我说蒋先生不会复函的。我要他捎信给陈诚，请陈将我的观点转达蒋先生。



晚年蒋介石

谁要求我寄发张君勱、左舜生、李璜、我等人在香港签署的《我们警告那些计划违宪的人》抗议信？刘裕略。我当然愿意签署这样的警告信。^②

有人奉派来港劝我出席1966年举行的国大第四次会议吗？没有。当然，有友人想劝我去台北出席。^③

【人们明知违宪不妥，但还是拍马逢迎，国大通过了“宪法”修正案，使蒋先生得以第三次连任“总统”。】

对亚洲革命的看法

大约1950年，马来亚（马来西亚西部土地的旧称——编者注）处于紧急状态。马来亚华侨钟先生表示想邀我去那儿训练一支游击队。钟先生是黄埔毕业生，在中国住了几年，胜利后返回吉隆坡。马来亚当局认为，凭我同共产党长期斗争的经验，我一定知道在马来亚如何对付共党。该国共产党由来自海南岛的华

① 见洪兰友3月9日、9月29日与10月23日致张发奎函。

② 见胡越1960年1月19日致张发奎函中夹附的油印警告信；又见于劳思光、胡欣平（即司马长风）等1960年1月27日致张发奎函之油印附件。

③ 见1966年1月26日、2月2日黄镇球致张发奎函。在第二封信中，黄指出：虽然左舜生等人反对过国民党，现已回台出席第四次会议。黄对张缺席感到不妥。张最后同意去台湾居住，虽然他在香港保留了住宅。

侨陈平领导。

邀请函是以华侨的名义签发的，我猜忖这是英国人怂恿的。我拒绝了这一邀请。为什么？他们要我带一批教官去，我们就讲条件：我想知道，当我们训练游击队的工作结束以及消灭了马共以后，马来亚政府如何安置我的手足。钟先生说，他们可以加入当地的警队。我不同意这项条件。

翌年，钟先生邀得华振中将军、林方泽将军等军人去马来亚帮助他们制订军事计划。华振中做过我的副参谋长，林方泽在广州行营任过高参，是海南岛人。他们出发前签了几年合约。约满后就留在马来亚定居了，现在还在那儿。

【我听到许多小道消息。十年前，一位在香港做进出口生意的印尼华侨黄先生，邀我出席午餐，他介绍我认识一位印尼上校。我还请了一餐。从这些接触，我得悉“中华民国政府”正在支持一批印尼军人反对苏加诺总统，这项行动是由蒋经国直接指挥的。^①】台湾运送武器、派遣军人去印尼建立联络处。印尼从台湾一家航空公司买了一架飞机。这位印尼上校是在他多次穿梭台湾的秘密旅行中路过香港的。

后来，当反苏加诺的行动失败后，印尼反抗军驻香港的一些代表不能返回他们的祖国，便携眷去了台湾。

中共的内部矛盾正引人注目。自共军攻占广州后，中共并不伤害阮海臣等反对胡志明的越南人，他们一直留居广州。当然中共是支持胡志明的。

我到香港后，新的越南友人，如黄南雄、刘德中来看望我，后者在陈诚去世前很活跃，陈诚决定帮助他。我认识许多河内政府官员，直至十年前，河内的华侨还一次次捎信给我向我致意。例如胡德诚就希望我去河内访问。

张君勱 1954年9月6日来信，建议我同罗永扬一起访问越南。张听说吴庭艳政府想邀我去越南训练南越军队，他认为这是让第三势力立足于越南的捷径，罗永扬是张君勱民社党的成员，是军人。但我没有接获邀请。

我安排杨清文去越南。我想了解当地情况。我有个姓陈的朋友拥有几艘轮船，他从事走私活动，但与海防土著没有直接联系。我介绍杨清文陪他去越南，给他当翻译，杨可不知道陈从事走私活动。我要杨去考察北越形势，我认识那儿许多领导人，杨则自称是个生意人。他去海防看望了张中奉与胡德诚，转达了我的问候，他们则委托杨回复对我的致意。

^① 据曾任蒋介石专机机长、空军副参谋长的衣复恩回忆：1958年有一位陶姓（化名）的印尼华侨，暗中与台湾联络，希望在台湾建立反对亲共之苏加诺政府的基地，且委请台湾复兴航空公司出面购买C-54和B-26机各一架，用以支援苏拉威西万雅佬地区的反共武装。该部在菲律宾获得最南端的小岛——大威岛作为出击点，岛上辟有机场可供飞机起降。于是衣复恩奉蒋经国之命，协助情报单位从事此项支援印尼反共武装的秘密任务。他驾驶那架B-26机与复兴航空总经理陈文宽驾驶的C-54一齐飞往大威岛，同行者有十几位印尼反共集团的人，其一是反苏加诺的印尼空军司令，另一位是年长的曾任农业部长，他们来往奔走于印尼台湾之间。两架飞机装了汽油和炸弹飞抵大威岛后，见有中情局的报务员与美军机师介入。衣复恩指挥飞机执行轰炸任务，耗尽C-54携来的炸弹才返回台湾。反共武装所用的武器与军服都以轮船运往印尼。60年代中期苏哈托推翻苏加诺政权后，对那批反共分子都予以重任。

1957年，我认识已久的友人、吴庭艳政府的官员阮福堂偕妻子及南越总统府秘书长武文海的夫人来港。一位香港商人介绍我们认识，一位在越南居住了许多世代的张姓华侨充当翻译。阮福堂告诉我，越南人民对我非常敬仰。接着，12月3日武文海写信给我，感谢我对他夫人的殷勤款待，并表示邀我去南越访问。

【此时，我会晤了南越国防部长阮友固。他刚访问台湾，阮高其叫他不要回西贡去，他就留在香港了。1967年8月27日，他给我他的照片。】

武鸿卿与严继祖在吴庭艳主政时去过台湾，但他们在南越政府中并非高官。

【就在最近——1967年8月以后，武鸿卿——南越总统候选人，派人持他的名片与照片来看我，此人说，如果武鸿卿当选总统，就会派代表去同胡志明举行和谈。考虑到我能够影响胡志明，他希望我派一位代表同他一起做事。据悉，美国人已告诉武鸿卿，他们支持他的和平努力。】

有人批评我支持共产党、接近像胡志明那样的共产党人，还有人说胡志明能攀上北越共产政权的元首宝座是由于我的扶植。我坚信，我奉行的对越政策自始至终是正确的。至于越南人之间的冲突，我相信中国的古话：“得民心者得天下。”

……

如果美国人不支持南越政府，胡志明早就吃掉南越了。据我所知，南越领袖们主要的兴趣是捍卫个人利益。问题在于美国人支持过与正在支持的南越领导人，没有一个是具备革命精神，真正值得支持的。

……

对台湾的一些看法

我对1965年3月陈诚的去世十分感慨。陈诚的去世是蒋先生与“中华民国”的巨大损失。虽然他一再邀请我赴台，但我从1949年后再也没有会晤过他，他病重时我也没赶去探望，为此我感到十分难过。

因为陈诚敢于捋虎须，敢于在蒋先生面前进逆耳忠言，所以我们对国事还怀着希望。我们还对孙立人抱有希望。【恃才傲物是他失势的主要原因，美国人想扶植他反而害了他。他以为美国人支持他，以致得意忘形。然而，美国人是不可靠的，孙立人的矜才使气使他得不到蒋先生的信任。】

【蒋先生对何应钦的态度也欠佳，他忘不了龙潭之战前夕何应钦对白崇禧逼他下野之举默不作声。这就是何的官职一直低于陈诚的主要原因。】

目前台湾的大权已集中到蒋经国手中。然而，一旦蒋先生仙游，蒋经国似不该继任总统。小蒋聪明能干，善解民意，应有自知之明——其声望不足以继承大位。】

黄埔子弟已经完全掌握了台湾。现在甚至一级上将也多数是黄埔毕业生。在曩昔，上将是十分尊贵的，他们真正能打仗，如果不流血，也至少有汗马功劳。然而到台湾以后，上将不用打仗。至于保定军校毕业生，都垂垂老矣，也无所作为了。

从军事观点来看，国民党最大的错误乃是，根据外交关系的亲疏，在不同的时期采用不同国家的制度。自从我加入军队起，亲眼目睹了许多变化。譬如，我

们的中山装起初是中式的领子；当中山先生同苏联挂上了钩时，中式领子变成了翻领加上纽扣；胜利后一切都仿效美式，连军服都改成美式，现在军官的制服是大翻领。【蒋先生特别喜欢穿这一制式。】这是最不合理的做法。我们应该明白，倘若领子不必经常洗涤，那么穿翻领的军服比较合适。外国人有洗衣机代劳，我们却没有。事实上，我们甚至没有自己设计的军服，却一味模仿洋人，一阵子俄式一阵子美式。我们只学习外国制度的皮毛，却不学人家的精神。

如果由我做主，我会选择最佳的外国制度。每个国家都有其优、缺点。对外国有益的可能对我们无益。我坚信，中山装最适合我们中国人穿。

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但我们不应该东施效颦。譬如，在台湾穿胶鞋是最合适了，不必学习美国大兵穿皮鞋。另一个例子：英国士兵的枪托是顶住地面的，如果我们也学样，那么我们的（士兵比洋人矮小）步枪螺丝就会失效，整支枪就会报废。

在选择装备与决定组织系统时，我们必须跟随科技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机关枪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炮兵与飞机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当另一次战争来临时，核武器将成为决定性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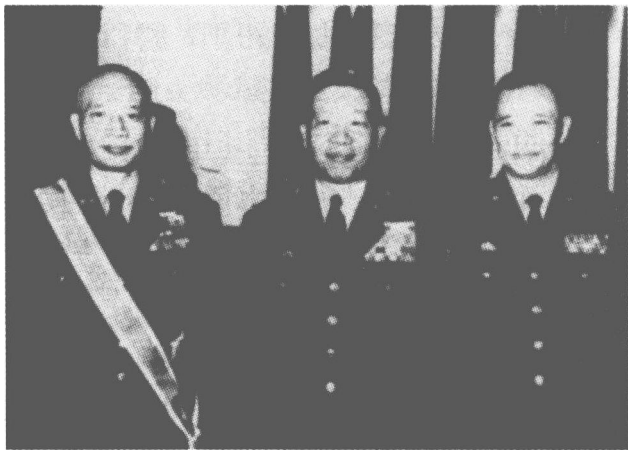
【你可以见到，蒋先生嗜好修改外国的制度，使彭孟緝能担任参谋总长达八年之久（1955—1957，1959—1965）。根据规定，参谋总长、陆军总司令等职位，任期只有两年；修订后便可以续任一任，任期又延长了四年。许多人认为彭孟緝长期担任这一要职，是不公平的。

彭孟緝在学识与能力上都都很平庸。我这么说并非贬低他，因为我与他私交很好。战时在柳州与陆总，他做过我部下的炮兵指挥官。他品格良好，性情平和。然而事实证明许多军人比他更适任参谋总长。

赴台前，彭只是个少将。按规定，从少将升到中将需要六年，从中将升到二级上将要八年，从二级上将升一级上将要看编制上有没有缺额。然而他1955年就攀升到一级上将，也不论有没有缺额了。】

台湾实施征兵制，然而这是个地方，又长年不打仗，三年后，征来的上兵转为预备役，所以就没必要开小差，当地的民众也不怕儿子去当兵。

毋庸置疑，蒋先生是个强人，看看他掌权的时间有多么长呀！当危机发生时，他会先退一步，然而进两步，这就是强人之路。从民国肇建以来，在



左起：黄杰、彭孟緝、陈大庆。

这方面无人能与他攀比。

其他任何人处于蒋先生的位置，都会无法重新掌权，可是蒋先生居然能复辟。复行视事后，他遇到更大的艰难险阻，但他仍不屈不挠昂首阔步。在台湾那种局促环境下，只有他才能从容应付，力挽狂澜，其他人做不到。

【他在台湾也犯下过错，但是情感往往遮盖了理智，他善于从错误的政策中赢得支持。吴国桢比我更清楚地了解这段时期发生的事，他接近蒋先生。……】

我对教育与社团的关注

我刚到香港时，有些旧属无事可作，我必须为他们想点办法——倘若仅我个人有饭吃，我是不会心安理得的。有人希望我创办一家农场，但这方面我完全是外行。我说：“不，但如果你们兴办一座学校，我可以投资。”

50年代初在香港兴办一所学校没什么大问题，只要有钱就可以办学。然而我缺少足够的资源，我知道，学校开办后，我无力长期维持它。然而，买一所现成的学校是另一回事。于是，我们收购了四邑华侨中学，旨在安置那些失业的手足。

这件事还有另一个因素。该校原来的校长姓胡，他公开悬挂毛泽东像，10月1日还在校园升起中共的五星旗。当我们听说他愿意开价七万元卖掉这所学校时，我告诉李汉魂麾下的文官刘卓仁，首先我想照顾我的旧属；其次，我要拆卸毛泽东像，降下那面五星旗。我愿意拿出五万元港币，建议他斥资两万元。他当时在一家银行任职，手里有几个钱。

我们聘请李汉魂的前秘书丘先生担任校长。该校聘用那批无业的袍泽，但月薪仅200元港币（当时香港的银行高级职员月薪400元）。为了彻底解决问题，他们一边教书一边到教师训练班进修。两年后，他们都具备了教官立中学与资助中学的资格，可赚取较高的薪金。在十年内，这批人都在外面找到了理想的职务。

刘卓仁去台湾前，将股权卖给一位黎先生，让他接任校长。黎先生移居美国前，我买下他的股权之八成，交给三弟嘉斌，他就当了校长。结果我们还是赔钱。1962年7月，嘉斌把学校卖给本区的一位女士，得款仅1.8万多元。就这样我蚀了6万多元。

1962年，我开办大同书院，起因是我到美国去旅游时，人们建议我办一所学院，附设一所中学，招收华侨青年，其宗旨是鼓励海外华侨使用中文，进修国学与礼仪。

我投入五万港币，华侨捐赠了几十万元。香港当局教育司署署长彼特·多诺荷告诉我，如果我们计划开办一所中学，他愿意给我们一块地。我婉拒了他的好意，坚持以每平方尺90元的价钱自置校舍用地。如果我们接受港府拨给的土地，……学校的行政就会受到当局的干涉。华侨遴选张忠猷任该学院的院长，我当校董会主席。起初，学校有一百多名学生，一部分是华侨子弟，另一些是从大

陆来的反共学生，也有香港本地学生。

把志锐中学图书馆一万多册藏书都移交给大同书院。

大同书院特具政治倾向吗？任何学校都不能脱离政治，教育年轻人的目的是让他们成才以及为国家效力。但有人问时，我们当然回答说“没有”。

我们只有130个学生。虽然香港是殖民地，但在3月29日——黄花岗起义纪念日，我们给师生放假一日。在孙中山诞辰与忌辰，我们也放假，让学生们记得，我们有一位国父。所有这些反映了这所学校的特性。

大同书院只办了两年就关闭了。首先，学校的校董与校长意见不合，后者希望增加开支，我们办不到；此人甚至想掌控人事，我们说这是人事委员会的职权。其次，在校舍方面遇到困难，我们租用校舍以两年为期，但无法展期。于是我们把学生转到珠海书院去，那是陈济棠的旧属开办的。

四校校友联谊会在香港每月都聚餐，但我很少出席。我估计，有三四十人出席。

大陆失陷后，道社成员都来了香港。1951年8月，杜月笙去世，许世英与钱永铭去了台湾。我们没有再举办过任何活动，因为大多数成员都去世了，仅剩杨德昭等几人与我还在世。

我第一次来香港时（1945年12月），香港崇正总会要我当它的名誉会长。后来，它挂起了中共的五星旗。我说，如果你们降下那面旗，我愿意担任你们的理事长。……每个人都同意，于是我当了崇正总会理事会主席。

1966年，崇正总会选举我为理事长，我婉拒了。我说我做永远名誉会长就行了，他们便改选林翼中^①为理事长。……该会上一任理事长（钟锦泉）是做大陆生意的。这就是他们选我当第二届理事长的原因。

崇正总会多数大陆来的会员都是广东客家人，来自大陆者多于香港原居民，而其中人数最多是来自惠州与宝安的客家人。该会由前广东省财政厅厅长邹敏初——一位大埔的客家人捐助建筑费二万元创办。

天主教与道德重整

我信了天主教。全家抵港后，我妻子的一些朋友，包括一位当医生的旧属，劝说她去天主教堂做礼拜，介绍她认识几位美国玛丽诺教会的神父。她同我商量。我说宗教信仰是一件好事，我认为天主教优于基督教，因为前者更多地要求信徒自我约束，教士的生活更为严格与克制。1955年10月1日，她正式受洗为

^① 林翼中（1887—1984），广西合浦人。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广州起义。光复后任钦廉军政分府交通部长。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师政治部主任、广州特别市组织部长。1928年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教官；1929年7月任广东省政府委员。1931年、1935年、1945年三次当选国民党中执委；1937年当选中常委；1943年、1946年两度当选广东省参议会议长。1949年创办私立珠海大学，1953年任该校监督。1966年代理崇正总会理事长。著有《苏俄现代一瞥》、《广东省地方纪要》、《广东省地方自治概要》等。

天主教教徒。有几位神父也向我游说，但我不为所动，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变成天主教徒，但一位美国玛丽诺教会神父麦考密终于感化了我。他在粤北客家群落中传教二十年，能讲客家话，刻正在台湾播道。经过他锲而不舍的努力，我于1956年10月10日正式受洗。

天主教与基督教都建基于爱心，基督为了人类牺牲了自己，这就是我信仰它的原因。

信仰天主教后不久，我阅读了一些由何应钦赞助在台湾译成中文出版的道德重整协会文献，这引起了我的兴趣。很简单，我把道德看作良心，有良心的才算有道理。然而，许多人的良心沦丧了，这就是我们提倡道德重整的原因。

记得我在1926年也改造自己的私生活，但我仍保留一些坏习惯。哪些习惯？说谎、烦扰旁人、明知错了还固执己见等等。

第四军的箴言是“公诚廉毅”，同道德重整协会的四律——爱诚公廉——有三点是吻合的，仅有一条“毅”意谓坚定，而四律强调“博爱”，稍有差异。我发觉1921年美国传教士弗兰克·布克曼发起的道德重整运动同我的理念十分相近。事实上，加上“爱”这一条，道德重整运动就比我的信念更进了一步，我转而相信四律能拯救人类。

但我不认为要把第四军的箴言改得同四律一样，因为毅力是十分重要的，这是蒋先生取得成功的原因。“坚定”对军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拿破仑说过，胜利取决于战场上最后五分钟坚持。加入道德重整运动增加了我对第四军箴言的信心。以前我向部队演讲时，常常解释往昔我如何在自己倡议的第四军箴言上做得不够，甚至于今日我仍缺乏毅力。

基督教十戒同道德重整运动的四律都是我们生活中必须遵守的规则，四律是“十戒”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些天主教神父说，他们担忧，加入了道德重整运动会导致人们动摇自己的宗教信仰，但我个人的经验证明恰恰相反。道德重整运动加强了 my 天主教信仰。譬如，自我加入道德重整运动以来，我参加教会的弥撒风雨无阻，这是我从前做不到的。

于斌大主教告诉我，他并不反对道德重整运动，同布克曼博士也很友好，但他认为用四律来概括人际关系是不相宜的，这只适用于上帝。我不同他争辩，因为自己也没有完全做到四律。我希望改变自己，进而改变我的家庭。可是直至今日，我尚未完全改变自己，遑论改变全家。然而，我感觉我应该朝四律这一方向迈进。我相信许多道德重整协会的成员也尚未达致四律的境界。

我告诉香港道德重整运动的领袖凯瑟琳·吴小姐，有些比我年长的人常常邀我共饮，例如周焯年^①爵士。人们都知道我善饮，我酒量很好。我感到如果我拒

^① 周焯年（1893—1971），20世纪初香港商界名人，毕业于圣士提反书院。1911—1915年在英国牛津大学修读法律。1922年获委香港太平绅士，1929—1932年任香港洁净局局绅，1956年受英国册封为爵士。其弟周锡年从政16年，1953—1959年任香港立法局首席议员，1959—1962年任行政局首席议员，任华人银行、牛奶公司等多家公司董事长。

绝与周爵士共饮，似乎有点失礼。吴小姐向我指出：要想改变别人，就得让别人改变我。这确是金玉良言。然而，中国人的礼节往往使我很难拒绝。我告诉吴小姐，这事实上是一个难题但我会尽力去改正。

我有时说，道德重整运动禁止酗酒是为了应付形势。人们说：“为什么道德重整运动要干涉饮酒这样的小事？”实际上道德重整运动并未下禁酒令，而是人们加入此运动后自动戒酒。故此，当我说道德重整运动禁止饮酒时，就成了我说谎，那就违反了四律中的“诚”字。那不是进退两难吗！无论如何，加入此运动后，我减少了饮酒。

加入道德重整协会最大的成果是我改善了同妻子的关系。我们原本常常吵架，我总认为我是对的。现在我不再争论，即使她错了我也保持沉默。

我妻子对道德重整运动一点也不感兴趣，她误解了它的信条。例如我说一个不怀恶意的谎话以便拒绝出席一个会被劝饮的聚会时，她就会说：“这不是绝对的诚实！”毕竟这类不怀恶意的谎言不会伤害任何人。我妻子喜欢打麻将，在往昔，为了以身作则，我不让她打麻将；恢复平民身份后，我不能再阻止她。所以我要求吴小姐去改变她。

该运动是从意识形态上反对共产主义，它企图改变共产党。当它有所建树时，其成果会令人难忘，但其进程是缓慢与困难的。例如，有个加入共产党25年的印度人加入了道德重整运动。我承认，要改变毛泽东，将是极其困难的。诚然，我的兴趣在于该运动的反共立场，它的反共原则同我的思想是一致的。然而，加入道德重整运动的主要目的改变我自己。

道德重整协会最初在香港政府登记为“牛津团体”，它出版《仁报》。成员有三十多个，包括仁报编辑刘裕略以及李毓田^①、王同荣。其成员的职业背景有商人，也有文化、教育界人士，有些人同我一样——无业。他们多数是从大陆来的，外省人多于粤籍人士。其负责人，华人与洋人都有。

香港人对道德重整运动兴趣乏乏。我对中文译名“道德重整”有点不以为然。中国人对这四个字的典型反应是：“是否你意谓我们道德不好，所以需要重整？”

我必须承认，在某些事情上，道德重整协会的成员是很不道德的。几年前，该运动想派五个学生去美国密歇根州马凯特岛（位于休伦湖上，系避暑佳地。马凯特是印第安语“乌龟”）。有人建议我们申领亚洲基金会旅费资助。凌道杨^②、陈能方与我同亚洲基金会的香港代表讨论了此事。他告诉我们，道德重整协会在

^① 李毓田（1904—？），直隶延庆（今北京延庆）人，东京帝国大学政治经济科毕业。历任上海大夏大学教授、国民政府外交部研究室主任、香港国际通讯社主任编审委员。1945年4月出任第四届国民参政员。

^② 凌道杨（1890—？），广东实安人，上海圣约翰大学文学士，美国麻省大学法学博士。历任中央大学林学院院长、广东农林局局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1945年9月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广东分署署长，1949年赴香港。著有《森林学大意》等。

香港成立比亚洲基金会早得多，而且财力比他们雄厚。既然我们要求资助，他可以打电报给总部，但他不认为基金会将会给我们资助。

后来我们知悉，道德重整协会总部早已寄了五张飞机票到香港，可是香港的负责人没有告诉我们。那时我刚刚加入该协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刘裕略也不知底细。后来才从凯瑟琳·吴小姐处知道机票的事，当时她在香港。

还有些其他的事。道德重整协会规定，五位代表必须是大学或专科学校的优秀学生。我们挑选的五名学生中，港大、新亚学院、崇基学院各一，另两位不符资格。周振勇坚持要派他仅是高中毕业学历的女儿去，苏达立博士^①——香港疗养院负责放射科的英籍医生想派一名护士去。他们的动机是自私的。

游历欧美

1960年夏，我和妻子去欧美出席世界道德重整大会。这次我的护照办成了。在叶公超调华盛顿任“驻美大使”前，我托友人告诉他，我要一本护照。叶公超说“好！”叫我同“政府”驻香港外交特派员吴文辉联络。吴先生上门找我，在澳门签发了我的护照。

我想乘机会看看欧洲，睽违好多年了。许多人不了解我的政治倾向。有人希望我回程顺便访问台湾，其他人希望我去台湾抨击蒋先生。我拒绝这样做。我的态度是，我支持“中华民国政府”，但既不批评也不赞颂蒋先生。

我们先飞新加坡，由此经贝鲁特、约旦入耶路撒冷到瑞士的日内瓦及柯峰。在那儿我初次会见了布克曼博士。当然我崇拜他，不然我不会加入道德重整协会。他身体不太好，坐着轮椅。他告诉我，1917年他在广州河南土敏土厂见过孙总理。他叫彼得·霍华德给我一张亲笔签名的照片。他虽然体弱，还是参加了一部分会议。

直至那时我仍痛恨日本人，在会议上不愿与日本代表打招呼。在1960年8月26日的会议上，侵华日军第一一九师团长盐泽清宣中将与战时驻马来亚与安达曼群岛日军司令官保佐井上中将忏悔他们的战争罪行，向中国与中国人民道歉。与会的只有六位中国人，而日本代表有七十多个。忏悔完毕后，盐泽清宣抱住我痛哭。我突然意识到我的想法错了，应该谴责的是日本政府，而非日本人民。我想向日本人民表示我的歉意，但我缺乏勇气。我仍旧放不下面子。

我向马哈曼·甘地的孙儿拉贾木汗·甘地请教。他要我自己深思。我为此沉思了两天两夜，睡不着觉。我感悟上帝告诫我，不要害怕起立忏悔。这是道德重整运动的力量，也是神的“指引”。我终于向拉贾木汗·甘地说：上帝要我向日本人表示歉意。于是，他宣布我有话要说。在我忏悔自己痛恨日本人的思想之后，所有的日本人都围住了我，有些人拥抱我，有些人热泪盈眶。当然，我也

^① 1983年2月18日，香港疗养院副院长曹英楷博士来函称：苏达立博士应系史蒂芬·斯德顿博士，他是本院放射科负责人，直至1969年退休为止。

哭了。

按照指引，人们在会上忏悔自己殴打过他们的儿子或骂过妻子，我承认直到那一天我不能当众作这一类的忏悔。

在柯峰停留十天后，我去了伦敦，然后再回到柯峰。何应钦按原定计划来了柯峰，我想见他。我好多年没见到这位老朋友了。我们在一起聚了一星期，他每天同我谈话，想劝我去访问台湾。我不置可否。他说他能担保我来去自由，我说，我不需要任何人为我担保，我相信我能自由进出台湾。

离开柯峰后，我和妻子环绕全欧旅行。我们去了巴黎，全部时间都和道德重整运动的成员在一起。在欧洲，华侨比较少，我在英国、荷兰、比利时同一些华侨聊天。在英国，我同孙总理的保镖莫里斯·科恩邂逅相遇。

【我一向是高傲的，有时会得罪人。准备去纽约时，我想起我过去对待李汉魂太太的态度。战时她丈夫任广东省主席时她在妇女协会、孤儿院等方面很活跃。我不赞成她参与政治活动，我一直认为已婚妇女应该在家里照顾她的家庭。我忏悔我错误地干涉了他们的家事。李汉魂卖掉香港的住宅前，我透过他的长子告诉了他的前妻，让她出面争回了一部分卖房得款，这就意味着吴菊芳到手的钱少了一截，她自然对我不悦。

考虑到我去纽约会见到吴菊芳，我决定请求她原谅，否则我不能心安。倘若不加入道德重整运动，我永远不会想到要请求她宽恕我。】

到纽约后，许多华侨组织的代表来见我。【李汉魂与吴菊芳也到场了。但是当时有许多人在场，我没有机会向吴菊芳道歉。次日，我向她认错，求她宽恕我。她当然回答说，她从未放在心上，说我不必说那些道歉的话。】

到纽约不久，我出席了“中华民国”驻纽约总领事俞国斌（1984年6月到1989年5月在台湾任“行政院”院长的俞国华之胞弟）为“双十国庆”所举办的鸡尾酒会。俞总领事说，孔祥熙与宋子文马上就到，我叫李汉魂马上一同离开，他建议我留下来会晤他们郎舅俩。我不想见。后来听说孔祥熙告诉李汉魂，他想见我，然而我不想见他。我为什么不想见他？我认为蒋先生待他们太宽容了，他们属于“四大家族”，可是孔宋离弃了蒋先生，在他最需要亲人帮助的时候弃之不顾，悠游海外，这太绝情了！

我见了李宗仁好多次。他在异国的土地上，精神痛苦，回肠九转。当然，他享受到美国的物质文明。他比我大六岁，到了古稀之年，做家务劳动是辛苦的。

此外，他的英语不灵光，所以举步维艰。他问我：“有没有办法安排我到香港居住？”我答应试一试。香港政府是不会批准他定居的，但是我认识香港多位太平绅士。我能尝试着帮一下忙，但我没有起步，因为我听说他的小妾郭德洁当时在香港探望居住在荃湾的母亲。我听说，在程思远与梁舜城的影响下，她一再颂扬中共。我担心一旦我帮助他来港居住，接着他又回大陆，我要受到舆论的谴责。

陈立夫到纽约的旅馆来看我，我去他家回拜。我们谈及他的养鸡场。

1960年11月12日的香港《新闻天地》周刊说我在纽约发表演说支持蒋先

生，我也见到了那篇报道，它写得不够严谨。在机场上迎接我的华侨社团代表中，也有国民党美东支部的成员。按照惯例，不论是敌是友，我都应该去回拜。所以我拜访了美东支部。

接着，美东支部为我举办了欢迎茶会。我老友的儿子张之陆在会上赞扬我的爱国精神，称我为“同志”，他要求我即席讲话。我说：“我是国民党员，但不是现在的国民党的党员。从前我们曾是同志，现在我不是你们的同志。”他们笑了。我继续说：“不管如何，我们都是反共的，应该并肩作战。我们应该在‘政府’领导下团结起来。”这就我所说的全部。但是这几句话上了某些报纸就改头换面了，加上了“在蒋总统领导下”字句。有些对蒋先生不满意的华侨劝我向报社提出更正。我拒绝了。……但从此以后，我先写下发言稿，照稿念完，然后把讲稿交给记者。

听说我到了纽约，张君勖急忙从旧金山赶来看我。他带了一些朋友到旅馆看望我，包括李宗仁、谢扶雅、伍藻池^①、李汉魂以及张忠黻。我们讨论了大陆局势。我们希望建立一个新的组织，但提出这个议题时，李宗仁持消极态度。他说，他不希望再谈政治，李汉魂也表示消极。张君勖与谢扶雅持积极态度。我希望有些成果，否则张君勖不会仆仆风尘远道来看我。当然，讨论不出什么结果。

不久，我和妻子去波士顿，再赴华盛顿特区、蒙特利尔、渥太华，最后去马凯特岛出席道德重整大会。

我被邀以“1949年国民党为什么失去大陆”为题发表演说。我提到三点原因：吏治腐败、士气低落、丧失民心。

离开马凯特岛时，我说：“参加道德重整协会前，我是个坏东西。虽然加入了道德重整运动，我仍然不是个好东西，但我不再是一个坏东西了。”大家哄堂大笑。

我同妻子去多伦多、芝加哥，在那儿同老朋友斯各特先生聚餐。然后我们去亚利桑那州图森市、凤凰城、拉斯维加斯、洛杉矶，最后到达旧金山。在那儿我收到何应钦一封信，提起我已答应他回港途中停留台湾。他说，如果我不去，他将使蒋先生失望，因为他已报告蒋先生我会去台湾。我复函说，如果有机会，我会去。陈诚与黄镇球也来信要我去台湾重聚。

我在旧金山停留大约一个月，其间我访问了波特兰。在那儿我发觉人们还在谈论1935年发生在温哥华的突发事件（见本书第九章）。我接触到战时结识的美国人吗？我想见魏德迈将军与鲍曼将军。前者不在华盛顿特区，后者住在离纽约很远的地方，10月24日他写信给我，说他非常想见我，可惜他病了。（原第二方面军兵站副监）帕尼上校偕妻子到纽约来看我。他在全力支持“中华民国”的“百万人协会”中十分活跃。应我的邀请，他后来访问了香港。1947年主持

^① 伍藻池（1903—？），广东台山人，民社党党员，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博士，1947年3月当选立法委员。

颁给我金棕榈勋章的法雷尔舰长邀我午餐，他当时正从事报业。

从旧金山我们飞抵檀香山，我当工程师的义子威立全家都在那儿定居。我们继续飞往东京，在那儿与道德重整协会的友人们重逢，又会了“中华民国”驻日使馆的人员以及彭昭贤、商震等人。

对往事的看法

我很少谈论往事。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如果不是记者来访问录音，我不想再谈往事。我并不觉得过去的事很有趣——否则我会保存我所有的文件资料（此时已馈赠哥伦比亚大学）。

我对林林总总的回忆录是持怀疑态度的。譬如，我看过黄绍竑撰写的《五十年回忆》与冯玉祥的《我的生活》。他们讲的许多事情都是假的，隐恶扬善，忌谈任何对自己不利的东西，不写自己的过错，只写自己的功劳。

《陈诚年谱》最近出版了，其中好多内容是不准确的。例如，此书略去了他在第一师的全部经历。

我相信，陈诚走了以后，没人敢对蒋先生进逆耳忠言了。那就是我不愿意写回忆录的原因。要写就得讲真话。在你来访谈之前，许多人要求我撰写回忆录，有人要付钱买下回忆录的版权。首先我想对他们说的是，我不想告诉他们那些暴露我是坏蛋的事情：如果不告诉他们那些事，那么回忆录就毫无价值。但是，既然你向我提问，我就必须对你讲真话。

1937年后，我不认为我犯下过错，在抗战期间，我只是执行中央制定的战略。

道德重整运动的成员、日本人涩泽最近问我，是怎样成长为一名优秀军人的。我答：“我不是一个优秀的军人，可是我有责任感。”

战争已变得科技化了，指挥官们必须用脑。但是，不管武器与战争形式有多大变化，《孙子兵法》中的用兵原理，古今一概适用，尤其是这句名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我从列兵做起，即使不入军校，也能升到高位。中国有句成语“时势造英雄”，但这不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英雄是造时势的。

我们中国人尊崇岳飞的忠诚，然而历史学家称此为“愚忠”。皇帝下了十二道金牌，他不理会十一道金牌，但是服从了第十二道金牌。他本该坚持不理睬皇帝的命令继续北上直捣黄龙府的。

在20世纪的中国，产生过麦克阿瑟那样的英雄吗？没有，我想不出任何人。我感到，长期以来，中国的政治与军事都没有走上正确的轨道。主要的缺点是政治上独裁。【蒋先生随心所欲。】

如果我能从头开始，我还选择当军人吗？不！因为通过军事力量来达致世界和平是绝对不可能的，战争只会导致更大的混乱。从我加入道德重整运动以后，我悟出了这一真理。同中国出现的情形一样，在阿根廷、南非、南美等地“武力

决定一切”就造成了许多动乱。

还有一点：军人之间是存在着不渝的友情的，在战争中失去友人是十分痛苦的。再者，中国的军人同外国的军人，所过的日子完全不同，外国的军人生活优裕，中国的军人生活艰难困苦。我们同军阀作战时，这点差异尤其明显。现在，问题就简单了。

现在多数人叫我“将军”或者“长官”，同辈友人叫我“向华”，很少有人叫我“总司令”，有些朋友与一般人，包括侍者，叫我“大王”。

我父亲在各方面都对我影响很深，我继承了他的坚强意志与正义感。遵照他的教诲，我不许家中任何成员从事司法工作。还有，我像我父亲一样，从未纳过妾。就这样，我感到他影响了我的性格，更加影响了我的私生活。

当我的胡子变成灰白时，想拔掉它，但不知怎么拔。广东人认为“剃眼眉”就是不给人家面子，让对方丢脸。最后，我开始修剪，剪得看上去好像没剪过一样。我的理发师刚刚把它剃掉了。那就是我怎样摆脱灰白胡髭的方法。

.....

1980年3月10日，张发奎在香港逝世。

译注参考书目

1. 《张发奎将军抗日回忆记》，蔡国桢发展有限公司印赠，1981年版。
2. 张发奎《自传》（未刊稿）。
3. 张发奎：《中共广州暴动之回忆》，载香港《春秋》半月刊第554期。
4. 张发奎：《八一三淞沪战役回忆》，载香港《大成》月刊总第9期。
5. 邓以彭：《张发奎与广西》，载台北《传记文学》1996年2—4月号。
6. 张发奎编：《第四军纪实》，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
7. 麦朝枢：《我所了解的张发奎》，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19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
8. 广东省政协文史委主编：《挥戈跃马满征尘——张发奎将军北伐抗战纪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9. 郭汝瑰、黄玉章：《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0. 黄仲文：《余汉谋先生年谱》，台北上海印刷厂1989年8月印刷。
11. 杨恺龄：《民国张静江先生人杰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
12. 郭廷以：《王微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96年版。
13. 《李汉魂回忆录》。
14. 金典戎：《最初在香港搞第三势力内幕》，载香港《春秋》周刊第175期。
15. 朱振声：《哭吊向公张发奎上将》，载香港《大成》月刊第77期。
16. 刘汝曾：《我对张发奎将军的悼念》，载香港《春秋》半月刊第546期。
17. 帘外风：《我所知道的张发奎将军二三事》，载香港《春秋》半月刊第558期。
18. 刘志：《由章士钊南来谈到张发奎上将》，载香港《春秋》周刊第169期。
19. 刘志：《汀泗桥大破吴佩孚军详情》，载香港《春秋》周刊第175期。
20. 刘志：《张发奎枪决陈牧农军长真相》，载香港《春秋》周刊第177期。
21. 陈正茂：《简述五〇年代香港第三势力运动》，载台北《传记文学》月刊第426期。
22. 张一民：《五十年代的自由中国运动》，载香港明报月刊1990年1月号。
23. 小田：《山林寂静，壮怀激烈》，载香港明报月刊1990年2月号。
24. 一夫：《悼邹安众先生》，载香港《春秋》半月刊，第744期。
25. 《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1997年版。

26. 《国史拟传》，（台湾）“国史馆”出版，1988年起。
27. 胡健国编：《中华民国褒扬令集》，（台湾）“国史馆”出版，1991年起。
28. 国史馆编：《民国人物传记史料汇编》，1988年起。
29. 《国史馆馆刊》，（台湾）“国史馆”出版，1987年起。
30. 熊钝主编：《中华民国当代名人录》，台湾中华书局印行，1978年起。
31. 刘绍唐主编：《民国大事日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起。
32. 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起。
33. 蒋纬国：《蒋中正先生传》，台北青年日报社1997年版。
34. 黎东方：《蒋介石全传》，台北大同出版事业公司。
35. 郭廷以校阅：《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编印，1989年版。
36. 黄仁宇：《黄河青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1年版。
37. 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香港明镜出版社2002年版。
38. 雷啸岑：《忧患余生之自述》，台北传记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39. 《蔡孟坚传真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起。
40. 谷正文述：《白色恐怖秘密档案》，台北独家出版社1995年版。
41. 谷正文述：《谷正文情报工作档案》，台北书华出版公司1997年版。
42. 黄宇人：《国民党失去中国大陆的原因》，香港吴兴记书报社1982年版。
43. 李璜：《学钝室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社1979年版。
44. 朱振声：《哀江南》，香港振华出版社1962年版。
45. 段克文：《战犯自述》，纽约世界日报社1980年版。
46. 郑义：《国共间谍战七十年》，香港夏菲尔国际出版公司2001年版。
47. 朱振声编：《李汉魂将军日记》（非卖品），1975年版。
48. 唐柱国：《最高机密——国民党情报秘史》，台北新新闻文化事业公司1997年版。
49. 东方仪：《自由中国运动见闻录》，香港国风出版社1955年版。
50. 翁台生：《CIA在台活动秘辛》，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2年版。
51. 《蒋公与我——见证中华民国关键变局》，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2003年版。
52. 衣复恩：《我的回忆》，台北立青文教基金会出版社2000年版。
53. 韩信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
54. 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5. 刘国铭主编：《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
56. 廖盖隆主编：《中国人名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
57. 李盛平主编：《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
58. 辛平编：《民国将领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9. 陈予欢编：《黄埔军校将帅录》，广州出版社 1998 年版。
60. 陈予欢编：《民国广东将领志》，广州出版社 1994 年版。
61. 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粤军史实纪要》，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62. 于俊道主编：《中国共产党名人录》，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63. 盛平主编：《中国共产党人名大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1 年版。
64. 胡华主编：《中共党史人物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 年起。
65. 樊荫南编：《当代中国四千名人录》，香港波文书局 1978 年版。
66.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主编：《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出版 1978 年起。
67. 王永均编：《中国现代史人物传》，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68. 王健英：《中国红军人物志》，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69. 王成斌等主编：《民国高级将领传》，解放军出版社 1999 年版。
70. 万仁元主编：《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商务印书馆 1994 年版。
71. 万仁元主编：《孙中山与国民革命》，商务印书馆 1994 年版。
72. 万仁元等编：《民国职官年表》，中华书局 1995 年版。
73. 张磊主编：《孙中山辞典》，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74. 谢膺白：《张发奎传略》，原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 19 册，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 年版。
75. 黄纫秋：《谈李宗仁在美国的寓公生涯及回大陆前后》，台北《传记文学》1988 年 3、4 月号。
7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丛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1 年起。
77. 刘秉荣：《北伐秘史》，北京知识出版社 1995 年版。
78. 宁凌：《国民党治军档案》，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3 年版。
79. 广东省地方志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省志·财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80. 广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民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81. 李新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82. 张明金：《国民党历史上的 158 个军》，解放军出版社 2007 年版。
83. 戚厚杰编：《国民革命军沿革实录》，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84. 刘国铭主编：《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北京团结出版社 2005 年版。
85. 广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新桂系实录》，1990 年。
86. 吴仲禧：《吴石接受中共地下党指挥的故事》，载《广东文史资料》总第 73 辑，1993 年。
87. 黄霖：《南昌起义亲历记》，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88. 《许德珩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7 年版。

89. 林孟熹：《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新华出版社 2001 年版。
90. 任海生：《共和国特赦战犯始末》，北京华文出版社 1995 年版。
91. 任海生：《国民党重要将领改造纪实》，解放军出版社 1999 年版。
92. 沈醉：《战犯改造所见闻》，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 1991 年版。
93. 宋希濂：《鹰犬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6 年版。
94. 《张治中回忆录》，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5 年版。
95. 程思远：《政海秘辛》，香港南粤出版社 1988 年版。
96. 《文强将军回忆录》，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
97. 黄绍竑：《五十回忆》，长沙岳麓书社 1999 年版。
98. 锺卓安：《陈济棠》，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1999 年版。
99. 吴江雄编：《国民党要员身边的中共地下党》，海天出版社 1995 年版。
100. 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香港南粤出版社 1986 年版。
101. 傅作信：《我的哥哥傅作义》，团结出版社 1999 年版。
102. 千家驹：《七十年的经历》，镜报文化企业公司 1986 年版。
103. 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5 年版。
104. 何邦东主编：《广东抗战纪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105. 《广东军阀大事记》，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106. 尹永林编：《薛岳传略》，韶关大学编辑部 1995 年版。
107. 中共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重庆出版社 1986 年版。
108. 彭新云：《南天烽火——中南大剿匪》，解放军出版社 1999 年版。
109. 蒋永敬：《胡志明在中国——一个越南民族主义的伪装者》，台北传记文学社 1972 年版。
110. 萧玲玲：《许崇智与民国政治》，台北大安出版社 1991 年版。
111. 黄康永：《我所知道的军统兴衰》，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年版。
112. 巢威：《桂林焦土抗战亲历记》，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 40 辑，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6 年版。
113. 曹福谦：《湘桂黔大溃退目击记》，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 40 辑，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6 年版。
114. 刘中刚等：《侵华日军高级将领大结局》，珠海出版社 2004 年版。
115. 潘泽庆：《侵华日军高级特务大结局》，珠海出版社 2004 年版。
116. 史群编：《日本姓名词典》，香港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117. 《胡汉民自传》，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 1969 年版。
118. 周聿峨：《胡汉民》，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119. 毛思诚编纂：《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香港龙门书店 1965 年版。
120. 陶菊隐：《吴佩孚将军传》，上海中华书局 1941 年版。

121. 农工民主党中央编：《邓演达》，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5 年版。
122. 湖北省地图院编制：《湖北省地图册》，山东省地图出版社 2000 年版。
123. 顾卫东：《世纪风云——张云逸》，作家出版社 1997 年版。
124. 谢膺白：《镇压广州起义亲历记》，载中国文史出版社《文史资料选辑》第 138 辑，2001 年版。
125. 邓演超主编：《回忆邓演达》，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126. 崔乃夫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大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
127. 王炳毅：《揭开道社神秘内幕》，原载北京《文史春秋》2006 年第 9 期。

译注后记

2002年，由于撰写有关50年代香港第三势力的论文的需要，我托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张之丙女士在该校珍本与手稿图书馆取得了《张发奎口述自传》的第二十章的英文抄本，由于书中人名、事件、机构都是半个世纪前的旧事，我在3.8万字的译文后加了2.8万字的注释。此文刊载于2003年12月出版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刊印的《近代史资料》第107期。

2005年7月，我赴美领取万人杰新闻文化奖时，由哥大讲座教授夏志清博士陪同，买下了张发奎口述自传的中文版权。携回香港细细阅读，方才悟出何以哥大口述史负责人韦慕庭教授将这套缩微胶片赠送中国社科院二十多年来，居然无一人着手将这部名著译成中文。于是，我下定决心，要把包含上万个人名、地名、事件名、机构名的四厚册英文誉本啃下来，使这部传记文学的奇葩、口述历史之极品不再沉睡在异域图书馆的尘埃之中。

《张发奎口述自传》能成为中国名人口述历史中首屈一指的传世之作，也因为美国人舍得耗巨资派遣训练有素的研究员夏莲瑛女士远渡重洋扎根香港两年、访问张发奎上将400多次、并在港台两地穿梭访问有关军政人员梁华盛、杨清文、黄旭初、邓龙光等多人，又以黄旭初、李宗仁、蔡廷锴等人大量的回忆录核对比较，才以录音记录为主，整理出1089页的英文抄本。夏莲瑛是以张发奎的私人记录——日记、电报、信函、公文为线索，按年代顺序询问他在每个历史事件中的亲身感受与目击真相，发现细节有误会便建议他澄清，既能挑剔含糊的答案，又能循循善诱，使他自然而然吐露出平时难以启口的事实。譬如夏莲瑛看了李宗仁口述稿，问他是否曾建议李宗仁邀请蒋介石来广州，然后扣押蒋制造第二次西安事变。张发奎答：“我从未建议他扣押蒋先生。当蒋先生派宋子文来广州取财出国前，我曾建议（广东省主席）薛岳扣押他。说：‘我们这么穷，把他扣起来问他要钱，我们从哪里还能领到军饷？蒋不会给我们任何东西了，宋子文最怕死！’薛岳不赞成我的主意，所以没有实现我的愿望。我和薛岳当年在广州都是反蒋的，但我从来不想扣押蒋先生，早在1927年他派宋子文来广州试探我们肯不肯邀他到访时，我就可请他南下，然后扣押他，但我无意做这样的事。”张发奎对夏莲瑛说：“有人要付钱买下我的回忆录版权，我对他们说：我不想告诉他们那些暴露我是坏蛋的事情；如果我不告诉他们那些事，那么回忆录就毫无价值。但是，既然你向我提问，我就必须对你讲真话。”他对访谈者坦承在粤军时包赌包娼收黑钱、贩卖鸦片充军饷、擅杀中央军军长胡谦等不名誉的事，这在林

林总总的国民党军将领回忆录中从未记载。他承认第三次北伐时，有人说第四军“在开封俘获数以万计敌军官兵的消息，那是胡扯！敌军都已撤走了，我不相信奉军张学良在开封驻有数以万计的部队。这一定是有人为我吹嘘战绩”。“根据余汉谋呈交给我，而我又转呈给中央的报告，我们在粤北打了一场大胜仗，事实上我们被打败了。我们把粤北战役视为胜仗，只是因为敌人攻下英德之后马上后撤并未进攻韶关。”有关两次收复南宁，他说：“敌军是自动撤出南宁的。为了宣传目的，敌人每撤退一次，我们便报一次胜仗。中央对此十分了解，这些都是弄虚作假的胜利！”他承认抗战是幸胜的：“我们从未取得一次胜利，只是延宕了敌人的前进。大多数海内外同胞认为：我们以劣势装备与粗浅训练，英勇地与武器精良训练一流的敌军鏖战了八年，最终取得了胜利。然而从一个军人的观点，我认为谈不上英雄史诗，我们所作的一切只不过是空间换取时间。”对于军中政工制度，他认为“毫无价值”，保甲制度则“徒有其名，不起作用”。

诚然，张发奎是凡人，并非圣人，我在译注这部著作时，绝对无意美化传主，而是遵循梁任公的教谕，对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丝毫不掺杂自己的意见。例如访谈者问及外界传说张发奎1927年冬下野时，从央行广州分行运走了几百万银元，张回答是陈公博以省府主席身份向省财政厅要了20万银元，名为第四军军饷，实际上汇给汪精卫充作政治活动经费。译者则引用知情人的回忆录，称“张离穗前曾席卷800万银元投入香港与南洋买地开厂”，究竟是否属实，须留待后人考证。又如桂柳会战溃退时，大量难民随军后撤，堵塞了六寨附近的钢骨水泥大桥，国民党军为阻止敌军前进而炸桥，人流还是拥护不停，张发奎唯恐耽误戎机，断然下令炸桥，五六百民众与大桥同归于尽。这是国民党军一六六师参谋长曹福谦在《湘桂黔大溃退目击记》中披露的事，列入注解供读者判断。

人的记忆是会产生偏差的，张发奎的记忆强于常人，但也有误记的事。例如：(1)“曾仲鸣被误杀了，暗杀曾的特工接着也被杀了”，这可能是1963年美国第35任总统肯尼迪遇刺案中杀手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等连环被杀事件引起的错觉。事实上，开三枪打死曾仲鸣的是戴笠贴身警卫王鲁翹，他赴台后官至台北市警察局局长，连他的儿子王章钧至今仍在台北市警察局局长任上。(2)“马当要塞司令逃跑”系误传，贻误戎机被蒋处决的是援军第一六七师师长薛蔚英。(3)“国民党中央委员陆幼刚路过柳州”，陆氏路过柳州时任军委会军风纪巡察团委员，抗战胜利后才当选中委。(4)1966年口述“何东爵士现在还健在”，其实何东已于1956年逝世。(5)“阙汉骞是黄埔一期生”，非也，是黄埔四期。(6)“六十三军军长林伟俦”，错！是六十二军。李方梆属五十四军，而非十八军。(7)“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屈服于银弹攻势”，戴戎光是江阴要塞唯一未加入中共地下党的高级军官，他的过错乃是30两黄金贿赂总统府军务局局长俞济时而幸获要塞司令职位。(8)“吴克仁没有及时撤出松江，结果投降了敌军”，错！六十七军军长吴克仁是指挥部队渡河时中弹殉国的。

有些错误是出于传主长期对蒋介石优待中央嫡系部队亏待地方部队而产生的

偏见，如他说“胡宗南部 60 万大军不发一弹就瓦解了”，胡宗南在陕南 11 年间整训的壮丁游勇总计不止 100 万，但先后调派劲旅增援重庆、桂林、新疆、北平、天津、豫西、郑州、徐州、许昌、豫东、太原以及裁撤缩编，实际留守关中者，不过第一军与二十九军而已，1949 年从陕南出发的十万大军转战千里后抵达成都仅剩 6 万人。张发奎对蒋介石重用外戚宋子文干政误国愤愤不平因而迁怒于蒋，说“蒋先生根本不想反攻大陆”，其实蒋介石醒里梦里都念念不忘反攻大陆。详见拙著《反攻大陆机密档案》一书。第十九章卢汉扣押陆军副总司令汤尧，也是误传，汤尧是在昆明事变一个半月后在蒙自兵败被俘的。

有些错误是访谈者听错的，如 1929 年 9 月 19 日，第四军在枝江击中中央军曹万顺部运兵轮“江靖”号，英文抄本说“曹万顺与副师长陈诚在另一艘兵轮上”，系误听，此时陈诚不在新一师——早在 1928 年 8 月就升任第十八军军长兼十一师师长，位阶已高过曹万顺。有些错误是因编辑人员疏忽而引起的，如说重庆谈判中毛泽东要求国民党让出 7 个省主席席位，其实是索要 5 个省主席、6 个副省长；又如将长沙绥署误为汉口绥署，将广州绥署误为广东绥署，将阎锡山、居正、李文范飞桂林请驾的 1949 年 5 月 2 日写成 1944 年，这些都是一举手之劳就可以查明的，哥大编辑人员却敷衍交差。

此书涉及的党、政、商各界名人都是 60 至 80 年前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如今大多数已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如（上海市长）陈良、国民党政府委员王伯群、立法院院长童冠贤、粤桂联军总司令刘震寰等人，译者均加注简历，以助阅读。原作中，传主提及的事件属浮光掠影者，均加注深入考据阐述。例如抗战前后黄埔保定陆大毕业生在国民党军的地位、抗战八年抽壮丁总数、田赋征实的来龙去脉、驼峰行动的绩效、桂柳会战受挫时难民逃亡路上的惨况、顾维钧与法国政府折冲樽俎的经过以及惩治汉奸条例的全文等等。张口说“有人说项英不是在现场被杀，而是后来中弹的”，译者则根据解密档案，注明项英确实不是被国民党军杀害，而是事变发生两个多月后在泾县赤坑山蜜蜂洞被其亲信部下刘厚总等人杀害，诱因是垂涎项英贴身所带金银财宝。

虽然中国名人的口述自传无一部能出其右，但是其英文抄本的编辑工作实在不敢令人恭维。美国人虽然财力雄厚，可惜重访谈轻编纂，故此书的编辑杂乱无章，英文抄本之重复、颠倒、缺页等多达近百页，串字错误则不计其数。访谈者最大的失策是采用“威妥玛（Wade Sir Thomas Francis）式拼音法”来翻译中国人名与地名。威妥玛（1818—1895）随英军参加鸦片战争，曾参与胁迫清廷签订中英《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烟台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官至英国驻华公使。他退职后出任剑桥大学第一任汉语教授，但是他对中文的认识实在肤浅得很，所以沿用近百年的“威妥玛式”拼写汉字方法贻害不浅。这种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方法，清辅音与浊辅音不分、s 与 sh 不分、ch 与 zh 不分，k 与 q 错乱，j, y, r 互相混淆，以至于湖口译成 ku kou，朱（Zhu）译成 Chu，金华县与清化乡都译成 Chin-hua，郭泰祺译成 Quo Tai-chi，湖北沙市（Sha si）译成

Shan si (山西), 杂志名《革命评论》译成 Ko Ming Ping Lun (国民评论), 斯重淦译成 Szu Chung Kan, 叶蓬译成 Yeh Feng, 陈克 (Ke) 文译成陈国文 (Chen Ko - wen)。

其次英文抄本的作者, 中文程度太差。美国口述历史协会会长唐纳德·里奇说, 制作抄本是口述历史计划花费最多时间与金钱的程序, 平均每小时的访谈需要约 6—8 小时的抄本制作时间, 包括仔细处理专有名词、简称、地名、方言俗语的过程。从英文抄本把何彤译为 Ho Tan (丹), 把翁照垣 (yuan) 译成 Weng Chao huan (桓), 张一麇 (lin) 译成 Chang - I - chan (麇), 张威遐译成 ChangWei - ?, 连遐迩闻名的遐字都不识, 自己留下一个问号。另一些属于中国史地常识的欠缺, 如日寇侵占贵州独山县是 1944 年 12 月 5 日, 而非 11 月 5 日, 显然无人核实把关。

第三是制作者与编辑者都缺乏起码的兵器常识, 以至于英文抄本出现“1.05mm 口径山炮”字样, 一毫米小于一颗米粒的厚度, 这样的炮弹能杀敌吗? 理应是 105mm, 1921 年“汉阳造”的山炮口径最小, 也有 75mm。

第四是英文词汇辨识力不够, 如把中国文房四宝之一的砚台 (inkstone) 译为 inkwell (镶在桌上或墨水台上的墨水池)。

第五是编排紊乱, 第十九章的李宗仁谋反文件, 其条、目、款符号用了英文大、小写与罗马字 I、II、III 等, 从属混乱, 主次颠倒, 令人莫名其妙。还有, 目录与内文实际页码迥异, 相差达九页之多。

第六是地名前后译法不同, 如富池口, 前头译 Fu Chih Kou, 后面译 Ku - Chia Kou。

第七是近音词或同音词译成同一个英文词, 如把广西鬱林与海南榆林都译成 Yu Lin, 把 168 万人口的广西柳州与 120 万人口的广东雷州都译成 Liu chow。

第八, 同音异字与同字异音: 胡志明译成 Ho Chi Minh, 何康译成 Ho Lien, 陈诚译成 Chen Cheng, 而郑姓也译成 Cheng, 程潜译成 Cheng Chien; 陆晶清译成 Lu Ching Ching。

第九, 拼错字引起笑话, 如把 Ordnance (军械) 串成 ordinance (法令)。

第十, 因广东方言引起的混淆, 如把广东肇庆译成浙江绍兴 (Shao hsing), 把黄如今译成 Huang Ju - chin, 黄宇人译成 Huang Yu - jen, R, J 混淆造成两人掉换或者合而为一, 其他因访谈者胡、吴不分, 受访者黄、王不分引起的舛错姑且略而不提。

第十一, 无缘无故的误译, 如把李良荣译成李元良 (Li Yuan - liang), 把吴铁城译成维天城 (We Tien - cheng), 把武文海译成阮文海 (Yuan Wen - hai), 把南江桥位于平江以北译成“平江以南”, 还有多处把日本陆军军衔“大佐”误译为 Admiral (海军上将)。

第十二, 迹近文字游戏, 如把集团军译成 Army Group, 把兵团译成 Group Army, 其实那是抗战期间与胜利以后的不同称呼, 其编制是一样的, 都包含二至

四个军。

第十三，华人洋名不加注，如 Hollington Tong 倘不注明中文译音，相信多数读者不会知晓这是指董显光。这就好比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所有人名全用表字而非名字，读者读到仲和、叔鲁、达铨、邻葛、伯唐、慕韩等等一头雾水，谁能明白是指章宗祥、王克敏、吴鼎昌、杨宇霆、汪大燮、孙宝琦等一品大官呢？像慕韩这一表字，近代名人至少有几十人选用。抄本的制作人忽略了这样的文章是写给读者看的，并非同老友聊天。纵观两岸出版的十几种近现代人名辞典，无一种是附注洋名的，可奈何？

第十四，对越、韩、日本等国文字一窍不通，以至于把越南革命党人 *Truong Boi Cong*（法文张佩公）称为公先生。日、韩、越三国本来都与中国人同文同种，在抗战期间，该三国人民与中国人都能用笔交谈，可惜这本《张发奎口述自传》的英文抄本吝于将英文译名附加汉字原文，所以在翻译过程中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如韩国志士 *Choe Tok Sin*，译者查考了《韩国史新论》、《韩国史大观》、《韩国四总统合传》、《国民政府与韩国独立运动史料》等五本厚书，竟一无所获，最后还是蒙韩国驻港领事馆的何小姐协助，才知是崔德新。崔氏在 60 年代曾任韩国政府外交部长，倘若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就犹如海底捞针了。译者为了书中 5 个日本姓名，耗费了三日去查《日本姓名词典》，不巧该辞典是以汉字编目的，查一个日本字就要从头至尾查 11 万个日本姓名，倘若是用英文字母编目，相信用不了五分钟就搞定了。

外国人名难于转译，中国人名从英文转译过来也不容易。张发奎的陆军小学同窗 *Kuan I*，乍一看去好像是关义，殊难想到是官讳，此人官至第一五九师师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即使中国人、中国书也弄不清这个讳字，大陆的出版物误作官讳。此书英文抄本里的上万个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耗费了翻译工作九成九的时间，有时一个人名要花费一周时间，几乎在黑暗中摸索，例如：（1）*Pei kan shan*, *Nantao* 这两个地名难倒了我这个老上海，前者是从 1973 年 12 月号香港《大成》杂志张发奎亲撰《八一三淞沪战役回忆》一文查明是北干山，后者则遍查多本上海地图而无果，最后从一本七十多年前的英文地图查明，原来是旧上海的市中心——南市，究竟南市为何译成 *Nantao*，那又是威妥玛的“创举”。（2）张发奎到华北视察的察哈尔省 *Kalgan*，经查考《中国历史地图》、《简明中国古今地理通名汇释》、《中国历史地图集》等书，才确定原来是张家口，其原名张垣，却不知何时称作“卡尔更”？（3）目前公开印行的中国地图与分省地图都查不到龙门、金牛、大坑口、新标营、弄吕、蒙圩、平舟、新街、赛湖、星子等村镇名，120 万分之一的分省旅游挂图只登具有旅游价值的县市，像于潜、龙邦等县尚付阙如，只能凭借译音逐个从卷帙浩繁的五巨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大辞典》中搜寻，有些地名在 1949 年后改掉了，查考难度无异牵牛下井。（4）*Chang Wei*—？这是个哑谜，只知他当过年余广西民政厅长，只好翻查洋洋洒洒的《广西通志》，遗憾的是该书目录含糊，只好逐页搜寻，直至第 21 册才查明此

人叫张威遐。(5) 孙宝刚是 50 年代香港第三势力的骨干人物，但由于其晚年穷戚潦倒，海峡两岸的名人辞书与民国人物传丛书都未将他列入，最后由台北的“中华民国国史馆”纂修胡健国先生帮忙找了 50 年代“总统府”资料室移交的六则香港报纸剪报以及两页官方档案，这才凑乎写出了孙宝刚简历注文。(6) Eugene Chen 是张静江女婿，遂从《张静江传》查出此人乃是陈友仁，顺带查出其妻名叫张荔英。(7) Li Jen Jim 是广西议长李任仁，这就有点猜谜语的天分了。(8) 张天爵从饶纪寰所著《张发奎与志锐中学》一文中查出，郑润琦从《粤军史实纪要》中查出，杨锦龙从《世纪风云——张云逸》一书查出，Chiang Tung-Chin（江董琴）从《邓演达传》查出。其余数千个人名、地名恕不赘述了。

本书史实沿用英文抄本原来的安排，用第一人称问答形式展现全部内容，未曾更动一字一句，唯阙疑处另以脚注阐明相异之史料，供读者自行判别。传主在全书中一贯对蒋介石尊称为“蒋先生”，仅有两处讲到激动处漏出“蒋介石”名讳。还有一次，访谈者问及大同书院特具政治倾向吗，张发奎显得不耐烦，但也按捺下脾气回答：“任何学校能脱离政治吗？我不懂你的问题！教育年轻人的目的是让他们成才以及为国家效力。没有人能远离政治”，毕竟张发奎的个人修养是光明磊落的。这也表明口述历史比一般的传记作品在语气、声调、情绪方面留下更生动、鲜活的记录。张发奎口述的粤语方言“过三胎”、“番禺捕属”、“李灯筒”、“李郎鸡”，粤谚“多只香炉多只鬼”、“执到金都唔笑”、“灵魂交付炼狱之后，便不需要和尚超度了”，歇后语“我不是一把夜壶——需要时才拿出来用”、“我像个老嫗——毋须再醮”以及西谚“胜利取决于战场上最后五分钟的坚持”等等，使得这本传记更加神完气足、引人入胜。

这本书的译注从 2002 年开始，时间跨度达 6 个春秋，2007 年冬每日投入 18 小时，边译边注边修改，九易其稿，在冥思苦索考订译名之漫长岁月中，往往与张发奎将军浑然一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几乎成了他的分身。皇天不负苦心人——上万个专有名词剩下仅六七个没有把握，俟有了新的发现后再在再版中予以纠正。照片我搜集了千多张，精选了一百多张配合内文而且精彩的编入书中，借以增进读者的阅读兴趣。

在本书译注过程中，吾友夏志清、胡健国、张之宇、张之丙、容若等不吝赐教，特此致以诚挚的谢忱。

译注者 胡志伟

农历戊子年正月初三日于香港